

4. 代表性论文

4.1 翻译传播系列论文

翻译传播效果动因解析^{*}

邓颖玲, 李 颖

(湖南师范大学 翻译传播研究所,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翻译传播过程不仅受到其内部机制的制约, 还受到传播所处环境和条件的综合影响。从翻译传播效果的产生机制来看, 翻译传播效果是翻译传播的内部要素与外部因素发生影响并相互作用的结果。翻译传播效果的内因产生于翻译传播过程内部, 是主体、译者、讯息、媒介、受体五个要素所发挥的自身作用和互动作用; 翻译传播效果的外因指翻译传播活动所处的社会环境, 包括文化差异、民众情感、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 它们对传播效果起着推动或制约作用, 并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使翻译传播效果得以产生。本文分析了翻译传播内外动因的影响方式和相互作用, 提出了翻译传播效果产生的分析模型。

关键词: 翻译传播; 效果; 动因; 内因; 外因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6431(2020)06-0178-05

DOI:10.13715/j.cnki.jxupss.2020.06.028

近年来, 为了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国积极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 孔子学院、“《大中华文库》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华学术外译”“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等大型翻译出版项目, 来华留学生支持项目, “汉语桥”活动等, 都是我国主动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有力举措。“走出去”战略中的项目大都是异语场景下开展的翻译传播活动。如此众多的翻译传播项目的实施效果如何, 是社会十分关切的话题。探讨翻译传播效果的产生机制, 分析影响翻译传播效果的动因, 是提升翻译传播效果的重要研究课题。

动因即动机、原因, 在生物学中指驱动因素或诱发因素, 在哲学上与“效果”相对, 是产生效果的驱动力。人类社会的任何活动都受到某种动因的影响, 在动因影响下产生的结果便是效果。翻译传播效果的动因指影响翻译传播活动效果产生的各种因素。对翻译传播效果动因进行全面的分析, 有助于深入了解翻译传播效果的产生机制, 帮助我们在推进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实践中有针对性地选取传播策略, 克服传播障碍, 改善传播效果。

一、翻译传播效果的产生机制

效果即“人的行为产生的有效结果”^[1], 它可以指某一具体行为实现其特定意图的具体程度, 也可以指这一行为对周围一切人和事物所产生的影响之和。人类传播行为所产

生的有效结果即传播效果, 既指传播行为所引起的受传者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 即传播者意图的实现程度, 亦指大众媒介的传播活动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结果。传播效果是整个传播理论研究体系中受关注度最高, 成果最多的领域^[2]。影响和制约传播效果的因素是复杂的, 因为传播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从传播活动自身内部来说, “从发出信息到受众接受信息, 中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环节和因素, 每个环节和因素都可能对效果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3]。从传播活动的外部社会环境来说, 传播过程不仅受到其内部机制的制约, 还受到传播所处环境和条件的综合影响^[4]。要理解传播效果的产生机制就要理解影响和制约传播效果的各种动因。

与一般传播活动不同, 翻译传播是异语场景中的传播活动, 其内部过程与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传播过程内部来说, 一般传播具有传播者、讯息、媒介、受传者、反馈五个要素, 翻译传播在上述五个要素之外增加了译者这个要素; 一般传播具有发出信息、传输信息、接收信息三个环节, 翻译传播在上述三个环节之外, 增加了语言转换环节^[5]。翻译传播活动的上述变化使翻译传播效果的产生机制具有特殊性。一般传播活动在同语场景中展开, 传播效果受语言差异、文化差异的影响相对较小。而翻译传播活动发生于异语传播场景中, 传播主体和受体具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 翻译传播主体发出的讯息要通过译者的语言转换后才能

* 收稿日期: 2020-09-07

作者简介: 邓颖玲(1965—), 女, 湖南醴陵人,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翻译传播研究;
李颖(1981—), 女, 湖南邵阳人, 湖南师范大学翻译传播研究所博士生、副教授, 主要从事翻译传播研究。

基金项目: 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重大项目“新文科背景下翻译传播学跨学科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2020JGZX006)。

到达受体,这些变化对于受体的讯息接受必然产生影响。对于翻译传播效果所受到的文化差异制约,学术界研究相对充分。然而,无可回避的是,翻译传播大多时候是跨文化的国际传播,其传播效果除了受到文化差异的制约外,还会受到民众情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差异的制约。

因此,翻译传播效果的产生机制就是翻译传播的内部要素与外部因素发生影响并相互作用的方式,翻译传播效果的产生是内外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影响翻译传播效果的内因

内因即内部影响因素,产生于翻译传播过程各要素自身和要素间的互动关系之中。美国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曾提出对传播界影响深远的“传播过程五要素理论”,其中五要素指的是传播者、讯息、媒介、受众和反馈^[10]。翻译传播过程较之一般传播增加了译者,所以包括主体、讯息、译者、媒介、受体和效果六个要素^[172]。其中,翻译传播主体、讯息、译者和媒介属于传播行为的主动发出方,其自身形象、在翻译传播过程中作用的发挥,以及相互间的互动关系均会对翻译传播效果产生推动或制约作用。受体是传播过程中讯息的接收者,对接收到的讯息产生接受、无视或排斥反馈。受体的反馈是传播效果最直接的反映,是制定新一轮翻译传播活动决策的重要依据。翻译传播过程各要素自身对翻译传播效果发挥作用,同时各要素之间的互动也会对翻译传播效果产生影响。

(一) 翻译传播主体影响

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才能进入传播渠道^[143-153],这体现了传播者对于讯息具体内容的把关作用。翻译传播主体就行使着“把关人”的职责。主体是讯息的主动发出者,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对于受体认同传播行为、接受译语讯息等非常重要。举个浅显的例子,如果我们信任一个人,则会爱屋及乌地去相信其所说,支持其所为,甚至追随其做法,这就是传播效果产生的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

翻译传播主体在整个翻译传播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把关人”责任与权力不仅仅是把关讯息的内容,还包括确定译者、译法、讯息的呈现形式、传播媒介、目标受众等翻译传播过程中的各个细节。传播主体在任何一个方面的决策失误都可能影响讯息的传播效果。比如:在3~6岁幼儿绘本的翻译传播方面,如果传播主体缺乏对目标受众群体特征的考察,就可能出现译作外观缺乏童趣、作品内容不符合该年龄段儿童认知能力和喜好等情况,从而影响传播效果。同时,翻译传播主体的决定也会受到其他要素的影响。以受体对主体的影响为例:译作在正式出版前一般会先选取部分读者进行“试阅读”,试阅读的反馈会影响翻译传播主体的决策,促使传播主体在译作进入市场前对内容和形式做进一步完善。

(二) 译者影响

译者是翻译传播过程中的关键要素,他们所从事的翻译

工作使翻译传播效果的产生成为可能。译者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主要通过译者形象、译者对翻译过程的控制以及译者与其他要素的互动来实现。

首先,译者的身份和影响力对传播效果会产生影响。如果译者具有名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其译作更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此外,译者对翻译过程的控制对传播效果产生直接影响。译者的控制可分为主动控制和被动控制两个方面。主动控制指译者通过自身的知识图式和主体意识来决定翻译活动的各个细节。如果译者的知识图式不足以完成某项具体翻译任务,译文质量则会受到影响;在知识图式能满足翻译任务的情况下,翻译策略和译文风格将体现译者的个体审美。译文质量的高低,译者审美是贴近受体还是远离受体,均会给传播效果带来影响。葛浩文在翻译莫言的作品时,充分发挥译者的主动性,根据目标受众的语言和认知习惯,在风格上对原作进行了一定调整,获得了西方世界的一致认可。被动控制是指译者受到翻译传播过程其他要素的影响而做出的翻译决定,并在译语讯息中体现出来。如我国出版社在翻译出版其他国家英语教材时,会要求译者去除不符合我国国情和意识形态的内容,这对译者来说是被动控制所产生的结果。

当然,译者也并非完全被动地根据其他要素的反馈对翻译进行调控,他们可以结合自身丰富的异语文化知识和翻译工作经验,主动向传播主体、媒介等要素提出自己的传播建议。在互联网时代,译者与受众的接触渠道日渐增多,译者可以根据受众的反馈及时调整翻译策略,从语言转换环节获取最佳的翻译传播效果。

(三) 翻译传播讯息影响

翻译传播活动中的讯息包括原语讯息和译语讯息,其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作品形象上。作品形象包括原作形象和译作形象,原作形象是指作品在同语场传播中受体心目中的形象,译作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异语场受众心里的作品形象,由译作的思想内容、文本类型、语言表达、呈现形式等要素构成。一般而言,原作形象在同语场传播中对传播效果的影响通常大于在异语场传播中的影响,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异语场受众是通过对比译作的兴趣来激发对原作的兴趣的。因此,贴近目标受众思维习惯和文化习俗的内容更容易被受众接受。

由此可见,在翻译传播过程中可以通过调节讯息要素来提升翻译传播效果。首先,在讯息内容的选择方面要注重寻找与目的语区域文化的结合点,了解目标受众的政治背景、文化倾向和价值取向,在不违背作品中心思想和传播意图的情况下,尽量与目标受众的喜好和需求相契合。其次,译语讯息的表述应尽量贴合目标受众的表述习惯,否则译作难以被受体接受。华裔作家刘宇昆翻译的《三体》(第一部)截至2018年3月31日被全球1149家图书馆收藏,创造了中国图书译著有史以来的最高馆藏纪录^[4],其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作品译文流畅,表述方式贴合受众语言习惯,在英语世界树立了《三体》作品形象,对翻译传播效果产生了良好的

影响。

(四) 翻译传播媒介影响

译语讯息通过翻译传播媒介向受体传播,所以媒介与受体有大量直接接触的机会。媒介分为媒介技术和媒介组织。媒介技术指用于传递信息的载体和技术手段,如图书、报纸、电视、电脑等;媒介组织指从事信息采集、加工和传播的社会机构^[115]。媒介技术的形式和媒介组织的形象均会直接影响受体对讯息的选择与接受情况。从媒介技术对传播效果的影响来看,通过互联网传播的讯息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远远大于通过图书、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传播所产生的影响,这是人类社会生活方式变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相比之下,媒介组织的形象对传播效果的影响更具可控性。媒介组织的形象一般包括媒介的权威性、公信力和亲和力。迄今为止,大众传媒仍然是翻译传播的主要力量。当前国际社会中存在一些国际公认的主流大众媒体,如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同样的讯息如果由这些媒体报道出来,其传播效果是一般媒体报道无法企及的。这些媒体历史悠久,信息来源广泛,有敏锐的新闻嗅觉,善于抢占舆论先机,且背后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支持,所以长期控制着国际舆论导向,逐步形成了其自身的权威性。

媒体的公信力一般与权威性成正比,但由于公信力并非一种完全客观的认知,它强调受体对传播主体和讯息的主观判断,所以在某一目标群体中享有良好信誉的媒体,在其他受众群体中有可能毫无影响力,这种情况在国际传播中非常普遍。一般来说,国家主流媒体代表该国当权机构的政治立场,所以如果一国主流媒体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媒体,其公信力会随之上升,该国的主张也会获得更多受众的支持,这对于一个国家争取国际话语权而言至关重要。我国的主流媒体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在国内享有高公信力,但国际公信力还有待增强,这是制约我国在国际社会发声的因素。同时,翻译传播媒介的亲和力也有助于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一板一眼的翻译传播媒介形象已经不能满足信息社会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传播主体开始转向更为亲民的媒介形式,如《人民日报》开微博,《中国日报》推出公众号,《新闻联播》入驻短视频平台,都收获了“现象级”传播效果。

媒介类型丰富,各有特点,不同的媒介对不同的感官起作用^[116],所以翻译传播主体需要充分结合讯息和受体的特点来选择合适的传播媒介。麦奎尔(Denis McQuail)曾经提出“媒介能力”和“媒介效果”的概念,证明媒介具有有意无意地影响受体心理、态度和行为的能力,并且所产生的影响在个人、社会、制度或文化等层面均有可能发生^[380-381]。媒介与其他要素互动的过程,也是媒介影响翻译传播效果的过程。

(五) 翻译传播受体影响

受体对翻译传播效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受体对讯息的接收上。受体态度的形成及其对讯息的选择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受体的先验观念,即受体脑海中固有的对

外界事物的印象和观点。这种观念可能形成于潜移默化的长期经历,也可能产生于刻骨铭心的瞬间经历。不管出于哪种原因,一旦形成便难以改变。二是受体的自身因素,包括个人属性(如年龄、性别、家庭地位、学习经历、工作经历、收入水平等)、个人需求、讯息获取习惯、获取讯息的机会等^[350-351],这些因素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三是受体受到的群体影响。群体压力理论(Group Pressure Theory)认为,群体压力会对受体接受媒介讯息产生影响^[233]。任何受体都是团体中的一分子,为了得到团体的认可与接纳,受体可能倾向于与团队中的“意见领袖”或“大多数”保持意见一致,即常见的“从众心理”。受体在这些因素的引导下,对“可得性”讯息产生个人认知与态度,并付诸行动。

翻译传播活动在异语场景中发生,影响受体认知和行动的文化背景、成长环境、生活状态等因素差异性很大,所以对同一讯息产生不同认知和行动的可能性也很大,这也是异域文化中的认知情感差异。一般而言,受体对于符合自身原有认识或能满足自身诉求的讯息持喜欢和接受态度,反之则产生下意识的排斥和拒绝。所以,从受体角度来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改善翻译传播效果:一是提高讯息的曝光率,增加获取渠道,让受体有机会接触讯息;二是锁定目标受体,结合目标受体的个人属性、社会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开展翻译传播活动,让讯息以适当的方式、方法接近目标受体,实施传播学中的劝服性传播^[117];三是让目标受体中的部分人成为“意见领袖”,让意见领袖将讯息“从他们那里传达到人群中不太积极主动的那些部分”^[389],以此获得更多关注度、点击量、阅读量、销售量等。

三、影响翻译传播效果的外因

从翻译传播过程的社会模式可知,影响翻译传播效果的外部因素众多,如传播主体的公众形象和人格结构、传播主体所处的组织和社会环境、受体的自我印象和人格结构、受体生活的群体和所处的社会环境等^[340]。一般来说,讯息发出的外部环境受体所处环境的趋同度越高,越易产生好的传播效果,反之则会制约传播效果。对于影响翻译传播效果的外部环境,学术界多从文化差异进行分析^[118-119]。文化差异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加界定地使用不利于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本文认为,翻译传播面对的文化差异主要指不同国家或区域的人群之间在语言、种族、宗教及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差别。影响翻译传播效果的外部因素有四种:文化差异、民众情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它们分别从认知、心理、观念和管理四个层面对翻译传播效果产生影响。

这四种外部因素对翻译传播的影响是全过程的。虽然对受体的影响比较直接,因为受体对翻译传播讯息的接受直接受到文化差异、民众情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制约,但这些外部因素对传播主体等其他翻译传播要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传播主体对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策略、传播技巧的选择,译者对翻译策略、翻译技巧的选择,讯息文本的生成,媒介对传输方式和传输时间节点的选择等,同样受到这

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反过来,翻译传播各要素通过翻译传播行为的实施,又对这些外部因素也会产生影响。这就是翻译传播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内外因素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总和就是翻译传播效果。

(1) 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是人们由于宗教、种族、群体、阶级、语言、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不同而产生的差别,它影响人们的社会认知。翻译传播是在异语环境进行的传播,所面对的文化差异主要是由语言、种族、宗教及受教育程度等不同带来的差别。由于存在文化差异,同样的事物在不同国家或区域的人们那里唤起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文化差异越小,越容易获得受体的认同,翻译传播的效果越好。文化差异越大,越不容易获得受体的认同,也越不容易获得好的翻译传播效果。

比如汉英对照版《大中华文库》的封面采用的是黄色,反映了中华民族的颜色喜好;当出版汉语和阿拉伯语对照版《大中华文库》的时候,为了便于阿拉伯地区民众接受,就采用了伊斯兰文化喜好的绿色。中医作为中国的传统医学,在国内受到普遍认可。由于文化认同上的差异,中医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在西方国家受到质疑,传播艰难。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曾经质疑中医的国家纷纷建起了中医馆,中医典籍和资料也在英语世界广泛传播。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爆发期间,很多国家接受了中医能有效缓解新冠症状、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的事实,对中医由质疑与排斥逐渐转变成信任与接受。

(2) 民众情感

民众情感是指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民众对事物的心理感受。翻译传播活动在原语国家(或区域)与译语国家(或区域)之间进行,毫无疑问,两个国家(或区域)的民众对对方国家(或区域)的情感影响翻译传播效果。两个国家(或区域)的民众对对方国家好感度越高,越有利于翻译传播活动的进行,翻译传播的效果越好。反之,好感度越低,越不利于翻译传播活动的进行,翻译传播效果越差。两个国家(或区域)彼此之间的民众情感的产生受国家关系的影响,也受彼此在对方的心理感受中的形象影响。这种影响既可能缘于历史,也可能缘于某种突发事件。国家之间民众好感度与翻译传播效果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民众对翻译传播讯息的接受会影响其好感度,而好感度反过来又影响民众对翻译传播讯息的接受。

比如,2019年10月5日,美国NBA休斯敦火箭队经理莫雷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了一张支持港独的英文图片,立即引起了广大中国网民的愤怒,拥有最多中国球迷的火箭队遭到了中国球迷的抵制。研究表明,“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及其与相关媒体的接触会影响到民众对华的好感度”,而“美国民众的对华好感度往往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立场,认为中国是美国盟友的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更友善,反之,则更排斥中国”^{[13] 137}。

(3)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人们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是社会观念的总和。每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或主要阶层总是以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同国家之间的主流意识形态可能趋同,也可能存在差异甚至敌对。国家之间主流意识形态趋同有利于翻译传播活动开展,产生较好的翻译传播效果;国家之间主流意识形态差异越大,越不利于翻译传播活动的开展,翻译传播效果越差,甚至使翻译传播活动不能开展。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通过社会观念和社会舆论影响制约翻译传播的环境,间接地影响人们对翻译传播讯息的接受,另一方面通过外化为内容审查等社会制度制约翻译传播活动的开展。

翻译传播大多是跨国、跨区域的异语传播,翻译传播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是普遍的。比如,美国的反共文化传统根深蒂固,所以“Communist”一词在美国文化中带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是一个体现浓厚冷战思维的政治符号。“美国人对‘中国的 Communists’一词抱有强烈敌意,其敌意程度仅略低于对‘基地组织成员’的敌意程度。”^{[13] 173}由于“Communist”在美国社会文化中的强烈负面意义,美国的政治家、外交家、评论家、媒体人员等“贬低中国的时候,就往往不动声色地甩出这个词”^{[13] 17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中国理念,已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产生了日益广泛深远的国际影响。但是,“‘作为发展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世界建构理念,它的国际传播必然遭遇意识形态困境。”^{[14] 112}一方面,全球意识形态之间的排斥,使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国际传播受到阻碍。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处于维护其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需要,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进行扭曲。“西方国家的学者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扭曲为民族主义和理想主义,甚至中国主义等,充满了傲慢与偏见。”^{[14] 113}由此可见,意识形态是影响翻译传播效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

(4) 社会制度

社会制度对翻译传播效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翻译传播活动所处国家的法律、规章、标准、要求等对于翻译传播活动的实施具有制约作用。具体来说,社会制度对翻译传播效果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翻译传播内容的审查,二是对翻译传播活动的社会管理。

在翻译传播内容的审查方面,任何不符合受众国舆论环境、意识形态、法律制度等的讯息都会受到传播限制,这是由各国、各地、各行业的制度差异带来的传播障碍。社会管理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是为了保障在本国开展的翻译传播活动符合本国社会的利益和需求。《金瓶梅》在20世纪英美两国的官方传播渠道上一直步履艰难,因为“维多利亚时代颁布的《1857年色情出版物法案》在1959年以前一直有效,因此在20世纪前半叶仍然是英美两国文学审查制度共同的法律依据,成为高悬在涉性文学作品头上的一把利剑”^{[13] 41}。同样,我国出版机构在翻译出版国外图书的时候,也会进行内容审查。

与翻译传播活动相关的社会管理复杂多样,如人员出入境管理、出版物市场准入、卫星电视频道落地许可、广播波段的管理、电影上映许可、网站建设备案、著作权登记等。以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我国为例,我国于2004年出台了《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管理办法》,所有申请入境的外国电视频道都必须接受审核,取得落地许可后才能依法播出。

结语

对翻译传播过程中各要素作用以及要素之间互动关系的分析阐明了传播效果产生的内部影响因素;将翻译传播活动置于现实生活中,帮助我们理解外部环境因素对传播效果所产生的推动或制约作用。内外因素的互动,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翻译传播效果的动态图景。对翻译传播效果动因的解析有三个方面的现实意义:一是对于制定翻译传播规划提供决策参考;二是对于翻译传播项目的具体实施提供方法指导;三是对于建立翻译传播效果的监测评估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当前,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理念,与世界分享中国创造,国家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翻译传播效果动因研究将会帮助我们寻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策略和路径。

参考文献:

- [1]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第二版)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 [2] 段鹏. 传播效果研究: 起源、发展与应用 [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 [3] 尹飞舟,余承法. 翻译传播学论纲 [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
- [4] McQuail, D. & Windahl, S. Communication Models [M]. Long-

man,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Publishing Group, 1981.

[5] Lewin, Kurt. Frontiers in Group Dynamics: II. Channels of Group Life; Social Planning and Action Research [J]. Human Relations, 1947, 1(2).

[6] 绕翔,郭超.《三体》的传播与影响 [EB/OL]. 中国作家网.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1129/c427894-31482403.html>.

[7]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M]. 何道宽,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

[8] 丹尼斯·麦奎尔. 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五版) [M]. 崔保国,李琨,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9] 董璐. 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第二版)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0] 卡尔·霍夫兰,欧文·贾尼斯,哈罗德·凯利. 传播与劝服: 关于态度转变的心理学研究 [M]. 张建中,李雪晴,曾苑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1] 关世杰. 思维方式差异是影响中美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维度 [J]. 编辑学刊,2010(2).

[12] 王鑫,肖唐镖. 美国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 [J]. 江苏社会科学, 2015(5).

[13] 范勇. 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的意识形态偏见词语与“中国形象”塑造——基于对《纽约时报》的实证研究 [J]. 湖北社会科学,2009(8).

[14] 刘英杰,徐菲.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国际传播的意识形态困境及应对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11).

[15] 齐林涛. 原作之死——《金瓶梅》英译的去经典化研究 [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

责任编辑: 立 早

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Effect

DENG Ying - ling, LI Ying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not only restricted by its internal mechanism, but also influenced by its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ffect - producing - mechanism,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effect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nternal factors are generat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se factors refer to the exertion of self - functions and interactive functions of subjects, messages, translators, media and receivers in producing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effect. External factors derive from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are promoted, and the factors include cultural differences, people's emotion, ideology and social system. External factors always change with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environment. They either promote or restrict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The interac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gives rise to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eff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mod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An analysis model of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effect is put forward as well.

Keywords: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effect; influence factor; internal factor; external factor

翻译传播学论纲^{*}

尹飞舟, 余承法

(湖南师范大学 翻译传播研究所,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主要是跨语言的翻译传播, 长期面对克服传播障碍、提升传播效果的根本问题, 构建翻译传播学则是为解决这一根本问题提供理论支持。翻译传播是异语场景中人类借助翻译实现的信息传递活动。翻译传播学是研究翻译传播本质及其规律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 是传播学的分支。以推动翻译传播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为宗旨, 将翻译传播作为整体进行考察研究, 阐释其本质属性, 分析翻译传播与传播、翻译的关系, 论述翻译传播学的学理支撑、基本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社会应用, 初步构建翻译传播学的基本框架。

关键词: 翻译传播; 翻译传播学; 翻译; 传播; 本质属性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6431(2020)05-0170-07

DOI: 10.13715/j.cnki.jxupss.2020.05.028

引言

后新冠疫情时代, 国际文化交流将面临严峻的局面。面对西方反华势力的围堵和敌对媒体的妖魔化, 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遭遇的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传播障碍更为严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总结以前的相关研究成果, 构建翻译传播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 系统地研究以跨语言传播为特征的翻译传播内在规律, 研究克服传播障碍、构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形象的策略,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学术界对于翻译传播的关注与研究已经有过一段历程。20世纪末以来, 吕俊^[1]、孟伟根^[2]、姚亮生^[3]、唐卫华^[4]、张生祥^[5]、谢柯和廖雪汝^[6]等人相继将传播学理论引入翻译研究, 开创了翻译学研究的新空间, 并出现了构建翻译传播学的呼声。他们的研究沿着一个共同的理论路径展开: 将翻译作为研究的起点, 运用传播学理论对翻译做出新的解释。吕俊认为翻译“其本质是传播”^{[1] 39}; 谢柯和廖雪汝认为“无论从传播的定义还是从翻译的性质来看, 翻译的本质属性是传播”^{[6] 15}; 唐卫华提出“翻译即传播”^{[4] 48}; 张生祥认为“翻译与传播互为一体”^{[5] 117}。顺着这种理论路径, 必然得出“翻译学是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的结论。^{[1] 44} 笔者认为, 这种“从翻译看传播”的理论路径促进了翻译与传播研究的融合, 但就构建翻译传播学来说, 有些关键问题还需要廓清。

基于此, 本文试图回答翻译传播学构建的五个基本问题: (一) 在现有学科认知背景下, 翻译传播的本质与翻译传

播学的定义分别是什么? (二) 翻译传播学的学理支撑是什么, 与传播学、翻译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是什么? (三) 翻译传播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四) 翻译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五) 翻译传播学有哪些社会应用?

一、翻译传播的本质与翻译传播学的定义

要明确翻译传播学的定义, 首先要回答“翻译传播是什么”。我们转变研究路径, 以传播为起点来考察传播与翻译的关系, 回到认识的源头, 从现象考察和概念辨析明确传播 (communication)、翻译 (translation) 与翻译传播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的关系。

(一) 传播的界定

施拉姆认为“传播发生的关系看上去很简单: 两个人 (或两个以上的人) 由于一些共同感兴趣的信息符号而聚在一起。”^{[7] 43} 甲乙两个人的对话是最简单最直观的传播事例, 其中包含着传播的要素和基本原理。拉斯韦尔、施拉姆等传播学大师以及一些传播学经典教材论述传播定义、传播过程, 都从这种最简单的传播事例解析入手。“传播”概念的归纳和表述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复杂到简单明晰的发展过程。20世纪70年代, 施拉姆并没有给出“传播”的准确定义, 只是表明“传播是工具, 社会之所以成其为社会全赖传播这一工具”;^{[7] 2} “传播是人们所做的某种事情。传播本身没有生命, 没有任何神奇的东西, 唯有人们在传播关系中注入其中的讯息。讯息本身没有意义, 唯有人们注入其中的意

^{*} 收稿日期: 2020-08-09

作者简介: 尹飞舟 (1957—), 男, 湖南武冈人, 博士, 博士生导师, 湖南师范大学语言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翻译传播研究所所长;

余承法 (1974—), 男, 湖北安陆人, 博士, 博士生导师,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语言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基金项目: 本文受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重大项目“新文科背景下翻译传播学跨学科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2020JGZX006) 资助。

义。”^{[7] 4}20世纪末,斯蒂文·小约翰在《传播理论》中仍然认为“给传播下定义是很困难的”^{[8] 9},因为根据传播行为有无目的、传播讯息是否被接受,可以给出不同的定义。“‘传播是对一个思想或想法的口头交换。’这一定义包含的假设是一个思想或想法成功地得到了交流。另一方面,另一个定义则未对结果的成功与否做出判断‘传播是信息的传递。’这里信息得到了传递,但它不一定被接收或被理解。”^{[8] 10}如今,传播学界对“传播”的界定比较简明“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9] 4}、^{[10] 36}“**传播就是信息流动的过程**”^{[11] 19}

(二) 翻译的界定

中国对于“翻译”的认识可以上溯到周代《礼记·王制》记载“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12] 2}借鉴上述传播学使用的直观事例解析翻译:甲与乙说话,双方使用的语言不同,请来了懂双方语言的丙,丙把甲说的话用乙的语言说给乙听(或者相反),丙的行为就是翻译,丙就是译者。随着翻译形态和翻译技术的发展,人们对“翻译”的认识逐渐丰富。《辞海》:“翻译: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13] 5072}《牛津英语词典》对“翻译”的解释包括三个方面,即**翻译行为、翻译过程和译作**。方梦之在《中国译学大辞典》中对“翻译”的界定有了新的内涵,他认为翻译包括口译、笔译、同传与机译,是有文本参照的跨文化、跨语言的人类有目的的社会交际行为与活动。^{[14] 7}翻译自身在手段、形式和方向上发生的变化使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发生改变,如黄忠廉起初给出的“翻译”定义很简洁“翻译是双语间的信息转换”^{[15] 4},他最近对“翻译”给出了准确而丰富的定义“翻译是人或/和机器将甲语文化变化为乙语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16] 11}

但是,无论翻译的内涵或外延发生多大变化,其本质依然是符号(尤其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正如仲伟合所言“无论是奈达的‘等效’翻译还是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无论是斯坦纳的‘翻译哲学阐释’还是雅各布森的‘翻译三分法’,都没有离开‘**符号转换**’与‘**意义的再生**’而谈翻译。无论我们从哪个视角对翻译进行定义,都不能忽视翻译这个最根本的本质。”^{[17] 10}

(三) 翻译传播的本质

甲乙使用的语言相同,可以直接进行讯息交流;甲乙使用的语言不同,就不能直接进行讯息交流。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使用不同语言的甲乙要完成讯息交流,就必须通过丙进行翻译(符号转换),这就是最简单的翻译传播形式。从传播的语言(或者符号)使用来分析,传播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传播过程中使用同一种语言,称之为同语传播(一般传播);另一种是传播过程中使用不同语言,称之为异语传播,即翻译传播。在异语传播中,译者丙的参与不仅增加了传播要素,而且使传播过程和传播要素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不同于一般传播的特殊性。因此,**传播的一般属性和“语言转换”**

的特殊性相结合,构成了翻译传播的本质属性。这种最简单的翻译传播形式,在加上参与的人数及结构、手段和媒介、时空、场景以及方式的变化之后,就会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类型。根据**主体情况**的不同,翻译传播可分为:**人内翻译传播和人内翻译传播构成的微观翻译传播,群体翻译传播和组织翻译传播构成的中观翻译传播,大众翻译传播即宏观翻译传播**。根据**语言转换的场景**,翻译传播又可以分为**现场翻译传播(口译为主)和非现场翻译传播(笔译为主)**。

(四) 传播、翻译、翻译传播的关系

经过对客观现象的考察和概念的辨析,可以明确传播、翻译、翻译传播三个概念及其关系:传播是人类信息的传递活动,包括同语信息传递和异语信息传递;翻译是符际转换(主要是语际转换)活动;翻译传播是异语场景中人类借助翻译实现的信息传递,是有符际转换(主要是语际转换)的传播。在“翻译传播”这个概念中,“翻译”与“传播”不是“翻译即传播”“翻译与传播”,而是“翻译的传播”,其英译名称是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五) 翻译传播学的定义

综上所述,翻译传播是伴随着语言转换的社会交往活动,研究翻译传播现象,不能脱离人们的语言转换和社会交往。翻译传播学是研究翻译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是阐释人类使用不同语言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与交流的知识系统。

二、翻译传播学的学理支撑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构建翻译传播学,需要明确其与传播学、翻译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关系,厘清其间的交叉和分界,这样才能理解翻译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普遍联系,同时认识其相对独立性。具体来讲,就是要阐明传播学、翻译学以及其他学科在翻译传播学的构建中提供的理论和方法,同时明确翻译传播学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及其理论创新空间。

(一) 翻译传播学与传播学

翻译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从学科史来看,传播学发展曾经依附于新闻学。传播学在我国至今仍是新闻传播学下属的二级学科。有学者指出,传播学未来的发展呈现出两极趋势: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一方面会将传播学引向更加细化的研究,一方面又会将传播学引向整合的全息文化研究。现存媒介传播的主要是大众文化,未来的信息高速公路传播的将是涵盖各个层次文化的**全息文化**。”^{[18] 45}传播学的整合发展将产生基础传播学,另一方面,“传播学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18] 45}翻译传播学应该成为传播学要开辟的诸多专业领域之一。

就目前的学科理论体系来看,传播学与翻译传播学的关系是**基础学科和专门学科之间的关系**,好比基础医学与外科学或者儿科学的关系。传播学的基本概念、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适用于翻译传播学。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同语场景中的信息传递,极少关注异语场景中信息传递的特殊规律,而这正是翻译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二) 翻译传播学与翻译学

异语场景中传递的信息要经过语言转换,这是翻译学的研究对象,也是翻译传播的一个环节,因此翻译传播学和翻译学的研究存在交叉。语言转换是翻译传播中信息传递特殊性的根源,翻译学因此可以给翻译传播学提供系统的语言转换原则和方法。翻译学以信息传递中的语言转换为研究内容,涉及翻译的原则、策略与方法、行为过程及其结果(即译作)。翻译传播学的研究内容是异语场景信息传递的全过程,研究翻译传播的主体、客体、译者、媒介、受体、效果等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需要在翻译学之外借助传播学及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翻译学研究过去较多关注翻译行为及其结果,近年来随着重视中华文化“走出去”,开始考虑传播过程和效果,但往往将翻译和传播视作两个阶段;翻译传播学则认为翻译只是翻译传播过程的一个环节,将翻译传播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在逻辑上,翻译传播学与翻译学存在着包含关系,但是两个学科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均存在差异。因此,翻译传播学与翻译学是研究领域存在交叉的关联学科。

(三) 翻译传播学与其他学科

翻译传播学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除了传播学、翻译学之外,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跨文化传播学、语言学、符号学、社会心理学、媒介学等。“跨文化传播学的存在意义及学科本质,就是通过对人类文化差异的研究,求得对人类生活的社会和时代的理解,最大限度地克服差异所制造的交流障碍。”^{[19] 89}从符号运用来看,跨文化传播有语言交流和非语言交流。从传播区域看,跨文化交流有国际交往和国内交往。^{[20] 2}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国际交往和语言交流与翻译传播学是相关联的,翻译传播学可以借鉴跨文化传播学中关于克服文化差异障碍的相关理论和方法。

传播学阐释传播机制以及翻译学阐释翻译机制,都借助符号学与语言学,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是翻译学的“一个最重要的流派”^{[21] 75},翻译传播学阐释信息传递机制同样需要借助符号学和语言学。在研究翻译传播媒介时,翻译传播学需要借助电视学、编辑出版学、广播学等专门的媒介学理论;在研究翻译传播受体时需要借助社会心理学等。

(四) 翻译传播学的研究特性

相对于翻译传播学的学科构建来说,人们对翻译传播现象的关注出现较早。近年来翻译学研究的一个明显趋向就是在研究翻译行为的同时研究译作的传播。^{[22] [23] [24]}“翻译+传播”的研究对于纯翻译研究有所拓展和超越,为翻译传播学的构建提供了学术土壤。

翻译传播是一种普遍存在且具有特殊属性的传播现象,需要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传播学目前缺乏对这类特殊传播现象的研究,当下国内翻译学研究开始注重这类传播现象的一个环节。因此,翻译传播学的构建十分必要。翻译传播学对翻译传播进行整体考察,从客观现象出发,揭示其本质,研究其整体运行中的策略运用与最佳效果。

翻译传播学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翻译传播是传播的一种特殊形式,具有传播的一般属性和自身的特殊

性,对翻译传播一般属性的阐释来自传播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对翻译传播特殊性的阐释来自运用传播学、翻译学及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的开创性研究。翻译传播的技能、策略及监测评估模型等应用研究来自运用翻译传播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对相关案例的分析和总结。

三、翻译传播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翻译传播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就是翻译传播的本质与过程。其中,过程研究包括过程总论(过程模式)和分论(六个要素)。虽然语际转换和效果都是翻译传播过程中的环节,但其关键性和重要性使其可以单独作为翻译传播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因此,翻译传播学的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翻译传播的本质、过程、语际转换和效果四个方面。翻译传播本质在本文第一部分已作论述,过程模式、主体、客体、译者、媒介、受体、效果等论述如下:

(一) 翻译传播过程模式

拉斯韦尔从传播的简单形式入手对传播过程作了论述,提出了经典的传播过程“5W”理论“描述传播行为的简便方式就是回答下列问题: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取得什么效果?传播过程研究往往集中于上述某个问题。”^{[25] 35}翻译传播过程中加入了译者,即“Who translates”,这是翻译传播特有的要素,由此构成了翻译传播的6W(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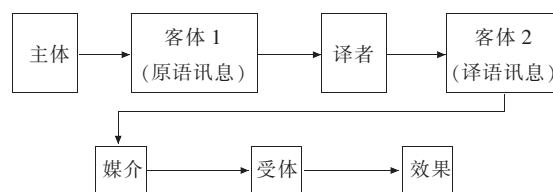


图1 翻译传播过程示意图

翻译传播六个要素中,效果是其目的与结果;作为客体的讯息是联结各个要素的焦点。主体、译者、媒介及受体处于翻译传播过程的四个环节:发起环节以主体为中心,发出讯息;翻译环节以译者为中心,完成讯息的语言转换;传输环节以媒介为中心,传输讯息;接收环节以受体为中心,接收讯息。

运用传播学阐释传播过程的一些模式^{[9] 50-56}来阐释翻译传播过程,可以揭示翻译传播的特性。图1的翻译传播过程是单向的,可称为线性模式,显示了翻译传播过程的组成要素。如果把现实中传播的双向性、主体与受体的角色互换考虑进来,就是翻译传播的循环模式。翻译传播往往是多种翻译传播活动相互影响的综合过程,这种影响既可能是共时的,也可能是历时的,在考察具体翻译传播活动时加入其他翻译传播活动的影响,就是翻译传播过程的系统模式。现实的翻译传播是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翻译传播受到政府和机构、社会制度、舆论、民众心理、社会习俗等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对社会产生作用和影响,这就形成了翻译传播的社会模式。

(二) 翻译传播主体

翻译传播过程的首个要素是翻译传播主体,即传播者,

是翻译传播活动的发起者,控制整个过程并且影响传播效果。

分析翻译传播主体如何控制过程并影响传播效果,是翻译传播主体研究的主要内容。在现实中,翻译传播主体是传播行为的责任主体,具有五个方面的**责任和权力**:决定翻译传播内容,确定呈现形式,选择媒介方式,挑选译者并与之互动,提供实施翻译传播所需的条件。翻译传播主体呈现出多种形式,个人、群体、组织都可以成为传播主体,掌握完成翻译传播所需的语言技能,确定完成翻译传播所需的人员或设备。

(三) 译者

研究如何实现语际转换,阐明译者在翻译传播中的定位与作用,研究译者的活动及其与其他要素之间的互动,从译者角度研究提升翻译传播效果的策略,这些构成了翻译传播学关于译者研究的主要内容。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但不一定是翻译传播的主体。译者是翻译传播过程中从事翻译活动的人、机器或者二者的组合。译者是讯息从原语到译语的转换者,是译语讯息的“把关人”。**译者的主体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译者是翻译传播的关键要素,没有译者的参与翻译传播就无法实现;其二,译者参与讯息传递的内容筛选。译者研究中,关于翻译标准或原则、策略和方法、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翻译技术的运用等,翻译传播学与翻译学存在相通之处。

译者与翻译传播各要素之间的互动是翻译传播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从译者角度提升翻译传播效果的基本策略。**译者与翻译传播主体“重叠”**是翻译传播特有的现象,这里的“重叠”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角色上译者有时就是翻译传播主体;二是在传播功能上,译者作为翻译传播主体的“利益攸关者”,共同对翻译传播效果产生影响。译者与翻译传播主体、翻译传播受体三者的互动是翻译传播过程中最基本的互动。充分掌握并运用传受双方语言与文化的译者或译者组合是翻译传播的“理想译者”。译者还要与翻译传播媒介互动,根据不同类型媒介的特点与要求完成讯息转换。

(四) 翻译传播客体

“人类传播是一个以信息为媒介的社会互动过程”。^{[9] 42} 讯息则是由一组相互关联的有意义的符号组成的、能够表达某种完整意义的信息,是翻译传播的客体和构成要素,也是主体、译者、受体、媒介、效果等各个要素互动的聚焦点。翻译传播学需要借助语言学、符号学以及媒介学等学科理论,阐明翻译传播讯息的结构、传递特点和处理策略。

人类运用语言符号交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语音通过听觉来交流,另一种是用文字通过视觉来交流。这两种方式使人类运用语言符号交流的讯息呈现为话语和文本,二者之间可以互相转化,也可以配合使用。话语的翻译传播主要指现场口译,对话语翻译传播的研究与翻译学中的口译研究存在共性。文本的翻译传播与传播媒介相关,在翻译传播中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

一般传播过程的讯息传递是从传播者经过媒介直接到受传者,但翻译传播的讯息传递有三个阶段:原语理解(原语讯息从主体到译者)、语际转换(译者对原语讯息进行加工处理)、译语表达与传递(将加工处理之后的讯息用译语表达出来并传递给受体)。从翻译传播学看,讯息传递的三个阶段同等重要,译语讯息是否适合受体,不只取决于译者,也取决于发出讯息的翻译传播主体。

对翻译传播讯息处理策略的研究是应用型研究:口译技能研究针对话语翻译传播策略;文本类型翻译研究针对文本翻译传播策略。翻译传播学在吸纳已有的文本类型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传播媒介的特点,分析各种传播媒介文本的语言及其呈现特点。根据传播媒介特点划分的主要文本类型有:会议文件、报刊文章、图书、影视文本、图片会展说明、公共信息等。

(五) 翻译传播媒介

作为翻译传播过程要素之一的媒介具有三重含义,一是讯息传递的渠道、中介物和工具(统称**载体媒介**),二是讯息传递的技术手段(统称**技术媒介**)三是从事讯息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社会组织(统称**机构媒介或媒介**)。翻译传播媒介研究包括载体媒介、技术媒介的运用和机构媒介的发展等。

从事翻译传播活动的机构媒介具体包括从事翻译传播的新闻社、报刊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站、会展公司、广告公司等。机构媒介的活动依据其传播方向分为对内翻译传播和对外翻译传播。翻译传播媒介具有以下特性:传播活动中存在翻译环节;传播活动需要获得作品著作权人的授权;有些翻译传播活动存在跨国或跨区域的媒介合作;有些翻译传播活动需要得到相关管理部门的许可。研究翻译传播媒介的特性、类型及其翻译传播能力建设,是翻译传播学的一个广阔领域。

不同类型的机构媒介提供不同的载体产品:新闻报刊社提供翻译的文章和图片,出版社提供翻译的图书和音像电子出版物,广播电台提供翻译的音频产品,电视台和影视公司提供翻译的视频产品,网站提供互联网翻译产品。翻译传播学结合各种媒介学理论,从不同类型机构媒介的实践案例分析入手,研究不同类型媒介的发展和运作规律,研究不同类型载体媒介的发展、运用及其对翻译传播效果的影响。

加强翻译传播媒介能力建设是提升翻译传播效果的需要。**翻译传播媒介能力建设**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提升机构媒介的话语影响力,增强其议题设置能力和国际话语影响力;二是促进载体媒介、技术媒介的发展;三是开展媒介影响力的监测评估。

(六) 翻译传播受体

翻译传播受体即受传者,是翻译传播讯息的接收者,以个体或者群体方式存在,其中“传播活动的群体性接收者称为‘受众’”。^{[26] 198} 翻译传播学运用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心理学和营销学等学科理论,研究翻译传播受体对翻译传播讯息接收的行为特征及其规律,着重研究各类翻译传播受体的

社会环境和文化心理,研究各类翻译传播受体的需求,从受体角度研究提升传播效果的策略。

受体接收讯息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对于他们来说,翻译传播讯息往往呈现为一种异质文化,受到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群体意识的影响更大。翻译传播学结合跨文化传播理论、“媒介需求满足”理论和受众理论,运用抽样调查方法可以对各类受体进行细致的实证分析。

市场受众观把受众视为媒介产品的消费群体,从市场角度研究受众的需求是媒介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翻译传播媒介也不例外。对受体需求的研究就是寻找“目标受众”,即某个媒介或某项媒介产品传播的目标人群。通过市场调查,可以了解受体的消费特征,帮助媒介把握“目标受众”及其产品的分众市场。

受体是媒介传播的对象,在传播过程中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会对媒介产品进行选择。翻译传播活动取得何种效果,最终取决于受体对媒介产品的接受程度。翻译传播媒介面对的是不同语境的受体,尤其要注意引导受体参与翻译传播活动,方法之一就是“试传播”,即在大批翻译传播产品推出之前,选择一定数量的目标个体,提供产品样本,请他/她反馈体验、提出改进意见,如翻译图书的试读、翻译影视的试看、翻译声频节目的试听等。

(七) 翻译传播效果

翻译传播效果是翻译传播学研究的指归。“如何评估和改善翻译传播效果”是翻译传播学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翻译传播学研究的根本意义所在。翻译传播学要明确翻译传播效果的特殊内涵及其规律,研究效果的监测评估。

传播效果既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引起的受体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即主体意图的实现状况;也指传播活动尤其是大众传媒的传播活动对受体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和结果。前者主要研究传播活动的具体效果,后者主要研究传播过程的综合效果。翻译传播过程中讯息经过了语际转换,因此对翻译传播效果的考察更强调主体意图的实现和信息的准确传递。

改善翻译传播效果有三个原则:充分互动、克服障碍和构建形象。充分互动是指翻译传播过程各要素充分互动,有三层含义:(1) 翻译传播由于增加了“译者”要素,传播效果的改善尤其需要各要素之间的充分互动;(2) 翻译传播各要素都对传播效果产生影响;(3) 监测评估翻译传播效果需要考量各要素作用的发挥。克服障碍就是在传播过程中克服社会文化差异、传播制度限制、传播渠道不畅等影响因素。翻译传播具有跨文化传播的特点,克服障碍的程度决定了传播的效果。翻译传播障碍包括:(1) 制度障碍(包括舆论环境、意识形态、法律法规等);(2) 文化障碍(包括信仰、习俗、教育等);(3) 情感障碍(包括兴趣、喜好、爱憎等态度);(4) 语言障碍。翻译传播对内和对外两个向度中,对外翻译传播的效果尤其需要构建形象,具体包括:(1) 作品形象;(2) 主体形象;(3) 文化形象(民族文化、地区文化或行业文化的整

体形象);(4) 国家形象。

翻译传播效果的监测评估要根据媒介需要,主要采取实证量化的方法,综合考虑文化传播效益、宣传效益和市场效益,采集翻译传播各个环节的数据进行分析,建立符合实际的监测评估模型。

四、翻译传播学的研究方法

翻译传播学总体上采取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具体可以采取以下研究方法和路径。

(一) 借鉴传播学、翻译学的研究方法

在一般方法论和具体学科研究方法两个层面,翻译传播学主要借鉴传播学与翻译学。以拉斯韦尔、施拉姆等为代表的**传播学经验学派**方法论以美国实用主义为哲学背景,认为传播现象的理论和假设都能够通过人们设计的科学方法得到验证;以阿道尔诺、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以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哲学背景,将传播理论与社会理论相结合,辩证分析传播环境与传播现象。翻译传播学需要借鉴这两大学派的方法论,综合运用实证分析和辩证分析。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传播学的抽样调查、内容分析、控制实验、辩证分析,以及翻译学的语形-语义-语用结合分析、原文-译文对比、多译文比较、译文风格再现和语料库研究等,都可作为翻译传播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二) 翻译传播学的四种主要研究路径

把研究领域和主要研究方法相对应,可以梳理出翻译传播学四种主要研究路径:(1) **翻译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主要运用抽样调查、案例分析、控制实验和模型构建等实证性研究方法,研究翻译传播的过程及其影响控制、翻译传播效果及其监测改进等。(2) **翻译传播文本的综合研究**,主要运用语义分析、内容分析、文本比较、文献研究、语料库建设等研究方法,综合研究各类翻译传播文本。(3) **翻译传播技术的融合研究**,主要运用语义分析、量化分析和控制实验等研究方法,研究新媒体技术、机器翻译技术、大数据等的融合应用及其对翻译传播的影响。(4) **翻译传播的社会、文化与历史的辩证研究**,主要运用辩证分析、历史分析、共时分析等方法,研究翻译传播与社会发展、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等重大问题。

四种研究路径中,翻译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和翻译传播文本的综合研究是翻译传播学的基础研究,翻译传播技术的融合研究和翻译传播的社会、文化与历史的辩证研究是翻译传播学的发展研究。

五、翻译传播学的社会应用

翻译传播学的产生是人类翻译传播发展的需要,是翻译传播实践推动的结果。与其他学科发展一样,翻译传播学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

(一) 翻译传播涉及的领域和人群

翻译传播现象普遍存在,如:个人的出国旅游、留学、非母语学习等,机构开展的非母语教育、国际访问、国际商务、国际会议等,社会的多语服务、公共场所的多语标识、政府部

门的外事活动等,大众传媒的国际传播等,几乎涉及了文化、教育、旅游、商贸、服务及社会管理等所有领域。在全球化趋势中,由于非母语学习逐渐推广、机器翻译技术迅猛发展以及跨文化交流增多,翻译传播现象日趋广泛。

根据涉及翻译传播的程度,与之相关的人群有三种类型:(1)偶涉人群,即偶尔参与翻译传播的人们,如短期去非母语国家或地区的旅游者、学习访问者或工作人员等,需要具备外语交际技能和一些翻译传播学常识。(2)常涉人群,即日常活动包含翻译传播内容但非专职从事翻译传播的人们,如涉外导游、兼职译员、兼职版权代理、非专职外文编辑、非专业外文网页编创人员、多语广告标识制作人员等,需要掌握相关行业外语技能跟相关领域的翻译传播学知识。(3)职业人群,即在异语场景中任职、将翻译传播作为职业的人们,如职业外交人员、职业翻译、外语教育人员以及翻译传播机构的记者、编辑、译员等。职业人群内部又分两类:一类是把外语技能作为职业工具的人们,在具备相应的外语交际技能的同时,还需要掌握与工作内容相适应的翻译传播学知识;另一类是不仅把外语交际技能作为职业工具而且负有翻译传播职责的人们,如学术型翻译机构的译员、学术型外语教育机构的教研人员、翻译传播机构的记者、编辑、译员等,在理论和实践中需要系统掌握翻译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

(二) 翻译传播学社会应用的五个方面

1. 为各类作品的翻译传播提供指导。作品的翻译传播是常见的翻译传播活动,通过总结作品翻译传播过程、分析各类典型案例,翻译传播学不仅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上给作品翻译传播过程的互动提供指导,而且能够给作品翻译传播效果的评估提供方法。

2. 为翻译传播项目的运作提供借鉴。翻译传播活动常常以项目形式呈现,如:一个国际会议的文宣和文件的综合解决方案,出版社或报刊社的出版选题或栏目,相关部门或机构推出的各种国际文化交流项目,等等。翻译传播学通过分析各类翻译传播项目的典型案例,从项目运作上提供参考范例,从方法上为各类翻译传播项目的效果评价模型提供借鉴。

3. 为加强媒介翻译传播能力建设提供支持。媒介的翻译传播能力对翻译传播效果有直接影响,翻译传播学通过对各类媒介翻译传播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建立媒介翻译传播影响力的评估体系、为媒介培养翻译传播人才等,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媒介翻译传播能力的提升提供支持。

4. 为提高社会翻译传播服务水平提供帮助。随着全球化发展,为使用非母语的人们提供的社会翻译传播服务逐渐增多,如公共场所的非母语标识、旅游景点的标语或讲解、政府部门及各类组织的非母语文宣等等,这是社会文化面貌展示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我国社会翻译传播服务还存在不

少问题,翻译传播水平亟需提高。翻译传播学知识的普及可以提高社会对翻译传播的认识,翻译传播学通过分类指导助力提升各类社会翻译传播服务的水平。

5. 为促进中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提供理论支持。为了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各国政府对开展国际翻译传播有着巨大需求。翻译传播学的构建可以助力新时期中外交流和中华文化“走出去”,为解决目前存在的翻译传播效果不好、翻译传播途径不畅、翻译传播能力不强等问题提供理论支持。

结语

翻译传播在今天蓬勃发展,一方面翻译技术的进步使人们的跨语言交流日渐普遍,另一方面翻译传播媒介的活动也日趋活跃。仅以我国对外翻译出版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华学术外译”为例,前者2013—2019年间资助了2183种图书翻译出版,后者2010—2019年间资助了1026种图书翻译出版。^①在翻译图书品种增长迅猛的同时,如何提升翻译传播效果就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课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7] 43}长期以来,中国文化“走出去”面对着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传播障碍。新冠疫情的出现,不仅增加了不同国家的人们物理空间的隔离,也加深了人们跨文化交流的心理隔阂。因此,研究突破传播障碍、构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形象的策略,就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使命。

由此可见,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翻译传播学的构建有其外在的时代需求和内在的学科发展需要。本文基于学界的已有研究,从认识论角度揭示翻译传播的本质和规律,论证翻译传播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本体论角度明确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从方法论角度阐述其适用的研究路径及具体方法,尝试构建翻译传播学的基本框架。此外,本文还在以下方面具有创新:一是从语言的角度分析传播,提出了传播分为同语传播和异语传播,“异语传播”概念的提出真正厘清了翻译与传播的关系,揭示了翻译传播的本质;二是运用传播学理论考察翻译传播过程,提出了翻译传播四个环节、六个要素的理论,真正把翻译放在传播整体过程中进行考察,改变了此前把翻译与传播分隔开来的研究格局;三是对翻译作为传播的一个要素(一个环节)后各个要素(各个环节)相应出现的新变化进行考察,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理论的完善,翻译传播学的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和应用价值将日益凸显。

参考文献:

- [1] 吕俊. 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J]. 外国语, 1997(2).
- [2] 孟伟根. 关于建立翻译传播学理论的构想[J]. 绍兴文理学院

① 此处数据系本文作者统计,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中华学术外译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网(www.cssn.cn)。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3] 姚亮生. 内向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双向对话——论建立传播学的翻译观 [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3)。

[4] 唐卫华. 论翻译过程的传播本质 [J]. 外语研究,2004(2)。

[5] 张生祥. 翻译传播学:理论建构与学科空间 [J].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1)。

[6] 谢柯,廖雪汝. “翻译传播学”的名与实 [J]. 上海翻译,2016(1)。

[7] [美] 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 传播学概论(第二版) [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8] [美] 斯蒂文·小约翰. 传播理论(第五版) [M]. 陈德民,叶晓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9]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第二版)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0] 李凌凌. 传播学概论(第二版) [M].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4。

[11] 胡正荣. 传播学概论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12]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 [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

[13]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 辞海 [Z].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14] 方梦之主编. 中国译学大辞典 [Z].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15] 黄忠廉. 翻译活动的轴心——转换 [J]. 中国科技翻译,1992(4)。

[16] 黄忠廉等. 翻译方法论(修订本)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2019。

[17] 仲伟合. 对翻译重新定位与定义应该考虑的几个因素 [J]. 中国翻译,2015(3)。

[18] 明安香. 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展望 [J]. 现代传播,2005(1)。

[19] 孙英春. 跨文化传播学导论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0] [美] 拉里·萨默瓦等. 跨文化传播(第六版) [M]. 闵惠泉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1] 许钧、穆雷. 翻译学概论 [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22] 杨平. 《易经》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 [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6)。

[23] 梁真惠,陈卫国. “活态”史诗《玛纳斯》的翻译与传播 [J]. 中国翻译,2018(5)。

[24] 王东风,赵赟.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 [J]. 中国翻译,2019(3)。

[25] [美] 哈罗德·拉斯韦尔.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双语版) [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

[26] 董璐. 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第二版)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7]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A].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 [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立 早

Toward Constructing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YIN Fei - zhou, YU Cheng - fa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s mainly cross - lingual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Faced with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overcoming communication obstacles and improving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for a long time,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TCS)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to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s.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refers to th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realized via human translation in cross - lingual scenes. TCS, as a branch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is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on the essence and rules of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Regarding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as a whole process, this paper expounds its connotation and interrelationship with 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ion respectively, unveils its essential nature and discusses its theoretical basis, research contents and approaches and its social application, in the hope of promoting the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TCS);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nature

新华文摘

【半月刊】



1 2021

ISSN 1001-665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
中国话语建构**（何毅亭）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推动宪法全面实施（杨振武）

论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韧性（韩保江）

现代主义与当代主义（杨大春）

财政理论中三个基本问题的再探讨（吴俊培）

从“五朵金花”到“皇权”“封建”之争（李治安）

大河初心（高建国）

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王 尧）

望英雄 眉目有山河

——回忆艰苦卓绝的上甘岭战役（吴东峰）

网络文化内容监管的价值冲突与秩序治理（高宏存）

一流大学与中心城市的互动发展（宋争辉）

黑海生态

——物联网时代的新战略思维及管理工具（张瑞敏）

**加强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中医药应急防控
体系建设的战略思考**（仝小林 等）

中国纪录片的文化使命与国际传播（张同道）

新华文摘

半月刊

2021·1
创刊/1979年1月

【总第709期·2021年1月5日出版】



微信公众号

主管单位：国家新闻出版署
主 办：人民出版社
编辑出版：新华文摘杂志社

社 长：李春生
总 编 辑：喻 阳
副 总 编 辑：王善超
副 社 长：刘仲翔

编辑部电话：(010)65132880
传 真：(010)65132880
市场部电话：(010)65170515

邮 购 热 线：(010)65250042
地 址：北京隆福寺街99号金隆基大厦
邮 编：100706
网 址：<http://www.xinhuaawz.com>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邮 发 代 号：2-244（小字本：2-243）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政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100044 北京车公庄西路35号）

国外代号：SM7
国内统一刊号：CN 11-1187/Z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1-6651
广告登记：京东市监广登字20200028号
定 价：19.00元（小字本：16.00元）

政 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

中国话语建构·····何毅亭 1

中国制度力量的内在逻辑与实践优势·····曹劲松 4

论立场·····骆郁廷 7

基层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与挑战·····文 宏 11

法 学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推动宪法全面实施·····杨振武 13

检察权与检察制度研究【两篇】

论我国检察权的新发展·····周 新 16

人民检察制度的理论逻辑与价值彰显

·····吴建雄 杨立邦 18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戴建华 21

新华观察

论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韧性·····韩保江 23

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形态·····李彦宏 27

绿色发展的中国经验及未来展望·····沈满洪 28

新华文摘·2021|1 1

读书与传媒

中国纪录片的文化使命与国际传播 张同道 147

翻译传播学论纲 尹飞舟 余承法 149

理解性阅读和批判性阅读

——由王力先生谈阅读说开去 孙玉文 154

报刊文章篇目辑览 171

论
点
摘
编
157—170

国家何以能治理好

人心政治论

地方权威主义治理逻辑及其困境

面向政府科学决策的智库建设

十月革命后列宁工会职能定位的演变

民族国家共同体演进中的族群权利：

边界及其治理

探索数字时代的自主性法治道路

民事纠纷的社会性与民事诉讼程序和

制度的构建

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机制的革新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立法反思与实践

转向

附条件不起诉的新孝道帮教理念

中国道路的哲学意蕴与时代价值

后现代与伦理难题

《黄帝内经》生命观的哲学意义

“五常”与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

真理检验逻辑与真理规范逻辑

规范性理由：内在理由还是外在理由？

债务/GDP水平及波动对经济危机发生

概率的影响

从企业规模分化视角解释劳动收入份

额变动

实现人口红利的充分必要条件

要素收入与居民收入分配格局

两种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

影响

依托数字经济发展，实现服务贸易数字

化转型

《清史地图集》的学术理论与编绘实践

古代西藏佛教藏书的历史发展

小面额东南会子对南宋货币流通的影响

元代丝绸之路对民族融合的影响

17—19世纪中日朝对原典儒学中实学

价值取向的传承发展

日本侵华战争的决策体制与政策

中国第六代导演的内卷化现象

新世纪网络文学创作的四大走向

左翼文学的海派特性

初盛唐五言“古风”型诗歌的诗史意义

宋代文人与砚

王船山诗学“宾主”说与“情之景”的

确立

20世纪初中国女性服饰变革与社会变革

连片特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跨域治理

想象的异邦：20世纪上半叶中国对印

度的文化叙事

“两个一百年”期间中国文化产业的

挑战与机遇

历史文化街区更新的逻辑考察

什么是“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

“本科出身”重要吗

跨学科教育的内涵与特征

着力提升教师教育的专业品质

教研要走出“学科本位”

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理性管理学派

预期交流影响创造力

平台领导力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

网络外部性对制造商制造策略选择的

影响

新创企业的即兴行为如何转化为惯例

区域城市先进制造业现状分析与发展

策略

专利质量层级、专利管理能力与专利

实施水平

选择性税收激励、迎合式研发投入与

研发绩效

身体哲学视阈下对中医学的思考

技术相似性与并购后创新绩效关系

用户媒介使用宽度的性别别沟及其演进

规律

智能媒体的演进逻辑与未来发展

饭圈失范的表象及纠偏

中国影视国际传播力提升的十个创新

理念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应重视全媒体人

才培养

稿酬启事：

一、按照国家税务管理有关规定，本刊向作者支付稿酬须履行全额申报和代扣代缴义务。本刊为二次文献，选用刊发稿件前通常不与作者联系，不掌握作者身份证号码、汇款账号等有关信息。请稿件被本刊刊发后未收到稿酬的作者，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与我刊有关人员联系，提供本人身份证号及银行卡号相关信息，以便我们及时为您支付稿酬。

联系人：张晓霞

联系电话：010-65242951

电子邮箱：xhwzgc@163.com

二、本刊部分转载文章，原发报刊未注明作者单位，这部分文章作者，如文章被本刊刊发后未收到稿酬，请按以下方式联系查询：

联系人：冯 华

联系电话：64081085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

55号2期209室

邮政编码：100010

邮购启事：

欲邮购2021年本刊者，请从邮局直接汇款至北京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吉隆基大厦，邮编：100706）；汇款时请正楷写清详细地址、邮编和姓名，以免误投；在附言栏上注明欲购刊期、册数及开票单位；不用另函；汇款请勿寄个人。2021年半月刊含邮资价：小字本，每册16.00元，全年456.00元；大字本，每册19.00元，全年528.00元。欲购过期刊物，请致电010-65250042、65289539联系。



东方红（摄影 1961 年）袁毅平

（选自《中国摄影》）

ISSN 1001-6651



9 771001 665192

CN 11-1187/Z 邮发代号 2-244 定价: 19.00元

翻译传播学视域下湖湘文化“走出去”策略体系建构*

余承法, 万光荣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基于翻译传播学的视角, 根据翻译传播的主体、客体、译者、媒介、受体、效果等六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将翻译传播过程分为发起、翻译、传输、接收四个阶段。为了进一步推动湖湘文化“走出去”, 可针对这四个阶段依次确立优选优创策略、对外翻译策略、国际传播策略和效果评测策略, 并以中国(长沙)马栏山文创产业园为文化交流基地和国际传播平台, 建构一个有机统一、循环往复、自我优化的湖湘文化“走出去”策略体系。这是讲好湖南故事、传播湖南声音、弘扬湖南精神的基础性工程, 对形成湖南的文化建设和政治经济建设的良性互动具有战略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 翻译传播学; 湖湘文化; 优选优创策略; 对外翻译策略; 国际传播策略; 效果评测策略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6431(2021)01-0180-06
DOI:10.13715/j.cnki.jxupss.2021.01.029

引言

2016 年以来, 湖南省提出文创产业发展目标, 旨在以湖湘文化为根基、以数字视频为特色、以“文化+”和“互联网+”为手段, 对标看齐中关村, 着力打造全国乃至全球文创产业发展高地^[1]。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设立“中国(长沙)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之后, 湖南省力争形成“北有中关村、南有马栏山”的行业引领格局,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中国最好的视频基地——“中国 V 谷”。加快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建设, 建构新时代湖湘文化“走出去”策略体系, 是讲好湖南故事、传播湖南声音、弘扬湖南精神的重要举措, 对形成湖南的文化建设和政治经济建设之间的良性互动具有战略意义和现实价值。

翻译传播学研究“异语场景信息传递的全过程”, 侧重翻译传播的主体、客体、译者、媒介、受体、

效果等六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2] 3}, 据此可将翻译传播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发起阶段以主体为中心, 涉及翻译传播的定位、目的、内容、译者和媒介; 翻译阶段以译者为中心, 译者跟主体、媒介、受体保持互动, 完成作品/产品的语际转化; 传输阶段以报刊社、出版社、广播电视台、网站等多种媒体为中心, 进行翻译作品/产品的国内外传播; 接收阶段以国外受体(包括海外受众和境外来华人员)为中心, 完成作品/产品的接收和反馈。针对这四个阶段, 可分别确立湖湘文化作品/产品^①的优选优创策略、对外翻译策略、国际传播策略、效果评测策略, 并以“中国 V 谷”作为文化交流基地和对外传播平台, 根据湖南省文化建设规划、文艺创作实践、市场需求、受体反馈, 适时调控四个阶段的策略, 建构一个有机统一、循环往复、自我优化的新时代湖湘文化“走出去”策

* 收稿日期: 2020-07-05
作者简介: 余承法(1974—), 男, 湖北安陆人, 博士,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语言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翻译学、翻译传播学和钱锺书研究;
万光荣(1972—), 女, 湖北荆门人, 博士,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对比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是湖南省社科基金智库专项重点项目“打造马栏山文化品牌 推进新时代湖湘文化交流与传播研究”(19ZWB54)、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湖湘文化走出去策略研究”(18YBA291)、2020 年度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重大项目“新文科背景下翻译传播学跨学科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2020JGZX006)的阶段性成果。
① “作品”是指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品, 强调创意性、审美性、唯一性。“产品”是指生产出来的物品, 具有规模性、经济性、批量性。“走出去”的中华文化不仅包括艺术作品, 也包含文化产品。湖湘文化中除了积淀深厚的文化作品, 还有中国红、活性炭雕、菊花石、湘绣等被誉为“湖湘四宝”的文化产品。因此, 本文使用“(湖湘文化)作品/产品”一词。

略体系(见图1)。具体操作程序如下:先建立湖湘文化资源总库,确立选择标准和原则,将优选的文化作品/产品收入湖湘文化精品资源分库,暂时未选中的作品/产品放回资源总库,便于今后重新挑选或改写;优选策略的标准和原则也可用来指导优创策略,用汉语创作的作品/产品进入对外翻译环节,经过翻译策略的选择与运用,进入国际传播环节,用外语创作的作品/产品则直接进入国际传播环节;翻译作品/产品经由不同领域的传播策略操作,进入国外市场;建立针对翻译传播的效果测评策略,前三个阶段的策略运用分别进行评价与优化,并开始新一轮的策略体系建构和实际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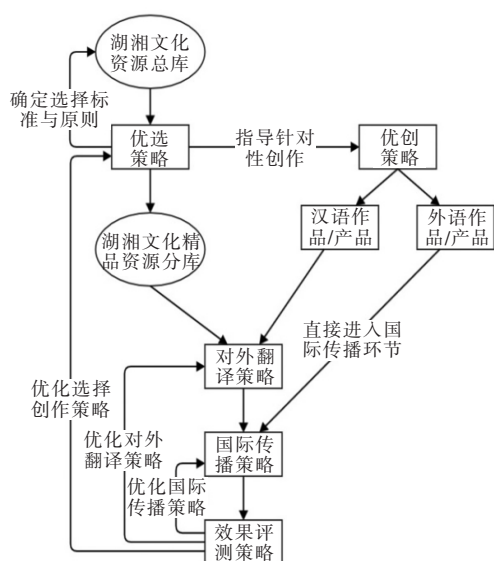


图1 新时代湖湘文化“走出去”策略体系

一、湖湘文化作品/产品的优选优创策略

湖湘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上古本土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的多元文化影响,先后孕育了屈原、贾谊、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左宗棠、魏源、黄兴、毛泽东等一大批杰出人才,形成了一种兼容并蓄、特色鲜明的区域文化。面对浩如烟海的湖湘文化,需要厘清源头、摸清家底、系统整理、优中选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3] 42}是湖湘文化作品/产品优选优创的总体指导原则,据此可确定**优选优创的三个标准:优秀、精华、特色**。所谓“优秀”,是指作品/产品反映以“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百折不挠”“兼收并蓄”“敢为人先”为特征的湖湘文化精神;所谓“精华”,主要是指湖湘文化中包含的哲学、经济、文学、法治、道德、军事等一系列思想精髓,“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4] 188};所谓“特色”,是指三湘

大地有别于其他区域的独特的生存和发展方式,以及对德智体美劳等积极向上的个性化追求,具体包括:以理学的道德精神与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相结合的哲学思想,“文道合一”的文学艺术思想,经史并重、说古也是为了道今的史学思想,重视学思并重与知行统一的教育思想^{[5] 12-16}。简言之,湖湘文化作品/产品的优选优创标准是体现湖湘精神、蕴藏湖湘智慧、具有湖湘特色。

(一) 湖湘文化作品/产品的优选策略

优选策略是指对丰富多彩的湖湘文化资源进行优中选优,确定最适合当下翻译传播的文化作品/产品,这是湖湘文化“走出去”中的一项重要前期工作,也是打造马栏山文化品牌的关键。湖湘文化作品/产品的优选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四点。(1) **打造文化输出精品工程**。首先确立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创建湖湘文化资源总库,再运用“把关人”理论进行优选,创建不同时期和类型的湖湘文化精品资源分库,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进行翻译传播。(2) **兼顾传统与当代、特色与全面**。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提出的要求,“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6] 208-209},既要翻译传播具有悠久历史的湖湘传统文化,又要推出在三湘大地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体现时代精神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3) **采取差异化路径**。在优选湖湘文化资源时需要注意内外有别、外外有别^[7],广泛听取海外受体的意见,采取针对不同国家/区域、不同人群的文化作品/产品优选策略。(4) **提升优选主体能力**。文化资源优选涉及政府、机构和个人三个层面:政府是文化翻译传播的组织者,优选能力主要包括方向引导、宏观调控和整体把握;机构是文化翻译传播的管理者和协调者,包括文化教育机构、科研院所、媒介组织、社会团体等,负责将各级政府的文化优选能力落实为具体行动;个人是翻译传播的实施者,文化优选能力主要包括政治修养、文化素养、知识结构、赏鉴能力等。

(二) 湖湘文化作品/产品的优创策略

优创指基于湖湘文化资源库创造出具备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的文化精品,包括三层含义:对湖湘文化资源总库中的作品/产品用汉语改写改编,用汉语创作新作品/产品,直接用外语创作新作品/产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 23}是新时代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方针,也是湖湘文化作品/

产品优创的重要指针。优创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四点。(1) **提升创作能力**。与作品/产品的优选一样,优创也涉及政府、机构和个人,提升创作主体的能力相应地体现在这三个层面:政府应具有对文化资源进行宏观把握、配置和调控的能力以及对创作进行方向引领、组织和管理的能力;机构应具备贯彻政府意志、提倡创作新风、培养创作人员的能力;个人应具有作品/产品的原创和再创能力,原创是指用汉语或外语写作,再创是指基于某一现存文艺作品/产品用汉语或外语进行改写改编。(2) **丰富创作形态**。要实现传统文化作品/产品当代价值的最大化,就需要做到原本及其改编本在传播中齐头并进,创作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湖湘经典作品/产品。用外语创作不同于翻译,不是依赖某一现存文本,而是基于湖湘文化的某一事件或现象,为海外受体直接用外语写作。除了传统的文艺作品/产品,还可创作动漫游戏、影视节目、短视频、网络文学以及适应新媒体、自媒体的多模态作品/产品。(3) **优化创作模式**。推进湖湘文化的翻译传播,应充分发挥海内外一切力量,如汉学家、华人华侨、知华友华人士、来华人员等,尝试“以我为主、中外结合”,采取“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既挖掘湖湘文化的精髓,又满足海外读者需求、实现最佳传播效果,同时促进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4) **提高创作质量**。这不仅关涉创作主体的能力和创作模式,也与传播效果的反馈相关,应在不断改进创作模式的基础上提高质量、扩大影响。

二、湖湘文化作品/产品的对外翻译策略

新时代适逢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和大数据,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开始由“引进来”转向“走出去”,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需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推进国际传播。包括湖湘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的翻译传播一度以海外译入为主,实际需求激励对内对外的翻译传播平分秋色,应该坚持“以我为主、兼容并蓄”的指导原则:在我国政治、经济、生产、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各领域坚持以我方主译,鼓励和邀请外方参与,形成本国/本土译者+外国译者的“理想译者”组合模式。

(一) 对外翻译核心要素的优先规划序列

就行为而言,中华文化对外翻译(简称“外译”)包含九个核心要素,关涉何时、何人、因何、以何工具、用何策略、将何对象、向何地、对何人进行翻译传播、以达何效果的复杂过程。当下的文化外译面临投资多、数量多、接受少、收效少等窘境,亟须针对文

化输出供给侧问题进行战略规划。较大规模的湖湘文化外译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整合各种资源,通盘思考文化外译行为各要素的优先规划序列问题,全面考察译者行为与译内相关要素之间的动态博弈以及翻译传播诸要素之间的互动,为湖湘文化外译制定新规划、探索新路径、选择新模式。为了追求湖湘文化外译质量的最大化、效果的最优化,首先需要为湖南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带一部”建设中涉及文化建设的内容进行顶层设计,其次需要根据湖湘文化外译的实际需求,分别制定涉及译者、客体、受体、时空、工具、策略/方法等方面的优先战略规划。

(二) 对外翻译主辅融合的策略

文化外译客体根据所在领域的优先规划序列为:生活艺术>经济贸易>工程技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表示“优先于”,下同);文化外译层次按照由低到高、由外向内的优先规划序列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8] 62}。文化外译工具与策略的优先规划构成湖湘文化外译的硬件与软件,工具主要是指:(1)技术,包括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实时传输技术^{[9] 124-125},以及新媒体和自媒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2)载体,如文字、声频、视频、图像等;(3)渠道,包括口头、文字、报刊、广播、影视等;(4)不同语言。技术优先战略规划序列为:机器-云翻译>移动-语音翻译>外包翻译>众包翻译^{[10] 34};载体优先战略规划序列为:声像文/声图文>图文/声文/像文>声/像/图/文^{[10] 36}。就文化外译的策略优先规划序列而言,首先讨论全译与变译,其次关注全译的七种方法及其组合、变译的八大手段和十二种方法及其组合。全译策略优先规划序列通常为:直译>意译(语言层面),异化>归化(文化层面);人工智能时代的外译操作策略优先规划序列为:人机互动全译>人机互动变译>人工变译>人工全译^{[10] 39}。就国家/区域的需求而言,既需要瞄准欧美发达国家,让湖湘文化“走上去”,又需要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瞄准发展中国家,让湖湘文化“走下去”。就当下的经济主旋律而言,文化外译需求的优先战略规划序列为:经济需求>“一带一路”建设需求>政治需求,这也同时决定了外译语种的优先规划序列大致为:英>法>西>俄>阿>德>日>朝……

三、湖湘文化作品/产品的国际传播策略

要实现湖湘文化作品/产品真正“走出去”,必须在传输阶段下功夫,有针对性地提升翻译传播效

果。通过抽样调查、深度采访、案例分析、态势分析(即SWOT分析)等方法,深入了解不同国家/区域中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受体对湖湘文化的实际需求,选取湖湘文化中传统典籍和当代精品进行国际传播,分析受体对作品/产品传播样本的了解和接受程度。通过孔子学院/课堂和海外华文教育机构,对世界各地的华人华裔、汉学家、精英人群、普通大众、来华经商或留学人员进行问卷和采访,通过大数据挖掘进行舆情分析,根据新闻出版、影视传媒、动漫游戏、互联网等不同领域的传播客体和受体,确定相应的国际传播策略。

(一)“出版湘军”的国际传播策略

“出版湘军”走出去既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服务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重大决策部署、提升湖湘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战略需要。这是一项复杂的跨文化传播行为,离不开政府、企业、市场三个层面的通力配合与有效运用策略。(1)政府要坚持政策引导: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翻译出版的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营造“出版湘军”的良好国际传播环境。(2)出版企业要努力成为国际传播主体:中南传媒作为具有传播力、感召力、公信力的国家级新型出版企业,需要坚守出版主业,着力将自身培育成外向型文化企业,勇于到境外开拓市场,发挥引领作用;其他出版企业协同创新,形成各种所有制文化企业积极参与的国际传播格局。(3)市场必须发挥作用:进一步发挥市场在国际传播中的积极作用,利用“中国V谷”的孵化器平台,走内涵式、多元化的出版模式,创新出版内容和形式,如推出电子书的发行与销售,提升“湘军”出版物的国际传播竞争力。(4)注重提质增效:充分调动国内外各界资源,以外译质量而非数量作为当下主要的效益追求,突出创作和翻译作品/产品的质量,追求良好的传播效果。

(二)“广电湘军”的国际传播策略

广播电影电视作为信息交流、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中发挥重要作用。“广电湘军”提高国际传播力的重要任务是思考如何贴近湖南乃至全国发展的实际,如何贴近国外受体对具有湖湘特色的广电作品/产品的需求,如何贴近国外受体的思维与收视习惯,这也是打造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的核心内容。在意识形态上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基本原则,在产业属性上要坚持“项目为王”“内容为王”“精品至上”等理念^[1]。借助大数据统计、对比分析和案例分析等方法,分析

“广电湘军”与国内外广电机构的优势和特色,如比较马栏山产业园与好莱坞电影巨头、横店影城发展模式的利弊,并采取以下四个策略:(1)以传播窗口建设为龙头,提高广电领域的对外传播艺术,构建对外宣传的新格局;(2)以“广电湘军”驻外站点的建设为基础,提高海外采编能力,抢占中国/湖南声音的制高点;(3)推进“中国V谷”建设,吸引国内外媒体入园,抢占新媒体、自媒体市场;(4)搭建国际视频发稿平台,成为满足国际需求的信息供应者。

(三)“动漫游戏湘军”的国际传播策略

动漫作为一种特殊的视觉文化,其中的图、文、声、像能够相对轻松地跨越国家和民族的语言文字障碍,能够潜移默化地直达人的心灵,影响受体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成为湖湘文化国际传播的另一个理想载体。湖南动漫产业的快速发展,必然需要拓宽国际市场,扩大传播空间,向国外观众展现湖湘文化的魅力,积极有效地构建湖湘形象和中国形象。游戏汇集了文学、影视、音乐等诸多文化形式的特点,具有强大的文化承载能力^[12]。“游戏湘军”年会为推动共建湖南文化娱乐梦工厂做出了很大努力,也是湖湘文化国际传播的理想载体。在游戏国际传播过程中,应该注意遵循国际惯例、尊重版权、尊重本土文化,建立全球性的研发、发行和运营的“一条龙”,提高了解和运用海外市场的能力以及全球协同创新的能力。除了将中国技术传播到全世界,还可以引进国外的优秀技术,将其融入湖湘文化作品/产品并进行升级改造,或者将湖湘元素融入高技术含量的动漫游戏产品,再推向全球。通过数据统计和比较分析,研究动漫和游戏的版权输出和海外传播,提出“动漫游戏湘军”拓展海外市场的相应对策。

(四)“网络湘军”的国际传播策略

要有效推动湖湘文化的国际传播,必须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巨大作用。湖南是全国12个互联网发达地区之一,拥有湘籍背景的“微信之父”张小龙、58同城创始人姚劲波、陌陌创始人唐岩等互联网领军人物,因而赢得“网络湘军”的美誉。湖南要实现湖湘文化的跨越式发展和国际传播,必须在坚持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前提下,深入研究数字化国际传播策略,具体包括:(1)政府引导,加强顶层设计,打造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网络媒体;(2)通过新媒体、自媒体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数据挖掘,又好又快推出湖湘文化作品/产品;(3)借助大数据分析,通过“态势感知”方法对文化传播议题快速做出

响应,制定多元化的传播渠道;(4)采用本土化战略,发挥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作为“全国媒体融合新地标”的新使命,贴近受体所在国家/区域的文化环境,实现湖湘文化精准、切实、有效的海外传播。

四、湖湘文化作品/产品翻译传播的效果评测策略

借鉴传播学中“传播效果”概念的双重含义——说服性传播和影响性传播^{[9] 172},既可具体分析湖湘文化作品/产品翻译传播的微观过程,也可综合考察宏观过程,因此效果测评策略既可针对具体阶段策略运用的具体效果,也可针对综合过程产生的综合效果。

(一) 针对优选优创策略运用的评测策略

评测优选优创策略运用的具体效果,先对单件作品/产品进行主客观评价,对于诸多文化作品/产品,通过在线调查、借助大数据进行批量统计与分析,从个别到一般、由点到面地进行优选优创策略的评价与优化。

评测某件作品/产品是否属于文化精品,可借助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进行问卷调查,邀请专家学者和普通读者作出评价选择,再通过统计分析,进行相对公正、客观的判断。评测某件作品/产品是否兼顾传统与现代、特色与全面,可邀请国外受体进行主客观评价,了解它是否有助于国外受体“真正认识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评价某件作品/产品是否经过了差异化筛选,可对国内外受体分别进行问卷调查和对话访谈,判断它是否做到了“内外有别”“外外有别”。评价选择者是否具备或提高筛选能力,既可对某位选择者进行历时考察,判断其不同时期选择的作品/产品是否适合不同国家/区域的受体,也可对一批选择者进行共时考察,判断他们在同一时期选择的作品/产品针对同一国家/区域的受体是否存在差异,从而判定其筛选能力的高低。在对某部作品/产品进行综合评价之后,可对选择者的策略运用和筛选能力进行公正、客观的评价,然后基于市场调研、受体反馈、大数据统计和舆情分析,进行优选优创策略的调整和优化。

(二) 针对对外翻译策略运用的评测策略

评测湖湘文化对外翻译策略运用的具体效果,最终落实在翻译质量和传播效果。先建立湖湘文化国际传播数据库,随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再借鉴翻译策略/质量评价模式或参数体系,如:文本论辩原则下的参数体系^[13]、翻译职业视域下的评估模式^[14]、语篇类型原则下的参数体系^[15]、功能-语

用原则下的参数体系^[16]以及等值论、标准论、功能论、关联论等模式,确立相应的评测策略,逐一评价翻译策略的优先规划序列及其具体策略与方法;最后根据汉学家、华人华侨和普通受体的反馈,调整和完善现有翻译策略的优先规划序列和方法。

(三) 针对综合传播效果的评测策略

鉴于每个具体的翻译传播活动都是由主体、客体、译者、媒介、受体等要素构成,每个要素都对传播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需要评测综合传播效果,借此判断湖湘文化是否真正“走出去”、有效“走进来”。可充分利用亚马逊、Goodreads等图书网站上真实的读者评价,拓展接受研究的范围和思路,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如借鉴通用的传播学评价指标,尝试建立湖湘文化翻译传播的效果评测策略,包括:3个一级指标(品牌力、影响力、互动力)、8个二级指标(媒介知名度、内容集成度、技术创新度、受体满意度、整体覆盖率、实际到达率、平台活跃度、受体活跃度)、17个三级指标(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信息来源、信息数量、信息质量、栏目设置、个性化服务、用户评价、现有用户数、现有粉丝数、使用率、活跃用户数、日平均互动量、人均互动量、社交平台转发次数、社交平台评论次数、好友推荐次数、主动收藏次数),并利用yaahp层次分析法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最终得出相应的指标权重,分别考察湖南的出版、广播影视、动漫游戏、互联网文化等领域的国际传播策略的运用效果,进行相应修改和完善,确立湖湘文化翻译传播效果测评的优化机制。

结语

为推进湖湘文化“走出去”,可基于翻译传播过程的阶段理论,将湖湘文化的翻译传播过程分为发起、翻译、输送、接收四个阶段,采用相应的优选优创策略、对外翻译策略、国际传播策略和效果评测策略,针对前三种策略运用的评测策略与优化旨在实现湖湘文化翻译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形成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逻辑链。对外翻译策略既呼应优选优创策略,更注重与国际传播策略的紧密联系:对外翻译的直接目的是进行国际传播,国际传播是否成功有效,依赖于翻译策略的运用效果、译作质量和行之有效的传播策略,而译作质量除了检验策略运用恰当与否之外,还可检验策略运用的效果。湖南的出版、广电、动漫游戏、网络文化等不同领域的国际传播策略依赖于作品/产品创作、选择和翻译的策略运用及其效果。以“中国V谷”为文化交流基地和国际传

播平台,通过国外的市场调研、受体反馈、数据统计与分析,确立湖湘文化翻译传播的效果评测策略,对翻译传播过程进行具体和综合的效果测评,进而调整和完善的策略,最终建构一个有机统一、循环往复、自我优化的湖湘文化“走出去”策略体系。

参考文献:

- [1] 湘声. 对标中关村 打造马栏山 [N]. 湖南日报, 2017-06-14.
[2] 尹飞舟, 余承法. 翻译传播学论纲 [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5).
[3]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 [Z].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 [Z].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6.
[5] 刘旭主编. 湖湘文化概论 [Z].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
[6]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 [Z]. 北京: 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6.
[7] 孙宜学.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战略: 二十个关键问题 [N]. 环球时报, 2017-11-24.

[8] 黄忠廉、杨荣广、刘毅. “中国文化 + 互联网”外译客体优先规划论 [J]. 中国俄语教学, 2016(4).

[9]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第二版)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0] 黄忠廉、杨荣广、刘毅. “中国文化外译 + 互联网”工具及策略优先规划论 [J]. 翻译界, 2017(2).

[11] 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 [N]. 湖南日报, 2018-08-23.

[12] 郑娜. 当游戏扛起“走出去”大旗(墙内看花) [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7-04-13.

[13] Joanna D. Quality in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Assessment and Improvement [M]. London/New York: Bloomsbury, 2013.

[14] Juliane H.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Past and Present [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5] Katherina R.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 [M]. Trans. by Erroll F. Rhode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4.

[16] Malcolm W.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An Argumentation - Centred Approach [M].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04.

责任编辑: 立 早

Toward Constructing a System of Strategies for Hunan Culture “Going Global” from a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YU Cheng - fa, WAN Guang - rong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TCS),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initiating, translating, transmitting and receiving,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ix elements: subject, object, translator, medium, receptor and effect. In order to further Hunan Culture “Going Global”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corresponding four strategies for optimized selection and creation, foreign transl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Hunan cultural works, and then establish an organic, cyclic and self - optimized system of strategies by taking China (Changsha) Malanshan Industrial Park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s a cultural exchange base and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latform. This is a basic project for telling Hunan’s stories, promoting Hunan’s spirit and conveying Hunan’s voices, and will be of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forming a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cult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in Hunan Province.

Keywords: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TCS); Hunan Culture; strategy for optimized selection and creation; strategy for foreign translation; strategy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y for effect evaluation

基于读者反馈的《西游记》 英译版海外传播研究

余承法, 郑剑委

摘 要:以《西游记》余国藩英译版的读者反馈为研究对象,采用情感分析、内容分析等方法,从文学、翻译、传播三个维度考察该版本的海外传播效果。研究发现,该版本在过去 10 年间(2011—2020 年)的读者评论热度呈曲中上升态势,表明其海外传播效果较好,具体表现在:在文学维中,人物维与叙事维的读者评论情感分值相对较低,而格调维和素材维相对较高,这是因为人物性格缺乏动态发展,部分情节存在复述,而幽默格调、文化素材是小说的特色和亮点。在翻译维中,译者的翻译技艺获得读者高度赞赏,大多数读者欣赏诗歌的全译以及增加的副文本。在传播维中,不少读者反馈,他们是通过《西游记》的多模态作品接触小说英译版,阅读小说带来他们的心理变化、推荐意向、阅读行为甚至创作行为。翻译传播者应该在遵循译语惯习和诗学范式的前提下尽力再现这些特色,并进行渐进式、多模态的跨文化传播。

关键词:读者反馈;传播效果;《西游记》余译版;跨文化传播

作者简介:余承法,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师范大学翻译传播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81)

郑剑委,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讲师(湖南 长沙 410081)

引言

文学传播是指文学语言、文学形象等相关信息通过媒介的传递、接受和反馈^[1],包括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行、推广、接受等主要环节,将作家的个人创作成果转化为社会的某种共享资源,但传播方式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范围和效果,影响文学接受系统的性质与结构。近年来,学界不仅重视文学作品的同语传播,即某作品在同一语言内部不同时空和读者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开始关注异语传播,即“异语场景中人类借助翻译实现的信息传递”,又称翻译传播^[2]。翻译界多关注作品选择、翻译模式、翻译策略/方法、译者风格等,而传播界聚焦传播的方式、内容、渠道和效果等。文学翻译传播不能只关注翻译质量而不考虑传播媒介和效果,也不能过分强调传播效果而忽视翻译质量,而需要整合翻译和传播“两张皮”,尤其需要通过收集读者反馈来考察传播效果。在中华文化“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基于受众反馈的文学翻译传播研究对于提高中国文学翻译质量、提升“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传播效果,具有现实价值和深远意义。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智库专项重点项目“打造马栏山文化品牌 推进新时代湖湘文化交流与传播研究”(19ZWB54);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湖湘文化走出去策略研究”(18YBA291)

一、《西游记》海外传播研究概览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神魔小说的巅峰之作,传播到东方的时间远远早于西方,在明代传入日本^[3],在1895年开始传播至英美,英译版达64种之多^[4]。《西游记》的海外传播研究以国内为主,主要包括:不同语种和模态的版本考述,聚焦地域为欧美和东南亚,如英国^{[4][5]}、美国^{[5][6][7]}、德国^{[8][9]}、泰国^{[10][11]}、印度尼西亚^[12]、缅甸^[13]等,涉及的传播时间从晚清到当代,关注新闻报道、图书、宗教、影视等多种传播媒介。这些研究充分利用文本、电子、音视频等多种资源,考察《西游记》翻译传播的历程、动机、主体、路径等,分析《西游记》在海外以不同媒介存在的翻译客体,勾画《西游记》在不同语言文化中的形象。

然而,以不同媒介形式存在的传播客体并不完全等于实际的传播效果。传播效果既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也指大众传播媒介活动“对受传者和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和”^[14],最真实的表现来自受传者的反馈。反馈作为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检验传播效果最直接、最有效、最真实的依据。对于文学翻译传播而言,考察读者反馈有助于深入了解译语世界的阅读习惯和偏好、反思翻译传播的得失,为文学翻译传播实践提供参考,为相关决策提供事实依据。目前国内以读者反馈为对象的《西游记》翻译传播研究较少,仅有三项相关成果:李文婷结合销售量和评论界反馈指出,《西游记》余译版深受读者好评的原因在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受众意识^[15];王镇根据英美汉学家在译著序跋、论文和著述中的评论以及 Goodreads 平台、亚马逊网站的英美读者评论,考察了专家读者与普通读者对《西游记》的评价^[4];Wang、Humbly 分析了亚马逊网站英语读者对《西游记》英译版的反馈^[16]。这三项研究关注普通读者群体的反馈,但随意抽取读者评论进行内容分析缺乏系统性,研究结果缺乏很强的说服力。鉴于此,本文以《西游记》余国藩(Anthony C. Yu, 1938—2015)英译版(*The Journey to the West*, 以下简称“《西游记》余译版”或“余译版”)为例,基于 Goodreads 平台上有关该版本的读者评论,对反馈数据进行情感分析和内容分析,考察其传播效果,以期为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传播效果研究提供新模式新路径。

二、研究方法

《西游记》英译版众多,选取余译版是因为它被视为“二十世纪的伟大人文成就”^[17],“在所有译本中最具可读性,同时保持了高度忠实性”^[18],以译本忠实、情节完整、注释详实享誉英语世界。若不局限于音韵特征、字词对应、语句调整等语言翻译层面的讨论,而是以该版本的读者评论为依据考察海外读者的接受反馈,则更能揭示深层次的文学翻译传播问题,研究结果也将更具代表性、说服力和启发性。

本文选取、收集、整理全球最大书评网站 Goodreads 平台(该平台系统呈现读者的自发性评论,可为文学传播效果研究提供充足的分析数据)上《西游记》余国藩英译版近十年(2011—2020年)的读者反馈,统计、描述读者评论数量的历时变化和维度分布,对评论文本进行情感分析和内容分析,考察该译本的海外传播效果。

首先,采用爬虫软件收集 Goodreads 平台上余译版的读者评论数据,清洗无效的读者评论,获得读者评论数据库。接着,利用 Nvivo 软件对评论文本逐条标注分析维度。采用 Nvivo 软件标注维度更加直观、规范和系统,可避免标注的重复或遗漏,方便校正错误标注,相同内容也可进行多个维度标注(因为同一内容可能属于不同维度的评价),并自动统计维度条目数。然后,按照各个维度抽取每条评论内已标注的内容,采用基于 Python 的 NLTK 情感分析工具包,逐一测定每个条目的情感分值。采用 NLTK 情感分析工具包是因为该工具包经过大量评论语料训练,具有良好的情感分析效度,已被广泛运用于文本情感分析。最后,结合评论内容,按不同维度进行解析。采用分维度的情感分值而非已有的读者星级打分,是因为星级打分只是整体的印象打分,无法反映读者对各个具体维度的评价。

三、基于读者评论数据的传播效果分析

整理在 Goodreads 平台获得的 1033 条读者打分评论数据,并绘制曲线图(见图 1),描述《西游记》余译版的历时打分评论次数,以反映该版本在英语世界的阅读热度。图 1 显示,余译版在英语世界近十年的评论热度总体呈上升趋势,2012 年达到小高峰,随后热度减缓,2017 年达到高潮,2018 年回落,随后又开始上升。这可能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输出活动存在相关性。一方面,中国 2010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从此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活动在文化领域的溢出效应备受关注。另一方面,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启动了一系列对外翻译出版工程,如 2009 年“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13 年“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2014 年“丝路书香工程”等,中国文学名著日益引起海外读者的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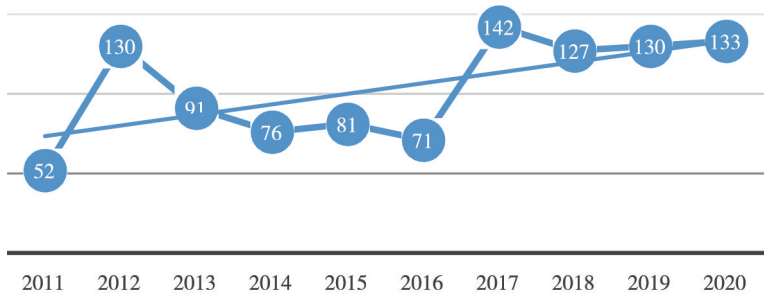


图 1 Goodreads 中《西游记》余译版历时(2011—2020 年)打分评论数

搜集、清洗、整理《西游记》余译版的读者评论数据,共获得 109 条读者评论文本(因为大多数读者只有打分,没有文字评论)。采用 Nvivo 标注了读者对译本的整体评价,即读者从整体上评价阅读体验或感受,共计 59 个评论条目。接着,按照 3 个一级维度、10 个二级维度、3 个三级维度分别标注读者评论,共计 191 个评论条目(见表 1)。

表 1 《西游记》余译版的评论维度条目分布

一级	二级	三级	评论条目(个)	条目小计(个)	内容占比
文学维	人物		20	105	16.26%
	叙事		46		
	格调		18		
		文化素材	12		
	素材	成人素材	3		
		具象素材	6		
翻译维	译者		11	39	4.49%
	诗歌		15		
	副文本		13		
传播维	渠道		5	47	4.2%
	效果		42		

如表 1 所示,我们在标注读者评论的反馈信息时,区分了文学维、翻译维和传播维三个维度。就小说而言,文学批评主要关注情节、人物和故事背景三个方面^[19],而情节和故事背景可以合称为叙事,叙事就可确定为文学维的一个二级维度。格调反映不同作家或不同作品的艺术风格的总体特征,素材是文艺创作最基本的原始材料,成为作家提炼和加工的现实生活对象,二者可视为文学维的两个二级维度。就《西游记》而言,素材主要包括三种:文化素材主要指《西游记》反映的佛、道等精神文化,成人素材指书中暴力和色情描述,具象素材包括兵器、打斗、山水等。因此,文学维包括人物、叙述、格调和素材四个二级维度。译者是翻译行为的主体,译者维是翻译维的一个重要二级维度。将诗歌翻译纳入翻译维是因为诗歌的语

言附属性极强,具有很大的不可译性^[20],而诗歌翻译水平直接决定译文质量和传播效果。副文本是“在正文本和读者之间发挥协调作用、展示作品的一切言语和非言语的材料”^[21],包括封面、作者姓名、主副标题、题词、序言、前言、注释、插图、附录、索引、跋/后记、出版信息等,译作中的副文本还包括译者的姓名、前言/序言、注释等,为读者理解译作的生成与接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常被纳入翻译研究范畴,因此本文将其归入翻译维。在拉斯韦尔的 5W 传播要素即主体、客体、受众、渠道和效果中,我们发现读者评论主要涉及对渠道和效果的反馈,因此提炼出包括渠道和效果的传播维,分别考察读者反馈中提及阅读《西游记》的途径和感受,而这是现有读者评论研究中往往忽视的内容。

表 1 显示,英语读者主要关注余译版的文学维,评论条目小计最多(105 个),内容占比最大(16.26%),这表明英语读者比较注重故事情节、人物刻画和素材三个方面。在翻译维中,诗歌引起的读者关注最多(15 个评论条目),其次是副文本(13 个评论条目)。统计显示,传播维的读者反馈主要为接受效果反馈,共 42 个评论条目,多于翻译维的评论条目(共 39 个),这间接反映读者阅读《西游记》英译版时拥有丰富体验,受到深刻影响,进而在 Goodreads 平台上分享其阅读感受。

四、基于读者评论文本的传播效果分析

利用 NLTK 情感分析工具测定不同维度每个条目的情感分值,然后综合各条目的情感分值,获得每个维度的平均情感分值(见图 2)。情感分值幅度由-1.0 到 1.0 归一化为-5.0 到 5.0 之间,以对比书评网站的 5 分制打分。分值越高,情感态度越积极;分值越低,情感态度越消极。为验证情感分析的可靠性,我们对每条评论的情感分值与其相应的星级打分进行相关性分析。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示,情感分值与星级打分的相关性系数为 4.5,显著性水平为 0.001($p < 0.01$),这表明两者成显著正相关,情感分析方法具有可靠性。

整体的情感分值为 3.8,表明读者对译本的评价较高。通过整体评论文本的词频统计和逐一核实,发现频率最高的五个评价性形容词依次是:great(“很棒”,6 次)、best(“最好”,5 次)、classic(“经典”,4 次)、enjoyable(“令人愉快的”,4 次)、engrossing(“引人入胜的”,4 次),均为褒义形容词。这两项统计说明,余译版的读者认可度较高,传播效果较好。下面从翻译维、文学维和传播维来分析读者评论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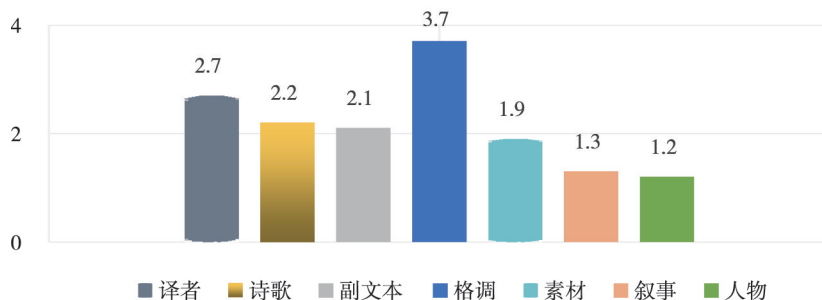


图 2 《西游记》余译版读者评论文本中翻译维和文学维二级维度的情感分值

(一) 翻译维的读者评论文本分析

如图 2 所示,翻译维的 3 个二级维度即译者、诗歌、副文本的情感分值均在 2 以上。

标注统计发现,译者维仅有 1 个消极评论条目,其余评论条目的情感分值均为正。如读者 Yoshinga 指出,“My rating for this book is purely based on the beautiful job that Anthony Yu did in translating it. He did not lose the original sentiment while making it actually make sense in English.”(我对本书好评完全是因为余国藩很棒的翻译。他不仅没有丢失原著表达的情感,反而在英语中进行了很好的传达。)这与文学批评学者 John Marney 的观点一致,他认为《西游记》余译版是翻译技术和艺术的典范^[22]。

诗歌翻译维的情感分值为 2.2,表明《西游记》余译版的诗歌翻译在整体上获得英语读者的好评。如 Bujold 评论道,“The translator’s English prose is smooth and clever, and he does an elegant job on the many interspersed poems.”(译者的英译流畅、娴熟,穿插其中的诗歌也翻译得很优美。)Luke 认为,“On

top of that, this book has the interesting quality of describing various people, places, and fights in descriptive poems.”(最重要的是,本书采用叙述诗歌描写了大量人物、地点和打斗场景,这一特色引人入胜。)但 Cleopatra、Pennybags、Chris 等 3 位读者认为诗歌过多,影响了故事的流畅性。其实,余国藩考虑过诗歌的存留问题,但他最终选择了全部翻译。他认为,《西游记》威利英译版(即 Arthur Waley 的变译本 *Monkey*, 1943 年由美国 The John Day Company 出版——笔者注)的最大遗憾是删除了原著的 750 多首诗,而这些诗是原著的基本文学形式,也是原著叙事活力和描述能量的体现,这些文学形式应该翻译出来,帮助英语读者理解和鉴赏原著的魅力^[23]。诗词全译是余译本的整体价值评判的关键参数,帮助英语读者在阅读译著时跟主人公一起体验降妖伏魔的奇幻之旅,并通过诗词全译体味这部文学名著的思想内涵^[24]。有些译者因为担心受众缺乏足够的文化理解能力,就一味迎合读者,刻意抹除原著的文学特色,但这可能导致译本的读者接受度不高、传播效果不佳。

余国藩的副文本策略包括前言、注释和索引表,英语读者称赞余国藩借助注释解释中国文化表达的做法,如 Burgendy 评论道,“Luckily this translation includes an extensive explanation of certain Chinese terms along with footnotes that help understand some of the terms.”(幸运的是,该译本包含对中国特色术语的大量解释以及有助于理解的很多脚注。)

(二)文学维的读者评论文本分析

文学维的四个二级维度的情感分值依次排序为:格调维(3.7) > 素材维(1.9) > 叙事维(1.3) > 人物维(1.2)。

格调维的读者评价最高,83%的评论条目的情感分值为正值。读者尤其喜欢《西游记》的幽默格调,这与上一节传播维中有关心理变化的发现是一致的。Mary S. Lee 指出:“It was neither dry, nor dense, nor inscrutable. To my surprise, it appears to have been intended to be fun, and, despite the intervening centuries, I often found it such. Although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violence, the tone is very light... Suffice it to say, I didn't expect a Chinese classic to contain a scene where three of the heroes pass off their piss as holy water.”(该书不干涩、不紧张,也不高深莫测。让我惊讶的是,此书似乎故意采用风趣的格调,尽管相隔几百年,仍然让我有如此感受。尽管有一些暴力场面,但格调还是很轻松……一言以蔽之,我没想到一部中国经典还有 3 位英雄将撒尿当做圣水[给妖怪喝]的桥段。)例如,余国藩对原著一段场景的翻译基本上再现了幽默效果:“那白马认得是八戒,忽然口吐人言,叫声:‘师兄!’这呆子吓了一跳,扒起来往外要走,被那马探探身,一口咬住皂衣,道:‘哥啊,你莫怕我。’八戒战兢兢的道:‘兄弟,你怎么今日说起话来了?你但说话,必有大不祥之事。’”虽然“兄弟”(brother)“口吐人言”(assuming human speech suddenly)“吓了一跳”(so shaken that he fell on the ground)的译法稍欠生动,但译者基本上将其中的言语幽默和形象幽默传达给英语读者,令人捧腹大笑。

素材维的 3 个三级维度的情感分值依次排序为:文化素材(3.8 分) > 具象素材(2.5 分) > 成人素材(1.06 分),文化素材的情感分值在所有维度中最高。英语读者对书中的道教、佛教等文化素材比较感兴趣,如 Liralen 评价:“The journey itself really reminded me a lot of old Taoist and Buddhist myth and legend and well... feel... that I got from my childhood.”(《西游记》帮助我回忆小时候学到的道教和佛教知识); Aubrey 评价:“There were further intriguing glimpses of religious clashes, including a very intense one between Buddhists and Taoists.”(“还有一些有趣的宗教冲突,包括佛教和道教之间的激烈冲突。”)在具象素材维的评论中,值得注意的是有人提到该书对女性低俗行为的描述(读者 Aubrey),主要是指女妖形象:她们充满食欲和色欲,作恶多端,负罪累累。其实,作者将这些践踏礼教的行为加在女妖身上,是为了“突出她们的妖性”,将其区别于凡间良女和天上女神^[25]。成人素材的分值最低,可能跟书中的血腥和色情描写有关,如:第 17 回悟空打死苍狼、第 30 回黄袍怪饮酒吃人、第 75 回狮驼岭死人堆,色情场景如第 27 回白骨精化身凡女、第 54 回女儿国国王挑逗三藏、第 72 回盘丝洞女妖洗浴描写,等等,几位读者反映这些场景描写不适宜少年儿童阅读。《西游记》余译版的词汇明晰、语言流畅、可读性高,少年阅读理解并不成问题,但因为是成人素材,加上诗歌难懂,佛道文化晦涩,的确不适合儿童阅读。

叙事维的评价偏低,消极评论集中在故事结局的可预测性(如 Letitia 的评论)、降妖模式的重复性(如

Mary 的评论)、人物对话中的情节复述(如 Hopp、Michael 的评论)。7 位读者反映角色有时复述故事情节,而未采用诸如“将上项事说了一遍”的手法。如第 30 回,三藏被黄袍怪变成老虎,白龙马变成宫娥刺杀黄袍怪,由于法力不济被砍伤,而后逃脱,八戒回到宝象国都时遇到白龙马,白龙马又繁琐地把前后经过复述一遍,即“你与沙僧在皇帝面前弄了本事……那妖精变做一个俊俏文人……只得化龙身去救……把我后腿上着了一下”。《西游记》原著复述某些情节,原因在于:最初从说书话本整理加工而来,每次说书都有时间间隔,观众可能不同,有必要重复上次说书相关的故事梗概。书中的很多复述并不在章回的开头,而是在中间。此处,白龙马战败后的附诗“意马心猿都失散,金公木母尽凋零。黄婆伤损通分别,道义消疏怎得成!”属于前文内容,与“且不言三藏逢灾,小龙败战”之类的后文内容可能是两次说书,经吴承恩整理成一个章回。这种情节复述在余译版中都得到了忠实再现,可能影响读者阅读时的流畅度。

人物维的情感分值最低,主要是因为不少读者认为《西游记》中人物性格的变化很小,唯一受到肯定和欢迎的角色是孙悟空,但其魅力随着剧情的发展而逐渐减弱(如 Sarah 和 Bibler 的评论)。Melanie 抱怨道,“I’m fed up with Sanzang’s stupidity (because, seriously, I would find it acceptable for a person to commit the same mistakes twice or thrice in a book, but the stupid monk just keeps doing it all over again!!), with Pig’s ill intentions and with Friar Sand’s uselessness. Well, at least Wukong is evolving in terms of personality. In a VERY, VERY subtle way, but at least he is the only one that looks like he’s at least TRYING to be a better being.”(我受够了玄奘的愚钝(一个人可能犯两三次错误,但这个蠢和尚一遍遍犯错)、八戒的坏心眼和沙僧的无用。悟空的性格发生了变化,但以极其微妙的方式,至少他是唯一想变好的人。)

(三)传播维的读者评论本文分析

传播维而言,5 位读者反馈他们通过接触《西游记》的漫画书、影视剧或游戏开始阅读英译版,这与《三国演义》海外网络游戏(Dynasty Warriors)的改编传播带动书籍阅读的模式相似,与卢颖桢有关印度尼西亚受众主要通过影视剧了解《西游记》的研究发现^[12]是一致的。英语读者阅读余译版之后,产生了如下四种反应。1)心理变化:除了两位读者产生无聊感(如 Melanie 和 Kloud),23 位读者表示阅读带来愉悦感(如 Sarah、Timothy 的“joy”以及 Allister、YAHHR 的“amusement”),Wendy 认识到团队合作和拒绝诱惑的重要性,Raditya 意识到人们要为过去的错误和罪恶忏悔;2)推荐意向:基于书中的道教文化、中医知识、冒险故事等因素,7 位读者表示会向他人推荐《西游记》;3)阅读行为:Alex、Sturgis、McGinnity 等 7 位读者表示将重读或读下一卷本《西游记》,如 Burgendy 评论道,“I can’t wait to read the next volume to it.”(我等不及要读下一卷);4)创作行为:Sheppard 指出,“*The Journey to the West* influenced the composition of my own latest work *Spiritus Mundi*.”(《西游记》激发我创作了《世界魂》。)总之,英语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了解了中国文化知识,体验了精神爽点,获得了心灵感悟,内化为认知的一部分,并借鉴、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这表明《西游记》给英语读者带来多元价值。

结语

《西游记》有两个英文全译本,余译版在 Goodreads 上的年平均打分评论数为 103 条,詹纳尔(W. J. F. Jenner)英译版为 101 条,合计打分评论数高于《红楼梦》四个英文全文版的年平均数(180 条),但两者均远低于世界经典小说的英译版,如日语名著《源氏物语》的 2003 年英译版 *The Tale of Genji* 的年平均打分数据为 760 条,西班牙语名著《堂吉珂德》的 2003 年英译版 *Don Quixote* 为 21000 条,俄罗斯语名著《战争与和平》的 1998 年英译版 *War and Peace* 为 25000 条。这表明《西游记》英译版在英语读者群中的传播范围有限,这也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必须面临的现实。

郭光华曾指出,国际传播能力评估要综合考虑传播方与接受方,要结合定量与定性测量,不能忽视受众的传播效果^[26]。本文正是基于读者反馈,采用分维标注、情感分析、相关分析等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析中国文学经典《西游记》英译本的海外传播效果,以期为文学作品的翻译传播研究提供科学、客观、可行的分析路径。在人物、叙事、素材、格调等维度得到再现的前提下,译文的文笔和风格可能显著区

别于原文;文学作品的受众存在显著差异,译语受众与原语受众的文学审美可能相差甚远。可见,对于相同的文学作品,异语传播与同语传播的效果可能大相径庭,基于受众反馈的接受效果研究将为揭示文学的翻译传播效果提供有益启迪和可行路径。

《西游记》余译版中幽默风趣的笔调(格调维)让读者体验到趣味和愉悦(效果维),注释(副文本维)文化词(文化素材维)以帮助读者理解,全译诗歌并兼顾传意和格律(诗歌维),译者力图以柔性再现而非省略或明晰化的方式(译者维)将《西游记》所蕴含的文学特色传译给英语读者,诗歌全译、幽默格调再现、副文本阐释都得到了海外英语读者的高度肯定。还有不少读者反馈说他们通过漫画、影视剧和游戏等多模态形式接触《西游记》。这些至少带来以下两点启迪:1)文学翻译传播必须考虑读者分层,确定翻译传播的主要内容和价值如《西游记》原著中体现的勇敢、正义、勤劳、善良等普世价值观,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如《西游记》余译版的学术性全译和威利改编版的变译,适时调整传播媒介、路径和方式,以满足特定条件下特定受众的特殊需要,以便切实提高传播效果;2)文学翻译传播需要尽量保持原著的文学特色,同时适应译语世界的诗学规范和语言惯习,兼顾原著文化价值与受众体验反馈,并采用渐进式、多模态的跨传播策略,先引发感官体验,然后引向经典阅读,再推动译本接受,最后缔结文学文化因缘。

参考文献:

- [1]王颖. 新传媒语境中文学传播的路径与价值嬗变[D].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13.
- [2]尹飞舟,余承法. 翻译传播学论纲[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170-176.
- [3]李舜华. 东方与西方:异域视野中的《西游记》[J]. 学术交流,2001(1):110-115.
- [4]王镇. 何惧西天万里遥——《西游记》在英美的传播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5]刘君. 文化寄生:一种跨文化传播的变异范式——《西游记》跨境传播的视觉重构与异域想象[J]. 东南学术,2010(6):163-171.
- [6]朱明胜,范圣宇.《西游记》故事在美国的传播与接受——基于对《纽约时报》猴王故事报道的分析[J]. 中国文化研究,2017(3):161-169.
- [7]赵敏. 文化主体的自证:美版《西游记》电影的改编创意和对话机制[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12):91-96.
- [8]李双志.《西游记》之“西游记”[J]. 上海文化,2017(7):114-119.
- [9]滕硕,王学博. 布迪厄场域理论视角下《西游记》在德语区的译介与传播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6):124-131.
- [10]张充.《西游记》在泰国传播态势分析——以对泰国曼谷纪伊国屋书店的调查为例[J]. 出版广角,2014(12):19-20.
- [11]谢玉冰.《西游记》在泰国的传播、再现与衍生[J]. 国际汉学,2018(2):74-82.
- [12]卢颖桢.《西游记》在印度尼西亚的传播研究[D].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 [13]黄秋秋,崔玉可,张聪. 中国电视剧走出去的效度与对策研究——以 86 版《西游记》在缅甸的传播为个案[J]. 传媒,2018(22):37-40.
- [14]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72.
- [15]李文婷. 西方修辞学认同论对英译典籍受众意识的观照——以余国藩版《西游记》英文全译本为例[J]. 外国语文,2016(5):118-123.
- [16]Wang, Feng and Humblé, Philippe. Readers' perceptions of Anthony Yu's self-retranslation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J].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2020(5):756-776.
- [17]Robinson, James T. and Rosengarten, Richard A. In Memoriam: Anthony C. Yu [J].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2016(1):1.
- [18]Martinson, Paul V. Review of Buddhist Pilgrim, Immortal Beast[J].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1985(3):378-385.
- [19]Hewson, Lance. An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Criticism: Emma and Madame Bovary in Translation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1:10.
- [20]Landers, C. E. Literary Translation: A Practical Guide [M]. Clevedon/Buffalo/Toronto/Sydney: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1:98.
- [21]Genette, G.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M]. Translated by Jane E. Lew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1.

- [22] Marney, John. Review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J].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1980 (1): 153-154.
- [23] Yu, Anthony C.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Preface.
- [24] 苏艳.《西游记》余国藩英译本中诗词全译的策略及意义[J]. *外语研究*, 2009(2): 82-86.
- [25] 张红霞. 女性“缺席”的判决:论《西游记》中的女性形象塑造[J]. *明清小说研究*, 2004(2): 67-77.
- [26] 郭光华. 我国新闻媒体国际传播能力评估体系研究[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7(4): 147-151.

Overseas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A Study Based on Readers' Feedbacks

Abstract: Tak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English readers' feedbacks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Anthony C. Yu's English version of *Xi You Ji*,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its overseas reception effect by sentiment analysis and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readers' comments, which are labell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of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readers' feedbacks in the past decade (2011-2020) have been on the rise on the whole despite one or two downs in between, reflecting an overall good overseas communication effect which is demonstrated as follows. First, character and narration in literary dimension are valued relatively low whereas tone and theme score high according to sentiment analysis, due to the relatively static nature of character development, partial repetitiveness of narration and the intrigue and charm of its rich humorous tone and cultural theme. Second, in the dimension of translation, Yu's translation technique is highly praised by readers, most of whom also appreciate his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poems and explanation of cultural contents in the form of paratext. Third, in the dimension of communication, some readers attribute their reading of Yu's version to their previous access to the novel's multimodal products, which results in their change of thinking, recommendation of the novel to others, re-reading or further reading, and even their own creation. It thus follows that, since literary features of literary classics such as humorous tone, cultural theme and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poem are the exact charms attracting foreign readers, translator-communicators need to do their utmost to reproduce such characteristics on the condition of adapting to the language habitat and poetical norms in the target culture and conduct progressive multi-modal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readers' feedbacks; communication effect;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translated by Anthony C. Yu;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责任编辑:文晶)

翻译传播主体控制效应解析

——以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英译出版为例

尹飞舟,李 颖

摘 要:基于异语传播环境,翻译传播主体具有不同于一般传播主体的特殊性,担负着更多责任,因而对传播过程各个环节的影响和控制表现出特殊规律。根据所处的语言环境,翻译传播主体可分为原语主体和译语主体,对传播过程的控制表现为原语主体控制、译语主体控制、原语主体与译语主体联合控制三种形式。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出版活动展现了翻译传播主体的这些特征。恰当运用翻译传播主体对传播过程控制效应的规律,能促进当代中国文学作品更好地“走出去”。

关键词:翻译传播;主体;控制;当代文学;英译出版

作者简介:尹飞舟,湖南师范大学翻译传播研究所、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81)

李 颖,湖南师范大学翻译传播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副教授(湖南 长沙 410081)

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逐步提升,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英美受关注的程度明显提高。从2015年起,“在英美世界一直处于翻译文学‘次场’的中国文学”迎来了曙光^[1]。《中国图书世界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海外影响力日益增大,“逐渐成为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的人们了解中国社会发展面貌的一个窗口”^[2]。莫言、王蒙、余华、苏童、贾平凹、麦家、刘慈欣、姜戎、周志浩、曹文轩、沈石溪、秦文君、刘震云等一大批当代作家的作品受到海外文学家、汉学家的青睐,被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传播。英美的一些文学评论家、书评家、汉学家积极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英文版撰写书评,并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卫报》《独立报》《出版人周刊》《加州书评》《今日世界文学》、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等影响力较大的大众媒体上发表。这些群体评论直接影响着“目标读者的阅读选择、阐释策略及价值判断”^[3]。亚马逊英文网站和全球最大的在线读书社区 Goodreads 上的读者评价显示,英语世界的大众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兴趣不一。截至2021年4月29日,《三体》有近二十万人参与评价,评论数两万多条,《狼图腾》和《解密》的评价人数也在四千到五千之间。但美国图书馆馆藏量排名靠前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流逝》《解约》等作品^[4]的评价人数却很少,均在两百人以下。《狼图腾》《解密》《三体》英文版在英美读者中引起的现象级轰动令国人为之振奋,但我们要清楚地看到,与英美文学作品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相比,中国文学作品仍显寂寥,很大一部分译作尚处于“走出去”却没能“走进来”的状态。

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英译出版的这种现象引发了人们的思考 and 解读,学术界在积极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并寻找对策。这既是文学现象,也是出版活动和翻译活动,所以,学者们从文学、翻译、出版等多个角度开展研究。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英译出版本质上是一种翻译传播活动,从翻译传播主体角度来分析这些问题,可以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传播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有助于促进其对外传播。

基金项目: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重大项目“新文科背景下翻译传播学跨学科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2020JGZX006)

一、基于异语传播的翻译传播主体特殊性

传播主体就是传播者,“指的是传播行为的引发者,即以发出讯息的方式主动作用于他人的人。在社会传播中,传播者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或组织”^[5]。传播者是传播过程排在首位的要素,因为它是传播活动的发起者,对传播活动和传播过程具有控制作用。传播学先驱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在提出著名的5W理论时,就曾指出:“研究‘谁’的学者查看传播者启动并指引传播行为的因素,我们将这个研究领域的子目标称为控制分析。”^[6]因此,分析传播主体就是分析传播活动与传播过程的控制,这是传播学界的共识。

从语言维度考察传播,是传播学理论的一部分,传播学家的一些经典著作及传播学教科书中都有相关论述。这些论述分析了语言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符号系统和最重要的传播工具在传播中的作用,却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人类的一些传播活动使用不同语言。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使用同一种语言传播与使用不同语言传播有没有区别?后者有没有特殊性?如果有,这些特殊性是什么?

传播学的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Lang Schramm)曾论述过语言在传播中的功用与问题。他引用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等语言学家的理论说明:“语言本身是一种社会规范,是代码化的文化的一部分,是人们一致同意的符号系统”^[7]，“在每一次传播中,我们携带我们的文化参与传播,于是,我们的文化就反映在我们的语言里,并通过我们的语言表现出来”^[7]。他的这些论述一般性地分析了语言在传播中的表现。尽管他提到“世界上现存的语言约有3 000种”^[7],却没有区分使用同一种语言传播与使用不同语言传播两种情况,没有分析使用不同语言进行传播的特殊性。

在人类传播活动中,使用同一种语言进行的传播称为同语传播,即一般传播,使用不同语言进行的传播称为异语传播,即翻译传播^[8],这两种传播的过程存在差异。异语传播必须有译者参与,译者要素的增加使得“传播过程和传播要素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不同于一般传播的特殊性”^[8]。

在翻译传播活动中,翻译传播主体对传播过程的控制具有特殊性,其根本原因在于翻译传播主体在异语传播环境中面对不同语境的作者或读者。如,在翻译出版过程中,作为主体的出版机构一般通过选择译者来实现对作品翻译的把控,同时还需处理翻译版权等相关事务。所以,从事翻译出版的出版机构自身必须具备跨语言编辑出版的能力,或者具有处理跨语言事务的渠道。以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出版为例,无论是推出“熊猫丛书”的中国文学出版社、外文出版社,推出《解密》英文版的英国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Group)、美国精英出版社FSG(Farrar, Straus and Giroux),还是推出《三体》英文版的美国托尔出版社(Tor Books)、英国宙斯之首出版社(Head of Zeus),在译语文本的出版发行运作中,都具备上述能力或渠道。具备跨语言特征以及基于异语传播环境的特点控制传播过程,就是翻译传播主体特殊性的体现。

二、翻译传播主体的责任及对传播过程的控制

在大众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处于最优越地位,“不但掌握着传播工具和手段,而且决定着信息内容的取舍,作为传播过程的控制者发挥着主动的作用”^[5]。传播主体的诸多责任中最重要的是对传播讯息的取舍选择,他们有责任 and 权力对进入传播渠道的讯息进行筛选和过滤,因而美国心理学家、传播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称他们为“把关人”^[9]。翻译传播主体与一般传播主体一样,处于传播过程的首端,需要承担讯息的筛选、处理加工和发送任务,并对讯息传播的时间、对象、内容、形式、流量、流向等因素起控制作用^[5]。作为异语传播活动的发起者和责任主体,翻译传播主体与同语传播主体不同,不仅要决定传播的讯息,还要考虑讯息的语言转换以及相应的传播条件。由于翻译传播活动发生在异语场景,翻译传播主体对传播过程的控制具有跨语言的特点。译者作为传播过程的一个要素,它的加入使得翻译传播主体需要考虑异语文化与制度差异、译者与译法选择、异语受众心理等一系列同语传播不会遇到的问题,需要协调、控制的因素更多,互动过程更复杂。具体来说,翻译传播主体“具有五个方面的责任和权力:决定翻译

传播内容,确定呈现形式,选择媒介方式,挑选译者并与之互动,提供实施翻译传播所需的条件”^[8]。翻译传播主体的责任既包含了一般传播主体共有的责任,也包含了其特有的责任,这些责任是翻译传播主体对传播过程发挥控制效应的基础。

翻译传播过程由发起、翻译、传输和接收四个环节构成^[8],比同语传播增加了“翻译”环节。虽然不同环节以不同要素为中心:发起环节以传播主体为中心,翻译环节以译者为中心,传输环节以媒介为中心,接收环节以受体为中心,但翻译传播主体会按照自身的传播意图来引导、协调甚至控制各个环节,同时凭借自身形象以及对传播过程的控制来影响传播效果。所以,翻译传播主体基于自身的责任和权力,对翻译传播过程以及传播效果具有不同于同语传播的控制效应。

(一)在发起环节,基于异语传播环境确定传播内容,提供传播条件

翻译传播主体在决定启动一项翻译传播活动的时候,会根据自己的传播意图来确定翻译传播内容,并提供翻译传播的必要条件,但确定传播内容的因素及需要提供的条件与同语传播有所不同。

确定传播内容是传播主体意图的直接体现,所以翻译传播活动一开始就要对传播内容进行选择。虽然在履行“把关人”责任这一点上,翻译传播主体与同语传播主体是一样的,但由于传播环境不同,前者对内容的把关还需要考虑和适应异语环境。在出版行业,作为翻译传播主体的出版机构必须根据传播地区或国家的文化与制度差异、异语环境下受众的文化需求、自身的出版目的、文本主题与思想等多方面因素来把关翻译传播内容,分析、筛选和确定可进入传播渠道的文本。被选文本不但要有传播价值,还必须符合相关国家的出版规范,所以一般要经过传播主体的多轮审读。如外文出版社和中国文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熊猫丛书”时以对外译介中国优秀文学作品为宗旨,因此要求入选作品在国内曾获文学奖项或具有很大影响,能代表中国文学的水准。而作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大众出版机构——英国企鹅出版集团,在确定出版《解密》和《狼图腾》时,不仅要确认作品与西方主流价值观不发生冲突,还要从商业角度考虑作品在西方读者中的市场。

翻译传播主体需要为翻译传播活动提供条件,包括解决传播内容的使用许可,提供活动经费等。翻译传播主体首先要取得内容的翻译版权,这是翻译传播活动开展的前提。以“熊猫丛书”的英译出版为例,传播主体致力于向世界推介当代中国有影响的作品,所以深受国内当代作家的欢迎,容易获得有关作家和机构的版权支持。畅销文学图书的翻译版权往往会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取。《狼图腾》和《三体》分别由英国企鹅出版集团和美国托尔出版社率先翻译出版,作品版权拥有者与出版机构实现了双赢,实现了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在提供传播活动经费上,由于一些国家出台了鼓励本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政策,翻译传播较之同语传播获得此类经费支持的渠道会更多。在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出版中,出版机构除了自身提供出版经费外,还可以争取相关的政府出版资助。作品英文版的出版投入本身就是出版资本运营的一部分,与一般的商业化大众出版并无不同,但在翻译出版当代中国文学作品时,国内外出版机构可以从中国政府部门设立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出版工程”“中外图书互译计划”等项目争取经费支持,如《三体》就得到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的支持。

(二)在翻译环节选择译者,与之互动

翻译环节是翻译传播区别于同语传播的根本所在。翻译传播主体与同语传播主体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需要考虑内容的语言转换,因此选择译者是翻译传播主体特有的责任和权力。在图书翻译出版中,作为翻译传播主体的出版机构需要选择译者,并与之沟通,使图书的翻译符合传播意图。

大多异语受众在接触译作之前都对原作缺乏了解。对他们而言,译作似乎就是原作,所以译作的翻译出版质量直接影响原作在异语环境的传播效果。瑞典知名汉学家马悦然(Goran Malmqvist)曾说:“选材不当,译得枯燥乏味,是中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最大障碍。”^[10]可见,翻译是译作进入异语世界的敲门砖,名作佳译能在异语环境中更好地传播。

由于译者在翻译传播中具有关键作用,翻译传播主体会根据自身传播意图,结合内容特点和译语受众的需求来选择“理想译者”。“理想译者”需要具备与所译内容相关的知识,具有相应的翻译经验、文化背景和社会影响。如“熊猫丛书”的译者团队杨宪益、戴乃迭(Gladys Yang)、王明杰、沙博理(Sidney Shapiro)等,都是学贯中西、中外闻名的翻译家;《狼图腾》的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三体》的译者刘宇昆

也都是出版机构反复考虑选定的。

翻译环节是讯息流动的一个结点,在语言转换过程中,讯息会有某种程度的过滤。因此,译者也是译作的“把关人”之一。为了实现传播意图,翻译传播主体选定译者后,往往会继续与之互动沟通,共同把关内容的翻译。在一些专业性问题上,翻译传播主体一般听从译者意见,而在政治导向和意识形态等重大问题上,传播主体会贯彻自身意图。在对外翻译出版中,牵涉到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文本的翻译,最后需要由出版机构按照程序审定,而在文学表达、语言风格等方面则鼓励译者探索创新。在翻译传播活动中,译者并非完全处于被动和受支配的地位,他们也有自身的主动性。译者是整个翻译传播活动中最具有跨语言交际能力和素养的成员。为了实现更好的翻译传播效果,译者可以积极地与翻译传播主体及其他要素互动,除了内容翻译外,他们还可以在媒介选择、版面设计、营销推广等方面提供专业建议。美国翻译家葛浩文谈到翻译出版时说,很多出版社在封面设计方面会征求译者的意见,有些出版社会让译者帮忙寻找图书推荐人来为译作写推荐语^[11]。

(三)在传输环节,根据异语传播环境确定讯息呈现形式和媒介

在讯息传输环节,传播渠道和传播媒介处于中心地位,但传播主体可以通过讯息的呈现形式和媒介选择来影响讯息的传输。但与同语传播中传播主体确定原语讯息的呈现形式和媒介不同,异语传播中传播主体确定的是译语讯息的呈现形式和媒介。因为异语传播中的讯息到达受众会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讯息在传播主体和译者之间的流动,生成译语讯息;第二个阶段是将译语讯息传递给受众,这个阶段才需要选择讯息的呈现形式和传播媒介。

译语讯息以哪种外观形式、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媒介呈现给受众,受到异语环境的影响,也会反作用于异语环境中的传播效果。翻译传播主体就是译语呈现形式和媒介的决定者。在翻译出版活动中,讯息的呈现形式就是图书的开本、封面、插图、版式设计等。纯文字本或是图文对照本,传统纸媒或是纸媒配音视频,素色或是彩色封面,平装本或是精装本等,都是影响受众消费感受和选择的因素,受众常常会因为其中一个因素而做出选择。如:翻译出版阿拉伯文版作品的封面采用清真绿会比其他颜色更受欢迎;文学作品如果配上合适的图片,更能为异域受众增加现实感受;传统纸媒与电子书、音频、影视、互联网等新媒体的结合比较适合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等网络普及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的受众。

“媒介”包括机构媒介、载体媒介和技术媒介^[8]。传播过程中载体媒介与技术媒介的选择受到传播主体的制约,如果机构媒介本身不是传播主体,政府或其他组织作为传播主体则有权选择机构媒介。如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在策划推出《三体》英文版的时候,经过精心考虑,最终选择了全球知名的科幻小说出版机构美国托尔出版社作为合作伙伴。

(四)在接收环节,利用异语传播环境中的有利条件引导受众

接收环节的中心是受众。使讯息符合受众心理需求,为受众接受,是传播效果产生的根本。如何克服制度、文化差异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传播障碍,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利用异语传播环境的各种条件来让受众接收并接受来自异语文化的讯息,是翻译传播主体影响控制接收环节的方式。

美国实验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曾经提出关于传播主体公信力的“可信性效果”理论,即:信源可信度越高,传播效果越好;可信度越低,传播效果越差^[5]。中国文学出版社、外文出版社、英国的企鹅出版集团和宙斯之首出版社、美国托尔出版社都是世界上知名度非常高的出版机构,它们自身的影响力对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翻译传播主体可以通过提供传播信息和安排相关议题来有效引导受众关注翻译传播活动。如出版翻译作品的出版机构可以在译语国家开展发布会、读书会、赠阅会,售卖或赠送主题画报、书签、挂件,在网络上成立读书社区、交流群组等亲民的定向宣传活动,拉近与受众之间的距离,提升传播效果。翻译传播主体还可以通过不同受众群体中“意见领袖”的作用来形成社会舆论,扩大译作影响范围。美国托尔出版社之所以对出版《三体》英文版产生强烈兴趣,是因为得到了“美国的一些杰出人士以及多位美籍华裔科幻作家的强烈推荐”^[12],业界权威人士的“意见领袖”作用让《三体》在美国的出版发行有了好的平台。《三体》英文版在英美出版发行后,美国科幻作家乔治·马丁(George Raymond Richard Martin)在《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以及一些社交网站上多次发表书评,不但吸引了马丁的书迷,还引起了整个美国科幻

读者群体的强烈反响,这也是“意见领袖”作用的体现。

三、翻译传播主体控制传播过程的表现形式

区分传播主体类型的标准有很多种,其中根据传播主体所处的语言环境进行区分,是翻译传播主体的一个特点。因为翻译传播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传播,讯息在传播过程中从原语转化为译语。翻译传播主体处于原语环境还是译语环境,其传播意图、传播策略以及对传播过程的控制会有所不同。从所处的语言环境来看,翻译传播主体包括原语主体和译语主体,对传播过程的控制体现为原语主体控制、译语主体控制、原语主体与译语主体联合控制三种形式。

(一)原语主体控制

原语主体就是处于讯息原语环境的翻译传播主体。由于处于原语环境,翻译传播主体对讯息的内容与质量有着透彻精准的理解,从传播方向来看是由内向外,传播的内容是本国或者本土的文化,往往容易获取原语国家或地区的资源。

出版“熊猫丛书”的中国文学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就是原语主体。作为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的成员,外文出版社肩负的职责就是“用外文说明中国,以图书沟通世界”。这样的出版机构翻译出版当代中国文学作品,其眼光和抱负自然与一般国外出版机构不同。根据笔者粗略统计,“熊猫丛书”至少收入了 59 种当代中国文学作品,包括了王蒙、茹志鹃、汪曾祺、谌容、凌力、张贤亮、张洁、张抗抗、梁晓声、陆文夫、邓友梅、贾平凹、冯骥才、池莉、迟子建、霍达、铁凝、程乃珊、古华、王安忆、高晓声、残雪等当代中国著名作家的代表作或作品集。可以看出,“熊猫丛书”旨在向世界展现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正如该丛书再版时外文出版社在序言中所说:“‘熊猫丛书’汇集了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主题涵盖广泛,包括城市和农村、爱情与婚姻、少数民族民间故事和历史传说等。这些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真实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并与他们不断变化的精神和社会视野产生了广泛共鸣。”(笔者译)^[13]“熊猫丛书”获得很大成功,广受英美文学界、汉学界关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译介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一个出版品牌。该丛书在海外的发行情况也曾经很好,“80 年代中期,据外文局相关部门的统计,‘熊猫丛书’的海外销量良好,经济效益也比较可观”^[14]。

原语主体往往趋向于选择对原语文化有深入了解的译者,比如“熊猫丛书”的译者杨宪益、戴乃迭、沙博理就深谙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此外,原语主体也比较容易获取原语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翻译出版当代中国文学作品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部分,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和鼓励。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支持了《黄雀记》的英译出版,“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支持了《推拿》《三体》《解密》的英译出版。

然而,原语主体对传输和接收环节的控制会表现出一些局限性。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下属的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前身为国际书店)是国内经营图书进出口业务很有影响的公司,也是外文出版社发行对外翻译图书的主渠道。该公司在图书对外发行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成熟的运作,但对英美图书市场的影响力仍然难以比肩英美图书发行商。因此,“熊猫丛书”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文学界和汉学界,不像《狼图腾》《三体》的英文版,其巨大影响产生于大众读者群体。

(二)译语主体控制

译语主体是处于讯息译语环境的翻译传播主体。由于处在译语环境,所以对目标受众有深入的了解,对译语环境下的传播手段有很好的掌控。从传播方向来看是由外向内,翻译传播的是来自异域的文化,往往是从译语环境的文化需求来确定翻译传播的内容。

在出版行业,译语主体更熟悉当地的出版规则和模式,更了解当地受众的文化心理和阅读需求,在文本内容、翻译策略、媒介利用、推广方式上所做的选择往往以市场和受众为导向。这些传播主体接触引进作品的途径主要有翻译家和版权代理,这两类群体推荐的作品大多是原语国家或地区的经典作品,往往是“世界著名作家和重要人物的新作、被改编制作成商业电影的作品、不愁销路的作品(如惊悚小说、非常有才气的纯文学等),或者在目的语国家获得重大奖项并开始在其他国家受到关注的作品”^[15],一般作品

极难得到译语主体的关注。

麦家的《解密》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以这种模式“走出去”的典型案列。该作品荣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和“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之后,英国汉学家米欧敏(Olivia Milburn)和克里斯托弗·佩恩(Christopher Payne)慧眼识珠,将其译成英文,并在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的推荐下,由英国企鹅出版集团和美国精英出版集团联合出版^[16]。两大出版集团凭借各自丰富的市场推广经验,通过制作宣传片、媒体报道、发表书评、作者全球巡讲等多种营销途径,让《解密》英文版成为经久不衰的大众畅销书,并入选“企鹅经典”文库,成为收入该文库的唯一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三)原语主体与译语主体联合控制

“原语主体与译语主体联合控制”指的是处于原语环境和译语环境的两个传播主体共同负责某个翻译传播项目。在出版行业,就是由分别处于原语国家和译语国家的两个出版机构合作完成作品的翻译版权授受、翻译、出版、营销推广和市场反馈等出版发行全流程。《三体》的英译出版是该形式的典型案例。

2012年,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科幻世界》杂志社与《三体》作者刘慈欣签署了《三体》英文图书版权协议,获得了《三体》英文版的翻译版权,并选择美籍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担任第一部的译者。2014年,该公司授权美国托尔出版社在全球出版《三体》英文版^[17]。2015年,托尔出版社又回授该公司大中华地区英文版的版权,《三体》英文版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上市。《三体》英文版的出版发行由中国和美国的出版机构联合完成,既充分把握了《三体》的作品内涵,又很好地利用了英美出版社的本土发行优势,因而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三体》英文版不仅深受英美读者欢迎,一度位居亚马逊“亚洲图书首日销量排行榜”第一,同时登上了“2014年度全美百佳图书榜”^[18],而且得到了英美文学界的认可,获得了最具权威与影响的世界性科幻大奖“雨果奖”^[19]。

原语主体与译语主体联合控制吸纳了原语主体和译语主体双方的优势,展现出良好的前景,逐渐被国内外出版机构采用。如200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与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Harper Collins)在翻译出版张炜的《古船》时就展开了合作。2016年,美国波士顿出版公司(International Press of Boston Inc.)在翻译出版余秋雨的《千年一叹》《行者无疆》时也与岳麓书社展开合作。

结语

后疫情时代,国际传播环境风云变幻,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传播面临更为复杂艰难的局面。为了更好的翻译传播效果,需要认识和掌握翻译传播主体控制效应的特殊规律,发挥其“把关人”和“传播者”的作用^[20]。在当代中国文学翻译传播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发挥各种形式翻译传播主体的优势。发挥原语主体优势,精准把握我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的内涵特质,谋篇布局,规划实施展现当代中国文学发展全貌的大型项目。发挥译语主体优势,深入了解读者市场,积极推介当代中国文学精品,让更多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走进西方读者的视野。尤其要鼓励原语主体与译语主体联合,发挥多重翻译传播主体在传播过程各个环节的控制优势,获得更好的翻译传播效果。在译语主体的配合下,克服中国文学作品在异语环境的制度、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不同带来的“水土不服”,让世界听到真正的当代中国文学故事。只有各种形式翻译传播主体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当代中国文学成为国内外出版机构高度重视的资源宝库,当代中国文学作品才能真正地“走出去”“走进来”。

参考文献:

- [1] 谢丹凌.中国当代小说英译本在海外的出版与传播:2015—2017年[J].贵州社会科学,2018(11):50-57.
- [2] 姜智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新变化[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5-27(4).
- [3] 刘亚猛,朱纯深.国际译评与中国文学在域外的“活跃存在”[J].中国翻译,2015(1):5-12+126.
- [4] 李清柳,刘国芝.英文版“熊猫丛书”在美国的传播[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7(4):29-37.
- [5]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49,127,183.
- [6] 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35-36.
- [7] 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第二版)[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88,89,84.

- [8] 尹飞舟,余承法.翻译传播学论纲[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170-176.
- [9] Lewin Kurt. Frontiers in Group Dynamics: II. Channels of Group Life; Social Planning and Action Research [J]. Human Relations, 1947, 1(2):143-153.
- [10] 邵璐.拨开文学翻译与传播中的迷雾[N].社会科学报,2016-10-20(5).
- [11] 葛浩文,林丽君.翻译不是一人完成的[J].南方文坛,2019(2):36-39.
- [12] 陈枫,马会娟.《三体》风靡海外之路:译介模式及原因[J].海外传播,2016(11):57-59.
- [13] 巴金.憩园[M].卓可·霍,译.北京:外文出版社,2009:序.
- [14] 何明星.中国当代文学海外出版传播 60 年[J].出版广角,2013(7):18-21.
- [15] 花萌.美国文学代理现状与代理人眼中的中国文学英译——盖尔·哈克曼访谈录[N].中华读书报,2017-5-10(11).
- [16] 缪佳,汪宝荣.麦家《解密》在英美的评价与接受——基于英文书评的考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2):229-239.
- [17] 谢晨星.中国科幻小说《三体》英文版销量逾两万册[EB/OL].[2015-02-13].<http://www.chinanews.com/m/cul/2015/02-12/7059271.shtml>.
- [18] 许晓青,姬少亭.《三体》英文版入选年度全美百佳图书榜[EB/OL].[2015-02-09].<http://www.chinawriter.com.cn/bk/2015-02-09/80075.html>.
- [19] 刘慈欣获雨果奖后淡然:“一次获奖,并不能改变一切”[EB/OL].[2015-08-24].<http://news.cntv.cn/2015/08/24/AR-TI1440399772630397.shtml>.
- [20] 梁岩,张玉韞.简论新媒介语境下新闻传播模式的演进[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08-115.

A Study on the Regulating Effects of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Subjects : Taking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Works as a Case

YIN Feizhou, LI Ying

Abstract: Facing the foreig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subject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communication subjects, and shoulder more responsibilities and perform special rules in the influence and regulation of each link dur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In terms of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subjects fall into source language subjects and target language subjects. Their regulation form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the source language subject regulation, the target language subject regulation and the joint regulation of both sid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works fully demonstrates these features. Taking advantages of the regulating effects toward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subjects will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ac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works.

Key words: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subject; regulat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责任编辑:文晶)

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理论新视角: 翻译传播过程的四种模式

尹飞舟¹ 王佳娣²

(1.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81; 2.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05)

摘 要 中华文化“走出去”具有跨语言传播的特征,其主要表现形式为翻译传播。对翻译传播本质和过程的认识是构建翻译传播学的基础,分别回答“翻译传播是什么”以及“如何翻译传播”的问题。翻译传播过程是翻译传播的动态结构,呈现各环节、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模式研究是对翻译传播基本结构和运行规律的理论化和抽象化总结。基于传播学的过程理论,结合对翻译传播的本质认知,翻译传播过程具有线性模式、循环模式、系统模式和社会模式。四种模式具有各自的功能,揭示了翻译传播的本质和内涵,为翻译传播的历时和共时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 中华文化; 走出去; 翻译传播; 模式

DOI:10.16059/j.cnki.cn43-1008/c.2021.02.004

中华文化“走出去”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①。但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文化“走出去”面临艰难复杂的局面,需要我们着眼长远,充分把握好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形式,并深刻认识其内在规律,加强传播理论创新。

从根本上说,中华文化“走出去”具有跨语言传播的特征,其主要表现形式为翻译传播。中华文化要“走出中华文化区”“走进其他文化区”^②就必须借助翻译。翻译传播是异语场景中人类借助翻译实现的信息传递活动,相对于同语场景中的一般传播来说具有自身的特性和规律。研究翻译传播本质及其规律的学科就是翻译传播学,是传播学的分支,也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新兴交叉学科。构建翻译传播学的目的就是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理论支持。

构建翻译传播学,首先要明确翻译传播的本质和过程,本质论与过程论是翻译传播学的两块基石。本质是对翻译、传播、翻译传播之间关系的厘清,回答“翻译传播是什么”的问题;过程是对翻译

作者简介: 尹飞舟,男,湖南师范大学翻译传播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佳娣,女,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利玛窦西学汉译中的儒学观及其当代启示研究”(项目编号:17YBA114)。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4 页。

^②周加李:《从四个维度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全面升级》,《求索》2020 年第 3 期。

传播环节和要素之间关系的呈现,回答“如何进行翻译传播”的问题。模式是对真实世界的一种理论化和简约化的表达^①,以抽象的方式深化对事物本质的认识。翻译传播的过程模式是对其基本结构和运行规律的模式化表达,为翻译传播过程研究提供基础理论框架。本文基于传播学的传播过程理论,结合对翻译传播本质的认知,提出翻译传播过程的四种模式,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根据要素与变量的参与程度形成递进的模式序列,逐步揭示翻译传播过程的基本结构、要素互动、内在机制、外部互动以及社会影响。四种模式的功能分别从不同方面揭示翻译传播的属性与内涵。

一、线性模式: 揭示翻译传播的基本结构与特殊性

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提出了著名的5W传播过程模式,最早以建立模式的方法对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进行了分析。“5W”模式就是一般传播过程的线性模式,把五个构成要素按序列连接起来,形成一个链式结构: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②。这一模式界定了传播学研究的范围和基本内容,影响极为深远。翻译传播是通过语际转化实现的传播活动,即讯息发生了从原语到译语的转化,因此翻译传播过程比一般传播过程多了一个环节,即“翻译”。在翻译传播过程中,“译者”(Who translates)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承担着讯息转化的作用,是原语讯息(Source Language Message,简称SLM)到译语讯息(Target Language Message,简称TLM)的转化者,因此翻译传播的线性模式包含六个要素,翻译传播主体、讯息、译者、媒介、受体以及效果,简称为“6W”。由于翻译活动的主要任务是处理语言符号,此处的客体(讯息)用原语讯息和译语讯息加以区分。是否有译者参与,即讯息是否发生语际转化是区分翻译传播与一般传播的标志。

翻译传播过程的线性模式是高度抽象的模型,展示了翻译传播的六个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翻译传播过程的线性模式与一般传播的线性模式主要区别在于译者在翻译传播中的重要角色和讯息的语际转化。在翻译传播中,主体发出讯息后,译者接收并进行语际转化,此时受体处于等待状态,因为受体不是直接从主体处接收原语讯息,而是从译者处接收译语讯息。译者是原语讯息的接收者,也是译语讯息的发出者。译语讯息经媒介到受体,完成一次单向的翻译传播过程。在此过程中,翻译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环节,译者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是讯息语际转化的生成者,是翻译传播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由译者对原语讯息进行解码和编码生成译语讯息,再进入下一环节,经过媒介的进一步解码和编码之后,到达翻译传播受体。因此,在整个翻译传播过程中,讯息经过了两次转码,由原语讯息转化为译语讯息,再通过媒介,由译语讯息转化为受体接收到的讯息。

线性模式体现了最基本的翻译传播结构和过程,为人们理解翻译传播过程的各环节及其内在关系提供了基本的路线图。在翻译传播六要素中,以传播效果为目的,以讯息为纽带,形成了翻译传播过程的四个环节:以主体为中心的发起环节、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环节、以媒介为中心的传输环节以及以受体为中心的接收环节^③。翻译传播过程的线性模式可用于描述单一翻译传播活动的环节与要素。例如1595年,利玛窦(译者)在南昌应建安王朱多燦(翻译传播主体)之邀,将西方关于友谊的格言译成中文,以中文和拉丁文对照的形式编成小册子《交友论》(客体—讯息),引得南昌的士大夫(翻译传播受体)争相传阅、摘抄。后来分别在江西、安徽和南京刻印出版,后又被收入《天

①[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5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②[美]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页。

③尹飞舟、余承法:《翻译传播学论纲》,《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学初函》和《四库全书》(媒介),使得这部以“友道”为主题的格言集在中国流传甚广。冯应京在《刻交友论》序中发出“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的感慨(效果)^①。运用线性模式对翻译传播过程六要素进行分析,有助于明确翻译传播活动的基本过程和主要环节,以及分析各要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二、循环模式:揭示翻译传播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翻译传播过程中,受体并非被动地接受讯息,而是积极理解讯息并做出反馈,其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从受体角度看,反馈是翻译传播受体的意见、需要、态度等信息的流通方式,受体可以积极主动地介入翻译传播过程^②,对效果产生影响;从主体角度看,反馈可以检验翻译传播效果,主体可以根据反馈调整和规范目前以及未来的翻译传播行为。受体接收到讯息后,可以对媒介、译者和主体进行直接反馈,但在翻译传播过程中,由于存在语言转换,受体的意见通常要通过译者进行间接反馈,即译者获取受体的反馈后,将反馈讯息进行语际转化,再传递给主体和媒介。主体在接收到反馈后,对原语讯息进行及时修正、补充或更新,再通过译者的翻译活动转换为译语讯息,经由媒介再到达受体,形成翻译传播的循环模式。

反馈是循环模式区别于线性模式的要素,翻译传播效果主要通过受体的反馈体现。受体可以向主体进行直接反馈,也可以通过译者将反馈内容传达给主体,译者在此过程中仍然充当反馈讯息语际转化者的角色。根据译者是否处于传播现场,翻译传播可分为现场翻译传播和非现场翻译传播。一般的口译传播活动属于现场翻译传播,而一般的笔译传播活动属于非现场翻译传播。现场传播和非现场传播中都存在受体的反馈,根据反馈的作用和发生的时间可分为即时反馈和延时反馈,根据反馈的方式又可分为直接反馈和间接反馈。

(一) 现场翻译传播的循环模式

在现场翻译传播活动中,受体的反馈讯息通过译者的现场翻译传达给主体,主体据此对传播活动的内容和形式等进行调整,反馈具有即时性和直接性。现场翻译传播中受体的反馈对译者和媒介也产生影响,对译者的影响尤为明显。译者会根据受体的反应做出即时判断,不断调整自己的翻译行为,使讯息传达更加明晰、顺畅,从而实现更好的翻译传播效果。这在口译传播实践中很常见,例如在每年全国两会期间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答问者与提问者分别承担着翻译传播主体与受体的角色,记者通过提问获取自己想了解的讯息,答问者根据记者提问回答有关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调整回答的方式和内容,他们的讯息交换往往通过译者来完成,是一种典型的现场翻译传播循环模式。

(二) 非现场翻译传播的循环模式

在非现场翻译传播的循环模式中,反馈呈现多样性和交互性的特点。受交流渠道的影响,受体的反馈往往具有滞后性。受体可以直接向主体反馈,也可以通过译者间接反馈,受体的反馈同样对译者和媒介产生影响。比如一本图书出版后,出版社通常会对图书销量、读者评价等进行调查,根据结果决定是否加印、重新设计和对内容进行修订。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霍金的《时间简史》中文版受到读者欢迎后,出版社多次加印,译者和编辑对内容进行修订,重新装帧设计,使该书成为出版社最畅销的科普类图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还成为中国大陆唯一获得授权的霍金著作中文版出版机构,接连推出霍金著作17种,带动了系列科普图书的热销。由此可见,在非现场翻译传播活动中,受体的积极反馈,与主体、讯息、译者、媒介等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提升翻译传播的

^①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页。

^②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页。

效果。

在翻译传播活动中,受体与其他要素之间存在广泛的互动。翻译传播活动引入反馈的概念之后,激活了翻译传播的循环模式,重点是主体、译者、媒介和受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相互影响,以及译者在此模式中的作用。翻译传播过程的循环模式可用于以受体为中心的翻译传播活动考察,研究受体的反馈对于翻译传播活动各环节和各要素的影响,以及对传播效果影响的研究。

三、系统模式: 揭示翻译传播活动的系统性及相互之间的影响

系统是同类事物按一定的关系组成的整体^①。翻译传播作为一个整体,常以系统的方式呈现,是多种翻译传播活动相互作用的综合过程。在翻译传播系统中,除了主体、讯息、译者、媒介、受体之间的互动及相互影响,每个环节也受到诸多相关因素的影响。若将翻译传播视为一个大系统,根据标准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的子系统,各子系统间相互影响。因此,翻译传播过程的系统模式可用以解释整个过程中子系统、各要素及相关因素的互动关系。翻译传播过程的系统模式又可分为单一系统模式和复合系统模式。前者表现为单一翻译传播活动中各环节、各要素与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后者表现为不同翻译传播系统之间、不同翻译传播系统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 单一系统模式

翻译传播的单一系统模式是某一翻译传播过程中各环节、各要素、其他相关因素及其互动的模式呈现。该模式是在循环模式的基础上,增加各种影响因素而形成的。在该模式中,除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外,在讯息的选择和生成环节,还与作者、原始讯息等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互动关系,进而影响整个翻译传播过程。

翻译传播单一系统模式中,六大要素之间呈现出相互影响制约的关系。主体控制讯息的翻译传播过程,与作者、讯息、译者、受体之间存在广泛的互动关系。主体对讯息、译者和媒介具有选择权,译者、媒介都受制于主体,共同完成翻译传播目的。原语讯息由译者转化为译语讯息,再经过媒介到达受体,讯息在主体、译者、媒介和受体之间流动。原语讯息的选择和加工有时受到原作者和原始讯息等因素的影响。影响译者的主要因素包括主体、作者、媒介以及受体。主体和作者同时影响译者的译材选择、翻译方法及翻译效果。译者在译材选择的过程中或主动、或被动,取决于主体和作者的身份及目的。译者的翻译方法可能会受到媒介的制约,同时也会直接影响讯息的传达效果,进而影响受体的接受与反馈。媒介除了对讯息的解码和编码以及收集受体反馈外,也受到主体的意志和理念、译者的翻译方法以及受体反馈的影响。受体接收讯息后,对主体、讯息、译者或媒介做出多种形式的反馈,这是翻译传播效果的体现。

(二) 复合系统模式

不同翻译传播系统之间并非孤立、封闭存在,而是相互交错并产生影响,这就形成了翻译传播过程的复合系统模式,又可分为共时复合系统模式和历时复合系统模式。前者用以描述某一特定时期不同翻译传播系统以及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后者用以描述某一翻译传播系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

在共时复合系统模式中,从事翻译传播的媒介机构(期刊社、出版社、广播电视台、网络平台等)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同一媒介机构的不同部门或个体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就某部文学作品的翻译传播而言,涉及原著的作者和出版机构、译者、译著及其出版机构等,彼此之间涉及版权、内容、形式等问题的协商,不同出版机构之间的相互影响显而易见。一部图书的多语种版本翻译出版中,其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407页。

采取的翻译标准、对原文术语的理解、译名的统一等均存在对其他语种(尤其是英语)借鉴的现象,因此不同语种的翻译传播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和相互影响。

在历时复合系统模式中,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传播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以《墨子》的英译为例,首个重要英译本由梅贻宝于 1929 年完成,后来的伯顿·华兹生(Burton Watson)在重译该书时,在译本的前言中明确写道从梅贻宝译本“获益匪浅”^①。其后出版的汪榕培与王宏译本、李绍崑译本、伊恩·约翰斯顿译本也都在译者序中指明参考了之前的各种译本,有的还指出之前译本中存在的错误,并在新译本中加以改正。由此可见,在作品的历时翻译传播中,不同翻译传播系统之间的影响是较为普遍的,尤其体现在訊息的互文性和传播效果的累积性上。

翻译传播过程的系统模式涉及各种环节、要素及相关因素之间的互动,揭示共时性和历时性翻译传播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及规律。共时复合系统模式可用于指导某一特定时期不同翻译传播活动的比较研究,如不同媒介机构的翻译传播活动、不同文本类型的翻译传播活动、同一作品在不同语言中的翻译传播、不同媒介对翻译传播效果的影响等属于共时研究范畴。历时复合系统模式可用于指导翻译传播史研究,如某部作品翻译传播的历史、主体或翻译传播媒介的发展史、读者期待的演变史等都属于历时研究范畴。翻译传播过程的系统模式有助于消除翻译与传播相分离的误解,充分展示翻译与传播相融合的本质性特征,为翻译过程研究打开新思路,也可以为作品的重译研究带来新启示。

四、社会模式:揭示翻译传播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

对上述三种模式的探讨是基于翻译传播系统内部环节和要素的考察,翻译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并非在真空中进行,而是受到诸如意识形态、行政管理、社会舆论、民众心理、市场规则等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社会因素是翻译传播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把翻译传播置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即置于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交网络活动的相互作用中去分析和研究,才能在现实中把握其发展与变化。反之,翻译传播的过程和效果也会对社会产生反作用。翻译传播过程的社会模式就是用来考察各种社会因素在翻译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翻译传播的过程和效果对社会的反作用(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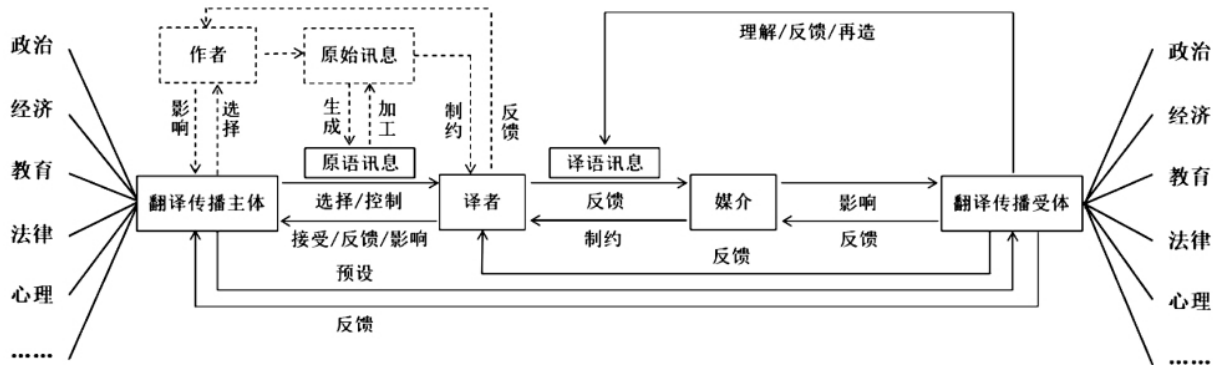


图 1 翻译传播过程的社会模式

(一) 社会因素对翻译传播的影响

社会因素可以对翻译传播的整个过程产生影响,也可以影响其中的某一个(些)环节,具体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首先,影响主体的决策。翻译传播主体是活动的发起者,是决定总过程的把关

^①Mo Di, *Mo Tzu: Basic Writings*, trans. Burton Wat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7.

人。其在决定是否发起一个翻译传播活动,尤其是在选择讯息时,必然会考虑以下问题:传播行为本身能否被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所接受?是否符合政府的相关管理规定?讯息是否符合译语社会舆论和受体心理的期待?怎样做才能符合市场规则?因此,社会因素对翻译传播主体决策的影响体现得最为明显。其次,影响译者的翻译。译者是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做出的选择决定翻译效果,要考虑原语和译语文化差异和译语受体的心理期待。根据埃文-佐哈(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如果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系统中的地位较高,译者就会倾向于选择异化策略,更多地保留原作的文化特征;如果翻译文学在目的语文学系统中处于弱势地位,译者则会倾向于选择归化策略,使译文更符合译语受体的语言和文化习惯^①。这些可视为翻译的外部因素对译者翻译传播活动产生的影响。再次,影响讯息的翻译传播方式。社会因素对翻译传播方式的影响体现在媒介上。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特别是自媒体、新媒体、融媒体出现,各种形态的媒介都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报刊社、出版社、广播电视台、网络平台等都属于大众传媒,其翻译传播活动受国家相关法规制度的约束。同时,不同媒介也会针对不同的受体采取不同的翻译传播方式。最后,影响讯息的翻译传播效果。翻译传播效果主要通过受体反馈来决定,因此社会因素对翻译传播效果的影响就体现在对受体的影响上。意识形态、社会舆论及群众心理等因素对塑造受体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受体对讯息的接受和反馈。

以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为例,在梁启超的号召和带动下掀起的翻译欧美政治小说热潮,与当时中国人民寻求“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梁启超敏锐地觉察到译介西方政治小说对启迪民智、改造社会的作用和意义。他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极力宣传欧美政治小说的社会功能,创办报刊,并身体力行进行翻译实践,使翻译政治小说成为晚清翻译的热点。其本意虽然是利用小说达到政治变革的目的,但客观上提高了小说翻译的价值,同时也提高了小说的文学地位^②。在此过程中,社会因素对翻译传播的影响可见一斑。梁启超作为传播主体在选择译介西方政治小说时,受到其富国强民思想的极大影响,其创办的报刊及发表的文章和译作,极大地推动了政治小说在中国的翻译传播。跟随其后的译者不仅获得报酬,还提升了社会地位,将翻译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在当时的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也带动了其他小说类型的引进翻译。该翻译热潮也被视为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开端的标志之一,在晚清特殊的历史背景催生下,中国翻译文学的大幕徐徐拉开。

(二) 翻译传播对社会的影响

翻译传播过程一方面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对社会产生反作用。翻译传播也同样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对原语社会和译语社会都会产生影响。翻译文学在东西方文化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也对自身的文学系统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现代的诗歌翻译传统是在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大量的西方诗歌被译成汉语白话自由体诗,呈现出反诗学的倾向,并在诗歌形式架构和思想内容上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使自由体诗在近百年的诗歌创作史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当代,中国网络文学通过翻译在海外网站流行,获得读者追捧,这种现象代表中国网络文学对海外读者的吸引力,引起了国内文学界的关注和研究^③。同时,国外读者通过阅读中国文学译作,加深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的了解,也有助于塑造读者心中的“中国形象”。微观上,翻译传播对译语的文学系统结构带来影响,丰富其文学形态;中观上,翻译传播影

^①Even-Zohar, Itamar,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in Lawrence Venuti, eds.,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192-197.

^②查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③刘阳:《中国网络文学对外传播的“在地化”建构:历史、现状和思辨》,《现代传播》2019年第5期。

响译语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领域;宏观上,翻译传播能够促进文化交流与文化遗产。

翻译传播过程的社会模式揭示翻译传播受到政府、舆论、民众心理、社会习俗等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揭示翻译传播对社会的反作用,给翻译传播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该模式为研究翻译传播活动与社会的相互影响提供了理论阐释空间和实践操作规范。历史上不同阶段的翻译传播活动都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运用历时研究可以分析不同阶段的翻译传播活动与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以探讨社会因素对某一具体翻译传播活动的影响以及该翻译传播活动带来的社会影响,进而发现存在的普遍规律,为翻译传播实践提供参考与借鉴。

五、结语

翻译传播过程的四种模式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逐步深入地形成了自成一体又相互联动的理论架构。线性模式是其他模式的基础,以高度抽象的形式呈现了翻译过程中的主要环节和基本要素,是翻译传播过程的基本模式。循环模式加入翻译受体的反馈,强调讯息的循环流动,是以受体为中心的模式。系统模式将翻译传播活动视为独立运行的系统,是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之间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模式强调翻译传播活动与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将翻译行为置于翻译传播的全过程,能够为翻译传播现象提供新的解释,有助于为翻译学与传播学中或模糊不清、或受到忽视的领域提供新的研究思路,进而形成翻译传播学的过程理论。

翻译传播过程的四种模式给研究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首先,中华文化“走出去”以跨语言的翻译传播为主,需借助翻译才能完成,因此必须遵循翻译传播的规律。其次,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效果取决于翻译传播全过程,并非取决于某一个环节,要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就要注重传播过程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充分互动。再次,中华文化“走出去”要注重图书、报刊、广播、电视及互联网等各种共时性翻译传播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还要注重历时性翻译传播活动的影响。最后,中华文化“走出去”需要研究其传播环境,尤其需要研究所面对的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传播障碍。唯有深入了解传播障碍的形成原因,才能找到突破传播障碍的策略,加快构建起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良好形象,中华文化才能更好地“走出去”“走进去”。

(责任编辑:王国宇)

图书翻译出版的五 R 评价^{*}

◎ 尹飞舟 谢清风

摘要: 五 R 指 Rendering (翻译)、Releasing (发行)、Reading (阅读)、Reviewing (评论)、Recreating (再造)。五 R 评价是图书翻译出版评价的新标准新体系。它基于传播链条、重在传播效果、强调实用性, 具有独特的理念和内在逻辑。它以译作为中心、以译者和读者为两端构建模型, 是包含多个层次多方面指标的评价体系。它利于翻译理论的发展, 促进翻译实践, 助推出版走出去, 具有创新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 图书翻译出版 评价指标体系 传播效果 翻译质量

中图分类号: I046

在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大背景下, 由于国家出版政策的引导与支持, 图书对外翻译出版迅猛增长。如何评价图书对外翻译出版的成效, 是社会的期望, 也是管理部门和出版单位的需要。同时, “有了完善的翻译评价机制, 翻译作品的质量才能有足够的保障, 翻译学成为学术之林中的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才有可能”^①。基于现实和理论的需要, 笔者提出图书翻译出版的五 R 评价, 试图既满足翻译出版实践的需要, 又助力管理水平的提升。

一、图书翻译出版评价的理念与内在逻辑

要建立良好的翻译评价机制, 就要认识翻译的属性。翻译与出版都具有传播的属性, 因此必须从传播过程来认识图书翻译出版评价的理念和逻辑。

1. 基于传播链条

基于传播链条指把图书翻译评价置于图书传播的过程中, 既对作为图书传播链条中的环节之一的图书翻译做出评价, 又以图书翻译环节为中心向下延伸, 将它摆在传播链条中予以判断, 评价其渠道和客户影响、读者影响、媒体影响、文化影响和社会影响等。基于传播链条不是对图书翻译作为传播环节的弱化, 而是在静态强化图书翻译在语言转换、文化传递、文本呈现等方面创造的价值的同时, 在动态的传播过程中发现这种价值的流动与扩散、增强和放大, 彰显这种价值的基础性、本源性和决定性。基于传播链条是对注重以翻译质量评价图书翻译的观点和做法的突破, 从理念上将传播学融入

图书翻译评价, 用传播理论指导图书翻译评价; 从方法论上将图书翻译评价纳入结构和系统中, 体现整体观和全程观; 从路径上是由对点的图书翻译评价延伸到线上、由静态图书翻译评价发展到动态过程考察、由局部的图书翻译评价拓展到整体评价。

2. 重在传播效果

重在传播效果指重视图书翻译给渠道、读者、媒体、社会等带来的效应以及产生的效益, 并把这种效应和效益作为图书翻译评价的重要标准。“而翻译, 作为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一, 也势必带有一定的目的性, 在合乎一定的自然或社会规律的前提下实现, 并产生一定的价值。但其真正的价值主体不是译者本人, 而是译作的读者。只有当译作受到社会对象也即读者认可了, 译作才产生了价值, 译者的劳动也才得以认可, 这时作为翻译活动的执行者的译者也只能从翻译这一实践活动中受益。也就是说, 译者在翻译行动之前就应该对翻译行动的各种选择(即各种可能译作)可能会产生的后果进行预见和权衡, 以使其译作能被社会读者所认可和接受, 由此实现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协调统一, 从而实现其翻译行动价值的最大化。”^②当译者的价值判断聚焦在翻译质量时, 他们笔下是没有或少有读者的, 他们不会充分意识到他们的翻译行为是传播的组成部分。强调图书翻译评价重在传播效果是将目光集聚到读者, 是以读者为中心的图书翻译出版观, 是以翻译图书对读者的影响总括翻译图书对传送渠道、媒体、文化和社会的整体影响。

^{*} 本文系 2017 年湖南省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出版沿‘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布局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 17WTA06)、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018 年重点课题项目“中国经典作品在全球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播与推广研究”(项目编号: 2018-14-1)阶段性成果。

3. 强调实用性

强调实用性指图书翻译评价的可操作性。这种可操作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图书翻译评价的理论容易理解，逻辑非常清晰。第二，图书翻译评价的指标设置有效、合理，和图书翻译充分匹配，能充分反映图书翻译的主要特性。第三，图书翻译评价的数据来源确定，评价数据能够获取并且可靠，数据分析处理简便可行。第四，图书翻译评价的过程可控，结果可信。在图书翻译出版过程中，“具体而言，主要利益相关者既包括译者、作者以及实现翻译信息接受目标的读者，也包括管理翻译及出版活动的出版机构及赞助方；次要利益相关者包括翻译评论家、翻译研究者、高等院校、译者培训机构、相关政策制定者等，也包括间接受到该过程影响的社区、社会公众、政府组织等”^③。着眼于翻译质量，则翻译评价的主体主要是译者本人，而在传播视野下评价图书翻译出版，强调图书翻译出版的社会性和目的性，实际上是看重图书翻译出版对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当这种价值既是可预测的也是可实现的，那么图书翻译出版的实用性就突显了。

二、五 R 评价的模型和指标

以传播过程理论为指导，对图书翻译出版的各个环节进行定性或者定量的分析，就可以形成完整的评价模型。

1. 五 R 评价界定

五 R 取自五个英语单词的第一个字母，这五个单词是 Rendering（翻译）、Releasing（发行）、Reading（阅读）、Reviewing（评论）、Recreating（再造）。从传播过程看，图书翻译对应内容，图书发行对应渠道，图书阅读对应读者，图书评论、文化再造对应效果。从传播效果看，图书评论和文化再造基于图书阅读，通过阅读得以实现，而图书阅读的结果和效果借助图书评论和文化再造得以表现和体现。从五 R 间的关系看，五 R 评价的基础是图书翻译，其重点是图书的传播效果，其关键是图书发行和阅读。

2. 五 R 评价模型

五 R 评价是对图书翻译价值高低的评定。从主体看，出版主体的角色是赞助人，是作用于图书翻译、图书发行、图书阅读、图书评论、文化再造及其组成的整

体的外在力量，同时接受这些组成部分的反作用；读者是图书翻译的受众，是对图书翻译过程和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评判者；译者是出版主体和读者之间的中介，是图书翻译的直接主体，理解和接受出版主体的要求并将这些要求融入图书翻译中，创造性地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从对象看，译作既是译者的产物，也是阅读的客体。因此，作为图书翻译价值的载体，译作是五 R 评价模型的中心；作为图书翻译价值最相关的两重主体，译者和读者是五 R 评价模型的两端。译者通过翻译活动产生译作，译作通过发行到达读者，读者通过阅读评判译作，翻译是译者和读者的对话，反馈是读者和译者的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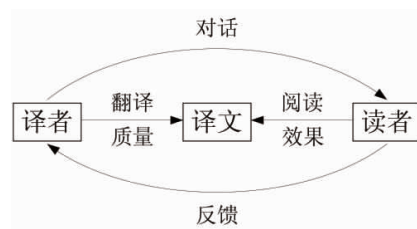


图1 5R评价模型

在五 R 评价模型中，图书翻译价值包含两大部分：翻译质量和阅读效果，阅读效果也是翻译的目的和最终效果。冯平将翻译评价分为翻译审美评价、翻译道德评价和翻译功利评价。翻译审美评价，即译者对原作和译作的审美能力，用正确的审美观、审美标准把握原作和译作。翻译道德评价是指译者的翻译职业道德，判断原作和译作，使译作忠实于原作又能被读者接受。翻译功利评价指译者迎合目标读者的需要，对译作进行的判断和选择。^④这种翻译评价确立了图书翻译的质量要求和标准，值得借鉴。这种评价涉及了读者需求，但是没有把它放在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的地位和价值层面予以特别强调和突出。五 R 评价模型在图书翻译质量评价成果的基础上，把翻译效果作为重要的价值评判标准予以强化，同时把这种评价从翻译过程中提出来，置于传播系统的各个环节中，便形成了新的图书翻译质量的评价方式。

3. 五 R 评价指标

五 R 评价模型以传播过程为内在逻辑，在传播效果上表现为依次上升。

第一个 R——Rendering（翻译），图书只是完成了

内容的语言转换，从传播学来说只是实现了译者自身的人内传播，第一个 R 的评价是依据译作对原作的忠实和译入语读者的接受程度。

第二个 R——Releasing（发行），翻译图书实现了发行，也就是进入了大众传播渠道，第二个 R 的监测就有实体书店以及电商的销售数据可以作为评价依据。

第三个 R——Reading（阅读），翻译图书实现了阅读，也就是被读者接受，进入第三个 R 表明图书真正产生了人际传播效果，其监测数据可以图书馆借阅记录和零售销售数据为依据。

第四个 R——Reviewing（评论），翻译图书获得了传播过程的“反馈”，也就是引起了社会的反响，进入第四个 R，表明图书的翻译出版获得了良好的效应，专业书评以及电商销售平台的社区留言可作考察的依据。

第五个 R——Recreating（再造），翻译图书在译入语地区获得了极高的接受度，成为译入语地区文化创新的元素，这是图书翻译出版的最佳效果，这可以由翻译图书被改编成新的形式产生了二次或多次传播来考察。

五 R 评价指标的确立原则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和包容性。科学性指五 R 评价指标具有理念基础、内在逻辑清晰，方法论得当。在理论上，它基于翻译学理论，引入传播学理论。在方法论上，它强调系统性、结构性、整体性，遵循评价的规律和规则，特别注重指标间的关联。客观性指五 R 评价指标尊重图书翻译的规律，与其本质和特性充分一致；符合国际传播的规律、逻辑和特点；指标的内涵、外延确定，界定明晰，数据测量方法准确。包容性指五 R 评价指标融合图书翻译和传播的各因素，既适应环境和时段的需要对特定的图书翻译价值予以评价，又可以根据环境和时段的变化进行相应的指标增减，是开放的体系。

五 R 评价指标的确立思路是根据图书翻译出版的特性，遵循翻译学和传播学的规律，将影响图书翻译质量和译作传播效果的种种因素，转化为可测指标，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形成部分分层次多指标的量化评价体系，实现结果的确定性和得分的可比较性，具体包括“软硬并举、双效并行”“主客结合、性量兼顾”“部分区别、层级差异”。“软硬并举、双效并行”指五 R 评价指标注重发行量、读者量所显示的硬实力和能力，也注重读者阅读程度、读者和媒体评价、影响文化和社会发展

等效果方面的软实力；注重影响读者、文化和社会的社会反响和社会效益，也注重指向经济效益的发行范围和数量。“主客结合、性量兼顾”指五 R 评价指标以客观因素为基础、以量化数据为基本，也基于实情确定具有主观性进行定性分析的标准。“部分区别、层级差异”指五 R 评价指标分为图书翻译质量和传播效果两部分，每一部分因为价值差异呈现出不同层次。

表 1 五 R 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定性	定量	综合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翻译质量	50%	审美性	20%			好/一般/差		
		道德感	20%			好/一般/差		
		读者意识	10%			好/一般/差		
传播效果	50%	发行	10%	区域（发行国家数）	5%			
				发行数量（册数）	5%			
		阅读	20%	收藏图书馆量和收藏数	5%			
				电商零售销量	15%			
		评价	10%	平台留言量和好评率	5%			
				媒体评论量和好评率	5%			
		再造	10%	再次或多次传播现象	5%			
				衍生产品量和现象	5%			

五 R 评价的一级指标图书翻译质量和传播效果各占 50%的权重。二级指标中的审美性、道德感、阅读各占 20%的权重，读者意识、发行、评价、再造各占 10%的权重。三级指标中的电商零售销量占 15%的权重，区域（发行国家数）、发行数量、收藏图书馆量和收藏数、平台留言量和好评率、媒体评论量和好评率、改编出版情况、衍生产品量和现象各占 5%的权重。

五 R 评价的指标中，翻译质量的评价属于定性评价，翻译效果的评价是定量评价基础上的定性分析，最终，将图书置于一定时段的一类书中进行综合分析后得出所处层次和所具有的价值。

三、五 R 评价的运用

图书翻译出版五 R 评价的直观性，使它在图书翻译出版项目的考核评价中能够广泛运用，同时通过对传播效果的强调，可以引导翻译质量的提升。

1. 五 R 评价是翻译传播学的组成部分

翻译学引入传播学理论已有较长历史。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Nida)将通讯论和信息论融入翻译研究,使翻译学和传播学走近。我国最早将传播学理论与翻译联系起来的学术文章是1991年发表在《固原师专学报》第1期的《试从信息论的观点看语际翻译的信息转换过程》,该文用香农(Shannon)的信息传递模式解释翻译中的信息传递过程。1997年,吕俊发表在《外国语》第2期的《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一文,首次在国内提出了翻译学传播理论,阐释了将翻译学纳入传播学范畴的理由。然而,翻译学和传播学始终没有真正融合,翻译学始终没有在既借力传播学又不失学科定位、特性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这当然涉及各方面的原因,但是,未能尊重翻译的实践特性,从传播学引入理论和方法,提高翻译的价值和地位,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翻译的实践性决定了它必须和时代的精神和要求结合,才可能彰显其价值、提升其地位,而翻译价值的充分实现必须借助传播,不但需要以传播的理论指导,而且需要在传播中体现。翻译传播学是融合翻译学和传播学并建立交叉学科的创新举措,是针对翻译学、传播学的特性,直面翻译学的问题而提出来的。五R评价以图书翻译为对象,是翻译传播学在特定领域的理论应用和实践深入,是翻译传播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2. 五R评价促进翻译实践

五R评价同时强调图书翻译质量和传播效果,以翻译质量保障翻译效果,以翻译效果达成翻译目的。20世纪80至90年代,在德国兴起“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该理论提出决定译者翻译策略的基础是翻译活动的各种功能。显然,在翻译目的的导引和拉动下,翻译实践的动力更足。五R评价从图书翻译质量拓展到翻译传播效果,将译者的视野从基于文本语言转换扩大到基于文化传播的更广空间,这在挑战译者素养和能力的同时,用更高的要求促使译者围绕原著和译作做更多调查研究等准备,从而提高译作质量和与读者、社会的匹配性。在翻译效果的追求过程中,译者有更多机会从后台走向前台,在读者、社会等认同和肯定中享受价值实现带来的成就感。

3. 五R评价助推图书对外翻译出版,提升国际传播效果

五R评价助推出版走出去首先表现在翻译上。翻

译是出版走出去的瓶颈,这主要表现在翻译人才不足、译者动力不足和译作对外传播性不强。五R评价提高图书翻译的价值获得感,可以吸引更多人才投身对外翻译,可以提高译者的积极性和投入程度,而图书翻译质量和传播效果的互推,既利于提升译作的国际传播特性,又利于译者充分参与到对外传播的活动中。其次,五R评价助推出版走出去体现在解决图书对外翻译出版的评价上。缺乏可操作性的评价工具是出版走出去的障碍。出版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许多力量都在参与,但是,绩效评价的不合理不但没有对他们起到促进作用,反而挫伤了部分参与者的积极性。五R评价可以让出版走出去的实践者真实地体会到图书翻译出版的成就和获得感,因为投入而收获了价值的实现感;可以让出版管理者得到衡量、评价图书走出去和走进来绩效的工具,从科学、合理的评价理念出发,以客观真实的数据给出令人信服的评价结果。

注释

- ①李英垣.论多元语境关照下的翻译评价体系建设[J].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81.
- ②何雪莲.翻译评价对学习者的翻译能力的驱动[J].浙江社会科学,2012(5):137.
- ③冯全功,张慧玉.论图书翻译出版中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与互动[J].中国出版,2017(6):40.
- ④冯平.评价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参考文献

- [1]刘燕南,刘双.国际传播效果评估指标体系构建:框架、方法与问题[J].现代传播,2018(8).
- [2]丁丁,张天培.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媒体传播效果评价体系[J].新闻战线,2017(10).
- [3]贾丽婷.PACTE翻译能力模式下翻译评价模型构建研究[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8(7).
- [4]陈潇.我国翻译传播理论研究现状探析[J].海外英语,2013(6).
- [5]罗红玲.“一带一路”图书海外传播效果分析——以亚马逊网站对外文化传播类图书为例[J].中国出版,2018(2).
- [6]邱均平,文庭孝,等.评价学理论·方法·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所)

4.2 其他核心论文

注重英语专业的人文性

——国家级教学团队“读议写”模块课程建设例析^{*}

湖南师范大学 邓颖玲

提要: 英语教育中应注重学生的人文教育和人文修养。本文以人文通识教育理念为指导,以湖南师范大学“英语听说读写基础课国家级教学团队”的建设为实例,通过多维度分析英语听说读写技能课程与学科基础课程的内在关系,从教学目标、课程设计、教学方法等方面探讨了新形势下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关键词: 人文教育、“读议写”模块课程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429(2013)03-0436-06

一、引言

“人文”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而又很难确切指陈的概念,它与人的价值、尊严、人格、个性、理想等密切相关。“人文教育是指通过授予受教育者以人文学科知识,使其在认识自我世界、认识和适应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能力和审美能力等方面得到发展”(杜时忠 1999:73)。按学理划分,英语当属于人文学科。王守仁(2001:42-43)认为:“英语是人文学科的一支,……英语学科的基本要素是英语语言、文学和文化”。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英语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到人文学科之外;英语教育越来越忽视其人文性内涵。“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外语专业注重人文教育的传统正在一步步丢失……各类人文课程被大幅度削减,课时大幅度压缩。……这种弱化人文教育的现象在全国各级各类教育中具有普遍性”(刘伟 1995:23)。近年来,忽视人文修养和人文关怀已引起

^{*} 本文为英语听说读写基础课国家级教学团队(教高函[2007]23号;负责人白解红)和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系统论的‘四位一体’英语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与实践”(JG2012B015)的阶段性成果。

教育界和学术界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著名华裔美国教授杨振宁和何炳棣在不同场合频频呼吁,希望我国教育界,尤其是高等教育界,重视人文学科和人文修养。何炳棣甚至认为,“忽略人文,中国势将付出极大的代价”(转引自张中载 2003: 455)。因此,“加强外语院校的人文教育和学生的人文修养,已是我们必须十分关注的当务之急”(张中载 2003: 455)。

二、英语专业的工具性和人文性

胡文仲教授(2008:1)将新中国的英语专业教学分为两个阶段,即二十世纪 50 至 70 年代以培养英语听、说、写、读、译技能为目标的教学阶段和 80 至 90 年代以培养英语能力+某种专业知识为目标的复合型人才教学阶段。

1. 以技能训练为中心的英语教育

一谈到英语,人们很容易把它看作是一种工具,首先想到的是它的工具性和实用性,而不是它的学科性。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00 年 3 月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中,体现英语工具理念的“英语专业技能课”和“相关专业知识课”占到了英语专业本科阶段课程的 82%。一、二年级基础阶段的主干课程是语音、精读、泛读、语法、阅读、听力、口语、写作等。课程设置完全以语言技能训练为核心,着重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译能力。高年级阶段的必修课包括高级英语、阅读、写作、翻译等,再加上少量的文学、文化类课程,依然属于语言训练,真正可以称之为专业课程的不多。英语专业的不少学生学了四年英语,听、说、读、写的能力确实有了很大提高,但与文科其他专业如中文、法律、经济专业的毕业生相比,在思想的深度、知识的结构、思辨和创新能力方面都出现了差距。这一问题的出现与英语专业以听、说、读、写技能训练为中心内容的课程设置不无关系。

中国的英语专业教育,语言技能训练不能放松。但过分强调听、说、读、写技能训练也有一定的负面作用。韩宝成、刘润清(2008: 153)指出,英语教育不能只停留在语言技能训练的层面上。英语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其目的应该是学生通过英语来学习文化,认识世界,培养心智,为终身发展打下基础。

2. 以职业为导向的复合型英语教育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大量外资和合资企业纷纷建立,社会和用人单位对外语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将外语作为一门工具、只懂语言但缺乏专业知识的英语人才已不大适应社会需要。新形势下国家对外语人才的培养重新进行了设计。2000 年教育部批准实施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对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做了明确规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培养具有扎实

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 2000:1)。《大纲》首次将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予以确认。从此,外语教育的课程设计从以培养单纯的语言技能为主要目标转变为以培养语言技能加专业知识为主要目标,即培养英语复合型人才,出现了“英语+语言文学、英语+国际经贸、英语+外交、英语+法律、英语+新闻”等培养模式,其语言教育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可见一斑。

“复合型人才”教育方式的提出,使外语教育顺应了社会需求,对培养社会急需人才、优化高校的学科分布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有利于调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缓解毕业生心理上的就业压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复合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一些院系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就业难题,盲目推行“复合型人才”培养,开设过多的相关专业课程,忽略了对学生外语实践能力和人文综合素质的培养。胡文仲、孙有中(2006:246)明确指出,“英语专业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理应遵循人文通识教育的基本办学理念,超越过于职业化取向和着眼于短期办学效益的‘复合型’培养模式”。

3. 英语专业的人文性

人文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必要构成,占有基础性地位。早在 1998 年,教育部就颁布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修养和科学素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1998:2)。

除语言技能训练外,英语专业内容应在大文科中与历史、哲学、艺术、宗教等相关专业部分交叉互补。作为人文学科的英语专业学生,不仅要操练好用外语的“五会”技能,还必须具有渊博的专业知识和人文知识,具有融汇中西、跨越中外人文视野的思辨能力。此外,英语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形态,负载着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和人文精神。从根本上说,学习英语就是让学生感受英语国家民族先贤智者的思想和智慧,领悟他们的情操并从中汲取养分,以塑造个人的品格。秦秀白指出,“没有人文就没有语言这个工具,抛弃人文也无法掌握语言这个工具”(转引自庄智象 2009:89)。从这个意义上说,英语教育的重要本质特征就是它的人文性。

三、人文主义的全人教育观与读议写课程建设

人文主义思想对我国当前的素质教育、课程改革以及教育评价等都具有重

要的启示。英语专业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理应遵循人文通识教育的基本办学理念,超越过于职业化取向和着眼于语言技能训练的人才培养模式。本着这个理念,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英语听说读写基础课国家级教学团队”的建设与实践中,以人文通识教育理念为指导,从教学目标、课程设计、教学方法等方面对构建新的英语人才模式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实践。

1. “全人”教育观与课程群建构

对于高度体制化的高校教育而言,课程设置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基本途径和保证,对于学生的素质培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7年,湖南师范大学“英语听说读写基础课教学团队”获国家“质量工程”项目立项。该团队遵循“人文通识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按照“人文教育、英语学科特点与教师教育相融合,知识、能力、素质相协调”的人才培养思路,实施了技能课程知识化、知识课程技能化的教学改革实验。首先,我们对传统的课程设置进行了改革,将基础阶段的纯技能训练课程,包括听力、口语、综合英语等课程进行压缩,取消了高年级开设的高级英语课,将课时和学分用来开设人文性通识课程。其次,我们根据输出驱动假设理论,将原来分开开设的阅读和写作课进行合并。原来的阅读和写作课过于注重语言技能训练,课程内容缺乏思想的深度和知识的广度。通过合理配置各种教学资源,建构了一系列适合学生综合发展、用英语讲授的具有兼容性的“读议写”人文通识模块课程体系(表1)。

表1. “读议写”人文通识模块课程体系

1. 读议写(一)	英语技能导学与学习策略
2. 读议写(二)	网络与报刊阅读
3. 读议写(三)	古希腊罗马神话
4. 读议写(四)	《圣经》
5. 读议写(五)	英美历史与文化
6. 读议写(六)	中国文化经典导读
7. 读议写(七)	西方哲学经典导读
8. 读议写(八)	批判性思维

该课程群涵盖广阔的文、史、哲领域,是一个多学科的课程组合,与历史、文学、语言、哲学等相关专业部分交叉互补。它将单一的技能型课程转变为融技能发展与人文教育、思维能力培养于一体的综合性课程。它强调研读原典,并基于这些原典提出原创性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人文科学的学习和研究并不在于它们的实用价值和专业性,其中心目的是为了训练学生的智力,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的原创能力和探索知识的能力。正

如柏拉图所说:“天文学和地理学一样,并非旨在研究天空或地球的实际状况,而是我们用它们来解决社会及道德问题,获得真正的科学知识和训练感官的理性思维能力”(Monroe 1914:137)。“读议写”模块课程有效增强和拓宽了英语专业学生的中西文化底蕴,完善了他们的知识构架,提高了学生运用英语进行双向文化交流的能力。

2. 以学生为主体的体验教学模式

一提起人文教育,国内高校普遍首先想到的是加开文、史、哲等课程,简单地寄希望于以人文课程的增加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但人文主义教育观的教育目的远远超越了单纯的知识传授和智力培养,而将其上升到集知识、能力、人格于一体的全面均衡发展的高度。如果不改革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只注重人文知识的机械传授,而忽视学生主体自身的人文意义建构,人文教育终将成为一句空话。基于人文主义全人教育理念,“读议写”模块课程建立了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体验教学模式,将“议”和“写”重要环节引入教学结构中。

体验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课堂上亲身感知、领悟知识,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从而使学生成为真正自由独立、情知合一、实践创新的完整的人。Kolb(1984)较早提出体验式学习理论,认为有效的学习应从体验开始,进而发表看法,然后进行反思,再总结形成理论,最后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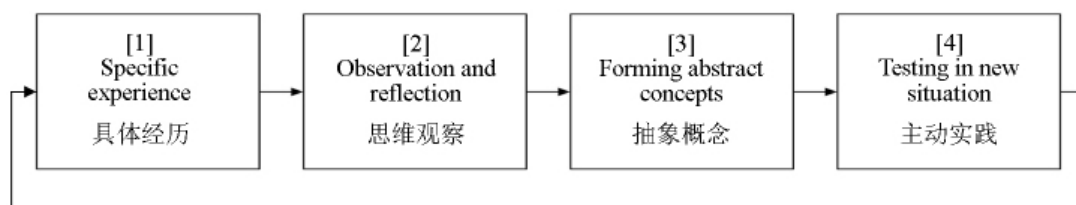


图 1. 体验式学习过程(Kolb 1984:42)

他认为这种强调“做中学”的体验式学习,能够将学习者掌握的知识、潜能真正发挥出来,使语言学习的过程转变成一种创造运用语言的体验过程,成为一种栩栩如生的互动体验,是提高学习效率的有效学习模式。我们倡导的“读”、“议”、“写”三结合模式与体验教学的精神实质是吻合的。

“读议写”课程教学在实施的过程中,强调读写结合,聚焦于写作过程;强调阅读、写作过程与学习者认知发展的相互作用。教师在围绕主题布置、指导学生进行大量的课外阅读以保证足够的输入后,在课堂上运用情境式、换位式、多媒体法、实践法等体验教学方式精心组织、安排教学活动,组织学生开展合作、思考、讨论,并积极主动地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使学生在“议”的过程中体验事实、体验问题、体验过程、体验合作,真正感受到知识与思想的萌生、形成和交流的过

程。当学生通过最大程度的主体活动对研究的主题内容有了较为丰富的感性认识之后,再以“写”的形式内化相应的人文知识,建构基于主体自身理解的人文意义,将课堂上的体验表达出来。这种教学模式使学生通过教师精心组织安排的活动,参与到教学之中,主动与教师一起进行教学活动,使学生自始至终参与到知识形成的全过程中,让学生自己去尝试、讨论、合作,自己去领受、理解知识。在这样的教学模式里,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的作用在于成为学生学习英语的组织者、引导者和合作者。体验教学模式使英语学习既有利于学生打好英语基础,又有利于学生形成健全人格,更有利于学生去探索、创新。

四、结语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英语这门学科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重视。湖南师范大学“读议写”模块课程的建设本着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尝试从传统的纯技能训练课向学科基础课转型,在技能训练中融入人文专业学习,在人文知识课程的教学融入英语听、说、读、写、译的训练,力图将人文教育与语言训练相结合。这一尝试迎合了当今中国素质教育的要求,我们将继续探索、实践和论证。

参考文献

- Kolb, D. 1984. *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M].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 Monroe, P. 1914. *A Text Book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M]. New York: Macmillan.
- 杜时忠,1999,《人文教育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2000,《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韩宝成、刘润清,2008,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育回眸与思考(一)——政策与目的[J],《外语教学与研究》(2):150-156。
- 胡文仲,2008,序言[A]。载孙有中(编),《英语教育与人文通识教育》[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2。
- 胡文仲、孙有中,2006,突出学科特点,加强人文教育——试论当前英语专业教学改革[J],《外语教学与研究》(5):243-247。
- 刘伟,1995,关于外语院校培养目标转型的几点思考[J],《外语教学》(4):18-23。
- 王守仁,2001,加强本科英语专业“学科”的建设[J],《外语与外语教学》(2):42-43。
- 张中载,2003,外语教育中的功用主义和人文主义[J],《外语教学与研究》(6):453-457。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1998,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Z]。教育部高教司[1998]2号。
- 庄智象(编),2009,《中国外语教育发展战略论坛》[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收稿日期:2012—06—27;本刊修订,2013—03—20

通讯地址:410081 湖南省长沙市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论小说节奏的叙事功能*

邓颖玲¹ 蒋翊遐²

(1.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2. 甘肃联合大学外语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摘 要:小说节奏是指小说艺术各要素有秩序、可衡量、有一定节律的交替变化过程,反映小说人物、事件、场面等整体向前运动变化的速度。小说节奏在小说创作中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叙事要素,发挥着自己的功能性作用。本文主要从调节情感运动、控制情节发展、揭示小说主题三方面探讨了小说节奏的叙事功能,并指出:节奏作为小说审美生命的体现,不但是小说形式美的重要因素,而且能使小说的叙事话语带上不同的审美意味和情绪色彩,从而真实、深刻、形象地表现生活的内蕴和思想主题。

关键词:小说节奏;叙事功能;审美意蕴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038(2012)01-0091-04

1. 引言

节奏,最初是作为音乐元素出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1989:314)如此解释节奏“乐音时值的有组织的顺序,是时值各要素——节拍、重音、休止等相互关系的结合。强弱、快慢、松紧是节奏的决定因素。其作用是把乐音组织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以体现某种乐思”。可见,节奏的本初意义是指乐音以不同速度、长度和强度运行的现象。随着适用范围的扩大,节奏渐渐演变成一种形容事物运行轻重、缓急、行止交替的泛化概念,在音乐、美术、建筑、文学等各个领域受到广泛关注。朱光潜(1982:110)认为“节奏是一切艺术的灵魂”;林语堂(1947/2000:266)亦持此论,认为“艺术上所有的问题,都是节奏的问题,不管是绘画、雕刻、音乐,只要美是运动,每种艺术形式就有隐含的节奏”。在小说创作中,节奏的存在同样不容置疑。清代刘大槐(1959:5)就认为“文章最要节奏,譬之管弦繁奏中,必有希声窃渺处”。小说创作者对叙述内容的安排同样反映了人们所感知到的事物和情感的自然律动,体现了小说家的叙事意图。小说节奏在小说创作中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叙事要素发挥着自己的功能性作用。

2. 小说的节奏

提起节奏,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诗歌,而不大会想到小说,甚至以为小说没有节奏。这是因为我们一般理解的节奏主要是指文字音节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和高低起伏的变化。这种由语音的有规则的出现造成的节奏感在叙事文中确实不占显著位置。小说主要以“讲故事”为主,不太讲究声音韵律,纵有节奏,也常被意义掩盖,不易为人们觉察。但不可否认,小说中同样存在某种节奏,如海明威的快捷、托尔斯泰的舒缓、康拉德的凝重、奥斯丁的流畅等。我们常说的故事有起有伏,有张有弛,就是一种节奏。优秀的小说总是具有快慢、缓急等错综变化的节奏美感。

小说节奏指的是小说艺术生命的自然律动,它体现了小

说艺术各要素有秩序、可衡量、有一定节律的交替变化过程,是小说人物、事件、场面等整体向前运动变化的速度。小说的节奏使小说情节发展呈现出波澜起伏的运动状态,它不仅存在于矛盾冲突、小说结构、小说语言以及小说人物的情感的发展过程中,而且也存在于小说家具有共时性特征的主观意象中。苏珊·朗格言简意赅的说法启示我们,小说节奏的本质是指“一系列相同事件以相当短的、一定的时间间隔的连续推进”(Langer,1957:50)。这个定义暗含着,节奏就是对时间有规律的切割。与诗歌中的语言节奏相比,小说的节奏更多的是通过叙述时间与自然时间的对照表现出来。在《论节奏》一文中,郭沫若(1979:231)如是论道“凡要构成节奏总离不了两个很重要的关系。这是甚么呢?一个是时间的关系,一个是力的关系”。很显然,在节奏的形成过程中,时间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现代叙事学理论以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的比作为标准,对小说的叙述运动节奏进行了测定。叙事学把叙事作品划分为三个层面:故事、叙述和叙事。故事是叙事内容,叙述的对象;叙述是故事讲述的行为本身,即讲故事的过程,叙事即叙事话语或称文本,是故事的语言载体。从这个角度透视小说,小说存在三种节奏,即故事节奏、叙述节奏和文本节奏。故事节奏存在于故事层面,是故事本身一波三折、起伏跌宕的变化;叙述节奏存在于叙述层面,是叙述运动自身起承转合、抑扬顿挫而又错落有致的运动曲线性;文本节奏存在于叙事层面,是指叙事话语的节奏性。由于语言是故事的载体、叙述的依托,是叙事话语的物质形式,所以小说的节奏实际是通过小说叙述语言的轻重缓急来体现的。本文旨在论述小说节奏的叙事功能,因此,主要从叙述和文本层面来探讨小说的节奏。

20世纪20年代,帕西·卢伯克的《小说技巧》和爱·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最早关注到小说节奏问题。福斯特以音乐节奏作类比,认为在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中反复

*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二十世纪英国小说的空间诗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A752007)和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二十世纪英美小说的空间诗学研究”(项目编号:09YBB27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邓颖玲,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叙事学研究;蒋翊遐,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叙事学研究

出现的音乐短句就是小说的节奏。卢伯克从“场景”与“间接的叙述”的对比切入来谈,主张慢吞吞的场景描写应该与加速描写的概述交替配合使用,相得益彰,节奏感就在两种叙述运动的运用中得以传达。法国小说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广泛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集大成式地分析了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关系。他将小说时间处理方式分为“概要”、“停顿”、“省略”、“场景”四种,认为四者的交替运用就是小说节奏的主宰方式(Genette,1980: 86 - 112)。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相等或基本相等的叙述称为“场景”,以此为基点,向两端延伸。叙述时间短于故事时间为“概要”;叙述时间为零,故事时间无穷大的是“省略”;叙述时间无穷大,故事时间为零则是“停顿”。在热奈特笔下,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之间的“非等时”现象存在与否,是小说有没有节奏效果的决定性因素。无论是概要、场景,还是停顿、省略,它们在时间上的跨度对叙事结构中的节奏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最极端的例子是《追忆似水年华》一文,话语的节奏有时慢到以190页的篇幅描述三个小时内发生的事情,有时却快到仅仅用三行文字就概括了12年的故事(Genette,1980: 92)。至于何者用快节奏表现,何者用慢节奏表现,实际上关系到作品主题和作者的价值取向。

3. 小说节奏的叙事功能

任何一种叙事策略都指向一定的叙事功能,小说节奏的处理也莫过于此。小说的节奏不但是小说形式美的重要因素,而且能使小说的叙事话语带上不同的艺术效果和审美价值,对于塑造人物的心理形象,编织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创造别具匠心的艺术结构,渲染浓厚的氛围和传达复杂深刻的感情及思想内涵等,均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3.1 情感运动的调节器

为了保证自己创作意图的充分实现,小说家赋予了节奏以尽可能多的叙事功能,其中之一就是通过调整小说节奏运行的速度快慢和收放张力大小,控制小说的情感运动,使小说叙述语言的节奏与人的内在情感节奏、与生活生命的节奏相契合,真实深刻地表现生活的内在蕴涵和人的情感世界。

情感运动的节奏,是指情感活动起伏交替、强弱张弛的转折变化等,它是语言节奏审美层次的核心。朱光潜(2004: 98)曾说,“节奏是传达情绪的最直接而且最有力的媒介,因为它本身就是情绪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谈美书简》中也谈到,“节奏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也是生理和心理的统一,它是内心活动的传达媒介,艺术家把应表现的情感和情趣表现在音调和节奏里,听众就从这音调和节奏里体验或感染到那种思想和情趣,从而引起同情共鸣”(朱光潜,1980: 79)。任何小说家在创作小说时都会在情感的驱动下,通过主体意识活动,把自己的情感、性格、生命、能力等主观因素外射、移注到作品里,使原本没有生命、没有情感的文字变成有生命、有情感的载体,从而达到一种物我交融、物我同一的境界。所谓“文章不是无情物”、“情者文之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英国批评家威尔斯就认为,“几乎所有经过时间考验、跻身于公认的伟大作品之列的小说,不仅都浸透了作者的人格,而

且还包含着从作者内心迸发出来的、毫无掩饰的思想和情感”(殷企平等,2001: 135)。情感的表达既可直抒胸臆,在直接的叙述、描写和议论中表达出来,也可以间接抒情,通过叙事策略和叙事技巧的运用传达出来。

《雨中猫》是海明威系列以婚姻和两性关系为主题的著名短篇小说,它以其极富海明威特色的简洁语言、精巧的情节、模糊却又深远的象征意义等广受研究者的关注。小说故事情节极其简单:一对美国夫妇投宿在意大利的一家旅馆,适逢下雨,无处可去。丈夫乔治躺在床上看书;年轻的妻子眺望窗外,看见雨中一只猫后,心生怜悯,决定下楼去把猫抱上来。可是到了楼下,那只猫不见了,她快快而归。旅馆老板见她爱猫,就派侍女送来一只猫。乍一看,这篇小说故事情节简单,平淡无奇。但海明威通过独特的节奏处理艺术,将女主人公在异化了的婚姻中的内心感受和渴望揭示得生动形象,有血有肉。在女主人公下楼寻猫路过旅店老板时,小说这样描写道“这个太太喜欢他。她喜欢他听到任何怨言时那种非常认真的态度。她喜欢他那庄严的态度。她喜欢他愿意为她效劳的态度。她喜欢他觉得自己是个旅馆老板的态度。她喜欢他那张上了年纪而迟钝的脸和那一双大手”(海明威,1993: 190)。短短的段落里句子骤然变得短而促,节奏如鼓点般密集。这与小说开头行云流水般舒缓的景物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六个简单句中连续出现六个“liked”,简练精悍,情感凝重,传达出作家丰富的情感和强烈的心理体验。六个“喜欢”表示出女主人公对旅店老板的爱慕,将女主人公见到旅店老板时那种奇特又强烈的内心感受完全展示出来。小说的快节奏应和了此刻女主人公剧烈的心理变化和期待,将女主人公见到旅店老板时的砰然心动模仿得惟妙惟肖,仿佛让读者听到了这位妻子内心的自然律动。当女主人公出去寻找那只猫但无功而返以后,想出了许多改变现状的方式:改变发型;要一只猫坐在膝盖上;用自己的银器来吃饭;要几件新衣服……,但都没有得到丈夫的回应。最后她说“总之,我要一只猫”,“我要一只猫,我现在要一只猫。要是我不能有长头发,也不能有任何有趣的东西,我总可以有只猫吧”(海明威,1993: 192)。这一段只有三十一一个单词,却有六个句子,大多为四个词构成一个句子。句子被裁剪得不能再短,形成音乐中的短节拍。高频率的重复(“我要一只猫”)将小说语言的节奏推到极速。这种快速、跳跃式的节奏将妻子对冷酷、麻木、没有热情、没有冲动的丈夫的愤怒之情以及她由于无力改变现实状况所产生的绝望至极的心理状态跃然表现于纸上。不断重复所产生的强烈节奏模拟了女主人公内心的呐喊,她需要关爱与呵护,渴望一种人际间的交流和沟通,一种夫妻之间的默契。这种快节奏无疑对读者心灵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力。

3.2 情节发展的控制器

节奏在小说中的作用,除了情绪上的强弱调控之外,在情节发展的疾徐和时间进程的长短上,也起着控制作用,正如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所说,“节奏是戏剧的‘指令形式’,它形成于剧作家最初的‘布局’概念,并对戏剧主要部分的划分起支配作用。节奏决定着戏剧表演风格的轻松与

沉重,决定着最崇高与最凶暴戏剧行为的强度,决定着人物数量的多寡与人物发展的程度”(Langer,1953:356)。小说节奏是作家在构造故事情节时的一种律动,体现着作家在表达意义时所采取的一种态度和方法。

任何优秀的小说,光有精彩的情节内容和深沉的思想内涵并不够,它还需要有一种张弛相间的节奏表达机制,以控制小说情节发展的方向和力度。那么,小说节奏是怎么控制情节的发展的呢?阿伯拉姆在给情节下定义时指出,“戏剧作品或叙述作品的情节是作品的事情发展变化的结构。对这些事情的安排和处理是为了获得某种特定的感情和艺术效果”(阿伯拉姆,1987:256)。这个定义虽然简单却道出了要点:情节就是为了表现和达到“特定的感情和艺术效果”而对故事事件的重新“安排和处理”。它是叙事主体为了表达某种叙事意图,对素材进行选择和组织直接产物。情节作为对故事的艺术加工,是对故事本身的重构。它既可压缩和扩展故事,强调故事的某一方面、忽略故事另一些方面,也可对故事进行删减和调整。情节节奏决定于小说描写的各种矛盾。矛盾产生或激化,节奏必然紧促;矛盾缓和或解决,节奏趋于缓和。

《诺斯托罗莫》是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的一部长篇社会小说。它以史诗般恢弘的场面、独特新颖的创作手法和丰富的思想内涵成为20世纪的经典之作。康拉德在《诺斯托罗莫》中就采用了起伏有致、动静结合、张弛兼济的审美节奏。作者并未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叙述故事,把诺斯托罗莫冒险护银和将银子占为私有的过程——道来,而是采用多种多样的手段将故事“重组”,通过疏密有致的情节处理,将自己大部分的个人经验和审美观念溶进小说,引导读者对这部小说作全方位、深层次的立体解读。《诺斯特罗莫》第一章是全书场面叙述规模最大、节奏推进最慢者。一开篇,作者就以几乎是“场景”的慢速度对柯斯塔瓜纳共和国进行了全景式的纯粹的描述。近五页的文本时间全部用来描写萨拉科城和它的历史,人物描写和事件的发生在书的开篇不存在。整个章节看不到叙述的进程和事件的推进,从而造成了叙述的静态、静止效果。但如果把它当作小说整体情节的一部分来看,读者会发现第一章慢速度的大量信息呈现内容都与后面的主要行动相关,实际上是整个故事的提前呈现,是整部小说情节的一个微缩和概貌。正如雅各布·洛斯在评论这部小说的情节时所说“尽管小说中有很多重要人物,但真正的主角是历史悠久和动荡多变的萨拉科城”(Lothe,1989:177)。在开篇宏观、平稳、细腻、慢板描述之后,康拉德立即以紧凑的叙事节奏描述了在海关大楼附近发生的最激烈的暴乱。“门外阵阵喧哗此起彼落,仿佛平原上的狂风围绕着这幢门窗紧闭的房屋呼啸盘旋;时断时续的枪声逐渐压倒沸腾的人声”(康拉德,2001:14)。和小说开头的慢节奏、徐徐推进的静态描述相比,小说这时的故事变得动态而异常迅疾,节奏骤然变得紧凑而密集,在宏观上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动静交替式节奏。在整个故事情节的安排上,作者以展示里比厄拉政府溃败的场面开始,再从中间返回到事件开始时的权力之争,然后才是建立里比厄拉政权所付出

的努力以及人们对它的期待。整个情节安排呈一种螺旋式的循环状态,有点有面、有疏有密、变化有致,读来颇有节奏感。这种结构可以避免读者线性地看待历史的发展。它要求读者关注于事件本身,在一系列流动变换的事件中去发现、体验和感悟小说中所揭示的超越时空的历史观(邓颖玲,2005a:77)。节奏在这里决定着小说各个部分以整体形态向前推进的速度,也决定着每一个叙事环节的处理和情节的叙事走向,它成了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

3.3 小说主旨的解码器

小说节奏不但具有表现功能,而且具有修辞和叙事功能,是作者表达主题的重要手段。美国作家利昂·塞米利安就认为,小说的节奏不但可以“赋予作品以简洁精练的美感”,“赋予小说以深度和强度,使作品生动多姿,跌宕起伏,富于变化”,而且还能够“披露作品中的深层意蕴,揭示寓于故事情节中的人生哲理”(塞米利安,1987:19)。

从叙事的角度上看,小说节奏速度由一定长度文字中所包含的被叙述故事信息总量的大小来衡量。同一文字长度的叙述段落所包含的故事时间总量越大,小说节奏的运行速度越快;反之,单位文字内所含时间量越小,小说节奏的运行速度就越慢。快节奏叙述很多时候起着背景介绍、叙述焦点转换、展开和推进故事以及交待人物最终结局的言说功能;慢节奏叙述因单位长度文字中的信息容量增大,具有刻画人物、结集矛盾冲突、推动情节发展的叙事效果。依据注意力分配的一般规律,快节奏叙事多与作者认定的价值意义较弱的时刻重合,而慢节奏呈现往往是意义重大的时刻。由此可见,不同的节奏表达方式表现出不同的人物事件在作者心目中的价值地位。何者用快节奏表现,何者用慢节奏表现,实际上关系到作品主题和作者的价值取向。

《间谍》是康拉德小说创作后期的一部政治小说,也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幽默、最具反讽意义的小说。英国批评家利维斯称它为康拉德“给英语小说增添的两部无懈可击的一流经典之一”(Leavis,1979:220)。小说以1894年2月15日在伦敦格林威治公园发生的一起真实爆炸案为背景,描述了一个关于外交阴谋和无政府主义奸诈行为的故事”(奥伯雷,1927:38)。在小说最具震撼力的第十一章中,康拉德以贴近生活原生态的节奏速度描写了维尔洛克太太刺杀她丈夫时的情景:

他仰卧在沙发上,双眼盯住天花板。天花板上和墙上他都看到一只胳膊的影子越来越近,手的影子里还紧紧攥着一把切肉刀。那影子上下缓慢地闪动,闪动得那样缓慢,使维尔洛克先生看得清楚那是一把刀,而且一个人正用手握着它(康拉德,2002:235)。

挂钟字盘上所表明的时间是差十分九点。维尔洛克太太不去注意什么时间了,钟摆却还在滴嗒滴嗒地响个不停。她断定这不可能是钟摆声,于是转动阴沉的目光向四壁扫视。她心神不定,眼睛也模糊不清,看不到什么。只好竖起耳朵谛听,弄清楚到底这钟摆声来自何处。滴、滴、滴……!(康拉德,2002:237)

在这个场景中,“维尔洛被刺杀的缓慢速度显示出一种

极不规则的节奏”(Fincham & de Lange, 2001: 42)。作者讲述这段情节所花费的时间,与该情节实际发生所经历的时间大致相等,或者更长。“滴、滴、滴”的声音加上细节描写使得故事的发展进程慢得就像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时间一样。这个场景使人想到哈代的《远离喧嚣》中范妮·罗宾沿着卡斯特桥公路绝望地爬行五个小时的缓慢场景。这种精雕细镂般的场景描写似乎将人物的一举一动都进行了定格,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刺杀场景本身,而不是故事的发展进程。作者以一种非常形象化、足以给读者强烈印象的方式将温妮的内心怨恨和复仇以肢解的慢动作展现出来。

在《诺斯托罗莫》中,诺斯托罗莫和德考得驾驳船离开港湾的那个夜晚,被英国现代文论家利维斯誉为“文学里最为生动而具美感的描写之一”(Leavis, 1979: 192)。这一节故事时间仅有几个小时。比起小说覆盖的百年历史,它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但是康拉德却用了四十页的篇幅去描写这一场景:诺斯托罗莫仿佛置身于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漫无边际的寂寥,既无声又无光,犹如一副强力麻醉剂侵袭了他的感官。他甚至有时都弄不清自己是睡着了,还是醒着。宛若坠入梦乡的人,什么都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就连把手举到面前,也不见五指……若不是他仍然保留着思绪,简直与死亡无异”(康拉德, 2001: 200-201)。在这样一个时间仿佛停止的空间内,作者花大量的笔墨将记忆、意象、人物甚至细节一一呈现。这些细部呈现使小说情节进展得非常缓慢,时间仿佛被凝固起来。在这种静止的叙述中,节奏在行使它的叙事功能。它向读者揭示了这样一个主题:驳船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空间背景,而是诺斯托罗莫和马丁·德考得的炼狱;海湾之行不再是为萨拉科的财富找一个安全的栖身之地,而是诺斯托罗莫和马丁·德考得深入自我、征服自我的精神航行(邓颖玲, 2005b: 35)。在这个绝地熔炉里,诺斯托罗莫得以重生,终于认识到名声在身不由己的命运面前是何其微不足道;人类在默然的大自然面前又是多么渺小!

4. 结语

苏珊·朗格曾说“以我来看,艺术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人物和情境是如何形成的,而在于在它们之上剧作家赋予那种‘可感知的生命’的节奏”(Langer, 1953: 350)。可见节奏之于小说之重要。节奏作为小说审美生命的体现,无论是在调节情感、控制情节还是揭示主题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叙事功能。它不但是小说形式美的重要因素,而且能使小说的叙事话语带上不同的审美意味和情绪色彩,从而真实、深刻而形象地表现生活的内在蕴涵和思想主题。优秀的作品只有通过引入波澜起伏、往复回环的叙事节奏,使复杂的情节与简单纯情节有机组合,紧张激烈的事件与富有抒情色彩的事件彼此交融,快节奏与慢节奏交错相间,才会产生跌宕起伏、错落有致的审美意蕴。

参考文献:

[1] Fincham, G. & A. de Lange (eds.). 2001. *Conrad at the Millennium: Modernism, Postmodernism, Postcolonialism*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2] Genette, G. 1980. *Narrative Discourse*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3] Langer, S. 1953. *Feeling and Form* [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 [4] Langer, S. 1957. *Problems of Art: Ten Philosophical Lectures* [M]. New York: Scribner.
- [5] Leavis, F. 1979. *The Great Tradition* [M]. London: Chatto & Windus Ltd.
- [6] Lothe, J. 1989. *Conrad's Narrative Method*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7] 阿伯拉姆. 1987. 简明外国文学词典 [Z].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 [8] 邓颖玲. 2005a. 论“印象派”绘画技巧在《诺斯托罗莫》中的运用 [J]. 外国文学研究, 27(3): 75-80.
- [9] 邓颖玲. 2005b. 《诺斯托罗莫》的空间解读 [J]. 外国文学评论, 73(1): 31-38.
- [10] 郭沫若. 1979. 文艺论集·论节奏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1] 海明威. 1993. 陈良廷等译. 海明威文集: 短篇小说全集(上册)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12] 利昂·塞米利安. 1987. 现代小说美学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 [13] 林语堂. 1947/2000. 苏东坡传 [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 [14] 刘大槲. 1959. 论文偶记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5] 让·奥布雷. 1927. 约瑟夫·康拉德: 生平与书信(第二卷) [M]. 伦敦: 威廉·海曼出版公司.
- [16] 殷企平 高奋 董燕萍. 2001. 英国小说批评史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17] 约瑟夫·康拉德. 2001. 刘珠还译. 诺斯托罗莫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18] 约瑟夫·康拉德. 2002. 张健译. 间谍 [M].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
- [19]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音乐舞蹈学科编辑委员会. 1989. 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 [Z].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20] 朱光潜. 1980. 谈美书简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 [21] 朱光潜. 1982. 郝铭鉴主编.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2卷)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 [22] 朱光潜. 2004. 诗论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Abstract: The rhythm of novel refers to the orderly, measurable and rhythmic alternation and variation of novel's elements; it reveals the speed of the integral forward movement of characters, events and scenes in novel. The rhythm of novel has become an independent narrative element in the creation of novel and played indispensable narrative functions.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its narrative func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regulating emotional movement, controlling plot development and revealing the theme of the novel. The study reveals that as an embodiment of novel's aesthetic life, rhythm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beauty of novel, but also endows the narrative discourse with different aesthetic meanings as well as emotional colors. It can truly, deeply and vividly represent the inner implication and the theme of novel.

Key Words: the rhythm of novel; narrative functions; aesthetic significance

4.2.3 邓颖玲. 论石黑一雄《长日留痕》的回忆叙述策略, 外国文学研究, 2016 (4)

论石黑一雄《长日留痕》的回忆叙述策略

邓颖玲

内容摘要:《长日留痕》是当代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的代表作。小说以日记体形式,叙述了管家史蒂文斯在英国西部进行的六天旅行。回忆既是小说的叙述形式,也是作者结构情节的方式。史蒂文斯对往事的叙述体现了回忆的不可靠性、碎片化和选择性特点。回忆叙述在整个叙事中成为了小说不可或缺的主题,一方面凸显了所选择事件在史蒂文斯心中的地位,使读者看到他终于有勇气直面自己的内心世界、对肯特小姐的爱和对达林顿勋爵趋于客观的评价;另一方面也模糊了不同事件间的界限,使回忆中弥漫着沧桑的历史感,这也是作者石黑一雄本人站在客观角度上对历史进行的一种重新审视。

关键词: 石黑一雄;《长日留痕》;回忆叙述;不可靠性;碎片化;选择性

作者简介: 邓颖玲,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叙事学研究。

Title: On the Remembering Narration Strategy in Kazuo Ishiguro's *The Remains of the Day*

Abstract: *The Remains of the Day*, the representative novel of the contemporary Japanese British writer Kazuo Ishiguro, records Stevens' six-day trip into the west of England in the form of diary. Remembering narration,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whole narrative, is the way in which the novel's narration goes and the way the author structures the plot. Stevens' narration of the past events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reliability, fragmentization, and selectivity of remembering narration, through which, on the one hand, readers see the weight of the selected events in Stevens's mind, Stevens's courage to face his inner world, his love for Miss Kenton, and his increasingly objective judgment on Lord Darlingt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boundaries of different events are blurred, thus giving remembrance a historical sense and providing Kazuo Ishiguro with an objective point of view to reexamine history.

Key words: Kazuo Ishiguro; *The Remains of the Day*; remembering narration strategy; unreliability; fragmentization; selectivity

Author: Deng Yingling is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Her research area i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narratology. Email: dengyingl@163.com

《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是当代著名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于1989年获英语文学里享有盛誉的“布克奖”。小说以日记体形式,叙述了管家史蒂文斯(Stevens)在英国西部进行的六天旅行。这六天的行程既是史蒂文斯的西部之旅,也是他的回忆之旅和心灵之旅。史蒂文斯一面享受难得的几日清

闲,记录着沿途见闻,一面回忆达林顿府邸(Darlington)在战前辉煌一时、战后没落易主的历史命运。回忆是《长日留痕》的主要叙述形式。主人公不仅是在回忆中追述自己的一生,也是在回忆中追寻自己存在的文化记忆、身份记忆,甚至是隐藏在背后的历史记忆。故事在史蒂文斯的回忆中不断绵延、迂回往复,使过去与现在不断交织渗透,完成了小说叙述形式与主题同步升华。

一、回忆的不可靠叙述

《长日留痕》的情节大致可分为两条线:一是史蒂文斯对其六天出游行程的记录;二是他对战前在达林顿府服务岁月的追忆,这部分占据了全书的主要篇幅。从整部小说来看,回忆既是小说的叙述形式,也是作者结构情节的主要方式。史蒂文斯对往事的叙述体现了回忆叙述的特点,即叙述的不可靠性。

不可靠叙述最早是由叙事理论家韦恩·布斯提出。在《小说修辞学》一书中,布斯对不可靠叙述进行了定义:“当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范式(即隐含作者的范式)保持一致时,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Booth 158-159)。很明显,布斯衡量叙述是否可靠的标准是作品的规范(norm),即作品中“人物、文体、语气、技巧等各种成分体现出来的作品的伦理、信念、情感、艺术等各方面的标准”(Booth 73-74)。若叙述者的叙述与隐含作者的规范保持一致,那么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否则,则不可靠。回忆是《长日留痕》构架小说的主要叙述形式。小说中史蒂文斯对往事的叙述,因以回忆的方式呈现,出现了对历史事实的扭曲和与作品本身标准的背离,造成了不可靠叙述。丽贝卡·卡尼也明确指出“(叙述的)不可靠实际上是石黑一雄小说世界的基底,这一点在他的第三部小说,也是布克文学奖得主《长日留痕》中尤为显现”(Karni 76)。

亨克在论及回忆的特点时指出:“回忆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它与过去所经历的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个人的‘内心故事’是建立在现实的需求之上,并经历持续不断的改写与校订”(Henke 80)。可见,回忆总是迎合当前的需要而对过往事件加以重构。出于意愿的需要,叙述者在回忆时可能有意回避,或有选择地加工重构。而“这种体现回忆扭曲事实能力的精致重构,可以被看作是石黑一雄全部文学作品的主要关注点之一”(Drag 2)。在《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身处“二战”前后的巨大社会变革之中。在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下,其当前的需求便是重新确立自身价值,通过回忆来证明自己是一位“杰出”的男管家。史蒂文斯认为判断一位男管家是否“杰出”,应当遵循这样的标准:“肯定地讲,一位‘杰出的’男管家只能是这样的人:他能自豪地陈述自己多年的服务经历,而且宣称他曾施展才华为一位伟大的绅士效过力——通过后者,他也会服务于全人类”(112)。^①可见,史蒂文斯是否“杰出”直接依赖于达林顿勋爵是否“伟大”;“只有通过其雇主,史蒂文斯才能建立自身的价值”(Gurewich 78)。因此,在回应战后外界对达林顿具有反犹太倾向的指责时,史蒂文斯有意进行了不符合事实的辩护:“在我为勋爵工作的所有岁月里,我的职员队伍中曾有过许多犹太人,而且我要更进一步说明,他们从未因为其种族之故而受到任何不同的待遇”(139)。然而在试图找出这些“无理指责”的真正来源时,史蒂文斯叙述了1930年初达林顿勋爵事实上的反犹太行为:

比如说,我今天仍记得很清楚,在一个晚宴上,席间曾提及某家报纸,我偶然听到勋爵说:“哦,你是说那份犹太人的宣传报刊。”这之后,在那段时间里的另一场合,

我记得他交代我停止对当地一家定期来到府上的慈善机构捐款，那是因为该机构的管理委员会“或多或少与犹太人类似”。我迄今对这些话仍记得起，因为它们当时确实让我很吃惊，勋爵在此之前对犹太种族可从未表露过诸如此类的敌对情绪。（140）

这里提到的事情与之前史蒂文斯所说显然矛盾，是不实报道，即詹姆斯·费伦所称的“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②史蒂文斯极不愿意承认达林顿勋爵的反犹太事实，因为一旦承认便意味着达林顿勋爵的行为“犹如过去任何的罪恶那般可恶”（143），意味着达林顿勋爵不再是位“伟大的绅士”，史蒂文斯自己也就不再是位“杰出的管家”。因此，史蒂文斯在叙述达林顿勋爵的反犹太行为时有意淡化，称这些事件“完全属于偶然”、“特别微不足道”。然而，他同时却又说：“我迄今对这些话仍记得起，因为它们当时确实让我很吃惊”（140）。在史蒂文斯充满矛盾的叙述背后，是其内心的挣扎与不安。虽然“史蒂文斯知道历史会如何评判达林顿勋爵，但他又无法让自己承认这一事实”（Wong 61）。因此，史蒂文斯一方面因要回应外界对勋爵的指责，不得不道出事实；另一方面又只能遮遮掩掩以维护勋爵，更是维护自己。通过回忆的不可靠叙述策略，史蒂文斯在重构事件时便有了回旋的余地，他先断言达林顿府上的犹太雇员从未受到过不公平待遇，再逐步淡化达林顿勋爵反犹太的事实，从而树立起达林顿勋爵作为伟大绅士以及他本人作为杰出管家的文本形象。

回忆叙述中的叙述者，因回忆本身的解释性表征以及模糊性，也往往对事实进行不实报道或者不充分报道。在描绘府内职员为1923年那次国际会议进行准备时，史蒂文斯曾叙述道：“至于肯顿小姐，我似乎记得那些日子沉沉的重压对她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75）。文中“似乎”二字将回忆的模糊性前景化，且与“显而易见”形成矛盾。当时，史蒂文斯提醒肯顿小姐准备好供楼上使用的亚麻床单。而此刻忙得不可开交的肯顿小姐抱怨道：“史蒂文斯先生，在过去的两天之中，这算是第四次还是第五次您觉得确有这种必要”（76）。由此可见，肯顿小姐受到的如此“沉沉重压”并非事实，而是史蒂文斯自身心理状态的投射，是由史蒂文斯回忆的模糊性引起的不可靠叙述。因为在史蒂文斯心中，杰出的管家应当时刻带着职业的面具，“他们绝不外部事件所动摇，不论那外部事件是多么让人兴奋，使人惊恐，或是令人烦恼”（39）。所以，他的叙述一直保持着矜持而客观的口吻，回避任何情感的流露。他“只有在谈论别人时才能谈论自己，而一旦直接谈及自己他便不得不说谎”（Shaffer 80-81）。通过回忆的模糊性而造成的不可靠叙述，史蒂文斯将自己的情绪投射到他人身上，这使读者可以窥见一直戴着“非人”面具的他的内心世界，反映出他不能直接面对自己的内心情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混乱和精神、心灵的残缺不全。由此可见，不可靠叙述作为作者的一种叙述技巧，它不再仅仅是作为形式而存在，而是已参与到小说的主题建构之中。

二、回忆的碎片化叙述

回忆，是对过往具体事件进行艺术重组，正如斯蒂芬·欧文所说：“回忆本身就是来自过去的断裂的碎片”。^③回忆作为一种意识行为和情感体验方式，运用到文学创作中，不仅是叙事方式和主题呈现手段，而且具有了丰厚的文学内涵和审美意义。在《长日留痕》中，管家零散、深沉而缓慢的回忆碎片与现实生活交叉相融，构建起整部小说的叙事框架，形成了《长日留痕》独有的片段美学。

众所周知,储存在人脑中的记忆并非流畅的、不可割裂的信息流,而是一系列可随意识自由调节的片断。长久占据回忆中心的往往是印象深刻的细部记忆,而且大多是以与其他事实连续不上的片断式呈现。这些记忆碎片往往因外界事物的触发而被唤醒,再通过心理刺激点彼此连接起来,因此,它在小说中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史蒂文斯承担了热奈特所说的“指挥功能”,通过对回忆事件的选择和过滤,对文本和读者进行操控,从而达到他叙述的真实目的。他经常通过这样的表达来进行回忆的选择,如“这个事件不由得使我想起……”、“回想起那位常使人恼怒的女仆……”、“我怎么也无法忘记那一次……”(47)“我至今仍记得”、“据我的回忆”、“据回忆”(202)等。他甚至在同一段或同一页文本长度内对回忆事件进行高密度、高频率的切换,使文本呈现出碎片化、跳跃性特征。在小说中,史蒂文斯追忆了父亲早年间在达林顿府服务时摔倒的事件。引起这段回忆的源头是肯顿小姐信中对某个场景的描述:“倘若这是令人伤感的回忆,那就请原谅我。可是,我怎么也无法忘记那一次我们俩注视着你的父亲在凉亭前徘徊着,目光紧盯着地上,似乎希望找到他丢在那儿的珠宝”(47-48)。这段场景发生在他父亲跌倒之后。因史蒂文斯的父亲在服务时跌倒,达林顿勋爵担心他在两星期后的国际会议上再次出现纰漏,遂让史蒂文斯找其父亲谈话并缩减其工作。然而史蒂文斯并未直接进入这段回忆,相反,他先叙述了肯顿小姐将鲜花送到配膳室的情景,再转到两周后肯顿小姐对其父亲的工作失误不断抱怨,接着跳跃到两个月之后达林顿勋爵找其谈话以及之后史蒂文斯与父亲的对话,再跳回到与达林顿勋爵谈话之前一周父亲摔倒的情景。直到最后,史蒂文斯才用自己的口吻,描绘了肯顿小姐信中父亲“寻找失去珍宝”的情景。围绕着父亲的跌倒,回忆的碎片被组织起来,然而事件与事件之间却留有长短不一的时间空白,回忆的时间顺序也被打乱。这种迂回、跳跃的叙事手法不同于平铺直叙,既体现了回忆本身的场景依存性,也反应了史蒂文斯内心的挣扎。父亲是史蒂文斯心目中具有“尊严”的“杰出管家”的代表,他曾说:“我希望你会认可,我父亲本人不仅显示尊严,而且他本身几乎就是海斯协会称之为‘与其地位相称的尊严’的典范”(39)。然而随着年龄增大,父亲已经不能胜任管家的工作。父亲的跌倒无疑是一直崇拜父亲的史蒂文斯不愿面对的记忆。然而,父亲被免去一些工作的重要原因,是不久之后达林顿府将召开重要的国际会议,而史蒂文斯则将这次会议视作其职业生涯引以为傲的转折点,是史蒂文斯极想叙述的一段回忆。挣扎在说与不说之间,史蒂文斯便选择了绕开平铺直叙,采用碎片化的、跳跃迂回的方式呈现这段荣辱参半的记忆,以淡化和模糊父亲的年老和失误、突显父亲“杰出管家”的文本形象。

三、回忆的选择性叙述

人的一生当中会经历无数个或远或近的生活事件,但能够明确记起的却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回忆不是被动无情地对一系列资料片段加以储存和提取,而是根据需求,在已被注意和理解的信息中挑选出对自己有用、有利、有价值的信息储存在大脑中,其余信息则往往被遗忘或留在潜意识里。巴特莱特认为“回忆并非无数固定的、毫无生气的和零星的痕迹的重新兴奋。它是一种意向的重建或构念。这种重建或构念与我们的态度有关,与突出的细节有关”(巴特莱特 279)。因此,能够满足需求的信息,记忆程度一般较高,往往成为人们重构记忆的主要信息来源。在以回忆为主要叙述方式的《长日留痕》中,作者或叙事者对人物和事件的选择与过滤同样反映出作者的审美需求。

在《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以回忆的形式,追述了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包括他的

雇主与纳粹集团的牵扯、他与父亲僵硬的关系以及他对同事肯顿小姐压抑的感情。他一生痴迷于追求“尊严”，崇拜名誉，把自己最美好的三十五年岁月无怨无悔地奉献给了雇主。他对职业尊严和成就的追求使他时时刻刻保持克制矜持的叙述者形象，回避任何情感的流露。这一点从他作为叙述者所选用的非常正式的语言中可见一斑。他使用的语言语法完全正确，词汇简单精确，表达逻辑严密，一如“管家式的语言，没有任何文学特点，缺少妙语、美感和创意”（Parkes 31）。也正是这种“管家式的语言”，建立了他克制、拘谨、容忍的文本形象。初读文本，读者对史蒂文斯的印象多为冷漠、麻木、不通情理，但仔细分析叙述者对过往事件的选择性叙述，读者会发现掩藏在表层文本下面的史蒂文斯其实有着一颗敏感、细腻、温柔的心。

从元故事叙述层来讲，史蒂文斯作为叙述者，反复实施了自己对文本的操纵功能，站在自己的角度选择性地忘记、回忆事情，或自动删除某些情节，例如，他会经常说“也非常可能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其他事例，我现在已经忘却了。然而，无论如何，我至今不可忘怀的是，在一个阴沉而又细雨绵绵的下午，事情达到了某种高潮”（54）；他也会承认：“我今天虽无法准确回忆起我说了些什么，可我记得我曾非常坚定地请肯顿小姐离开”（159）。亚当·牛顿言简意赅地总结了史蒂文斯的这种选择性叙述，认为史蒂文斯能“掠过记忆，时而审视，时而回避，两者交替进行”（Newton 282）。在这种回忆与忘却的选择性叙述之间，史蒂文斯间接地在文本中勾勒了自己的另一形象。试看下段：

整个上午特别使我关注的是一段回忆——更加准确地说，那只是回忆的一个片段罢了，可那一刻出于某种原因在这些年来一直栩栩如生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我至今仍记得，我曾独自站在后走廊处肯顿小姐起居室那紧闭着的门前；我当时并不曾正面对着那门，只是站在那儿侧着身子对着它，究竟该不该敲门呢，我茫然不知所措；因为在那时，据我的回忆，我很震惊，因为我确信就在那扇门的后面，离我不过几码远之处，肯顿小姐确实在哭泣。正如我所说，那一刻曾深深地留在我的脑里，据回忆，当我就像那样站在那儿时，我感到一种特别的情感在我体内升腾起来。至于实际上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就那样站在后走廊处，我现在无论如何也无法确定了。（201-202）

对这一场景的描述，小说中出现了多次。史蒂文斯反复强调的是“我至今仍无法记清楚，那天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才会使我直接登上了这幢房子的最高一层楼”，他唯一清晰地记得的是“肯顿小姐的身影，那是靠在其中一间卧室窗户前的侧影，曾吸引了我的目光”（64），甚至认为“倘若我当时敲门走进去，我也许会发现她泪容满面，这一点倒是相当肯定的”（216）。史蒂文斯忘记的是自己的动机、自己的感受，而深深刻入他脑海中的是“肯顿小姐确实在哭泣”、“她泪容满面”。由此可见，肯顿小姐的哭泣在史蒂文斯心中已沉淀为一个心理刺激点，永远定格在他的记忆中。这种回忆的选择凸显了肯顿小姐在史蒂文斯心中重要的地位，泄露了一直压抑自身情感的史蒂文斯对肯顿小姐的关爱。德拉格甚至认为，“史蒂文斯对肯顿小姐哭泣的高度关注暴露了他对其自身情感的某种不安”（Drag 73）。为了实现自己成为“伟大男管家”的梦想，史蒂文斯故意戴上强者面具，克制陈述自己的情感失落，极度压抑自己的情感需求。他经常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因此肯顿小姐会质问他：“史蒂文斯先生，为什么，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你总要装假？”（147）史蒂文斯的叙述选择暴露了他作为正常人对情感的需求与向往，同时也让读者看清了戴着

职业面具的他的精神和心灵的残缺不全和性格悲剧。

《长日留痕》由史蒂文斯的回忆拼接而成,体现了回忆叙述的不可靠性、碎片化以及选择性特点。史蒂文斯为了证明在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下自己是一位杰出的管家,借由回忆叙述的方式,对历史事实进行了碎片化处理和选择性叙述。过往的历史以碎片的形式,跳跃式地呈现出来。同时,由于回忆的模糊性,历史事实在史蒂文斯的叙述中也呈现出不可靠性。这不仅体现了回忆的组织特点,同时也反应了史蒂文斯叙述时的不直接与遮遮掩掩。回忆叙述在整个叙事中成为了小说不可或缺的主题,一方面凸显了所选择事件在史蒂文斯心中的地位,使读者看到他终于有勇气直面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对肯特小姐的爱,对达林顿勋爵的判断也趋于客观;另一方面也模糊了不同事件间的界限,使回忆中弥漫着沧桑的历史感。史蒂文斯借助对过去时光的回忆,重新构造了一个世界,一个供作者石黑一雄本人站在客观角度上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的世界。

注解【Notes】

- ①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石黑一雄:《长日留痕》,冒国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下文引用只注明出处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 ②参见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小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0。
- ③参见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60。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弗雷德里克·C·巴特莱特:《记忆:一个实验的和社会的心理学研究》,黎炜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 [Bartlett, Frederic C.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Trans. Li Wei.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8.]
- Booth, Wayne C.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Chicago UP, 1961.
- Drag, Wojciech. *Revisiting Loss: Memory, Trauma and Nostalgia in the Novels of Kazuo Ishiguro*.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2014.
- Gurewich, David. "Upstairs, Downstairs." *New Criterion* Vol.8. 4 (1989): 77-80.
- Henke, C. "Remembering Selves, Constructing Selves, Memory and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British Cultures* 1 (2003): 77-100.
- Karni, Rebecca. "Kazuo Ishiguro and the Ethics of Reading World Literature." Diss. UCLA, 2010.
- Newton, Adam Zachary. "Telling Others: Secrecy and Recognition in Dickens, Barnes and Ishiguro." *Narrative Eth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1997. 241-85.
- Parkes, Adam. *Kazuo Ishiguro's The Remains of the Day: A Reader's Guide*.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2001.
- Shaffer, Brian W. *Understanding Kazuo Ishiguro*. Columbia: U of South Carolina P, 2008.
- Wong, Cynthia F. *Kazuo Ishiguro*. Horndon: Northcote, 2004.

责任编辑:桑 晔

【主持人语】(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杨金才教授) 当代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荣获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受到中国读者的青睐,研究者更是好评如潮,竞相推出各自研究心得,在一个更宽阔的视野内把握他的文学精神与艺术风格,在探索何以使其获此殊荣的问学中更加关乎石黑一雄文学创作的内在文化肌理和深邃的主题意蕴,并在历史的探寻和拷问中追寻其文学书写所内蕴的民族创伤及其历史足迹,进而深化对石黑一雄文学睿智的理解,更好地领悟其以史为鉴、正视历史、化解创伤的人性张扬和伦理彰显特点。石黑一雄的记忆书写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邓颖玲一文立足文本,探讨了“遗忘”的叙述功能,认为该作品通过“遗忘”叙述启示读者不该忘却“被埋葬的”个人记忆和社会历史;王岚的论文通过深入的文本细节分析,认为石黑一雄在其营造的悠远历史氛围中既重新诠释经典,又通过丰富的历史隐喻解构了亚瑟王的形象,表达了某种超越狭隘的自我意识与族裔认同;梅丽从历史的角度观照文本,并结合当代英国发展的历史际遇,认为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通过营造一个半虚构的田园牧歌式的英国,引导人们去正视英国所遭遇的社会现实与文化困境,很好地论述了小说的主题内涵;陈婷婷、孙妮的论文侧重小说叙事层面的分析,认为该小说发挥了隐喻的多重指涉功能,可以引导读者参与文本想象和历史重构,再度探讨了后现代语境下大屠杀记忆的历史性与创伤性问题。这里遴选的4篇论文各有重点,特色鲜明,希望引起国内同仁对石黑一雄文学创作的更多思考。

石黑一雄新作《被掩埋的巨人》遗忘叙事研究

邓颖玲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石黑一雄的新作《被掩埋的巨人》对奇幻小说文类进行了惊人大胆的改编。作者不仅将魔怪等超自然元素引入小说,而且将整个故事建立在“遗忘”的叙事框架之上。小说以“巨人”为隐喻,讲述了主人公埃克索和比特丽斯夫妇的个人创伤经历和不列颠人对撒克逊人进行的血腥屠杀历史,探讨了具有当下意义的主题:被遗忘的历史是该遗忘还是记起?民族创伤以何种方式愈合?本文在细察小说描述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基础上,探讨了“遗忘”的叙述功能,指出“遗忘”不仅具有治愈、修复和宽恕功能,而且具有一种解放的再生性力量。石黑一雄通过“遗忘”叙述启示读者“被埋葬的”个人记忆和社会历史不该被遗忘;只有以史为鉴,正视历史,化解创伤,才是解决民族矛盾和国家分歧的良策。

关键词: 石黑一雄; 被掩埋的巨人; 遗忘; 记忆; 救赎功能

中图分类号: I561.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22X (2018) 01-0001-07

收稿日期: 2017-04-18; **作者修订:** 2017-11-18; **本刊修订:** 2017-11-21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石黑一雄小说的记忆叙事研究”(14A104);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空间建构与身份认同:战后英国流散文学研究”(14YBA272)

作者信息: 邓颖玲(1965-),女,湖南醴陵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叙事学, E-mail: dengyingl@163.com。

0. 引言

石黑一雄 (Kazuo Ishiguro) 是英国当代著名的日裔英籍作家, 与奈保尔 (V. S. Naipaul)、拉什迪 (Salman Rushdie) 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曾获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英国皇室文学骑士勋章和法国艺术文学骑士勋章, 2017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小说以强烈的情感、精妙的叙事手法和宽广的文化视野受到文学研究者的持续关注与研究。经过十年的精心酝酿和打磨, 2015 年石黑一雄推出了新作《被掩埋的巨人》(The Buried Giant), 小说出版后好评如潮, 《纽约时报》称它“具备了所有巨著该有的品质, 让人读后回味无穷, 爱不释卷”(Gaimanfeb 2015); 《卫报》认为“在这部创作周期长达十年的小说中, 他(石黑一雄)对文类做了最为惊人大胆的改编”(Holland 2015)。这种惊人大胆之处首先体现在小说采用的魔幻叙事模式上, 作者不仅将魔怪等超自然元素引入小说, 而且将整个故事建立在“遗忘”的叙事框架之上。“遗忘”构成了整部小说的叙事动力, 推动着小说主题向纵深拓展。

1. 被遗忘的记忆

石黑一雄一直钟情于记忆主题的创作, 是书写记忆的圣手(钟志清 1994: 34-35)。德拉格 (Drag 2014: 1) 认为, “回忆”是石黑小说叙事的“情感内核”。石黑一雄本人在采访中也多次谈到, 他所有的小说都是关于人物“与个人记忆所做的斗争”(Wood 2015)。从结构精巧的第一部小说《远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 1982), 到荣获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的《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 1989), 再到曾轰动一时的《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 2005), 他的小说无不选取了特定的历史背景, 细微地展现了记忆的模糊特质以及记忆与遗忘的交互作用。与以往小说不同的是, 《被掩埋的巨人》聚焦于记忆的另一面, 即遗忘, 用遗忘来构造小说, 透过遗忘的视角来细察记忆, 对记忆主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继承与拓展。

记忆与遗忘, 是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文化母题。遗忘存在于记忆的过程之中, 是记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剑桥大学科学家芭芭拉·威尔逊 (Barbara A. Wilson) 将“遗忘”定义为“当记忆失败的时候”(Fara & Patterson 1998: 113)。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 (Paul Ricoeur) 也认为, “遗忘是记忆的组成部分”(Teo 2014: 5)。在石黑一雄的笔下, 记忆和遗忘更是成了他孜孜以求的表达对象, 它们共同构成了《被掩埋的巨人》的叙事张力。在谈到小说的创作动因时, 石黑一雄本人就明确指出“在我笔下那个简化了的神话背景中, 我创造了一片降临在这片土地之上的迷雾, 而这迷雾的超自然魔力就是能够使人遗忘”(Crum 2015)。

《被掩埋的巨人》讲述了公元 6 世纪之初英格兰的撒克逊移民和不列颠土著的生活与战争故事。当时不列颠人与撒克逊移民比邻而居, 相安无事地生活了数十年。与此同时, 一片奇怪的“遗忘之雾”笼罩了英格兰的山谷, 使村民们患上了一种群体性失忆症。主人公埃克索 (Axl) 和比特丽斯 (Beatrice) 为了赶在记忆完全丧失之前找回多年前失踪的儿子, 踏上了艰辛的寻子之旅。途中, 他们得知母龙魁瑞格 (Querig) 是迷雾的罪魁祸首, 正是它吞吐的气息使“这块土地中了魔咒, 被遗忘的迷雾笼罩住了”(石黑一雄 2016: 43)^①, 于是他们加入了屠杀母龙的行列。最终, 撒克逊武士维斯坦 (Wistan) 打败了保护母龙的亚瑟王武士高文 (Gawain), 杀死了母龙, 成功驱散了迷雾, 使集体失忆的人们最终恢复了记忆。标题“被掩埋的巨人”是统领整部小说的一个隐喻, 喻指被埋葬的记忆和历史, 具体指不列颠老夫妇埃克索和比特丽斯的个人记忆和不列颠人对撒克逊人血腥屠杀的集体历史。

小说一开始就向读者描绘了一个被“遗忘之雾”笼罩的世界。在这里，“人们很少谈论过去。……过去消失在一片迷雾之中，就像沼泽地上的雾气一样”（7），甚至连刚刚发生的事情都会忘记。没人知道、也无人关心个中原因。小说的主人公埃克索和比特丽斯连自己的儿子长得什么样都想不起来，“不记得他的脸或者声音”，不记得“他是什么模样，在哪里住”（24），甚至连儿子失踪的原因也无从记起。遗忘的伤痛时刻折磨着他们的内心。为了寻找被“遗忘之雾”遮蔽的往事，找回被埋葬的记忆，他们开启了艰难的寻子之旅。

在寻子途中，埃克索和比特丽斯先后遇到了保护母龙的亚瑟王老武士高文爵士、被恶龙咬伤的撒克逊男孩埃德温（Edwin）和意欲屠杀母龙的维斯坦武士。为了避免埃德温再遭村民残害，老夫妇和维斯坦便带着他一同走上了屠龙之旅。在是否屠龙这个核心问题上，老夫妇之间发生了分歧。比特丽斯坚持屠龙找回记忆，她担心“没有了记忆，就没有了源头，我们的爱会不会慢慢枯萎、死亡”（44）。与妻子的决绝态度相反，丈夫埃克索则对屠龙迟疑不决，陷入某种恐惧之中。在他看来，“有些事情藏起来，不放在心里，难道不是更好吗？”（157）。随着记忆在寻子途中被逐步唤醒，困扰他们多年的儿子失踪之谜也渐渐露出水面。原来他们曾经背叛对方，年幼的儿子目睹了父母之间的不忠而负气出走。离家后没多久，儿子就死于肆虐全国的瘟疫，被埋葬在海岛上。因此，小说描绘的屠龙之旅实际上是记忆与遗忘的交锋之旅。对他们来说，恢复记忆既意味着恢复对甜蜜爱情的记忆，也意味着恢复了对欺骗、背叛、不忠等不堪往事的记忆。

“遗忘之雾”不仅导致了埃克索和比特丽斯失去了对儿子的记忆，也造成了他们对自己身份的遗忘。埃克索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谦卑的农民，与妻子及族人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但随着记忆的慢慢苏醒，他发现自己曾经是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之一，曾代表不列颠人与异族撒克逊人和解。他曾主张以和平友好的政策安抚撒克逊人，还制定了“无辜者保护法”，因此被百姓亲切地称为“和平骑士”。不列颠人对撒克逊人的残暴屠城行为让埃克索觉得自己成了骗子和屠夫。所以，在不列颠人庆祝胜利的时刻，他毅然离开宫廷，带着妻子隐姓埋名于乡野。但由于笼罩一切的“遗忘之雾”，他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武士身份，同时也忘记了那段血腥的历史。

在《被掩埋的巨人》中，“巨人”是贯穿小说的一个核心隐喻，它喻指被埋葬的不仅仅是埃克索和比特丽斯夫妇的个人记忆和创伤经历，而且“暗喻着被埋葬的战斧，暗喻着压抑的仇恨以及对血腥复仇的渴望”（Sanai 2015）。具体来说，喻指不列颠人对撒克逊人进行的血腥屠杀历史。在小说中，遗忘并非少数个体的遭遇，而是一种集体病症，正如比特丽斯所说“大家都在忘记昨天和前天的事情”，就像是“得了什么毛病一样”（17）。在这种集体失忆的状态下，人们丧失的不仅是关于个体生命、个体历史的记忆，也是关于集体生活、集体历史的记忆。小说通过人物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回忆刨开了那段被埋葬的不列颠人血腥残杀撒克逊人的历史。作者对这段历史并没有采用白描的手法直接表达出来，而是以记忆慢慢复苏的形式间接陈述。

在“高文的第一次浮想”这一章中，读者随着高文的记忆捕捉到了那段被埋葬的历史：“那些衣衫破烂、饱经风霜的妇人，以前也都是清纯的少女”“晚上来抓他的人都死了，很多都成了焦黑的骨头”“每天他手上流的血，都要让塞文河泛滥啦！”（205-207）。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之间的愤怒和仇恨可见一斑。这种仇恨在埃克索的回忆叙述中得到了进一步印

证“我们正式允诺不伤害他们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所以他们留在村子里，没人保护。但是，现在他们都被我们的人杀了，包括最小的婴儿”(215)。寺院地道里的白骨也时刻提醒着人们那段“被掩埋”的屠杀历史“这都是人的头骨，我不否认。这儿一条胳膊，那儿一条腿，……我们整个国家都是这样。翠绿的山谷。春天里怡人的小灌木丛。可是，你往土里挖，雏菊毛茛下面，就是死者的尸骨”(171)。“被掩埋”的记忆不会成为湮灭的过往，“被掩埋的巨人”终将复活。在小说的最后，维斯坦武士要埃德温记住“屠杀我们族人的，是亚瑟王领导的不列颠人。抓走了你母亲和我母亲的是不列颠人。我们有义务去仇恨每一个不列颠男人、女人和孩子”(247)。

2. 遗忘的救赎功能

《被掩埋的巨人》无论在构思上还是在表达上，都贯穿着某种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这些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又通过“遗忘”的叙事框架表达出来。正如克拉克(Clark 2015)所言，“遗忘”的迷雾是《被掩埋的巨人》一书的主旨所在。遗忘建构起整部小说的文学秩序，担负起小说的言说功能和救赎功能，成为小说主题表达的理想之径。

首先，遗忘具有治愈和修复功能。在记忆恢复之前，埃克索和比特丽斯夫妇一直相亲相爱、相濡以沫地生活着。当比特丽斯担心遗忘会让他们夫妻之间的爱枯萎时，埃克索马上向她保证“我们的爱怎么会枯萎呢？和年轻时候傻傻的热恋相比，现在我们的爱不是更深吗？”(44)。可见，遗忘在这里“发挥了双重功能——忘记罪孽的人和忘记罪孽”(Clark 2015)，是遗忘使他们忘记了失子之痛和欺骗之痛而保持着亲密的夫妻关系。但是，遗忘带来的只是一种当下的、无根的短时亲密；被遗忘掩盖的夫妻之间的共同记忆才是“关爱的构成性要素”，是维系夫妻间“浓厚关系”^②的重要因素(阿维夏伊 2015: 8)。因此，小说中老夫妇俩才会因为遗忘而备受煎熬，才会不顾一切地开启艰难的寻子之旅，追寻被“遗忘之雾”所遮蔽的记忆。正如小说开端处埃克索对比特丽斯的劝慰“我们的记忆没有永久丢失，不过是被这邪恶的迷雾放到什么地方找不到了。我们会找到的，哪怕是一件事一件事去想。我们出门，不就是为了这个吗？”(44-45)。阿维夏伊·玛格利特(2015: 5-6)在谈论真相对共同记忆的治疗效果时指出“在制造创伤的同时，被压抑的共同记忆被公开、被言说、被感知也具有治疗效果。”是遗忘引发了埃克索和比特丽斯的寻子之旅，寻子之旅不仅恢复了夫妻俩遗忘的关于儿子的共同记忆，也复原和修复了夫妻俩产生隔阂、互生怨恨的过往历史。

当母龙被杀死后，夫妻俩对先前的不忠有了全新的认识。开始，埃克索之所以拒绝屠龙，拒绝探寻遗忘的真相，是因为内心之中“潜伏着的其他什么东西。也许是渴望惩罚”(322)。他希望通过掩埋真相来惩罚妻子对他的不忠。最后，埃克索终于意识到，妻子的不忠，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她认为前面的事情是她的错，那么后面的事情，我就要负很大责任了。因为有短短的一段时间，她曾对我不忠，这是真的。……可能是我做了什么事把她赶到了另外一个人怀里。或者是因为我该说的没说、该做的没做？”(322)。他意识到自己禁止妻子去祭祀儿子的坟茔，“真是件残酷的事情。……那可是更加阴暗的背叛，甚至妻子一两个月的小小的不忠”(322)。很明显，是遗忘以及遗忘带来的记忆复苏抹平了夫妻间的隔阂，修复了夫妻间的关系，使夫妻俩灵魂得到救赎，感情得到新的升华。

当维斯坦战胜母龙后，埃克索无限感慨地说“如果迷雾没有剥夺我们的记忆，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爱是不是不会如此牢固？也许有了迷雾，旧伤才得以愈合”（327）。比特丽斯也认同道：也许“遗忘”的迷雾退去，“会给这块土地带来可怕的后果，但对于我们来说，消退得正是时候”（327）。因此，探寻遗忘之旅也成了夫妻之间的反省、忏悔之旅。最终，夫妻俩历尽千辛万苦，把吃了毒草的山羊牵到母龙跟前，他们心中被埋葬的记忆也得以修复。正如石黑一雄本人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些事情我们宁愿抛诸脑后，不再提及；总有些令人不舒服的阴暗旅程。这时，最明智的做法似乎就是将它们深深地埋葬”（Crum 2015）。这与赵静蓉在论述创伤记忆时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她（2015：94）认为“记忆创伤或治愈创伤恰恰需要忘记创伤来实现”。迷雾散去后，夫妻俩忆起了创伤的根源。面对难以抚慰的丧子之痛和不堪往事，他们选择相互宽容和原谅，不离不弃，共同走向未来。由于能勇敢对待过去的创伤，共同经历磨难，他们心中“最后一片黑暗”也已经离去（323），心中的创伤得以愈合。

其次，遗忘与“宽恕”联系在一起（Teo 2014：5）。小说人物在对遗忘历史的探寻与追忆中，逐渐接近事实的真相。在对真相进行重新审视的基础上，以一种更加开放、更加客观公正的心态对待历史，直面真相，最终使创伤得以抚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遗忘”开启了这种精神层面的救赎之旅。亚瑟王派人施咒并保护母龙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埋葬那段不列颠人血腥残杀撒克逊人的历史，从而让人们遗忘过去，让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能够和平共处。对于这段被埋葬的历史记忆，小说中有两种针锋相对的不同态度：一是以高文爵士为代表的遗忘派。高文对他的态度做了如下解释“我知道我的神为我们那天的行为感到不安。但事情过去很久了，死者安息于地下，地上早已覆盖着怡人的绿草。年轻一代对他们一无所知。我求你离开这个地方，让魁瑞格的作用再发挥一段时间。她还能活一两个季节吧，最多了。可是那么长的时间也许就足以让旧伤口永远愈合，让永久的和平降临在我们中间”（294）。高文认为是对战争的遗忘才让整个国家拥有了长久的和平，才让两个敌对的民族能够和平共处。因而，他们暗中喂养魁瑞格，借失忆以弥合两族人的精神创伤。确实，在遗忘之雾被驱散之前，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相安无事地混居生活，甚至有融合成新民族的迹象，就像高文爵士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爱着的亚瑟在这儿给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带来了持久的和平，虽然我们仍能听到遥远的地方发生战争的消息，但我们这儿，大家长期以来都是朋友和亲人”（110），以至于维斯坦都向高文爵士发问“你们伟大的国王用了什么神奇的本领，治愈了这片土地上的战争创伤，以至于今天在这儿旅行的人，几乎看不到任何疤痕或阴影？”（110）。显然，这种“神奇的本领”就是遗忘，是遗忘让他们忘记了相互的仇恨和战争，弥合了征战及大屠杀引发的裂痕。另一派则是以维斯坦武士为代表。维斯坦认为历史必须铭记，被埋葬的记忆不会成为湮灭的过往，针对不列颠人的复仇应该不惜一切代价。

同样，在“是否遗忘”的问题上，修道院内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以修道院住持为代表的很多修士认为，遗忘是最好的疗伤之道。因而，他们主张继续保护恶龙，借失忆以弥合两族人的精神创伤。他们通过折磨、惩罚自我肉身，以求获得上帝的宽恕，获得内在良知的安宁。也正是出自这个善的初衷，当得知维斯坦一群人将去屠龙时，他们才会百般阻挠。但是以乔纳斯神父（Jonus）为代表的一些修士却意识到，通过惩罚肉身来减轻罪孽的方式无异于自欺欺人。欺骗不能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遗忘并非解决问题的正确之道。正如乔

纳斯神父所说“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不会获得宽恕。我们必须揭开隐藏的事情，直面过去”(153)。大屠杀的痕迹难以被彻底清除，通过强行制造某种遗忘症来实现的和平注定脆弱而不持久。消除遗忘、拾起记忆才是唯一选择。由此可见，小说中围绕遗忘之源“恶龙”所展开的较量，实质上是记忆与遗忘、恢复与埋葬历史真相、强权与抵抗强权的较量。

石黑一雄在谈到《被掩埋的巨人》的创作动机时会说“我做了一件至少15年来我一直想做而未做的事，就是写一部围绕这个问题的小说——何时应回忆，何时不如遗忘——并将之扩展到一个更大的层面上：社会、民族、共同体层面”(Crum 2015)，并且强调该小说所关注的重点在于记忆的“社会层面”(Wood 2015)。被遗忘的历史是该遗忘还是记起？民族创伤以何种方式愈合？作者并没有在小说中直接给出答案；小说在维斯坦等待族人开展报复行动中就此搁笔。但小说在结尾中似乎向我们暗示了答案：高文已经风烛残年、衰老不堪，无法胜任保护恶龙的使命；内讧让修士们慢慢从内部瓦解，他们已经无法承担养护恶龙的任务；恶龙已经奄奄一息，随时都有可能死亡。可见，维护遗忘势力的一方已经日薄西山。相反，担负杀死恶龙、还原历史真相使命的维斯坦则身强力壮、智勇双全。当高文恳求维斯坦“让这个国家在遗忘中平复”时(294)，维斯坦则认为高文的想法很愚蠢“蛆虫越活越肥，旧伤口怎么可能愈合？和平建立在屠杀与魔法师的骗术之上，怎么能够持久？”(294)。显然，恢复记忆乃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但简单的恢复记忆就是平复民族创伤的有效途径吗？遗忘能够维持的只是暂时的和平。小说的开放式结尾已暗示读者：新一轮的战争、仇恨及宗派暴力，被遗忘却未被原谅的冤屈威胁着要再次出现，“多少古老的仇恨将在这块土地上复活，……人们会在夜间烧掉邻居的房子。清晨将孩子们吊死在树上。河水发臭，河上漂着泡了很多天的肿胀尸体”(305-306)。这种危言耸听、触目惊心的描述向读者提出了索古探幽却直指当下的、一个关乎人类生存状况的严肃问题：关于民族的创伤历史，我们是该遗忘，还是该铭记？故事结尾处，不列颠老夫妇请求撒克逊小男孩埃德温将来一定要记住孩童时期与他俩建立的友谊。虽然仍清晰记得“屠杀我们族人的，是亚瑟领导的不列颠人。抓走你母亲和我母亲的，是不列颠人。我们有义务去仇恨每一个不列颠男人、女人和孩子”(247)，但埃德温“没打算把这对好心的夫妇也包括在内”(310)，埃德温内心深处充满了对不列颠老夫妇的仁爱与慈善。老夫妇恳请小男孩记住他们以及埃德温对“敌人”显露出的原谅和宽恕，其实隐喻着过去对未来的忠告：只有铭记过去，尊重历史，学会宽恕与原谅，才会有美好的未来。正如徐贲(2008: 1)所指出的那样“走出历史灾难的阴影，实现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不是‘不记’前嫌。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要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石黑一雄通过这部小说向我们传递了具有当下意义的信息：通过盲目强制的遗忘是不可能遮盖邪恶、平复创伤、解决民族矛盾的，只有恢复记忆、正视历史，才是解决民族矛盾和国家关系的良策。

3. 结语

美国学者大卫·格罗斯(David Gross)指出“遗忘不仅仅是一种解放的力量，也是一种再生性的力量。遗忘通过扫除过去的碎片，可以走向净化和再生之路。”(赵静蓉 2015: 119)遗忘的这种再生性力量在《被掩埋的巨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小说中，石黑一雄站在人性的高度，以其对历史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通过“遗忘”的主题和叙事框

架,带领读者重访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英国“初创时期”的历史,提出了伤痛记忆和历史是该记起还是该遗忘的问题,深刻阐明了记忆和历史对个人和社会的深远意义。小说启示读者:伤痛的记忆和历史不该被遗忘,“被埋葬的”个人记忆和社会历史终究会被唤起。只有通过追忆创伤往事,才能真正达成对他人的宽恕。因此,对于个人记忆和社会历史,我们的态度不应该是压抑或遗忘,而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去接受过去,承认历史,化解创伤,并以史为鉴,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注释:

- ① 文中所有出自该小说的引文均出自参考文献 [2], 以下只标明页码。
- ② 阿维夏伊·玛格利特 (Avishai Margalit) 是以色列哲学家,他在《记忆的伦理》(The Ethics of Memory)一书中指出,浓厚关系指与我们有亲密关系的人际关系,包括父母、朋友、爱人、同胞等,是建立在过去的共同记忆基础上。

参考文献:

- [1] 阿维夏伊·玛格利特. 记忆的伦理 [M]. 贺海仁,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 [2] 石黑一雄. 被掩埋的巨人 [M]. 周小进,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 [3] 徐贲.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
- [4] 赵静蓉.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 [5] 钟志清. 寻觅旧事的石黑一雄 [J]. 外国文学动态, 1994, (3): 34-35.
- [6] Clark, A. The Buried Giant Novel Interview [N]. The Guardian, 2015-02-19.
- [7] Crum, M. Kazuo Ishiguro On Memory, Censorship And Why Proust Is Overrated [EB/OL]. (2015-03-03) [2016-11-15].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5/03/03/kazuo-ishiguro-interview_n_6785824.html.
- [8] Drag, W. Revisiting Loss: Memory, Trauma and Nostalgia in the Novels of Kazuo Ishiguro [M].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4.
- [9] Fara, P. & K. Patterson. Memor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0] Gaimanfeb, N. Kazuo Ishiguro's The Buried Giant [EB/OL]. (2015-03-01) [2015-04-24]. http://www.nytimes.com/2015/03/01/books/review/kazuo-ishiguro-the-buried-giant.html?_r=0.
- [11] Holland, T. The Buried Giant Review—Kazuo Ishiguro Ventures into Tolkien Territory [EB/OL]. (2015-03-04) [2015-04-24]. <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5/mar/04/the-buried-giant-review-kazuo-ishiguro-tolkien-britain-mythical-past>.
- [12] Sanai, L. Don't Fall for the Fantasy: This Novel is Classic Ishiguro [N]. Independent, 2015-02-28.
- [13] Teo, Y. Kazuo Ishiguro and Memory [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 [14] Wood, G. Kazuo Ishiguro: Most Countries Have Got Big Things They've Buried [N]. Telegraph, 2015-02-27.

(责任编辑 张新萌)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A Study on the Theme of Forgetting in Kazuo Ishiguro's Newly-Published Novel *The Buried Giant*, by DENG Ying-ling, p. 1

With the employment of supernatural elements as well as the narrative frame of “forgetting”, Kazuo Ishiguro's newly-published novel *The Buried Giant* has made a startling and audacious adaptation to fantasy literature. The novel depicts Axl and Beatrice's personal traumatic experiences and sketches the history of the Britons' bloody slaughter to the Saxons. It probes into a theme of current significance, that is, should the forgotten history be forgotten or recollected? In what ways should a nation's traumas be heal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ersonal and social memories, the paper studies the narrative function of “forgetting”. It points out that “forgetting” plays not only a function of healing, restoration and forgiveness, but also a role of liberation and regeneration. Through the narrative of “forgetting”, Kazuo Ishiguro intends to enlighten the reader that the “buried” personal and social memories and history cannot be forgotten; only through learning from history, facing up to reality as well as curing the traumas can we solve the problems of ethnic conflicts and national differences.

History as Metaphor—A Thematic Study of Kazuo Ishiguro's *The Buried Giant*, by WANG Lan, p. 8

In *The Buried Giant*, Kazuo Ishiguro revisits some of his favorite topics, such as the uncertainty of memory, the reflection on history, and the emotional needs of human beings. The novel is a portrayal of the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Britons and Saxons following the latter's invasion in the 5th and 6th century. Despite elements of fantasy, the language as a whole is plain, unadorned, and restrained. Using history as metaphor, the novel urges people to view the memory of history through proper lenses, to follow the moral law within oneself instead of following any authority blindly. The implied message is that people should learn to cherish and tolerate. Deeply rooted in the tradi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the western canon, the novel suggests that readers should rise above egoism and ethnic identity, build harmonious family and ethnic relations, and guard against killings caused by hatred and revenge between ethnic groups. It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author's concern for the fate of human beings as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and a call for peace.

The Cultural Dilemmas in Britain after World War II as Reflected in *The Remains of the Day*, by MEI Li, p. 15

Kazuo Ishiguro's novel *The Remains of the Day* is a reminiscent tale of Stevens, a British butler who dedicates his lifetime to serving the owner of Dalington Hall. It excavates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personal fate, and reveals three cultural dilemmas in Britain in the post-World War II era when Britain declined in its power and influence, namely, the hypocritical nostalgia of the England myth, the anachronistic Victorian virtues, and the otherness of British culture caused by the diverse cultures and new world order.

Stance of Noun Complement Structures in Academic Writing—A Corpus-Based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by ZHANG Ying, LEI Lei, p. 39

The study investigated the stance of *Noun that*, *Noun to-infinitive* and *Noun of-prepositional complement* structures in academic writing across disciplines. Results showed that noun complement structures mainly express

流散视角下的历史再现 ——《上海孤儿》对英、日帝国主义侵华行径的双重批判

邓颖玲，王飞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当代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的代表作《上海孤儿》选取英、日帝国主义相遇的上海租界作为历史背景，透过流散视角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遭受英国鸦片贸易、日本侵华战争双重侵略的中国历史。小说中的人物既是为历史洪流所夹裹的个体，同时也具有历史象征意义。在细读小说历史语境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小说主人公班克斯、戴安娜及山下哲的个人遭遇，认为小说从人物既是中心又是边缘的相对位置出发，审视了那段被西方学者压抑的中国殖民历史，批判了英、日帝国主义罪恶的侵华行径。

关键词：石黑一雄；《上海孤儿》；流散视角；鸦片贸易；侵华战争；历史再现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5)06-0141-05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1954-)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英国文坛走红，并成为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生于日本、长在他的与拉什迪、奈保尔并称为当代英国文坛“移民三雄”。石黑一雄擅长从流散视角出发，以优雅细腻的语言叙述回忆历史、个人与社会的交互关系，被誉为“寻觅旧事”的圣手。^{[1](34)}他的小说以反思英、日历史为主题，继承了英语文学的隐忍节制和日本文化的“物哀”“幽玄”^{[2](92)}，充满了对历史问题的深切思考。石黑一雄的大部分小说都是关于日本或英国历史的，尤其是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历史。《浮世画家》反思了二战时期日本所犯的罪行及战后日本普通民众经历的伤痛；荣获布克奖的《长日留痕》批判了二战前英国针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绥靖政策；而《上海孤儿》则综合发展了前两部小说的主题，把故事背景设定在上海租界这样一个英、日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的时空交点，从流散的视角对英、日帝国主义侵华行径做了双重批判。

在这个“英国文学国际化”的时代^{[3](1)}，石黑一雄的日裔英籍双重身份尤为引人注目。石黑一雄于1954年生于日本长崎，5岁时随父母迁居英国，在家接受日本文化的熏陶，在学校受着纯正的、典型的英式教育。东西方双重教育背景使得他对两种文化既有部分认同，又有一定程度的疏离。正如石黑一雄本人所说：

“我认为我是一个无根的作家。我既不是真正的英国人，也不是真正的日本人。在我身上没有明显的文化身份。”这也是他坚称自己是“国际主义作家”的原因。^{[4](58)}正是这种既认同又疏离、既居于其内又处于外部的流散身份使他“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以及看待事物稍显不同的视角”^{[5](35)}。独特的双重身份让他看待历史、反思过去更加全面、客观、公正，因为他“没有要为之代言、抑或作为写作对象的社会或国家”^{[4](58)}。

流散，英文 diaspora，源自希腊语，意指植物通过花粉的传播而繁衍生长。《圣经》中用来指上帝有意将犹太民族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状态。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过文学文化研究派的语义重构，流散一词的内涵从流离失所的凄苦扩展至跨越文化的喜悦，其外延也随之从散居的犹太民族推至任何离开故土的民族和个人。童明教授据此认为，“任何跨民族的”“跨界的、旅行的”“翻译的、混合的形式”都具有“飞散性”。^{⑥[6](89-91)}《上海孤儿》从多方面体现了石黑一雄看待事物的流散视角，反映了他流散的历史观。小说的背景上海租界，是多文化杂存、英日势力冲突的典型流散空间。小说人物班克斯、戴安娜以及山下哲都是旅居国外的流散人物。特别是通过生于上海租界、长于英国的主人公班克斯追寻民族“原罪”、解构“母

收稿日期：2015-09-10；修回日期：2015-10-28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石黑一雄小说的记忆叙事研究”（14A104）；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个人记忆与社会历史——石黑一雄小说的历史叙事研究”（CX2014B182）

作者简介：邓颖玲(1965-)，女，湖南醴陵人，文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叙事学；王飞(1983-)，男，河北张北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叙事学

亲”形象以及亲历日本侵华战争,石黑一雄表明了自己流散的历史观。流散的历史观,不以单一民族的意志来篡改、美化历史,而是透过人道主义精神,通过客观的叙述,为被压迫、被侵略民族的历史提供复现的途径。在《上海孤儿》中,作者表现了罕见的正视历史的勇气,不仅向人们揭示了英国向中国运送鸦片牟取暴利的历史,而且对日本的武力侵华行径进行了无情批判。

一、班克斯的“原罪”:英国对华鸦片贸易

在西方及日本学者普遍遗忘甚至歪曲历史的背景下,石黑一雄的《上海孤儿》对英、日帝国主义侵略历史的反思和批判显得弥足珍贵。《上海孤儿》讲述了侦探克里斯托夫·班克斯在“有可能吞噬整个文明世界的大漩涡中心”,试图解开历史谜案的离奇经历。^{[7](147)}男主人公班克斯的父亲是英国一家鸦片贸易公司的职员。9岁那年,他的父亲从家中消失。后来,他母亲也失踪。他被送回英国抚养,最终成了著名的大侦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揭开父母失踪之谜,班克斯回到了正遭受日本侵略的上海租界。上海这一流散空间重叠了他的记忆与现实,也成为他醒悟自己民族“原罪”的起点。

动身去上海之前的班克斯对鸦片贸易不明就里,他一直认为父母是反对英国在华鸦片贸易的斗士,所以一直以父母为“榜样”,“与罪恶作斗争”。下面是班克斯记忆中母亲因鸦片贸易而责骂公司卫生检查官的描述:

接下去母亲便开始滔滔不绝、语气激烈但又不失克制地指责起来。[……]正是因为整个英国[……]向中国大量进口印度鸦片,才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极度痛苦和堕落。[……]

“先生,你难道不觉得羞耻吗?身为一名基督教徒,身为一名大英帝国的臣民,一个做错事还能感到良心不安的人,为这样一个公司服务你不觉得羞愧吗?告诉我,靠这种充满罪恶的财富生存,你不觉得良心不安吗?”^{[7](56-57)}

在接下来的回忆中,班克斯却“不再有十分把握她是不是真的一字不差地对检察官说了那些话”^{[7](63)}。他认为可能自己“把她说那些话的时间、地点、人物整个记错了。换句话说,那些言辞针对的根本不是卫生检查官,而是父亲,并且是在另外一个早上”^{[7](64)}。显然,班克斯母亲激烈言辞所针对的对象不同,意义就会截然不同:若是针对卫生检查官,那么她则是在

公开场合批判鸦片贸易;若是针对父亲,那么不过只是私下的反对罢了。根据班克斯的叙述,针对卫生检查官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因为“在我看来,就算她情绪再激动,也该能想到这些话多么不合时宜,多么容易招来耻笑。我不相信妈妈会糊涂到这种地步”^{[7](64)}。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班克斯的模糊叙述正说明他批判鸦片贸易的观点不过是内心想法的投射,因为他们家“‘赖以生存’的公司竟专门经营十恶不赦的行当”,对他的心灵“是个十足的折磨”^{[7](64)}。

事实上,直到小说结尾处了解到事实真相之前,班克斯一直都是个主观性极强的人。从儿时开始便坚信父母是反对鸦片贸易的英雄,长大后重返战火频仍的上海依旧“刻舟求剑”般地坚信父母多年来一直被关押在以前的一所房子里,甚至将自己视为能够解决眼前这场世界大战危机的不二人选。透过自己模糊的主观叙述,班克斯将服役于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公司服役的父母摆在正义的一边。这样模棱两可、甚至时而颠倒是非的叙述,一方面为班克斯对故事(或者说历史)的主观性论断找到了开脱的理由,另一方面,这种似是而非的模糊叙述使文本产生了强烈的反讽意蕴,向读者表明了对鸦片贸易的尖锐批判。

小说中班克斯母亲对检查官或父亲的质问,“身为一名大英帝国的臣民,一个做错事还能感到良心不安的人,为这样一个公司服务你不觉得羞愧吗”^{[7](57)},不禁让人联想起班克斯在战场上对那位日本上校的质问。在小说结尾处,我们同班克斯一起从菲利普叔叔那里得知,班克斯在伦敦的地位和优裕生活源于鸦片贸易所得的“肮脏财富”^{[7](321)}。因此,班克斯母亲的质问“告诉我,靠这种充满罪恶的财富生存,你不觉得良心不安吗”^{[7](57)}同样也适用于班克斯自身,同样是对班克斯自己的辛辣反讽。班克斯在对往事模糊回忆的过程中,一直站在母亲一边。所以,正如上文论及的,母亲的话其实是班克斯自己的心声。在小说结尾处得知自己的“原罪”时,他批判的矛头最终指向了自己。其实,从隐喻意义上来讲,班克斯象征了整个大英帝国。正如班克斯受益于英国在华鸦片贸易,英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靠的也是对中国等众多国家的殖民、侵略以及鸦片贸易。透过班克斯探寻自己“原罪”的心路历程,读者领会了隐含作者的反讽用意,跟随作者一起重访了那段帝国主义罪恶的侵略历史。

但西方人却往往没有班克斯(或石黑一雄)的这种“原罪”意识,他们通常刻意遗忘甚至美化自己的侵略历史,正如小说中的大多数西方人一样。罗兰·巴尔特就曾指出,西方人习惯将中国人与吸食鸦片相联系^{[8](84)},将中国人视作“东亚病夫”。但他们却从不曾

扪心自问, 不曾追责自己。千万中国人成为“病夫”的根源不正是英国在华的鸦片贸易吗? 历史表明, 中国也正是由于深受鸦片的毒害, 才让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军有了可乘之机。正是英国在华的鸦片贸易及其对日本侵华所实施的绥靖政策, 将整个中华民族置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小说中班克斯对自己罪恶的反省, 实际上是对整个英国民族的批判。在上海租界这一流散空间内, 结合日本侵华战争的亲身经历, 班克斯追问了自己(象征意义上则是自己的民族)的历史“原罪”。从小说开始时表现出的主观模糊、不可靠的狭隘民族主义视角, 到结尾处渐变为流散的国际主义视角, 班克斯最终醒悟到了自己民族的“原罪”, 从而实现了精神上的成长。

二、戴安娜的遭遇: 上海外国租界的兴衰

从叙事空间来讲, 《上海孤儿》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英国的伦敦和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上海, 但小说主要的故事空间却是上海。这里的“上海”主要有两层涵义: 一是班克斯通过回忆描述的儿时生活的“国中之国”上海租界, 二是班克斯成年后为了寻母而重返的“孤岛”上海^{[9](27)}。从某种程度上讲, 我们可以将《上海孤儿》看作是一部上海租界的兴衰史。同时, 班克斯对上海租界的回忆与对母亲的回忆相互交织。上海是他的出生地、“母”国, 母亲失踪后班克斯便不得不被迫离开上海, 多年后为了寻找母亲他又只身重返上海。可以说, 对母亲的回忆就是对上海的回忆。母亲的人生际遇随着上海外国租界的兴衰或沉或浮, 或风光无限或流离失所。鉴于此, 母亲戴安娜的遭遇与上海外国租界的兴衰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因此也带有了象征色彩。

正如班克斯象征着英国对帝国主义“原罪”的主观歪曲和美化, 我们也可以说, 戴安娜的遭遇影射了英租界及英国势力由盛而衰的过程。最初, 戴安娜随同丈夫来到上海租界, 代表英国在华经营鸦片, 英国在华势力盛极一时; 之后她因丈夫失踪而被迫做了中国军阀的姨太太, 此时英国只能借助军阀之手进行鸦片贸易; 而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 她又跟随国民党流落重庆、转而被遣送香港, 最终导致精神崩溃, 此时英国势力完全退出中国。

从戴安娜的生命历程与地理位置的转变, 可以反观上海租界英国势力的衰落与日本势力的兴盛。纵观她的生命历程: 从贩卖鸦片到反对鸦片, 再到重新做了贩卖鸦片的同谋(军阀的姨太太); 纵观她的地理位

移轨迹: 从上海租界到战时陪都, 最终回归到英国殖民地香港。戴安娜轮回的命运暗示, 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历史密不可分。作为英国在华鸦片贸易公司的一员, 她始终逃脱不了自己的英国身份与罪恶历史。同时, 她的颠沛流离和精神失常也象征了英国在华势力的彻底衰落, 其中最直接的历史原因便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

从小说叙述层面上来讲, 戴安娜从未成为一个独立的角色。她一直存在于主人公班克斯的回忆里。小说对她的描述都是透过班克斯的主观叙述完成的。她的形象由班克斯回忆里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美最终转变为扭曲而痴呆的丑。这种美一丑的根本性转变所具有的象征意义, 我们可以从小说首尾两处班克斯对她的描写中窥见一斑:

在我整个成长过程中, 我一直以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认为妈妈很“美”。人们总是这么说她, 而在我看来, “美丽”不过是张贴在妈妈身上的标签[……]。如今每当我凝望她的相片[……] 我总会被她那种传统的、属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美所震撼。^{[7](53)}

她比我料想中瘦小得多, 两边肩膀弓得厉害。[……]她的脸皱纹虽不是很多, 但眼睛下面却又深深的两道眼袋, 仿佛刀刻一般。可能因为某种伤病, 她的脖子已经深陷入体内[……]。^{[7](277)}

说母亲有着“传统的、属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美, 表明母亲是英国的象征, 她的美正是班克斯对英国文化的期许。而小说结尾处“她比我料想中瘦小得多”则暗示着她并非班克斯回忆或者想象中那么伟大。班克斯对“母亲”形象的解构, 也即对英国文化的质疑。他从回忆返回现实, 寻到母亲的同时也发现了自己“原罪”的真相。母亲的“美”原来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自己能够独自解决大战危机的幻想, 也成了对自身的辛辣反讽。连自己的母亲都难以保护, 何谈拯救整个世界?

《上海孤儿》横跨的时段(除了1958年班克斯在香港与母亲最终见面之外)是20世纪初至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这个时段正上演着日本与英美激烈较量的历史。上海租界的兴起源自于英国为首的欧洲帝国主义的贸易侵略, 而它衰落于1937年日本的武力侵略。日本侵华战争使得上海租界成为一座“孤岛”。因此, 可以说, 日本的侵华战争直接改变了上海租界的命运, 也改变了戴安娜的命运, 导致二者的衰落。戴安娜后来之所以几易其主, 颠沛流离, 是因为作为个人, 她势必与英国的在华势力、与历史的洪流一起沉浮。她流离失所的直接原因正是日本对华侵略, 而她的大本营——英国在华鸦片贸易公司, 以及由英帝国始作俑的上海租界, 正是由日本侵华战争画上了一个

句号。因此,上海租界成了英、日帝国主义罪恶行径的交点,也成了批判两国帝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流散空间。

三、山下哲的忏悔:英国人眼中的日本侵华战争

《上海孤儿》有两大场景,前半部是静谧安逸的伦敦,后半部是战火频仍的上海。西方评论家们都把前半部视作现实主义,而把后半部看成与《无可慰藉》相似的超现实主义。笔者认为,小说后半部即使是班克斯的心理超现实主义想象,也是基于小说对日本侵华战争(更确切地说是淞沪战役)的现实主义描写。不管战场上的日本士兵是否是班克斯的儿时伙伴山下哲,小说对于他和班克斯一起经历的战争以及他对战争的忏悔都让读者身临其境并胆战心惊。

对于中日淞沪战役的惨状,小说通过英国人班克斯中立的流散视角这样描写到:

事实上,我常常感觉自己并非走在贫民区里,而是走在某个有无数房间的大厦废墟里。尽管如此,我还是会时时想到,脚下的碎片中不知埋藏了多少传家之宝,孩子的玩具,以及虽然简陋却备受家人珍爱的生活用品。每当这时,我内心便会顿然愤慨万端,越发气愤那些给无辜民众带来如此厄运的罪魁祸首。^{[7](220)}

这一段描述了正遭受战争摧残的上海,读起来令人震撼,激起读者对侵略者罪行的愤慨。被战火“夷为平地”的贫民窟其实点明了英、日帝国主义的双重罪恶:先是英国的贸易侵略造就了这些贫民窟;继而日本的武力侵略毁灭了这些贫民窟以及里面的无数生命。班克斯在这里还只看到了被毁的房屋,接下来的经历却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战争带给生命的残酷。在寻找他自认为关押父母的房子的路上,班克斯亲历了中、日两个士兵的死亡过程:

一阵沉默之后,一个奇怪的声音穿过重重围墙传到我们耳边。它先是悠长、无力,像荒野中野兽的嘶鸣,最终变成放声大哭。随即又转为尖叫抽泣。接着那位伤者开始喊叫什么,听起来和起先那位濒死的日军士兵一模一样。由于处在极度疲倦的状态中,我恍惚觉得肯定是同一个人。正想开口对哲说这个人真是倒霉透顶,却突然意识到那人说的是中文,而不是日语。想到这是两个不同的人令我不寒而栗。^{[7](235)}

“没有国别民族的差异”的“死前号啕”体现了

班克斯(和石黑一雄)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反映了他居于两个民族之间流散的双重视角。在他看来,侵华战争给中国和日本带来了同样的伤痛。不同的是,中国人民是受害者,而日本士兵却是咎由自取的侵略者。

亲历了残酷战争并身负重伤的山下哲在战役间隙和班克斯聊起了“恋旧”的话题。当听到班克斯说“人千万不可过于恋旧,老是怀念童年时光”的时候,山下哲反驳道:“能恋旧真好。它对我们非常重要。”“怀旧,意味着回忆过去。那个世界比我们长大面对的世界美好得多。回忆会促使我们向往美好世界重回身边。”^{[7](240)}他还请班克斯帮忙转告他远在日本的儿子:“告诉他,我为国身亡。告诉他,好好对待妈妈。捍卫,创造一个美好的人间。”^{[7](239)}在这里,山下哲在这里所说的恋旧其实不仅仅是回忆童年,而是要回忆“过去”。从个人角度来讲,过去是记忆,而从社会层面来讲,过去是历史,历史就是通过每个人的记忆得以保存的。让儿子记住父亲是“为国身亡”,或许不是将自己视为民族英雄,而是要儿子记住,侵华战争是整个日本民族对中国犯下的罪行。记住惨痛的历史,目的在于憧憬美好的未来,而这也正是山下哲对儿子“捍卫,创造一个美好人间”的殷切期望。通过同样是流散人物的山下哲的反思,小说不仅从历史角度描述了当时的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从现实角度警醒人们不要遗忘已成过去的历史,只有记住历史才有美好的未来。正如日本东亚历史文化学会会长长瀬厚所言,“妨碍[中日]两国人民自由沟通的最大问题还是历史问题。”^{[10](35)}而作为“步入了现代国家的日本,应该对这场战争不断地进行检讨和反思”^{[10](10-11)}。其实,对于帝国主义侵略历史,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作为侵略和被侵略双方的日本和中国的民族主义反思,更需要《上海孤儿》这样流散、客观的人道主义反思。

四、结语

《上海孤儿》带我们重访了1937年正遭受英国鸦片贸易和日本侵华战争双重侵略的中国。作为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透过自己独特的流散视角,选择从既是中心又是边缘的相对位置上对帝国历史进行审视和批判,揭露了英、日帝国主义相似的侵华罪行。历史表明,英、日对中国不同方式的侵略,不仅相互抗衡,而且相互纠缠、并形成因果联系:由英国牵头霸占的上海外国租界与英国在华的鸦片贸易紧密相关,而上海租界的兴衰则体现了英、日帝国主义在华势力

的强弱对比。小说中的人物(班克斯、戴安娜以及山下哲)一方面是历史潮流中的个体,透过个人视角回溯社会历史,但另一方面却都带有象征色彩:通过渐渐接近鸦片贸易真相,流散人物班克斯揭开了一直被英国学者掩藏的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原罪”;戴安娜的命运则与上海租界这一流散空间密切相关,她的遭遇反映了英、日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较量以及英国势力的衰落过程;山下哲对于历史重要性的强调,从反省日本侵华罪行上升到了流散的人道主义高度。另外,同石黑一雄一样,班克斯和山下哲都有生在上海、长在各自国度的流散经历,他们对两种文化既熟悉又疏离,正是这一有利视角让他们能够更加公允客观地再现、反思被遗忘和歪曲的历史。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映射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曾经有过的辉煌与苦难、荣耀与耻辱、成功与失败。反思和批判历史的目的在于教人以史为鉴。正如西班牙小说家乔治·桑塔亚纳所言,忘记过去就注定会重蹈覆辙^{[11][21]};不尊重历史或歪曲历史,必将遭到历史审判和淘汰。

注释:

- ① Diaspora 一词有流散、离散、散居等多种译法。童明教授新译“飞散”,因为他认为其他译法只传达了该词社会学、人类学范畴中的涵义,而飞散却能兼顾 diaspora 一词社会学派与文学文化学派的双重涵义,“唤醒词源的寓意,符合重构的新意,又可借比喻和犹太历史经验保持关联”(2007: 91)。本文选择了“流散”这一更为学界熟知的译法。

- ② 陶菊隐认为“孤岛”这个名称很不恰当,因为租界的行政管理权握在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在内的列强手中,这个嵌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在中日战争时期成了一个“中立国”,但并不是中国人的“孤岛”(2005: 27)。

参考文献:

- [1] 钟志清. 寻觅旧事的石黑一雄[J]. 外国文学动态, 1994(3): 34-35.
- [2] 邱华栋. 石黑一雄: 寻觅旧事的圣手[J]. 文学月刊, 2009(9): 92-97.
- [3] King, Bruc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nglish literatur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 [4] Oe, Kenzaburo, Kazuo Ishiguro. The Novelist in Today's World: A Conversation [C]// Brian W. Shaffer and Cynthia F. Wong (eds). Conversations with Kazuo Ishiguro.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8: 52-65.
- [5] Swift, Graham, Kazuo Ishiguro. Shorts: Kazuo Ishiguro [C]// Brian W. Shaffer and Cynthia F. Wong (eds). Conversations with Kazuo Ishiguro.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8: 35-41.
- [6] 童明. 飞散的文化 and 文学[J]. 外国文学, 2007(1): 89-99.
- [7] 石黑一雄. 上海孤儿[M]. 陈小慰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 [8] Sim, Wai-chew. Globalization and dislocation in the novels of kazuo ishiguro. university of warwick [D].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2002.
- [9] Barthes, Roland. Mythologies [M]. Trans. by Annette Lavers St Albans: Paladin, 1973.
- [10] 陶菊隐. 大上海的孤岛岁月[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11] 颜继厚. 何谓中日战争[M]. 申荷丽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through a diasporic perspective: Double exposure of British and Japanese imperialist invasion into China in *When We Were Orphans*

DENG Yingling, WANG Fei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Abstract: *When We Were Orphans*, the representative novel of the contemporary Japanese-born British writer Kazuo Ishiguro, is set in the Shanghai foreign settlements where the imperialist Britain and Japan met. Through a diasporic perspective, the novel reconstructs the 1930s China under the double invasion of British opium trade and Japanese military aggression.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are individuals involved in the historical events with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Based on a close-reading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novel, this essay analyzes the personal stories of Banks, Diana and Akira with the conclusion that, from the characters' relative positions of being the center as well as the marginal, the novel reproduces the colonization history of China repressed by western scholars and criticizes the UK and Japan's evil invasion of China.

Key Words: Kazuo Ishiguro; *When We Were Orphans*; diasporic perspective; opium trade; invasion of China;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编辑: 胡兴华]

Huang, Zhonglian et al. (2019). *Fanyi Fangfalun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Revised Edition).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pp. XIV+302, RMB 63. ISBN 978 7567585027.

Comparative Stylistics of French and English: A Methodology for Translation has enjoyed popularity “in large measure due to its clear presentation and generous exemplification of a succession of methods of translation” (Vinay and Darbelnet 1995: viii). However, fundamental concepts such a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ranslation methods, translation procedures and translation techniques are still debated among translation scholar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China has witnessed systematic studies on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a pioneer instance of which is *Fanyi Fangfalun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henceforth *TM1*) by Zhonglian Huang et al. (2009). This is Huang’s perseverant exploration of translation ontology and methodology after a constellation of publications.

TM1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of translation professionals, researchers and students. So far, it has received four book reviews and 3987 article citations in the database of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China’s most comprehensive gateway of knowledge. It also won the 3rd prize of the 6th National Excellent Academic Achievement Award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y China’s Ministry of Education.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authors revised the book in 2019 (henceforth *TM2*) so as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its advantages and keep pace with the recent trend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TM2 consists of four parts and six chapters. The introduction in Part I, “Outline”, contains an insightful clarification of the concepts of method, methodology and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and distinguishes between Complete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Variation in terms of behavior, purpose and result of translating.

Chapter 1 in Part II, entitled “Translation Law”, argues that similarity rather than equivalence exists between source texts (ST) and target texts (TT), especially between unrelated languages like English and Chinese. Complete Translation aims to achieve maximum similarity between an ST and a TT in meaning, form and style, whereas Translation Variation aims to achieve a TT’s “three particular effects” as another kind of similarity, i.e. to meet a particular readership’s particular needs under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Chapters 2 and 3 constitute Part III, entitled “Complete Translation”. Chapter 2 expounds three aspects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transformation, sublimation (quantitative change of ST), and strategies. Chapter 3 establishes a methodology for Complete Translation as a hierarchical system of four levels: a category (Complete Translation), two strategies (literal vs. free translation), seven methods (correspondence, addition, omission,

transposition, conversion, division and combination) and 30 techniques which are applicable to different linguistic units and/or varied expression modes.

Chapters 4 and 5 constitute Part IV, entitled "Translation Variation". Chapter 4 addresses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ation Variation: extraction, accommodation (qualitative change of ST) and strategies. Similarly to Chapter 3, Chapter 5 formulates a methodology for Translation Variation as a hierarchical system of four levels: a category (Translation Variation), one or two strategies (accommodation with or without a strategy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12 methods (selective translation, transediting, translated narration, condensed translation, summarised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plus review, translation plus comment, translation plus writing, explanatory translation, reference translation, and imitated translation), and 59 techniques applicable to specific situations for specific purposes.

TM2's first striking feature is its exhaustive study on translation proper. It combines interdisciplinary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by drawing on the quintessenc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ical outlooks on accommodation and sublimation as well as definitions and categorisations in the Western systemic argumentation. It also draws from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linguistics, aesthetics, cognitive science, cultural studies and studi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doing so, it reexamine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divides translation into two categories with new definitions, and establishes a binary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by applying "a clause-pivoted approach to Chinese grammar", "a clause-pivoted approach to Complete Translation" and "a sentence-group-pivoted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Variation".

Secondly, *TM2* differs from *TM1* in its distinct logical thinking. *TM2* generally follows the research process from translation outlook to translation law and to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and from the general to the specific. Part I explores the three core concepts and proposes a dialec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outlook and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thus paving the way for subsequent analysis and inquiry in the book.

Thirdly, *TM2* outshines *TM1* in its improved content. For instance, besides redefining three core concepts, Chapter 2 renames two methods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techniques. Also, Chapter 3 rearranges and discusses the seven methods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and similarly, in Chapter 5, the 12 methods of Variation Translation are revisited and rearranged.

Last but not least,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M2* is its target group. Based on readers' feedback and the authors' own reflections, the revision is intended firstly for translation practitioners with guiding principles and systematic

methods, and secondly for translation researchers, e.g. with examples for translation criticism.

However, *TM2* also has room for improvement. A clarification of the grey areas between Complete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Variation may help readers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t methods. Furthermore, the authors may conduct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to demonstrate how often the seven methods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are used in English-Chinese and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respectively, since they are dependent on language pair and translation direction.

In sum, *TM2* is an integration of practical guidance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and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proposed in the book will be useful to countless translation practitioners and researchers. It will also enjoy continued popularity for its considerable applicability, symmetrical layout, succinct clarity and forceful exemplification of a systematic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References

- **Huang, Zhonglian et al.** (2009). *Fanyi Fangfalun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Vinay, Jean-Paul and Jean Darbelnet** (1995). *Comparative Stylistics of French and English: A Methodology for Translatio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uan C. Sager and Marie-Josée Hamel.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Acknowledgements

The research was supported by the major program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Grant No. 19AWW003).

Chengfa Yu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chengfayu@hunnu.edu.cn



4.2.7 余承法. Book Review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Global News: What Sarkozy Said in the Suburb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1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SSN: (Print) (Online)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tandfonline.com/loi/rajc20>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global news: what Sarkozy said in the suburbs

by Claire Scammell,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98 pp., \$54.99 (hardcover), ISBN-13: 978-3-31974-023-2, ISBN-10: 3319740237

Chengfa Yu & Ziqi Liu

To cite this article: Chengfa Yu & Ziqi Liu (2021):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global news: what Sarkozy said in the suburb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DOI: [10.1080/01292986.2021.1991405](https://doi.org/10.1080/01292986.2021.1991405)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1080/01292986.2021.1991405>



Published online: 21 Oct 2021.



Submit your article to this journal 



View related articles 



View Crossmark data 

BOOK REVIEW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global news: what Sarkozy said in the suburbs, by Claire Scammell,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98 pp., \$54.99 (hardcover), ISBN-13: 978-3-31974-023-2, ISBN-10: 3319740237

As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news gathering and disseminating, news translation has been a popular trend and journalistic translation research (JTR) a heated interdisciplinary topic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which share common interest in the process and product (Valdeón, 2015). Holland (2013: 335) argues that Venuti's proposal of domestication does not make sense in the case of news translation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target text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that any source news text undergoes when rendered into another language. In this context, Claire Scammell'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Global News: What Sarkozy Said in the Suburbs* explores the potential for introducing 'a degree of foreignization' as an ethical, yet practical alternative to the current domestication norm in translating global news. It will capture readers from a myriad of areas in making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into translation strategies employed by journalists to report foreign news events to the home audience, which will be justified in Valdeón's (2020) claim that together with the exponential growth of the publications by European researchers, authors from North America, South Africa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ave also contributed substantially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books in Palgrave Studies in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Series 'examine the crucial role whic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in their myriad forms play at all levels of communication in today's world,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Scammell, 2018, p. i). To fulfil this goa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Global News* aims to: (1) highlight the responsibility of global news agencies as authors of widely-reproduced translations; (2) examine ways in which the journalistic ideals of accuracy and objectivity can be compromised by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3) illustrate how culture-specific meaning may be lost when foreign cultural concepts and quotations are domesticated; (4) explore the potential for introducing 'a degree of foreignization' as a fresh strategy to facilitat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mong Asian communities, Europeans, peopl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even among a wide international audience; and (5) propose for *The Reuters Handbook of Journalism*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Handbook*) a set of five updates that helps journalists to counter accuracy issues of translating reported speech and increases readers'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source news. As Scammell (2018, p. v) puts it in the preface, 'the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of this book will appeal to a broad range of readers, in particular scholars and students in the fields of translation, media, culture and journalism studies.'

The book under review is composed of 8 chapters. Chapter 1 introduces the case study – what Sarkozy said in the suburbs in 2005 and how his comments were reported in the British press and Reuters in particular, and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discourses in the following chapters. Beginning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everal key French words, the author highlights the impact of translation process on the accurate conveyance of the source news quotations and the target readers' interpretations of foreign news events. On the basis of Venuti's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she proposes 'a degree of foreignization' as an ethical, yet practical alternative to the current domestication norm conducted by the Reuters news agency.

Chapter 2 investigates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Big Three’ global news agencies – Reuters, Agence France-Presse and Associated Press – as providers and translators of foreign news information. By constructing a case-study corpus of Reuters news reports Sarkozy’s speeches concerning crime policies, security, and thugocracy, the author discusses and evidences the three major factors affecting the widespread reproduction of news content: ready-to-publish nature of agency content, a lack of original foreign reporting and news aggregators republishing agency content for a growing online audience. She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and advantage of the value attached to quotations in agency news reports; that is, news is what is said by someone, as the agencies translate it, because quotations in foreign news reports are usually translations written by news agencies.

Chapter 3 argues that news translation practices have challenged the traditional notion of ‘translation,’ since such terms as ‘transporting,’ ‘translating,’ ‘transposing/transediting’ and ‘transmitting’ are interchangeable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or media studies (Baumann, Gillespie & Sreberny, 2011). Scammell points out that the involvement of translation in news-writing is ‘relatively limited and localized to parts of a news report where the journalist needs to translate foreign language’ (Scammell, 2018, p. 22), because translation occurs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journalist’s newswriting task, ‘a complex, integrated combination of information gathering, translating, selecting, reinterpreting, contextualizing and editing’ (van Doorslaer, 2010, p. 181). After a review of researchers’ criticisms of Venuti’s advocacy for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nd some guidelines in *Handbook*, she illustrates the possibility and importance of adopting ‘a degree of foreignization’ as an alternative to domestication norm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news translation.

Chapter 4 focuses on quotations and culture-specific concepts as two key sites in the translation of global news and analyzes how translation process undermines the accuracy and objectivity of reporting quotations. She expounds the function of journalist and translator as a double cultural mediator in news translation, especially his/her important role in finding methods for home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foreign realities. She shows that domestication norm as a translation strategy is problematic because it obscures the voice and role journalist as translator, limits the audience’s re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major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deprives them of access to foreign culture. This chapter also describes news case study, research methods and construction of Reuter’s news reports corpus with an aim at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for ‘a degree of foreignization’ as an ethical yet viable alternative to domestication norm.

Chapter 5, focusing on the definition and use of ‘strategy’ within translation studies, sets out the book’s focus on the loca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translating foreign quotations and culture-specific concepts so as to reflect the localize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volved in Reuter’s global news reporting. The author reviews two common research methods regarding new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 traditional text-based method (comparison between source text and target text) and a currently prevailing empirical method (asking the translator to talk through his/her decision-making while translating a text, such as Think-aloud Protocol). By borrowing Pedersen’s taxonomy of strategies for rendering culture, she suggests three models for strategies utilized in Reuter’s corpus: a model for looking at cultural-specificity, a model for assessing degrees of domestication or foreignization, and a model considering constraints.

By adopting Pedersen’s ‘Venutian scale’ and conduct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Chapter 6 examines current strategies and methods used to translate French culture-specific concepts in the Reuters corpus: SL-oriented (foreignizing) strategies including retention, specification and direct translation, and TL-oriented (domesticating) strategies including generalization and substitution. The analysis finds a much higher incidence of domesticating strategy,

which is attributed to the guidelines in *Handbook* in which journalists are instructed to translate quotes in an idiomatic way in general and try to avoid using foreign language. Therefore, some updates in *Handbook* are likely to be an impetus for Reuters to introduce ‘a degree of foreignization’ in translating quotations and culture-specific concepts and increase potentials for translation as a tool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global news.

In Chapter 7, the author proposes five updates for *Handbook*: (1) reten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culture-specific concepts; (2) reten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quotations; (3) paraphrase for accuracy in translated quotations; (4) showing deletions in translated direct quotations; and (5) signalling the foreign context of quotations. All updates aim to foreignize Reuter’s overall translation principles so as to increase readers’ contact with the foreign source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help journalists to counter accuracy issues when translating reported speech, with Update 1 related to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e-specific concepts and Updates 2-5 as individual ones to the translation of quotations. These five updates are discussed with underlying mechanisms and examples of the impact on Reuters newswriting.

Chapter 8 summarizes the main findings on current translation practices in global news and proposes the foreignized approach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current domestication norm. It also highlights the book’s contribution as an initial exploration of the scope for foreignizing new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points to implications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s in relevant fields.

The book is worth reviewing and reading. First, it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two much-discusse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field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edia studies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challenges the time-honoured conclusion in the new translation literature regarding the non-relevance of foreignization in the global news reporting. Second, it is well organized and logically connected between and within chapters. It takes the case study of the Reuter’s news report on ‘what Sarkozy said in the suburbs’ throughout the volume and centers on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with the preceding chapter foreshadowing the following on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it is the author’s organic integration of her experienced practice in translating and editing and years of deep reflection of theoretical translation issues, which enables her to draw innovative and tenable conclusions like proposal of ‘a degree of foreignization’ rather than ‘absolute foreignization.’

However, some demerits deserve mention. For one thing, JTS in the book, although coupled with a corpus-based method, is mainly conducted in discourse analysis and linguistic approaches (Valdeón, 2020). For another, the book emphasizes foreign-language quotations and culture-specific concepts as the two key sites of news translation, which limits the scope of research and lacks in multi-dimensional insights into the observation of translating and newswriting in the context of this continually developing digital news landscape. Besides, the author obscur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ch translation terms as ‘approach,’ ‘strategy,’ and ‘method.’ For instance, she uses ‘a foreignized approach’ (which is usually related to research, similar to ‘methodology’) 37 times, ‘foreignizing strategy’ (a commonly accepted expression) 7 times, and regards retention, specification and direct translation as ‘SL-oriented (foreignizing) strategies’ (which might be changed into ‘methods’).

All in all, this book is one of the most comprehensive dialectic investigations of domesticating and foreignizing strategies translating global news. Since JTS has gone truly global, from Canada to China, from the US to the Arab world, from Finland to Spain (Valdeón, 2020) and beyond translation studies to communications, media studies, and globalization studies, the book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to scholars and researchers in the above academic fields, as well as journalists, editors, translators and those who show interest in translating, news reporting, editing and transmiss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No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was reported by the author(s).

Funding

The research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Office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of China (Grant No. 19AWW003).

References

- Baumann, G., Gillespie, M., & Sreberny, A. (2011). Transcultural journalism: Translations, transmiss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Journalism*, 12(2), 235–238. doi:[10.1177/1464884910388588](https://doi.org/10.1177/1464884910388588)
- Holland, R. (2013). News translation. In C. Millán-Varela & F. Bartrina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pp. 332–346). London: Routledge.
- Valdeón, R. A. (2015). Fifteen years of journalistic translation research and more. *Perspectives*, 23(4), 634–662. doi:[10.1080/0907676X.2015.1057187](https://doi.org/10.1080/0907676X.2015.1057187)
- Valdeón, R. A. (2020). Journalistic translation research goes global: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five years on. *Perspectives*, 28(3), 325–338. doi:[10.1080/0907676X.2020.1723273](https://doi.org/10.1080/0907676X.2020.1723273)
- van Doorslaer, L. (2010). Journalism and translation. In L. van Doorslaer & Y. Gambier (Eds.),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pp. 180–18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Chengfa Yu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China
 chengfayu@hunnu.edu.cn

Ziqi Liu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China

© 2021 Chengfa Yu
<https://doi.org/10.1080/01292986.2021.1991405>



4.2.8 余承法. Book Review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of Management Philosophy in Asian Compan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0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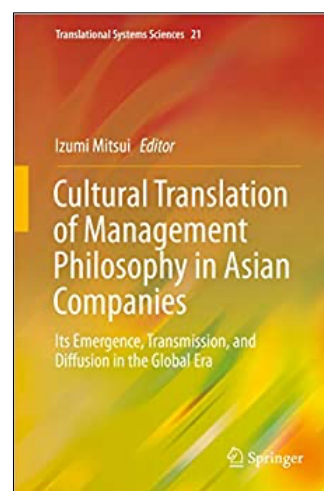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4(2020), Book Review 2659–2662

1932–8036/2020BKR0009

Izumi Mitsui (Ed.), **Cultural Translation of Management Philosophy in Asian Companies: Its Emergence, Transmission, and Diffusion in the Global Era**,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2020, 155 pp., \$78.65 (hardcover).

Reviewed by
Chengfa Yu¹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s an important theme that has drawn wide attention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the era of increasing globalization, digitalized society, and deteriorating environment. Linguistic barriers and cultural conflicts also arise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a company's domestic headquarters and overseas subsidiaries that have 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Against this backdrop,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business ethics has been a prevailing topic (Mitsui, 2013; Nakamaki Hioki, Mitsui, & Takeuchi, 2016, Nakamaki, Hioki, Sumihara, & Mitsui, 2019). **Cultural Translation of Management Philosophy in Asian Companies: Its Emergence, Transmission, and Diffusion in the Global Era** is a timely investigation of the dynamic process of global transmission of management philosophy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ommunication studies, behavior studies, sociolog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volume consists of nine chapters, or nine papers by 12 Japanese researchers. Chapter 1 proposes a conceptual/analytic framework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lay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subsequent discussion in the rest of the book. Editor Izumi Mitsui holds that “cultural translation” is not simply a transfer of language but also is part of the “language—recognition—action triangle” (p. 3) and that “management philosophy” is a spatial-and-temporal diffusion of the actual condition of the philosophy, including its generation, continuation in a temporal fashion, and transmission in a spatial way (p. 5). There are two methods in the translational process of culture: translation (practical cognition or cognitive practice) and displacement (practical action) (p. 3). The transmission of Panasonic’s management philosophy in its overseas expansion is a process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the interfacing of different cultures, which in turn leads to the creation of a new culture.

Chapters 2, 5, and 6 focu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management philosophy of four Japanese companies. Chapter 2 examines the efforts and translations involved in transmitting the management philosophy of Honda Motor Co., Ltd. based o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Honda maintains the core of its management philosophy with partial revision and modification so as to adapt to the overseas expansion. It propagates and practices management philosophy through education, training, and personnel

¹ This research is supported by th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Fund of Hunan Province, China (Grant No. 18YBA291) and the Think Tank Projec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Fund of Hunan Province, China (Grant No. 19ZWB54).

evaluation so that the transference of management philosophy enables employees to realize the corporate dream. Chapter 5 conducts four case studies 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spatched managers and local employees in Japanese companies. Due to educational peculiarities, young Chinese employees, unlike their middle-aged colleagues, are not affected by the inertia of the former system and accept without resistance Matsushita Electric Industrial's management philosophy. The process of transmitting management philosophy includes not only the manifest function and instruction of local employees but also the latent function--the growth of dispatched managers as international citizens with a broad perspective.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Yakult Group, chapter 6 describes Yakult Lady's evolution from simply selling products to embodying the foundation of corporate philosophy with its overseas expansion. Besides Yakult Group's company philosophy, other ideas like "popularization" and "delivery" are communicated and cherished among those engaged in the Yakult business. In the Yakult Lady Dealer System, a unique sales method deployed by the group, Yakult Lady's role varies with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situation in each country, so sales companies need to appoint those ladies as regular employees on a consignment sale contract.

Chapters 3 and 7 explore the creation of corporate philosophy in a transitional period. Rakuten, a Japanese e-commerce company, regards "Five Principles for Success" as a code of conduct for employees in 1999, defines "Brand Concepts" in 2006, and establishes "Rakuten Basic Principles" in 2008 (p. 36). Rakuten changes the sense of time and emphasizes "Speed!! Speed!! Speed!!" as one of its Five Principles for Success. With its new goals of English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t gradually bases its corporate philosophy on its mission, practices, and two core values of "empowerment" and "merchant first," present through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ompany. Ningbo Fotile Group, a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develops its Confucianism-based management philosophy during China's shift from a high-growth economy to a low-growth one. After several ups and downs, Fotile stipulates its management philosophy, composed of mission ("to make our home better"), vision ("to be a world-class company respected by everyone"), and core value (*sanpinheyi*, namely,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characters: character of the people, character of the company, and character of products; pp. 113–115). It practices its management philosophy by having built Confucius Hall and encouraging employees to read Confucian classics. As a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family businesses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 of "structural weakness," Fotile attempts to control its excessive pursuit of profits, foster a cooperation-like sense of unity, and fulfill its CSR.

Chapters 4, 8, and 9 expound the penetration of management philosophy into three Asian companies' overseas branches against changing contexts. In chapter 4, Olympus Corporation is proved to be an excellent example of the book's main focus—"cultural translation of the management philosophy." Olympus's corporate philosophy is not regarded as unchangeable and continuous but regularly reviewed in the context of company growth. The evolution of the corporate philosophy is related to and forms the foundation of the five significant stages of the 100-year-old company. Chapter 8 investigates Samsung's management philosophy of "contribution,"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pursuit of rationality" (p. 126) as well as its core values of five elements: people, excellence, change, integrity, and coprosperity (p. 129).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penetrating and diffusing Samsung's management philosophy is based on the administrators' "message-driven management," suggestive parables, and impressive performances and the employees' correct understanding and flexible application of the messages to their everyday work. Chapter 9 explor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LG Electronics' management philosophy centering on "value

creation for customers” and “human-centered management.” LG’s management strategy after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undergoes a shift to its global strategy, a shift to a high value-added strategy, and a shift from a strategy of business expansion to that of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The book is characterized by four remarkable features. First, it adds a new frontier chapter to *Springer Nature’s Translational Systems Sciences Series* by providing a conceptual/analytic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21st-century socioeconomic systems in translational, transitional, and transdisciplinary contexts. Second, it is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academia and industry. The volume is the aggregation of intercultural participants’ wisdom, as researchers, practitioners, company leaders from Japan, South Korea, and China have joined rounds of in-depth discussions on CSR as a small step towar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oncerted efforts in the global era. Third, it is a typical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because the team is made up of 12 researchers from a wide scope of subject areas like management studies,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and the nine chapters study the emergence, transmission, and diffusion of Asian companies’ management philosophies from various academic aspects. Finally, the research is conducted by multiple methods. By applying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business philosophy, the nine chapters adopt such methods as literature review, diachronic analysis, interview, field research,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However, the book has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layout, it would be better organized if arranged in the order of introduction (chapter 1), emergency (chapters 3 and 7), transmission (chapters 2, 5 and 6), and diffusion of management philosophy (chapters 4, 8 and 9) rather than in the order of Japanese, South Korean, and Chinese companies. Furthermore, the volume would form an echo with chapter 1 if a concluding chapter were added to summarize common principles and successful strategies of transmitting and diffusing management philosophies based o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between the 15 case studies. In terms of research subject and object, it is necessary to interview more people and conduct more surveys, for example, in the case of the study on Yakult Lady in chapter 6 so as to further the general applicability and repetition of those findings. In terms of key concepts, “cultural translation,” “management philosophy,” and “company/corporate philosophy” need a stricter definition and clearer differentiation.

All in all, the volume is one of the most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s of the emergence, transmission, and diffusion of management philosophy of global companies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It is theoretically significant for researchers and students in management studies, anthropology, translation studies, etc., and practically valuable for entrepreneurs,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in global companies as well as bicultural and multicultural people engaged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ferences

- Mitsui, I. (Ed.). (2013). *Asia kigyō no keieirinen: Seisei Dempa Keisyō no Dynamism* [Management philosophies of Asian companies: Dynamism of their creation, propagation and succession]. Tokyo, Japan: Bunshindo.
- Nakamaki, H., Hioki, K., Mitsui, I., & Takeuchi, Y. (Eds.). (2016). *Enterprise as an instrument of civilization: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business approach*.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 Nakamaki, H., Hioki, K., Sumihara, N., & Mitsui, I. (Eds.). (2019). *Enterprise as a carrier of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译艺谱美曲，译论写华章 ——百岁翻译家许渊冲教授访谈录

余承法¹ 李亚舒² 许渊冲³

(1.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2. 中国科学院 国际合作局, 北京 100864;
3. 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许渊冲教授在访谈中回忆了自己的翻译人生和翻译艺术, 强调了翻译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 阐述了中国学派翻译理论的源流和内涵, 并展望了中华文化典籍外译和翻译人才培养的前景。其主要观点概述如下: ①文学翻译者需要夯实内功, 从学习、模仿、借鉴中体悟翻译艺术之美; ②翻译实践先于并高于翻译理论, 翻译理论应该来源并运用于翻译实践, 同时服务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 ③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可进一步概括为“美化之(艺术)”, 即“三美”本体论、“三化”方法论、“三之”目的论, 这是源于实践经验总结、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受益于先哲前贤的学术思想; ④典籍外译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程, 中国文化梦需要几代人接力完成, 外译理论和实践人才应该尽早培养, 形成梯队, 以便又好又多地为世界传达中华文化之美。

关键词: 许渊冲教授; 文学翻译; 译艺; 译论; 美化之艺术

Composing Beautiful Songs Through Translation Art and Writing Brilliant Chapters with Translation Thoughts: An Interview with Prof. Xu Yuanchong

YU Chengfa LI Yashu XU Yuanchong

Abstract: In the interview, Prof. Xu Yuanchong recalled his life as a translator and translation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海外‘钱学’文献系统整理、研究与开发”(19AWW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余承法, 男,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博导, 主要从事翻译学和翻译传播学研究。

李亚舒, 男, 中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协会副会长, 资深翻译家, 教授, 主要从事翻译学研究。

许渊冲, 男,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中国当代著名翻译家, 翻译理论家, 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scholar, emphasized the dialec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heory, reinterpreted the origin and connotation of his translation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posed his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foreign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and cultivation of capable translation practitioners and researchers. His major viewpoin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①Literary translators shoul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ranslation art and gain a deep insight into the beauty of translation by reading, comparing and imitating others' fine versions; ②Translation practice precedes and outweighs translation theory, with the latter derived from and applied to the former and at once serving the strategy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③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ory of the Chinese school, including triple beauty as ontology, triple transformation as methodology and triple ability as teleology, is originated from translation practice, rooted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influenced by the Chinese sages' academic thoughts; ④Foreign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as an arduous long-term project requires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generations of Chinese people, so it is urgent to cultivate translation practitioners and researchers as early as possible so as to disseminate the beautiful Chinese culture around the world better and faster.

Key words: Prof. Xu Yuanchong; literary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rt; translation theory; art of beauty; transformation and ability

[访谈者按语]许渊冲(1921.4.18—2021.6.17),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当代著名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从事翻译工作80余年,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出版中、英、法著作和译作160余部,发表文章160多篇。1999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2010年获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获国际译联“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2015年被评为“中华之光”年度人物。2020年7月4日,许老在家中欣然接受了笔者的访谈,回答了有关翻译艺术、翻译实践、翻译思想、翻译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问题。

余承法、李亚舒(以下简称“余、李”):许老,您好!非常感谢您拨冗接受我们的访谈!首先热烈祝贺您的新著《许渊冲西南联大日记》于年初出版!这是您百岁生日最有价值的献礼。您在1939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我过去喜欢一个人走自己的路,现在也喜欢一个人走自己的路,将来还要一个人走自己的路。”回望您的百年人生路,您最成功的选择是什么?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许渊冲(以下简称“许”):我这辈子最成功的选择就是结外语缘、做翻译梦。我自幼就喜欢历史故事和诗词歌赋,喜欢美的、不同寻常的事物。表叔熊式一的翻译成就彻底改变了我对英语学习的态度,并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初中时喜欢中国文学,后来背诵了很多英语名篇,这些为我的外语学习打下了坚实基础。我高中时喜爱鲁迅的杂文,相信他主张的“直译”。大学期间诸多良师益友对我的翻译和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吴宓、钱锺书两位先生在课堂上的理论讲解和译例分



析,让我豁然开朗。钱先生更是我的翻译恩师,多次跟我通信,交流文学翻译心得。抗战期间,我报名参军并担任翻译,在欢迎美国“飞虎队”的招待会上,将“三民主义”脱口译成“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第一次感受到沟通中西文化的喜悦,于是将外语学习的重心转向翻译。

我此生无憾!但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译作都是精华,也有平庸之作甚至糟粕。精华受到前人启发,可以传给后人,糟粕则需要大家批评和超越。我一直在努力超越自己,追求翻译艺术之妙,传播中华文化之美。

余、李:您公开发表的第一部译著是什么?您能谈谈相关情况吗?

许:我公开出版的第一部译著是1956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切为了爱情》,译自英国17世纪“桂冠诗人”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的经典剧作 *All for Love*。1951年,我从法国留学归来时,被分配到北外法文系任教。我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遭受批判,经过据理力争和停职反省,最后得到宽大处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膨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为了不荒废自己的英语能力,并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我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这个小剧本。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我被批判为思想“右倾”,译著也跟着受批。1994年,漓江出版社再版时,我将书名改为《埃及艳后》。将“all for love”直译为“一切为了爱情”也是可以的,但不够文气。书名副标题“the world well lost”的字面意思是“这个世界损失得很好”。若将“world”译成“世界”,则显得太重,而“江山”既指代国家,又有人情味、书卷气。将“lost”直译为“失去、丢失、牺牲”,都不可取,显得俗气。我后来意识到“殉”字能准确表达“为爱情而弃江山”的含义,容易让中国读者联想到“爱江山更爱美人”。因此,改译名《江山殉情》既能兼顾主副标题的含义,又能概述剧中安东尼(Antony)和克利奥佩屈拉(Cleopatra)的殉情故事,既富有韵味和余味,又体现文化品位。我由此感到:美的事物需要不断发现,妙的文字需要仔细体悟,翻译艺术永无止境。

余、李:您在2017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期《朗读者》中接受董卿采访时说道“如果我活到100岁,我计划把莎士比亚翻译完。”您也希望有人继续翻译莎士比亚并能超越您。请问您现在的翻译进展如何?您觉得何人具备何种素养才能完成这项艰巨任务?

许:我目前只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的一半。我每天都在坚持,但进度不快,无法实现百岁译完莎士比亚的梦想。我认为你们这些人,包括你们的学生、学生的学生,都可以接上这根翻译“棒”。年轻人有时间和精力,加上现在设备先进、资源丰富,应该比我们这代人翻译得更快、更好。翻译是吃力不讨好的苦差,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要坐得住冷板凳。翻译莎士比亚需要掌握扎实的中英文功底,全面了解英国的历史和文学知识,尤其需要了解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背景,准确分析剧中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查阅词典、上网搜索、机器翻译并非解决翻译问题的万能钥匙。总之,翻译莎士比亚需要有足够的精力、功力、智力和毅力。

平心而论,我翻译的莎士比亚有一个从不好到好、再到更好的过程,关键是要不停地理解和思考原文,不断地追求美妙的译文表达方式,就像刚才提到的《一切为了爱情》和《江山殉情》,通过比较可以辨识高下。翻译是如此,人生也是如此。人生如果只有美好,“美”就不那么“好”了。他人的作品在进步,我的翻译在慢慢进步,我们的人生也在慢慢进步,于是才有“日日是好日,夜夜是春宵”的佳句。

余、李:提到翻译艺术,我们惊叹于您的译果累累,受益于您的理论洞见。您的翻译实践和理论一直是双轨驱动、相得益彰。您在参与《上海科技翻译》2003年组织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讨论”中,认为“实践第一,理论第二”(许渊冲,2003),是否意味着“翻译实践高于翻译理论”?您现在如何重新认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您自己是如何处理翻译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的?

许:关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我仍然坚持“实践第一,理论第二”,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在时间上,先有实践,后有理论,理论是对实践的经验思考和理性提升;第二,在重要性上,实践高于理论,“在理论和实践有矛盾的时候,应该改变的是理论,而不是实践”,“理论要服从实践”(许渊冲,2003);第三,翻译理论应该是双向的,来源并适用于翻译实践。一个人没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不可能提出解决中外互译问题的理论。我翻译实践的数量和影响远远超过翻译论著。我的翻译之路是:实践—理论—再实践—完善理论—回到实践。具体说来,先领会原文之美,再创造译文之美,通过比较译文和原文,产生译感之美,悟出道理,将经验和体会上升为翻译理论,再用理论来检验翻译实践,在思考中借鉴他人理论,在实践中完善我的翻译理论,再次回到实践加以检验。我1956年公开发表译作,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发表论文,而且大多是反思和研究我和他人翻译的毛泽东诗词,包括讨论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等。经过较长时间的成果积累和经验总结,我开始思考“译文能否胜过原文”“如何发挥译文优势”等问题。我曾在《翻译的理论和实践》一文中借助毛泽东诗词翻译的不同版本,解释严复的“信、达、雅”,借助已有的翻译经验重新审视“形似”“意似”“神似”(许渊冲,1984)。我一直坚持实践先于理论,在实践中积累、反思,为我的经典名著翻译撰写了一些前言后语,逐渐形成了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当然,理论思考不能止步于翻译实践,尤其是在理论建构和学科建设方面,翻译理论还必须从哲学、文论、美学等学科中汲取养分,追求翻译理论的逻辑性、体系性、自洽性以及翻译现实的关怀。

余、李:您提出了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对于其中每个字的来源和界定,您给出了不同解释。“三美”“创造美”是本体论,“三化”“发挥优势”是方法论,“三之”“神似”是目的论,“艺术”“竞赛”是认识论;“信”是翻译的本体论,“达”是方法论,“雅/优”是目的论(许渊冲,1999);中国学派的译论来源于老子的“本体论”和孔子的“认识论”“方法论”和“目的论”(许渊冲,2012)。令人困惑的是:同一个翻译理论中怎么会出现多种来源和解释?它们



之间存在什么关联?您现在对这十字译论有新的解释吗?

许:我在不同场合对这十个字有不同表述,表明我对翻译艺术的认识有一个深化过程,这也是立足中国文化传统、总结前人理论提出来的。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我现在认为“美化之艺术”更重要,“创优似竞赛”内涵也包括在其中,因此我的翻译理论可进一步简化为“美化之”,这基本概括了我提出的翻译本体论、方法论和目的论。

“美”作为文学翻译的本体论,借自鲁迅“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鲁迅,2018:5-6)这启发我提出文学翻译的“三美论”:意美、音美和形美。我已有一些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但要强调一点,作为本体论的“三美”包含“三似”,这是我对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杨伯峻,1980:13)的理解和挪用,也是总结朱光潜和钱锺书的观点,“‘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朱光潜,2014:156);“盖艺之至者,从心所欲而不逾矩”(钱锺书,2001:197)。我将其运用于文学翻译,形成了中国学派文学翻译理论的依据“从心所欲”是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自由选择最好的译文表达方式,追求“美”的自由王国,着眼于积极方面。“不逾矩”指不违反翻译的客观规律,坚持“似”的原则,停留在艺术的必然王国,强调消极方面。译者要在“不逾矩”、不违背“求似”规律的前提下,尽量传达原文的“美”。“似”体现译文跟原文的关系,包括低级的“形似”、中级的“意似”、高级的“神似”;“美”表面看是指创造的译文之美,实则蕴含原文之美,分为意义之美、声音之美、形式之美,在翻译中的优先序列是依次递减。文学翻译虽然创造美,但我不主张牺牲原文内容,也不过分强调译文形式。原语和译语的表达方式并非完全相同,但传达的内容应该基本相同,至少需要做到“意似”、追求“意美”。“三美论”作为文学翻译的本体论,是将原语之美转化为译语之美,解决形似和神似的矛盾,亦即直译和意译的矛盾。总之,我基于鲁迅的“三美”,根据朱光潜和钱锺书解读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提出了“三美、三似补论”,或曰“新本体论”。

“美”需要借助具体手段、运用恰当方法加以实现,此为“三化”方法论。“化”源于钱锺书的“化境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漏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锺书,2002:77)他站在原语和译语的角度,提出了“欧化”和“汉化”,我进一步提出了“三化”:浅化、等化和深化。译文首先需要做到跟原文“等化”,如不“等化”,则会更优或更劣,不得已采取“浅化”,能做到“深化”当然是求之不得。如:

原文: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译文 A: Three blacksmiths equal Solomon.

译文 B: Three cobblers equal Zhuge Liang.

译文 C: 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mind.

译文 A 将中国读者熟知的“臭皮匠”和“诸葛亮”分别换成“blacksmiths”和“Solomon”,这是在力图扭转英语劣势,以方便英语读者理解和接受,却失去了汉语的特有意象,译文比原文差一点、隔一层,属于“浅化”;译文 B 保留了原文意象,采用“等化”争取译文跟原文的均势,却可能让英语读者不知所云、不明深意;译文 C 增加了背景信息“with their wits combined”和“the mastermind”,还形成了韵律和节奏,这是充分发挥译语优势采取的“深化”。我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基于钱先生的“化境”,将“化”明确为可操作的三级,认为“三化”应该力求“优化”。如果译文不仅似于原文,而且胜过原文,效果就会优于原文,跟原文“竞赛”,可谓“以创补失”。此为我的“三化补论”,或曰“新方法论”。

“之”来自孔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第十二章)。文学翻译至少需要让人“知之”,即译文忠实得使读者知道原文说了什么,进而令人“好之”,即译文通顺得使读者喜欢“说什么”,如使人“乐之”,即译文精彩得使读者对“说什么”和“怎么说”感到愉快,则进入最高境界。此为文学翻译目的论。将“三之”“三化”结合起来,即“浅化”是扭转译语劣势,可以使人“知之”,如上例中让英美人知道中国有类似“三个铁匠的智慧等于所罗门”的说法“等化”是争取译文跟原文的均势,可以使人“好之”,如例中增添英语中没有的“臭皮匠”“诸葛亮”,让英美读者喜欢这种说法“深化”是发挥译文优势,可以使人“乐之”,如例中再增添对“臭皮匠”和“诸葛亮”的相关解释,使英美读者乐于接受该新奇说法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这是我总结孔子言论提出的“三之论”,即文学翻译目的论。

余、李: 您多次深情回忆恩师钱锺书先生对您翻译人生的影响,谈及他赞赏您的诗歌翻译。您如何继承并超越他的译论和译艺?

许: 钱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终生的,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才智过人,妙语惊人,嘉勉后人。“才智过人”的经典例子是他对成语“吃一堑,长一智”的翻译“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音形义三美具备,真了不起! 当时,金岳霖实在想不出更好的译文,就去问钱先生,没想到钱先生脱口而出,折服了当场所有人。钱先生的这种博学睿智,跟他深厚的家学渊源、照相机式的记忆力、勤奋的读书笔记、不停的思考和领悟是分不开的。他除了急中生智、幽默风趣,还经常妙语如珠,真的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例如,他在课堂上讲到“skepticism”(怀疑主义)时,用简洁的英语解释“Everything is a question mark; nothing is a full stop”(一切都是问号,没有句点)。时任北大校长蒋梦麟将人分为三种类型“笑的”“愁的”“怒的”。钱先生就属于第一种,他经常原谅学生,主张“to understand all is to



pardon all”(理解就是谅解),不断勉励后学,对我而言,他是“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20世纪70年代,我拜读了钱先生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不太满意这种无韵译文,进行了重译,并请他斧正。他在给我的回信中称赞我的译文“戴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许渊冲,2017a)。他总体上认为“诗是不可译的”,但他对我译诗的肯定增添了我“以诗译诗”的信心,引导我理性思考如何才能既不得罪“诗”又不得罪“译”。20世纪80年代,我几次寄去新译请他指正,都收到了他的鼓励和赞誉。他评价我翻译的《苏东坡诗词》是“壮举盛事”,《唐诗一百五十首》《翻译的艺术》“二书如羽翼之相辅,星月之交辉。足征非知者不能行,非行者不能知;空谈理论与盲目实践,皆当废然自失矣”(许渊冲,2017a)。他阐述的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激发我深思,鼓励我继续从事翻译实践和研究。我在翻译唐诗宋词时,遇到疑惑就向他求教,他总是一语中的,让我茅塞顿开,既肯定我的妙译,也指出不足,如他认为我翻译的“春蚕到死丝方尽”是“不忠的美人”。我很满意自己用 lovesick 和 silk 来处理“丝”这个字的双关义。学生在老师面前不能过于谦虚,要有自信,要有敢于挑战的决心和勇气,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钱先生对我的《李白诗选》英译本和《唐宋词选一百首》法译本比较满意,开玩笑说“太白能通夷语……与君苟并世,必莫逆于心耳”,并戏称为“译才”“有双枪将、左右开弓手矣”(许渊冲,2017a)。这些溢美之词对我是勉励,也是鞭策,坚定了我走文学翻译之路的决心和信心。

余、李:您近年来发表的多篇论文紧随时代脉搏或针对译学热门话题,如:您论述“文学翻译对实现中国文化梦的重要性”(许渊冲,2014);您基于习近平总书记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中国文学翻译理论的“六性”,在论述翻译的矛盾论时认为“航行自由≠横行霸道”(许渊冲,2016);您通过具体的译例对比和有理有据的分析,批驳“中国经典外译只能靠汉学家”之类的说法(许渊冲,2017b)。请问您在90岁高龄如何做到不忘初心、与时俱进?

许:我其实刚才也提到过,翻译研究来源于并服务于翻译实践,既要学习继承先哲前贤的学术思想,又要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这样的翻译理论才有实际用处,才有针对性、时代感和生命力。我人老心不老,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每天花大约一个小时读报纸、看电视或听收音机,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国内外大事,尽可能跟上翻译界新动态。例如,有人在翻译“道可道,非常道”时,把“道”音译为“Tao/Dao”,但外国人无法“知之”,更不能“好之”“乐之”,而译成“truth”就易于理解。这句话也可用来解决当今世界的大问题。个别西方大国一直批评中国不民主,在新冠疫情爆发后不遗余力地批评中国政府的不作为、不民主。但现实是中国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基本上控制了疫情,而美国感染和死亡的人数居全球前列。试问它是如何在为人民服务?美国前总统林肯早就说过,民主政府是“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政府。“of the people”(民有),说明民主的性质,这是本体论,中国跟美国的国体不同,中国是真正属于人民的民主“by the people”(民治),说明民主的方式,这是方法论,由人民来治理国家,涉及选举制度和方式,中国有适合自己的国情和做法“for the people”(民享),说明民主的宗旨,这是目的论,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目的与方法之间,目的更重要,因为目的决定方法和手段。中国政府努力控制疫情、为人民治病,结果感染和死亡人数很少;西方某国政府不考虑为老百姓治病,而放任病情扩散,并且为了赢得选举,不惜一切代价转移国内矛盾并攻击中国。西方标榜得再多、再好也没有用,不仅要看现象,还要看结果、看本质。这时用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来批驳美国政府的错误言行,价值就非同一般。因此,翻译实践要关注现实,翻译研究要懂得实际需求;不然译文不能激起读者的共鸣,研究成果会落后于时代。

余、李:您刚才谈到的《道德经》翻译涉及中国典籍的外译传播问题。有人认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最好译介模式是“中西合璧”,如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作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您一直赞同徐志摩的观点:“中国诗只有中国人才能译好。”(许渊冲,2020-12-31)像您那样精通中外语言、能做好典籍外译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西方人一直不主张将母语译成外语,所以中国人的翻译作品在国外不受待见。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您认为中华文化应该怎样快速有效地走出去?

许:首先,外国人翻译的中国典籍作品不一定胜过中国人,有时根本不如中国人!他们翻译的唐诗、宋词、毛诗,不是理解错误,就是表达不准,传达不出原文之美。例如,毛泽东的“不爱红装爱武装”,美国文学教授兼翻译家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译成“(Daughters of China with a marvelous will,) you prefer hardy uniforms to colorful silk.”(Mao, 1972b: 97)。原诗中,“武装”是诗人赞美女民兵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和乐观精神,富有意美。“爱”和“不爱”有正反的意美、重复的音美、错落的形美。“红装”“武装”还有对仗的形美。这三种“美”在译文中消失殆尽,而且第三人称改成了第二人称,回翻成汉语就是“你们喜欢耐穿的制服胜过彩色的丝绸”,根本没有传达原诗中赞美的意义和口吻,只剩下干瘪瘪的陈述。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Hua-ling Nieh)及其丈夫、美国诗人保罗·恩格尔(Paul Engle)的“中西合璧”译文是“they like uniforms, not gay dresses”(Mao, 1972a: 82)。回翻成汉语是“她们喜欢制服,不喜欢花哨的衣服”。这是典型的形式对等,没有意美和音美,更难以传达诗人对女民兵的欣赏。我译成“they love 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她们爱面对硝烟,不爱涂脂抹粉),巧妙运用“face”和“powder”的双关义,通过换位形成一种俏皮的“回文”,兼具意美、音美和形美,远远胜过以上两个外国译文,也好于钱先生等人的集体译文“they love their battle array, not silks and satins”(Mao, 1976: 38),更是超越了原文。这个“超越原文”的大胆译法,在当时不但没有得到鼓励,反而受到批评。抚今追昔,通过比较,我坚信



自己的译文还是略胜一筹,这是我长期积淀、不断思考的结果。

西方人认为,译者应该始终将外语译成自己的母语,不能“反其道而行之”。这反映了他们的欧美中心主义和语言文化霸权主义,就像美国派飞机、军舰来南海就是“自由航行”,而我国的填海固岛工程就是“军事威胁”。部分中国人认为,只能靠汉学家从事中华文化典籍外译。这是盲目跟风、不自信的表现。大量的中译外实践表明,中国人采用优化译法创造的译作,不仅能够传达原文意义,还能基于原文创造意义,不仅能够达意,还能传情。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完全经得起考验,我们有文化自信的同时,还得练好中国语言文化的内功,读懂、吃透祖辈传承下来的经典,学习、模仿、借鉴我们已有的佳译精品,再将我们形成的翻译理论用来指导翻译实践。我在钱先生成绩的基础上前进,也希望大家在我的基础上再前进,就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将中华典籍一本一本地往外翻,一代一代地往下传。

余、李:2016年,山西大同大学成立了“许渊冲翻译与比较文化研究院”,以学术至尚、艺术至臻的理念,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旨,建立具有浓厚学术氛围的民间学术团体,确立如下目标:研究许渊冲先生的翻译思想,分享先生的丰富成果;提供创新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学习和交流平台;培养和指导优秀的翻译人才。四年来,研究院开展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活动。您对研究院的运行满意吗?您还有什么期许?

许:一些翻译同仁当初成立研究院时,我和夫人是大力支持的,因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关键在于创作和翻译更多优秀的作品,为翻译事业培养更多合格的人才。研究院围绕办院宗旨和目标,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开展了一系列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成功举办了三届“许渊冲翻译大赛”,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踊跃参加。我对此非常满意,也希望研究院越办越好,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我认为,除了在大学生中间开展翻译大赛之外,还可以让典籍外译走进大学课堂,让更多的年轻人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他们从事文化典籍外译的兴趣,让他们对中华文化及其典籍外译从“知之”到“好之”再到“乐之”。同时,也可以从中小学生抓起,培养他们从小阅读双语诗词的习惯,让全社会意识到文学翻译对实现中国文化梦的重要性。我们不但要继承前人的翻译理论,更要敢于突破和创新,这样才能培养更多优秀的中华文化外译实践和研究人才,为辉煌灿烂的世界文化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余、李:您历经坎坷,始终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白寿之年仍笔耕不辍,一直都在为挺起中国文化的脊梁而不懈努力,努力实现“把一个国家的美变成世界的美”的理想。您投身翻译事业的家国情怀、执着信念,以及为推动文学翻译发展和世界文化交流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激励学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我们想用一首小诗表达对您的崇高敬意“风范耀千秋,译艺传万代。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再次

祝您健康长寿、喜乐平安!

许: 谢谢《英语研究》编辑部! 谢谢你们! 祝你们再结学术硕果!

(本访谈系作者2020年7月4日在许老北大家中采访实录。以此纪念许老先生。)

参考文献

- [1] Mao, Tse-tung. The Poetry of Mao Tse-tung [M]. Hua-ling Nieh & Paul Engle (trans.). London: Wildwood House Ltd., 1972a.
- [2] Mao, Zedong. The Poems of Mao Zedong [M]. Translations,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Willis Barnstone.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b.
- [3] Mao, Tsetung. MAO TSETUNG POEM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6.
- [4] 鲁迅. 汉文学史纲要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
- [5] 钱锺书. 谈艺录(补订重排本, 上下卷)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 [6] 钱锺书. 七缀集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 [7] 许渊冲. 翻译的理论和实践 [J]. 中国翻译, 1984(11): 5-10.
- [8] 许渊冲. 译学要敢为天下先 [J]. 中国翻译, 1999(2): 4-9.
- [9] 许渊冲. 实践第一, 理论第二 [J]. 上海科技翻译, 2003(1): 2.
- [10] 许渊冲. 再谈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 [J]. 中国翻译, 2012(4): 83-90, 127.
- [11] 许渊冲. 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化梦 [J]. 中国外语, 2014(5): 1, 12-18.
- [12] 许渊冲. 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翻译理论 [J]. 中国翻译, 2016(5): 93-99.
- [13] 许渊冲. 钱锺书先生与我的信札掠影 [J]. 档案春秋, 2017a(12): 30-35.
- [14] 许渊冲. 中国经典外译只能靠汉学家吗? [J]. 国际汉学, 2017b(3): 2, 5-9.
- [15] 许渊冲. 翻译中国诗, 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翻得好? [EB/OL]. 观察者, [2020-12-31]. <http://www.zgshigt.com/c/2016-05-31/1305219.shtml>.
- [16] 杨伯峻, 译注. 论语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7] 朱光潜. 诗论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责任编辑: 郭建辉

感 官 与 审 美

审美的世界体验^①

[德]沃尔夫冈·韦尔施 著
余承法 译

“审美的世界体验”是一个很有挑战的题目,赋予审美行为比以往更多的赞誉。审美体验被认为不只是体验方式之一种——也因而与其他类型的体验一样有局限性:审美体验侧重于美和愉悦之类的特定审美价值,政治体验局限于权力和正义之类的问题,经济体验则关注金钱、财产、劳力等方面——相反,审美体验被认为超越了传统的审美领域,超越了上述局限,延伸到世界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能让整个世界焕然一新。简言之,审美体验可以发现世界,形成新的世界观,认识世界的未知的面向。

一、艺术打开了认识世界的视野

让我们先看几个例子,清楚地表明审美体验可以提供认识世界的新经验。

第一个例子是俄国至上主义艺术奠基人、几何抽象派画家卡西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 1878—1935)的经典作品《黑方块》,黑色方块画在灰色的石膏板上。这件作品给观众带来一种特殊的体验。众所周知,纯黑色(只要不被环境反射所掩盖)不会被看作是有色的表面,而是纯粹的深度。因此,当观众的眼睛集中在黑方块上,而且黑色被真正当作黑色时,观众的视线就会长久停留在表面上,就

^① 本文为德国耶拿大学哲学系教授沃尔夫冈·韦尔施在“中华美学的传承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华美学学会2017年年会外国美学圆桌会议上的主旨发言。诚挚感谢韦尔施教授的细心解答和高建平教授的慷慨指导!——译注(以下未标明的均为原注)

像通过一个正方形隧道,视线被快速引向无穷的远方。这的确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而是令人烦恼和可怕的,但它恰好传达了马列维奇想要让我们体验的东西:一个宇宙维度,不是按照星座(如大熊座、仙后座等)有序组织起来的普通意义上的星空,而是作为一个绝对的、黑暗无限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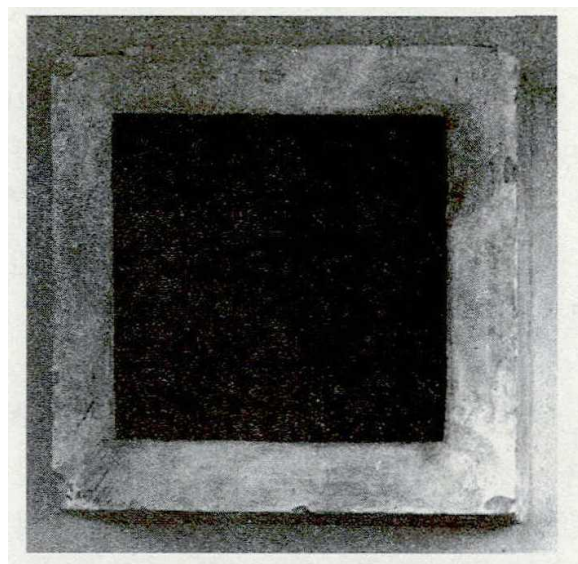


图1 卡西米尔·马列维奇：《黑方块》
(约 1923—1930)

这就是马列维奇借助他提倡的“至上主义”(suprematism)想要表达的意图。^① 他想将我们带进一些维度——既不能被人类标准预期,又不能缩小到人类的标尺的维度。他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这件作品——当然是人类创造的——只是一个场合,可以由此体验超越人类世界中的某种东西,一个更大的、非人类的世界。因此,他明确反对将这件作品(“图标”,icon)与实际的绘画(“图像”,picture)联系起来:“一个方块并不是一幅图像,就像开关和插座不是电流一样。将图标当作

① “我没有发明任何东西,只有我感受到的那个夜晚,在那里我看到了一种新东西,我称之为‘至上主义’的新东西。它通过黑色的表面显现出来,先形成一个正方形,然后形成一个圆形。”参见卡西米尔·马列维奇:《至上主义》(Suprematism),《欧洲年鉴》(Europa-Almanach)(Potsdam, 1925)。引自 Walter Hess: *Dokumente zum Verständnis der modernen Malerei*, Reinbek: Rowohlt, 1956, S. 98。——原注。中译本参见瓦尔特·赫斯:《欧洲现代画派画论(插图珍藏本)》,宗白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译注

图像是错误的,因为这是将开关和插座当作电流的再现。”^①马列维奇不希望这件作品被看作一种自足的图像,而是作为“电流的触发器”。正是基于此,他宣称:“我最终摧毁了图像,并且揭示了对世界的感觉。”^②

第二个例子是歌德提出的“通过艺术看世界”。他在《诗与真》(*Poetry and Truth*)中描述了艺术体验如何以一种不太惊奇的方式塑造我们的世界观。他在德累斯顿参观画廊时,欣赏了荷兰风俗画家阿德里安·范·奥斯塔德(Adriaen van Ostade, 1610—1685)的一幅绘画作品,然后回到他居住的鞋匠家里。他进入房子时,突然觉得自己看到了眼前有一张奥斯塔德画的照片,“太完美了,只能挂在画廊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意识到这种天赋的巨大价值,我后来用很大努力去实践这种天赋——用我刚刚特别关注的某位艺术家的眼睛来观看自然”。^③

也许大多数人都知道这种经历。观众离开展览时,突然用艺术家的眼睛,透过艺术品的玻璃来观看世界。艺术品展现的是一个特定的世界观。如果展品呈现的是几何形状,观众会突然用敏锐的眼光将整个城市看作水平和垂直的房屋、道路网络、冲压成型的汽车,甚至人群的形状。这正是尚未惯坏的审美行为:对艺术的感知也应用于对现实的感知。从根本上来说,重要的审美体验并不是说艺术封闭于自身,而是它让我们睁开双眼观察世界中陌生的一面。艺术品往往产生一种强化的感知,并辐射到现实世界中。我所举的第一个马列维奇的例子是关于如何将我们带进另一个世界,歌德的例子则是有关我们如何重新审视眼前的世界。

第三种可能性是伴随审美的敏感性(aesthetic sensitization)去发现世界中的新东西。电子音乐的先驱、美国生物声学家伯尼·克劳斯(Bernie Krause, 1938—)最先在合成器上开发了新的音乐形式,并提

① 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看不见的杰作:现代艺术的神话》(*Das unsichtbare Meisterwerk: Die modernen Mythen der Kunst*, Munich: C. H. Beck, 1998),第342页。

② 同上。

③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诗歌与真理》(*Dichtung und Wahrheit*, 1811, I. Teil, 8. Buch, Potsdam: Rütten & Loening),第520页。他在《意大利游记》(*Italian Voyage*)中提到,“我刚刚抓住画家的一些画,获得用他的眼睛看世界的旧天赋”。参见《歌德作品》第11册(*Goethes Werke*, Vol. 11, Munich: Beck, 1974),第7—349页,这句话引自第86页,1786年10月8日记。

供给飞鸟乐队(The Byrds)、大门乐队(The Doors)、鲍勃·迪伦(Bob Dylan, 1941—)和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 1943—2001)等流行乐队或歌手。有一天,他将录音设备从工作室搬到了一个自然保护区,目的是录制这片荒野中的声音。他通过麦克风,第一次注意到以前从未听到的东西——一个生物群落产生的异常丰富的声音。对他来说,这是一种令人惊醒的体验。他发现了生物界的音乐,从此致力于探索这种令人如醉如痴的自然界音乐及其众多“交响乐”。^①在这个意义上,审美敏感性指向了世界的全新一面的发现,这是它在美学上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克劳斯甚至认为这就是音乐的起源。这里的艺术创造力不是创造艺术,而是发现世界的新方面。

二、艺术超越现实

第四种可能性是:艺术也可以吸收现实世界,仿佛可以摧毁它。我们所熟悉的世界的平淡无奇消失在它转变为艺术的过程之中。奥地利指挥家、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1886年,指挥家布鲁诺·沃尔特(Bruno Walter, 1876—1972)去阿特湖畔施泰因巴赫(Steinbach at the Attersee)拜访马勒,当他们向海尔山的悬崖望去时,马勒说:“你没必要再看这些山,我已经把它们去掉了,谱进了我的曲子。”^②马勒的《第三交响曲》删除了这些山。现实中的海尔山看起来就像是这首交响曲第一乐章爆发后形成的一堆矿渣。^③马勒通常认为,艺术可以以自然出发,但不能仅仅复制自然或赞美自然,而是必须改善自然、升华自然;艺术必须创造一个更加完美的现实,而不是日常生活中平庸的现实。

马勒在《第三交响曲》中打算创造一个更加全面和更真实的自然

① 参见伯尼·克劳斯(Bernie Krause):《伟大的动物管弦乐队:在世界荒野之地寻访音乐的起源》(*The Great Animal Orchestra: Finding the Origins of Music in the World's Wild Places*, Lond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12)。

② 延斯·马尔特·菲舍尔(Jens Malte Fischer):《古斯塔夫·马勒——熟悉的外国朋友》(*Gustav Mahler—Der fremde Vertraute*, Vienna: Paul Zsolnay Verlag, 2003),第289页。

③ 马勒说他本来可以将第一乐章称作“山脉告诉我什么”。同上,第341页。

景观,而不是资产阶级世俗风格的自然景观。他想展示“这个自然所包含的一切:恐惧、庄严和甜蜜”。马勒说:“我总觉得很奇怪的是,大多数人在提到‘自然’时,只想到了花、鸟、森林的气味,等等,没有人知道酒神狄俄尼索斯和伟大的牧神潘(the great Pan)。”^①另一方面,马勒希望让我们听到自然中可怕的特征和永恒的生产力。他相信,“这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界……被唤醒了,意识到周围的声响和铃铛”^②。顺便说一下,自然界实际上似乎像马勒所说的那样,在持续不断地生产和创造。海尔山的最近一张图片(图2)显示,它已经从马勒“删除”的景观中恢复得很好。



图2 阿特湖畔施泰因巴赫海尔山的酒吧(1900年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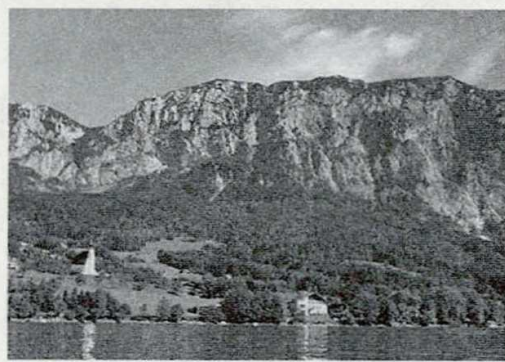


图3 海尔山最近的图片

像马勒那样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表达的主张是很明显的。马勒指出,系列交响曲的目的是“用所有现存的技术手段创造一个世界”^③。汉斯·沃尔施莱格(Hans Wollschläger, 1935—2007)曾写道:“要了解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只需要知道马勒的音乐所讲述的内容就够了。”^④

①② 古斯塔夫·马勒1896年11月18日写给理查德·巴特卡(Richard Batka)的信,见《古斯塔夫·马勒的信件》(*Gustav Mahler-Briefe*, Vienna: Paul Zsolnay Verlag, 1982),第180页。

③ 赫伯特·基利安(Herbert Killian)编:《娜塔莉·保尔-列赫回忆中的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 in den Erinnerungen von Natalie Bauer-Lechner*, Hamburg: Karl Dieter Wagner Verlag, 1984),第35页。

④ 汉斯·沃尔施莱格(Hans Wollschläger):《从多巴亚科到古斯塔夫·马勒近期作品的注释》(*Notizen aus Toblach zu Gustav Mahlers Spätwerk*, 1986),《另外一种物质:古斯塔夫·马勒的碎片》(*Der Andere Stoff: Fragmente zu Gustav Mahler*, Göttingen: Wallstein Verlag, 2010),第336—346页。

在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马勒甚至走得更远,他颠倒了通常的视角。艺术家作为自主的创造者是世界的建造者甚至是创造者吗?马勒回答道:“不是。”艺术家创造世界时,是作为世界的媒介:“可以说,人只是被宇宙演奏的一种乐器。”^①“我越来越意识到:人并不创作乐曲,而是被谱了进去。”^②其实可以这样说:即使拥有自主的想象力,艺术家实际上是世界的施为者(agency),因为他毕竟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为其所孕育。无论如何是世界的这一部分创造了一幅画面,形成对世界的感知,世界通过这部分进行自身再现。艺术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世界的媒介。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艺术与世界发生关系的多种方式:形成一个非同寻常的世界观(马列维奇);塑造或改变我们对世界的习惯性认知(歌德);发现以前未知的世界(克劳斯);超越当下的现实,提供对世界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认识(马勒);试图将我们理解为世界的代理人或媒介(马勒)。

三、转化与类比

我们现在转向美学结构的另外一种辐射模式。当然,这次不是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而是特指社会。

荷兰几何抽象派画家彼埃·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 1872—1944)的作品完全是由水平线和垂直线组成,基本色调是黄、红、蓝以及白与黑,看起来相当形式化,是完全抽象的,但它们同时体现和表明了社会结构的原则。蒙德里安的权衡艺术不仅是指绘画的时刻,同时也代表了平衡生命权重的模式——这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必须完成的任务,也同样是社会结构所需要的。看着蒙德里安绘画的那些观众,你可以研究他们如何通过再现蒙德里安的绘画平衡术,来逐渐平衡自己的身体姿势。

这里至关重要的不是基于不统一的那些不平衡,而是在尊重多样

① 古斯塔夫·马勒 1896 年 6—7 月间写给安娜·冯·米尔登伯格(Anna von Mildenburg)的信,见《古斯塔夫·马勒的信件》,第 164 页。

② 同上,第 16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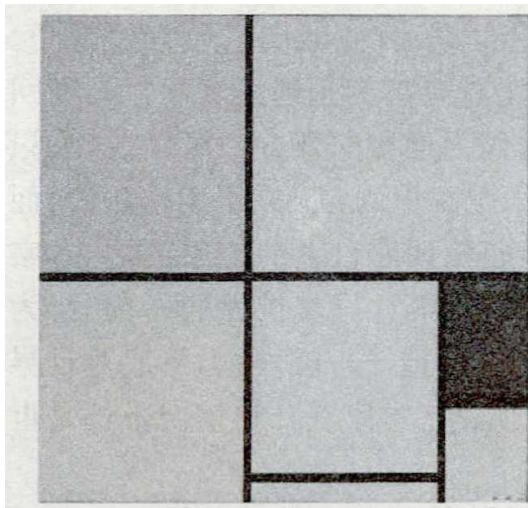


图4 蒙德里安：《蓝、黄构图》(19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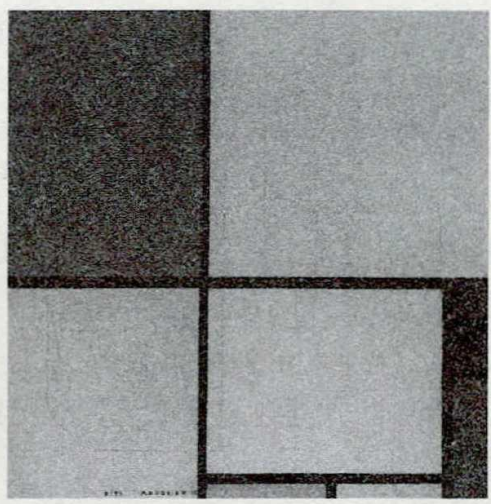


图5 蒙德里安：《红、黑、蓝、黄构图》(1928)

性的同时得到协调的那些不平衡。蒙德里安将自己的绘画理解为平衡社会力量的模式，这在民主社会是必要的。这些绘画也可以被看作人们平衡自己不同身份和阶层的模式。只有当人们认识到他们跨越出来去接触实践的不同维度时，这些沉默、不做作的作品才能得到充分感知。

以类似的方式，人们将意大利著名画家乔治·莫兰迪(Giorgio Morandi, 1890—1964)的静物当作社会图像进行阅读。人们看到玻璃、瓶子、饭碗、罐子和杯子等日常物品并排堆在一起，紧紧压在一起，部分重叠在一起。这些物品放在一起，显然就像家庭成员聚在一起。人们可以看到等级制度、倾向、胆怯、回避策略、自我主张和关联性。可以说，作为艺术家，蒙德里安在宏观社会学领域进行创作，而莫兰迪是在微观社会学领域创作。

很可能每种美学理论都可以由相应的伦理学进行详述，而每种伦理学理论都可以由相应的美学加以写作。物体合在一起的方式——无论是蛮横自大的、有机的，还是开放系列的——同时体现艺术风格和社会形式。^①美学的任务通常在于坚持一致性，这在个人生活、家庭和社会中也是如此。一致性意味着：一方面是多样性，另一方面

① 因此，伟大的美学理论可以同时道德哲学和社会哲学产生影响，阿多诺已在《美学理论》中证明这一点，参见阿多诺：《美学理论》(Ästhetische 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0)。——原注。中译本参见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译注

是保持共性和连贯性,在两者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审美修养和伦理修养之间的这种对等情况,使得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艺术作品同时能够预示正确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美学往往被认为是恰当的伦理学指南。



图6 乔治·莫兰迪:《静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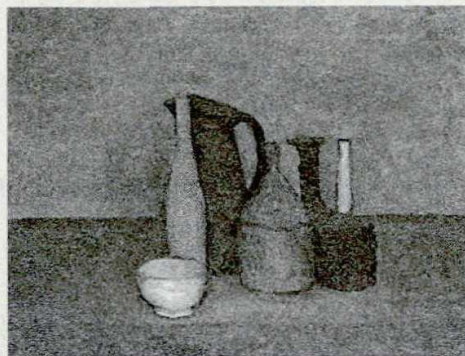


图7 乔治·莫兰迪:《静物》

这个观点往往是由诗人提出来的。例如,奥地利著名诗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在《古老的阿波罗躯干雕像》(*Archaic Torso of Apollo*, 1908)一诗的结尾提出从美学认知转变到伦理需求的著名观点。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的通常关系是相反的,“从内部熠熠生辉”的躯干以其全部的辉煌向观众讲话,要求他改变生活。^① 主

① 斯蒂芬·米切尔(Stephen Mitchell)的英译和本文的汉译对照如下:——译注

We cannot know his legendary head
with eyes like ripening fruit. And yet his torso
is still suffused with brilliance from inside,
like a lamp, in which his gaze, now turned to low,

我们无从得知他传说中的头部
以及成熟水果般的双眼。但他的躯干
从内部熠熠生辉,
像一盏明灯,隐藏着他低垂的目光。

gleams in all its power. Otherwise
the curved breast could not dazzle you so, nor could
a smile run through the placid hips and thighs
to that dark center where procreation flared.

倾其全力依然闪烁。否则,
扭曲的胸膛不会让人眼花缭乱,也不会
有一丝微笑穿过平静的臀部和腿部
直到生殖器突起的黑暗的中心。

Otherwise this stone would seem defaced
beneath the translucent cascade of the shoulders
and would not glisten like a wild beast's fur;

否则,这块石头看上去有点污损
在他肩膀半透明的瀑布般的下方,
它不会如野兽的毛皮闪闪发光:

would not, from all the borders of itself,
burst like a star: for here there is no place
that does not see you. You must change your life.

也不会从所有的边界处
像星星那样迸发:因为他的每个部位
都凝视着你——迫使你改变你的生活。

张美学与伦理关系密切的诗人还有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和美籍俄裔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 1940—1996)。席勒提出了美学从艺术作品的通常关注转向“生活的艺术”的新视角:常识中的艺术向更加困难同时也更加重要的生活的艺术提出建议,^①而约瑟夫·布罗茨基甚至认为美学即为“伦理学之母”^②。

四、机遇——关于现实的另一个教诲

在讨论美学与社会设计、艺术流派之间的转换之后,我们再次转向世界关系。

艺术有时通过展示通常被人忽略的现实特征来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其中一个例子是马勒坚持自然中狄俄尼索斯式的一面,而不是资产阶级世俗风格的自然观。有关艺术影响世界观的另一个很好的题目是机遇。这种改变始于1913年,当时法国艺术家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 1887—1968)非常巧合地创作了音乐(《错误的音乐》, *Erratum musical*, 1913)和绘画(《三个标准的终止》, *Trois stoppages étalon*, 1913/1914^③)方面的艺术实验作品。在他看来,最初的实验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但他采用这种方法的时间越长,他就越来越意识到机遇的艺术潜力,直到他最终完全踏上这

① 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美育书简》(*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 in a Series of Letters*),雷金纳德·斯奈尔(Reginald Snell)译(Bristol: Thoemmes, 1994),第15封信,第80页。——原注。中译本参见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译注

② 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表情独特的脸庞》(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Uncommon Visage, The Nobel Lecture*, 1987),见约瑟夫·布罗茨基《悲伤与理智》(*On Grief and Reas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96),第44—58页,本文引自第49页。“‘好’‘坏’的范畴首先是美学范畴……伦理学中之所以并不是‘一切都被允许’,正是因为美学中‘并不是一切都被允许’,因为光谱中颜色的数量是有限的。不谙世事的婴儿哭闹时,陌生人向他/她伸手,却遭到拒绝,婴儿是出于本能这样做,做出的是一个美学的而非道德的选择。”——原注。中译本参见约瑟夫·布罗茨基:《悲伤与理智》,刘文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50页。——译注

③ 杜尚从一米高处落下三根一米的细线,并将随机的结果固定下来。

个艺术旅程。^① 因此可以说,杜尚是偶然发现了这种新方法,才逐渐认识到这是一条黄金之路。

同样,杜尚说公众只有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接受这条道路,而后才真正意识到这是一条非常现实的道路:人们“认为任何事情都必须有目的、有意识地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终将接受机遇作为生产事物的一种可能方式。事实上,整个世界是以机遇为基础的,或者说,机遇至少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发生事情的一个定义”。^② 事实上,今天的宇宙论和进化论证明了杜尚“机遇是世界的一个根本原则”^③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我们人类通常不愿相信这一点。我们宁愿把自己看作是个人奋斗的结果,而导致我们现实存在的很多决定是完全巧合的!我们真的应该在自我概念和生活方式上对机遇给予更多的空间和承认,认识到它的生产力或生产效率,把它当作朋友和同伴。我们不应该坚持固执的目标导向,而应该在目标导向和随机性之间取得平衡。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能够容易地认识到机遇的益处。人们只需要阅读一些名人传记就会知道巧合经常决定他们选择人生道路,这最终帮助他们获得认可和成功。例如,在图书馆里找书的任何人都可能有这种经历——在他寻找的这本书旁边的那本书更有意思。(又如,在咖啡馆里,坐在隔壁桌子上的人可能会比约会的人更有前途。嗯,旁边的那本书更容易理解。)

在杜尚的开创性工作之后,机遇的重要性成为 20 世纪五六十年

① 杜尚自己用一种有启发性的方式描述了这个过程:“那种实验的确是我未来主要致力开发的部分,它本身并不是一件重要的艺术作品,但是对我来说,它开辟了一条道路——一条逃离长期与艺术相关的传统表达方式的道路。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偶然发现了什么。你拍打的时候,并不总能辨认出这种声音,这种情况很容易在之后发生。对我来说,《三个标准的终止》是将从过去解放出来的第一个信号。”引自阿图罗·舒瓦兹(Arturo Schwarz)编:《马塞尔·杜尚全集》第1卷(*The Complete Works of Marcel Duchamp*, Vol. 1,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9),第128页。

② 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著作:他一生发表的文章》(*Die Schriften: Zu Lebzeiten veröffentlichte Texte*),赛尔奇·史托福(Serge Stauffer)编(Zurich: Ruff Verlag, 1994),第97页。

③ 这里只举两个例子。在大爆炸之后的第一个千分之一秒之后,有关我们宇宙的性质出现了一个关键点。大部分夸克和反夸克已经相互摧毁,但碰巧只剩下很小的一部分夸克(大约十亿分之一)。从这个微小的剩余中形成了质子和中子,最终形成了我们宇宙的全部物质。这就是我们的宇宙是物质世界而不是反物质世界的偶然原因。第二个例子:在寒武纪——所有现存的生物谱系的形成年代,皮卡虫(Pikaia)——一种非常小的动物——幸存下来,这是所有脊椎动物(包括所有哺乳动物和人类)的祖先。如果没有皮卡虫的意外生存,进化将会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向——我们将不会存在。

代美术和音乐的一个主要话题。非定形艺术派(The Art Informel)的主要代言人包括法国存在主义画家让·弗特里埃(Jean Fautrier, 1897—1964),德国画家、摄影师沃尔斯(即阿尔弗雷德·奥托·沃尔夫冈·舒尔策[Alfred Otto Wolfgang Schulze]的笔名,1913—1951),法国画家、雕刻家和版画家让·杜布菲(Jean Dubuffet, 1901—1985),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大师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 1912—1956)等人,他们在画布上给机遇留下空间。音乐机遇派(The Musical Aleatorics)包括美国先锋派古典音乐作曲家约翰·凯奇(John Cage, 1912—1992),法国指挥家、前卫作曲家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 1925—2016),德国20世纪伟大的前卫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音乐学家卡尔海因兹·斯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 1928—2007)等,他们创作了故意隐含随机因素的乐曲。在这种情况下,艺术也让我们睁开眼睛,去观看世界中经常被忽视、被压抑的基本特征。艺术使得我们被人了解,也受到我们与通常不合时宜的巧合青睐。

五、作为多元化流派的审美体验

让我们来谈另外一个话题。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问题是:单部作品或单一范式如何传达特定的世界体验?我们用来讨论这个问题的例子包括:马列维奇的黑方块、马勒的交响曲、蒙德里安和莫兰迪的画、机遇音乐,以及最后将音乐作为一个整体。现在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扩展一下,试问:多种不同作品和范式的体验教给我们什么?在整个广度上的审美体验对我们看待世界有哪些影响?

将艺术作为整体而言,需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艺术多元,事实上,是激进的多元。这并不是简单地说,艺术领域有很多作品,一个人喜欢这个,另一个人喜欢那个。关键在于,艺术构成了(在每个流派中)各种不同的范例,而这些不同类型的作品要求完全不同的感知类型和标准体系,不能用同一个尺度来衡量。^①

^① 关于范式的概念和结构,详见沃尔夫冈·韦尔施:《现代理性批判和横向理性的概念》(*Vernunft. Die zeitgenössische Vernunftkritik und das Konzept der transversalen Vernunf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95),2007年第4版。

用法国写实派、印象派画家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 1832—1883)的画作做简要说明。在马奈的《水晶花瓶里的鲜花》(*Flowers in a Crystal Vase*)中,眼睛必须扫描画布的表面,特别是要欣赏和享受油画,但在马列维奇的作品中,什么都没有。我们的感知必须透过表层而延展到宇宙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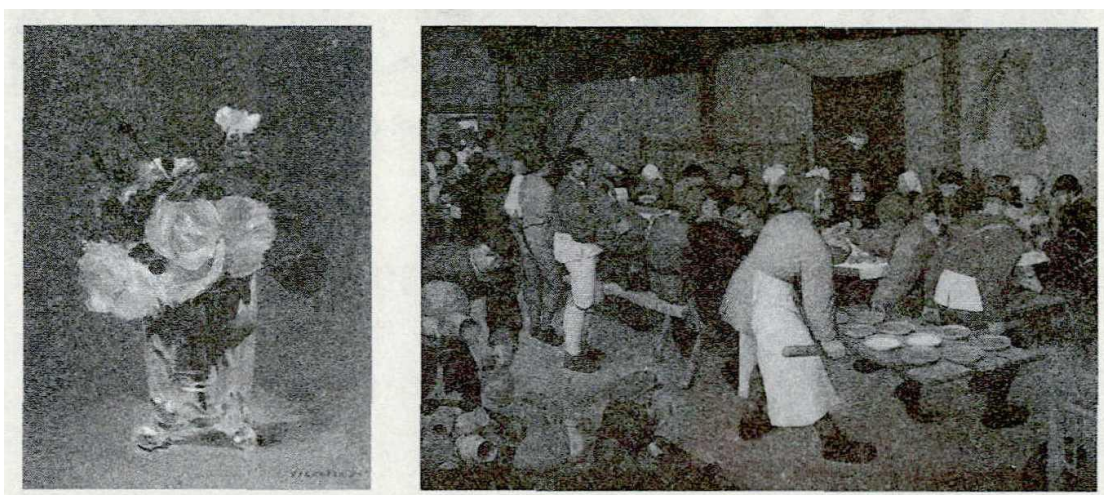


图8 爱德华·马奈:《水晶花瓶里的鲜花》(1882)

图9 老彼得·勃鲁盖尔:《农民的婚礼》(1567)

在荷兰风俗画中,例如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 约 1525—1569)的《农民的婚礼》(*Farmers' Wedding*),表面也很重要,但并不是因为表面的油漆,而是因为很多客观细节需要我们去阅读和解码。

一个完全不同的例子是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 1863—1944)的《尖叫》(*The Scream*)。只要人们没有听到画中展示的尖叫,就没有真正看懂这幅画,因为视觉感知必须成为听觉感知。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大师杰克逊·波洛克的《第三十二号》(*Number 32*)则需要运动知觉。

简言之,审美体验属于一系列不同的感知模式。审美体验原则上是多元的审美,而不是单一的审美。观众必须弄清哪种感知类型对单件作品是相关的、必要的,必须认识到一部作品独特的言语方式(真实的语言)。否则,作品仍然不被人们认知,反而受到误解。用来评判各种作品的不是一个通用标准,就像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 1880—1942)所批评的那种标准——“用来建造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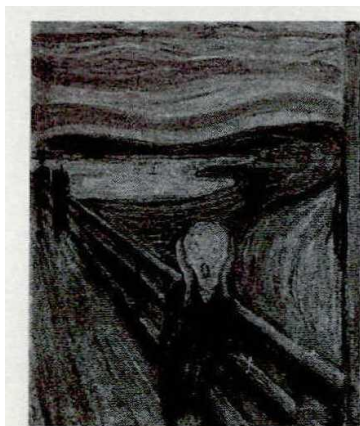


图 10 爱德华·蒙克：
《尖叫》(18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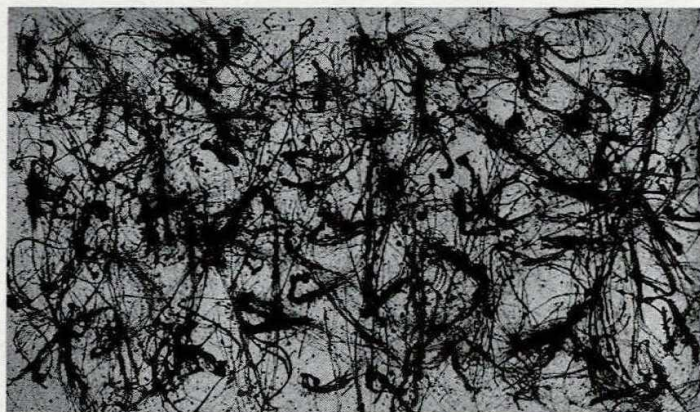


图 11 杰克逊·波洛克：《第三十二号》(1950)

大厦的万能砖”^①。不能用奏鸣曲的标准评判凯奇，也不能用机遇的标准评判贝多芬。用一套不相关的标准评判一件作品，或者用一套单一标准评判所有作品，都是随意的做法。审美体验是一个多元化的流派，审美能力在于能够走向多元化。^②

六、有关虚拟的感受

除了敏感性之外，还必须提到审美能力的另一个而且具有同样社会重要性的功能：审美体验提升了我们关于虚拟(possibility)的感受(穆齐尔语)^③，甚至可能首先唤醒它。艺术内在的多元性也意味着，人们不仅可以用一种方式，而且可以用多种不同方式制造、看见或创造一切事物。

① 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日记》(*Tagebücher*)，阿尔道夫·弗里斯(Adolf Frisé)编(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1976)，第449页。

② 顺便提一下，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现代社会(充其量是增加了)，在传统中也存在。西塞罗早就指出，人们必须承认和欣赏各种流派和风格的独特性：“如果存在几乎难以统计的言语群体和风格，各自特性完全不同，但其本身又令人称赞，那么，因为它们彼此不同，就不能再讲解相同的规则、传授同一体系。”(西塞罗：《论演说家》[Cicero, *De oratore*, III, 34])。同样，“虽然只有一种绘画艺术，但泽克西斯、阿格拉奥丰、阿佩勒斯是完全不同的，不应责难其中任何一个作品”。(西塞罗, III, 26)。

③ 参见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没有个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第4章：“如果有现实感，就一定也有虚拟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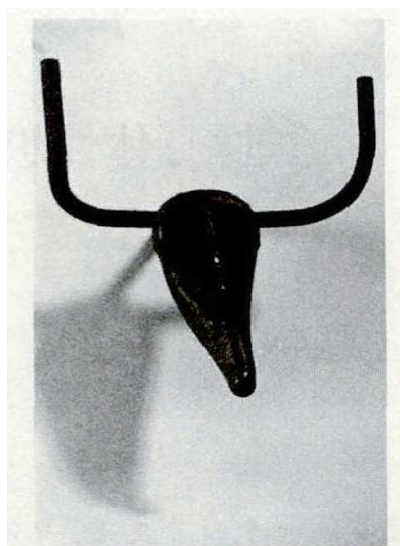


图 12 毕加索：《公牛头》(1942)

毕加索的《公牛头》非常有名，他只是简单地把一辆旧自行车的车座和车把组装起来：车座是垂直的（尖端向下倾斜，靠背部分朝上），车把在后面，把手朝上，就这样完美地产生一个印象：带有威胁的两个角的公牛头。如果这是可能的——一个自行车车把和车座可做成一个公牛头，那么还有哪些改变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感官的可能性呢？艺术唤醒了我们的选择、开放、追求疯狂事物的感觉。任何事情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做，可以重新组织。艺术唤醒了我们进行思考的意愿。

（作者单位：德国耶拿大学哲学系）

（译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学术编辑：刘 卓

《围城》海外旅行 70 年^{*}

余承法

（湖南师范大学，长沙 410081）

提 要：基于 WorldCat, Google Scholar, Amazon 和 CiNii 等网络资源，通过文献阅读和史料爬梳，回顾《围城》70 年的海外旅行旅程，考察 9 种外文版本的出版发行情况，总结它们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馆藏的规律，探究对多元文化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深刻启迪。这是我们对《围城》中文单行本出版 70 周年的最好纪念，将对海内外“钱学”研究、文学研究、跨文化研究、版本学研究、出版发行研究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钱钟书《围城》；海外旅行；版本

中图分类号：H3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18)01-0116-6

DOI 编码：10.16263/j.cnki.23-1071/h.2018.01.018

70 Years' Overseas Journey of *Wei Cheng*

Yu Cheng-fa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Based on WorldCat, Google Scholar, Amazon and CiNii, as well as a wide reading of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ine foreign versions of the Chinese novel *Wei Cheng* (or *Fortress Besieged* in English), summarizes the common laws guiding their dissemination and collec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sheds light on the Chinese literature's "going global" in a globalized era of multi-culturalism. It argues that revisiting *Wei Cheng*'s 70 years of overseas journey, which is the best commemoration of its first publication in 1947, will be of academic value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for Qian Zhongshu studies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literary studies, cross-cultural studies, textual research and studies on publ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Qian Zhongshu; *Wei Cheng* (*Fortress Besieged*); overseas journey; version

1 引言

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是一部记录人生旅行、描摹人情世态、暗示人生困境、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围城”的小说，其外文译本之多、图书馆收藏数量之众、传播力度之大、影响范围之广、研究成果之多，是中外现当代出版史上浓重墨彩的篇章，在中外文学交流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本文借助 WorldCat, Google Scholar, Amazon 和 CiNii 数据库回顾《围城》70 年的海外旅行历程，总结它在全球范围内译介、传播和馆藏的一般规律，是对《围城》中文单行本发表 70 周年的最好纪念，将为海内外“钱学”研究挖掘

史料，为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外译提供有益启迪。

2 《围城》的外文译本

《围城》问世之初即受到广泛关注，法国来华传教士秉善仁等人 (Schyns et al. 1948: 182) 在《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中肯定钱钟书创作中的幽默艺术，但站在宗教立场否定小说的价值。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称赞《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趣味横生、最用心经营的一部小说，也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小说”，在中国所有的战时战后小说中“最能捕捉到旅行中的喜剧和苦难” (Hsia 1961: 432 -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化境研究” (13FYY008) 的阶段性成果。感谢澳门大学中文系龚刚、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孔子学院李树清、广西民族大学曾薇、黑龙江科技大学顾俊玲、西班牙国立马拉加大学欧怡韵以及中南民族大学万光荣、李丹、陈丹、刘雪梅、章羽红、熊苇渡等学人的慷慨帮助！

460)。这一评介从此揭开《围城》在海外译介和传播的序幕,先后出现英语、俄语、法语、日语、德语、波兰语、捷克语、西班牙语、韩语、越南语和荷兰语等十余个外文译本,经历过多次域外旅行。

2.1 英译本

继夏志清之后,珍妮·凯利(J. Kelly)1974年在香港《译丛》(*Renditions*)杂志上发表《围城》第一章的英译,美国出现两篇研究《围城》的博士论文:胡定邦(Hu 1977)的《钱钟书三部文学作品的语言学—文学研究》和胡志德(Huters 1977)的《传统的革新:钱钟书与中国现代文学》。1979年,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围城》的第一个外译本 *Fortress Besieged*,以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的《围城》版为底本,凯利译出初稿,美国华裔学者茅国权(N. K. Mao)完善,收入美籍华人学者罗郁正、刘绍铭和李欧梵等主编的“中国文学的英译”(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丛书。《译者序》指出:虽然钱钟书受到夏志清的高度评价,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因此希望《围城》英译本能够引起读者对钱钟书及其作品更大的兴趣(Chien 1979: x)。《译者导言》除简介作者生平和著作外,着重将《围城》作为一个完整艺术品进行讨论,认为这既是一部带有幽默风格的喜剧,又是一部讽刺爱情婚姻、评论和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学者小说,其最高艺术成就是对主人公方鸿渐的成功塑造(同上: xiii-xxix)。

英译本被美国图书协会评为1980-1981年“杰出学术著作”,3年内至少有8篇书评发表于《图书馆杂志》《纽约图书评论》《国家评论》《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观察家》《今日世界文学》《亚洲研究杂志》和《中国文学:散文、论文和书评》等英美主流期刊杂志。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在题为《永恒的玉石》的书评中指出,《围城》“是一部才华横溢、技艺精湛、趣味横生的小说,文笔高雅,结局带有浓浓的悲观色彩”,“富有活力、结构严谨的英译本将会立刻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某些看法”(Spence 1980: 20)。胡定邦认为,文学翻译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翻译钱钟书这位文学大师的作品更是如此,《围城》英译本令人肃然起敬,但在文化负载词、句法语义和原著风味等方面存在不足,只有钱钟书本人才能胜任翻译(Hu 1978: 427-443)。

1989年,英译本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重印,在中华大地开启“出口转内销”的历程: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被授权出版;国立中央

图书馆台湾分馆1995年发行该版本的有声图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汉英对照本,增加杨绛撰写的中文前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出版英译本,收录杨绛作、凌原译的《记钱钟书与〈围城〉》汉英对照本。2004年,美国纽约新方向出版公司推出经杨绛授权、两位译者同意的修订本,收入“新方向经典系列”(Qian 2004)。该修订本除将钱钟书姓名的威妥玛拼音 Ch'ien Chung-shu 改为汉语拼音 Qian Zhongshu 外,书中人名、地名的拼写和其他内容都未做变动。史景迁在《前言》中指出,《围城》是一部构思非常奇巧的喜剧性传奇小说,充满创造力、机智和正直,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杰作,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部值得称道的作品”(Spence 2004: vii-x)。英国企鹅出版社2004年再度出版,收入“企鹅现代经典”,旗下的艾伦·莱恩出版社2005年再版,企鹅出版社2006年再次印刷。美国亚马逊官方网站评论《围城》是“中国20世纪最优秀的一部小说,是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是仿拟西方文学传统与哲学、描写民国时期中产阶级的一部杰作”。至少7篇关于该修订本的英文书评发表于《图书馆杂志》《对抗》《观察家》《泰晤士报文学副刊》《金融时报》《纽约图书评论》和《独立报》等期刊上。

2.2 日译本

日本汉学家荒井健1956年开始接触《围城》,多次尝试翻译未果。1975年前后,他听到钱钟书去世的传言,怀着悼念的深情翻译《围城》前四章,连载于《飙风》杂志(1977-1981年)。他与学生中岛长文(翻译第5至7章)、中岛碧夫妇(翻译第8至9章)合译的《结婚狂诗曲》(《围城》)上、下册由岩波书店1988年出版,列入专收外国文学名著的“岩波文库赤系列”,2002年再版(钱钟书 1988/2002)。日译本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本为底本,略去“重印前记”,并参考英译本。钱钟书(1981: 97-98)应邀作序,回忆他与荒井健的文学因缘,相信原著“会在日语里脱去凡胎、换成仙体”。荒井健在“跋”中写道:该小说在日本最初以“被包围的城堡”为题名出现,日语中找不到“围城”的准确译法,只好选取作品的一个主题——“结婚”,因此将书名改译为“结婚狂诗曲”,并将直译的“围城”附在其后(荒井健 1996: 155-159)。荒井健还指出,《围城》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好作品”,针对有人批评书名的改译,他觉得问心无愧,因为钱钟书本人并不在意(同上 1988)。中岛长文以跟钱钟书通信的形式写成《〈围城〉论》,提出一些不同于我国学者的

独到见解,如“围城”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会注考证》(钱钟书指出)或蔡文姬的《悲愤诗》(这一猜测未得到钱钟书回应);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与《围城》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都市幽默方面《围城》明显继承西欧小说的血统,在现代中国小说中是罕见的,也表明西欧文学很好地移植到中国文学的土壤(中岛长文 1990: 189 - 209)。《围城》日译本为日本 157 家图书馆收藏,帮助日本读者意识到现代中国竟有这样了不起的小说,至少有 5 篇日语文章研究《围城》。

2.3 俄译本

莫斯科文学出版社在 1980 年出版前苏联汉学家、翻译家符·索罗金(Владислав Федорович Сорокин)的《围城》俄译本 *Осажденная Крепость*,以晨光出版公司 1947 年版本为底本,收入“中国文学文库”(Цянь 1980)。前苏联杰出的中国文学翻译家和研究专家艾德林(Лев Залманович Олдрин)在题为《作家和学者钱钟书的〈围城〉》的序中着重分析小说的社会意义,指出该小说吸收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小说的精华。俄译本的内容简介指出,小说以幽默笔法描写 1930 年代末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前景悲观失望、忧郁苦闷、动摇不定的性格,表现出作者的社会批评精神和人道主义倾向。俄译本首印 5 万册很快售罄,1989 年再版时印刷 10 万册。符·索罗金(1996: 160 - 177)根据原著修订本作过部分改动,将书名改为 *Осажденная Крепость: роман; рассказы*(Цянь 1989),收入《上帝的梦》《灵感》《纪念》3 部短篇小说和杨绛的《干校六记》,用《〈围城〉俄文版再版前言》取代艾德林的序言,回顾钱钟书和《围城》相互交织的命运以及中西方对《围城》的主要评价,解释未收录《猫》却收录《干校六记》的原因,提及杨绛的文学创作以及钱钟书的创作、学术和社会活动,最后指出:钱钟书小说创作时间虽然不长,却引起遥远国度读者的极大兴趣,足以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围城》俄译本对苏俄传播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重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力量发行《围城》新版本。

2.4 法译本

巴黎克里斯蒂安·布格瓦出版社 1987 年出版西尔维·塞尔望-许来伯(Sylvie Servan-Schreiber)和华人记者王鲁(Wang Lou)合译的《围城》法译本 *La Forteresse Assiégée*,收入“东亚丛书系列”,1997 年再版(Qian 1987/1997)。跟英译本一样,法译本也是中外译者通力合作的成功范例,但王鲁的名字一度被忽略,连钱钟书在《围

城》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一版第四次印刷本的“重印本前记”中也只提到西尔维的名字。法国汉学家毕仰高在序中评价钱钟书是“中国 20 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知名专家”(Bianco 1987/1997: I-VII),分析《围城》的创作艺术和法译本的翻译技巧。美国学者贝缇娜·纳普(Knapp 1988: 332)在法译本的书评中指出,“钱钟书不具体描述日本对中国的掠夺与破坏,而是借助人物角色来叙述战事,以一种全新方式来处理战争话题”,华人学者马森认为,《围城》是与传统偏见不同、反映人类厄运的一部长篇小说,法译本难免存在少许瑕疵,但非常忠实原著,“是一部杰出译作”(Ma 1988: 305 - 306),它的出版为钱钟书这位中国重要作家和学者的声誉增添“一顶皇冠”。

2.5 德译本

1978 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汉学家会议上,钱钟书流利的英语演讲为德国著名汉学家莫宜佳(Monika Motsch,曾译为莫妮克,莫芝宜佳)打开通向中国文化的门户,成为她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她决心跟德籍华裔学者史仁仲(Jerome Shih)合译《围城》,并跟钱钟书保持书信往来,到北京向他求教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他们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印刷本为底本,将书名改译为 *Die Umzingelte Festung: Ein Chinesischer Gesellschaftsroman*,1988 年由法兰克福岛屿出版社出版(Qian 1988),2008 年慕尼黑施尔默-格拉夫出版社再版时将书名定为 *Die Umzingelte Festung: Roman*(Qian 2008)。莫宜佳为译本作注并撰写后记,从西方文学传统的角度将《围城》定位为“社会小说”,指出它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中西文学合璧的小说:钱钟书借用法国哲学家蒙田的一句名言,既暗射中国的抗日战争,又讽刺那些自私的人——中国人、西方人以及全人类,因此发现中西文化的不少共同点。钱钟书欣然为德译本撰写前言,称赞她对中国现代文学在德国传播做出突出贡献(钱钟书 1982: 108)。《围城》德译本迅速跻身于畅销书之列,曾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获最佳翻译奖,《明镜周刊》《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等主流媒体纷纷发表书评,有人甚至认为钱钟书完全有资格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高度评价到“就其独一无二的构思和深度而言,《围城》堪称中国现代小说艺术最为讲究的、在此意义上也是无可逾越的标志”(顾彬 2008: 209)。龚刚认为,《围城》德译本“对于德国汉学界及德国文学界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发挥重要作用”(龚刚 2010)。2016 年,外语教学

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围城》汉德双语版,中文本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年版本为底本,德文本即为莫宜佳和史仁仲的译本(钱钟书 2016),这是中国文学作品外译中“出口转内销”的另一成功案例。

2.6 西译本

1992 年,巴塞罗那阿纳格拉玛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围城》西班牙语译本 *La fortaleza asediada*, 收入“叙事全景丛书”(Qian 1992)。译者是西班牙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塔西娅娜·菲萨克(Taciana Fisac),1986 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访华时,她担任随行翻译,多年从事中国文学、文化和中西关系的教学与研究。据钱钟书透露,该译本“译笔其实寻常,聊胜于无而已”(陆文虎 2007)。西译本于 1996、2009 和 2011 年多次印刷,不像英、法、德译本那样有很大影响,西语世界目前分别只有一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研究该译本。

2.7 韩译本

随着中韩两国 1992 年正式建交,《围城》开始走向韩国读者。1993 年,韩国的李惠兰(이혜란 1993)将《围城》从英译本转译成韩语,书名为『황하의 노을』(黄河的晚霞),由韩国皇帝出版社出版。1994 年,吴允淑(오윤숙 1994)将《围城》直接从中文译成韩文『포위된 성』(被包围的城)(上、下册),由韩国实录出版社出版,再次向韩国读者译介这部优秀小说。责任编辑在后记中记述译者从翻译到成书的过程,给读者带来不少启发。韩国学者对《围城》中的现实主义描写和讽刺手法颇感兴趣,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韩国至少有 4 篇硕士学位论文和 6 篇期刊论文研究《围城》,内容涉及小说的批判意识、讽刺手法、主题内涵和人物性格等方面。

2.8 其他外文译本

胡志明市文艺出版社 1996 年出版黎金坦(Lê Kinh Tâm)的《围城》越南语译本 *Trong vòng vây tình yêu*,收入“中国文学”系列(Tiên 1996),河内作家协会出版社 2004 年出版智闲王、山黎(Trí Nhân Vương, Sơn Lê)合译的另一译本 *Vòng đời vây bủa: tiểu thuyết*(Tiên 2004)。阿姆斯特丹雅典娜一波拉克和范根纳普出版社 2013 年出版荷兰汉学家林格(Mark Leenhouts)的译本 *Belegerde Vesting*(Qian 2013),以 1985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为底本,受到很高评价。钱钟书曾提到,1980 年代还出现过《围城》的捷克语和波兰语译本,目前尚未搜集到具体信息。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海外“钱学”的进一步传播和研究,《围城》的中外文本必将旅行到更多国家和地区。

3 《围城》外文译本在世界各地图书馆收藏情况的统计与分析

“一个国家、地区的图书馆系统拥有某本书的数量,代表这本书在这个国家、地区影响力的大小,这种影响力包含思想价值、学术水平及作者知名度、出版机构品牌等各种因素的认定。”(何明星 2016)70 年间《围城》的不同中文版在世界各地图书馆收藏的数量依次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200 家) > 书林出版有限公司版本(58 家) > 华语出版社版本(51 家) >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版本(47 家) > 台湾辅新书局版本(46 家)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本 = 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版本(33 家) > 香港基本书局版本(31 家) > 厦门音像出版社版本(26 家) > 香港文教社版本(21 家) > 台湾大地出版社版本(18 家)。根据《围城》外译本在世界各地图书馆的收藏情况统计可知:

(1) 按收藏《围城》外译本的图书馆数量依次为:英译本(873 家) > 日译本(159 家) > 荷译本(52 家) > 法译本(49 家) > 德译本(42 家) > 越译本(22 家) > 西译本(18 家) > 俄译本(2 家) > 韩译本(0 家)。

(2) 美国是《围城》外译本的馆藏大户(636 家),通常译本为出版社所在国的图书馆收藏最多,其次是以译语作为(半)官方语言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但俄语、越南语、韩语译本例外,因为 WorldCat 和 CiNii 中没有这 3 个国家图书馆系统的收藏信息。

(3) 英译本先后在美国、中国、英国的 5 家出版社出版过 6 个版本,被收藏的图书馆数量最多(873 家),传播范围最广(包括全球 6 大洲 23 个国家和地区),影响力最大,再次印证英语图书的强势地位。“中国文学作品在美国及其他英语国家的英译本也同样在英国传播开来”(王洪涛 2016: 146 - 151),《围城》即是典型一例。

(4)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汉英对照本(2003)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英译本(2003)早于纽约新方向出版公司(2004)和企鹅出版集团(2004)的版本,因而在欧美等地也有收藏,属于出口转内销之后的再出口,而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英译本(1989)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同年出版,在北美图书馆几乎没有收藏信息。

4 《围城》“走出去”70 年的传播规律和深刻启迪

4.1 《围城》“走出去”70 年的传播规律

《围城》堪称“曾经的流行、如今的经典”,它

的真正流行始于夏志清的高度评价以及其他美国学者的译介与研究,凯利和茅国权的英译本在中国是一部典型的出口转内销的文学经典。借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传播学奠基人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2003:35-36,65-66)的 5W 传播模式:who(什么人——传播主体)、says what(说什么——传播客体)、in what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传播渠道)、to whom(对谁说——传播对象)、with what effect(达到什么效果——传播效果),总结出《围城》外译本在海外译介和传播的 5 个共同规律:

(1) 传播主体:译者无一例外都有译语所在国的学者,或是知名汉学家、“钱学”专家,或是文学家、翻译家,或独译或主译,华人华侨学者参与英、法、德 3 个译本的合译,体现出外国学者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享有的优势、采取的主动和发挥的主导,表明《围城》是外国人的主动引进而非中国人的主动输出。

(2) 传播客体:所有译本都是全译本,除李惠兰的韩译本转译自英译本、日译本参考英译本之外,其他外译本都直接译自汉语,都有序言或前言,德、日译本邀请钱钟书作序,英译本再版、俄译本初版、法译本由著名汉学家作序,书末附有译者注,英译本再版、德译本、吴允淑韩译本还有译者后记,通过简介作者生平、概述主要内容、评价艺术价值来吸引读者的兴趣,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译本在译语所在国的接受和传播。

(3) 传播渠道:这些外译本或在出版前已有相关评介,或在出版后有书评发表于主流期刊杂志,英语报纸还有对钱钟书和《围城》的相关报道。《围城》被拍成电视剧上映后,美国加州南海有限公司 1990 年发行家庭影院版,在海外华人界掀起“《围城》热”。除了传统纸版,1979 年英译本也有电子版收藏于美国谷歌公司总部和 HathiTrust 数字图书馆。

(4) 传播对象:基于 WorldCat 和 CiNii 的统计和分析发现,外译本都有再版或多次印刷,韩译本和越译本都有两个,英译本先后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在世界各地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社区图书馆都有收藏,可见读者群体不限于专家学者,也有普通读者。

(5) 传播效果《围城》的中文本、外译本、相关书评、媒体报道以及相关研究论著助推这部小说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并获得高度评价。英译本的版次、发行量、收藏的图书馆数量、传播力和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版

本,中文本(被 421 家图书馆收藏)以及德、法、西等语种的译本也取得一定传播效果,外译本的海外旅行反过来促成《围城》作为一部文学经典在中华大地的传播。

4.2 《围城》海外旅行 70 年的深刻启迪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个热议话题是:谁是主译者,是我国译出还是他国译入。结合莫言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刘慈欣科幻小说获得第 73 届雨果奖的成功案例,《围城》70 年的海外旅行给中国文学“走出去”带来 5 点深刻启迪。

(1) 前提:必须首先考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需要,只有明确输入国的现实需要,才能挑选适合外译的中国知名作家的经典作品,厘定相应的翻译原则,培养翻译人才,在输入国寻找合作伙伴,即如梁启超百余年前的呼吁“择当译之本”“定公译之例”“养能译之才”(梁启超 1984:11)。

(2) 出发点:必须以服务于翻译产品的需求方为出发点,考虑译语受众的语言习惯、文化传统、审美情趣和接受心理等因素,并根据译语读者的特定需求决定采取全译还是变译。

(3) 保障:(主)译者必须是以译语为母语者,同时精通中国语言文化,或者是长期生活、工作在译语国家的双语双文化的华人华侨学者,中外译者合作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外译的理想译介模式。

(4) 核心:译作必须既能传达原作风味,又满足译语受众需求、符合译语的审美接受。“化境”是中国文学作品全译的最高理想和最高标准,变译是解决中国文学作品的语际文化供求矛盾的有效策略。

(5) 关键:必须实现中外文学界、翻译界、编辑界、出版发行界、传播界、图书馆界等领域的通力合作,确保作品的“评介——翻译——出版发行——市场策划——媒体宣传——读者反馈”的一条龙传播渠道畅通无阻。唯有如此,中国文学才能被积极“引进去”、主动“走出去”、成功“走进来”。

参考文献

- 符·索罗金.《围城》俄文版再版前言[A].钱钟书研究采集(2)[J].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 龚刚.谈钱钟书小说的德译本[J].澳门文献信息学刊,2010(2).
- 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第七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M].北京:

-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3.
- 何明星. 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 [N].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2016-08-23.
- 荒井健. 机智幽默, 绰乎有余——《围城》译后记 [N]. 文艺报, 1988-09-24.
- 荒井健. 《围城》日译本跋 [A]. 钱钟书研究辑(2) [C].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 梁启超. 论译书. 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 陆文虎. 我所见到的《围城》诸版本 [N]. 深圳晚报, 2007-07-16.
- 钱钟书. 《围城》日译本序 [J]. 读书, 1981(10).
- 钱钟书. 《围城》德译本前言 [J]. 读书, 1982(12).
- 钱钟书. 围城(汉德双语)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
- 王洪涛. 社会翻译学视阈中中国文学在英国传译的历时诠释 [J]. 外语学刊, 2016(3).
- 王友贵. 从 1949-1977 年中国译史上的翻译需要审视“中华学术外译” [J]. 外文研究, 2013(1).
- 中岛长文. 《围城》论 [A]. 钱钟书研究(第二辑) [C].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
- Ch'ien, C.-S. *The Besieged City* (Chapter 1) (J. Kelly Trans.) [J]. *Renditions*, 1974(1).
- Ch'ien, C.-S. *Fortress Besieged* (J. Kelly, N. K. Mao Trans.) [M].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 Hsia, T. C.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 Hu, D.-T. A Linguistic-literary Study of Ch'ien Chung-shu's Three Creative Works [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77.
- Hu, D.-T. A Linguistic-literary Approach to Ch'ien Chung-shu's Novel *Wei-ch'eng* [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78(3).
- Huters, T. D. Traditional Innovation: Qian Zhong-shu and Modern Chinese Letters [D]. Stanford University, 1977.
- Knapp, B. L. Review of *La Forteresse Assiégée* [J]. *World Literature Today*, 1988(2).
- Ma, S. Review of *La Forteresse Assiégée* [J]. *The China Quarterly*, 1988(114).
- Qian, Z.-S. *Fortress Besieged* (J. Kelly, N. K. Mao Trans.) [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4.
- Schyns, J., Su, X.-L., Chao, Y.-S. *1500 Modern Chinese Novels and Plays* [C]. Peiping: Scheur, 1948.
- Spence, J. Forever Jade — Review of *Fortress Besieged* [J].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80(6).
- Spence, J. Foreword [A]. In: Qian, Zhongshu, *Fortress Besieged* [M]. Tr. by J. Kelley and N. K. Mao.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4.
- Bianco, L. Préface [A]. *La Forteresse Assiégée* [M]. Par Qian Zhongshu, traduit du chinois par Sylvie Servan — Schreiber et Wang Lou. Paris: Christian Bourgois Éditeur, 1987/1997.
- Qian, Z.-S. *La Forteresse Assiégée* [M]. Traduit Du Chinois Par Sylvie Servan-Schreiber et Wang Lou. Paris: Christian Bourgois Éditeur, 1987/1997.
- Qian, Z.-S. *Die Umzingelte Festung: Ein Chinesischer Gesellschaftsroman* [M]. Übs. v. Monika Motsch und Jerome Shih. Frankfurt am Main: Insel, 1988.
- Qian, Z.-S. *Die Umzingelte Festung: Roman* [M]. Übs. v. Monika Motsch und Jerome Shih. München: Schirmer Graf, 2008.
- Qian, Z.-S. *La fortaleza asediada* [M]. Trad. de Taciana Fisac. Barcelona: Anagrama, 1992.
- Qian, Z.-S. *Belegerde vesting* [M]. Vertaald door Mark Leenhouts. Amsterdam: Athenaeum-Polak & Van Genep, 2013.
- Цянь, Чжун-шу. *Осажденная Крепость* (Федорович, Владислав Сорокин) [M]. Москва: Литератур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80.
- Цянь, Чжун-шу. *Осажденная Крепость: роман; русский рассказы* (Федорович, Владислав Сорокин) [M]. Москва: Литератур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89.
- Tiên, Chung Thu'. *Trong vòng vây tình yêu* [M]. Nguôí dịch: Lê Kinh Tâm. Hồ Chí Minh: Văn Nghệ, 1996.
- Tiên, Chung Thu'. *Vòng đời vây bủa* [M]. Nguôí dịch: Trí Nhân Vu'ng, Sơn Lê. Hà Nội: Hội nhà văn, 2004.
- 錢鐘書. 結婚狂詩曲——圍城(上、下) [M]. 東京: 岩波書店, 1988/2002.
- 이혜란. 항하의 노을 [M]. 서울: 황제출판사, 1993.
- 오운숙. 포위된 성 [M]. 서울: 실록출판사, 1994.

定稿日期: 2017-12-05

【责任编辑 陈庆斌】



- 中文外国语类核心期刊
- CSSCI来源期刊(扩展版)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 全国高校精品社科期刊
-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

2018年第 **4** 期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2018年第4期

编辑委员会

主 任:纪怀善

副主任:阎绶龙 张金生 陈春华 鲁 猛 陈 勇 任国军

委 员:(按姓名音序排列)

樊明明 李志东 吕春燕 祁广谋 任 军 孙成岗
孙建民 唐 慧 王 亮 王 昕 肖 欢 熊友奇
徐万胜 许 宏 许宗华 易绵竹 钟智翔

特约编委:(按姓名音序排列)

陈国华(北京外国语大学)	程朝翔(北京大学)
戴炜栋(上海外国语大学)	董燕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顾曰国(中国社会科学院)	韩宝成(北京外国语大学)
黄国文(华南农业大学)	姜景奎(北京大学)
金基石(上海外国语大学)	刘世生(清华大学)
苗兴伟(北京师范大学)	彭广陆(北京大学)
施建军(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初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王加兴(南京大学)	王铭玉(天津外国语大学)
王守仁(南京大学)	卫乃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许 钧(浙江大学)	俞理明(上海交通大学)
张德禄(同济大学)	张 辉(南京师范大学)
仲伟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编 辑 部

主 编:陈 勇 副 主 编:张立英

编 辑:(按姓名音序排列)

刘芳亮 尚小晴 田国丰 张新萌

本期执行编辑:刘芳亮 终 校:尚小晴

排 版:田国丰 封 面 设 计:付 姚 郭 靛

(本刊实行同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度)

目 录

(双月刊)

1978 年创刊

第 41 卷

2018 年第 4 期

(总第 217 期)

专栏: 变译理论批判 (特约主持人: 黄忠廉)

我国明末清初时期《圣经》汉译中的变译现象研究	傅敬民	1
变译论之辨与思: 理论类属、学科贡献与概念界定	蓝红军	7
学术参译研究——以钱钟书《谈艺录》为例	余承法, 万光荣	11
“萃译”之辨	任东升	16
变译理论批判与反思	陈元飞	21

专栏: 隐喻研究 (特约主持人: 束定芳)

隐喻性范畴建构中介的关系属性	龚玉苗, 王聿良	25
基于语料库的英语经济话语隐喻研究	陈 朗	34
近十年国际语料库隐喻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薛 冰, 向明友	43

语言与语言学研究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阈下教育语言学研究范式	于 晖	52
庭审话语会话修正中的认知状态研究	贺小聃	61
当代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李向东	69
日语复合动词的事件结构及其句法表征——以 V+ <i>dasu</i> 为例	杜盛斌	77

外语教学研究

国内外二语教师研究的方法回顾与反思(2000~2017)	徐锦芬, 李 霞	87
网络实时文本交际互动中的同伴支架研究——与课堂互动相比较	张秀芹, 贺玉珍	96
齐普夫分布对二语学习者习得虚拟 IF 句的影响研究	麦春萍, 张晓鹏	103
CLIL 模式对英语专业学生写作焦虑影响的定量追踪研究	钟含春, 范武邱	111

外国文学研究

消费与认同: 维多利亚时代器物之于丽奥诺拉	修立梅	120
18 世纪英国小说中父亲的“否决权”	刘 戈	127
青春的挽歌——论梅崎春生《樱岛》的主题	何建军	136
波德莱尔在中国的接受和研究	文 雅	144
私人空间与政治空间的交融 ——论冯塔纳历史小说《沙赫·冯·乌特诺》中“危险的政治性”	刘 萌	151

第 6 届国际认知语义学学术研讨会会议通知

6

英文摘要

159

学术参译研究

——以钱钟书《谈艺录》为例

余承法，万光荣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考察钱钟书在《谈艺录》中的翻译实践可以发现：他采用的变译多于全译，变译中以参译为主，其他方法为辅。他的参译实践有助于我们明确学术参译的性质和功用，指导我们遵守学术参译“为研究参考，跟写作协调”的合作原则及其准则，从而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地遵循参译规范。

关键词：变译；参译；学术参译；钱钟书；谈艺录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2X (2018) 04-0011-05

0. 引言

参考文献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但引用非写作语言的文献时涉及的翻译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黄忠廉等人在变译范畴中提出了“参译”概念，阐述了其基本内涵、操作方法和主要原则（黄忠廉 2000：337-353；黄忠廉等 2009：205-211；黄忠廉、李明达 2014），尝试建构了较为科学、完整的参译方法体系（王丽娜 2016）。截至 2018 年 2 月 4 日，中国知网中篇名含“参考文献”“引用文献”“参译”字眼的论文分别为 14 052 篇、1176 篇、1 篇，摘要中含“参译”的论文只有 23 篇。由此可见，参译现象虽然由来已久，参译在学术研究中也有较多的实际运用，但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钱氏的译论与译文，以少胜多多，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举一反三。”（罗新璋 2013：80）在翻译范畴上，钱氏的变译多于全译，外译汉多于汉译外，散见于不同著作中。在变译方法上，其参译多于摘译、编译、缩译、译述、译评、改译，少用或不用综述、述评、译写、阐释和仿作。他在 50 余万字的《谈艺录》（1984）^①中，摄取英、法、德、西、意等西方语言 680 余种著作中近千条例证，翻译成与写作风格一致的文言，为我们从事学术研究尤其是参译树立了典范。故此，本文以黄忠廉等人提出的“参译”为出发点，以《谈艺录》中的参译实例为对象，探究学术参译的性质、功用、原则和规范，以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1. 学术参译的性质

根据黄忠廉、李明达（2014：89）对参译的最新定义“译者摄取外国文献中部分内容并

收稿日期：2018-05-08；作者修订：2018-05-30；本刊修订：2018-06-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化境’研究”（13FYY008）

作者信息：余承法（1974-），男，湖北安陆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翻译学和钱钟书研究，E-mail: victoryu2006@126.com；万光荣（1972-），女，湖北荆门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句法学和语言类型学，E-mail: yu_wan2007@126.com。

译入创作,引译为据的变译方法”,可将参译分为两大类:文学参译和学术参译。“学术参译”兼属动词和名词,可按“属加种差”的逻辑定义方法进行义素分析。第一,学术参译的主体是人而非机器(机器在短期内不能代替人工进行学术研究),是学术研究中顺带进行翻译的学者,而非普通译者。第二,学术参译的客体不限于外国文献,也包括外族语的文献以及用外语写作时参考的本族/国语的文献,统称为“非写作语言的文献”。第三,学术参译的动作是摄取,包括移植、摘取、压缩、转述、改换、融入等手段,以母语为主,外族语和外国语为辅。第四,学术参译的目的是参考和引证,既服务学术研究的宗旨,又忠实参引文献的内容及其作者的意图。第五,学术参译作为一种参译类型,既是一种借助语言的变译行为,也是学术研究的呈现结果。基于此,可将学术参译界定为“研究者撰写论著时摄取非写作语言文献中的文化信息作为参考和引证的变译行为及其结果”。

2. 学术参译的功用

学术参译的基本功能可概括为“述古而强以就今,传人而借以寓积”(38),具体包括参考、引证、互文、打通。

1) 参考。学术参译中,“写”是目的,占主导地位,“译”是手段,处于次要地位,作为“写”的参考,并为之服务,正所谓“有目的而选择工具,始事也;就工具而改换目的,终事也”(39)。参译作为学术论著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学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为作者立论立言提供依据,为同仁批判思考提供参照,为读者温故知新提供来源。钱氏在《谈艺录》中参译西方文献的若干片段时,常用“参观”“参印”“相参”“参释”等词,作为评论中国古典诗话的参考。例如,他为了阐述“文章流别,初不拘名从主人之例,中外一理也”(3),参译席勒、福楼拜、李高洁等人的观点,指出与苏东坡、吴雨僧的观点相吻合,从而作为自己立论的参照。

2) 引证。参译作为学术引用的一种,是为了进行古今中外相关内容的引用与互证,既证实又证伪,既为文本中的某一论点提供理论支撑或事实证据,又针对某一观点提供批驳意见或反面材料。钱氏在学术活动中践行“互相发明”“连类互证”“不谋而合”“理足相参”“亦资印证”“可以比堪”等,如其所言“又于西方典籍,褚小有怀,绠短试汲,颇尝评泊考镜”(1)。这类例子在钱氏《谈艺录》等著作中比比皆是,在中西互证互识互释互补的对话中寻找超越于同异的普适性理论话语,实现跨文化的创造与建构(季进 2002: 194-195)。

3) 互文。学术参译使得研究者与其引用的原文作者、写作文本与引用文本、文本读者与不同作者之间能够进行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学术对话,彰显在写作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互文相足”。钱氏在论及炼字时依次参译歌德、诺瓦利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狄更斯、福楼拜、尼采、巴斯可里等人的观点,旨在阐明“观事物,当以故为新,即熟见生”(320-322)。这些来自不同语言、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文字之间具有高度互文性,与钱氏提到的俄国文评家希克洛夫斯基的“使熟者生”、梅尧臣的“状难写之境,含不尽之意”互文见义。他在学术著作中参译西方文学作品的片段,在文学创作中参译学术文章的观点,有时进行多语种多文献的互文性写作,将参译融入写作,实现更高境界的互文,表明科学研究与现实生活、文学创作虚实相生,体现了学术研究的传承与创新。

4) 打通。《谈艺录》“盖取资异国,岂徒色乐器用”(1),《七缀集》是打通中西、连贯古今的比较文学文集,《管锥编》是参译了英、法、德、意、西、拉丁、希腊等语种众多文

献的辉煌巨著,《钱钟书英文文集》荟萃了他在不同时期用英文写就的有关中西文学关系的多篇论文。这些著作体现了他开阔的学术视野,实现了他追求的“打通”理想:古今之间、中外之间、文字文学文化之间、文史哲之间、创作与研究之间的打通,“打通而拈出新意”。参译文本不仅是钱氏学术著作中添砖加瓦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成为西方文学文化在中国现当代接受和传播的佳译,是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学者以不同形式进行学术交流的文字记录,助推人类语言墙壁的凿通、中西文化藩篱的贯通、人文科技信息的联通和人类文明的会通。正如乐黛云(2004: 152)所言:“‘打通’二字,即突破时间、地域、学科、语言等各种界限和壁垒,以新的学术视野来进行新的学术研究。”

3. 学术参译的原则

学术参译的性质和功用决定了它“为研究参考,跟写作协调”的合作原则,包含忠诚、适度、切合、简练4个准则。

1) 忠诚准则。这是对研究者兼译者的伦理要求,也是对译文之质的要求。一方面,作者在写作中参译其他语种文献时,必须遵守《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971)、《世界版权公约》(1971)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等相关规约、法律,以恰当的方式注明原文出处。对他人成果引而不言,既违背学品,更有辱人品。另一方面,无论作者采取哪种摄取手段,参译文本必须准确、完整地再现原文信息,不能为了追求所谓“六经注我”而误解原文作者的观点或采用的例证;否则,参译会失去参考和引证功能,写作会失去论证力度和学术影响。钱氏的诸多求“化”佳译可为后世垂范,试举一例窥斑见豹:他在论及《随园诗话》中“诗虽新,似旧才佳”时,分别引用尹似村语“得句浑疑是旧诗”和陈古渔语“得句浑疑先辈语”,指出“此境即济慈(Keats)与友论诗第一要义(axiom)所谓‘好诗当道人心事,一若忆旧而得者’”(Poetry should strike the reader as a wording of his own highest thoughts and appear almost a remembrance.),随后标明详尽的引文出处,还引用方德耐尔、柏拉图、约翰生、圣佩韦、德·桑克提斯、海涅、霍姆士等人的语句加以印证(255、573-574)。他采用繁化(增加词语“好”“而得者”)、简化(减译 word-ing、his own、highest)、换化(名词 remembrance 换译为动词“忆旧”)3种全译求化单一机制,出神入化地再现了济慈的观点,并将其无缝融入写作之中。

2) 适度准则。这是对译文之量的要求。学术参译的初衷是为了学术研究的辩证扬弃和推陈出新,适当引用是著作权法合理使用制度的基本要求(吴汉东 1996: 14)。学术参译或参译式写作中,“写”是主体、主导,“译”是次体、次要,参译的内容数量必须适度,合理引用部分通常不超过写作的10%。学界普遍认为钱氏论著中的参译比例较高,但统计后发现,《谈艺录》中参译文字(包括背景介绍、译文和原文、注释、简评等)与其他文字之比为45 433:500 000 $\approx$ 9.1%。如果引用过度,译文超量,作者的观点会淹没在引号之中、消解在他人论据之间,不仅谈不上学术的继承与发展,而且有滥引或抄袭之嫌。

3) 切合准则。这是对译文与正文间关系的要求。学术参译中引用的证据要与研究论题切合,与文本观点吻合,与行文步调一致。一般而言,参译文本前面需有交代或过渡,后有简评或按语,做到边写边译、夹译夹议。钱氏《谈艺录》中参译的西方文献片段,都是用来观照中国古典诗话,主题完全切合,逐一译成典雅文言,既保留原文风格,又与正文和谐共融。学术研究为了跟上人文、科技的最新进展,不仅需要参译经典著作,还要引用最新文

献,如钱氏在《谈艺录》1986年补订本中,增添了83则补正文字,其中包括1985年、1986年出版的最新外文文献。

4) 简练准则。这是译文数量要求在呈现方式上的反映。写作要求言简意赅,其中参译更是如此,条目必须适可而止,文字必须尽可能简练流畅,参译例子必须针对性强、表达力准。引用太多会喧宾夺主,言语繁琐往往失其所用。作者在摄取原文的相关信息时,对于句式繁冗、篇幅较长的内容,可舍弃全译而采用编译、译述、缩译等变译式参译(黄忠廉等2009:210),做到例少证足、言简意赅。

4. 学术参译的规范

研究有范式,写作有章法,参译有规范。钱氏成功的参译实践为我们遵循参译规范树立了一座丰碑,至少要做到二“精”、二“区”、二“注”。

1) 二“精”:精选原文,精求译文。学术研究(尤其在人文社科领域)注重厚积薄发,参译是撰写学术论著的必由之路。作者需具备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积淀,学会用“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语言文化和研究领域,就像钱氏在《谈艺录》中参译西方文学文化著作中的相关片段来证明清代学者对我国文学传统的误会以及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无知或偏见。在信息爆炸、资源共享的互联网时代,我们需要对林林总总的文献进行甄别、精选,考虑原文材料的权威性、代表性、切合性,翻译时必须忠实再现原文信息及其作者的真实意图,以保质定量、精益求精的译文服务于学术研究和写作。

2) 二“区”:区别人己,区分引译。学术研究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将自己和他人的研究成果区分开来,并且向读者做明确交代(邢福义2002)。学术参译作为一种特殊的引用,借他人之言表达作者之意,摄取、翻译他人观点并融入写作之中,故尤其需要区别他人与自己的论点和论据,同时还要区分引用和参译。引用多为原封不动的照搬,不仅包括他人的思想观点,还有其语言表达形式;参译作为一种变译式写作,体现了作者兼译者选取材料时的思维批判性和翻译时的语言创造性。钱氏在《谈艺录》等论著中秉承严谨的学术态度,多用一手文献,避免二次引用可能存在的以讹传讹,多用自译,少用他译(除非是为了译评之需),确保译文与正文的语言表达贴近、文体风格贴合。作为信息时代的学术参译,作者少用他译,既是为了彰显语言的创造性,更是为了合理避免“查重”。

3) 二“注”:注重格式,注明出处。学术参译除了遵守国内外知识产权、著作权的相关法律法规之外,中文著述还应遵循《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2015)以及出版社、期刊杂志的具体规定,外文写作还应参照APA、MLA或Chicago Manual等文献格式。钱氏在《谈艺录》中采用的主要参译格式为:介绍语(原文作者国籍和姓氏)+言说类动词(“曰、写、谓、言、告、云、以为”等)+汉译(直引式汉译用引号,转述式汉译无引号)±原文+注明出处的夹注(采用正文小号字体,用“按、见、参观、于……参观”等标识)±简评^②。具体包括直引、转述、压缩、融入、对照等5种类型。其参译特点是“译”融于“作”,随文而注“译”“作”同中见异,异中见同,参互参观,侧重以西证中,旨在阐明“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1)。无论采取哪种参译格式,钱氏都详细注明原文出处,注明出处的实质是“保护作者精神利益”,标准是“防止读者混淆”(牛强2014:15)。一方面,作者遵循学术参译的合作原则及其准则,既区分人己成果,又分清翻译与引用,方便今后自查自校;另一方面,读者能够一目了然地把握作者的主要论点、论据和

论证, 容易判定作者对前人的继承与创新。

5. 结语

学术参译是研究者主动汲取域外知识、严谨从事学术研究的不二法门, 是跨语言、跨文化、跨社会学术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也是钱氏追求“打通”理想的成功尝试。他的参译实践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学术参译的性质和功用, 认真遵守学术参译的原则和规范。在当下的翻译研究中, 翻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融通还有待深化, 中国文学外译的跨学科研究视角也有待进一步拓展(李琴、王和平 2018)。因此, 钱氏的参译实践也为未来的学术参译研究指明了方向: 加强实证研究的力度与深度, 通过文本比读和统计分析, 系统建构学术参译的方法论体系; 从翻译学与写作学的互动角度考察学术参译中的主体、客体、行为、方式、效果、属性等诸多因素, 探讨如何在参“入”(外译中)和参“出”(中译外)中助力学术的推陈出新; 加深翻译学与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新闻传播学之间的融通力度, 深究学术参译在引进外来科技与文化、传播中华文明、打通中西的使命中如何发挥独特的价值与作用。

注释:

- ① 以下引用该书时只在括号中标明页码。
② “+”表示有其后内容为必选 “±”表示其后内容为可选。

参考文献:

- [1] 黄忠廉. 翻译变体研究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2] 黄忠廉, 等. 翻译方法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3] 黄忠廉, 李明达. 变译方法对比研究 [J]. 外语学刊, 2014, (6): 88-91.
[4] 季进. 钱钟书与现代西学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5] 李琴, 王和平. 国内翻译与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 现状与展望——一项基于 CSSCI 源刊的共词可视化分析 (2007~2016)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 (1): 134-141.
[6] 罗新璋. 译艺发端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
[7] 牛强. 论著作权法中的“注明出处”——兼评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草案)》相关条款 [J]. 知识产权, 2014, (5): 15-22.
[8] 钱钟书. 谈艺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9] 王丽娜. 俄汉参译研究 [D].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6.
[10] 吴汉东. 论著作权作品的“适当引用” [J]. 法学评论, 1996, (3): 14-19.
[11] 邢福义. 社会公益对学风文品的管约 [J]. 语言文字应用, 2002, (4): 10-14.
[12] 乐黛云.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 刘芳亮)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A Reflection on the Translation Variations of *Bibl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f China, by FU Jing-min, p. 1

Based on both the documentary reading and the symptomatic reading, this paper has reflected on the translation variations adopted in the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practice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iming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three questions: Why have translation variations been adopted? What kinds of translation variations been adopted? What norms have the translation variations conformed to?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ranslation variations are actual facts in any translation, and they are feasible and necessary approaches for a new culture fusing into another culture.

Category, Contribu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Translation Variation Theory, by LAN Hong-jun, p. 7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translation theories made in China, the Translation Variation Theory, which has already had a history of about 20 years, has been exerting great academic influence. The theory, as a new endeavor to reveal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its existence. The major contribution of the theory to the discipline is that it conceptualizes and categorizes new ideas of translation, and thus develops a new dimension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future, the theory needs to better its definitions of some key terms, and to clarify its theoretical goals and orientations.

A Study on Academic Reference Translation—A Case Study of Qian Zhongshu's *On the Art of Poetry*, by YU Cheng-fa & WAN Guang-rong, p. 11

An investigation into Qian Zhongshu's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his *On the Art of Poetry* indicates that his translation variation far outweighs complete translation and that reference translation is the most frequently adopted method by Qian. Qian's translation practice helps us gain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academic reference translation and its functions. He sets a good example for us to observe the cooperation principle of academic reference translation and corresponding axioms so as to follow appropriate formats and norms on rational grounds, to our advantage and with restraint.

On Extracted Translation, by REN Dong-sheng, p. 16

The paper proposes a concept of extracted translation on the basis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extracted translation of 8 novels. Extracted translation refers to a series of strategies and methods that aim at enhancing the general reading effect by deleting the trivial characters and minor plots that might be unacceptable to the target readers while maintaining the main body of the work, the basic plot-line, the style of the works, and the overall narrative structure. It consists of three steps: the abstrac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the harmonization of the abstracted text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harmonized text.

The Relational Property of the Mediator of Metaphorical Categorization, by GONG Yu-miao & WANG Yu-liang, p. 25

本刊稿约

1. 本刊刊登英语、俄语、日语及非通用语种语言、文学和相应的中外对比研究学术论文。常设栏目有: 语言与语言学研究、二语习得与外语教学、翻译研究、外国文学研究。同时根据国内外研究热点, 不定期设置专栏(详见本刊主页)。

2. 本刊欢迎以下各类稿件, 尤其是具有独到见解的原创性研究。

1) 语言与语言学研究: 对语言本体的研究; 对语言学各领域、各交叉语言学科的原创性研究和综述。可以考察英语、俄语、日语及非通用语种的某一具体现象, 也可以进行外汉对比, 但无论研究何种语言现象都须把研究内容置于国际研究的背景下。也欢迎借鉴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现象的原创性论文。

2) 二语习得与外语教学: 对外语教学与测试以及二语习得理论和方法的实证研究。也欢迎介绍某一前沿理论或方法, 对热点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批判性分析的综述类论文。

3) 翻译研究: 对翻译理论、实践和方法以及翻译教学的研究。特别欢迎有数据支持的语料库翻译研究、汉译外研究和翻译教学研究等。

4) 外国文学研究: 对外国文学理论、作品、作家、思潮的分析与评论。

3. 来稿力求简练, 论文以不超过 10 000 字为宜。正文中不要出现作者的姓名、单位和作者信息, 以便于匿名评审。

4. 请使用本刊主页 (<http://jfw.cbpt.cnki.net>) 上的“作者投稿系统”进行投稿。注意事项和格式要求见主页的“投稿指南”和“下载中心”的例文。

5. 本刊力求高效处理稿件, 一般不超过 3 个月, 过期可投他刊。

6. 对刊登的稿件, 本刊一般不付报酬, 届时将寄送每位作者当期刊物 2 册。

7. 由于编辑部人员有限, 如需咨询, 请发电子邮件至 jfwgyxyxb@vip.163.com, 编辑部会尽快回复。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双月刊)

第 41 卷

Jiefangjun Waiguoyu Xueyuan Xuebao

2018 年第 4 期(总第 217 期)

主办单位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编辑出版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

主 编 陈 勇

通信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 036 信箱 120 号

学报编辑部(邮编 471003)

联系电话 (0379) 69843520

印 刷 洛阳市天彩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 洛阳市邮政局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订 阅 全国各地邮局

出版时间 2018 年 7 月 15 日

电子信箱 jfwgyxyxb@vip.163.com

网 址 <http://jfw.cbpt.cnki.net>

定 价 10.00 元

刊 号 ISSN 1002-722X
CN41-1164/H

邮发代号 国内 36-212
国外 BM1651

ISSN 1002-722X



门罗·比厄斯利、阿瑟·丹托、 诺埃尔·卡罗尔的艺术批评^①

[美]柯蒂斯·卡特 著
余承法 陈 敏 译

内容提要 在三位美国批评家、美学理论家门罗·比厄斯利、阿瑟·丹托、诺埃尔·卡罗尔的论著中,艺术批评与美学密切相关。他们在各自的实践中有着不同的关注焦点:比厄斯利认为艺术批评的主要角色是描述,丹托认为艺术批评的主要任务是阐释,卡罗尔并不否认艺术批评中描述和阐释的作用,但认为艺术批评的首要任务是评价。艺术批评家对于一件艺术品的知识,在某些重要方面不同于艺术家赋予作品的知识。视觉艺术家、演员和舞蹈家的知识既包括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获得的内在体验,也包括从艺术品本身得到的经验。批评家不直接参与在场的实际艺术创作过程,也不具备创作者和表演者的亲身经历,视觉艺术家和表演家拥有的知识只能通过实际的艺术创作过程获得。艺术家将实际创作和表演过程中的丰富体验融入作品之中,而这种丰富体验丧失在批评家的外部观察或者对于某件作品的预判断之中。

关键词 门罗·比厄斯利 阿瑟·丹托 诺埃尔·卡罗尔 艺术批评

本文旨在评析三位美国哲学家门罗·比厄斯利(Monroe Beardsley, 1951 - 1985)、阿瑟·丹托(Arthur Danto, 1924 - 2013)、诺埃尔·卡罗尔(Nöel Carroll, 1947 -)的艺术批评。他们在各自论

① 本文为美国马凯特大学哲学教授柯蒂斯·卡特(Curtis Carter)在“中华美学的传承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华美学学会2017年年会(中南民族大学,2017年10月20—22日)外国美学圆桌会议上的主旨发言。诚挚感谢卡特教授的细心解答和高建平教授的慷慨指导!——译注(以下未标明为“译注”的注释均为原注)

著中涉及了 20、21 世纪艺术批评,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绩。^①

近年来,艺术批评吸引了众多美学家的关注,在考察艺术批评和美学理论的关系上,比厄斯利、丹托、卡罗尔做出了卓尔不凡的贡献。他们在艺术实践和哲学美学方面拥有广博的知识:比厄斯利从新批评视角研究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丹托侧重视觉艺术,卡罗尔则主攻电影和先锋派戏剧与舞蹈。他们都因对美学理论的突出贡献而闻名于世,同时也都从事艺术批评:比厄斯利进行文学艺术批评,丹托长期担任美国《国家》杂志(*The Nation*)的视觉艺术评论人,卡罗尔是《艺术论坛》(*Art Forum*)、《戏剧批评》(*Drama Review*)、《苏豪周刊艺术新闻》(*Soho Weekly Art News*)等刊物的评论人。^②

本文讨论的批评主要包括三种形式:描述、阐释和评价。批评家也可能探讨诸如某位视觉艺术家、作家或表演家的风格特点等更加宽泛的问题,也可能研究某一特定艺术媒介的整体特征。艺术批评的一个总体目标是,提高我们对于视觉艺术、文学艺术和表演艺术的理解或认识。随着大众传媒和数字艺术的兴起,艺术批评正向这些新的艺术形式以及更多传统艺术延伸。

批评家对一件艺术品的描述包括哪些内容?这基于作品本身给

① 本文评析的三位批评家门罗·比厄斯利、阿瑟·丹托、诺埃尔·卡罗尔的艺术批评,不包括基于后现代理论、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的艺术批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在本雅明·布赫洛(Benjamin Buchloh, 1941-)、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 1955-)、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 1941-)等人参与的圆桌讨论已经讨论过,见《圆桌会议:艺术批评的目前状况》("Roundtable: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Art Criticism"),《十月》(*October*), 2002 年第 100 期,第 201—228 页。比厄斯利、丹托、卡罗尔等美国学者进行艺术批评时,除了简单提及各自他们的方法之外,并没有运用基于神经的、受到弗洛伊德学说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或者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批评方法。本文涉及比厄斯利三位学者的艺术批评,不包括在更广泛的全球场景(如在中国、印度和其他非西方文化的国家、地区)中进行批评实践的方法,也不包括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 1906-1978)、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 1909-1994)、芭芭拉·罗丝(Barbara Rose, 1938-)、琳达·诺克林(Linda Nochlin, 1931-)、康奈尔·韦斯特(Cornell West, 1953-)等美国批评家的观点,他们从艺术史或其他文化基础的视角从事艺术批评,见威尔·芬斯特梅克(Will Fenstermaker):《十篇永远改变了艺术批评的文章》("The 10 Essays That Changed Art Criticism Forever"),《艺术空间》(*Art Space*), 2017 年 6 月 14 日。

② 大量证据表明,丹托和卡罗尔从事过艺术批评。《审美观点论文集》(*The Aesthetic Point of View: Selected Essays*, 比厄斯利著)的编者迈克尔·琳(Michael J. Wreen)在 2016 年 1 月与另一编者唐纳德·卡伦(Donald M. Callen)的个人访谈时指出,比厄斯利的论著涉及艺术批评和审美理论。

予感官的印象：它的外观、声音和感觉。批评家的描述中涉及的艺术品特性，部分是可以被直接观察到的，但并不是所有。例如，作者意图，文学作品的情感基调，视觉艺术品的色彩、形状和线条以及身体在运动中的造型和动作（包括速度、持久力、强度等属性），都很容易被经验丰富的批评家观察到。在戏剧表演中，服装、灯光、布景设计、音乐类型以及声音和运动的样式等，也同样得以观察。对于体验艺术非常重要的其他特征，不易被一般意义上的视觉和听觉实证直接察觉，而是根植于批评家的身心。但这些特征对批评家描述一件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意义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动觉性、表现性、形式性三个特征相互作用，为作品创造一种整体的风格感。因此，批评家既关注一些突现的、整体的属性——这些属性将作品界定为一个整体，也关注作品各部分的特性。描述作品中更加微妙的内容时，需要敏锐的观察技能和创造性的语言运用。

跟描述不同，阐释和评价要求批评家依据自身的经验和知识来阐述自己对于作品的观点。在阐释中，批评家可以从总体上阐明与作品相关的内容，并参照其他同类作品对整体意义和贡献提出意见和建议。阐释是把某件艺术品的主要特征与一个观念或信念框架和作品外部的社会环境相联系。面对毕加索的《格尔尼卡》（1937），批评家可能指出欧洲现代艺术的艺术革命，包括毕加索对立体派风格的独特贡献，以及1930年代西班牙内战时期的一系列社会、政治事件。谈到现代舞蹈，批评家可能引导观众联系到现代舞创始人之一的多丽斯·韩福瑞（Doris Humphrey, 1895—1958年）的《震荡教徒》（“The Shakers”，1931）与20世纪美国现代舞的运动风格转变，19世纪宗教团体“震荡派”的信念和实践。

作为批评的三种形式之一，评价需要批评家具备与所评艺术形式相关的批评专业性知识。例如，评价需要对一件艺术品进行价值评判，必须考察诸多因素，诸如所评作品的独创性，概念展示的重要性，表演者的技巧性、生动性或枯燥性，以及表演风格的创造性、社会关联性，批评家的品位及其感知和解释技能。在最佳意义上，批判性评价来源于这些因素是在场还是缺席，是优势还是劣势，并为这些因素所制约。

然而，艺术批评家的任务必然依赖另外一些概念工具，这些工具由艺术史、艺术理论（如再现、表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提供。一位优秀的批评家会利用来自深入的专业经验的感知技能，同时考虑

某件艺术品与其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关系。比厄斯利、丹托、卡罗尔还运用了各自的美学理论为他们的艺术批评提供哲学框架。

艺术批评家对于作品的知识,在某些重要方面不同于艺术家赋予作品的知识。视觉艺术家、演员、舞蹈家的知识既包括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获得的内在体验,也包括从艺术品中得到的经验。批评家不直接参与在场的实际艺术创作过程,也不具备创作者和表演者的亲身经历,视觉艺术家和表演家拥有的知识只能通过实际的艺术创作过程获得。因此,艺术家将实际创作和表演过程中的丰富体验融入作品之中,而这种丰富体验丧失在批评家的外部观察之中,或者对于某件作品的预判断之中。

1. 比厄斯利的艺术批评

比厄斯利的批评思想在其著作中占有很大篇幅,以他与 W. K. 温姆萨特(W. K. Wimsatt, 1907 - 1975)的合撰论文《意图谬误》(1946)为开端,他相继出版了有关艺术批评的众多著作,包括:《美学:批评哲学中的问题》(*Aesthetics: Problems in the Philosophy of Criticism*, 1958)、跟赫伯特·舒勒尔(Herbert M. Schueller)合编的《美学研究:艺术批评与艺术哲学论文集》(*Aesthetic Inquiry: Essays on Art Crit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Art*, 1967)、《批评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Criticism*, 1970)等,以及在198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期刊论文和专著章节。^①

比厄斯利和温姆萨特反对阐释和评价艺术品时与作者意图进行任何关联。^② 他们的论文《意图谬误》一直被各种期刊广泛转载,经常被文学理论家热烈讨论,因而奠定了比厄斯利在艺术批评领域的突出地位。他在随后的论文《意图与阐释:重新抬头的谬误》(“Inten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A Fallacy Revived”, 1982)中,并没有放弃早期否认作者意图的观点,但将作者称为“任何有意创作由口头或书面的

① 比厄斯利有关艺术批评的论著,详见《门罗·比厄斯利美学著作目录》(“Bibliography of Writings in Aesthetics by Monroe Beardsley”),门罗·比厄斯利(Monroe Beardsley)著,迈克尔·琳(Michael J. Wreen)和唐纳德·卡伦(Donald M. Callen)编:《审美观点论文集》(*The Aesthetic Point of View: Selected Essay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第371—378页。

② 门罗·比厄斯利(Monroe Beardsley)、W. K. 温姆萨特(W. K. Wimsatt):《意图谬误》(“The Intentional Fallacy”),《塞万尼评论》(*Sewanee Review*),1946年第3期,第468—488页。

自然语言文字组成,按照句法规则安排的单词序列的文本的个人”^①。他一贯反对的追问艺术家意图的实质在于,他将艺术品视为一种象征,一种施为行为或再现,^②正如他在坚持“新批评”实践时的主张:重点在于艺术品本身,而非艺术家创作艺术品时的想象活动。^③ 尽管比厄斯利最初反对在批评中运用艺术家意图,但他在后期的美学论著中承认艺术家意图发挥的作用。他在学术生涯晚期发表的论文《艺术的美学定义》(“An Aesthetic Definition of Art”, 1983)中,认为艺术家意图似乎起着关键作用,“一件艺术品是为了让它满足审美兴趣而产生的”^④。在这里,他的关注重点已经转向为获得审美体验而走向艺术家创造的产品(即艺术品)的审美兴趣。

虽然比厄斯利对艺术批评的突出贡献源于他对艺术家意图的看法,但另一个中心主题,也许是他研究中更重要的一个主题,是关于艺术批评和美学的关系。他在《美学:批评哲学中的问题》的导论中写道:“尽管美学和批评有各自不同的任务,但它们无法脱离对方而存在。”^⑤他在继续阐述艺术批评和美学的关系时指出:“对于一位优秀的批评家,积累跟艺术相关的大量信息和丰富经验是远远不够的。”^⑥优秀的批评家必须学会呈现艺术经验,并将艺术经验与其他方面的世界经验以及作为哲学学科的美学所运用的概念相联系。当然,美学概念指向除描述以外的两个重要艺术批评问题——阐释和评估,例如:“批

① 门罗·比厄斯利(Monroe Beardsley):《意图与阐释:重新抬头的谬误》(“Inten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A Fallacy Revived”),迈克尔·琳(Michael J. Wreen)、唐纳德·卡伦(Donald M. Callen)编:《审美观点论文集》(*The Aesthetic Point of View: Selected Essay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第189页。

② 在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 1911-1960)和美国哲学家约翰·赛尔(John Searle, 1932-)的著作中,“施为行为”(illocutionary acts)是包括宣告类、指令类和表达类(declarations, directives and expressives)在内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s)。

③ 同①,第194页。

④ 门罗·比厄斯利(Monroe Beardsley):《艺术的美学定义》(“An Aesthetic Definition of Art”),见休·梅塞·科特勒(Hugh Mercer Curtler)编《艺术是什么?》(*What Is Art?*) (New York: Haven Publications, 1983),第15—29页;彼得·拉马克(Peter Lamarque)、斯坦·郝高姆·奥尔森(Stein Haugom Olsen)编:《美学与艺术哲学研究文集——分析的传统》(*Aesthe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Art—The Analytic Tradition: An Anthology*)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4),第58页。

⑤ 门罗·比厄斯利(Monroe Beardsley):《美学:批评哲学中的问题》(*Aesthe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Critic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58),第4页。

⑥ 同上,第5页。

评家究竟如何看待审美对象及其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①

比厄斯利在论著中一再强调美学与艺术批评密不可分。批评家该说什么仍然是哲学美学感兴趣的主要话题。在这个方面,批评家的普遍实践是“为检验假定的美学理论的真实性提供重要证据”^②。不过他也承认,他二十多年前提出用元批评来界定美学的建议可能有点偏激。

2. 丹托的艺术批评

丹托在艺术批评方面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也许是《寻常物的嬗变》(*The Transfiguration of the Commonplace*, 1981)。^③他在书中阐述了有关艺术与哲学关系的观点,提出了一种艺术哲学理论,其中包含被认定为艺术品所必需的条件。他认为,这本书促使了他决定当一名艺术批评家。

出于对艺术批评的兴趣,丹托在1984年10月应邀担任《国家》杂志的艺术评论人(直到2009年),开始了新的职业道路。他在选择从事艺术批评时,加入了由美国画家费尔菲尔德·波特(Fairfield Porter, 1907 - 1975)、美国极简主义艺术家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 1928 - 1994)和诗人约翰·阿什伯里(John Ashbury, 1927 - 2017)等人组成的行列。

在某种程度上,丹托艺术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始于对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 1928 - 1987)的《布里洛盒子》(*Brillo Box*, 1964)而产生的有关艺术品身份的困惑。他的系列思考最终解决了美学如何区分艺术品与具有类似感性特征的非艺术品这一问题。^④他在《美学与艺术批评》(“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1994)一文中,再次探讨了这一

① 门罗·比厄斯利:《美学:批评哲学中的问题》,第45页。

② 门罗·比厄斯利(Monroe Beardsley):《审美观点论文集》(*The Aesthetic Point of View: Selected Essays*),迈克尔·琳(Michael J. Wreen)、唐纳德·卡伦(Donald M. Callen)编(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第317页。

③ [美]阿瑟·丹托:《寻常物的嬗变》,陈岸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译注

④ 阿瑟·丹托(Arthur C. Danto):《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第61页。丹托在《美学与艺术批评》(“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艺术的本体论地位,这与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Brillo Box*, 1964)相关。见阿瑟·丹托《被呈现的意义:批评论文与美学沉思》(*Embodied Meanings: Critical Essays and Aesthetic Meditations*)(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94),第382—384页。

主题,并且指出:沃霍尔艺术品《布里洛盒子》和设计师史蒂夫·哈维(Steve Harvey, 1956-)广告作品《布里洛盒子》之间的差异,实质上是与两个对象相适应的艺术批评的差异:“史蒂夫·哈维的盒子是有关布里洛的,是有关速度和清洁之类的价值……沃霍尔的肖像画更为复杂,与这些价值毫无关联,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哲学的,是关乎艺术的……”^①

丹托将艺术批评家的工作简括为一个双重任务:“确定艺术品的意义,阐明该意义如何体现于作品之中。”^②他对艺术品的形式特征没有兴趣,除非它们在阐明艺术“被体现的意义”方面发挥作用。这里“被体现的意义”不是艺术家的发明,而是源于艺术家生活在其中并与更大群体分享的世界,这可能包括艺术世界和社会的其他方面。因此,阐释是丹托理解艺术批评的主要兴趣所在。他不否认他的艺术批评也可能包括评价,但坚持认为评价是次要的,而且只有服务于阐释时才有意义。^③

他在《从美学到艺术批评再回到美学》(“From Aesthetics to Art Criticism and Back”, 1996)一文中,十分推崇黑格尔关于“艺术的内容”和“艺术品的表现手段”的智力判断,并评论道:“批评别无所需,只需要确定意义和表现方式……基于‘艺术品是被体现的意义’这一论点。”这实质上相当于将艺术定义为从观察者“旨在把握艺术品蕴含的意图而做的解释行为”中引出的“被体现的意义”。^④

① 阿瑟·丹托:《安迪·沃霍尔》,第61页。丹托在《美学与艺术批评》(“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艺术的本体论地位,这与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Brillo Box, 1964)相关。见阿瑟·丹托《被呈现的意义:批评论文与美学沉思》(Embodied Meanings: Critical Essays and Aesthetic Meditations)(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94),第386页。

② 同上,第xiii页。

③ 诺埃尔·卡罗尔(Nöel Carroll):《阿瑟·丹托的艺术哲学与批评实践》,彭锋编:《美学与当代艺术》(Aesthetics and Contemporary Art)(《美学国际年刊》,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Aesthetics, 2012年第16期),第48—68页。

④ 阿瑟·丹托(Arthur C. Danto):《从美学到艺术批评再回到美学》(“From Aesthetics to Art Criticism”),《艺术的终结之后》(A. W. 梅隆美术讲座,1995年伯林根系列第35:44讲)(After the End of Art, The A. W. Mellon Lectures in the Fine Arts, 1995 Bollingen Series, 第98页。不同于我们在这里使用的美学包括艺术的感知方面和艺术哲学,丹托对美学和艺术哲学做了明确区分,这在一系列著作中都有体现,包括他的最后一本书《艺术是什么》(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他在该书中指(转下页)

尽管丹托在《寻常物的嬗变》中指出了某物被认定为艺术品的条件,但他坚持认为,就其艺术批评实践而言,他乐于接受传达艺术之哲学本质的任何艺术。^① 作为批评家,丹托愿意接纳在多元艺术世界中可能出现的任何艺术变体。有些艺术家希望其作品代表某种历史性突破,但丹托对这些艺术家没有兴趣,因为艺术史上的这些进展已经终结了。某个固定议程或某些审美特质对于艺术批评实践都不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丹托感兴趣的艺术品范围不同于比厄斯利,后者并未将法国艺术家杜尚的现成品和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之类的东西纳入其艺术品范围。在丹托看来,批评家实践的重心是审美特质或其他艺术元素对艺术品进行最佳解释的方式。丹托继承了黑格尔的美学精神,认为艺术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整体……看不到这一点的任何批评都不会有什么价值”^②。

3. 卡罗尔的艺术批评

卡罗尔作为艺术批评家的早期经历主要是关于 1970—1980 年代纽约下城区剧院舞蹈、电影和演出的艺术世界的研究。他的批评对象主要是下城区的艺术家,不同于丹托艺术批评中的纽约上城区的艺术世界。^③ 卡罗尔的艺术批评记录了某一特定场所中“丰富而活泼”的先锋派艺术的新动向。他和同时代的年轻批评家实际上构成了艺术场

(接上页)出,美学为事物的感官动作(感性)提供支持某种观点的辩论,艺术哲学则聚焦于区分艺术品与非艺术品的问题。见约瑟夫·唐克(Joseph Tanke):《艺术的艺术性:阿瑟·丹托〈艺术是什么〉评介》,《美国艺术》(*Art in America*),2013 年 8 月 30 日。

① 丹托对“什么构成艺术”这一问题的最后思考形成于《艺术是什么》之中。他在书中指出,艺术哲学是“试图区分艺术与世界上的其他事物”,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什么让艺术成为艺术?”引自约瑟夫·唐克(Joseph Tanke)《艺术的艺术性:阿瑟·丹托〈艺术是什么〉评介》,《美国艺术》(*Art in America*),2013 年 8 月 30 日。

② 阿瑟·丹托(Arthur C. Danto):《艺术的终结和艺术批评家》(“The End of Art and Its Critics”),见《绞车与弓:艺术哲学与艺术理论丛书》(*Lier en Boog: Series of Philosophy of Art and Art Theory*),1998 年第 13 卷,第 54 页。

③ 这个纽约艺术世界在 1960 年代出现,在 1970、1980 年代进一步发展,相关图片详见萨利·贝恩斯(Sally Banes, 1949—)的著作《1963 年的格林尼治村:先锋派表演和欢乐的身体》(*Greenwich Village: Avant-Garde Performance and the Effervescent Bod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和《颠覆性的期望:1976—1985 年间纽约的表演艺术与准剧院》(*Subversive Expectations: Performance Art and Paratheater in New York: 1976 - 85*) (Ann Arbor, MI: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中译本参见[美]萨利·贝恩斯著,华明等译:《1963 年的格林尼治村:先锋派表演和欢乐的身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译注

景中活生生的一部分。在这个场景中,他看到了创新艺术在徐徐展开,后现代舞蹈编导跟画家和雕塑家(经常将其艺术品演变为表演艺术)保持互动交流。^①

卡罗尔后来对艺术批评的观点在专著《论批评》(*On Criticism*, 2008)中得到了强化,并在最近的系列文章中做了详尽阐述,尤其是他回应丹托和比厄斯利艺术批评的那些论文。他艺术批评的核心概念是评价——用事实证据支持艺术判断的严密推理过程。根据卡罗尔的规范性观点,批评家的角色就是展示一件艺术品具有价值并阐明理由,诸如艺术家意图、艺术品相关艺术范畴中的划分、相关历史背景等。

卡罗尔的一篇相关论文《艺术欣赏》(“Art Appreciation”, 2016),虽然不是艺术批评,但他着重探讨了艺术批评的一个中心目标——提升艺术欣赏。他在该文中区分了艺术欣赏的两种形式:“喜欢”和“估量”。就批评而言,他认为“喜欢”的艺术欣赏少有或根本没有价值。另一方面,他发现了估量与艺术批评之间的密切联系。卡罗尔眼中的艺术批评过程,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哲学家解决其他领域的问题特别是价值问题时可能采取的逻辑分析过程。

4. 简评比厄斯利、丹托和卡罗尔的批评方法

对于什么是批评家感兴趣的批评对象,比厄斯利、丹托和卡罗尔三人没有达成最终共识。在比厄斯利看来,艺术批评重在艺术品自身的审美特质。对丹托而言,艺术批评的重点是联系更广阔的艺术、文化背景来阐释通常出现于展览环境中的艺术品的意义。卡罗尔则认为,艺术批评的重点是特定艺术品或者其主体部分以及批评家参考某个艺术时期或类型对作品进行的恰当定位。这些元素,加上对艺术家意图的理解,在某种可以认知的程度上,为批评家进行评估提供了理性依据。三位哲学家中,也许卡罗尔对“什么是批评家感兴趣的批评对象”做了最贴近的界定。

^① 诺埃尔·卡罗尔(Noel Carroll)有关艺术批评的系列研究收录于论文集《生活在艺术世界之中:1970、1980年代舞蹈、表演、戏剧和美术的评论与论文》(*Living in an Art World: Reviews and Essays on Dance, Performance, Theater, and the Fine Arts in the 1970s and 1980s*)(Louisville, KY: Chicago Spectrum Press, 2012)。他将后现代舞蹈、后现代绘画等术语的特征概括为风格标记,最终汇聚为“后现代主义”这个更加包容的概念,见第338—351页。

艺术批评的三个方面即描述、阐释和评价不时受到挑战,例如,被自然科学所建构的认知意义进行标准评判时。一般说来,正如美国学者约瑟夫·马戈利斯(Joseph Margolis, 1924—)所言,需要核实对作品的描述是否符合事实时,描述意味着一个稳定的、定义明确的、可供检查的对象。^① 是否符合“稳定艺术品”的必要条件取决于媒介,例如,物理媒介在包括绘画、电影和数字艺术品在内的几乎所有艺术实践中,都因为特定作品可能受到损害,或是由于媒介处理技术的淘汰而发生一些变化。

阐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一场表演的描述性事实来核查,批评家和读者都应该在上述限制范围内做到这一点。另外,有时可能对一件艺术品给出不止一种可以接受的解释,而不要求达成一致。阐释不会为了具有认知意义而被判定对错。阐释或许是有趣的、合理的、可能的,但仍然具有认知意义,尤其体现在由艺术史和艺术实践知识构成的专业背景中进行批评的情况之中,或者由训练有素的观察者进行批评的情况之中,因为他们在作为批评家的定期实践中培养了高超的感知技巧和表述能力。

评价,即对一件艺术品的意义进行评估或价值判断,在长期的艺术批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批评性评价无法在任何简单意义上被判定对错,但能够帮助我们更仔细观察并反思艺术品的意义,从而增长我们的知识。评估似乎是描述过程和阐释过程的一个自然结果,但在某些方面评估是最有问题的。上文提到的艺术家意图在艺术批评中的作用,引起人们对艺术家意图在评估艺术品中作用的争论,美国美学家对此讨论得尤为激烈。例如,不妨回顾一下,比厄斯利在早期论著和后续研究中都回避了艺术家意图,他认为:“在判断一部文学艺术作品是否成功时,作家意图既不是一个适用标准,也不是一个理想标准。”^②对于艺术家意图,卡罗尔的看法跟比厄斯利不同,他认为:仔细审视艺术品,借助艺术家的日记或传记等外部资源,可以充分认

① 约瑟夫·马戈利斯(Joseph Margolis):《艺术与哲学:美学中的概念问题》(*Art and Philosophy: Conceptual Issues in Aesthetics*)(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89),第111页。

② 门罗·比厄斯利、W. K. 温姆萨特:《意图谬误》,《塞万尼评论》,1946年第3期,第468—488页。

识艺术家意图,以及艺术家意图在理性评估艺术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作者单位:美国威斯康星州马奎特大学

译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学术编辑:刘卓

图像显示了什么^①

[德]斯蒂凡·马耶夏克 著
余承法 陈 敏 译

一、图像：凝视的现象

图像吸引观众凝视的能力一直令人着迷。在自然主义流派的图像中,图像的再现有时与我们在现实中感知的内容非常接近,以致我们几乎被骗了。不知为什么,我们倾向于说,图像中显现的内容如同真的一样,并且远比只能借助词语、句子等任意语言符号所做的描述更贴近、更直接。让刻画对象如在眼前的这种体验,导致历史上不断发生两种现象:经常归因于图像的神话般的,甚至是神奇的特质;对于图像的强烈情感反应——介于宗教偶像崇拜和破除偶像迷信主义之间的一种反应。^② 我们看照片时,如图 1,美国摄影师理查德·艾维顿(Richard Avedon, 1923—2004)1963 年拍摄的《生而为奴的威廉·卡斯比》(“William Casby, born in slavery”, 1963),不仅仅是在辨认各种化学成分固定在相纸上的灰度关系,而且就像我们在直视主人公

① 本文为德国卡塞尔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哲学教授斯蒂凡·马耶夏克(Stefan Majetschak)在“中华美学的传承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华美学学会 2017 年年会(中南民族大学,2017 年 10 月 20—22 日)外国美学圆桌会议上的主旨发言。诚挚感谢马耶夏克教授的细心解答和高建平教授的慷慨指导!——译注(以下未标明为“译注”的注释均为原注)

② 阿瑟·丹托(Arthur C. Danto):《刻画与描写》(“Depiction and Description”),见《哲学与现象学研究》(*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第 43 卷第 1 期(1982 年),第 1—19 页。

的眼睛。^①

借用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 1404—1472)的著名比喻 *aperta fenestra* (打开的窗户)^②,图1这样的图像仿佛让我们通过一扇打开的窗户看见事物;换言之,图像不仅显现具体形状和颜色的星丛,而且使刻画对象显而易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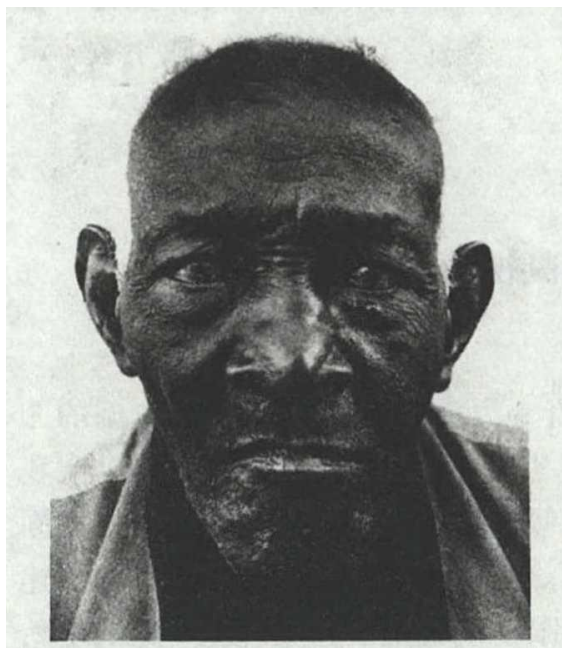


图1 理查德·艾维顿:《生而为奴的威廉·卡斯比》(1963年)

观看图像时,我们所体验到的事物变得可见,图像的这种力量令人着迷,有时几乎令人难以抗拒,但很难对图像的本体论地位以及决定其可视化能力的诸多规则进行概念阐明,因为图像是凝视的现象。不同于其他存在类型,如物质的东西、数字和想法,图像在本体论上不外乎是人类感知的一些现象,即看见事物以特定形状和颜色显现于画面有限连续区域之中。这种情况发生时,就意味着图像制作者在技术或艺术上成功地以这种方式安排

了标记网络:使得一些物质因素,诸如图像平面的形状和质量、颜料的性质、笔画的视觉质量等,不会或至少不会主要成为感知的对象,而是对图画显现的事物打开一个视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眼前有一

①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明室——摄影纵横谈》(*Camera Lucida: 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Howard)译(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1),第34—38页。中译本参见[法]罗兰·巴特著,赵克非译:《明室——摄影纵横谈》,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第55—56页。——译注

② 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论绘画》(*De Pictura*),见奥斯卡·贝奇曼(Oskar Bätschmann)、克里斯多夫·绍布林(Christoph Schaublin)编辑、介绍、翻译和评论,克里斯汀·帕茨(Kristine Patz)参与:《雕刻、绘画艺术、绘画基础:拉丁语—德语》(*Das Standbild. Die Malkunst. Grundlagen der Malerei, Lateinisch—Deutsch*)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00),第224页。中译本参见[意]阿尔贝蒂著,胡珺、辛尘译:《论绘画》,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年。——译注

幅“图像”。

当然,对于大多数图像,观察者对于什么是可见物的视角并不是纯粹的。因为很显然,图像也通常被当作颜色和形状的星丛来看待,或者至少可以这么来看,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建筑师戈特弗里德·波姆(Gottfried Boehm)和美国著名哲学家、艺术批评家阿瑟·丹托(Arthur Danto)都强调,涉及图像时,必须在原则上区分为某物打开视角的时刻和关闭视角的时刻,基于图像自我呈现的方式,即波姆所强调的“透明和不透明”(transparency and opacity)——这两者属于同等的“构成时刻”(constitutive moments)。^①在很大程度上,每幅图像既透明地显现某物,与此同时又以不透明的方式只显现自身。从照相写实主义到单色场绘画的范围内,每幅图像都介于纯粹透明地呈现其他东西和纯粹不透明地自我呈现的可能性之间,这种可能性最终决定图像呈现的语义范围或空间。^②

如果我们撇开图像的本体论地位问题,而讨论如何从理论上解释事物在图像中可视的过程,情况几乎不会变得更简单。从柏拉图(《智者篇》, *The Sophist* 240a)直到现在,欧洲思想界在努力寻找这个问题的恰当答案时,一直聚焦于“相似性”概念。其基本观点是,在图画标记的星丛中,有些事物变得可见,是因为这个星丛相似于现实中形状和颜色的可视星丛。这个观点自柏拉图提出以来,就自然而然地以不同方式确立下来。但事实上,“相似性”概念的任何解释能真正帮助我们理解事物在图像上可视的过程吗?我们所观看的理查德·阿维顿拍摄的这张照片之所以是一幅真正的图像,难道就是因为它与一个名

① 戈特弗里德·波姆(Gottfried Boehm):《从媒介到图片》(“Vom Medium zum Bild”),见根多尔夫·温特(Gundolf Winter)、伊冯·斯皮尔曼(Yvonne Spielmann)编:《图像—媒介—艺术》(*Bild, Medium, Kunst*)(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1999),第167页。另见戈特弗里德·波姆(Gottfried Boehm):《图像的返回》(“Die Wiederkehr der Bilder”)、《图像的问题》(“Die Bilderfrage”),见戈特弗里德·波姆(Gottfried Boehm)编:《图像是什么?》(*Was ist ein Bild?*)(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1994),第33、338页;阿瑟·丹托(Arthur C. Danto):《寻常物的嬗变: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The Transfiguration of the Commonplace: A Philosophy of Art*)(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第159页。中译本参见[美]阿瑟·丹托著,陈岸瑛译:《寻常物的嬗变: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译注

② 伯恩哈特·瓦尔登菲尔茨(Bernhard Waldenfels):《可视性顺序》(“Ordnungen des Sichtbaren”),见戈特弗里德·波姆(Gottfried Boehm)编:《图像是什么?》(*Was ist ein Bild?*)(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1994),第23页。

叫威廉·卡斯比的人相似吗？产生直视他眼睛的这种感觉跟这幅图像与威廉·卡斯比相似有什么关系吗？我们实际上知道这张照片跟任何人(或任何事物)相似吗？1963年，艾维顿拍这张照片时，人们普遍认为每张照片都预设了一个外部参照。鉴于当下计算机制作图像的可能性，我们现在只能确信，面前的这幅图像看起来像是一张跟参照物有关联的、机械的照片。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感觉许多图像与其呈现对象相似，这是无可争议的。德国著名哲学家伯恩哈特·瓦尔登菲尔茨(Bernhard Waldenfels, 1934—)说得对：“如果古希腊画家宙克西斯(Zeuxis)画的葡萄看起来跟食用的葡萄完全不同，就没有人会说，他画的是葡萄，并用来诱惑鸟儿。如果图像中出现的東西不能看起来像描绘的对象，柏拉图和其他研究者就不会对绘画的魔力产生如此敌意。”^①尽管如此，我认为美国著名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 1906—1998)的下述观点是对的：要解释事物在图像中可视化的方式，我们必须放弃用“相似性”对代表性现象进行实例化的想法。我认为，古德曼不仅能够解释诉诸图像与呈现对象之间的客观相似概念是无意义的，而且能够表明，代表性现象通常来源于我们在特定情境中的阐释性决定——将视野内的可视标记网络当作以语义和句法的密度、饱和度为特征的符号系统中的元素。^②

鉴于上文提到计算机制作图像的技术可能性和古德曼对相似性概念的根本批判，相似性概念是否应继续在图像理论中扮演主要角色，事实上已引发争议。我不打算在下文中细究相似性这个问题，而是试图在完全避谈相似性概念的情况下概述对图像的理解。为此，我将首先认为，图像大体上可以理解为“可视性的定义”。然后，我将以

① 伯恩哈特·瓦尔登菲尔茨(Bernhard Waldenfels):《镜子、轨迹与凝视:关于图像的起源》(*Spiegel, Spur und Blick: Zur Genese des Bildes*)(Köln: Salon Verlag, 2003),第7页。

② 关于古德曼对相似性概念的批评,见斯蒂凡·马耶夏克(Stefan Majetschak):《图像与可视性:对跨越不同学科的图像概念的思考》(“Bild und Sichtbarkeit: Überlegungen zu einem transdisziplinären Bildbegriff”),见《美学与艺术史杂志》(*Zeitschrift für Ä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第48卷第1期(2003年),第30页等。另见斯蒂凡·马耶夏克(Stefan Majetschak):《图像转向:关于图像理论现状的批评性修改和一些论文》(“Iconic Turn. Kritische Revisionen und einige Thesen zum gegenwärtigen Stand der Bildtheorie”),见《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Rundschau*),第49卷第1期(2002年),第50页。

此为基础,探讨艺术图像和非艺术图像之间的差异。因为,即使我们大致了解像艾维顿的照片这样的图像如何与所描绘的可视性相关,我们仍然不知道面前的图像是何种类型。

二、图像：可视性的定义

如上所述,图像是可视的,是作为由颜色和形状构成的不透明物体而可视的,但同时也透明地使某些本身不可见的物体变得可见。^①如果这个定义没有反映出对图画性现象的完全误解,那么必须由恰当的图像理论来回答的这个问题就很明显,即:图像的可视性如何与图像中可视内容的可视性(即图像指代物体的可视性)相关?有关图画相似性的主导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假定,图像的内部可视性与图像指代物体的可视性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模仿或反映而形成的一种固定、明确的关系,并以相同方式呈现给所有观众。因此,就有可能比较图像的可视性与从外部视角客观描述物体的可视性,然后确定描绘的可视性在图像上被充分再现的程度。但真是这样吗?对每位观众而言,是否真的有一个明确的、清晰的可视性顺序,无论是在图像中还是在现实中?图像或现实中的任何可视性顺序难道不是本质上取决于观察者从特定角度、在特定条件下由视觉所感知到的东西吗?难道图像中的可视性顺序与现实中的可视性顺序之间的关系不也是依赖这些吗?如果对这些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我认为是必然的),那么,谈及图像中和现实中能被看到的東西之间存在任何客观上固定、明确的关系,也就自然毫无意义。相反,我们必须承认,任何观众往往只能够比较自己“所看到的图像和图像所呈现的对象”^②。

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恰当的图像理论都必须解决以下问题:观众看到了什么?我们必须如何设想图像中和现实中的可视性?观众是否掌握一些可靠的、明确的可视性顺序?本文不可能为了回答这些

① 试比较莱因哈特·勃兰特(Reinhardt Brandt):《图像的真实性:观看和辨认——从镜子到艺术形象》(*Die Wirklichkeit des Bildes. Sehen und Erkennen—Vom Spiegel zum Kunstbild*)(München: Carl Hanser Verlag, 1999),第10页。

② 格诺·伯梅(Gernot Böhme):《图像理论》(*Theorie des Bildes*)(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1999),第33页。

问题而去回顾欧洲哲学和学术史中不同范式的视觉理论,^①诉诸如下的广泛共识就够了,即:观众视野中作为既定顺序出现的事物,不仅是自然过程的产物,即通过投射在视网膜上的光线对现实顺序的反映,而且往往是观众的主观性阐释性行为带来的结果。牛津大学艺术史家马丁·坎普(Martin Kemp, 1942—)说道:“每个感知行为都必然是具有高度定向性和选择性,无论指导原则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我们对周围现实的观察,都建构于现有的感官经验、预先确定的阐释标准、新旧的命名和分类行为、感知器官的物理参数,以及最重要的(或者最根本的)——操作于预先或潜在的言语行为的深层结构。”^②正是由于这些过程,我们似乎无法了解任何“客观的”、非阐释性的可视性。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一方面包括光反射的自然过程中形成的视觉数据,另一方面包括认知阐释的各种要素。如果这点是正确的(而且普遍认为是这样的),^③我们就尤其需要标记观众视野中所感知到的顺序和结构,即从提供给眼睛的视觉数据的共同存在和相互作用中挑选出来,作为认知阐释产物的顺序和结构。因为“我们的视野部分地由阐释行为形成”的这个观点,根本不是赞成主观主义或唯我主义(后者认为每个人与独特的可视世界形成唯一联系)。相反,它势必意味着可视现实被当作一种光学潜力,基于生理上可描述的光学过程和不确定的先验内部组织而存在于主体之间。在这种潜力中,许多视觉秩序原则上可以得到阐释性强化,而这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视觉定位

① 总体回顾见拉尔夫·科纳斯曼(Ralf Konersmann)编写的文集《视觉批评》(*Kritik des Sehens*)(Leipzig: Reclam Verlag, 1997)。

② 马丁·坎普(Martin Kemp):《可视化:艺术与科学的自然书》(*Visualizations: The Nature Book of Art and Scienc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第1页。

③ 除了马丁·坎普(Kemp, 2000)之外,还可参见以下文献:冈特·阿贝尔(Günter Abel)《语言、符号与诠释》(*Sprache, Zeichen, Interpretation*)(Frankfurt/Main: Suhrkamp, 1999),第130页等;阿瑟·丹托(Arthur C. Danto):《寻常物的嬗变》(*The Transfiguration of the Commonplace*)(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第115页;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艺术的语言:通往符号理论的道路》(*Languages of Art: An Approach to a Theory of Symbols*)(Indianapolis, IN: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1968),第7页;戈特弗里德·波姆(Gottfried Boehm):《视觉:阐释学的思考》(“Sehen: Hermeneutische Reflexionen”),见《国际哲学杂志》(*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第1期(1992年),第50—67页[另见①,第272—297页]。还可列出更多相关参考文献。

Languages of Art: An Approach to a Theory of Symbols 有两个中译本:[美]尼尔森·古德曼著,褚朔维译:《艺术语言》,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美]纳尔逊·古德曼著,彭锋译:《艺术的语言:通往符号理论的道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译注

的认知模式等。

我要强调的是,图像体现和代表了在可视现实的未确定潜力中,在某一特定时间能够或可能被感知的可视顺序。如果我们无法脱离我们的视野说出这些秩序应是什么,那么将它们看作对世界的客观既定的可视顺序的模仿(例如通过相似性)显然没有多大意义。正因为如此,把图像看作“可视性的定义”,即借助图画标记顺序创造性地决定如何从某种视角理解可视现实的顺序,似乎更有意义。^①图像通过强调目光在可视现实永不枯竭、尚未确定的光学潜力中可能感知的顺序,而在其内部标记网络中实现和固定了可视顺序,这种可视顺序在时空上并非以与自然凝视相同的方式获得,因为自然凝视的视野内所感知的顺序是不断变化的。实际上,它们只会在图像中获得某种稳定性和恒常性。

用绘画的例子可以阐明图像的这个概念。绘画通常被认为借助轮廓线再现现实本身的客观可视性顺序,但即使是一幅画,也并未在其线条网络中反映任何预先确定于画家视野中的东西。相反,至关重要的是,一幅画是对没有以这种方式看过的一种形式轮廓的创造性表现。这点可能启迪了法国哲学大师、“解构主义之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用夸张手法谈到的一个观点:画家在绘画中呈现了他本人并未以这种方式看到过的某种事物,即所谓艺术家的构成性“失明”。从绘画的例子可知,艺术家不能看见事物,用德里达的话说,“并非缺陷或失败,反而为绘画经历提供了准超验的来源”^②。在1950年代,德国作家、文学评论家阿尔布雷希特·法布里(Albrecht Fabri, 1911—1998)也表达过类似观点,但他说得更简单:“绘画……盲人的艺术。”他还强调,在凝视的视野中,“除了十几个例外,并不存在绘画所描摹的、被普遍当作某个客观物体轮廓的任何线条”。换言之,“虽然笔画似乎由物体决定”,但笔画还是笔画,“一定是被发明

① 另见斯蒂凡·马耶夏克(Stefan Majetschak):《图像与可视性:对跨越不同学科的图像概念的思考》(“Bild und Sichtbarkeit: Überlegungen zu einem transdisziplinären Bildbegriff”),见《美学与艺术史杂志》(*Zeitschrift für Ä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第48卷第1期(2003年),第40页。

②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盲人回忆录:自画像与其他遗迹》(*Memoirs of the Blind: The Self—portrait and Other Ruins*),帕斯卡—安妮·布劳特、米歇尔·纳斯(Pascale—Anne Brault and Michael Naas)译(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第49页。

的笔画”。在法布里看来,“画一个物体”因此总意味着“通过肌肉想象物体”^①:艺术家用手发明物体的视觉形状,并将它固定在线条上。

当然,想象和发明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不同的图像类型。事实上,只有少数图像是真正的新发明,真正对事物视觉形状的新定义,大多数图像都采用传统的图画外观模式。但是,对于一切图像,无论是创新的还是传统的,这些阐释性决定都至关重要的,即:怎样把眼睛能够自然获取的可视数据转换成图画数据。在图画或绘画中,有些转换方法属于传统风格,有些则属于个人的代表性风格。这里涉及的范围包括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学习的用来挑选“图形—背景—星丛”的传统方法,到在图画艺术中表现出来的个人的、但相对稳定的风格,图画艺术使得我们能够通过风格特征来识别艺术家。

这当然不仅仅适用于传统和艺术手法的产物,如素描和油画。正如坎普强调:“任何视觉产品都具有我们称之为‘风格’的特质”,因为“设计和表现中总有诸多选择……即使选择的风格是自动的、无意识的”。^②照相机拍摄的图像和计算机生成的图像被理解为将自然可视性转换为图像可视性时所做的阐释性决定,它们同样具有风格,因为它们是以实现可视物在某些方面的“光学—机械”原理或计算法则为基础的。因为这些图像来源于机械过程,以可预知的恒常性来实现它们的可视性顺序,这也是为什么计算机能够在没有实际参照物的情况下制作出像照片一样的图像。但是,随着可视物的部分风格得以呈现,其他方面往往被抑制了:例如,在摄影中,我们视野秩序的内在瞬时性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冻结的。法国哲学家、文化理论家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 1932—)告诉我们,在法国雕塑艺术家罗丹(Auguste Rodin)看来,这个理由足以怀疑普通摄影的“真实性”。^③ 我们现在接

① 阿尔布雷希特·法布里(Albrecht Fabri):《你闭着眼睛画画……》(“Man zeichnet mit geschlossenen Augen…”),见英格堡·法布里(Ingeborg Fabri)、马丁·万曼(Martin Weinmann)编:《肮脏的拇指:研究文集》(*Der schmutzige Daumen: Gesammelte Schriften*) (Frankfurt/Main: Zweitausendeins Verlag, 2000),第504页。

② 马丁·坎普(Martin Kemp):《可视化:艺术与科学的自然书》(*Visualizations: The Nature Book of Art and 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第4页。

③ 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视觉机器》(*The Vision Machine*),朱莉·罗斯(Julie Rose)译(London an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第2页。中译本参见[法]保罗·维利里奥著,张新木、魏舒译:《视觉机器》(*La machine de vision*),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译注

受照片作为可视现实的权威定义,作为我们文化上认同的对现实的客观可视面的定义。

三、艺术图像和非艺术图像

“不同类型的图像如何在风格上实现对于可视世界的可能视角”这个问题,也包含了区分艺术图像和非艺术图像的问题。权威的艺术概念不能做出这种区分,因为并不存在被普遍接受的这个艺术概念。

在阿瑟·丹托看来,一个与之相关的难题是,通过任何特定的“感知特性”^①将艺术品与所谓的普通物品区别开来,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诚然有纳尔逊·古德曼所说的“美学症状”^②的东西,比如“密度、饱满度和范例性”,但经过漫长的图像史,这些症状作为“美学特征”^③服务于我们训练有素的眼睛。在面对某一特定物体时,它们经常帮助我们确定该物体作为一件艺术品的特征,但它们只是一些标志,不足以作为定义艺术的标准。这是因为,正如现代艺术史突出地表明: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日常品和艺术品可能是无法区分的。正如安迪·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Brillo Boxes*)清楚展现的那样(这件作品成为丹托反思艺术概念的出发点)。^④ 这个困难也影响到在对艺术图像和非艺术图像的区分上所做的探究。

因此,艺术图像和非艺术图像的区分,不能通过一个特殊的艺术概念迂回地进行。在我看来,只能借助描述艺术图像和非艺术图像中实现可视性的不同方法。这两种类型图像的主要区别在于:不同于

① 阿瑟·丹托(Arthur C. Danto):《寻常物的嬗变: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The Transfiguration of the Commonplace: A Philosophy of Art*)(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第43页。

② 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艺术的语言:通往符号理论的道路》(*Languages of Art: An Approach to a Theory of Symbols*)(Indianapolis, IN: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1968),第252页。

③ 阿瑟·丹托(Arthur C. Danto):《寻常物的嬗变: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The Transfiguration of the Commonplace: A Philosophy of Art*)(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第254页。

④ 同上,第vi页等。

艺术图像,非艺术图像通常只是复制传统的观看方式,重复熟悉的视觉再现风格,至少没有有意识地尝试在未确定的光学潜力中创造观看某物的一些新可能性。

这种情况在来自自然科学的图像中尤其明显,这些图像,借用马丁·坎普的话,经常以一种“绝对客观的修辞”^①来表现所指,但实际上使用了“一种属于自己的风格”,即坎普所说的“自相矛盾地”成为“无风格”。^②虽然这种“无风格”声称只是呈现纯粹的客观性,但它绝不会驱动于被呈现物体的可视外表,而且从美学角度来看,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非常传统的。坎普所举这类例子的其中之一,是伽利略号飞船和麦哲伦号飞船执行任务时拍摄的木星和金星的图像,曾被美国宇航局(NASA)在互联网上挂了一段时间。



图2 美国宇航局:“麦哲伦号”飞船提供的金星埃斯特拉西部地区火山的透视图(1991年)^③

① 马丁·坎普(Martin Kemp):《可视化:艺术与科学的自然书》(*Visualizations: The Nature Book of Art and Scienc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第3页。

② 阿瑟·丹托(Arthur C. Danto):《寻常物的嬗变: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The Transfiguration of the Commonplace: A Philosophy of Art*)(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第4页。

③ 同上,第138页。

这些图像的独有特征在于,它们纯粹由测量数据建构而来。不可否认,它们看起来确实像是“在正常视野被看到的”,但坎普指出:“金星上的大气特征是这样的:它不能被正常的可视光谱中的光线穿透。”^①使用一种特殊的雷达系统,图像生成才变为可能。庞大数据因此通过计算机的计算,以这种方式确定某个事物的可视性,这个事物自身对人眼和现在所有的摄影系统实际上是不可视的。下一张图片显现了伽利略号飞行任务所提供的木星上的大气环境。



图3 美国宇航局:伽利略号飞船提供的木星上大气的图像(1997年)^②



图4 威廉·特纳:《暴风雪——蒸汽船驶离港口》(1842年)

“当木星的图像从伽利略号飞船……发送回来时,《独立报》1997年6月7日的报道这样开头:‘它可能看起来像是特纳的一幅

① 马丁·坎普(Martin Kemp):《可视化:艺术与科学的自然书》(*Visualizations: The Nature Book of Art and Scienc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第138页。

② 同上。

画……。”^①请注意：这里提到特纳并非巧合。

事实上，伽利略号和麦哲伦号飞船发送回来的所有图像都明显倾向于欧洲绘画史上的再现风格。坎普评论道：“为了捕捉美丽的风景，运用侧面扫描和高度测量合成图像时，需要做出一系列明显的图画选择来影响显现过程的每个方面，这些选择包括：从使用传统的视角缩放来测绘数据的基本决定，到使用那些‘错误颜色’以及如何通过距离修改这些颜色的一些具体选择。”^②从测量数据到图形数据的风格转换所做的这类选择，绝不是一种预先确定的可视性的必然结果，因而并不是没有其他选择，这从美国宇航局提供的同一数据库的替代图画结构中就看得很清楚——这些结构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大气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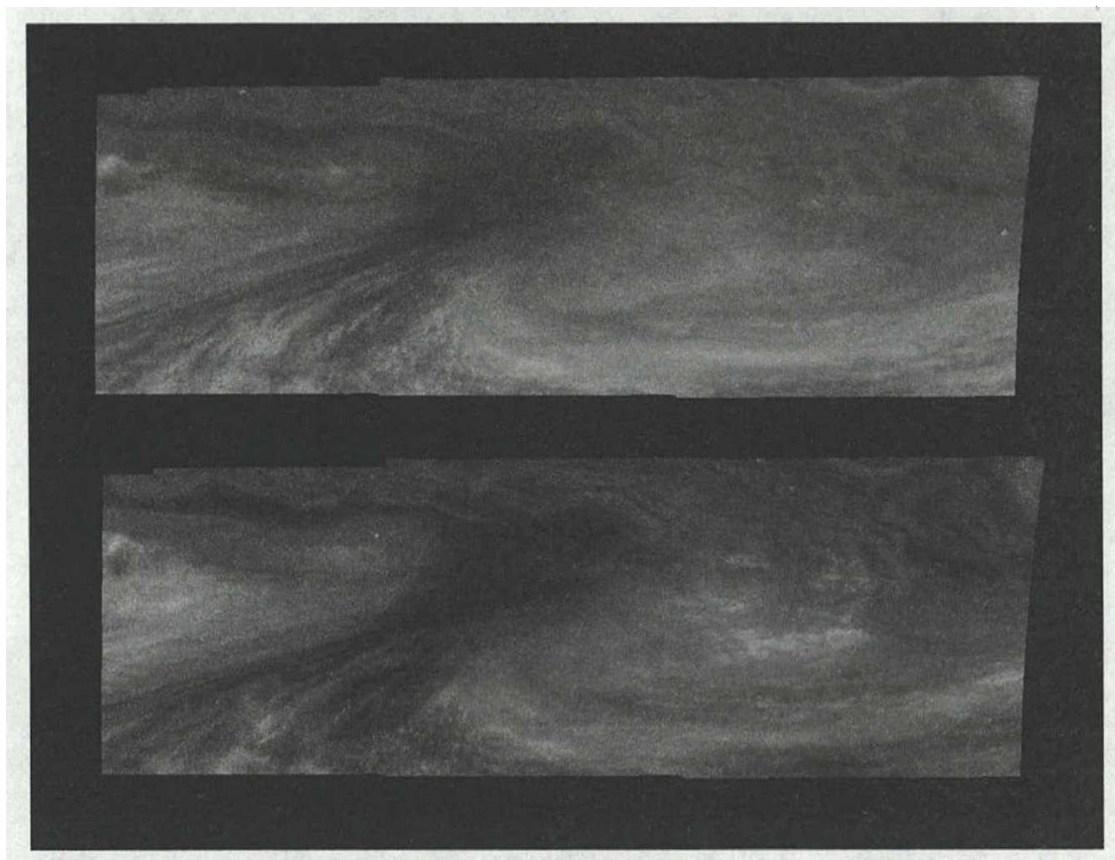


图5 使用其他颜色再现木星上的大气环境

① 马丁·坎普(Martin Kemp):《可视化：艺术与科学的自然书》(*Visualizations: The Nature Book of Art and Scienc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第138页。

② 同上。

因为这里展示的例子都倾向于欧洲绘画传统的再现风格，坎普讽刺地形容它们“主要是匿名的星系风景画大师的杰作”^①。当然，这些“大师”一直匿名或不出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的绘画风格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传统的。不管这种说法听起来是多么奇怪，他们确实没有表达真正的新意，因为他们试图借助一些熟悉的风格重新联系所显现的事物和熟悉的可视性。虽然我们可以把这些图像理解为艺术图像，即使是相当传统的图像，^②但正是这一点给它们打上非艺术图像的标记。这类图像不期望观众接触太多图画的、审美的创新，因为这些创新，正如我们从艺术史中得知，很容易引起观众对绘画正确性和审美合理性形成保守的标准。相反，正如坎普正确指出的：“如果太空探索的巨大预算需要给出正当理由，如果这个事业要继续的话……，那就需要某种‘壮观的’（尽管是按照保守的审美愉悦标准来判断衡量的）公共产品……因为有了这些电子数据汇聚的图像，我们就成为在精彩的星球探索之旅中扶手椅上的游客和审美探秘者。”^③

另一方面，艺术图像使得我们往往不能在传统可视的宇宙中进行一次舒适的旅行。艺术图像不是仅仅试图复制传统的图画再现风格，而是试图质疑、批判这些传统风格，颠覆性地破坏它们，甚至偶尔重新定义它们。在现代艺术中，这经常成为一个有意为之的计划，^④我想在结语中对此加以简评。

在艺术理论中，德国哲学家康拉德·费德勒（Konrad Fiedler, 1841—1895）、英国著名艺术史家、美学家罗杰·弗莱（Roger Fry, 1866—1934）、德国艺术史家、哲学家马克斯·拉法埃尔（Max Raphael, 1889—1952）等人从理论上反思这个方案，但他们碰巧都是互不相识。费德勒和弗莱认为，普通人（因而也是普通观众），比如喜欢坎普分析的星系风景画这类图像的人，事实上并不真正知道是一些什么事物——不仅包括那些在我们视野之外的、距离遥远的星系物体，也包括我们身边的事物。在费德勒看来，“观看事物时，人们的沉

① 马丁·坎普（Martin Kemp）：《可视化：艺术与科学的自然书》（*Visualizations: The Nature Book of Art and Scienc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第139页。

② 正如坎普所报道的那样，这些图片事实上是作为“艺术品”展示在“画廊”里。同①。

③④ 同①，第139页。

思尚未到达抽象思维的阶段”^①——把可视物纳入抽象概念的阶段。此后,观众停止仔细观看,而满足于对事物可视性的浅层次认识。^②弗莱在《论美感》(“An Essay in Aesthetics”, 1909)一文中表达了类似观点:“我们用令人羡慕的省钱办法,学会看到只符合自身目的的一些东西,但这其实是很小的一部分,只能看到和辨别每个物体或个人;物体或个人一旦被看到或辨别,就会成为我们心理目录中的一个,不再被真正看到……几乎所有有用的东西,都或多或少地戴上这顶不可视性的帽子。”^③相对于这种表面的、日常生活的视角,上述两位学者都相信,艺术能在艺术品中对可视形式形成一种清晰、稳定的视角。因为,菲德勒认为在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中,“手虽然没有做到眼睛所见到的,却创造了一些新东西”——仅凭眼睛无法获得的新东西:图像具有艺术价值时,眼睛就获得了一个对于艺术家所指物体的清晰、脱离常规、新颖的视角。在创新艺术中,这类艺术品因而成为以新鲜、脱离常规视角去呈现对象的积极来源。

正如马克斯·拉斐尔在评析法国杰出风景画家柯罗(Jean Baptiste Camille Corot, 1796—1875)的一幅画时所言,艺术家创造艺术品的过程,就是将日常视野中不具体的“被感知的图像”(the *Wahrnehmungsbild*, “perceived picture”)翻译成艺术性的“被实现的图像”(Realisationsbild, “realized picture”)^④。他还强调:“服务于实

① 相关文献参见斯蒂凡·马耶夏克(Stefan Majetschak):《视觉的现代化:关于现代艺术早期视觉的动因问题》(“Die Modernisierung des Blicks. Über ein sehtheoretisches Motiv am Anfang der modernen Kunst”),见迈克尔·豪斯凯勒(Michael Hauskeller)编:《感知的艺术:对感性知识哲学的贡献》(Die Kunst der Wahrnehmung, Beiträge zu einer Philosophie der sinnlichen Erkenntnis)(Zug/Kusterdingen: Graue Edition Verlag, 2003),第298—328页。

② 康拉德·费德勒(Konrad Fiedler):《对视觉艺术作品的评价》(1876)(“Über die Beurteilung von Werken der Bildenden Kunst”, 1876),见戈特弗里德·玻姆(Gottfried Boehm)编:《关于艺术的文章(第二卷)》(Schriften zur Kunst, 2 vol.)(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1991),第22页。

③ 罗杰·弗莱(Roger Fry):《论美感》(“An Essay in Aesthetics”),见罗杰·弗莱:《视觉与设计》(Vision and Design)(London: Chatto & Windus, 1920),第18—24页。Vision and Design 有两个中译本:[英]罗杰·弗莱著,易英译:《视觉与设计》,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论美感》在第11—24页;[英]罗杰·弗莱著,耿永强译:《视觉与设计》,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论美感》在第16—31页。——译者注

④ 康拉德·费德勒(Konrad Fiedler):《关于艺术活动的起源》(1887)(“Über den Ursprung der künstlerischen Tätigkeit”, 1887),见戈特弗里德·玻姆(Gottfried Boehm)(转下页)

用导向的普通视觉由这个目的决定和限制,而且变得模糊不清。”^①被感知的图像依赖眼睛在空间的任意移动,没有形成稳定性或内在统一性。在艺术过程的结果中,被感知的图像“随观众的身体而被固定”,先被转换成长方形面板,再被刻成与图像呈现一致的几何结构系统,于是被感知。因此,我们在艺术中感知的“被实现的图像”,在我们视野内的自然图景中有它的起点,但正如拉斐尔所言,这样的图像与自然界或我们视野中的图像并不类同。^②就这样,艺术家将日常生活中感知的任意一幅图像,转换为图像被实现的可视性(亦即清晰和必要的可视性),这种被实现的可视性通过具体的绘画手段(如运用“黄金比例”等)使我们按照图像的内部规律来观看事物。

如果一位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成功地做到了独创性,那么新获得的可视性有时会遭遇公众的不理解,至少在欧洲现代主义早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早期现代主义创新绘画中的再现风格似乎是陌生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符合观众的视觉期待。但这并不奇怪,因为,用弗莱的话说,“奇怪的是,对于绘画的流行批评标准,即:绘画看起来是否自然真实,大多数人未能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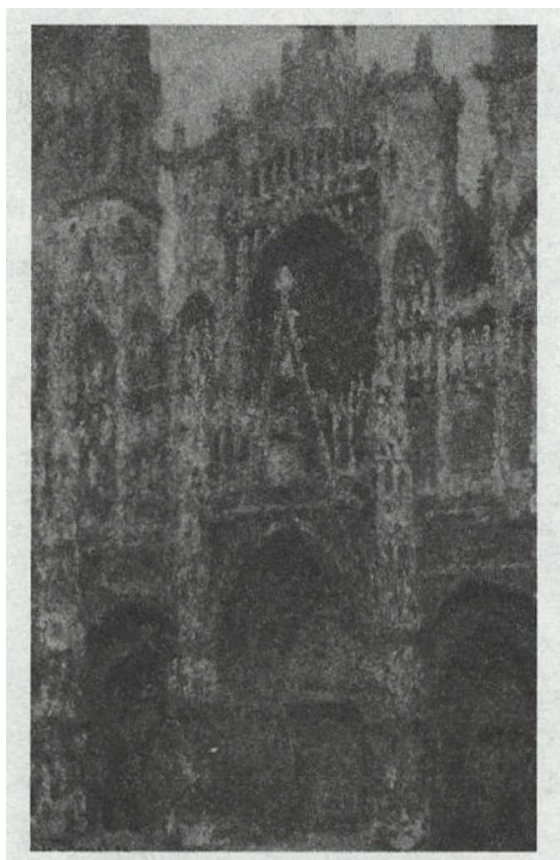


图6 克劳德·莫奈:《鲁昂大教堂》
(1892—1894)

(接上页)编《关于艺术的文章(第二卷)》(*Schriften zur Kunst*, 2 vol.)(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1991),第165页。

① 马克斯·拉法埃尔(Max Raphael):《图片专论:柯罗的〈罗马风景〉》(1937/39) (“*Monographie eines Bildes: Corot ‘Römische Landschaft’*”, 1937/39),见马克斯·拉法埃尔《工人、艺术和艺术家》(*Arbeiter, Kunst und Künstler*)(Dresden: VEB Verlag, 1978),第71页。

② 康拉德·费德勒(Konrad Fielder):《关于艺术活动的起源》(1887) (“*Über den Ursprung der künstlerischen Tätigkeit*”, 1887),见戈特弗里德·玻姆(Gottfried Boehm)编《关于艺术的文章(第二卷)》(*Schriften zur Kunst*, 2 vol.)(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1991),第115页。

确运用”，“那些‘批评家’真正看过的实际上是其他图像；观察过大自然的艺术家向批评家如实‘汇报’自己的亲眼所见，批评家会以这幅图不酷肖自然的真实而愤怒”。^①事实上，他们不满的真正原因只是这幅图看起来不像他们已经习惯的传统图像。

弗莱用法国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的画阐明自己的想法：“莫奈作为一位艺术家的杰出成就在于，他以令人叹为观止的能力忠实再现自然界的某些方面，但他的天真无邪和真心诚意被公众当作最大胆的欺骗。”^②在现代艺术初期，许多艺术家，如法国著名画家塞尚，都有类似境遇，能够逃脱这种命运的只有那些突破传统绘画风格老路的艺术家，比如我们所说的匿名星系风景画画家。

（作者单位：德国卡塞尔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译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学术编辑：张强

① 马克斯·拉法埃尔(Max Raphael):《图片专论:柯罗的〈罗马风景〉》(1937/39) (“Monographie eines Bildes: Corot ‘Römische Landschaft’”, 1937/39), 见马克斯·拉法埃尔《工人、艺术和艺术家》(*Arbeiter, Kunst und Künstler*) (Dresden: VEB Verlag, 1978), 第77页。

② 罗杰·弗莱(Roger Fry):《论美感》(“An Essay in Aesthetics”), 见罗杰·弗莱《视觉与设计》(*Vision and Desig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20), 第18—24页。

- (hua yu wen xue yan jiu de jin lu yu ke neng zhuan ti yan tao).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5(2006): 1-4]
-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译丛’总序”，《当代作家评论》4(2006):132-136.
- [—: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Overseas 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Prologue to *The Collection of Translations on Overseas 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ai wai zhong guo xian dai wen xue yan jiu de li shi xian zhuang yu wei lai).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4(2006): 132-136]
- Zhang, Longxi. “Out of the Cultural Ghetto: Theory, Politics,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Modern China, 1993, 19(1): 71-101.
- 张英进 “从文学争论看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变迁”，《文艺理论研究》1(2013):28-38.
- [Zhang, Yingjin. “Literary Debates and Paradigm Shifts in Overseas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ong wen xue zheng lun kan hai wai zhong guo xian dai wen xue yan jiu de fan shi bian qian).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1(2013): 28-38]
- ：“学术的主体性与话语权 ‘华语电影’ 争论的观察”，《二十一世纪》4(2016):47-60.
- [—: “The Subjectivity and Discourse Power of Academic Research: An Observation on the Dispute of Chinese Movies” (xue shu de zhu ti xing yu hua yu quan: hua yu dian ying zheng lun de guan cha). Twenty-First Century 4(2016): 47-60]
- Zhang, Yingjin.ed. 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est Sussex: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6.

中外联通 东西摆渡^{*}

——《跨文化研究：中国与世界——庆祝张隆溪教授学术成就文集》介评

余承法

作者简介：余承法，文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学、钱钟书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化境研究”（13FYY008）的阶段性成果。电子邮箱：victoryu2006@126.com

DOI:10.16234/j.cnki.cn31-1694/i.2017.03.020

一、引言

《跨文化研究：中国与世界——庆祝张隆溪教授学术成就文集》（Cross-cultural Studies: China and the World,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Zhang Longxi）由博睿学

* 感谢张隆溪、钱锁桥两位教授的热情鼓励和细心指导。

术出版社(Brill)2015年出版,属于旗下东亚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系列之六。文集以张隆溪的学术成就为经,以跨文化研究为纬,荟萃了来自不同国家、文化背景和研究领域的学者撰写的12篇论文,从比较文学、历史学、哲学、宗教学、电影学等方面展示了张隆溪的国际学术影响及其与这些学者之间的学术情谊,旨在庆祝他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跨文化研究开辟一座里程碑而作出的卓越贡献。文集是博睿在推出《中国的文学世界主义者:钱钟书、杨绛和文学世界》之后的又一扛鼎之作,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又一典范,是追求“中外联通、东西摆渡”的又一见证。

二、内容概述

文集由英国纽卡斯尔大学中国学教授钱锁桥担任主编,他在引言中梳理了晚清以来的中国学术,简评张隆溪在汉学和比较文学领域做的突出贡献认为钱钟书、张隆溪学贯中西、一脉相承。张隆溪亲自作序,深情回忆了感人肺腑的学术之旅,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位中国学者的学术情怀和感恩之情。英籍华人作家毛翔青(Timothy Mo)作跋,他回顾了几千年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评述了两类中间人或翻译者:圣人和罪人,他深知西方文化对中国/东方文化的傲慢与偏见,认为当今世界需要像张隆溪这样的大学者和思想家进行中西文化的摆渡和沟通。这篇跋“堪称文集的精彩华章,虽不是加注的学术论文,可是感性很强”(引自钱锁桥与笔者的邮件),令读者掩卷深思、回味无穷。

正文包括三大部分12章,概述如下。

第一部分“汉学研究:历史上的中国及其‘他者’”包括4章。

第一章“汉族官员任职于女真族:赵秉文对敌对政权和不同文化的诗学反思”。艾朗诺(Ronald Egan)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剖析了任职于女真族政权的汉族官员赵秉文在系列诗歌中屡屡表现出来的情感和心理挣扎:他是谁?与汉族是什么关系?应该继续履职还是归隐逃避?如何游离于政治忠诚、民族认同和文化完整之间?这些是艾朗诺在汉学研究中经常思考的问题,也与张隆溪从事本族文化认同和跨文化研究的宗旨与思路相通。

第二章“聚焦文本:朱熹和道学的民族志诗学探究”。詹森(Lionel M. Jensen)指出,朱熹思想的集大成《朱子语类》和重要著作《楚辞集注》透露了对神的敬畏和依赖,与法国人类学家让·鲁什论述“身体是神秘自然”的心理物理学表现相似,是一种跨文化存在;解译者需要认同人、世界和文本的共存以及人的身体和情感的互文,克服中国哲学长期以来牺牲文本涵义的做法,透彻理解朱熹文本对儒家学说的巨大贡献,这正是在努力贯彻张隆溪倡导运用全球视阈解译文本的跨文化研究理念。

第三章“对书写中国思想史的思考”。罗多弼(Torbjörn Lodén)主要探讨了3个问题:1)“哲学史”和“思想史”是否为相同概念?2)西方概念能否用来分析中国传统思想?3)中国思想在构建全球道德观时有何重要意义?胡适、钱钟书、张隆溪等学者对西方文化的娴熟把握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思想,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西方文化。中西文化表面上存在差异,但本质上有诸多相似,在全球道德观的语境中继续研究和书写中国思想史具有深远意义。因此,跨文化阐释和交流不仅可能,更有必要,这也是张隆溪为探讨这个问题作出的深邃思考。

第四章“中国和日本:日本文学史上的二分和双言”。林德伯格(Gunilla Lind-

berg-Wada)认为,中日关系一直是从二分角度进行描写和解释,但用“双言”概念作为分析和解释工具更能准确把握日本文学史书写和语言使用的动态过程。全章分为4节:第一节讨论19世纪后期日本的文本世界和国民文学标准的形成,第二节考察日本文学的中国性和日本性二分,第三节分析日本传统文学史中语言的性别区分,第四节探究“双言”概念作为有效分析工具的可能性。

第二部分 “比较文化研究:东方与西方”包括第五至八章。

第五章 “中国和欧洲的古典学:对莫米利亚诺的反思”。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在开篇指出,本文献给贤友张隆溪,激赏他为东西方文学和哲学的比较研究作出的开拓性贡献。自莫米利亚诺创建古典学以来,西方汉学家和历史学家逐渐意识到古典学已成为中国思想史和物质文化史的重要元素。欧洲的古典学家关注地方历史和传统,形成地方身份的认同感,而中国古典学家在政府授意下完成与某地相关的纪念碑文的研究,不利于把物质文化的研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第六章 “宇宙学、占卜学和符号学:中国与希腊的比较”。瑞丽(Lisa Raphals)在题注中写道,她应张隆溪之邀在香港城市大学访问期间完成了研究项目并出版了专著,该文即由此压缩而成,虽然其标题不足以表达她对张隆溪25年情谊的感激。全章分为4节:解释“占卜学”,探讨占卜术在中国天文学和宇宙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希腊人对占卜术不断变化的观点及其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和希腊哲学都有形而上学,但对神人关系和对占卜术的认识不同。

第七章 “利玛窦:一位洋道士”。苏源熙(Haun Saussy)在开篇指出:张隆溪近乎一位“乌托邦主义者”,一贯主张东西方文化的兼容和沟通,其学术实践展现了文化同化和传播的双重机制,这在意大利传教士、中国文化传播者利玛窦身上得到了印证。利玛窦说汉语、写汉字、穿汉服、守礼仪,引用《诗经》和《尚书》,认为汉语写作有助于确立他在中国文人中的地位。他被当作道家传人,但其道家身份不完全被认同,因为他是道教教义中的一个形象、以常人意想不到的一种方式回归到基督教的根。“西国去中州十万里, […] 通之自利子始”(王家值38),正是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真实写照。

第八章 “‘平静下面的喧嚣’:比较《红楼梦》与《米德尔马契》等西方小说名著”。罗纳德·斯通(Ronald Stone)在题注中提及写作背景和意图,感谢张隆溪的鼓励和帮助。作者认为,《红楼梦》可与《追忆似水年华》《米德尔马契》《战争与和平》等西方名著媲美,在很多方面比较接近,如:曹雪芹采用心理描写,塑造了不断遭人误解的主人公,激发读者的同情和共鸣;大量运用讽喻和象征,从主要人物的不同视角观察整个世界。张隆溪一再为歌德的著名论断鼓与呼:“世界文学的新纪元即将来临,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加速这一进程。”遗憾的是,很少有学者像他那样强调中西文学文本的联系性和普适性。

第三部分 “文化理论:中国与世界”包括第九至十二章。

第九章 “张隆溪在多元文化的全球化世界中对世界文学的贡献:一篇颂词”。郑和烈(Hwa Yol Jung)在开篇提到,其学术研究受益于张隆溪的代表作《他者的神话:西方眼中的中国》。本章分为4节:第一节阐述歌德“世界文学”的含义;第二节论述张隆溪在文学阐释学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其文学理论深深植根于东西方哲学,研究方法是“作为哲学的文学”和“作为文学的哲学”的有机统一;第三节考察费诺罗萨在文学/文化阐释学领域所作的汉学词源学研究尝试;第四节是结语,揭示横贯性之“道”,指出比

较文学与比较哲学的未来研究趋势。

第十章 “纪念真理的语言:对尼采、比亚利克、陈寅恪和张隆溪的反思”。舒衡哲(Vera Schwarcz)讨论了4位学者面临的共同困境——追求永恒真理,却一再绊倒在谎言上面。尼采讽刺狂妄自大的宇宙中心主义者,批评无知和不敢面对怀疑的人;比亚利克认为语言是物质宇宙的主要反映,对自然的畏惧可以唤醒内心;陈寅恪认为中国要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研究中独立出来,坚持用传统方法研究语言,大胆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张隆溪挑战认知虚无主义,在比较文化研究中澄清疑问与自大,明白语言和真理,主张探究不同文本以及自身单一的道德意识,呼吁全世界文人都加入追求真理的互动过程之中。

第十一章 “毛泽东思想的‘出口和再转内销’:一个跨文化二幕喜剧”。郭建将全章分为5部分。序幕指出,西方左翼和中国新左派都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合理性,赞成“文革”,尽管意识到它的危害。第一幕认为,3位法国哲学家萨特、阿尔都塞、福柯都信奉毛泽东思想,欢迎“文革”是“唯一批判斯大林”的历史存在,3位美国哲学家詹姆斯·德里克、裴宜理认为毛泽东思想是1960-1970年代最丰富的新思想。而拉康怀着对另一种中国的浓厚兴趣再次出场,潜心研究道教,坚决捍卫孔子,认为儒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种哲学。第二幕认为,“文革”虽然已结束30多年,被定性为毛泽东犯下的错误,但余音未散,留学海外的学生学者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训练,生活在西方的华人华侨学者能够把握中国人不知道的中国革命之精髓。作者在尾声感激张隆溪的鼓励和帮助,认为他是最早批判中国新左派的人士之一,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理性评价。

第十二章 “记忆、根茎和后现代敏感性:王家卫和巴西电影”。丹尼兹·克蕾雅·阿劳茹(Denize Correa Araujo)运用根茎理论和互文性理论,比较分析了中国和巴西3位电影导演的4部作品: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和《2046》、若奥·莫雷拉·萨勒斯(Joao Moreira Salles)的《一球成名》(Santiago)、鲁伊·古雷拉(Ruy Guerra)的《埃伦迪拉》(Erendira)。4部影片运用非传统的时空概念,借助片段式、省略式记忆,具有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符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关联德勒兹的根茎结构,带有后现代敏感性特征。3位导演立足本土,放眼全球,崇尚多元文化和全球化。新媒体应用下的网络信息导致电影创作主题和方法的融合,形成了21世纪基于美学研究的新领域,这也是张隆溪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旨趣所在。

三、简要评价

总体而言,文集至少体现了以下四个鲜明特色。

(一) 主旨明确

各章紧紧围绕跨文化研究这一主旨,秉承“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理念,始终贯穿张隆溪的学术思想,注重对以往研究的理性反思,多视角、多层面、多方位地展现张隆溪作为中西方文化牵线人和思想摆渡者作出的卓越贡献,记载了他跟不同国籍、文化背景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之间的学术情谊。该书在多元文化的全球化世界中架起了一座联通中西的友谊之桥、学术之桥和文化之桥,是一部拓展学科宽度、彰显学术力度、体现研究深度、传递人情温度的学术文集。

(二) 思路新颖

全书的编写思路新颖、结构完整、脉络清晰,围绕跨文化研究这根主线,采取中国与世界两个视角,正文分为汉学、比较文化学和文化理论三大范畴,收录 12 篇精彩纷呈的论文。全书除主体之外,还包括钱锺桥的引言、张隆溪的序、毛翔青的跋、各位作者的基本信息,以及 5 页 369 个汉字列表和 34 页 660 条参考文献。包括书名在内的 15 篇文章都采取主副标题配对的形式,既突出研究主题,又表明研究方法,巧妙突出了艾朗诺、罗多弼、苏源熙、罗泰等知名汉学家的佳作,既统筹兼顾,又重点突出。

(三) 领域广泛

文集涵盖比较文学、哲学、文化学、翻译学、电影学、汉学、古典学、考古学、宇宙学、占卜学、符号学、历史学、宗教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体现了学术研究的跨学科性、跨时间性、跨地域性、全球本土化和本土全球化,为相关领域的各国学者提供了研究的新范式、新思路、新视角、新材料和新切入点,有望成为比较文学与文化领域的必读书目、从事汉学研究的案头必备。

(四) 启迪深刻

15 位作者来自中国、美国、英国、瑞典、巴西、德国、韩国、罗马尼亚等国,曾在欧美(主要是美国)接受学术训练或从事学术研究,娴熟掌握几种语言,具有国际学术视野,掌握跨文化研究和交流的能力。他们成功的学术合作,跟张隆溪卓越的学术贡献、浓厚的学术情怀、巨大的人格魅力密不可分。这一成功案例为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对话带来了深刻启迪,张隆溪为华人学者发出中国声音、扛起中国旗帜树立了典范:只有像他那样具备国际化的学术背景,植根中国土壤,放眼全球语境,在国内外拥有广泛的学术声誉,结交一批志同道合的国际友人,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与合作,才有可能助推中国学术积极“走出去”,真正“走进去”。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Qian, Suoqiao. ed. *Cross-cultural Studies: China and the World,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Zhang Longxi*. Leiden/Boston: Brill, 2015.
- 王家骥“题畸人十篇小引”,李之藻《天学初函(第1册)》。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38。
- [Wang, Jiazhi. “A Brief Note to Introduce *Jiren Shipian* (ti ji ren shi pian xiao yin). Ed. Li Zhizao, *Tian Xue Chu Han* (Vol.1). Shanghai: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38.]

“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方法论”工作坊综述

王洛岚

作者简介: 王洛岚,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古希腊诗学。电子邮箱 wlaura@126.com

全译本质“化”论^①

余承法 中南民族大学

摘要: 结合全译的新定义, 基于钱锺书对“化”的独到诠释, 将“化”定义为: 译者为消除语际内容与形式之间的“一意多言”式矛盾, 得原文之意、存原文之味、成译文之形的双语转换过程和结果。“化”是全译最高理想与最高标准的通约、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融合、内容求信与形式造美的结晶、原文价值与译文使用价值的再现。因此, “化”不仅是全译转换的精髓, 更是体现为全译的本质。

主题词: 全译; 本质; 化; 原文; 译文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82 (2016) 00-0090-06

DOI: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16.02.012

1 引言

全译作为一种翻译类型, 是“人或/和机器用乙语转化甲语文化信息以求信息量极似的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黄忠廉, 2012), 旨在转移原文的语义内容, 更换或保留原文的语言形式, 化解原文和译文内容与形式之间的“一言多意”式矛盾。全译是原文内容渐化、译文形式化生的量变过程, 行为的落脚点在“化”上。该“化”与哲学之“化”有何关系? 哲学之“化”如何用作译学范畴? 如何体现为全译的本质? 本文试图做出回答, 以求教于方家。

2 “化”的内涵诠释

文字学之“化”的基本含义是化生、变化, 有贯通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神用, 体现于文艺创作的理论与实践之中, 构成文艺学的一个独有审美范畴。钱锺书(2002: 77)从许慎关于翻译的一段训诂出发, 揭示翻译所起的作用(“诱”)、难于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 用着墨不多的文字道出译艺之“化”的基本内

涵: “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 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 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译艺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去痕、存味”, 这正符合“化”的基本含义。就“变化”义而言, 全译首先表现为语形的有形变化(更换原文形式), 其次表现为语义和语用的无形变化(转移原文内容、保存原文风味), 前者是外在、次要的, 后者是内在、根本的。钱先生提到“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时, 使用了“化”的“有形变化”之义, 在谈到入于“化境”时, 使用了“化”的“无形变化”之义。他赞同荀子对“化”的哲学解释: “状变实无别而为异者, 谓之‘化’”, 并从形与神的关系提出对“化”的独到见解: “盖状变形改之‘化’, 是处即有, 夫人尽睹……; 且金就形论形, 亦未尝思出其位, 旁及于形与神智离合也”(钱锺书, 1979: 472)。就“化生”义而言, 原文经过译者的原语理解、语际转化和译语表达三个阶段, 发生语形的有形变化和语义、语用的无形迁移, 生成“状变实无别”的译文, 即“躯体

作者简介: 余承法, 中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 翻译学、中外语言比较。E-mail: victoryu2006@126.com。

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故我”，同时参与译语文化的生命构成，即“化生”译文。

钱锺书（2002：77-79）标举“化”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时，也坦言“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

“化”“讹”同源同根，“化”加“言”即为“讹”，“讹”去掉虚假之“言”即为“化”。《说文解字》中无“讹”有“吡”，“吡”即“动也”，“讹”为俗字，“化”有变化、变动之义，变动可能导致虚假和不实。钱先生悬出“化”的最高理想，从艺术审美的高度为译者指明了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认为有些“讹”尤其是译者创造性的“讹”能起一些抗腐作用，译文因此得以免于全被淘汰（同上：87）。译者通过引诱、避讹、求化、打通一系列过程，帮助原文获得生命的丰富、拓展和延续，此种“讹”更是另一境界之“化”（余承法、黄忠廉，2006）。因此，“化”中有“讹”，“讹”中显“化”，二者“背出分训”，共存、统一于具体的翻译实践。

3 “化”体现为全译本质的五大特征

全译忠实原文内容，再现其语用价值，化解原文和译文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帮助译文读者逐渐理解和接受异质事物，求得译文与原文最大程度的“似”，即信息量极似，包括意似、形似和风格似（黄忠廉等，2009：10-12）。结合全译的新定义，顺着钱先生的思路，本文将“化”定义为：译者消除语际内容与形式之间的“一意多言”式矛盾，得原文之意、存原文之味、成译文之形的双语转换行为。这一定义跟“化”的文字学原解（教化、变化）、哲学通解（渐化、化生）、美学专解（物化、化境）和钱先生自解（去痕、存味）一脉相通，落脚于化解双语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贯穿于全译行为的始终。下面将从全译的理想与标准、目的与手段、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价值与使用价值五个方面论证“化”如何体现为全译的本质。

3.1 “化”是全译最高理想与最高标准的通约

钱先生在1964年将“化”标举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1979年之后改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这一改动导致译学界对“化

（境）”持有四种主要观点：“标准说”“理想说”“理想/标准模糊说”和“理想兼标准说”（余承法，2013：55），争论的焦点在于：

“化”能否兼作全译的最高标准？最高理想/境界与最高标准之间究竟是否具有可通约性？

钱先生的相关表述清楚表明“化”属于最高理想/境界范畴，这已为大多数人接受，即使是“标准说”支持者也无异议。有学者认为“化”是最高理想而非最高标准，如：许建平（1997）认为钱先生不在为文学翻译提出一个标准模式，而是揭示译者追求的理想境界；陈福康（2000：419）认为“化”的本意并非将其视为翻译的标准或原则，而是指出了翻译艺术的极致；朱宏清（2001）、欧阳利锋、尚敏锐（2002）、黄汉平（2003）等认为化境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葛中俊（2007）区分了“翻译的理想”和“理想的翻译”，指出前者是翻译实践追求的极限高度，是超乎标准以上的目标，后者是可以达到的客观现实，是标准本身。“标准说”论者如周煦良（1982）、许渊冲（1982）、张今（1987）、朱志瑜（2001）等直接引用《林纾的翻译》早期版本中的相关陈述，将“化”当作最高翻译标准，论证它作为标准的功用、评析译文的依据、指导批评的尺度。辜正坤（2005：105-106）认为“化境”作为文学翻译的标准，需要构成一个标准系统才能有助于翻译实践。

翻译标准归根结底来源于翻译的定义，二者是流和源的关系（黄忠廉、李亚舒，2004：228）。翻译分为全译和变译之后，翻译标准也相应地分为全译标准和变译标准。判断全译求“化”成功的标志是“译本对原文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钱锺书，2002：77），这是“化”的审美要求，因此可视为全译的最高标准。“化”的可操作性在于译文对原文“得意忘言”“形变实存”“量变质保”，有众多出神入化的译文作为事实证据，也有些研究“化（境）”的论著作为理论依据。

对于“化”是全译的最高理想还是最高标准，有些学者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如：刘靖之（1981：1-15）、罗新璋（1984：1-19）、郑诗鼎（1997：70）、王宏印（2003：177-193）有时将“化境”当作翻译标准，有时视为理想境界，或者交替、并列使用“境界”和“标准”。少数学者认为“化（境）”可兼作翻译的最高理想和最高标准，如：余承法（Yu，2006）认为：“化”既指译

者追求的理想,又可看作翻译实践和批评的标准;王秉钦(2004)、余协斌等(2004)指出:“化”既是翻译的最高标准,也是译者追求的最高目标;陈大亮(2006)强调“化”作为翻译的最高标准和理想境界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杨全红(2008)明确“化境”既是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又兼作最高标准,但他没有回答二者之间能否通约的问题。

辜正坤(2005:83)指出,不仅有多层次读者,也存在多层次译者,每个层次对译文都有特定的评价尺度,因而导致翻译标准多元化。基于翻译艺术的高低,可将译者大致分为翻译家(翻译大师)和普通译者(包括高级译者、中级译者和初级译者)。翻译家以深厚的职业素养、广博的知识结构、高超的双语功力、成熟的转换艺术创造名篇佳译,在他们妙笔生花的译文中,既能达到作为最高标准的“化”,也能实现作为最高理想的“化”,标准和理想成功地合二为一。普通译者以“化”作为最高的理想追求,尽力消除三种距离,即:译文与原文在语言、文字、文化方面存在的距离、译者的原文理解和译文表达之间的距离、译者风格和作者风格之间的距离,从而达到人与译同化、心与手一致。尽管全译的理想追求和实际操作之间还存在一段很长距离,创造由“讹”向“化”的译文尚需不懈的艰辛努力,但“化”的最高理想并非海市蜃楼,“化”的最高标准绝非高不可攀,译者的不断实践是通向“化”之理想的不二法门,众多高质量的译文是实现“化”之标准的试金石。

总之,“化”字“并行分训”,兼含全译最高理想和最高标准的双重功能,既指向全译实践,又指向全译批评,具有实践指导性和示范性,能够提高译文质量、推动译才培养。

“化”作为全译最高理想和最高标准的通约性体现在从初级译者向中级译者、中级译者向高级译者、高级译者向翻译家的角色嬗变历程之中,体现在从误译到正译、从普译到佳译的精益求精的艺术创作过程之中,二者存在理论上的关联性和实践中的递变性。

3.2 “化”是全译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翻译是为实现某一特定目的而进行的一种复杂活动”(Nord, 2001:13),翻译目的可分为三类:译者的基本目的、译文的交际

目的、特定翻译策略或手段达到的暂时目的。目的论者除运用skopos(总目的)之外,还使用了aim、purpose、intention、function等几个相关概念:aim(目标)是翻译行为要达到的最终结果,purpose(目的)指达到目标过程中的阶段和结果,function(功能)指译文受众心目中文本意在传达的意义,intention(意图)是有目标的行为计划,包括译者有目标地化生译文和受众有目标地理解译文。这五个概念中,skopos是类概念,指翻译行为的总目的,其余四个是属概念,指翻译行为的子目的,总目的控制和支配子目的,子目的为总目的服务。

全译的总目的是“化”,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具有不同思维模式、运用不同语言的人们消除隔阂甚至冲突,构建译者与原文及其作者、译者与译文及其读者、译文与译文读者之间圆通共融的和谐状态。全译的直接目的是忠实原文,尽可能保存其信息内容和宏观形式,求得译文与原文极似,通过消除译文和原文微观的语言层面上的差异,确保原文的量变质变。全译的终极目的是“打通”,即:中西打通,古今打通,文字、文学、文化、学科打通,实现语言壁垒的凿通和人类文化的互文,最终建造人类文明的“巴别塔”。“化”作为总目的,是全译行为的统领和核心,决定整个活动中的诸多因素,既关涉全译标准的厘定和理想的追求,又体现战略的部署和机制的确立,最终落脚于决定策略、选择方法和运用技巧,是全译行为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动力,是一切全译行为的起点和归宿。

求“化”手段指译者为实现译文“去痕、存味”的目的而运用的工具、操作程序、方法技巧的总和,工具是指甲乙两种语言(即原语和译语),操作程序即为原语理解—语际转化—译语表达,操作方式是指对原文基本单位如词、短语、句、段、语篇等的处理,包括直译和意译(处理语言差异)或归化和异化(处理文化差异)两大全译策略,以及对译、增译、减译、移译、换译、分译、合译七种全译方法,以及针对不同语境中不同语言单位的具体处理而采用的三十余种全译技巧,从而构成完备的全译方法论体系(余承法,2014:16)。

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既是一个翻译问题,

也是一个哲学命题。一方面,全译的求“化”目的和手段相互区别、相互对立,“化”之目的和求“化”手段以其独立形态存在,二者不容混淆。“化”作为目的是译者根据原文内容和读者需求主观设定的,必须依靠现实条件作为前提,其总目的和终极目的是长期的,但具体目的或直接目的是短暂、易逝的,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与之不同,求“化”手段是客观存在和实际运用的,在某种意义上是长期运用的。另一方面,“化”之目的和手段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目的决定方法”,“化”之目的必须借助一定的求“化”手段才能实现,具体目的决定相应的求“化”手段,设定目的是为了考证其实现途径和手段的可行性,没有不采取求“化”手段就能达到的“化”之目的,正如诺德(Nord, 2001: 15)所言,“翻译是一种受目的驱动、以结果为导向的人类互动行为”。与此同时,求“化”手段首先是为了实现“化”之目的,没有不为实现“化”之目的而采取的求“化”手段,即使偶尔存在这样的手段,也是极个别情况下特殊的运用手段。因此,“化”之目的和求“化”手段均以对方作为自身存在的前提,共处于全译实践之中,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渗透、相互转化。

3.3 “化”是全译主体与客体的融合

全译主体是指参与全译实践的人,有时也包括作为人类智力延伸的机器,分为直接参与者(译者)和间接参与者(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核心主体是译者。一方面,译者是求“化”的主体,兼任原文读者、原文和译文的中介者和协调者、译文作者以及译文读者,所有本领都体现在循规蹈矩而又游刃有余地施展“化”术:消化原文、变化形式、化解矛盾、化生译文、物(原文和译文)我(译者)同化。在从隔到不隔、不化到化的颠顿风尘中,译者既可能承受“叛逆者”的恶名,又可能赢得“创造者”的美誉,于是“创造性的叛逆者”是其受之不甘的尴尬形象。“译者若能如学者般独立的学术思考理解原文,兼有作家沉着的艺术创造再现原文,以评论家敏锐的洞察力审视译文,则有可能进入自由的审美之境、凝神冥想的创造之境和至善至美的翻译之境”(余承法, 2006),这是求“化”主体的译

艺追求。另一方面,译文读者是悟“化”的主体,既是求“化”艺术的感受者,也是译文的评判者,高悬“化”之宝剑,对入“化”译文赞叹有加,对食而不化、化而不合的译文口诛笔伐。既然译者是一类特殊读者,读者对译文的审美要求也就自然体现在译者的求“化”过程之中。

全译客体是全译实践的对象,包括作为认识客体的原文和创作客体的译文。原文是全译活动的起点,首先进入译者的认识世界,译者必须跨越时空,进入忘我境地,融自身于原文的创作语境,透彻理解原文语形所体现的语义、语用及其反映的语言现实、文化背景和主客观世界。译文作为全译活动的终点,是双语转化之后的化生对象,译者必须实时调整角色,从用原语思维转化为用译语表达,融入译语反映的文化图景、思维模式、风俗人情、社会百态,用适当的译语形式表达对原文的准确理解,力争译文成为了无痕迹的文本生态。

“化”是译者主体性充分发挥的阶段,表现为认识差异、创造不已和诚明以信(彭发胜, 2006)。在求化和打通的过程中,文本意义呈现非线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译者必须让原文意义融化在其意识之内,尽量做到忘我以充分理解文本意义,这种行为即为西方哲学中的“悬置”,与孟子《万章上》的观点不谋而合:“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这是中国诠释学的一个核心命题。“以意逆志”是指读者根据自己对文本的充分解读,去逆推作者的心理状态及其相关语境因素。

因此,在原文作者—原文—译者—译文—译文读者的全译主客体链条中,译者跟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循环互动,以译者跟原文作者对话、转化表达原文为主,以原文作者间接参与和读者赏析译文为辅,共同推进全译艺术尽善尽美。译者穿梭于原文和译文,融原文于其意识之内,以内心空无的状态化出译文;读者充分解读、完全融入译文,在清明透彻的不隔译文中逆推作者的心境和原作反映的原语世界,进入主客融合、物我同化的艺术高境。

3.4 “化”是内容求信与形式造美的结晶

全译求“化”的首要条件是求“信”:“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

(钱锺书, 1979: 1101)。入“化”的译文, 必须求信于原文内容, 求真于原文风格, 跟原文处于一种不隔、透明的状态, 自身必须具备透义性, 确保一个语言世界中的读者借助译文认识另一个语言世界时, 并不感到译文的存在。同时, 求“化”也是为了造美。译者忠实原文并不是要亦步亦趋、矫揉造作, 而是在对原文融会贯通的前提下, 通过自己的审美判断和选择, 对原文进行艺术再创造。“化”强调译作的审美艺术效果, 认为译作是原作的“投胎转世”或“脱胎换骨”。许渊冲、许钧(2001: 46-59)认为: “求真是低标准, 求美是高标准; 真是必要条件, 美是充分条件……如果真与美能统一, 那自然是再好没有”。真与美的统一即为“化”, 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 既能解决译文与原文在内容与形式上的“一意多言”式矛盾, 又能解决译文跟原文“信言不美”与“美言不信”的矛盾, 因而成为原文在译语世界中内容求信与形式造美的结晶。

3.5 “化”是原文价值与译文使用价值的再现

原文价值是作者凝结在艺术创作中的无差别劳动, 其使用价值是原文能够满足读者阅读、欣赏和使用的属性; 译文价值是凝结在译文中的无差别劳动, 既包括作者的原创性劳动, 也包括译者的二度创作行为, 其使用价值是指译文能够满足译语读者阅读、欣赏和使用的属性。因此, 译文价值包含并再现原文价值, 译文的使用价值折射并近似原文的使用价值。

全译行为中, 求“化”主体与客体的和谐共融, 使原文经历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 在译语世界获得“来世”, 确保译文原原本本、不折不扣地输入原文的价值, 并彰显自身的使用价值, 帮助译文读者获得跟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满足相同的需求。既然全译之“化”旨在化解语际内容与形式的矛盾, 求得译文与原文的极似, 缔结文字、文学、文化姻缘, 那么全译行为的最终社会效应就是让原文与译文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共同体现于作者和译者的创造性劳动以及读者需求的艺术追求之中, 体现于原文内容渐化和译文形式化生的量变过程与结果之中, 成为价值的和合体。

4 结论

钱先生意识到“化”字本身“并行分训”, 挖掘出哲学之“化”的科学内涵, 体悟到艺术之“化”的无穷魅力, 对文字学之“化”做出独到的译学界定, 完成了对“化”的理性提升、概念移植和范畴转换。基于此, 本文将全译之“化”定义为: 译者为消除语际内容与形式之间的“一意多言”式矛盾, 得原作之意、存原作之味、成译作之形的双语转换行为过程与结果。“去痕、存味”是译艺之“化”的总体特征, 这与文字学之“化”的基本含义吻合, 与哲学之“化”的内涵一致, 与文艺之“化”的追求相同。宏观上, 坚持全译观念追求“化”, 转移原文意义实施“化”, 再现原文价值体现“化”; 微观上, 全译目的决定“化”, 全译手段展示“化”, 译者实践促成“化”, 读者审美需要“化”, 全译过程贯穿“化”, 全译结果验证“化”。总之, “化”是全译最高理想与最高标准的通约、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融合、内容求信与形式造美的结晶、原文价值与译文使用价值的再现。因此, “化”不仅是全译转换的精髓(余承法、黄忠廉, 2006), 更是体现为全译的本质。□

注释

-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化境研究”(13FYY008)和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专项基金项目“语言类型学视域中的惊讶范畴研究”(CSY15015)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Nord, Chir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13; 15.
- [2] Yu, Chengfa. On Qian Zhongshu's Theory of "Sublimity"[J].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006,14 (3): 214-229.
- [3] 陈大亮. 重新认识钱锺书的“化境”理论[J]. 上海翻译, 2006(4): 1-6.
- [4]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 上海外

- 语教育出版社, 2000: 419.
- [5] 葛中俊. “化境”背后: 钱锺书的文本价值论[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1): 150-153.
- [6] 辜正坤. 译学津原[M]. 郑州: 文心出版社, 2005: 83; 105-106.
- [7] 黄汉平. 文学翻译中“删节原作”和“增补原作”现象的文化透视——兼论钱锺书《林纾的翻译》[J]. 中国翻译, 2003(4): 26-29.
- [8] 黄忠廉. 翻译新解——兼答周领顺先生论“变译”[J]. 外语研究, 2012(1): 81-84.
- [9] 黄忠廉等. 翻译方法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0-12.
- [10] 黄忠廉, 李亚舒. 科学翻译学[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228.
- [11] 刘靖之. 翻译论集[C]. 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1: 1-15.
- [12] 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1-19.
- [13] 欧阳利锋, 尚敏锐. 以西方观点解读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理论[J]. 语言与翻译(汉文), 2002(1): 44-48.
- [14] 彭发胜. 融通化生——翻译过程的现象学描述[J]. 中国翻译, 2006(5): 29-36.
- [15] 钱锺书. 管锥编(1-5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1101; 472.
- [16] 钱锺书. 七缀集[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77-114.
- [17] 余协斌等. 钱锺书的翻译理论与西语雅译[J].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3): 46-49.
- [18] 王秉钦. 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 [19] 王宏印.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177-193.
- [20] 许建平. 钱锺书“化境”说新释[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1): 91-93.
- [21] 许渊冲, 许钧. 翻译: “美化之艺术”——新旧世纪交谈录[A]. 许钧等.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C].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46-59.
- [22] 许渊冲. 扬长避短, 发挥译文优势[J]. 翻译通讯, 1982(4): 19-22.
- [23] 杨全红. 化境: “理想”耶? “标准”耶?[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8 (1): 98-103.
- [24] 余承法. 释“化”[J].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2): 73-75.
- [25] 余承法. 全译求化机制论[D].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3.
- [26] 余承法. 从全译之“化”看变译之“变”[J]. 外语学刊, 2014(1): 99-103.
- [27] 余承法. 全译方法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 [28] 余承法, 黄忠廉. 化——全译转换的精髓[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2): 89-93.
- [29] 张今. 文学翻译原理[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 118.
- [30] 郑诗鼎. 语境与文学翻译[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70.
- [31] 周煦良. 翻译三论[J]. 翻译通讯, 1982(6): 1-8.
- [32] 朱宏清. 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锺书先生的翻译观[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2): 103-105.
- [33] 朱志瑜. 中国传统翻译思想: “神化说”(前期)[J]. 中国翻译, 2001(2): 3-8.

On “Sublimation” as the Essence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Abstract: Based on the new definition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and Qian Zhongshu's origi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ese word “hua” (“sublimation/sublimity”), the present paper defines “hua” as the process and result of a bilingual transformational activity in which the translator tries to maintain the meaning and flavor of the source text (ST) and create the target text (TT) by handling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same ST meaning and corresponding different TT forms. It then elaborates the fiv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that is, “hua” as the commensuration between the ultimate ideal and highest standard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the unity of end and mean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ubject and object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pursuing faithfulness to the ST and creating beauty in the TT,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ST value and TT value in use.

Key Words: Complete Translation; essence; “hua” (sublimation/sublimity); source text; target text

读钱不易 译钱更难:《七缀集》英译本译者导言

Duncan M. Campbell 著 余承法 译

摘要: 钱锺书《七缀集》英译本由世界知名的布里尔出版社作为“东亚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的第一部于2014年推出。译者邓肯(Duncan M. Campbell)呕心沥血近30年,完成这一异常艰巨的翻译任务。他在《译者导言》中探究钱先生学术品格,考订七篇文章的版本细节,阐明如何再现原著风格、追求“化境”,回忆翻译过程中的酸甜苦辣,为我们从事比较文学研究、钱学研究、翻译研究带来深刻启迪。

关键词: 钱锺书;《七缀集》;英译;导言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73X (2016) 02-0066-04

诚如布里尔出版社(Brill)“东亚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East Asi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主编张隆溪教授在拙译《七缀集》(Patchwork: Seve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序言中所说,学者、小说家和诗人钱锺书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钱先生的学风、文风颇似清代著名的考证派学者,融会贯通中国的人文传统(包括文言和白话),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记忆力,终生勤勉记下了大量读书笔记。他是一位语言天才和博学鸿儒,遍览博观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经典著作,娴熟掌握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的文、学术传统,其学术思想跨越时空,涵盖不同学科,创作体裁广泛,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为中国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树立了光辉典范。

广义而言,钱先生的学术研究可以归属到他本人和其他学者提出的比较文学的范畴,但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家。他总是避免那些似乎能够概括当代文学话语、实际上歪曲而不是加深解读古代文本的宏大系统理论。相反,他经常关注以往论著中的一些细节,挖掘被人遗忘或忽视的书籍中蕴含的真知灼见,并置古今中西韵文、诗歌、随笔、小说中的一两句话,旨在建立跨越时空的某种联系。

事实上,钱锺书的治学特征与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 M. Forster)提出的“惟有连接”(“Only Connect!”)存在某种契合,这种理想即是他主张的文、史、哲之间的“打通”(“to strike a connection”),“打通而拈出新意”。郑朝宗认为,“打通”一词有助于我们理解钱先生“真学力、真本领”的真谛^①。

在《七缀集》的这些文章中,钱先生指出一名学者需要完成的任务,这成为他终生追求的学术

使命。例如,他在《读<拉奥孔>》(On Reading Laokoon)中指出:要研究中国古代美学,就必须穷尽占有各种文献,不管这种方法获得的见解是多么“零星琐屑”。“……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再说,我们孜孜阅读的诗话、文论之类,未必都说得上有什么理论系统”(引用的钱锺书原文用小五号楷体标明,下同——本文译者注)。在其中最著名的一篇《中国诗与中国画》(Chinese Poetry and Chinese Painting)中,他强调应该发挥广泛阅读的作用,因为文艺批评史并不是要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最终还是为了批评自身。

我们要了解和评判一个作者,也该知道他那时代对于他那一类作品的意见,这些意见就是后世文艺批评史的材料,也是当时一种文艺风气的表示。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所以,风气是创作里的潜势力,是作品的背景,而从作品本身不一定看得清楚。我们阅读当时人所信奉的理论,看他们对具体作品的褒贬好恶,树立什么标准,提出什么要求,就容易了解作者周遭的风气究竟怎么一回事,好比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风的姿态。

翻译之难,人所共知。尝试翻译像钱锺书那样学识渊博、涉猎广泛的一位大家的作品,近乎是一种草率之举。他本人经常运用“出发的语言”(langue de départ)和“到达的语言”(langue d'arrivée)机智、优雅、娴熟地写作,也对翻译本质和翻译史发表独到见解,如本书中就有两篇文章透彻阐明翻译这

门艺业的诸多方面。在《林纾的翻译》(Lin Shu's Translations)中,他高度评价清末民初大翻译家林纾的翻译作品,开篇的几段文字展现了他作为学者和批评家的治学风格:

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囀,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囀’,读若‘譌’。”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引“诱”,“譌”、“訛”、“化”和“囀”是同一个字。“译”、“诱”、“媒”、“訛”、“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polysemy, mani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难于避免的毛病(“訛”)、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翻译,从广义上讲,可以说是贯穿了钱锺书的一生。他出生于清朝即将灭亡的前夕,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甚至血腥的事件,如:三次国内革命战争(1926-1927;1927-1937;1946-1949)、抗日战争(1937-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9)、“三反”、“五反”运动(1951-1952)、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②,以及随后的改革开放。父亲钱基博为他取名“默存”,希望他沉默少言,他在上述重大场合中基本上都听从了父亲的教导。美国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在《〈管锥编〉英文选译本导言》(Introduction to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中,隐约意识到钱锺书“暗射文化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其学术品格。钱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指出,为了最准确地评判一位作者,应该了解他创作时代的文艺风气,这也提示我们,他本人是如何认识到时代背景对于创作的重要意义。我们会自然想到他在《诗可以怨》(*Poetry as a Vehicle of Grief*)中阐述的“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这是他自己战胜不幸、走出逆境的一种含蓄表达。

如果说钱先生的“化境”(“realm of transformation”)是我作为一名译者无法企及的境界,那么我希望翻译的《七缀集》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避免对原作的“訛”,引“诱”读者对这位杰出学者的学术著作及其关注的事物产生新兴趣。钱先生有两

部辉煌巨著:《谈艺录》(*On the Art of Poetry*)研究唐宋诗歌,完成于1940年代早期,1948年出版;《管锥编》问世于1979-1980年间,关注范围扩大到了“中国的整个人文传统”,包括书法和美术在内的视觉艺术^③。这七篇论文虽然创作于不同年代,但在一定范围内探讨了上述两部巨著中涉及的一些主要论题,可认为是他“打通”二者之间的一根主线。因此,《七缀集》是带领我们走进钱锺书学术世界的起点。

《谈艺录》和《管锥编》用难懂却灵活的文言写成,《七缀集》中各篇文章基本上采用流畅、细腻在白话,同时繁征博引中国古典诗文。中国在20世纪早期进行的语言文字改革导致了文言和白话的分离,钱锺书试图努力打破文字体系的这种泾渭分明的界限,写作中交替运用文言和白话。1948年他在评价好友杨宪益翻译的《老残游记》(*The Travels of Old Decrepit*)(他在《通感》中也提到了这部小说)的一篇英语文章中表达了这种奋斗理想,在分析书中王小玉说鼓书那一段描写(这是非常有名且被经常引用的一段)之后得出结论:“换言之,在这段音乐描写中,没有继承文言传统的一位现代作家可能尝试将散文提升为诗歌,而像刘鹗那样接受家学熏陶和古文教育的一位文人,显然是想试验让诗歌适应散文。从白居易到王以敏都是用文言作诗,刘鹗却用白话写散文,并大获成功。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新瓶装旧酒,而是名副其实的文字竞赛和体裁转换。”^④

钱锺书谦虚地将第二部巨著取名为《管锥编》,“管锥”语出《庄子》等书,意指有人试图“用管窥天,用锥指地”,并谦虚地为艾朗诺的英文选译本取名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有限的观察:关于观念和文学的札记》)。关于《七缀集》的取名,他在序中解释说,“这本书是拼拆缀补而成”,可见他也同样出于自谦。我在英译这个标题时,尽可能忠实作者的本意,同时将艾朗诺的《管锥编》英文选译本视为楷模。

我翻译的《七缀集》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出版、1988年二次印刷的版本,书中附有钱先生多次手抄的“修订和反复思考”——这是他1998年5月2日给我信中的原话,他赠送给我的即为该版本。他在《七缀集》序言(落款时间为1984年11月,我也译成英语)中提到,前四篇文章收入1979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旧文四篇》(*Four Old Essays*)。这些文章写于1948-1963年间,再版时进行了大量修订。他在《旧文四篇》原序中还提到这些文章第一次结集出版的部分细节,我翻译了该序,

并附录在书后。后三篇跟翻译相关的文章发表于1980年代初期,其中《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的早期英语版本 *An Early Chinese Version of Longfellow's "Psalm of Life"* 发表于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书林季刊》(*Philobiblon*) 1948年第2期第10-17页,他后来接受张隆溪的建议,将其改写成了一篇较长的中文。这三篇文章收入1984年香港广棱镜出版社出版的《也是集》(*This Also Collection*),书末提到出版细节,我将译文附后。

《七缀集》中收录的几篇文章曾由法国汉学家郁白(Nicolas Chapuis)译成法语,收入克里斯蒂安·布格瓦(Christian Bourgois)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诗学五论》(*Cinq Essais de Poétique*)。另外,《林纾的翻译》由香港学者高克毅节译为Lin Ch'in-nan Revisited,发表于香港《译丛》(*Renditions*)杂志1975年第5期第8-21页。《诗可以怨》的早期版本由香港翻译家黄兆杰译成 *Poetry as a Vehicle of Grief*,发表在《译丛》杂志1984年第21、22期第21-40页,后来收入宋淇主编的《诗中情意:中国诗歌与诗学》(*A Brotherhood in Song: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译丛》丛书,1985年版)。黄先生同意我将其译文收入本书。董存曾将这篇文章译成 *Poetry Can Vent Resentment*,发表于《文贝:中国比较文学研究》(*Cowrie: A Chines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广西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期刊,广西少数民族出版社出版)1986年第3期第1-15页。有人将《通感》译成 *Synaesthesia*,发表于《文贝》1983年第1期第1-20页。

我在本书中采取的翻译方法是尽可能做到译文通畅、信达,保留钱先生原作中的散漫(偶尔出现的迂回)风格,同时尽量将各篇文章的标题及其相关内容跟艾朗诺《管锥编》英文选译本保持一致。集中的每篇文章都可以单篇阅读。钱锺书旁征博引中国和欧洲国家的文学作品,在阅读、笔记、写作、修改、发表、再版的过程中,一些小错(主要是各种形式的排印错误)在所难免。我注意到这些错误时,悄悄予以更正。毫无疑问,错误仍然难免;也毫无疑问,我可能新增了一些错误。钱先生的参考书目通常比较简略,我没有补充诸如出版地之类的细节而给读者增添麻烦。

作为作家,钱锺书留给后世的丰富遗产是创作于1930-1940年代中国的最优秀长篇小说《围城》(*Fortress Besieged*)以及充满睿智、博学的短篇小说和随笔;作为学者,他的上述两部辉煌巨著代表了

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美学传统的最高成就。我衷心希望这本译文集能够为更多非中国的学者了解和欣赏。在学科分类日益专门化却毫无新意的当下,钱锺书及其学术方法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多年来,为翻译这部论文集,我欠下了很多人情。

钱先生最初得知我要翻译这本书时,他心里多少有些疑虑。令我终生难忘的是,1987年12月上旬的一个下午,我带着部分译稿登门拜访,他和夫人杨绛先生(小说家、戏剧家、翻译家)接待了我,他们的热情大方、温文儒雅果然名不虚传。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招待”了我——给我讲述了这些文章的写作背景和相关细节。我临走时,他真诚地问我是否读过戴维·洛奇的《小世界》(*David Lodge's Small World: An Academic Romance*)。当时我还没有看,后来一弄到这书本就及时拜读了,书中的日本译者晃坂辉(Akira Sakazaki)在翻译的过程中问了小说作者罗杰·弗洛比舍(Roger Frobisher)无数细节问题、让他不堪其扰,只有这时我才深切体会到钱先生问我那个问题的良苦用心!虽然他博学多才,却总是富有童趣,快意于欣赏人生的多种讽刺。

此后这些年,我无数次修改译稿,这次出版时得到杨绛先生的授权。

包括那次北京之行在内,我多次受到好友、时任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馆官员艾伦·杨(Alan Young)的热情款待,在此对他深表感激之情。

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教授是我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同事,最早建议我翻译这本文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主任白杰明(Geremie Barmé)教授是我现在的同事,早在1987年就将我打算翻译《七缀集》的请求信转交给钱先生。多年来,两位教授非常关心我翻译工作的进展情况。宋淇认为我的翻译工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而又极其艰巨的任务”,非常慷慨地跟我在香港见面,探讨钱先生及其作品。已故的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柳存仁先生花费了很多时间阅读我的译稿,用准确无误的小号字体手写了几页修改意见,因此我的英译得以避免更多增删错误。我对他感激不尽!朋友兼同事庞秉钧和张静清审阅了我的译稿,提出了很多改进意见。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教授雷勤风(Christopher Rea)博士曾打算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中心担任研究员,最近几年将钱先生的短篇小说和部分散文译成 *Humans, Beasts and Ghosts: Stories and Essays* (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这是研究和翻译钱锺书的一部典范之作,鼓舞我重新开始这项搁置多年的翻译工作。香港城市大学张隆溪教授2012年受邀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从事学术交流时,决定将我的《七缀集》英译本作为他和波士顿大学魏朴和(Wiebke Denecke)教授共同主编的“东亚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的第一部,两位主编对译作提出了许多改进意见。张教授还精审拙译,确保译文尽可能准确、流畅。我在翻译中不断遇到新问题时,他总是给出良好建议,这也促使我重新拜读钱锺书作品,能够更准确地体味其中蕴含的机智和细腻。张教授还慷慨为本书作序,阐述对钱先生著述的真知灼见,让本书大为增色。布里尔出版社出版编辑姜琴(Qin Higley)女士为人和蔼可亲,给予了大力支持。

我无限感激这些朋友和同事给予的帮助和鼓励。我相信本书的出版是对他们慷慨热情的一种报答。当然,由于我水平有限,译文中的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

我要将这本书献给我的家人,多年来为完成这部译著,我未能分担家务,在此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歉意和诚挚的谢意!

致谢:《〈七缀集〉英译本译者导言》的中文翻译,经由布里尔出版社授权,征得邓肯教授的首肯并赞同添加中文标题,多次得到他极为严谨的审校和异常耐心的答疑。同时感谢张隆溪教授给予的鼓励 and 指教,感谢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化境研究”(13FYY008)的支持。

注 释

- ① 郑朝宗,《〈管锥编〉作者的自白》,《人民日报·副刊》1987年3月16日第8版。研究钱锺书及其学术

的英文论著包括: Ronald Egan, “Introduction”, to Qian Zhongshu,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by Ronald Eg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26. Theodore Hutters, *Qian Zhongshu, Twayne World's Authors Series # 660* (Boston: Twayne, 1982); Christopher Rea, “Introduction”, in Christopher G. Rea, ed., *Humans, Beasts, and Ghosts: Stories and Essay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这三部文献提供了关于钱锺书的很多富有启发性的信息。最有影响的中文著作是: 孔庆茂,《钱锺书传》,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5年版。随着“钱学”成为一门新兴学科,钱锺书的大量传记先后问世。

- ② 在1969-1972将近两年半的时间里,钱锺书和杨绛被分别下放到河南农村的干校,夫妇二人隔得较近: 钱锺书分发信件,杨绛在菜园除草。《干校六记》记叙了这段经历,见杨绛著《陆沉》、白杰明译 *Lost in the Crowd: A Cultural Revolution Memoir*, 墨尔本: 麦克菲·格里布出版公司, 1989年版。
- ③ Ronald Egan, “Introduction”,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p.5.
- ④ 钱锺书,《〈老残游记〉英译本第二章注释》,《书林季刊》(C. S. Chi'en, “A Note to the Second Chapter of Mr. Decadent”, *Philobiblon*), 1948年9月。该文发表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办的电子期刊《中国遗产季刊》(*China Heritage Quarterly*)第25期(2011年3月,网址: <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editorial.php?issue=025>)。

[作者简介]邓肯(Duncan M. Campbell), 博士, 新西兰人, 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汉学系教授、美国汉庭顿图书馆艺术馆和植物园东亚园林艺术研究所所长、流芳园院长, 主要研究中国文学和明清时期文化。

[作者电子信箱]duncan.campbell@anu.edu.au

[译者简介]余承法, 文学博士, 中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普拉特维尔校区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研究方向: 翻译学、中外语言比较。

[译者电子信箱]victoryu2006@126.com

文学世界主义研究的最新力作

——《中国的文学世界主义者：钱锺书、杨绛和文学世界》述评

余承法

一、引言

《中国的文学世界主义者：钱锺书、杨绛和文学世界》(China's Literary Cosmopolitans: Qian Zhongshu, Yang Jiang, and the World of Letters)^①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举行的“钱锺书和杨绛：百年透视”国际研讨会(Qian Zhongshu and Yang Jiang: A Centennial Perspective,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的论文集，^②由活动发起者、该系教授、中华研究中心主任雷勤风(Christopher Rea)博士担任主编，是世界知名的布里尔出版社(Brill)“雷登中国研究”(Sinica Leidensia)系列的第一百二十五卷。正如雷勤风在导言中所说，钱锺书、杨绛夫妇在小说、散文、诗歌、翻译、文艺批评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他们作为中国的“文学世界主义者”杰出代表的明证，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创作生涯正好反映了中国文学追求“世界主义”的艰难历程。因此，论文集的出版将助力海内外学者重新审视这两位学者型作家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重大贡献，助推他们的作品在西方的译介、传播与研究。

二、内容概述

除序言和结语之外，全书正文分为九章，收录北美学者的九篇论文，分述如下。

第一章：杨绛抗战时期的喜剧，换言之，婚姻是一场交易(Yang Jiang's Wartime Comedies; or, The Serious Business of Marriage)，作者艾米·杜丽(Amy D. Dooling)是美国康涅狄格学院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小说和女性作家。该章通过研究杨绛抗战时期的四部喜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风絮》，揭示了这些作品反映的共同主题——物质贫乏时期人们以婚姻为跳板、企图通过嫁娶富贵来改善生活，总结了杨绛喜剧创作的一贯风格：运用幽默手段、注重安排情节、善于创新手法、探讨哲学问题，分析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如何成

① Christopher Rea (ed.), China's Literary Cosmopolitans: Qian Zhongshu, Yang Jiang, and the World of Letters, Leiden/Boston: Brill, 2015.

② Tiziana Lioi, "100 years of Qian Zhongshu and Yang Jiang: A Centennial Perspective", in Ikuko Sagiyama & Valentina Pedone (eds.), Perspectives on East Asia, Firenz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03 - 116

为影响作家人生和创作的重要阶段。杨绛的这些作品,既是清华求学期间耳濡目染的结果,又受西方喜剧传统如奥斯卡·王尔德的影响,更是直接取材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普通事件。她选择以轻松幽默的喜剧探讨婚姻的重大课题,直面荒谬与残酷,避免直接涉及战争,无疑引起读者的好奇和学界的探究。《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的成功在于时尚的语言、智慧的对话、跌宕起伏但组织严密的情节,以及对物欲横流社会中扭曲的金钱观的讽刺。《风絮》因战争接近尾声、剧院萧条而没有上演,但其主题——自私、虚伪、浪漫爱情的无用、理想的破灭——同样表达了作家当时的人生感悟。

第二章“夜来无梦过邯郸”:钱锺书诗歌与诗学中的激情与自制 (“Passing Handan without Dreaming”: Passion and Restraint in the Poetry and Poetics of Qian Zhongshu), 作者是俄勒冈大学东亚系副教授王宇根 (Yugen Wang), 主要研究中国文学。该章考察了钱锺书的三部跨越时空、不同类型的诗歌作品《槐聚诗存》(诗集)、《宋诗选注》(诗选)和《谈艺录》(诗评), 引用例子评价了他在诗歌创作和批评方面的才智, 分析了他创作风格和学术风格的深度与厚度, 总结了贯穿这些著作中的情感和智力动因: 作为一名文学世界主义者, 钱先生毕生追求打通中西、古今、学科的界限, 在现代社会中继承古典诗歌传统拥有无限的激情与一定的自制。钱锺书在诗歌创作和评论中的成就不仅与二十世纪的文学和人文背景有关, 还与中国古代文论的旧传统相关, 更是因为他精通新旧两种文学体裁, 具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进取的现代精神。他钦佩宋诗理论和实践的成就, 也批评宋诗“爱讲道理、发议论”的缺陷, 谦虚又中肯地评论杜甫和元好问倡导的论诗绝句。他采用宋诗的规则和形式进行诗歌创作, 但不完全同意宋人的诗歌创作技巧, 因而

在追求韵律形式标准和纯意义、古典传统和现代文论之间寻找平衡, 既保持诗歌创作和评论的激情, 又形成诗学视野的自制。

第三章: 杨绛小说中的自欺与自知 (Self-Deception and Self-Knowledge in Yang Jiang's Fiction), 作者是《洗澡》和《小阳春》的合译者梅珠迪 (Judith M. Amory)。本章通过回顾杨绛的人生经历、梳理其早期作品, 分析她如何将十八世纪英国文艺理论的原则、自身所处的环境融进小说创作。钱锺书和杨绛都只发表过一部长篇小说, 并且都是关于中国知识分子, 因此很多人误解《围城》和《洗澡》是姊妹篇。尽管钱氏夫妇都认为小说像一面镜子, 揭露人类的愚蠢和欺骗, 鼓励人们通过反省加以提高, 但侧重点有所不同: 钱锺书创作《围城》时很年轻, 书中充满智慧与讽刺, 重在暴露人性的劣根; 杨绛创作《洗澡》时已有阅历, 更多关注个人提高。杨绛感兴趣的是十八世纪洞察人性弱点、崇尚正义诚实、追求自知自改的文学, 如亨利·菲尔丁的“喜剧史诗”、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洗澡》《洗澡之后》《我们仨》《璐璐, 不用愁》和《小阳春》等都带有喜剧色彩, 寓说教于娱乐, 在笑声中抑恶扬善。《春泥》《关于小说》《倒影集》《大笑话》《玉人》《鬼》和《事业》形式多样, 以平静的方式叙述特殊政治背景下的生活, 理性揭示人性中深层的悖谬, 提倡美德和自我提高。

第四章: 如何用语言行事: 杨绛与翻译的政治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Yang Jiang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作者是杜克大学亚洲及中东地区研究中心副教授罗鹏 (Carlos Rojas), 主要研究女性、动漫艺术和中国文化。该章考察了杨绛在特定政治环境中的文学翻译实践, 探讨她如何利用原语和译语的间隙插入文学创作和时事评论, 阐明她提出的翻译原则和方法。杨绛的翻译活动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 贯穿于“文化大革

命”，因此打上了政治烙印。她的第一部译作是从英语转译成汉语的西班牙经典作品《小癞子》，具有反教权性质，一度遭禁；第二部译作是直接从法语译成中文的《吉尔·布拉斯》，问世后颇受欢迎，第二年她便应邀翻译《唐吉珂德》。她仔细比读《唐吉珂德》的几个英、法译本，发现差别不仅是语气，还有意义，于是决定学习西班牙语，认为从原语翻译可减少迂回和错误。她借用其中的一个情节形象地说明翻译过程：原文好比《圣经》，译文好比佛经；店主读账本好像在念经，念的是他不信的佛教内容，祷告内容却来自《圣经》。因此，翻译不仅仅是运用语言传达信息，还产生言后的行为效果，经过从死译到硬译、再到直译的三个阶段，译者只有不断与不可避免的局限和失败做斗争，才能追求译作的完美和透明。

第五章《管锥编》、西方文献引用和文化革命(Guanzhuibian, Western Citation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作者是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艾朗诺(Ronald Egan)，主要研究中国诗歌和文人文化。该章以《管锥编》这部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锋之作为研究对象，分析钱锺书的创作特色及其时代背景。《管锥编》的写作特色体现在：在修辞方面，他运用诗一般的语言和各种修辞手段，引用中国诗词时总在外文文献中找到对应或类似的内容；在诗歌技巧方面，他使用交错法、比喻、喜剧效果、幽默等中西诗歌创作中的共同点，达到最佳表达效果；在主旨方面，他联系西方浪漫主义风格；在观点方面，他总结中西文学表达和文学理论观点。《管锥编》是有关中西文学、哲学的一部辉煌巨著，是大量引用中国古文和西方文献的一本笔记：引用英、法、德、意、希等多种语言，包括一百多个欧美诗集、小说、文艺批评、美学、历史、哲学等，且多有扩展和论述；引用古代历史、哲学、诗歌、戏剧、散文、童话、文学批评、日记等，但没有

引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批评家和思想家，钱锺书故意使用古文显然带有政治目的，因为红卫兵的受教育程度不高，读不懂古文，也似乎在借此影射“文化大革命”。

第六章：以低调为荣：杨绛和中国革命文化(The Pleasures of Lying Low: Yang Jiang and Chinese Revolutionary Culture)，作者是俄勒冈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文迪·拉森(Wendy Larson)，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电影和文化。该章通过研读杨绛的四部作品《洗澡》《干校六记》《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阐述了包括艺术家、作家、学者、科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下放期间遭受身心折磨这一主题。《洗澡》记录了京津地区三千多名大学教职工集中一起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改造运动，讽刺了这场运动的荒谬，暗含着文人的情感痛苦。《干校六记》以冷静、轻松的口吻回忆知识分子在艰难政治环境中的生活琐事，避免描写他们与权力的接触。在这方面杨绛与王小波有相似之处，但是后者笔下的主人公不关心政治，以纵容自己的性爱得到快乐，而杨绛作品中的知识分子颇像法国著名学者菲利·普布林(Philippe Burrin) 研究中提到的纳粹入侵法国时期的知识分子，面对压迫，有反抗、有合作，但以妥协居多。拉森指出：杨绛以“低调”为荣，描述了革命时代理想的知识分子一直具备的道德和智力素质：独立、远见、荣誉、超然和纯洁，表现了这位文学世界主义者洁身自好的精神。

第七章：制度心态：钱锺书和杨绛论婚姻与学院(The Institutional Mindset: Qian Zhongshu and Yang Jiang on Marriage and the Academy)，作者雷勤风认为，钱氏夫妇的婚姻忠贞和学术成就是现代中国文人的典范，他们的作品在主题和风格上有诸多共同之处：第一，善于嘲讽，揭露知识分子卑劣的行为，《围城》记叙方鸿渐的婚姻失败和学术造假，《洗

澡》记录余楠婚姻不忠、巴结领导、排挤同事;第二,追求真实,《弄假成真》的主人公周大璋伪装自己是海归,以博得富家女子的青睐,《围城》的主人公方鸿渐伪造学历找到体面工作,这些都是虚伪、欺骗,遭人唾弃;第三,崇尚独立,在政治环境中保持文人的超然和独立,贯穿于文学作品之中,《写在人生边上》和《我们仨》都强调恋爱、婚姻期间保持智力独立的重要性。在现实生活中,杨绛并没有困于婚姻,钱锺书去世后她仍然坚持写作,不仅回忆了她与钱锺书的学术友谊和情感生活,也显示了她在学术方面的独立;第四,注重专一,强调对妻子或丈夫的智力和情感奉献,《围城》中方鸿渐缺乏对事业的奉献,《小阳春》记录俞太太对丈夫的过渡奉献,《玉人》和《上帝的梦》分别暗示,奉献不够或者奉献过度都值得深思。钱氏夫妇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在美满的婚姻中既互相奉献,又有各自的学术专长。

第八章“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杨绛新的贴心读者(“All Alone, I Think Back on We Three”: Yang Jiang's New Intimate Public),作者杰西·菲尔德(Jesse Field)是《记钱锺书与〈围城〉》和《我们仨》(第一、二部)的译者。本章考察读者对杨绛后期作品的关注和喜爱。他们因为阅读《我们仨》对杨绛倍感亲切,开始关注她的人生,关注她和钱锺书如何深爱对方、度过艰难时世。杨绛在女儿和丈夫去世之后,着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与其说是在选择翻译,不如说是在逃避现实,寻求一种忘记自我、冷静对待死亡的态度。《我们仨》中记叙钱瑗的内容不多,讲述了一个没有名门光环的真实的钱瑗:一个多病但很听话的战争时代的孩子,是可造之才,但栽培不够,不像父母那样人文素养高、知识面宽,这是该书畅销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她对中国共产党制度的肯定,她和风细雨讲述一个又一个关于婚姻、葬礼的小故事,预

示意识形态对人类情感和物质生活的深远影响,为中国政府寻求未来的道德教育提供了有益借鉴。此外,她开创了女性自传体小说的先河,为自己赢得了一大批“贴心读者”,使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几乎所有媒体都大量刊载有关女性的文章。

第九章:世界主义的当务之急:钱锺书和“世界文学”(The Cosmopolitan Imperative: Qian Zhongshu and “World Literature”)。作者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文化系荣休教授胡志德(Theodore Hutters)。该章通过重新审视钱锺书的《围城》这部被视为文化包容的经典作品,考察中国社会对文学世界主义的执著追求。胡志德指出,钱锺书认为中国文学具有世界文学的某些共性,致力于运用自身的博学、借助共同的主题、娴熟并置中西美学的文本,来追寻现代的表达方式,但中国力图加入“世界文学”的理想追求,是钱锺书的同龄人和后继者难以实现的。钱锺书本人采用一种间接的方式来追求这一目标:一方面,他在小说中广泛使用文字游戏,这很难译成他国语言,从而令国际性读者望而却步;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家和史学家对他不轻易下结论的文学研究感到茫然,很多问题亟待回答并澄清。胡志德认为,《围城》是描写中国战争期间城市精英堕落的众多小说之一,但它记录了与欧美接近的生活方式,反映了与一九三〇至一九五〇年间的英国著名小说相同的主题,因而深深扎根于世界文学的营地,具有独特的核心文化价值。《围城》作为一种可能的安慰方式,它嘲讽了中国的过去,但同时也代表了对现代性的不满,处处批评他人(尤其是主人公方鸿渐)的价值观,却没有标明作者本人的价值观,因而逃避了美学上的一个重大问题:除了一概否认,还有什么值得肯定呢?因而,它又是一部“自我吞噬的作品”,是英国小说风格在中国的冷试验,在很大程度上标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

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三、简要评价

纵观全书,这部文集体现以下四个鲜明特色:

(一)第一次将钱锺书、杨绛定位于“文学世界主义者”,从全新的角度评价他们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做出的突出贡献。雷勤风曾指出,钱锺书的世界观和文学风格体现为“四海为家的世界主义”,本书几乎所有章节(包括序言和结语)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将两位作家置于世界文坛的高度,与同时期海内外作家的创作主题和艺术风格进行比较,分析体现在他们作品中的文学世界主义思想或品质。

(二)第一次在英语世界相对完整地研究杨绛的作品,是海外杨绛研究的扛鼎之作。集中探讨贯穿钱锺书诗歌创作与诗学思想的原动力。全书比较全面地勾勒了杨绛的创作与人生,系统地研究了杨绛的战时喜剧(第一章)、文学翻译实践(第四章)、小说(第六章)、回忆录(第八章)等不同体裁的创作成就,视角新颖,材料充分,论证合理,观点明确,将推动杨绛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译介和传播。

(三)第一次荟萃北美学者对钱锺书、杨绛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海外钱学研究五十年来的一部最新力作。全书借鉴海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当下中国读者的评价,有力度、带温度地研究钱氏夫妇相互交织的创作和人生,重新评价他们文学作品的巨大艺术价值和深远文化影响,有利于学界追踪海外钱锺书、杨绛研究的前沿动态。

(四)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别出心裁地出版钱锺书、杨绛研究的论文集,给海内外钱锺书、杨绛研究吹来一缕清风。以往的钱锺书、杨绛研究,以译介居多,研究较少,多为单篇

论文,少见系统性专著或文集,缺乏学界的沟通与交流。该书作为国际性会议的论文集,经过与会学者的充分讨论和自由交流,加上四年多的编选、成书和沉淀,可以弥补上述缺陷。别具一格的编排方式令读者耳目一新、受益匪浅:各章内容虽侧重不同、视角各异,但都紧扣主题,贯穿办会理念和成书主线(参见主编立意深远、首尾呼应的序言和结语);每章伊始都引用名人(包括这两位作家)名言,概括本章主要观点;书后附录了两位作家用英语创作和被译成英语的作品,方便读者进一步查阅和研习。

尽管这次研讨会及其文集是针对非汉学家的大众读者,但毕竟是在讨论学术问题,因此个别章节对作家的生平和作品介绍稍微从简。第一、三、四、六、八章研究杨绛,第二、五、九章研究钱锺书,第七章研究钱氏夫妇,偏重杨绛研究,这是对以往较多关注钱锺书而忽视杨绛的一次矫正,值得赞赏。全书更多论及二人的文学成就,对钱锺书的学术成就涉及较少,编者对此作了相关解释,但这毕竟凸显了海外钱学研究长期存在的一个失衡点:重视钱氏的文学成就,忽视其学术贡献。全书按照钱氏夫妇发表作品的时间顺序排列九章内容,但似乎难以贯穿始终,仅以钱锺书的作品为例:第二章中,《槐聚诗存》收录钱锺书一九三四至一九九一年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旧体诗歌,《谈艺录》和《宋诗选注》分别首次出版于一九四八、一九五七年,经过多次修订和重印,很难用某部作品的某个版次来界定发表时间;第五、九章对《管锥编》和《围城》研究的安排也存在作品发表时间上的错位。

四、结语

自从美国华裔学者夏志清(C. T. Hsia)高度评价《围城》以来,^①钱锺书在海外拥有

越来越多的读者和研究者,杨绛也一直受到关注和译介。尽管他们的一些作品业已整理、翻译并出版,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走进去”作出了杰出贡献,但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全面认识。^②“人生是一部大书”,诚如雷勤风在这部文集的结语中所言:钱锺书、杨绛的故事远没有结束,许多档案机构决心继续挖掘新材料、提供新信息,世界主义仍将成为中国文学文化发展的当务之急。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钱氏夫妇的世界主义文学视野将会对当下读者和研究者产生巨大吸引力,将会有更多的同类研究成果陆续问世。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基于语料库的化境研究”(13FYY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余承法,文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普拉特维尔校区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责任编辑 高海涛)

-
- ① C. 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432 - 460.
 ② Christopher Rea, "Introduction", in Christopher Rea (ed. and tr.), Humans, Beasts, and Ghosts: Stories and Essays by Qian Zhongshu,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 - 19.

(上接第 29 页) 悯情怀。因为以童年视角为主,成人视角巧妙退居幕后,甚至自然隐蔽,让作品生成了一种“另类”的美感,类似于“反串”、逆向审视。又因成人视角的存在,从而填补了纯粹童年视角的“空白”——毕竟,许多人情的冷暖、是非的曲直乃儿童无法彻知的秘密。两种视角的交相辉映生成了文本恢弘的艺术时空,

总之,文学书写“中间地带”的诸多悖论无疑需要相当的洞察力和巨大的勇气,更需要与各种不合理的社会规约保持距离,甚至保持永不合作的姿态。作家绝对不能充当道德评判家,绝对不能以全知全能的圣人情怀去消解矛盾。需要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毅直指问题所在,虽然不能解决所有的迷惑和悖论,即或仅仅是现象呈现,亦能促发思

考,必然会迎来启迪心智的契机。“中间地带”之于中国儿童文学书写可谓真空地带,从某种意义上说,书写“真空地带”为中国儿童文学拓展了更为广阔的天空,是中国儿童文学巨大的增殖空间,使得中国儿童文学书写具有了多种可能性,甚至是医治“片面的单纯”等沉疴的良方。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日北京寓所初稿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北京寓所终稿

【作者简介】张国龙,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韩春燕)

全译求化的三位一体原则

余承法

(中南民族大学 外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 全译的本质是化,旨在转移原文的信息内容,变换其表达形式,化解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一意多言”式矛盾。由于中西语言文字、思维方式、文化传统之间的巨大差异,汉文与外文互译很难实现等值、等效,只能追求译文和原文在意似和形似基础上的风格似,遵循全译求化的内在规律,反映以求化为核心的全译观,遵循以语用价值为关键和核心、语里意义为基础和前提、语表形式为结果和外化的三位一体原则。

关键词: 全译; 化; 求化; 三位一体原则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2014)03-0176-05

一、全译及其本质

全译是“人和/或机器用乙语转化甲语文化信息以求信息量极似的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1],其核心与精髓是转化,包括转换和求化,即转移原文的信息内容,变换表达形式,化解原文和译文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转换成功即为求化,求化的外在表现是追求译文与原文的信息量极似。结合“化”的文字学原解(教化、变化)、哲学通解(渐化、化生)、美学专解(物化、化境)和钱锺书自解(去痕、存味),可将全译之“化”定义为:人和/或机器为解决语际内容与形式之间的“一意多言”式矛盾,采用对、增、减、移、换、分、合等手段传原文之意、存原文之味、成译文之形的双语转换行为。“化”作为原文内容渐化、译文形式化生的量变过程和结果,是全译最高理想和最高标准的通约、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融合、求信与造美的结晶、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再现,因而体现为全译的本质特征^[2]。

二、全译求化的内在规律

全译忠实传递原文的语义内容,完整再现其语用价值,通过保留或改变原文微观的语言形式来化解“一意多言”式矛盾,使原文表达的异域事物逐渐为译文受众理解和接受。由于中西语言文字、思维模式、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受到行为主体(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受众)、客体(原文和译文)、媒介

(时空距离和信道噪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汉文与外文互译不可能实现翻译界曾经主张的“等值”或“等效”,只能追求译文和原文最大程度的相似。“似”是指译文与原文之间的接近程度,在内涵上可分为近似和胜似^[3],近似是指译文跟原文相近或相像的程度,即“好的翻译,我们读了如读原文”^[4],是全译的常态追求,应用全译中更为常见;胜似指译文胜过或超过原文的程度,即“译笔正无妨出原著头地”^[5],多为文学全译追求的妙境。

例1 For men who are fortunate all life is short, /but for those who fall into misfortune one night is infinite time.

幸运者一生忽忽,厄运者一夜漫漫^[6]。

例1 两行原诗为并列结构,形式比较接近,意义形成对照。钱锺书汉译时完整保留这一特色,用“幸运者”和“厄运者”分别译出 for men who are fortunate 和 for those who fall into misfortune,用四字词语“一生忽忽”和“一夜漫漫”分别译出两个小句 all life is short 和 one night is infinite time。译文既对仗工整,又朗朗上口,诗歌的韵律和节奏更加明显,表达手段近似原文,表达效果胜似原文。

任何文本都包括形式、意义和风格三个要素,因此,全译求化的“似”在结构上可分为形似、意似和

收稿日期: 2013-06-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化境研究”(13FYY008);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全译求化机制研究”(2012G458); 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英汉复句中语气组对比研究”(CSY13021)。

作者简介: 余承法,男,中南民族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翻译学。E-mail: victoryu2006@126.com

风格似^[4]。

1. 形似。形似,指译文与原文语言形式的相近或相像,是“似”的外在表现,既包括保留原文的文体语体、篇章布局、行文方式等宏观结构,又特指尽可能贴近原文的遣词造句、韵律节奏、修辞手段等微观结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赖内容,不同内容需要作出相应变化,形式反过来又影响内容的表达,因此译文在准确传达原文内容的基础上,必须尽可能追求形式上的逼真,以期再现其语言特征。

各民族对文学体裁的划分大体一致,互译时大多可在双语中找到对应形式,全译行为通常不改变原文的宏观结构,只是调整微观形式,即话语的表层结构,包括遣词造句、安排段落、运用修辞等。同一内容在不同条件下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而同一形式在不同条件下可以体现不同内容,但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形式有时不单纯表现内容,而是对内容的表达或再现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文学作品如诗歌的全译,如果过分偏离原文形式,很难保证完全忠实原文内容;如果片面拘泥于原文形式,必然导致译文词不达意、不可接受,最终也会损害原文内容。我们不能强求所有译文的形式时时处处与原文完全一致,而应根据具体情况,结合原文内容和译语表达规范找到相应的语言手段和表现手法。形似归根结底是为了服务和服从内容传递这一基础,既非刻意也非任意为之,否则这样的形似跟原文只是貌合神离。

例2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The golden willows by the riverside/
Are young brides in the setting sun; / Their
reflections on the shimmering waves / Always
linger in the depth of my heart.

宏观结构上,例2中的原文和译文都是四行诗歌。微观结构上,原文和译文都是两行组成一句的主谓结构,译文保留原文的比喻(金柳是新娘)和拟人(艳影在荡漾)。译文在保持与原文内容一致的基础上,尽可能追求形似,但并非亦步亦趋,而是根据英语的表达规范,后移定语“河畔的”、“夕阳中的”、“波光里的”和状语“在我的心头”。当然,由于汉英不同的文字类型,原诗中由6、7、6、7个汉字构成的节奏和“娘”、“漾”形成的押韵没有也无法体现在英译中,这表明全译只能追求“极似”,而非“等值”或“等效”。

2. 意似。意似,指译文与原文信息内容的相像

或相符,是“似”的内涵和基础,因为全译所追求的译文与原文的信息量极似,首要任务是最大限度地传递原文内容,帮助译语读者了解异域文化。

内容是指文本所包含的一切内在要素的总和,是文本反映的客观现实以及人们对客观现实所作的认识、感受、评价和态度,包括题材、主题、人物、事件等客观要素及人物心理、受众反应等主观要素。原文内容在语际交流中不可避免地出现遗失,即“译必失”,译文内容相对于原文,或过之,或不及,都是无限接近,是信息量的极似而非等同。译者通过转移原文内容,帮助译语受众了解域外文化信息,有时实现意似即可实现跨文化交际。为此,译者除了斟字酌句之外,还需借助上下文和共享知识,采用恰当的译文形式,否则可能导致言不尽意、意非所言。

例3 It was important to dispel the
myth that AIDS was a gay disease.

译文I: 一定要消除艾滋病是同性恋人的疾病这种错误认识。

译文II: 一定要消除艾滋病只发生在同性恋人身上这种错误认识。

译文III: 一定要消除艾滋病是由同性恋引发的疾病这一错误认识。

例3译文I将原文中的 a gay disease 简单译为“同性恋人的疾病”,似乎做到了形似,但原意在传递过程中损失较多,容易让汉语读者产生歧义:艾滋病是只发生在同性恋人身上的一种疾病,还是由同性恋行为引起?译者只有借助上下文才能进行精准理解和恰当表达,如译文II和III,否则可能导致形“似”而意“非”的硬译或伪译。

3. 风格似。风格似,指译文与原文风格的相像,是似的最高层次和理想追求,因为全译追求“去痕存味”,其中的“味”即风味、风格,既涵盖信息内容,又外化为信息形式,既要求准确传递原文的语义信息,又要求完整再现其语用信息。

“风格”一词源于希腊文 $\sigma\tau\alpha\iota$,本义为长度大于宽度的一个固定的直线体,引申为“木堆”、“石柱”、“雕刻刀”等,进一步演化为“书体、文体”之意,英语、法语的 style 和德语的 stil 皆由此而来。汉语“风格”一词最早出现在晋代,特指人的作风、风度、品格,《文心雕龙》移指文章的风范格局,唐代用于品评绘画艺术。近代以来,该词广泛用于文学、艺术、美学、评论等领域,除了表示人的气度、作风之外,还泛指文艺作品表现出来的主要思想特点和艺术特点,可分为时代风格、民族风格、流派风格、个人

风格等四种主要类型。

风格的形成必须具备一些条件:主观上,创作者由于生活阅历、思想观念、艺术素养、情感态度、人品学识、审美情操的不同,会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区别于他人的相对稳定和显著的创作个性;客观上,创作个性的形成必然受到创作者所处的时代、民族、社会、阶级等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受到所选择的题材、体裁、形象及语言、手法等外在因素的制约。文艺风格是作品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因人、因事、因时而异,作为二度创作的翻译风格亦是如此。由于“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8],无论译者采取归化或是异化的手法,译文在文体或风格方面都会存在“讹”,有所遗失或遭受损伤。信、达、雅中的信有一个幅度,包括意义与功用、见次频率、必具范畴、体裁、音调、场合等方面的幅度^[9],都涉及译文的风格问题,风格的可译性也有一个幅度,百分之百地再现原文风格只能是一种理想追求。一般而言,文学全译对风格似的要求更高,尽可能做到在意似基础上的形似,非文学全译重在意似,形似有时是可遇不可求。既然风格是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再现原文的风格就必须先求意似然后求形似,而内容必须通过形式加以外化,因此,风格似的核心是意似,主要手段是形似,体现在微观语言结构上的“似”。

例4 有钱能使鬼推磨。

译文 I: With money you can make the devil turn the millstone.

译文 II: Money can make the mare go.

例4的译文I为典型直译,做到跟原文形意兼似,是可接受的译文。但谚语翻译不仅仅重在传意,还需再现表达效果,在意象选择、修辞运用、句式安排等方面尽可能跟原文相符。译文II直接套用英语谚语,将汉语意象“鬼推磨”改换为英美读者熟悉的意象 the mare go,符合他们的接受心理,也遵循语言的经济性原则:6个单词的简洁译文,既朗朗上口,又跟原文异曲同工,实现了风格似。

三、全译求化的原则

全译求化的原则是全译实践遵循的标准和全译批评依据的尺度,体现全译行为的本质属性,归根结底取决于全译的定义。既然全译是人和/或机器用乙语转化甲语文化信息以求信息量极似的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通过在乙语中保留或改换甲语的形式

来转移其内容、再现其价值,体现“去痕存味”的求化要求,就必然反映求化的内在规律。全译以小句为中枢单位,而小句集语表形式、语里意义和语用价值于一身,三者构成了全译三个阶段的周转要素^[10]¹⁴⁶,全译行为中的“一意多言”式矛盾也体现在这三者之间,因此必须遵循语用价值优先、语里意义次之、语表形式第三的三个准则^[11],分别反映风格似、意似、形似三个结构上的内在规律,体现在译味、译意、译字三个层面上的艺术追求。就重要性或追求层次而言,风格似>意似>形似(“>”表示大于)。意似是求真,是“似”的基础和内涵,是译文必须追求的基本和首要层次;形似是造美,是对意似的补充和外化,是译文可遇不可求的次要层次;风格似是求真和造美的结晶,基于意似寓于形似,居于统帅地位。相应地,全译求化的三个准则中,语值(语用价值)优先,表明风格似属于译文努力追求的完美和理想层次,以意似(语里意义的相似)为基础和前提,以形似(语表形式的相似)为必要非充分条件,制约语义传达的方式和效果,间接(通过语义)或直接决定语表形式的选择。因此,求化原则构成以语用价值为关键和核心、语里意义为基础和前提、语表形式为结果和外化的三位一体,即理解原语时,“由表及里求语义”、“语值离形求风格”;语际转化时,“语里转换求意似”、“语值转换风格似”;表达译语时,“由里及表句成型”、“语值驱附句成活”^[10]¹⁵⁰⁻¹⁸⁶。

1. 语用价值优先准则。语用价值,指文本的各种语言表达形式体现或蕴含的价值,可简称为“语值”或“值”,包括因不同文化背景、上下文语境和修辞手段而产生的相应价值,分别称为文化值、语境值和修辞值。语用价值优先准则,是指译者必须首先考虑如何实现译文跟原文在语用价值方面的极度接近,尽可能追求在意似和形似高度统一基础上的风格似。全译的首要目的是通过渐化原文、化生译文,帮助译文受众理解原文作者表达的内容,确保跨语言、跨文化交流的成功,终极目的是通过缔结一场文字、文学、文化姻缘,从而实现语言壁垒的凿通和人类文化的互文,因此,再现原文的语用价值成为译者必须遵循的第一准则。由于文化差异、时空变迁、修辞手段等影响,原文的语用价值可能在译语中发生细微变化,呈现与之不同的文化值、语境值或修辞值,译者必须尽可能得原语文化之精华,融入译语文化,根据具体语境选择恰当、规范的译语表达形式。

例5 谭嗣同捐躯赴国难,却依旧视

死如归,得到人们尊敬。

译文 I: Tan Sitong sacrificed his life for the national crisis, but he was still fearless of death, so he won his fellow – countrymen’s respect.

译文 II: Tan Sitong (1865 – 1898), a well – known Chinese politician, thinker and reformis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1636 – 1911) and one of the “Six Gentlemen of the Hundred Day’s Reform”, sacrificed his life for the then endangered country, and his undaunted spirit won respect his fellow – countrymen’s respect.

原文中“谭嗣同”虽为人名,实际上是一个文化负载词,单纯音译不能帮助英美读者准确完整地理解这一历史人物。因此,译文必须适当增加注释,跟原文的语表形式虽有一定出入,但添形未加义,更好地传达该词的信息内容及其蕴含的文化值: 晚清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戊戌六君子”之一。“赴国难”和“视死如归”都表现出谭嗣同的勇敢和无畏,连词“却”在深层语义上并非表达转折而是顺承,译文 I 未能完整再现其特定的语境值。另外,“视死如归”也不能简单理解其字面意思,译为 consider death as going home, 而应传达其内涵意义: fearless of death、undaunted spirit。鉴于此,译文 II 完整地再现了原文几个词表达的特定含义和价值,跟作者借古喻今、提醒当代青年热爱生活的写作意图不谋而合,很好地遵循了语用价值优先准则。

例 6 A: Are you OK?

B: I’m sorry, but I wonder whether I could find a place for my son at your school.

译文 I: 甲: 你还好吗?

乙: 很抱歉,我不知能否为我儿子申请在贵校上学?

译文 II: 甲: 你有什么事吗?

乙: 抱歉打扰,我不知能否为我儿子申请在贵校上学?

例 6 的语境是: 英国某小学门口,一位教师 A 见到前来为儿子报名的一位中国父亲 B,脱口而出“Are you OK?”。A 并不是简单跟 B 打招呼,而是在看到 B 略显忧虑的表情、犹豫是否该走进校门时,表示愿意为他提供帮助。因此,译者应结合这一特定语境,透过 Are you OK 的语表形式理解其语里意义,尤其是从 B 的疑虑反推 A 的交际意图: Do you

need any help? 跟译文 I 相比,译文 II 更好地再现了原文特定的语境值。

2. 语里意义次之准则。语里意义,是指文本的语言形式表达的信息内容,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或客观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可简称为“语里”或“里”。文本的表达形式包括音位/字位、词素、词、短语、小句、复句、句群、段落、章/节、篇/书等语言单位^[12],其语里意义分别对应为音位/字位义、语素义、词义、短语义、小句义、复句义、句群义、段落义、章/节义、篇/书义。语里意义次之准则,是指译者在完整再现原文语用价值的同时,必须考虑如何准确传达其语里意义,确保译文追求意似。原文语用价值在译语中的再现,通常以准确传递语义内容为前提和基础,非文学全译中更加突出,其文体风格不甚明显,实现意似即可追求风格似,因此语里意义是译者遵循的第二准则。单语内部的形义之间并非总是一一对应,语际转换中可能存在矛盾或冲突,为了解决双语之间的形义矛盾,追求译文与原文的意似,译者有时必须变换原文形式,否则造成词不达意、误解作者、误导读者等情况。

例 7 She always has to stick her nose into matters that do not concern her.

译文 I: 她总是要把鼻子触到跟自己无关的事情。

译文 II: 她总是要插手跟自己无关的事情。

例 7 中 stick her nose 为固定短语,属于比喻用法,意为“多管闲事; 插手与自己无关的事”(become involved in something that does not concern you, in a way that annoys people)。汉语中,鼻子通常只是单纯指嗅觉器官(除“鼻祖”比喻为“创始人”之外),“多管闲事”的固定表达则是“插手”而非“插鼻子”或“用鼻子触摸”。译文 I 追求机械的形似,令汉语读者不知所云,属于劣译; 译文 II 将英语意象 nose 改为汉语意象“手”,确保跟原文同样的语里意义,属于佳译。

3. 语表形式第三准则。语表形式,是指任何文本都具备的外在表达形式,包括拼音和书写,可简称为“语表”或“表”。在全译活动的语表形式 – 语里意义 – 语用价值即“表 – 里 – 值”三角中,译文语表的选择取决于原文语义的传递,归根结底由值决定,有时处于最次要地位,因而成为译者遵循的第三准则。每种语言都有相应的语表形式,表意文字和拼音文字之间在语表上的对应关系相对较少,互译

时若能追求风格似、意似和形似,自然是三全齐美,否则只能退而求其次,为了保值、存意而变形、借形乃至舍形,真正做到“去痕存味”。

例8 冯家祥恭恭敬敬向林苑之一揖到底,一边说“请恕我迟到,小生这厢有礼了。”

译文 I: He bowed to her deeply and respectfully, saying, “I’m awfully sorry I’m late. Please accept my sincere apology.”

译文 II: He bowed deeply to her with an expression of great respect and said in the manner of an actor in opera: “Madam, that I should late arrive, your pardon now I humbly crave.”

原文引自小说《上海的早晨》,冯家祥与徐义德的姨太太林苑之关系暧昧,他这次为了博得红颜一笑,故意在林苑之面前作忸怩之态,用“恕我”、“小生”和“这厢有礼”等古文戏腔加以自嘲。译文 I 几乎照搬原文语表,似乎也能传达其语义,但没有形象刻画冯家祥的矫揉造作之态,也未能再现作者嘲讽和挖苦的意图,属于形相似而意不全、值不保的欠佳译文。译文 II 为了再现原文其特定的语境值,准确

传达“一揖到底”的具体内含,增添了语表形式 in the manner of an actor in opera,还增加 Madam 表现冯家祥对林苑之的阿谀和奉承之情,借助古文戏腔、运用倒桩结构刻画他的矫揉造作和取宠之态。译文 II 增添词语和变换语序,虽然没有跟原文形似,但较好地传达了原文作者隐含的意义和蕴含的意图,更加贴近原文的风格,更容易为英美读者理解和接受,堪称入化的佳译。

四、结论

由全译的定义和本质可知,全译活动必须反映求化的内在规律即全译极似律,包括意似、形似和风格似,分别体现译文与原文在语里意义、语表形式和语用价值三个角度上的相似。三“似”中,风格似居于统帅地位,由意似这一基础和前提决定,通过形似这一外化手段加以体现,包括两个实现途径:一是从语用价值驱动语里意义,再由语里意义决定语表形式,即值→里→表。二是语里意义决定语表形式,再附之以语用价值,即里→表→值。因此,全译求化过程中,译者应该优先考虑完整再现语用价值,其次重视准确传达语里意义,同时兼顾语表形式,形成以语用价值为关键和核心、语里意义为基础和前提、语表形式为结果和外化的三位一体原则。

参考文献:

- [1] 黄忠廉. 翻译新解——兼答周领顺先生论“变译”[J]. 外语研究, 2012(1).
- [2] 余承法. 全译求化机制论[J].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3.
- [3] 余承法, 黄忠廉. 化——全译转换的精髓[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2006(2).
- [4] 钱锺书. 写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113.
- [5] 钱锺书. 谈艺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373.
- [6] 钱锺书. 管锥编(1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672.
- [7] 黄忠廉, 等. 翻译方法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0-12.
- [8] 钱锺书. 七缀集[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78.
- [9] 黄忠廉. 小句中全译说[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50-186.
- [10] 赵元任. 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M] // 罗新璋. 翻译论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726-741.
- [11] 黄忠廉, 方梦之, 李亚舒, 等. 应用翻译学[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3: 55-57.
- [12] 余承法. 等化机制的类型、理据和运用条件[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2(1).

(责任编辑 程 萃)

从全译之“化”看变译之“变”^{*}

余承法

(中南民族大学, 武汉 430074)

提 要: 基于保健品广告的英文全译和变译对比, 将哲学中的“变”、“化”范畴纳入译学领域, 从规律、目的、矛盾、方法、单位、价值等方面, 由全译之“化”反观变译之“变”, 以加深对变译本质的认识。

关键词: 全译; 化; 变译; 变; 本质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4)01-0099-5

Elaborating “Accommodation” as the Essence of Translation Var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limation” as the Essence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Yu Cheng-fa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China)

Applying a pair of philosophical categori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elaborates “accommodation” as the essence of translation var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limation” as the essence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in terms of translation rule, purpose, contradiction, method, unit and value based upon contrasting two different English versions of a Chinese-health-product advertisement so as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variation.

Key words: complete translation; sublimation; translation variation; accommodation; essence

1 引言

全译与变译作为新立的翻译范畴, 经历了概念的厘定、对偶范畴的确立、方法论的探究、翻译变化观的形成 4 个阶段。译学界对变译研究, 从最初排斥到随后质疑, 从逐渐接受到广泛探讨再到冷静反思, 经历了从感性到理性, 从理性到感性, 再从感性回归到理性的认识过程。周领顺 (2012) 考察变译的名与实, 对翻译、全译和变译的定义及相互关系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 也有值得商榷之处。这既是对变译研究的最好推进, 也是引发笔者思考的契机。他认为黄忠廉等关于全译、变译的定义有待完善, 但总体上不影响我们认识其本质属性, 今暂且沿用。“全译, 指人或机器将甲语文化信息转化为乙语以求风格极似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 “变译, 指人或机器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要, 采用变通手段摄取

原作有关内容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黄忠廉等 2009: 3)。转换是全译的核心, 转移原文内容, 更换原文形式, 化解语际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 以化求得译文与原文最大限度的“似”, “化”是全译转换的精髓; 摄取是变译的核心, 改变原文的内容、形式乃至风格, 以期满足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 “变”是摄取的精髓。基于此, 本文以广告的全译和变译为例(均为笔者试译), 以全译之“化”为背景加深认识变译之“变”, 以期廓清周领顺 (2012) 认为变译研究存在的“一些模糊不清的认识”。

国氏全营养素

科学减肥新概念

(1) “国氏全营养素”把调节脂肪代谢, 补充全面营养的独到理论应用于控制体重, 以便达到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化境研究”(13FYY008)、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全译求化机制研究”(2012G458)和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全译求化系统研究”(ZSY10016)的阶段性成果。

拥有苗条身材,保持充沛精力的目的。(2) 相信曾为肥胖困扰烦恼的你,因为服用了全新口味的“国氏全营养素”,不久也能体态轻盈,充满活力。

(3) “国氏全营养素”是著名营养学家国敏元教授从中国传统调养理论出发,针对多数肥胖者的基本成因,以调节体内营养平衡,改变脂肪代谢为目的,精选配置的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的全天然、全营养保健品,充分调

动体内多种酶的活性,迅速分解体内多余脂肪,使体态恢复健康苗条。(4) 国氏理论以其科学性、实效性为减肥领域开创了一条新路,“国氏全营养素”被中国女子体操队指定为控制体重营养品。(5) 减肥的同时,轻松愉快,精力充沛,体重正常之后,不会轻易反弹。(6) 所以,更多的体操运动员,都钟情于“国氏全营养素”。(359 字)

Guo's All-nutrient Slimming Extract	Guo's All-nutrient Slimming Extract
A New, Scientific Concept of Weight Control	Guo's All-nutrient Slimming Extract
(1) Guo's All-nutrient Slimming Extract applies the original theory of regulating fat metabolism and supplementing all nutrients to the control of body weight so as to help maintain a slim figure and plenty of vitality. (2) It is believed that you, once plagued by obesity, will soon have a supple and vigorous body by taking this brand new weight-control product.	(1) Thinking about losing weight? (2) Dreaming of keeping slim and fit? (3) All you need is Guo's All-nutrient Slimming Extract.
(3) Guo's is a completely natural, all-nutrient product rich in various nutrients such as proteins, vitamins, amino acids and trace elements, manufactured by Prof. Guo Minyuan, the famous nutritionist, who, basing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Recuperation Theory and the major causes of most obesity, aims at regulating the nutrient balance of human body and altering fatty metabolism. (4) The product can help regain a slim and healthy figure by effectively regulating polyezyme activity inside the body and quickly decomposing the excess fat. (5) Guo's theory has initiated a new way for weight loss with its scientificity and effectiveness, so Guo's All-nutrient Slimming Extract has been selected as the authorized nutritious weight-control product for the Chinese Women's Gymnastic Team. (6) While losing weight, you may feel relaxed, pleasant and energetic, and furthermore, you will not regain lost weight. (7) Therefore, more gymnasts are fond of taking Guo's All-nutrient Slimming Extract. (全译,213 words)	(4) Guo's is a 100% natural product rich in various well-balanced nutrients, such as proteins, vitamins, amino acids and trace elements. (5) Want to lose weight without losing vitality? (6) Take Guo's. (7) It regulates your fat metabolism and decomposes the surplus fat. (8) No sufferings. (9) No side-effects. (10) No weight regains. (11) Guo's has been selected as the authorized nutritious weight-control product for the Chinese Women's Gymnastics Team. (12) It is a new, scientific concept of keeping fit and slim. (13) Why hesitate? (14) Taking is believing! (变译,99 words)

2 “化”与“变”的区分

2.1 “化”遵循量变规律,“变”遵循质变规律

化、变作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中较早出现的范畴,经历了从单一概念向对偶范畴演变的历史进程,其内涵逐渐与量变、质变的内涵相接近,与译学范畴中全译、变译的实质相吻合,反映了全译的量变规律和变译的质变规律。

《荀子·正名》指出“化”即“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张载认为“化,言其渐”,朱熹提出的“渐化”概念即量变,是指事物数量的变化,表现为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动,是一种微小的、不显著的变化,是事物在度的范围内的延续和渐进(张立文 1988: 424)。钱钟书(2002: 77)曾对“化”作过精辟论述“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

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即去痕存味。“去痕”是指译者不知不觉地化解双语内容和形式之间的矛盾,渐渐消磨其间语言形式的差异,使原作发生不显著、无痕迹的渐化“存味”是指译作在相似度的范围内保留原作内容,尽量追求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确保译作成为原作的“投胎转世”。在这一量变过程中,“事物数量的增减”表现为原作中语素、词、短语等语言单位的增减,如例中全译减去原文句(1)中的“达到”和“目的”,增加原文句(5)中隐含的代词 you 和关联词 and furthermore;“场所的变动”表现为原作中语言单位在译作中的移位、切分、合并和重组等情况,如例中全译将原文句(1)中“独到理论”的前置定语进行后移等。这些微调只涉及对原文形式的改变,不影响其意义的准确传达,没有

超过原作的度的范围,是一种形变而实不异的渐化结果。

“变”是指一事物转化为性质不同的另一事物,张载指出“变,言其著”,朱熹提出的“顿变”概念即质变,是区别于他物的、事物内部固有规定性的变化,表现为根本性的、显著的突变(张立文 1988:424)。译作一旦有意不忠实于原作内容,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成为原作在渐化过程中的截取,正所谓“化而裁之谓之变”(《周易·系辞上传》)。正如“度”是体现事物物质和量对立统一的限度,相似度是区分全译和变译的临界点,在临界点的左端是全译,右端是变译,二者不仅存在表面上的差异,体现在信息的“量”上,更存在本质差异,体现在信息的“质”上,因此从全译到变译形成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发生质变的内容虽然“摆脱了原文的限制”,但还是以原作为参照,并没有置原文于不顾。无论“相似度”突破到什么程度,临界点移到什么位置,它仍然是从全译到变译所形成的翻译连续统上的点,仍然属于“译”而不是“非译”的范围。这个连续统应视为一条线段,有起点和终点,即周领顺(2012)认为的“从‘译’到‘创’的过程”或区间,全译和变译是被临界点分开的更短的两条线段,但比喻为“圆心”和“圆周”似有不妥(该比喻跟周文提到的“译文连续统”是自相矛盾)。例中的变译之“变”主要表现在:(1)内容上大变:译者增添了英语消费者关注的信息如 without any sufferings 和 side-effects 等,删减了他们不感兴趣的内容,如“著名营养学家国敏元教授”等,以及一些冗余信息如“国氏全营营养素”等,改换了原文的相关信息如句 6,代之以 Why hesitate 和 Taking is believing,因而译作跟原作和而不同;(2)结构上大变:原文的 2 个段落变成 6 个,复句变成单句或非完整句,长句变为短句,这些结构的调整也导致风格的改变,书面体被口语体代替;(3)数量上大变:通过译者采取摘取、压缩、合并或添写等变通手段,变译在数量上明显少于原文和全译(原文 359 字,全译 213 词,变译 99 词),信息从原作到译作由量的改变引发质的飞跃。

2.2 “化”旨在忠实原文,“变”旨在服务读者

根据翻译目的论,“翻译是为实现特定目的而进行的一种复杂活动”(Nord 2001:13),全译和变译的分野最终是为了实现不同的翻译目的。全译求“化”是为了忠实原文,力求保存原作的信息内容和宏观形式,化解微观形式的差异。当然,求“化”也是为了满足译文读者的需求,但毕竟这是

退而求其次的目的。例中全译在内容上完整地再现了原文中的产品信息,包括名称、性质、产家、原理、功效等,在篇章布局和段落安排上跟原文几乎如出一辙,只是在局部做了微调,如将原文句(3)切分为译文句(3)、(4),个别句子的语序稍作改变。

变译求“变”是为了满足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简称“三特”)。首先,特定读者是变译的原动力。近年来,“读者中心论”在全译中盛行,在变译中得到极度彰显。例中变译译者考虑到中英消费者不同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突出“您”(You)的存在,强化广告的情感传递功能,激发潜在顾客的购买欲望。其次,特定条件是变译的外在因素。原语文化信息要在译语中生存下去,就必须适应新环境,Verschuieren(2000)的“语言顺应论”和胡庚申(2004)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为变译提供了理据。译者可根据不同的传播媒介确定译文的形式和风格,如例中变译属于口语体,用于广播、电视、网络的音频或视频资料,译者也可创造用作包装说明书的书面变译。再次,特殊需求是变译的试金石。变译是否为读者接受,最终必须接受现实需求的检验,读者的分层和多元决定了对译文需求的动态多变,译者必须将原作视作一种信息来源,汲取并改造合理的、满足读者特殊需求的成分,并根据读者的需求反应重新审视和修改译作。例中变译保留了英语消费者关注的主要信息,删除了他们不感兴趣或难以理解的次要信息,并增加了相关新信息,以满足他们的身心健康需求。

2.3 “化”解决言意矛盾,“变”解决供需矛盾

“在不同的翻译观念的支配下,人们对翻译矛盾的认识和处理方式也会有异”(许钧 2003:260)。根据全译观,“化”所要解决的是同一语义内容与不同语言中表达形式之间的矛盾,即一意多言式矛盾。“一意”是指原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是确定不变的,译者不能有丝毫的误读、误译,“多言”是指同一思想内容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同一译者用同一译语表达时也可能采取不同的言语形式。例中的全译译者只聚焦于英译广告的词语选择、单位转换、语序调整、句子分合等微观形式的变更,而没有调整原文的宏观结构。因此,周领顺(2012)中“全译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看,但主要是宏观上的”这一观点难以令人信服。

根据变译观,“变”所要解决的是原作与译语中特定情况下特殊读者的特殊需求之间的矛盾,是一本多需(译)式矛盾。“一本”即是原作,“多

需”即不同读者的不同需求,由此产生的“多译”在内容、形式甚至风格上既跟原文相异,彼此之间也存在较大不同。这种供需矛盾既包括共时矛盾(原作与同时期不同译语读者需求之间的矛盾)和历时矛盾(原作与不同时期不同译语读者需求之间的矛盾),也包括同体矛盾(原作与译语读者需求在同一载体即同一语篇之间的矛盾)和异体矛盾(原作与译语读者需求在不同载体即不同语篇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不能像全译那样简单地改变微观的语言形式,而要从宏观上进行大改大调,还需要处理文化背景的差异、考虑译文的预期功能、汲取原语内容并由译语内容决定译语形式。“变”需要解决的是宏观的文化层面的大矛盾,尽管也包含“化”需要解决的微观的语言层面的小矛盾,但微观包含于宏观,小矛盾寓于大矛盾之中,因此变译也不可能并重宏观两个层面。例中变译译者正是抓住了大矛盾,坚持委屈原文、求全读者的原则,汲取了英语消费者关注的信息重心,大幅调整了原文的篇章布局,重组了其句子结构,使得译文的预期功能更突出,效果更优化,传播速度更快,从而更有效地解决了供需矛盾。

2.4 求“化”7 法以小句为中枢单位,求“变”

12 法以句群为中枢单位

为解决翻译矛盾,译者必须有效运用各种策略和方法。全译力求忠实地传达原作内容,兼顾原作形式,包括直译和意译两种求“化”策略,衍生对译、增译、减译、转译、换译、分译和合译 7 种求“化”方法,在例中都有运用:标题和句(6)(原文序号,下同)为对译;句(4)、(5)为增译;句(1)、(2)、(3)为减译;口号、句(1)、(2)、(3)、(4)为转译;句(3)为转译和分译;句(5)为合译。全译求“化”的基本单位包括词、短语、小句、复句、句群,小句为中枢单位,这是因为:词的翻译受控于小句,短语翻译从属于句,复句翻译依赖于小句,句群翻译寄托于小句(黄忠廉 2008: 22-27),而且译语小句都可与原语的词、短语、小句、复句和句群互换。原文句(2)中的“相信”一词转换为译文小句 *it is believed* 等,句(6)与译文句(7)直接对应转换,复句(1)浓缩为译文小句,复句(3)分化为译文句群,复句(4)、(5)转换成译文并列句,等等,都是以小句为轴心展开,这表明小句在全译转换中最自由、最灵活,负载的功能也最多。

“变”要解决供需矛盾,运用增、减、编、述、缩、并、改、仿 8 种变通策略,可构成 12 种求“变”方法: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译写、改译、阐译、参译、仿作。“变通”不应借辞书

释义“作非原则性的变动”,也不应与全译之意译混淆,而应有其特定内涵,即“变通是为了满足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而对原作较大的灵活变动的行为”(黄忠廉等 2009: 98)。“变”之增、减不同于“化”之增、减:前者同时增减内容和形式,引起质变;后者只增减形式不增减内容,只引起量变。如上所述,解决供需矛盾也包括解决言意矛盾,所有“变”法可能需要用到“化”法,反之并不然。就翻译方法而言,全译、变译之间的关系是“变”中有“全”,“全”中无“变”,并非有人(徐朝友 2006;周领顺 2012)主张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虽在临界点上存在模糊地带,但总体上区分明显。例中变译主要用了缩译和编译,也用了其他的变、化方法:摘译,如译文句(3)摘取原文的词(也对译保健品名称),句(4)、(7)、(11)分别摘取原文句(3)、(4)的部分内容(也用了转译),句(12)摘取原文口号,兼用译评;译评,如句(8)至(10);译写,如句(13);改译,如句(1)、(2)、(5)、(6);仿作,如句(3)、(14)分别仿英语广告词 *All you need is Bayer Aspirin* 和谚语 *Seeing is believing* 而译。

变译求“变”的语言单位包括词、短语、小句、复句、句群、段落、篇/章、书等,最小的求“变”单位是词,如阐释某个词的含义,与通常认为的求“化”单位不同,最大的求“变”单位是书,如以故事梗概缩译一部畅销小说,与求“化”的最大单位不同。句群是求“变”的中枢单位,因为它所包含的变译单位较多,在所有单位中处于中心联络位置,并对其它变译单位具有控制约束作用。例中原文由两个句群或段落构成,产品的性质、产家、原理、成分、功能等融于第二句群,符合汉语行文习惯。变译将语篇调整为 6 个句群或段落,原文第一个句群分解为译文的一个句群和一个小句,原文第二个句群分解为译文的 3 个句群,并增加了一个新句群。原文句群变一为多,变长为短,是为了遵循英语广告“一个段落(句群),一个主题”的行文要求,使得变译广告层次清晰、主题鲜明。

2.5 “化”重在输入原作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变”重在凸显原作的使用价值

原作的价值是作者凝结在作品创作中的无差别的劳动,其使用价值是指作品能够满足读者阅读和使用的属性。译作的使用价值是指译作能够满足译语读者阅读和使用的属性。

“化”旨在忠实传递原作内容,求得译作与原作的极似,全译文的最终社会效应是输入原作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输入是原原本本的,不折不扣

的,能够帮助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满足相同的需求。例中全译尽力再现原文内容,力保结构不受损益。

“变”旨在满足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变译文的社会效应就是摄取原作的价值,凸显其使用价值。摄取意味着选择、消化、吸收和改易,使原作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文读者的接受意识和审美需求,而成为一种变量,其因为“读者对译作的评价是如何地不以专业批评的意志为转移而直接影响译作实现其价值”(杨晓荣 2005: 46)。凡有助于实现“三特”目标,译者就容易作出选择和变通,就容易凸显原作的使用价值;反之,即使原作价值连城,若与目标实现无关,也会被认为毫无“价值”。例中的广告原文侧重于产品介绍和宣传,其潜在的使用价值蕴涵于吸引顾客的眼球之中,而变译基于消费者而不是企业本身,侧重于顾客的精神需要而非单纯的生理需要(即 keep fit and slim,对 fit 的追求优先于 slim),其使用价值在冲击消费者的耳膜中得以凸显,在他们强烈的共鸣中得到深度开发。

3 结束语

由全译之“化”反观变译之“变”,加深了对变译、全译和翻译本质的认识:分而观之,“变”是变译的本质属性,是译者运用增、减、编、述、缩、并、改、仿 8 种策略变通原作内容和形式以满足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并凸显其使用价值的行为,“化”是全译的本质属性,是译者采用对译、增译、减译、转译、换译、分译、合译 7 种方法化解

语际内容与形式的矛盾,消除译痕、保存风味、再现原作价值的行为;合而观之,变化是翻译的本质属性。

参考文献

- 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 黄忠廉. 小句中全译说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黄忠廉. 翻译“变”“化”观 [J]. 外语学刊, 2010 (6).
- 黄忠廉等. 翻译方法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钱钟书. 七缀集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 徐朝友. 《变译理论》的两大问题——与黄忠廉文商榷 [J]. 外语研究, 2006 (4).
- 许钧. 翻译论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杨晓荣. 翻译批评导论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 张立文. 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 周领顺. “变译”之名与实——译者行为研究(其九) [J]. 外语研究, 2012 (1).
- Nord, C.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收稿日期: 2012-07-21

【责任编辑 谢群】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版本考述

万光荣 李泽旭

一、引言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自 1964 年发表以来,因其中著名的“化境”翻译思想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学术影响,被数次解读和引用。该文虽以《林纾的翻译》为题,但论述的不仅仅是翻译问题,还包括训诂学、考据学、文章学、修辞学、文学、史学等学科领域的一些问题,如 翻译与古文(创作)、修辞的关系,文学研究与文学翻译、古文与文言的区别,译者的身份和地位,史实挖掘与考据,人品、学品与学风的关系等,体现钱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即 古今、中外、文字、文学、文化和学科的打通。这是钱先生经营最善、考据最详、修订最勤的一篇力作,在中国大陆出现多个版本,导致学界引用时出现版本不一、提法不同、用新本引旧言、以讹传

讹等乱象。鉴于此,有必要对这些版本进行全面梳理、考辨和比读,便于在出版发行界正本清源,澄清学术界解读该文、诠释钱先生学术思想时出现的种种误区。

二、《林纾的翻译》十个版本考略

《林纾的翻译》发表 50 年来,在中国大陆先后出现 10 个主要版本,既发表于专业性学术期刊,又被出版社收入不同文集,还被编者选入以“钱钟(锺)书”命名的集子(总体情况见下表),惠及读者之多、援引频率之高、社会效应之大、学术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这十个版本都有不同程度的修订,凝聚着作者的心血、编者的汗水和读者的期待,现依次考略如下。

《林纾的翻译》十个版本总体情况一览表

版本	书刊名称	署名	编辑部/出版社	出版年月	页码范围	字数	注释数量	底版及修订处)
一	《文学研究集刊》 第一册	钱钟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繁体版)	1964. 06	1-29	19601	79 个脚注	0
二	《旧文四篇》	钱钟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09	62-95	22357	75 个脚注	一版, 286
三	《林纾的翻译》	钱钟书	商务印书馆	1981. 11	18-52	22551	75 个尾注	二版, 18
四	《翻译通讯》	钱钟书	《翻译通讯》编辑部	1985. 11-12	(11): 2-10 (12): 2-9	25946	71 个脚注	二版, 375
五	《七缀集》	钱钟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12	67-100	25932	70 个脚注	二版, 331 (跟四版 24 处不同)

六	《钱钟书论学文选》	钱钟书著 舒展编	广州花城出版社	1990.01	106-147	26151	70个尾注	五版, 17
七	《七缀集》	钱钟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08	79-117	25985	70个尾注	六版, 104
八	《钱钟书散文》	钱钟书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7.05	269-311	26178	70个脚注	七版, 85
九	《七缀集》	钱钟书	三联书店(繁体版)	2001.01	89-133	25942	70个脚注	七版, 8
十	《七缀集》	钱钟书	三联书店(简体版)	2002.06	77-114	26136	70个脚注	六版, 96

第一版 写于 1963 年 3 月,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 年 6 月出版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1]。当时《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世界文学》等报刊发表了多篇研究林译小说的文章,翻译界掀起了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钱先生从许慎关于翻译的一段训诂出发,揭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分析林译小说中的“媒”或“诱”“讹”“化”,考察林纾对待翻译和古文的态度,考证一些文学史实。第一版问世于学术氛围不太浓厚的特定年代,发表于文学类专业集刊,因而较少受到关注。

第二版: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9 月出版的《旧文四篇》^[2],以第一版为底本,修订内容主要包括:1) 调整注释,新添脚注和夹注,将有些注释融入正文,根据史实更正或补充观点,在文末增加附记,删除个别内容;2) 锤炼语言,修改第一版中不够简洁或精确的表达,订正不合规范的汉字和外文单词;3) 修改标点和格式,如采用简体字、将第一版正文中的阿拉伯数字改为汉字等。适值中国学术界、文化界迎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春天,随着钱先生皇皇巨著《管锥编》在中华书局的出版,以及《围城》的重印出版,“钱学热”在学术界悄然兴起,《林纾的翻译》第二版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被收入多部文集,如刘靖之编《翻译论集》^[3],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4],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5],等等。

第三版 收入商务印书馆 1981 年 11 月出版的《林纾的翻译》^[6]。该文集收录研究林译的四篇论文,《林纾的翻译》是第二篇,被选为文集书名,并标明“钱钟书等著”。第三版以第二版为底本,经作者修订 18 处,包括在文中和文后附记增加内容。第三版在翻译界产生很大影响,被罗新璋收入《翻译论集》^[7],他在序言《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

中将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主线概括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从而确立了“化境说”在中国翻译理论中的重要地位^[8]。此后,翻译界人士在论及“化境”时常常转引收入其中的《林纾的翻译》,而作为其源本的第三版少有人问津。第三版的前两段内容还被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编入《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以《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为题^[9],可见其学术影响之高。遗憾的是,《林纾的翻译》被断章取义地当成了一篇纯粹探讨翻译的论文,学者们围绕“化”字大做文章,对其中比“化”谈论更多的“诱”和“讹”视而不见,有人甚至一笔勾销了文中跟翻译相关的其他学术观点,正所谓“不懂钱钟书,是国人的悲哀,同样,不识钱氏译艺谈,也是译界的不幸”^[10]。

第四版 发表于《翻译通讯》(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刊)1985 年第 11、12 期^[11]。编者按:“本文原是作者《旧文四篇》(1979 年)里的一篇……最近我们走访钱钟书先生……向他索取了《林纾的翻译》的新本,又征得同意,在本刊分两期发表。”这里提到的“新本”,即为《林纾的翻译》第四版,以第二版为底本,修订 375 处,主要包括:1) 修改个别重要观点、语言表达、注释格式及其内容、断句和标点、行文排版等;2) 增加例证、史实、注释等;3) 删除文字表述、史实和注释。所有版本中,第四版修订的内容最多、幅度最大,引人注目之处是将“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改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提出“欧化”和“汉化”两种翻译方法,从而引起了译学界旷日持久的争论:“化”究竟是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最高理想,还是最高境界?第四版作为学术论文分期发表于《翻译通讯》,该杂志从 1986 年第 1 期起更名由钱钟书题名的《中国翻译》,因而在翻译界的影响很大。

第五版 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12 月出版的简体字版《七缀集》^[12]。《七缀集》是由全部《旧

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9 月出版)和半部《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 1984 年 3 月出版)的合并,收入其中的第二篇即是《林纾的翻译》第五版,以第二版为底本,跟分期发表于 1985 年 11、12 月的第四版几乎同时问世,有人认为两者是同一版本。经过比读发现,第五版 25932 字,比第四版少 14 字,有 24 处不同,主要包括:1)调整了部分内容,减少了一个尾注,调换了两个尾注的顺序;2)简化了第四版中尚存的繁体字,修改了个别错别字,更正了几处不当表达;3)修订了几处断句和标点。第五版收入经过作者大大修订的论文集,在翻译界、文学界都产生深远影响。

第六版:收入广州花城出版社 1990 年 1 月出版、署名“钱钟书著、舒展选编”的《钱钟书论学文选》第六卷^[13]。第六版是文选第六卷“文论选”之下的第五篇,以第五版为底本,修订 17 处,包括:1)增加某些尾注中的考证文字;2)删节部分外语引文和出处的注释;3)对长引文使用引号、小号楷体,与正文隔行;4)改变繁简字体,将个别阿拉伯数字改为汉字。编者当时宣称《钱钟书论学文选》是钱先生学术著作比较完备的一个选本,将翻译归为“写作篇”之下,收入其中的《林纾的翻译》格外引人注目,经常为文学界、翻译界人士参阅和引用。

第七版: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8 月出版的《七缀集》^[14]。据编辑回忆,钱先生当时向出版社寄去了《七缀集》校改本和花城出版社《钱钟书论学文选》中的《七缀集》修订本,并主张以花城版的文字为准^[15]。第七版以第六版为底本,修改内容包括:1)调整注释,改脚注为尾注,新增、合并尾注;2)修改部分断句和标点;3)繁简字体的变化,既改简为繁,又改繁为简。第七版收进经过钱先生修订的《七缀集》中,在文学界、翻译界的影响很大。

第八版:收入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7 年 5 月出版的《钱钟书散文》^[16]。据文集编者交代,当时钱先生卧病,未能亲自编选和校订,散文集中所有篇目都由杨绛先生审定,其中的人名、地名、书名采用钱先生统一的译法,汉字拼写尊重其本人的习惯,原文篇末注脚统一为脚注。从收录的《〈七缀集〉序》来看,《林纾的翻译》第八版似乎以第五版为底本,但在内容上更接近第七版,修订了 85 处,主要是将尾注改为脚注,注释中涉及年、月、日、册、章、页等的阿拉伯数字改为汉字,还修改了少数标点。

作为谈文论艺的《林纾的翻译》第八版被收入普及性文集《钱钟书散文》,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在学术界尤其是翻译界的影响,如中国知网中以“《钱钟书散文》”为参考文献的 238 篇论文中,大多数论及文学,涉及翻译的只有 36 篇。

第九版:收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 1 月出版的繁体字版《钱钟书集》之《七缀集》^[17]。“《钱钟书集》由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提供文稿和样书,陆谷孙、罗新璋、董衡巽、薛红时和张佩芬诸先生任外文校订。”出版说明中这段文字的落款时间为 1999 年 12 月 1 日,当时钱先生已经作古,修订工作由杨绛先生跟上述人士和出版社编辑合作完成。从该集的“修订本前言”可知,它是以上海古籍出版社《七缀集》(修订本)为底本,因此《林纾的翻译》第九版以第七版为底本,而且这是所有版本中最近接的两个版本:第九版减少了 43 字,修改了 8 处,除繁简字体不同之外,主要是修订了注释中参考文献的版本、卷册和页码以及两处标点符号。

第十版:收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 6 月出版的简体字版《钱钟书集》之《七缀集》^[18]。该书出版后记中提道:“《七缀集》繁体字版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为底本,但删削了《钱钟书论学文选》中《七缀集》的部分修订内容,为了尽量保全钱先生著述的内容,经杨绛先生同意,简体字版恢复了这部分内容,并用楷体字标出。比读《林纾的翻译》第十版与第六、七、八、九版后发现:第十版以第六版为底本,两者在长度、行文、排版、注释等方面几近一致,只是在个别繁简字体、标点符号、汉字与阿拉伯数字之间稍微有所不同。第十版作为最终定版,收入三联书店简体字版《七缀集》,在学界的影响呈后来居上之势,如中国知网中以“《林纾的翻译》三联书店”为参考文献的论文达 188 篇。

三、《林纾的翻译》十个版本带来的启示

《林纾的翻译》十个版本总体上采取先增后删再补,以 1985 年的第四、五版为界:一、二、三版是旧版,特点是注释较多、格式不统一、语言不够精炼;六至十版是新版,特点是观点与时俱进(如对“化”的表述、译作优于原作的认识)、内容进行调

整(如将某些注释融入正文,增加考证文字)、语言表述更加精准(如对有些字词的反复推敲)、行文格式更加符合学术规范和编排要求(调整注释格式和内容)。每个版本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文字、标点或排版问题,新版本往往优于旧版本(或底本),三联书店的第九、十版本无疑是讹错最少、排版最美、体例最好的终定版。这十个版本先后发表于两家学术期刊,由九家出版社出版或再版(更不用说多次印刷了),体现了作者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和编辑甘为人梯的服务意识,给当下学术界、文化界出版发行界和广大读者带来深刻的启迪。

(一) 作者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

“文章不厌百回改,璞玉雕琢可成器!”《林纾的翻译》问世之初便是一块“浑金璞玉”,钱先生几十年来字斟句酌、反复考证、不断修订,将其打造成为一篇经久不衰的旷世力作。从不同版本的修改痕迹,可揣摩他对某些学术观点的一再深思,对语言表达的多次锤炼,甚至连不太起眼的标点符号和数字也再三推敲,体现了他著述的一个鲜明特点,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对自己的著作不断修改,除改正误排的,补充新发现的材料外,也有改正自己发现或别人指出的误引或不恰当引用的。”^[19]此外,他在收入《林纾的翻译》的《旧文四篇》和《七缀集》的历次版本中,认真撰写“卷头语”“附记”“序”“修订本前言”等文字,介绍对书(文)所做的修订,并通过与编辑的多次通信和交流,表达了他对出版社和编辑的谢意和敬意,体现了他的虚怀若谷和从严治学。他曾自嘲自谥为“钱文改公”,他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和严谨负责的学术态度,给“喧哗与骚动”的当下中国学术界、知识界敲响了警钟:求量不重质的著书立说只会产生文字垃圾,过分追求标新立异、一味鼓噪所谓理论创新只会污染原本健康的学术生态;盲目引进的外国理论、生吞活剥的欧化句式、文白夹杂的行文表述只会让编辑敬而远之、读者憎而恨之。目前很多核心期刊都面临一种“两难”矛盾:投稿作者抱怨发表文章太难,编辑部感叹选择优质稿件太难,除了选题不新、内容不实不精之外,文字功底不扎实、文学修养不深厚也是一大原因^[20]。钱钟书的一部《围城》便享誉中外文坛,被译成英、俄、法、德、日、西、韩等多种外国文字,两部巨著《管锥编》《谈艺录》和一部文集《七缀集》足以震撼中外学术界,

继《管锥编》被美国学者 Ronald Egan 节译成 Limited Views: Ideas on Ideas and Letters 之后,《七缀集》最近也被译成 Patchwork: Seve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因此,作为当下的中国学者,当务之急是要树立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要对自己从事的学术研究负责,要对自己完成的论著从内容到形式负责,要对论著的发表期刊或出版社、读者群体、成果应用及其社会影响负责。

(二) 编辑甘为人梯的服务意识

从钱钟书和诸位编辑就《林纾的翻译》《七缀集》的成文、书过程的信件往来可知,作者背后永远有一支服务意识强烈、学术视野开阔、业务知识扎实的编辑队伍,这是学术期刊和出版社发展的核心力量^[21]。首先,编辑必须具有强烈的服务意识和高度的奉献精神。他们服务于作者和读者两类群体,生活在学术追求和市场开拓的夹层之中,必须甘于坐冷板凳、争当无名英雄,这在出版社实行企业改制、部分期刊采取自负盈亏的大环境中更显得难能可贵。担任包括《林纾的翻译》在内的钱钟书著作的几代编辑,无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其次,编辑必须具备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业务知识。为人作嫁衣的编辑,不仅要学会做“裁缝”,还要当“设计师”,还必须介入论著的策划、写作乃至市场推广。从钱钟书在“卷头语”“序”“修订本前言”中充满感激的文字可以看出,魏忠贤、辛广伟、栾贵明、马蓉、施咸荣等编辑不仅在“编”上花了苦工,也在选稿、设计上费了一番心思;从钱钟书不同名称文集的出版说明、编后记、出版后记中可知,花城出版社《随笔》编辑部在“钱钟书研究”成为一个范行为的研究课题时,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普及性选本而承担了一个“宏大工程”——《钱钟书论学文选》,杨绛、钱媛、舒展等诸多学者为参与编辑《钱钟书散文》而费心尽力;三联书店组织精兵强将编辑出版了一套十部《钱钟书集》(繁体字版和简体字版),并邀请陆谷孙、罗新璋、董衡巽、薛鸿时、张佩芬、陆文虎、马蓉等一批“钱学”专家担任编辑,从而确保书集的质量和品位。

结 语

《林纾的翻译》不同版本的考证和修订,体现了钱钟书从严治学的精神和敢于担当的责任意

识,以及几代编辑甘为人梯的服务意识和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钱先生跟出版社和编辑之间的多次友好通信和坦诚交流成为学术界、知识界、出版发行界的一段佳话,为市场经济冲击波和大数据时代中的学术界和出版发行界做出了表率,值得学习和借鉴。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化境研究”(13 FYY 008)和中央高校专项资金项目“语言类型学视域中的惊讶范畴研究”(CSY15001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 (1)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文学研究集刊》1964年第1期。
- (2)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钱钟书著《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2-95页。
- (3)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刘靖之编《翻译论集》,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02-332页。
- (4)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版,第267-295页。
- (5)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薛绶之、张俊才主编《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323页。
- (6)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钱钟书等著《林纾的翻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52页。
- (7)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96-725页。
- (8) 罗新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9页。

(9) 钱钟书:《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见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选编《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125-127页。

(10) 罗新璋:《钱钟书译艺谈》,《中国翻译》,1990年第6期。

(11)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翻译通讯》,1985年第11、12期。

(12)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钱锺书著《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7-100页。

(13)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钱钟书著、舒展选编《钱钟书论学文选》(第六卷),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147页。

(14)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钱钟书著《七缀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9-117页。

(15) 高克勤:《从〈旧文四篇〉到〈七缀集〉》,《东方早报》2010年10月14日。

(16)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钱钟书著《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311页。

(17)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钱钟书著《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9-133页。

(18)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钱钟书著《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7-114页。

(19) 吴泰昌:《我认识的钱钟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20) 张雨晗:《什么样的文章会更受欢迎——编采心得》,《现代出版》,2014年第5期。

(21) 覃江华、刘军平:《我国翻译类学术期刊出版现状分析与展望》,《中国出版》2014年10月上。

(作者单位 中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重庆大学)

(责任编辑 李明彦)

全译繁化机制的内涵、理据与类型

万光荣¹，余承法²

（1. 中南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武汉 430074 /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 语言学系，美国威斯康星州 53706；

2. 中南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武汉 430074 / 威斯康星大学普拉特维尔校区 孔子学院，美国威斯康星州 53818）

摘要：繁化机制是译者为准确传达原文语里意义和完整再现其语用价值，而在译文中增补语表形式时所采取的一系列程序、手段、策略、方法之间相互组合和相互联系的全译行为，其理据是中西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字系统等方面的差异。根据操作的语言单位，繁化机制分为语素繁化、词繁化、短语繁化、小句繁化四种类型，运用频率依次递减，难度依次加大，既可单独操作于某一语言单位，也可逐层操作于不同语言单位，共同推进译文尽善尽美，追求精妙超凡的求化艺术。

关键词：全译；繁化机制；内涵；理据；类型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0823(2015)01-0052-07

1. 引言

繁化作为一种全译求化机制，为化解译文和原文之间的一意多言式矛盾，增加必要的译文语表形式，以期准确传达原文的语里意义、完整再现其语用价值。繁化机制遵循全译求化的三位一体原则（余承法 2014），符合信息冗余规律，将原文不需要或隐含的语表形式以恰当方式在译文中增补出来，确保成功地跨语言、跨文化交际，主要操作于双语的语素、词、短语、小句四个语言单位，分为语素繁化、词繁化、短语繁化、小句繁化四种主要类型，在不同语境中呈现出更加具体的类别。

2. 繁化机制的内涵

按照观察充分、解释充分和描写充分的“三个充分”研究要求，遵循“语际对比—思维转换—文化交流”（语—思—文）大三角和“语表形式—语里意义—语用价值”（表—里—值）小三角的“两个三角”研究思路（黄忠廉等 2009），借鉴钱钟书对“化”的界定，即翻译的最高标准和理想境界（Yu 2006），繁化机制可定义为：译者为准确传达原文的语里意义、完整再现其语用价值，增补原文缺失而译文必须的语表形式时所采取的一系列程序、手段、策略、方法之间相互组合和联系的全译行为。

繁化机制符合语言表达的信息冗余规律，通过

增补译语形式，实现译文文化求真、语里求准、语值求美，体现原语单位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短到长以及原语信息表达从减省到繁复的量变过程。

繁化机制的主要手段是增补，包括两大策略：一是增加原文中无其形但包含其义的语言单位，或增加原文中承前或蒙后省略的语言单位；二是补充原文不言自明的信息内容或原文受众熟悉而译文受众陌生的文化背景信息。

其操作原则是：繁形、不添义、不增值，即原语的语表形式在译语中有所繁复，但语义不添加，语用不增值，增加的语言单位必须是最小限度的，补充的信息及其表达形式必须适可而止，否则会因无端增补使译文信息无限膨胀，导致全译成为变译。

3. 繁化机制的理据

从“语—思—文”大三角考察，繁化机制的理据在于中西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字系统的差异；从“表—里—值”小三角考察，汉英语言文字系统的差异具体表现在运用语言形式、传达语里意义和反映语用价值的差异。

3.1 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

由于中西不同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导致汉英中特定的表达习惯，如习语、俗语、谚语，典故、神话中的罕见人名、地名等，

基金项目：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化境研究”（13FYY008）

作者简介：万光荣（1973—），女，博士，中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语言类型学、英汉对比与翻译；

余承法（1974—），男，博士，中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学、中外语音对比。

都承载着本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对本族读者是众所周知的,译语读者却难以理解。直译势必造成文化信息缺省,让译语读者望词兴叹,译者必须增补必要的背景信息,或随文译出,或加于文后,或辅以注释,才能准确、完整地传达原文词语的文化内涵,以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

3.2 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

汉英互译不仅是语言形式和文化体系的转换,也是深层思维方式的转换。连淑能(2002)总结出中西思维方式的十大差异:伦理型与认知型、整体性与分析性、意向性与对象性、直觉性与逻辑性、意象性与实证性、模糊性与精确性、求同性与求异性、后馈性与超前性、内向性与外向性、归纳型与演绎型。其中大部分影响汉英语言文字的差异。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伦理性特征,往往从自我出发观察和描写世间万物,表现在语言实践中的“人治”倾向,句子多用人称,常常隐含或省略人称主语。西方认知型的思维方式,从自然界说明事物产生、发展、灭亡的原因,导致语言表达中的“法治”倾向,句子常用物称,多用名词充当句子的主语。中国传统思维用模糊方法和工具把握事物的总体特征,有些概念范畴缺乏界定,不太注重逻辑推理过程。

反映在语言表达中,出现一词多义、形散神聚,需要结合上下文语境弄清词语、小句和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相反,精确性是西方近代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概念严密,判断明确,推理严谨,注重思维的形式化、公理化、符号化,语言表达中很少用笼统词语指称不同对象,小句内部各成分之间、小句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一目了然。中西这种模糊性与准确性的思维差异及其在语言中的表现,决定了汉英互译时需要适当增加词语。

3.3 汉英语言文字的差异

由于中西具有不同的文化渊源,形成不同的文字系统(表意文字VS拼音文字)和语言类型(分析型语言VS综合-分析型语言),表现在运用语表形式、传达语里意义和反映语用价值时的巨大差异。

3.3.1 汉英在运用语表形式上的差异

汉民族形象性、整体性、和谐对称的思维方式,使得汉字注重形象、直观、对称,大多可以见形知义;英美民族抽象性、个体性、分析性的思维方式,使得英语单词抽象、综合,一般不能听音或见形知义。

在词类运用上,汉英都有各自独特的词类,如

汉语的量词、助词,英语的冠词等。汉英相同词类的使用频率不同:表动作时,汉语惯用动词,英语可用名词、形容词或介词;指称人物时,汉语多用名词,英语惯用代词;连词成句时,汉语少用介词或连词,英语多用介词、连词、副词、关系代词等加以连接。这些词法差异决定了汉英互译时必须增加译语的特有词类,结合原语词义和译语构词方式增加必要词语。

汉语注重意合,以小句、短句见长,连词成句往往没有外部形态,而是借助语义关系,承前或蒙后省略句子主语;英语注重形合,以复句、长句居多,连词成句大多通过显现的外部形态,通常不省略句子的主语。因此,汉译英时必须依据逻辑语义关系增加关联词语,英译汉时需要根据汉语连词对出现的情况加以增补。英语句子习惯承前省略某些句子成分,汉译时必须适时补出,以使意义显豁,结构畅通。

汉语语篇呈螺旋式,习惯运用叠加、排比、反复等手段,英语语篇呈直线式,多用省略和替代,汉英全译时需要增补必要的词。汉语语篇强调悟性和意合,通过语境和语用等无形的衔接方式来领会语篇单位之间的逻辑意义关系,英语则强调整理性和形合,多用词汇、语法等有形的衔接手段,汉英全译时就需要增加必要的介词、连词或副词,确保译文语篇的连贯。

3.3.2 汉英在传达语里意义上的差异

单语内部的语表形式和语里意义并非总是一一对应,语际转换中的非对应性更加明显。

原语有独特的传情达意方式,将语里意义隐含于语表形式,或者依据语境需要省略某些形式,但在译语中必须加以明示或补充,才能帮助译文受众充分理解原文作者的真实意图;有时某些语表形式传达的信息在原语中属于赘余,但在译语中是必要的信息冗余,因此译者增添解释性短语或添加连接词来增强译文的逻辑性和易解性,导致译文往往采用比原文更明确的形式表达信息(Shuttleworth & Cowie 2004),借助译语形式将原文的语里意义显化或外化,传达原文词义时进行概念性增补,传达原文句义、语篇义及其语用义时增添语言单位。

3.3.3 汉英在反映语用价值上的差异

汉英反映修辞值、语境值、文化值的差异表明:译者准确完整地传达原文语义,只是尽了部分职责,最终还要判断译文是否再现原文语值,是否讲究修辞、富有文采。为此,译者必须适当增添语言单

位,符合语值再现的译语规范,确保译文成型成活。汉语经常用各种语气助词表达情态,运用语形重叠、语义重复实现对称美和音韵美,善用对偶、排比、顶针等修辞手段丰富表达形式。相反,英语力避重复,多用同义词或近义词,用代词替换名词,用助动词替换动词,几个并列词语共用同一成分。因此,英译汉时,在不增损原文语义的前提下,译者可以充分发挥汉语的优势,适当增添词语,使译文韵律和谐、结构匀称、语势强化、语篇优美,真正做到既求信、又造美。

4. 繁化机制的类型

繁化机制按其运用理据分为三种类型:语法性繁化,因双语语法结构的差异而运用的繁化;语义性繁化,因原文表意之需而运用的繁化;语用性繁化,因再现原文语用价值和满足译文修辞达意之需而运用的繁化。

一般而言,语法性繁化和语义性繁化是强制性的,否则译文无法准确完整传递原文语义,也不符合译语表达规范;语用性繁化是选择性的,在不影响传递原文语义的前提下适当增添,可确保译文准确、鲜明、生动、形象。繁化机制的操作手段是增补,主要涉及语素、词、短语和小句等语言单位,因而分为语素繁化、词繁化、短语繁化、小句繁化四种类型,运用频率依次递减,难度依次加大。

4.1 语素繁化

语素繁化,指根据表意需要将原语语素增译为译语词或短语,是原语语素在译语中的词化或短语化。语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是构词的语言单位,在实践中单独全译的可能性很小,没有词、短语、小句层面那么普遍,因此经常被人忽略。但是,语素繁化直接涉及词汇层面以及语法形态,在力图建立完善、全面的全译求化机制时,不能忽略语素繁化。

汉英语素在形式、构造、功能的较大差异,决定了双语词汇无法在形式上形成完全对应,必须采取相应手段和方法追求意似。汉语语素的实现形式是汉字,英语语素是一定的字母组合,词缀和词尾数量众多,绝大多数全译时必须增译成汉语的词甚至短语。

4.1.1 英语词缀汉译时的词化或短语化

英语词缀的词化或短语化,指用汉语的词或短语传达英语词缀所表达的意义。学者们界定词缀时存在分歧,数量也未达成共识。英语词缀的种类多、数量大,相当一部分在汉语中没有对应形式,只能用实词素表示。

4.1.2 汉语词缀英译时的处理

汉语的词缀数量有限,一部分可对译成英语词缀,一部分则没有对应形式,只能通过单词表达,如:老婆 — wife,阿姨 — auntie、nurse等。这些词缀的意义已经完全虚化,对应的英译并不是译“老”而是其后的语素。

4.2 词繁化

词繁化,指根据再现语值和传递语义的需要在译语中增加语言单位,从而将原语词增译为译语短语或小句,即原语词在译语中的短语化或小句化。一个词表达的语义内容,有时既可以用一个短语表达,也可以用小句表达。语际转换时,要保全原文语义,就要确保其信息守恒、思维内容等量不变,但等量的思维内容可以借助译语中不同级别的语言单位进行储存,出现原语单位和译语单位的跨级转换,即将原语词表达的概念内容替换为译语词表达的简单概念,或转换为译语短语表达的复杂概念,或转换为译语小句表达的判断。译语表达时,译者将储存于大脑中的概念内容,既可用译语中对应的词表达,也可换用译语中复杂的短语,即原语的词繁化为译语短语,还可换用译语的小句,即原语词繁化为译语小句。

4.2.1 词的短语化

词的短语化,指用译语短语传达原语词所表达的语义信息,包括以下三种情况:原语语素在译语中词化或短语化之后,原语词就自然而然地增译为译语短语;英语中有些复合形容词由相应的定语短语压缩而来,汉译时可直接还原成短语形式,译成“XX的”;在译语中增加原语无其形却含其义的词,将原语词增译成译语短语,从而将原语词表达的简单概念扩展为译语短语表达的复杂概念。

原语单词中的语素扩展成译语的词语之后,该词在译语中短语化,或直接通过增词实现原语词在译语中的短语化。增词首先表现在增加原语没有而译语特有的词类,如汉语的量词、助词,英语的冠词、表达时态的助动词等,其次表现在增加原语无其形但包含其义的词,或补充原语中省略的某些词。一般而言,实词增译多用于英译汉,虚词增译多用于汉译英。

4.2.2 词的小句化

词的小句化,指在译语中增加词或短语,从而形成小句,或者将原语词扩充为译语小句。新增词语表达的语义内容经过重新组合,形成带有特定语气、相对独立的小句。思维转换中,是将原语词表达

的概念,分解为几个译语词或短语表达的概念,再进行概念组合,积累到一定程度即形成一个完整判断,外化为译语小句。

原语词在译语中的小句化既涉及语言单位的语内转换和语际转换,也涉及思维单位的跨级转换,包括五个步骤:原语词转换为简单概念→简单概念转换为简单意象→简单意象聚合为简单组象→简单组象转换为简单命题/判断→简单命题转换为译语小句。(黄忠廉 2008)

英语中有些分词位于名词之前,语表上跟名词之间形成定心关系,可将其扩展为定语从句,从而将分词还原成动词,跟名词之间形成主谓关系。分词实现语内的小句化,译成汉语时即可对译成前置的定语短语,形成分词汉译时的短语化,也可跟所修饰的名词重新组合成为一个主谓短语,带上语气、独立出来即为小句,形成分词汉译时的小句化。如:

(1) He crashed down on a protesting chair.

protest相当于短语to express one's disagreement, feeling of unfairness, annoyance etc,表达一个复杂意象(或意象组合)。现在分词protesting修饰chair,将人的抗议声引申到椅子上,意象发生了转移,即:a protesting man → a protesting chair,重组为protesting → producing a protesting sound, a protesting chair → a chair that produced a protesting sound,表达判断a chair produces a protesting sound。原文一个小句就分解为两个小句:he crashed down on a chair和the chair produced a protesting sound,用汉语表达为:

译文I:他突然撞倒在一把椅子上。椅子发出抗议声。

经过概念合并、意象重组,两个小句可合并为一个,即:

译文II:他突然撞倒在一把发出抗议声的椅子上。

“他撞倒在椅子上”和“椅子发出抗议声”存在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为了发挥汉语善用小句的优势,尽可能做到既传达原意,又模拟声音,译文还可润色如下:

译文III:他突然撞倒在一把椅子上,椅子压得吱吱作响。

4.3 短语繁化

短语繁化,指根据语值再现和语义传达之需,在译文中增加原文虽无其形但包含其义的短语,从

而将原文的较短短语扩充为译文的较长短语甚至小句。短语繁化以词繁化为前提和基础,增词不一定增短语,但增短语肯定会增词,短语繁化比词繁化的难度较高、频率较低。

4.3.1 短语扩充

短语的扩充,指在译文中增加必要的短语,从而将原文的较短短语扩展为译文的较长短语,以便准确、清晰地传达原文语义,有效、完整地再现原文语用。常见的增加短语包括:概括性短语、列举性短语、替代性短语、省略性短语、注释性短语和修辞性短语等。

(2) If it is to be defended, its defenders must either argue that the market system is morally preferable because it promotes human freedom, regardless of the resulting situation of society, or that the market system will produce results which the individual making the judgment finds morally preferable.

如果得到辩护,那么辩护人必须从两方面进行争辩:其一,从道义方面,市场体制更受欢迎,因为它可以促进人类自由,不管社会的结果情况如何;其二,市场体制必将产生一种结果,这种结果的个人判断在道义方面令人喜欢。(http://202.204.128.82/CEO)

原文用either argue that...和or that...指出辩护人必须进行辩护的内容,译文先增加“两方面”进行总概,然后增加“其一”、“其二”分别叙述,层次分明,逻辑清晰。

4.3.2 短语小句化

短语小句化,指在译文中增加短语并带上某种特定语气,将原文短语扩展为译文小句。原语短语表达的复杂概念,既可扩展为译语中更长短语表达的概念,也可扩展为译语小句表达的判断,其操作程序包括以下六个步骤:原语短语转换为复杂概念→复杂概念转换为复杂意象→复杂意象分解为简单意象→简单意象聚合为简单组象→简单组象转换为简单命题→简单命题转换为译语小句。(黄忠廉 2008)如:

(3) 这里所说的清野,是指粮食成熟时早日收割的意思。(http://202.204.128.82/CEO)

原译:"Clearing the fields" means harvesting the crops as soon as they are ripe.

原文中“粮食成熟”为主谓短语,可转换为由“粮食”和“成熟”这两个简单概念组合成的复杂概念,经过译者的大脑思维活动,形成一个复杂意象,

可分解为两个简单意象:“谷物类、豆类和薯类”和“植物的果实完全长成”,聚合成两个简单组象:谷物类、豆类和薯类等果实完全长成(状态),果实完全长成的谷物类、豆类和薯类(结果)。考虑到原语中“粮食成熟”为主谓短语,强调“粮食成熟”的状态,而非“成熟的粮食”的结果,于是放弃组象聚合the ripe crops,选择the crops are ripe。经过一系列概念—意象—组象—命题之间的转换之后,原句分解为两个小句:这里所说的清野是指早日收割粮食的意思(独立小句);粮食成熟时(非独立小句),对译成两个英语小句,重组如下:

试译:Here "clearing the fields" means harvesting the crops as early as possible when the crops are ripe.

英语的独立主格结构由各种从句压缩而来,可增译为汉语小句;英语句首的名词短语有时充当原因状语,可扩展为原因状语从句,汉译时需繁化为原因分句(例4);英语简单句中的有些主语,实际上是一个表达含蓄条件的概念,可扩展为if引导的虚拟从句,汉译时需要繁化为假设分句(例5);英语中有些名词短语放在谓语动词之后,虽为主语的补语,实际上相当于省略主语和系动词的小句,可繁化为汉语并列复句的后分句(例6)。

(4) The heir to a fortune, he did not need to worry about his future life. (章振邦、张月祥 1997: 382)

试译:他是一笔财产的继承人,因而不必担忧未来的生活。

(5) A true friend would have acted differently. (同上:417)

要是真朋友,做起来就不一样了。

(6) They returned aware of their own literature, all accurately self-conscious and political people. (<http://202.204.128.82/CEO>)

他们回来时才知道自己的文献,这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和政治头脑的民族。

4.4 小句繁化

小句繁化,是指根据再现语值和传达语义的需要,在译语中增加必要的小句,或者将原语词和短语表达的意义用译语小句的形式表达出来,从而将原语单句扩展为译语复句甚至句群,即原语小句在译语中的复句化和句群化。小句繁化以词和短语的繁化为前提,增加小句必然增加词和短语,反之亦然,因此小句繁化的频率低于短语和词的繁化。有

时增加词语不足以传达原文语义,还必须借助译文小句才能挖掘字里行间的隐含意义,或者通过增加小句再现原文中隐含的文化背景信息,同时符合译语的行文习惯,满足修辞达意的需要。

4.4.1 小句的复句化

小句复句化,指在译语中增加词或短语,几个短语化或小句化的结构组合成复句;或者在译语中直接增加小句,原语小句自然扩展为译语复句。

小句的复句化,从语表形式看,是原语小句扩展为译语复句的过程,从语里意义看,是原语的简单命题扩展为译语的复合命题的过程,包括六个步骤:原语小句对应为命题→命题分解为命题成分/概念/意象→复杂命题成分组合为简单命题(或:简单概念/意象组合为简单命题)→简单命题外化为译语小句→几个译语小句联结为复句。(黄忠廉 2008)

(7) ①A confined triangle, perhaps fifty miles its greatest length, and thirty its greatest breadth; ②two elevated rocky barriers, meeting at an angle; ③three prominent mountains commanding the plain — Parnes, Pentelicus, and Hymettus; ④an unsatisfactory soil; ⑤some streams not always full; — such is about the report which the agent of a London company would have made of Attica. ("Athens, the Eye of Greece" by John Henry Newman)

原文独立小句为such is about the report,看似是一个简单命题,但主语such前面带有五个名词短语充当其同位语,可分解为五个一级复杂概念:短语①带有两个并列短语作后置定语,可分解为三个二级复杂概念:“一个隔绝的三角地带”、“最长处约50英里”、“最宽处约30英里”;短语②为一个名词短语带上一个作后置定语的现在分词短语,可分解为两个二级复杂概念:“两堵耸立的岩石屏障”、“在一处相交”;短语③为一个名词短语带上包含一个充当后置定语的现在分词短语和一个同位语,可分解为三个二级复杂概念:“三座突兀嶙峋的高山”、“俯临平原的这三座高山”、“帕奈斯山、彭特利库斯山、伊米托斯山”;短语④、⑤都是定心短语,分别表达一个复杂概念:“一处不尽人意的土壤”、“几条终年不涨水的溪流”。

因此,整个小句表达的命题可分解为上述六个一级复杂概念和十一个二级复杂概念,这些复杂概念既围绕命题成分,又相对独立,分别组合为简单命题,外化为以下6个译语小句:有一处与世隔绝的

三角地带;该三角地带最长约80公里;(该三角地带)最宽近50公里;有两堵挺然耸立的岩石屏障;(它们)相交于一角;有三座突兀嶙峋的高山;(它们)俯临平原;(它们)是帕奈斯山、彭特利库斯山、伊米托斯山;有一处不尽人意的土壤;有几条不是终年涨水的溪流。

于是,由一个原语小句扩展而成的六个译语小句,可根据语义关系联结为复句,根据表达习惯调整顺序,并进行必要的增删,最终繁化为一个汉语复句:

有一处与世隔绝的三角地带,最长处约80公里,最宽处近50公里;两堵挺然并耸的岩石屏障,相交于一角;三座突兀的高山,即帕奈斯山、彭特利库斯山、伊米托斯山,俯临平原;土壤不如人意;几条溪流并非终年涨水——这便是伦敦任何一家旅游公司的导游对于阿提卡所作的报道。(杨自伍译,笔者略加修改)

4.4.2 小句的句群化

小句的句群化,指在译语中增加词或短语之后,对原语的词进行短语化或小句化、短语进行小句化,或者增加独立小句,从而将原语小句扩展为译语句群。跟小句的复句化过程一样,小句的句群化也采取六个步骤,与之不同的是,在最后一个步骤中,先将某些小句独立为单句,再跟其他小句(单句)或小句组合(复句)一起联结为句群。

如:

(8) 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http://202.204.128.82/CE0)

We must be aware that China is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nd will remain so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The well-off life we are leading is still at a low level; it is not all-inclusive and is very uneven.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our society is still one between the ever-growing material and cultural needs of the people and the backwardness of social production.

原文单句省略了主语,宾语由三个并列的主谓短语充当,第二个主谓短语带有三个并列的定语短语,形成短语套短语的复杂格局。译者先将“必须看到”增译为小句we must be aware,三个主谓短语增译

为四个小句,再将第一小句转换为we must be aware的宾语从句,第二、三小句组合为并列句,第四个小句独立为单句,将这三个句子依次排列成为一个句群。

5. 结论

繁化作为一种全译求化机制,操作原则是繁形、不添义、不增值,即原文的语表形式在译文中看似有所繁复,但语里意义不改变,语用价值未变动;在操作语言的运用中,汉译英多于英译汉;在操作单位上,语素繁化>词繁化>短语繁化>小句繁化,运用频率依次递减;在词繁化的使用中,英译汉以实词增译为主,汉译英以虚词增译为主。繁化机制既可在某一语言单位上单独操作,也可在不同语言单位上逐层操作,通过在译文中增添原文形式上缺失或省略的语素、词、短语和小句等语言单位,准确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和语里意义,完整再现原文的语用价值,成功实现思维转换,共同推进译文尽善尽美,追求精妙超凡的求化艺术。

参考文献

- 黄忠廉. 2008. 小句中枢全译说[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黄忠廉, 等. 2009. 翻译方法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连淑能. 1993. 英汉对比研究[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连淑能. 2002. 论中西思维方式[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
- 刘宓庆. 2005. 新编当代翻译理论[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钱钟书. 1984. 谈艺录(补定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王克非, 等. 英汉对应语料库检索系统[OL]. http://202.204.128.82/CE0. 检索日期2012-10-18.
- 杨自伍. 1996. 英国文化选本(上)[Z].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余承法. 2014. 全译求化的三位一体原则[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3).
- 章振邦, 张月祥. 1997. 新编英语语法概要(第二版)[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Shuttleworth, Mark and Cowie, Moira. 2004.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Z].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Yu, Chengfa. 2006. On Qian Zhongshu's "Theory of Sublimity"[J].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14 (3).

- 许钧. 1987. 论翻译的层次[J]. 中国翻译, (5).
- 许渊冲. 1981. 翻译的标准[J]. 中国翻译, (1).
- 颜棣生. 1983. EXPERIENCE IN TEACHING TRANSLATION [J]. 外国语, (5).
- 杨健民. 1986. 茅盾早期论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J]. 江西社会科学, (1).
- 杨全红. 2008. 化境:“理想”耶?“标准”耶?[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
- 杨仕章. 2003. 科米萨罗夫翻译思想管窥[J]. 中国俄语教学, (3).
- 杨自俭. 2005. 对比语篇学与汉语典籍英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 (7).
- 臧仲伦. 1988. 俄汉翻译讲座第一讲——翻译实质和翻译标准[J]. 中国俄语教学, (4).
- 张柏然, 姜秋霞. 1997. 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J]. 中国翻译, (2).
- 张南峰. 1995. 走出死胡同, 建立翻译学[J]. 中国翻译, (4).
- 郑丽, 黄德先. 2013. 中美翻译服务标准的比较与启示[J]. 外国语文, (4).
- 郑声滔, 吴克炎. 1996. 翻译标准与文化交流[J]. 上海科技翻译, (1).
- 郑延国. 1990. 下笔妍雅 片言生辉——《管锥编》译句赏析[J]. 中国翻译, (2).
- 周笃宝. 2000. 继承传统译论 建立科学翻译学[J]. 中国翻译, (2).
- 周锰珍. 2007. “目的论”与“信达雅”——中西方两种译论的比较[J]. 学术论坛, (8).
- 朱树飏. 1981. 评介林同端译注《毛泽东诗词》——兼论我国古典诗词的翻译标准[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

A General Survey on the Study on Translation Criteria in China (1979–2013)

CHEN Xiang-mei¹, YUE Feng²

(1.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2.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studies listed on CNKI from the period of 1979 to 2013.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contrastive comparison, the article makes a synchronical and diachronical survey on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criteria, in hopes of sorting out the merits, demerits and some foresees for further study in related areas.

Key words: translation criteria; three stages; development; problems

(上接第57页)

Complication as a Sublimation Mechanism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Connotation, Motiv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WAN Guang-rong¹, YU Cheng-fa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China/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WI 53706, US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China/Confucius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Platteville, WI 53706, USA)

Abstract: As a sublimation mechanism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Complication is an activity involving a series of procedures, means, strategies and methods interacting upon and interacted by each other, which are adopted to add linguistic forms of the Target Text (TT) to accurately convey the linguistic meaning of Source Text (ST) and completely reproduce ST pragmatic value. The motivation of Complication lies in the discrepancies in cultural backgrounds, modes of thinking and language system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anguages. In terms of language units, Complicatio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types: Complication at the level of morpheme, word, phrase and clause — the bigger the language units, the fewer frequencies and more difficulties. These types may be adopted alone or together so as to pursue sublimity of the art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Complete Translation; Complication as a Sublimation Mechanism; connotation; motivation; classification

科技翻译中的全译求化机制*

万光荣 余承法

(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 武汉市 430074)

摘要 本文基于联合国网站上科学论文英汉对照版实例的分析,探讨了等化、繁化、简化、移化、换化、分化、合化七种机制的定义、理据和类型,建构科技翻译中的全译求化机制体系,指导科技翻译实践和翻译人才培养,推动全译理论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 科技翻译 全译 求化机制

Abstract Based on a detailed analysis of an English-Chinese bilingual article about biodiversity on the UN websit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finition, rationale and subdivision of seven translation procedures, e. g. simplification, transposition, conversion and attempts to propose a set of procedures for translating EST into Chinese.

Key Words sci-tech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procedures

DOI:10.16024/j.cnki.issn1002-0489.2015.01.002

引言

科技翻译实践既运用全译,也运用变译,二者是并列互补的关系,构成了科技翻译活动的“一体两翼”^[1]。变译是“人或/和机器用乙语摄取甲语文化信息以满足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的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全译是“人或/和机器用乙语转化甲语文化信息以求信息量极似的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2]。全译是量变质变的转化行为,转移原语内容,更换原语形式,化解原语和译语内容和形式之间的矛盾^[3],转换的目的是求化,转换成功即为求化。因此,全译的本质是“化”,核心是建立求化机制^[4]。科技翻译中的全译求化机制旨在帮助译者明确处理原文语言形式时应该遵循何种原则、执行什么程序、运用什么策略、采取什么方法,以及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

本文基于对联合国网站上“生物多样性”一文英汉对照版^[5-6]的实例分析,探究科技翻译中如何处理译文与原文之间的“一意多形”式矛盾,主要涉及处理语素、词、短语、小句、复句、句群等基本语言单位,总结出等化、繁化、简化、移化、换化、分化、合化七种求化机制。这七种机制既可单独使用,也可组合使用,单用是合用的前提和基础,合用是单用的综合和扩展。限于篇幅,本文只探讨求

化机制的单用情况,重在弄清每种机制的内涵外延、运用理据、操作类型,以期建立科学、完整的全译求化单一机制体系。

1 等化机制

等化机制,是指译者为实现译文与原文的语用趋同、语义相等而采取语形对应时所运用的一系列程序、手段、策略、方法及其相互之间组合和联系的全译行为。等化机制的运用理据相当严格:原语和译语具有极强的文化互文性和兼容性、具有相同或近似的思维方式、具有同构的思维顺序和表达顺序,符合语言表达的象似性规律^[7]。等化机制的操作原则是语形对应、语义相等、语用趋同,语形对应是外在前提,语义相等是内在基础,语用趋同是核心要素。等化机制采取双语语言单位对应的手段,运用直译策略,选择对译方法,在科技翻译中的具体技巧就是对原文单位的不增不减、不移不换,多操作于小句及其以下语言单位。如:

例1 Scientists reckon that there are actually about 13 million species, though estimates range from three to 100 million.

科学家认为实际上有大约1300万种生物,尽管估算范围从300万到1亿。

例1 汉译的每个词语都可在原文中找到原形、回复原位,如“科学家”和 scientists、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化境研究”(13FYY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电邮: yu_wan2007@126.com, victoryu2006@126.com

收稿日期: 2014-10-15/04

“认为”和 reckon、“实际上”和 actually、“尽管”和 though 等,属于词汇层面的等化;短语“大约 1 300 万种生物”和 about 13 million species、“从 300 万到 1 亿”和 from three to 100 million 等也逐一对应,形成短语等化;在词和短语对应的基础上,双语中的两个分句在结构和语序上也保持对应,形成小句等化,进而形成双语复句的整体对应,即复句等化。

等化机制是基于词汇层面的“级阶受限翻译”^[8],操作于以小句为核心的全译单位,向上延伸到复句和句群,向下覆盖词和短语,包括五个类型:词等化、短语等化、小句等化、复句等化、句群等化,受限程度随单位增大而递增,运用频率依次递减,大单位的等化以小单位为前提和基础。在词等化的基础上,可实现短语等化,进而达至小句等化,在小句等化的基础上实现复句等化甚至句群等化,因此操作程序通常是:词等化→短语等化→小句等化→复句等化→句群等化。等化机制的运用受制于文体类型,科技翻译比文学翻译运用较多。

2 繁化机制

繁化机制,是指译者为准确传达原文语义、完整再现其语用、成功实现思维转换而增补译文语言形式时所运用的一系列程序、手段、策略、方法之间相互组合和联系的全译行为。繁化机制的运用理据是:中西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字系统三方面的差异;语言差异又体现在语形、语义和语用三方面。繁化机制符合信息冗余规律,体现语言单位从原文到译文的无到有、少到多、短到长的渐变过程,以及语义表达从原文减省到译文繁复的量变过程,通过增补原文语形,实现译文语义求准、语用求美、文化求真。科技翻译中的繁化机制主要采取增补手段,增补原文中无其形但包含其义的语言单位,包括语素、词、短语和小句,以增补词和短语居多。繁化机制的原则是:繁形、不添义、不增值,原文语形在译文中有增补,但语义不添加,语用不增值,增加的语形必须是最小限度的,补充的语义必须适可而止,否则会因无节制的增补导致译文的信息扩张,全译成为变译,因此科技翻译中必须慎重运用。

例 2 Biodiversity also includes genetic differences within each species—for example, between varieties of crops and breeds of livestock.

原译:生物多样性还包括各物种内部存在的遗传差异,比如,农作物种类和牲畜品种里就存在这种情况。

试译:生物多样性还包括各物种内部存在的遗传差异,比如:农作物种类和牲畜品种内部都存在遗传变异这种情况。

例 2 中译者根据原文语义增加动词“存在”(词繁化),以确保译文结构完整;增加语气副词“就”(词繁化),突出原文作者隐含的强调语气;增加动词短语“存在这种情况”(短语繁化),准确传递原文为避免重复而承前省略的短语 genetic differences 的含义。为了使原文语义更加显豁,还可重复动词短语“存在遗传变异”(如试译),进而将省略型名词短语 (gen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varieties of crops and breeds of livestock 扩展为小句“农作物种类和牲畜品种内部都存在遗传变异的情况”,即短语繁化。

繁化机制根据运用目的可分为三个类型:语法型繁化(因语法结构之需)、语义型繁化(因语义表达之需)、语用型繁化(因语用效果再现之需)。语法型繁化和语义型繁化通常是强制性的,否则译文无法准确完整传递原文语义,也不符合译语表达规范,语用型繁化多为选择性的,在不影响原文语义传递的前提下适当增添语形,可确保译文准确可信、生动可读。

繁化机制根据操作单位可分为四个类型:1) 语素繁化,将原语语素增译为译语词或短语;2) 词繁化,增加原语中无其形但包含其义的词(如英译汉中,增加汉语量词、助词),或将原语的词扩展为译语短语;3) 短语繁化,增加原语中无其形但包含其义的短语,或将原语短语扩展为译语小句;4) 小句繁化,增加原语中无其形但包含其义的小句,或将原语小句扩展为译语复句或句群。四个繁化类型既可在某一语言单位上单独操作,如:将原语语素增译为译语的词,或将原语的词增译为译语短语或小句,或将原语短语增译为译语小句;也可在不同语言单位上逐层操作,如:在将原语的词或短语增译为译语小句的基础上,原语小句可增译为译语复句甚至句群。英汉科技翻译中多采用语法型繁化和小句繁化。

3 简化机制

简化机制,是指译者为高效再现原文语用、精准传达其语义而删减译文语形式时所运

用的一系列程序、手段、策略、方法之间相互组合和联系的全译行为。简化机制的运用理据与繁化机制相同,但操作方式相反,其动力源于语言的经济性原则,通过减省原文语形实现译文语义精准、语用高效,体现语言单位从原文到译文的有到无、多到少、长到短的渐变过程,以及语义表达从原文繁复到译文减省的量变过程。简化机制符合冗余信息理论,遵守合作原则中量的准则和方式准则,即:译文表达基于原文的同时,必须满足译语受众所需的信息,不应超出所需的信息;译文表达必须清楚了,避免晦涩和歧义,必须简洁洗练、井井有条。科技翻译中的简化机制主要采用删减策略,包括对原文基本单位如词、短语、小句、复句和句群的删除、省略、替换、合并。简化机制的操作原则是:简形、不损义、不贬值,删减的信息内容及其表达形式必须在原文内容“渐变”的量度范围之内,否则会因过度删减导致原文信息受损,科技翻译中更需把握全译之“化”与变译之“变”的界限^[8]。如:

例3 Biological diversity — or biodiversity — is the term given to the variety of life on Earth and the natural patterns it forms. 生物多样性指的是地球上生命的多样性以及形成的自然模式。

例3中译者根据汉语的表达习惯,将原文中的冠词一律省略,属于词简化。名词短语 biological diversity 简化术语为 biodiversity,以破折号连接,译者只需译出“生物多样性”,属于短语简化。译者采用汉语中下定义的方式,将 the term given to 简化为“指的是”(还可进一步简化为“是指”),是为了追求译文简洁连贯,也属于短语简化。原文的定语从句 it forms 压缩为前置的动词短语“形成”,属于小句简化。

简化机制根据运用目的可分为三个类型:语法型简化、语义型简化和语用型简化。前二者属于强制性简化,后者属于选择性简化,根据操作单位可分为四个类型:词简化、短语简化、小句简化、复句简化,使用频率依次递减,大语言单位的简化以小语言单位为前提和基础。译学界以往在探讨科技翻译中的省译或减译时,大多停留在词和短语层面,忽视了小句和复句层面,这需要我们立足丰富的全译实践,深入挖掘简化机制的类型和操作规律。汉英科技翻译中多采用语法型简化和小句简化。

4 移化机制

移化机制,是指译者在完整再现原文语用、准确传达语义的前提下,为遵循译语的表达习惯和规范而转移原文单位时所运用的一系列程序、手段、策略、方法之间相互组合和联系的全译行为。移化机制的操作原则是:移形、不易义、不变值,即原文的语形发生空间位置移动,但不易动其语义,不改变其语用价值。根据运用目的和原文单位的移动方式,移化机制可分为三个类型:1) 原形移化,将原语语形原封不动地移到译语,原语中某些专有名词和缩略语在译语中没有对应词,只能将其拼写和发音完整移植过来,多用于亲属语言之间,在外汉全译中的运用多于汉外全译,科技翻译中运用移化机制大多为了表达公认的某个科学概念(如 DNA)或公式(如 $E = MC^2$);2) 有形移化,指根据译语句法结构和表达之需对原文单位进行显而易见的转移,这是因为中西不同的思维认知方式导致两种语言在表达方式和顺序上的差异,包括四个次类:语素移位、词移位、短语移位、小句移位;3) 无形移化,指原文单位在译文特定的语境中获得新意,无法直接套用词典释义或字面意思,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引申,其运用理据在于:人类思维的相通和语言的共性、原文和译文的词语处于相同或近似语境、译语特定的表达习惯和规范,包括四个次类:专业化引申、普通化引申、具体化引申和抽象化引申。

汉英句子中的定语有不同位置:汉语句中的定语通常由词或短语充当,大多位于中心词之前;英语句中作定语的不仅是词和短语,也可以是小句(即定语从句),可位于中心词的前后。因此,科技翻译中有时需要对原文句子中的定语进行恰当移位,以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避免“译而不化”的翻译腔。如:

例4 Nature's products support such diverse industries as agriculture, cosmetics, pharmaceuticals, pulp and paper, horti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waste treatment.

原译:大自然的产物为包括农业、化妆品、制药、纸浆和造纸、园艺、建筑以及废物处理在内的各种行业提供着支持。

试译:大自然的产物支持包括农业、化妆品、制药、纸浆和造纸、园艺、建筑和废物处理在内的各种行业。(定语移位)

例 4 中 industries 的后置定语由一长串名词短语充当, 原译将其前移, 即成分移位。如果不将定语前移, 必须将其与中心语断开, 以补充形式置于其后。原译将动词 support 扩展为动词短语“为……提供着支持”, 并将动词短语后移, 似有不妥, 试译则稍作调整。

5 换化机制

换化机制, 是指译者为完整再现原文语用、准确传达语义而交换双语语形式时所运用的一系列程序、手段、策略、方法之间相互组合和联系的全译行为。与移化作为一种单向行为不同, 换化是一种双向行为, 旨在交换双语单位的表达方式, 但二者有时共同操作于同一语言单位, 既转移其位置, 也变换其表达方式, 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确保译文语义求真、语用求美。换化机制的操作原则是: 换形、不改义、不动值, 即交换原文和译文的语形, 力求不变换其语义, 不更动其语用价值。

按照双语单位互换的不同角度和层面, 换化机制可分为六个类型: 1) 词类换化, 指双语不同词类之间的相互交换, 这是因为双语词类的划分依据、词汇的使用频率和词汇的意义对应关系都有所不同; 2) 成分换化, 指双语句子成分之间的相互交换, 这是因为中西不同的思维模式导致句法结构和成分存在较大差异; 3) 句类换化, 指双语不同句子类型之间的互换, 包括单句与单句、单句与复句、复句与复句及复句内部不同分句之间的互换, 首先是因为单语内部存在不同句型互换的现象, 是人类思维共性在语言中的反映, 其次是因为双语单复句的划分不尽相同, 是不同民族的思维特性在语言中的反映; 4) 动静换化, 指双语在动静表达方式上的互换, 表现在双语中动词与其他词类之间的互换, 根源于中西两种不同的思维认识模式和文化背景, 反映中西哲学对物质运动和静止的不同观察和描写角度; 5) 正反换化, 指双语中肯定和否定两种表达方式的互换, 是中西不同思维模式在语言层面的反映, 同时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和规范; 6) 主被换化, 指双语中主动和被动两种表达方式之间的互换, 是因为汉英不同的语言类型导致被动语态在使用范围和频率上的诸多差异, 也是中西主体意向性思维与客体对象性思维的不同在语言中的反映。科技翻译多涉及词类换化、成分换化和主被换化。如:

例 5 Protecting biodiversity is in our self-interest.

保护生物多样性符合人类自身的利益。
(词类换化、成分换化)

例 6 This diversity is often understood in terms of the wide variety of plants, animals and microorganisms.

我们从多种多样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角度理解这种多样性。(主被换化)

6 分化机制

分化机制, 是指译者根据原文语用值再现、语义传达和译文表达之需, 拆分原文语形时所运用的一系列程序、手段、策略、方法之间相互组合和联系的全译行为。分化机制的运用不是任意为之, 而是基于汉外两种语言类型的差异及其体现在句法结构上的区别, 反映中西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 符合逻辑思维转换的规律。

分化机制的操作原则是: 分形、不断义、不损值, 即语形分离, 但语义不断裂、语值不损耗, 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和拆分的策略, 英汉科技翻译中运用比较普遍, 多操作于小句及其以上语言单位, 主要包括四个类型: 1) 词分化, 指将原文词语从句中分离出来, 成为译文中相对独立的一个短语甚至小句, 能够从句中分离的多为副词, 其次是形容词、动词和名词; 2) 短语分化, 指将原文短语从句中分离出来, 重组为译语小句, 多用于处理英语句中的分词短语、不定式短语、介词短语、形容词短语、名词短语、独立主格短语等, 或汉语句中的主谓短语、并列形容词短语等; 3) 小句分化, 指将词或短语从原文小句中分离、重组为译文小句之后, 原文小句就自动分解、扩展成为译文复句或句群, 以词和短语的分化为前提和基础, 包括原文的单句分化和复句中的分句分化; 4) 复句分化, 指将分句从原文复句中分离、重组为译语单句或复句之后, 该复句就分解为译语中更复杂的复句甚至句群。分化机制常用于英汉科技翻译, 以短语分化和小句分化居多。如:

例 7 In each ecosystem, living creatures, including humans, form a community, interacting with one another and with the air, water, and soil around them.

原译: 在每个生态系统中, 包括人类在内

的生物形成一个生态群落。这个生态群落不光会与其他生态群落互相影响，还会与周围的空气、水和土壤互相影响。

试译：在每个生态系统中，包括人类在内的众多生物形成一个个生态群落，群落之间互相影响，每一群落与周围的空气、水和土壤互相影响。

例7中译者先将分词短语 interacting with... 从句中分离出来，补充主语“这个生态群落”，从而将这个分词短语结构分解为汉译中的并列句，最终将英语单句分化为汉译句群。试译则将原文单句分化为汉译复句，并准确传达了 creatures 和 community 的复数含义。

7 合化机制

合化机制，是指译者根据原文语用再现、语义传达和译文语法规范之需，整合原文语形时所运用的一系列程序、手段、策略、方法之间相互组合和联系的全译行为。合化机制的理据与分化机制相同，但操作手段相反，原则是：合形、不漏义、不变值，即语形合并，但语义不遗漏，语值不变动，译文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和规范。合化机制采取化零为整的手段和融合的策略，多用于汉英科技翻译，根据操作的语言单位可分为四个类型：短语合化、小句合化、复句合化和句群合化。大语言单位的合化以小语言单位为前提和基础，短语合化、小句合化多见于小句内部，复句合化以复句中 小句和短语合化为前提，原文句群中单句、复句的合化最终导致整个句群的合化。如：

例8 The biodiversity we see today is the fruit of billions of years of evolution.

我们今天所见的生物多样性是数十亿年进化的成果。

例8中 we see today 是定语从句，汉语中无此分句类型，译者直接将其整合为作前置定语的主位短语“我们今天所见的”，从而将原文复句合化为汉译单句。

8 结论

科技翻译中全译求化单一机制的运用必须以完整再现原文语用和准确传达其语义为目的，力图改变或保留原文的语形。以科技翻译事实为依据，以求化原则为准绳建构的全译求

化单一机制体系包括等化、繁化、简化、移化、换化、分化、合化七大类别。一方面，七种机制可根据对原语单位的处理方式归类，繁化和简化涉及对原文单位数量的增减，可归为繁简机制，移化和换化涉及对原文单位的位置移动和相互交换，有时甚至操作于同一语言单位，可归为移换机制，分化和合化涉及对原文单位的结构调整，可归为分合机制；另一方面，每类机制还可根据运用目的、处理单位和操作方式划分为不同类型，每个类型还可往下细分，从而形成层次化、范畴化的全译求化单一机制体系（如下），以指导科技翻译实践和翻译人才培养，推动科技翻译理论建设。

一级范畴（1个）：求化单一机制；二级范畴（4个）：对等机制、繁简机制、移换机制、分合机制；三级范畴（7个）：等化机制、繁化机制、简化机制、移化机制、换化机制、分化机制、合化机制；四级范畴（30个）：词等化、短语等化、小句等化、复句等化、句群等化，语素繁化、词繁化、短语繁化、小句繁化，词简化、短语简化、小句简化、复句简化，原形移化、有形移化、无形移化，词类换化、成分换化、句类换化、动静换化、正反换化、主被换化，词分化、短语分化、小句分化、复句分化，短语合化、小句合化、复句合化、句群合化。

9 参考文献

- 1 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 2 黄忠廉．“翻译”新解——兼答周领顺先生论“变译”．外语研究，2012（1）
- 3 余承法．全译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 4 黄忠廉，方梦之，李亚舒等．应用翻译学．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3
- 5 <http://www.un.org/en/events/biodiversityday/biodiversity.shtml>
- 6 <http://www.un.org/zh/events/biodiversityday/biodiversity.shtml>
- 7 余承法．全译求化机制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 8 Catford J. C.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ist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9 余承法．从全译之“化”看变译之“变”．外语学刊，2014（1）

惊讶范畴:类型学研究的新领域^{*}

万光荣

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提要 惊讶范畴是类型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西方语言学界进行了广泛探讨。惊讶范畴表达言语交际者没有预料或者感到吃惊的信息,主要语法形式包括动词的复杂屈折变化、动词词缀、小品词、人称代词、传信语等。汉语中也有惊讶范畴,由具体的词汇或/和特定的句法结构表达,但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 惊讶 出乎预料 范畴类型学 汉语

中图分类号 H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17)06-0638-10

1 引言

惊讶范畴是英语 mirativity 的汉译,指言语交际者没有预料或感到吃惊的信息,最明显的语法形式往往是表达吃惊时的高声调(DeLancey 1997; Aikhenvald 2012)。此前,学者们用 mirative 或 admirative 表达类似概念:mirative 源于拉丁语动词 mīror,意为“吃惊、惊讶、羡慕”,派生词是 admīror,相应的英语动词是 admirative,意为“羡慕、惊讶、想知道”(DeLancey 1997; Elena 2010)。目前西方语言学界一般认为,mirativity 是语义范畴,mirative 是跨语言的语法现象,mirative construction /form 指的是某一语言中惊讶表达结构。在 DeLancey(1997)之后,惊讶范畴受到广泛关注,已在诸多语言中得到证实,成为类型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但一直没有系统地引入汉语学界。鉴于此,本文旨在介绍这一新的研究成果,试图在汉语中找到惊讶范畴的语言事实支撑,以求教于大方。

2 惊讶范畴在类型学视域中的内涵

惊讶范畴的研究源于传信范畴(evidentiality)。研究土耳其语族的学者们注意到传信范畴的标记形式不完全是传信的,如动词后缀-miş 既表示传信,又带有非传信成分,用术语 admirative 标识非传信成分。DeLancey(1997)专门研究隶属于传信范畴的这个分支,使用术语 mirative。例如:

(1) a. Kemal gel-di b. Kemal gel-miş (Slobin & Aksu-Koç 1982: 187; DeLancey 1997: 37)

Kemal 来 - 过去时 Kemal 来 - 传信/惊讶
Kemal 来了。 Kemal 竟然来了。

【收稿日期】2014年10月8日

【定稿日期】2015年9月22日

doi: 10.7509/j.linsci.201706.029875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7BYY150)的阶段性成果。承蒙《语言科学》编辑部及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特致谢忱。文中谬误,皆由作者负责。

例(1) a, 说话人有直接的信息来源, 亲眼看见 Kemal 走进房间, 使用表示动词过去时态的后缀-di; 例(1) b, 说话人只有间接的信息来源, 只看见 Kemal 的外套挂在门厅上, 或者有人告诉他 Kemal 来了, 就用标记传信范畴的动词后缀-miş。-miş 也可以用于说话人有直接的信息来源, 但通常读成高声调, 表达说话人的惊讶: 说话人本来不知道 Kemal 要来, 开门时看到门口站着的竟是他, 因而非常吃惊, 意为“Kemal 竟然来了”, 于是-miş 成了惊讶范畴的语法表达形式。

惊讶范畴研究信息内容, 关注的是出乎意料的信息, 具体包括下面五个方面 (Aikhenvald 2012: 473)。

1) 表达言语交际者突然发现或者意识到的信息

阿锡坤语 (Ashkun language, 阿富汗库纳尔省省会阿萨达巴德市西北小镇瓦马镇佩赫谷地区的一种语言) 用 sagə-séi 表达说话人突然意识到的信息。例如:

(2) zəmás batúð “ohō, yek to son sagə-séi” (Elena 2010: 7-8)

女婿 认为 啊 这个 如此 金子 是 - 是

他的女婿心想 “啊, 原来真的是金子 (像传言的那样)!”

例(2) 的背景是: 传言女婿房间有一个金罐, 岳父前去查看, 找到了一个满是烟灰的罐子, 就叫女婿把罐子给他, 女婿同意了。岳父拿着罐子来到河边, 用沙子洗掉烟灰时, 发现罐子闪闪发光, 紧随而来的女婿突然意识到罐子是用金子做的, 印证了此前的传言, 于是用 sagə-séi 表达了自己的惊讶之情。

2) 表达言语交际者吃惊的信息

加洛语 (Galo language, 藏缅语族的一支, 为印度加洛人使用) 用 la(a) ka 表达言语交际者吃惊的信息。例如:

(3) azèn = gə jesì t̥i-dùu la(a) ka (Post 2007: 626)

朋友 = 所有格 尿 喝 - 未完成体 惊讶

(那头猪) 正在喝其他猪的尿液, 那是多脏的东西!

例(3), 说话人当时看到一头猪在喝其他猪的尿液, 对这种恶心的事情感到非常吃惊, 觉得不可思议, 于是用 la(a) ka 来表达 “竟然有如此荒唐的事情”。

3) 表达言语交际者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信息

土耳其语中动词后缀-miş 标记言语交际者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信息, 如例(1)。Slobin & Aksu-Koç (1982) 指出-muş 也表达这种意义。例如:

(4) kiz-iniz çok iyi piyano çal-iyor-muş (DeLancey 1997: 38; Slobin & Aksu-Koç 1982: 197)

女儿 - 你的 非常 好 钢琴 演奏 - 现在时 - 惊讶

你女儿的钢琴弹得真是好!

例(4), 说话者本来就认为朋友的女儿钢琴弹得很好, 但现场的演奏效果远远超出了其预期, 于是用动词加后缀的 çal-iyor-muş 表达对朋友女儿高超弹奏技艺的惊叹和赞美。

4) 表达与言语交际者预期相反的信息

傣语 (Lisu language, 藏缅语族的一支, 中国云南、缅甸北部、泰国和印度部分地区傣人使用的一种声调语言) 用 γe⁵⁵ 表达跟说话人预期相反的信息。例如:

(5) a⁵⁵ sa³³ mi⁵⁵ gua³³ tho²¹ γ²¹ so³³ tia⁵⁵ si²¹ γe⁵⁵ ma⁵⁵ dzo²¹ (Aikhenvald 2012: 461)

ald 2012: 461)

Asami(第三个女儿) 那 书 学习 延续体 仍然 惊讶 可见的 报道义虚词
Asami 还在学习 [说话人认为 Asami 已经学完了]。

例(5), 说话人以为 Asami 已经完成了学业, 不会再学习了, 事实上她还在学习, 就用 γ_e^{55} 表达与自己期望相反的信息。

5) 表达对话语交际者而言的新信息

Akatsuka(1985) 注意到日语和英语中有些条件句并非一定表达条件, 有时也用来表达全新信息, 如日语中:

(6) konna ni yorokonde kureru no nara, motto hayaku kite ager-eba yokatta. (Akatsuka 1985: 630)

因此 方位格 高兴 给 名词化 如果, 更加 早 来 给-如果 好. 过去时
[说话人到医院看望朋友之后, 自言自语] “早知道他这么高兴见到我, 我应该早点来的。”

例(6), 说话人原来不知道生病住院的朋友非常乐意自己前去探望, 直到他在医院看到朋友高兴的心情, 才意识到这一点, 于是用虚拟条件句 ager-eba yokatta 表达这一新的信息。

3 惊讶范畴在不同语言中的语法表达形式

惊讶范畴表达的上述意义, 既可以由表达听见的、推断的或者某些现行的传信形式兼任, 也可通过独立、专门的语法形式表达, 主要包括: 词汇手段, 如副词、句末表评价的小品词等, 以及某些固定的语法结构, 如英语和日语中的条件句、英语的 (It) turns out + that 从句等。有些语言中, 不同的惊讶意义有不同的实现形式, 如“吃惊”由一种语法形式表达, “突然的发现”则由另一种语法形式表达。下面逐一举例分析。

1) 动词的复杂屈折变化形式表达惊讶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 藏缅语族的一些语言、东北高加索语、塔利亚纳语 (Tariana language, 巴西亚马逊流域阿拉瓦克语族的一支) 都借助动词的复杂屈折变化形式表达惊讶意义, 但不同语言表达惊讶意义的动词复杂屈折变化形式不一样, 如马加尔语 (Magar language, 尼泊尔部分地区、不丹南部、印度大吉岭市和锡金邦马加尔人使用的一种语言) 用动词词根加名词化屈折形式 o 再加上语法化屈折形式 le 一起作谓语, 表达惊讶意义。

(7) boi-e chitua-ke ŋap-o le (Aikhenvald 2012: 441)

父亲-作格 豹子-与格 射击-名词化 未完成体. 惊讶

我很吃惊地意识到 父亲居然射中了那只豹子!

例(7), 动词词根 ŋap + 名词化屈折词缀 o + 非完成体助词的屈折形式 le 一起充当句子的谓语, 表达惊讶意义“居然射中了”。这种动词的屈折变化组合其实是动词的名词化形式, 出现在口语交际中, 表达惊讶意义。用动词的名词化形式表达惊讶意义的情况还出现在一些喜马拉雅语言中, 如: 康巴语 (Kham language, 藏缅语族的一支, 尼泊尔境内罗尔帕高地、鲁孔区、巴格隆区马加尔部落使用的一种语言)、尚特尔语 (Chantelle language, 藏缅语族的一支, 尼泊尔境内巴格隆区和莫雅格迪区尚特尔人使用的一种语言) (Grunow-Hårsta 2007), 以及察胡语 (Tsakhur language, 东北高加索语系的一支, 阿塞拜疆西北部和俄罗斯联邦达吉斯坦共和国西南部的察胡人使用的一种语言) (Tatevosov & Maisak 1999), 等等。

康巴语中惊讶意义的表达形式较为复杂, 主要由系动词 le 的动名词形式和第三人称单数一起表达, 句中另一主要动词也要以名词化形式出现。动词的一般用法和惊讶用法对比如下:

- (8) a. ma-hu-ke b. o-ma-hū-wo o-le-o (Aikhenvald 2012: 442)
 否定 - 来 - 完成体 单三 - 否定 - 去 - 完成体 - 名词单三 - 是 - 名词化
 他没有来。 他竟然没有来!

例(8) a, 动词 hu 有否定屈折形式 ma-和过去时屈折形式-ke, 分别置于其前后, 陈述“他没有来”这一事实, 属于动词的一般用法; 例(8) b, 前半部的主要动词是 hū, 前面添加了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o-和否定屈折形式 ma-, 后面添加了名词化屈折形式-wo, 后半部的主要动词是系动词 le, 前面添加了第三人称单数屈折形式 o-, 后面添加了名词化屈折形式-o, 两部分共同表达说话人的惊叹“他竟然没有来!”

用系动词(相当于英语的 be、become) 和/或动词的名词化形式作句中谓语表达惊讶范畴, 是动词复杂屈折变化形式表达惊讶意义的主要形式。Hyslop (2011) 认为, 科托普语(Kurtöp language, 藏缅语族的一支, 主要为不丹人使用) 中系动词是惊讶范畴标记的来源。

2) 动词词缀和小品词表达惊讶意义

有些语言中, 动词词缀和小品词也用来表达说话人吃惊的态度: 词缀一般是动词后缀, 放在动词词根之后; 小品词主要包括助词(位于句中或句末) 和叹词(位于句首)。

察胡语的动词后缀-ēx 表达惊讶意义, 既可以用在现实形式中, 也可以用在非现实形式中, 既可以用在亲眼看到的传信信息中, 也可以用在未亲眼见到的传信信息中。例如:

- (9) a. dak-ē čol ez-u-ēx = id
 父亲 - 作格 田地 犁地 - 完成体 - 惊讶 = 连贯
 父亲已经犁了地。
 b. dak-ē čol ez-as-ēx = id (Tatevosov & Maisak 1999: 289 - 291)
 父亲 - 作格 田地 犁地 - 未完成体 - 惊讶 = 连贯
 原来父亲打算/必须去犁地!

例(9) a, 说话人亲眼所见的现实信息是: 地已经犁好了, 使用动词完成体 ez-u(= ploughed) 加上后缀-ēx 陈述既成事实“父亲已经犁了地”, 对父亲的这一行为表示惊讶; 例(9) b, 说话人尚未亲眼所见的非现实信息是: 地还没有犁, 使用动词将来时 ez-as 加上后缀-ēx, 表达“原来父亲打算/必须去犁地”, 对尚未见到父亲将做的事情表示惊讶。

讯语(! Xun language, 北科伊桑语系的一支, 是一种单一的方言簇) 中助词 kohà 用在传信语之后、时态标记词之前, 将一个中性陈述句变为表达惊讶的陈述句。试比较:

- (10) a. ha má ha è b. à má kohà à è (Aikhenvald 2012: 448)
 名词1 话题 名词2 指示代词 单二 话题 惊讶 单二 指示代词
 他在这儿。 哦, 原来你在这儿!

例(10) a 为中性陈述句; 例(10) b, 助词 kohà 用来表达惊讶意义。

卡多语(Caddo language, 美国德克萨斯州东部、路易斯安那州北部、阿肯色州南部和俄克拉荷马州等地卡多民族部落的一种语言) 中叹词 hús-总是和非现实状态一起出现, 如例(11), 表达说话人没有料到的、非常吃惊的情况。例如:

- (11) hús-ba-ʔa = sa-yi-k' awih-saʔ (Melnar 2004: 90)
 惊讶 - 第一人称受格. 非现实 - 名字 - 知道 - 进行体
 天哪, 他竟然知道我的名字!

某些语言有几种表示惊讶意义的语法标记, 互补使用。塔波语(Tabo language, 居住在印度喜马拉雅

尔邦斯皮提谷的人群使用的一种藏方言) 有两种惊讶范畴标记: 后缀-saŋ 用在非自主动词和情感动词之后, 表达说话人突然发现或者意识到的信息; 后缀-taŋ 用在目的动词或者自主动词之后, 表达预先没有想到的信息。试比较:

- (12) a. ndaŋ gø: mō khōŋ mĩndzĩtãŋ-ne: su ndĩl-saŋ-nuk
昨天 晚上 他. 通格 床. 话题 - 夺格 落下 - 惊讶(非可控) - 推断可见
哦, 他昨晚一定从床上掉下来了。
- b. ndaŋ gø: mō khōŋ mĩndzĩtãŋ-ne: su ndĩl-taŋ-nuk (Hein 2007: 210)
昨天 晚上 他. 通格 床. 话题 - 夺格 落下 - 目的. 惊讶 - 推断可见
哦, 他昨晚一定是故意从床上掉下来了!

例(12) a, 说话人看见他穿着睡衣和被子躺在地上, 推断他从床上掉下来之后还在地上睡觉, 将后缀-saŋ 用在非自主动词 ndĩl(=fall) 表达自己的惊讶; 例(12) b, 后缀-taŋ 用在目的动词 ndĩl 后, 带有“故意的、有目的”的意味, 表达说话人的惊讶。

3) 人称代词的特定形式表达惊讶意义

某些语言中人称代词可用来表达惊讶意义, 如希鲁克语(Shilluka language, 西尼罗语的一支, 南苏丹希鲁克人使用的一种语言) 用第三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 gĩ 表达“没有料到的事情”。试比较:

- (13) a. á-kōbbì kīnnì 'kāl 'gέ ká gέ kālāl'-έ
过去时 - 说 - 第三人称受格 补语 拿 位移. 未完成体 复三. 中性 和 复三. 中性 拿 位移 - 单三
她/他说 “拿走”。于是她/他真的拿走了(意料之中)。
- b. á-kōbbì kīnnì 'gέ kó
过去时 - 说 - 第三人称受格 补语 复三. 中性 否定情态词
kālāl ká gĩ kālāl'-έ (Aikhenvald 2012: 456)
拿. 位移. 未完成体 和 复三. 惊讶 拿. 位移 - 单三
她/他说 “别拿走。”她/他竟然拿走了(没有预料到地或错误地)。

例(13) a, 第三人称代词复数的中性形式 gέ 表达与预期相同的意义; 例(13) b, 第三人称代词复数的原始形式 gĩ 表达与说话人预期不同的意义。

候恩语(Hone language, 贝努埃 - 刚果语系的一支) 中, 同一人称代词的主格和宾格用连词 bé(=with) 连接, 字面意思是“我和我”“你和你”“他和他”, 实际表达的是“我没想到……、你没想到……、他没想到……”。例如:

- (14) n-tì-βi-έ kyèr-u [n-kyèr bómì] (Aikhenvald 2012: 456)
单一 - 否定 - 完成体 - 知道 - 否做饭 - 名词化 单一 - 做饭 惊讶. 单一
我本来不知道怎么做饭, 却居然把饭做好了。

例(14), 第一人称主格 n 和宾格 mì 由连词 bό 连接, 主格 n 在动词 kyèr 之前, bómì 在动词之后, 表达第一人称意想不到的事。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人称代词仅仅与动词的完成体组合, 且带有强调意味。

4) 传信范畴及其他范畴的语法标记表达惊讶意义

其他一些范畴, 如时、体、语气、人称、方式、传信等, 在特定上下文中也可表达惊讶意义。下面重点介绍时范畴和传信范畴的语法标记形式表达惊讶意义的情况。

时范畴的标记形式表达说话人吃惊或者没有想到的情况。印第语/乌尔都语(Hindi/Urdu) 陈述句中的典型动词过去时用在口头交际中, 带有半感叹的语调, 表达说话人的吃惊。例如:

(15) Are! Kitnâ baRâ ho gayâ! (?* ho gayâ hai) (Montaut 2006: 82)

嘿! 多么. 很 高 是 走 [变成] - 过去时 (是 走 - 完成体)

天哪! 他长这么高了!

例(15), 一对夫妇带着 15 岁的孩子拜访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孩子变化太大, 老朋友竟然没有认出来, 于是用动词的过去时 gayâ 表达对孩子体型变化的惊讶。

南孔丘科斯克丘亚语(South Conchucos Quechua) 的过去完成时或者进行时标记“-yka:”与一般过去时标记“-na:”连用, 表达说话人的惊讶。例如:

(16) ... I = tsay-pita-qa cruz-kaq-pa ko: rri ko: rri tuma-ski-na: -pa: -qa

和 = 那 - 夺格 - 话题 穿过 - 限定的 - 所有格 跑 跑 转向 - 完成体 - 名词化. 我 - 第一人称 - 故意的 - 话题

Chi: nu munta-sh @ witsa-yka: -tsi-mu-na: (Hintz 2007: 171 - 174)

Chino 骑着鹿 - 分词 走. 往上 - 进行时 - 使役格 - 由近及远的 - 过去时. 名词

当我走到十字路拐角处时, Chino 正骑着鹿朝这边走来。

例(16), 说话人沿着山路寻找鹿, 认为鹿很可能朝那个方向去了, 可是当他走到拐角处时, 惊讶地发现 Chino 找到了那只鹿, 骑着它朝这边走来。

传信范畴表达惊讶意义。若把传信语分为直接传信语和间接传信语, 则间接传信语更容易表达惊讶意义, 尤其是在表达推断和听说的传信信息中(Slobin & Aksu-Koç 1982; Aksu-Koç & Slobin 1986)。

马普切语(Mapudungun language, 位于智利和阿根廷中西部安第斯地区的马普切人使用的一种孤立语) 的传信表达标记-rke-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含义: 例(17) a, -rke-指听说的信息, 意为“据说”; 例(17) b, -rke-指根据现实情况推断的信息, 意为“一定是”; 例(17) c, -rke-表达说话人对于没料到事情的惊讶, 意为“真让人吃惊!”。

(17) a. kuyfi miyaw-ürke-y mawida mew

很久之前 走 - rke - 直陈句 森林 通过

很久以前他/她闲逛到这片森林 [据说是这样]。

b. weðweð-pe-rke-la-y

疯狂 - 最近的 - rke - 直陈句 - 第三人称

他一定是疯了 [他一直在雨中行走]。

c. miyaw-pa-rke-y mi (Aikhenvald 2012: 465)

走 - 周边方位 - rke - 单二. 直陈句

所以你就在这附近 [真是奇怪]

推断的传信语最易表达惊讶意义。纳梅德语(Mamaindê language, 巴西北纳母比夸拉语族的一种古老语言) 有六种传信表达方式, 其中推断传信标记基本上都表达惊讶意义。例如:

(18) wa-sen-na-sq-le?i-tu mamãinsa-a-hai?ki

单二 - 说 - 复一 - 名词化: 声音 - 过去时 - 限定 纳梅德语 - 所有格 - 语言

set-thahta-nu-sq-le?i-tu

nakajuannün-?na-je?-le-ø-n?-sihîn-wa (Aikh-

envald 2012: 468)

说 - 宾一. 复数 - 主二 - 名词补语: 声音 - 过去时 - 限定 忘记 - 宾二 - 强调 - 第一人称. 过去时 - 主三

- 否定 - 过去时/推断 - 陈述句

你过去跟我们说话用的纳梅德语,很显然你还没有忘记!

例(18),说话人认为一位外出很久的青年回到出生地之后,不会使用当地古老的纳梅德语,当他得知该青年竟然还没忘记这种语言时,感到非常吃惊。句中推断传信语-sihin一方面表推断“很显然你没有忘记纳梅德语”,另一方面表惊讶“你居然还会使用纳梅德语”。

听说的传信语一般表达“吃惊”或者“事后的发现”。Floyd(1996)指出,在克丘亚语的谜语中,惊讶意义和事后明白相联系,惊讶的语调也是基于说话人延迟意识到某件事情时产生的。

4 惊讶范畴在汉语中的事实支撑

汉语中惊讶意义包括 Aikhenvald (2012) 列举的五个方面,每种意义都有明显的语法表达形式,这些语法形式也都在 DeLancey (2012) 提到的所有形式中,主要包括:1) 词汇形式:语气副词,如“居然”“竟”“竟然”“竟自”等;动词短语,如“没想到”“没料到”“没料想”“想不到”“料不到”等;叹词,如“啊”“哎”“哦”“噢”“喔”“呀”“噫”“咦”等;2) 特定的句法结构,如“啊,原来……”“早知道……”等。

1) 汉语多以叹词表达与说话人预期不一致而产生的惊讶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以“口”为偏旁的叹词:啊、哎、哎呀、哎哟、欸、嗯、咳、嗨、嘿、嚯、哦、呃、嘻、咦、噫、哟,等等,都可以在具体上下文中表达惊讶义。

以常见叹词“啊”为例:放在句首,借助不同的声调表达不一样的意义,下面的几种声调里表达惊讶意义:

啊 ā,表示惊异。例如:

(19) 啊,出虹了!

啊 ǎ,表示惊疑。例如:

(20) 啊? 怎么会有这种事?

啊 à,表示惊异(音较长)。例如:

(21) 啊,真没想到他会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啊 ɑ,表示明白过来(音较长)。例如:

(22) 啊,原来是你,怪不得看着面熟哇!

例(19),“啊”表达说话人没有预料到会出现彩虹,现场看到彩虹时,非常吃惊;例(20),表达说话人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说话人有点不相信,于是既“惊”又“疑”;例(21),“啊”与“没想到”连用,加强了说话人吃惊的程度;例(22),“啊”表达与说话人预期不一致,明白过来之后很惊讶。

由“啊”构成的双音节叹词表示各种惊讶。“啊哈”既表示惊喜,如例(23),也可表示恍然大悟,如例(24);“啊呀”表示单纯的惊讶,如例(25);“啊哟/啊唷”表示情绪激动或惊讶,如例(26)。

(23) 啊哈,我看见他了。 (24) 啊哈,我明白了。

(25) 啊呀,他跑得真快呀。 (26) 啊哟,吓死我了。

2) 汉语用语气副词表达说话人出乎意料的事情

汉语中有的副词只有惊讶意义,如“竟自”“竟然”“居然”;有的副词有多种意义,其中一种意义是惊讶,如“竟”。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的“竟”竟₁有4个义项:完毕;从头到尾;终于;姓。竟₂只有1个义项:表示出于意料之外。例如:

(27) 都以为他一定不答应,谁知他竟答应了。

“竟然”与“竟₂”完全相同“副词,出乎意料”。例如:

(28) 这样宏伟的建筑,竟然只用了十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

“竟自”与“竟然”完全相同“副词,出乎意料”。例如:

(29) 虽然没有人教,但他摸索了一段时间,竟自学会了。

“居然”表示出乎意料;同“竟然”。例如:

(30) 真没想到他居然做出这种事来。

3) 汉语也用动词短语表达说话人出乎意料的事情

“想不到”和“没想到”表达说话人没有想到的事。《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里“想不到”表示“出乎意料;没有料到”。例如:

(31) 一年没回来,想不到家乡变化这么大。

与“想不到”意义相反的动词是“想得到”,表示在意料中;其否定形式“没想到”,表示在意料之外。

(32) 我以为她不过说了一句气话,没想到辞职后她却真的离开了我。

“没想到”可以和副词“更”“真”“竟”连用,加重出乎意外的程度。

(33) 我没想到我还能见到赵雅芝,更没想到我还会与她发生一段难忘的故事。

有时动词和副词结合使用,加强惊讶的语气。例如:

(34) 真没想到他居然做出这种事来。

4) 汉语用特定句法结构表达说话人突然发现新情况之后的惊讶

汉语里表达说话人吃惊的句法结构主要有“叹词+‘原来(是)’……”“早知道……”。

“叹词+‘原来(是)’……”表达说话人明白事情后的一种吃惊,叹词主要是“啊”和“哦”。例如:

(35) 哦,原来,他就是末代皇帝的御弟呀!

(36) 啊,原来是这样!

(37) 啊,原来他也是英雄呀!

“早知道……”表示说话人一直不知道某件事情,现在才知道,说明对说话人而言是全新信息。这种情况下,“早知道……”的主语是第一人称“我”,有时“我”不出现,后面接从句。例如:

(38) 早知道是中国货,今天就不约你来了。

例(38),说话人不知道“是中国货”,直到看见了才知道。“是中国货”对说话人而言是新信息,表达的是惊讶。英语和日语中的条件句表达类似惊讶意义,汉语的类似例句有:

(39) 如果早知道要交这么多钱,我也就不会打了。

(40) 如果早知道你会有今天的成绩,当年不该对你太狠了。

汉语中一些表达惊讶的语言形式一般单独使用,也可以选择性地连用,加强惊讶。

(41) 真没想到,原来你们画家这么穷!

Hengeveld & Olbertz (2012) 指出,“在许多语言里,惊讶和传信有相同的表达模式,因为惊讶和传信在历史上都是源于同一个结构。”但我们的初步观察发现,汉语的传信语不能表达惊讶。在张伯江(1997)分类的三种传信语中,表达对事件确信程度的传信语气助词“嘛、呗、的、吧”都没有“惊讶”这一义项;表达对信息来源交代的传信语,如插入语“据说、听说”等也不表达惊讶;表达对事实真实性态度的传信语,如副词“肯定、准保”等也不表达惊讶。因此,汉语中的惊讶范畴尚待深入、细致的研究。

5 结论

惊讶是人类的一种共同情绪,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多以上升语调、句首叹词为标记。但是不同的语言中,惊讶的词汇和语法表达形式不尽相同。一般而言,屈折形式丰富的语言,如马加语,惊讶范畴主要由动词的屈折形式表达;屈折形式缺乏的语言,如汉语,惊讶范畴主要通过负载惊讶语义的词汇表达。传信语表达惊讶是共性,而人称形式表达惊讶是少数。

惊讶范畴是世界诸语言的一种普遍现象,是类型学研究中一个新的增长点。近 20 年来,学者们从世界诸多语言的角度研究了该范畴,发现它在语言描写和分析中非常有用。《语言类型学》杂志 2012 年第 3 期“编者案”指出,惊讶范畴研究中的不同观点帮助学界明晰其真正含义,有利于研究者准确观察和细致研究它在不同语言之间的共性与个性。惊讶范畴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其本身的形式和意义研究,还需扩大到与其他语法-语义范畴的交叉研究。

参考文献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12. The essence of mirativity. *Linguistic Typology* 16: 435 – 485.
- Akatsuka, Noriko. 1985. Conditionals and the epistemic scale. *Language* 61: 625 – 639.
- Aksu-Koç, Ayhan, & Dan Slobin. 1986. A psychological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evidentials in Turkish. *Evidentiality: The Linguistic Coding of Epistemology*, ed. by Wallace Chafe & Johanna Nichols, 159 – 167. Norwood, NJ: Ablex.
- DeLancey, Scott. 1997. Mirativity: the grammatical marking of unexpected information. *Linguistic Typology* 1: 33 – 52.
- DeLancey, Scott. 2012. Still mirative after all these years. *Linguistic Typology* 16: 529 – 564.
- Dickinson, Connie. 2000. Mirativity in Tsafiki. *Studies in Language* 24: 379 – 422.
- Elena, Bashir. 2010. Traces of mirativity in Shina. *Himalayan Linguistics* 9: 1 – 55.
- Floyd, Rick. 1996. The radial structure of the Wanka reportative.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the Redwoods: The Expansion of a New Paradigm in Linguistics*, ed. by Eugene H. Casad, 895 – 941.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Grunow-Härsta, Karen. 2007. Evidentiality and mirativity in Magar.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0: 151 – 194.
- Hein, Veronica. 2007. The mirative and its interplay with evidentiality in the Tibetan dialect of Tabo (Spiti).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0: 195 – 214.
- Hintz, Diane M. 2007. *Past Tense Forms and Their Functions in South Conchucos Quechua: Time, Evidentiality, Discourse Structure and Affect*.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
- Hyslop, Gwendolyn. 2011. *A Grammar of Kurtöp*.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regon.
- Hengeveld, Kees, & Hella Olbertz. 2012. Didn't you know? Mirativity does exist! *Linguistic Typology* 16: 487 – 503.
- Melnar, Lynette R. 2004. *Caddo Verb Morphology*.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Montaut, Annie. 2006. Mirative meanings as extensions of aorist in Hindi/Urdu. *The Yearbook of South Asi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ed. by Rajendra Singh, 71 – 86.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Olbertz, Hella. 2009. Mirativity and exclamatives in functional discourse grammar: evidence from Spanish. *Web Papers in Functional Discourse Grammar*, 82: 66 – 82. <http://dare.uva.nl/document/162366> [accessed 27, Feb. 2014].
- Peterson, Tyler. 2012. *Evidentiality and the unprepared mind*. <http://media.leidenuniv.nl/legacy/peterson-tyler.pdf> [accessed 27, Feb. 2014].
- Post, Mark W. 2007. *A Grammar of Galo*. Ph.D. dissertation, La Trobe University.

- Slobin, Dan, & Ayhan Aksu-Koç. 1982.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use of the Turkish evidential. *Tense-aspect: Between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ed. by Paul J. Hopper, 185 – 200.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Tatevosov, Sergej G. , & Timur A. Maisak. 1999. Formy admirativnoj semantiki [Forms with admirative semantics] . *Elementy caxurskogo jazyka v tipologičeskom osveščeni* [Elements of the Tsakhur Language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 ed. by Aleksander E. Kibrik & Jakove G. Testelec, 289 – 292. Moscow: Nasledie.
- Zhang, Bojiang (张伯江) . 1997. Renshiguan de yufa biao xian 认识观的语法表现 [The coding of epistemology in grammar] . *Guowai Yuyanxue 国外语言学* [Linguistics Abroad] 1997. 2: 15 – 19.

作者简介

万光荣,女,1972 年生,湖北荆门人。博士,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句法学、语言类型学。出版专著 1 部、编著 3 部,发表论文 25 篇。

Mirativity: A New Category in Typological Study

Wan Guangr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Hubei 430074

Abstract Mirativity is an uprising cross-linguistic category recently researched across world languages with fruitful achievements from western scholars. The core meaning of mirativity is surprise and unprepared mind of the speaker, and the range of mirative meanings may be expressed through different ways, mainly complex verbal constructions, verbal affixes, particles, pronouns, and evidentials. This article offers a preliminary description of mirativity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finds that mirativity is encoded with unique lexicons and/or mirative constructions.

Keywords mirativity; unexpected; typology; Mandarin Chinese

DOI: 10.19503/j.cnki.1000-2529.2019.02.014

惊讶程度的多模态研究

万光荣

摘 要: 惊讶程度的高低取决于事实与说话人认知或心理预期值偏差的大小,有语音、句法和身态等多种表达手段,语音、句法和身态的多模态综合研究能较为准确地判定言语交际者的惊讶程度。单一形式表达惊讶程度时,身态特征最可靠,其次为语音特征,最后为句法特征。惊讶语流的声音越大、音调越高,惊讶程度就越高。与“惊”组词的另一语素的程度意义越高,该词的惊讶程度就越高;在“惊讶”后面作补语的词语的程度意义越高,该结构的惊讶程度就越高。言语交际者的身态越夸张,惊讶程度越高。

关键词: 惊讶程度; 多模态; 语音; 句法; 身态

作者简介: 万光荣,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湖南 长沙 410081)

惊讶,是喜、怒、哀、乐、惊、恐、思等七种人类基本情绪中的一种,在心理学和哲学领域受到较多关注,成果颇多。近年来语言学界把它单列为一个语义范畴,国外研究成果较多、学术影响较大的是 Scott DeLancey^[1] 和 Alexandra Aikhenvald^[2],他们指出惊讶是一种跨语言现象,有五种主要意义和三种主要语法手段,惊讶的本质是出新和出乎意料。国内的惊讶研究除了探讨它的表达手段以外^[3],还分析了它产生的原因,如普通话口语情感标记词“只是”表达低于说话人的预期,强调说话人因感到意外而吃惊^[4];“怎么”表达的信息与预期差距不大时,心理反应是意外;信息与说话人的预期相差很大时,心理反应是惊异^[5]。

惊讶有不同种类和不同程度。惊讶的描述都可以采用四个维度:效价(valence,情感的正负程度)、效力(power,情感的强弱程度)、激励(arousal,情感的平静与激动程度)和新奇(novelty,情感的意外程度)^[6]。可借助口头和非口头表达,通过提高声音响度、加快语速、突然移动身体、上扬眉毛、紧闭嘴唇、张大嘴巴等实现程度不同。惊讶面部表情的效价有六种:极端正惊讶、中等正惊讶、轻微正惊讶、轻微负惊讶、中等负惊讶、极端负惊讶^[7]。人们对事情的惊讶程度,会运用特定词汇,或在普通词汇上加上超高的音调,或有特殊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但惊讶是显性的、可查的。惊讶本身已经是一种程度较高的情绪,还可细分吗?如何区分?这些问题在目前的文献中还没有充分论述。另外,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需要识别人类情感,但人机情感互动还不能令人满意。鉴于此,我们从惊讶入手,从模态的视角认识惊讶及其程度。

一、远离参照点越多,惊讶程度越大

惊讶之所以产生,在于言语交际者心理事先有一个参照点,接受的信息与这个参照点相反或者不同。远离参照点的多少基本对应惊讶程度的大小。这个参照点有两个:认知参照点和心理预期值。

1. 认知参照点与惊讶程度

认知参照点,是人类在现实世界的体验中形成的对世界的认识,成为人类判断概念或采取行动的依据。如果说话人/听话人获得的信息在他对世界的认知范围之内,就不会产生惊讶;如果获得的信息在他对世界的认知范围之外,就会产生惊讶。“为什么惊讶?因为拥有巨大财富的企业家黄怒波不把他的财富挥霍于销金窟,而是用来从事于艰危的登山运动、探险事业。”^[8]在说话者屠岸的认知中,有钱的企业家都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类型学视域下的汉语意外范畴研究”(17BYY150)

是挥霍金钱,而黄怒波拿着金钱去做艰危的探险,他因此感到惊讶。由于个人对世界的认知不一样,同一件事对不同的人来说,有人惊讶,有人不惊讶,或者惊讶的程度不一样。“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就表现了说话人对其他人惊讶的不屑。

惊讶与个人知识储备和社会阅历有关。《雷雨》中,周冲对事情的反应普遍直白,因为他年轻,又接受了新思想,敢毫不顾忌地表露自己的情绪,遇到意想不到的事就产生惊讶,在言语、表情等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周朴园老沉,见过世面,表达情绪时会顾忌到他的身份,可能掩饰,即便是非常惊讶也可能极力表现平静。

2. 心理预期值与惊讶程度

心理预期值,是人类在交往中获得的相关知识,也成为判断概念或采取行动的依据。某一信息出现时,偏离预期便产生惊讶。一般来说,偏离得越多,惊讶程度越高;与心理预期完全相反时,惊讶程度最高。

(1) 不料,他没考上大学!

(2) 啊? 他没考上大学?!

例(1)中的说话人对他很了解,预期他考大学没问题,用否定词“不”否定预期“料”,产生惊讶。例(2)中的说话人事先非常肯定他能考上大学,当得知他没有考上大学时,与自己的期望完全相反,就非常吃惊。比较而言,“没考上大学”这件事偏离说话人的心理预期值,(2)比(1)大,所以(2)的惊讶程度比(1)高。

超过预期产生惊讶,不及预期也产生惊讶。超过预期或者不及预期的值越大,惊讶程度越高。心理预期值可以是个人的心理预期值,还可以是社会预期值。

(3) 这款瑞士手表才五十块?!

(4) 这款瑞士手表要十万块?!

例(3)为不及预期,例(4)为超过预期,这个判定是针对社会预期值而言的。社会预期值是特定社会背景下大众对某一事件普遍认可的一个值,比如瑞士手表根据配置一般认为两千至五千元,例(3)和例(4)与这个值都相差很远,说话人对实际价格都很惊讶。理论上讲,实际值与预期值的差越大,惊讶程度越高,例(4)表达的惊讶程度比例(3)高。

惊讶程度的高低可以通过不同的词法句法形式表达出来;如果没有显性的词法句法形式,可以通过语流中语音的变化识别出来;如果这些语言都没有,那么言语交际者的面部表情或者肢体动作能确定惊讶程度。下面就从词法句法、语音和图像三方面剖析惊讶程度的表达形式,我们称之为多模态分析方法。

二、惊讶的句法使用特点反映惊讶的程度

惊讶程度在句法上的特点主要体现为它的组词方式、前后修饰语的程度意义、标点符号的连用等。本小节的用例来自北京大学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

1. 与“惊”组词的另一语素的程度意义越高,整个词表达的惊讶程度就越高

从构词方式来看,在与“惊”构成的词中,另一语素的程度意义决定惊讶程度。《现代汉语词典》中,“震”意为“震动”“情绪过分激动”,“震惊”是“大吃一惊”,所以“震惊”比“吃惊”的惊讶程度高。“骇”意为“惊吓、震惊”,“惊骇”形容“惊慌害怕”;“魂”意为“灵魂”“精神或情绪”,“惊魂”是指“惊慌失措的神态”。比较而言,“惊魂”把灵魂都震惊了,“惊骇”是震惊、害怕,还没有入内心,因而“惊魂”比“惊骇”的惊讶程度更高。如此分析来看,惊讶程度的极差排序为:惊魂>惊骇>震惊>吃惊。

“惊”通常与其他情绪并存,分为三组:A. 惊+疑:惊疑;B. 惊+叹:惊叹、惊异、诧异、惊喜、惊奇;C. 惊+恐:惊慌、惊恐、惊愕、惊骇、惊悸^[9]。粗略地看,C组比B组的惊讶程度高,B组又比A组的高。

《雷雨》的作者使用“略惊”“惊”“惊愕”“更惊愕”等词语来区分惊讶程度,刻画人物内心世界。

(5) 繁漪:(略惊)你来做什么?

繁漪:(惊)什么?

繁漪:(惊愕地)侍萍? 什么,她是侍萍?

繁漪:(更惊愕)什么? 求婚?(这两个字叫她想笑)你跟她求婚?

2. 在“惊讶”类词汇前面作状语的副词的程度义越高,整个结构的惊讶程度就越低

CCL 语料库中表达惊讶意义的词汇中,“诧异”“吃惊”“惊讶”三个词的使用频率最高。我们就从这三个词入手,分析它们能否被程度副词修饰,如果能,又是什么样的程度副词,以此来观察惊讶的程度。

“诧异”作谓语时,前面可以没有程度副词,也可以有程度副词,程度副词主要是“愈发、颇为、很、好生、好不、不禁、不免、不觉、暗暗、更加”等。“吃惊”作谓语时,前面必须出现程度副词,主要有“很、十分、非常、大为、一点也不、暗暗、别”等。“惊讶”作谓语时,前面一般有程度副词,常用的有“非常、很、大为、好生、颇为、略显、极为、有些、十分、有些、一点都不、特别”等。

就惊讶程度而言,诧异>吃惊/惊讶。“吃惊”和“惊讶”前面修饰的高程度副词丰富,“诧异”前面修饰的高程度副词较少。“吃惊”“惊讶”前面受“特别”修饰,“诧异”前面一般不受“特别”修饰。“吃惊”“惊讶”前面“极为”用例较多,“诧异”前面“极为”用例很少。这些都说明“诧异”本身的程度高,不需要其他副词来提高程度,而“吃惊”和“惊讶”本身的程度稍低,前面还可以添进程度副词加强惊讶程度。另外,“吃惊”和“惊讶”前面受否定定义的程度副词修饰,并且通常是双重否定,如,这不由得我们不惊讶了。而“诧异”前面否定定义的程度副词很少,说明“吃惊”“惊讶”和一般动词、形容词一样,可以否定,与之对应的肯定意义在语言里存在;而“诧异”的否定受限,因为它已是程度高的极限形容词,否定极限词产生对应的肯定极限形容词在语言里也受限。

3. 在“惊讶”后面作补语的结构程度意义越高,整个结构的惊讶程度就越高

(6) a. 当石榴知道她和世纬根本不是“兄妹”时,惊讶得眼睛睁了好大好大。

b. “啊?!”苏淳惊讶得眼珠都掉出来了。

例(6) a、b 两句中惊讶后面都接了补语,b 中“眼珠都掉出来了”比 a 中“眼睛睁了好大好大”程度要高,b 句表达的惊讶程度比 a 句高。

(7) a. 黑泥鳅惊讶得叫出了声,铁汉这回才点了点头。

b. 当他踮起脚尖,把玉米送入鸽房时,惊讶得大叫起来。

例(7) a、b 两句中惊讶后面都接了补语,b 中“大叫起来”比 a 中“叫出了声”多了一个“大”字,程度要高,因此 b 句表达的惊讶程度比 a 句高。

惊讶各程度之间不能截然分开,而是一个连续统。如果“惊”组成的词连用,排序则反映了程度差别。《中国青年报》2017 年 7 月 10 日第 8 版新闻标题《中超联赛避险唯靠“足球自救”,一波三折有惊讶有惊奇有惊喜》,作者连用三个带有“惊”的词语,“惊讶”“惊奇”“惊喜”这种排列在此语境中表现为惊讶程度的递增。这种受语境影响的惊讶程度,甚或语言中没有类似上面 2.2 和 2.3 中的修饰语,都给惊讶程度的判定造成了一定困难,那么惊讶程度又如何界定呢?

三、语音特征值越大,惊讶程度越高

对于词汇句法手段不好区分的惊讶程度,考察小句的语音特征是一种有效方法。情绪的声学表现一般体现在强调、节奏、语调等韵律特征上,通过基频、强度、语速等表达出来,Praat 语音分析软件可以解析上述域值。它是一款语言学研究的免费下载软件,用作基频分析、强度分析、共振峰分析、语音标注、语音数据统计分析等,功能强大、操作界面友好^[4]。

我们首先用语音编辑软件 Cool Edit Pro2 截取表示惊讶的一段语音,将截取的语音输入 Praat,点击强度分析(To Intensity),输出强度图谱(Down to Intensity Tier),再点击音高分析(To Pitch),输出频率图谱,根据图谱上标识的分贝数值和赫兹数值的大小来判定惊讶程度。需要说明的是,表达惊讶的语音特征主要有音强、音高、音色、音长等,本小节通过控制音色和音长两个变量,观察音强和音高的数值,即声音的大小和高低,分析小句表达的惊讶程度。本小节采用电影《雷雨》音频为语料。

1. 疑问句和感叹句容易附载惊讶,且惊讶程度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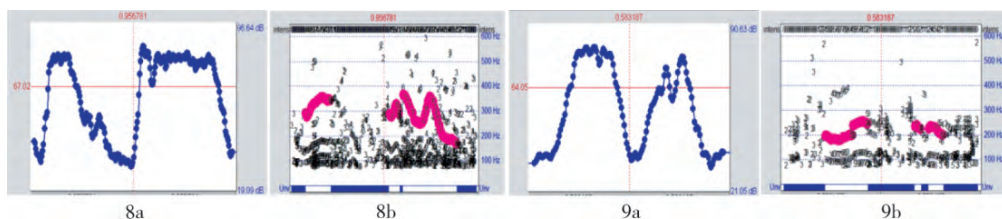
惊讶一般附着在小句上,小句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我们就从句类入手。疑问句和感叹句容易附载惊讶,陈述句和祈使句不易附载惊讶。一般来说,感叹句上的惊讶程度比疑问句的惊讶程度

高。比较例(8)和(9)。

(8) 周冲: 妈,您下楼来了!

(9) 周冲: 怎么啦,四凤?

例(8),周冲看见母亲下楼来了,觉得很突然、很吃惊,也很高兴,感叹句带上惊讶,音强约为96分贝(8a),音高约为400赫兹(8b)。例(9),周冲关窗户时,四凤“呀”地一声,他很疑惑,很惊讶,疑问句带上惊讶,音强约为90分贝(9a),音高约为300赫兹(9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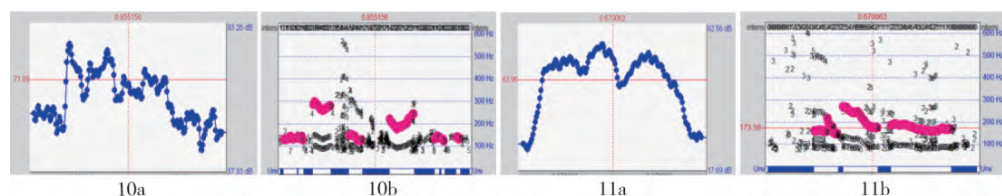


疑问句内部,如果除了疑问、惊讶之外,还带有其他情绪,那么这个疑问句的惊讶程度就高。比较例(10)和(11)。

(10) 四凤: 您看见什么?

(11) 四凤: 太太要她来?

例(10),鲁贵给四凤讲客厅发生的鬼故事,四凤完全没想到有这等事,很是惊讶,但又很疑惑,更多的是害怕,因此她问“您看见什么”时,是惊、疑和恐三种情绪的混合,音强约为93分贝(10a),音高约为320赫兹(10b)。例(11),鲁贵告诉四凤她妈妈要来,四凤很惊讶,同时充满了疑惑,她说“太太要她来”时,带有惊和疑两种情绪,音强约为90分贝(11a),音高约为280赫兹(11b)。三种情绪的惊讶程度比两种情绪的惊讶程度高。



惊讶本身是个瞬时过程,持续不过几十秒。用陈述句表达时,惊讶已经消失。如“我很惊讶”并不表达惊讶,而是在陈述有过惊讶这种心理经历,因此陈述句一般没有惊讶语气。祈使句是请求、要求、命令、劝告、叮嘱、建议别人做或不做某件事,说话人把握十足,与惊讶产生的条件相反,因此祈使句不易带惊讶语气。真正表达惊讶的,多是疑问和感叹这两种句类。

2. 问号/感叹号叠用或连用比问号/感叹号单用表达的惊讶程度高

(12) a. 他要来? aa. 他要来??

b. 他要来! bb. 他要来!!

c. 他要来?!

一般来说,“?”表示疑问,“??”表示疑问和惊讶;“!”表示感叹,“!!”表示感叹和惊讶;表示疑问、感叹和惊讶。例(12),小句的惊讶程度排序为:aa>a, bb>b, c>bb/aa。

(13) “怎么回事?! 有谱吗?! 不说好我唱吗,为什么换高跷了????!”

例(13)是个极端的例子,但能说明惊讶情绪的发展及与其他情绪的交织。“?”和“!”连用,说话人对获得信息的本能反应是惊、疑和叹;两个问号和两个感叹号连用,说话人惊、疑和叹的情绪上升,重在疑;三个问号和三个感叹号连用,说话人惊、疑和叹的情绪持续上升,重在叹。

3. 一般来说,振动频率越高,且振动幅度越大,惊讶程度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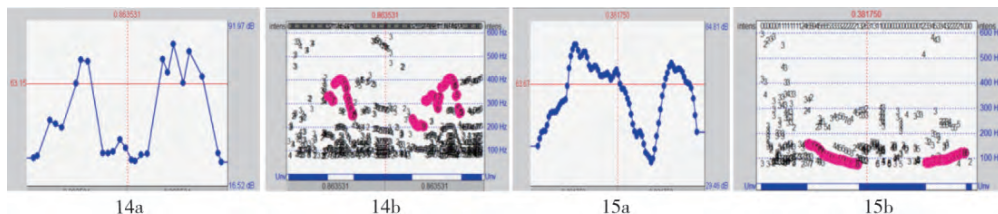
前文论证了同一个人说话时音高上升、音强增大,惊讶程度就高。这里说明不同的人对相同或类似事

件的惊讶程度不一样,有些人惊讶表现外显,有些人则含蓄。

(14) 周冲: 四风,你在这儿!

(15) 周朴园: 是你们!

例(14),周冲意外地发现四风在客厅,很惊喜。例(15),周朴园意外地发现两个儿子在客厅,很惊喜。同是惊喜,周冲表现很自然,感情毫无顾忌地外露,音强约为 91 分贝(14a),音高约为 420 赫兹(14b);周朴园本能的父爱,自然流露出惊喜,但他表达得克制些,音强约为 84 分贝(15a),音高约为 200 赫兹(15b)。根据图谱值,仍然可以说周冲的惊讶程度比周朴园高。



同一个人的惊讶程度在语音图谱上容易分出高中低三档,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的惊讶程度不一,但都可以通过分析语音数值获得。如果控制音色和音长,惊讶表达程度遵循以下规律: (音高频率大+音强振幅大) > (音高频率大+音强振幅小) 或 (音高频率小+音强振幅大) > (音高频率小+音强振幅小)。但这只是一个粗略概率,(音高频率大+音强振幅小) 和 (音高频率小+音强振幅大) 相比,哪个惊讶程度更高? 大和小都只有两个极端值,大当中的小和小当中的大之间的临界点是多少? 这些还需要进一步细化研究。

四、身态表现越夸张,惊讶程度越高

如果惊讶的表达既没有词汇,也没有声音,一定有面部表情或肢体动作;纯表情/动作表达的惊讶及其程度能够看出来。单模态识别情感中,面部表情比语音信息更准确^[1]。图像传达信息,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论^[2],到文艺界的文学图像论^[3],甚至传播学的图像传播,都说明图像能再现文本、附载大量信息,一系列图像的对比分析可以展现惊讶程度的高低。

1. 惊讶的共同图像特征

惊讶在图像上一般可以从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进行判断。面部表情包括:眼睛睁得大、嘴巴张得开、眉毛上扬、下巴拉长。肢体动作包括:用手盖住嘴巴、双手放进嘴里、双手摊开且手掌向上、耸肩、身子后退、猛地站起来或倒下去。面部表情基本上可以判断“惊”的种类或者“惊”与其他情绪组合的种类,这些是我们研究的基础。下面四张图片分别表示:人惊疑时,皱眉,睁大眼睛;人惊愕时,睁大眼睛,张开嘴巴;人惊呆时,皱眉,张开嘴巴;人惊骇时,皱眉,睁大眼睛,张开嘴巴^[4]。



2. 同一类型的惊讶,身态表现的特征越多,惊讶程度越高

以惊疑为例。一般而言,人惊疑时,身体前倾,眉头皱起或紧锁,眉毛上有凹陷,眼睛紧盯着说话人或

者信息的来源。本小节的八幅图片来自《雷雨》话剧截图。



以上图片从左到右的语境为: 图1,鲁大海惊疑。他说大少爷打了他一巴掌,是要算账的,可是母亲不准他伤害周家的人,“和周家的关系完了”,一向不是这样处事的妈妈为什么会这么说,他问“这是为什么?”图2,鲁侍萍惊疑。她很奇怪,四凤似乎不愿意跟自己一起离开这儿,转而又担心她是否与周家少爷有什么隐情,于是问“孩子,你怎么啦?”图3,周萍惊疑。四凤和鲁贵在家里安分做事,父亲突然要辞掉他们,周萍问“他们怎么啦?”图4,鲁贵惊疑。他半夜三更听到敲门声,心想:这么晚了怎么会有人来?他身体转向敲门声。比较图1和图3:鲁大海和周萍都身体前倾,眼睛盯着说话人,但图1中鲁大海面部表情比图3中周萍的更丰富,他眉头紧锁,眼睛张大,下巴拉低。图1的惊讶程度比图3高。比较图2和图4:鲁侍萍和鲁贵都眉头紧锁,眼睛盯着引起惊讶的来源,但图2中鲁侍萍身体前倾,图4中鲁贵没有,图2比图4的惊讶程度高。

3. 同一个人的面部表情越夸张,惊讶程度越高

以繁漪为例。她是周家悲剧的串线人,她面对控制不了的意外和冲突,表现出措手不及。



以上图片从左到右的语境为: 图5,周萍说要娶四凤时,繁漪惊讶,她没想到她爱的周萍要娶佣人四凤。图6,周萍一把抢过繁漪手里的信,说“你给我滚开”,她惊呆了:一向懦弱的周萍,竟然这么厌恶她。图7,周朴园宣布眼前妇人是侍萍,繁漪惊诧了:她以为侍萍早就死了的。图8,繁漪反应过来,发现眼前妇人真是侍萍时,她惊恐了。比较这四张图片中的下巴,图8中下巴拉得最低,惊讶程度最高。再比较四张图片中的眼睛,眼睛张得越大,惊讶程度越高。

五、多种模态综合分析中的惊讶程度

惊讶有程度之分,程度的高低取决于事实与说话人认知或心理预期值偏差的大小。惊讶表达有三种手段:句法形式、语音形式和身态形式。一般而言,单一形式表达惊讶程度中,身态特征最可靠,因为面对惊讶事件,面部表情、肢体动作是最本能的反应;其次为语音特征,最后为句法特征。惊讶及惊讶程度的表达往往是三种手段的综合运用,惊讶程度确定的最理想状态是综合语音、句法和身态的多模态特征,特征越明显或数量越多,惊讶程度越高。但如果不在场,就看不到身态,只表现为语音、句法形式;如果在场,语音形式和身态更直观更有效反映惊讶和惊讶程度;如果是阅读或写作一本小说,书中人物的惊讶及惊讶程度只能通过句法形式呈现。叹词表达惊讶,语音特征明显,表情和动作夸张,这是三种模态的综合体现,表

达的惊讶程度较高。面部表情表达惊讶,可能是无声的,没有语言形式;相对于有声的面部表情,有声的惊讶程度更高。不使用“惊”类词汇,仅对非“惊”用语赋予惊讶语音,语音阈值高,则惊讶程度高。

本研究结果可以为人机交互的情感识别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惊讶作为人类的基本情绪之一,在机器识别过程中,单模态情感的识别率较低、可靠性不好,计算机专家们一方面改进单模态算法提高识别效果^[3],另一方面更注重双模态混合算法,把语音和文本特征相融合^[4],或者探索语音和人脸表情双模态情感识别方法^[7],部分解决了情感误判问题。但是关于多模态算法的情感识别还在起步阶段,目前少数人工智能公司如竹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https://www.bilibili.com/>)致力于将文字、语音、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的表达综合考量,研发“多模态综合情感识别”,仍然显得比较粗糙。我们希望学术界加强情感识别的理论性研究,为其应用研究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 [1] DeLancey Scott. Still Mirative after All These Years [J]. *Linguistic Typology*, 2012(3): 529-564.
- [2] Aikhenvald Alexandra. Y: The Essence of Mirativity [J]. *Linguistic Typology*, 2012(3): 435-485.
- [3] 万光荣. 惊讶范畴: 类型学研究的新领域 [J]. *语言科学*, 2017(6): 638-647.
- [4] Wang Yufang, et al. Restrictiveness, Exclusivity, Adversativity, and Mirativity: Mandarin Chinese Zhishi as an Affective Diminutive Marker in Spoken Discourse [J]. *Chinese Language and Discourse*, 2013(4): 181-228.
- [5] 刘焱, 黄丹丹. 反预期话语标记 [J]. *语言科学*, 2015(2): 181-192.
- [6] Cristina Soriano, Johnny Fontaine, Klaus Scherer. Surprise in the GRID [A]. In Celle Agnes & Laure Lansari (eds.) *Expressing and Describing Surprise*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7: 173-196.
- [7] Li Wen, et al. Neural and Behavioral Evidence for Affective Priming from Unconsciously Perceived Emotional Facial Expressions and the Influence of Trait Anxiety [J]. *Journ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008(20): 95-107.
- [8] 屠岸. 我的惊讶与震撼 [J]. *博览群书*, 2012(1): 10-12.
- [9] 王寅, 储泽祥. “我的妈呀/我的天哪”的选择倾向及制约因素 [J]. *汉语学报*, 2011(1): 7-15.
- [10] Boersma Paul, David Weenick. Praat, a System for Doing Phonetics by Computer [DB/OL].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08032992_PRAAT_a_system_for_doing_phonetics_by_computer.
- [11] Busso Carlos, et al. Analysis of Emotion Recognition Using Facial Expressions, Speech and Multimodal Information [DB/OI].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21052478_Analysis_of_emotion_recognition_using_facial_expressions_speech_and_multimodal_information.
- [12]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 [M]. 陈嘉映,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203.
- [13] 赵宪章. 语图互仿的顺势和逆势——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3): 170-184.
- [14] Ekman Paul, Friesen Wallace. Unmasking the Face: A Guide to Recognizing Emotions from Facial Clues [M]. Los Altos, CA: Ishk, 2003: 43-45.
- [15] 朱芳枚, 等. 面向中文语音情感识别的改进栈式自编码结构 [J]. *东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4): 631-636.
- [16] 陈鹏展, 等. 基于语音信号与文本信息的双模态情感识别 [J]. *华东交通大学学报*, 2017(2): 100-104.
- [17] 闫静杰, 等. 基于人脸表情和语音的双模态情感识别 [J].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1): 60-65.

A Multimodal Analysis of the Intensity of Surprise

WAN Guangrong

Abstract: Surprise is expressed by syntactic, acoustic forms or body language. I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act and the interlocutor's cognition/expectation that leads to surprise. The greater the difference is, the higher the intensity of surprise is. The intensity of surprise is best revealed by a combined analysis of syntactic, acoustic features and features of body language. Generally speaking, the lexeme collocating with *jīng* (惊) or the adverbial modifying *jīng* (惊) before or after has a stronger denotation, then the expression has a higher degree of surprise. The bigger the value of the pitch or intensity of a voice is, the higher degree of surprise the language has. The body language, especially facial changes unveil the interlocutor's emotion; the more opened mouth, the wider opened eyes, the raised eyebrow, the lowered jaw and others bear the intensity of surprise.

Key words: intensity of surprise; multimodality; words; sounds; images

(责任编辑: 文建)

《语文研究》2012 年第 4 期 (总第 125 期)

语气助词对复句中分句语气异类组配的影响*

万光荣^{1, 2}, 储泽祥¹

(1.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2. 中南民族大学 外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语气助词是汉语语气的重要表现形式。陈述、疑问、祈使、感叹四种语气两两异类组配成二合复句时, 分句句末语气助词的句法和语义特点将影响语气组配的使用倾向性: 语气助词传信度高, 或者时间完句功能强的, 其所表达的语气在组配中的频率就高; 语气助词传疑度高, 或者对分句语气强化作用大, 或者感情完句功能强的, 其所表达的语气前置的频率就低。语气助词的特点使其所表达的语气按“前弱后强”的规律异类组配。

关键词: 语气助词; 复句; 语气; 异类组配

中图分类号: H1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79 (2012) 04-0054-05

doi: 10.3969/j.issn.1000-2979.2012.04.010

0 引言

语气助词是汉语语气的重要表现形式, 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对语气助词的研究, 不仅研究范围有大有小, 如有对单个语气助词的研究,^{[5]21-29} 有对某一句类的所有语气助词的研究,^[3] 还有对整个语气系统的语气助词的研究,^{[2], [4]1-44} 而且研究角度也多种多样, 包括对其句法、^{[11]267-277} 功能、^{[6]62-72} 来源、^{[4]69-138} 与其他语言语气助词的对比^[1]等的研究, 目前的成果已十分显著。

汉语小句都带有特定语气, 语气相同的小句组成复句, 是同类语气的组配, 语气不同的小句组成复句, 是异类语气的组配。^{[8]22-24} 对于汉语语气的组配研究, 至今仍比较薄弱。袁明军将陈述、祈使、疑问、感叹四类语气排列组合, 列出了组配的 16 种类型, 并探讨了这些类型所能表达的小句之间语义联结的类别;^[9] 朱斌、伍依兰不仅详尽描绘了 16 种语气联结表达的语义关系, 还归纳了语气联结的各种语法形式;^{[12]354-355} 曾常年就因果句群的语气组合, 探讨了 4 种同质语气和 12 种异质语气组合类型的频率, 并确定了因果句群中语气的优势和非优势组合。^{[10]45-46} 这些对语气组配模式的探讨深化了汉语语气的研究, 但都集中在描写语言现象的层面, 没有对语气组配的原因和制约语气组配的因素加以分析和解释。

只由两个分句组成, 并且句末有一个统一全句的终止性停顿、以句号/问号/感叹号收尾的复句是二合复句。^{[8]1-3} 二合复句中分句语气同类组配是主要的, 分句语气异类组配是次要的。^[7] 同类语气组配中语气助词的表现形式相对简单, 异类语气组配中分句的句末语气助词却丰富多样, 其中的典型语气助词与语气总体上构成对应关系, 如“了”“的”表达陈述语气, “吗”

“呢”表达疑问语气, “吧”表达祈使语气, “啊”表达感叹语气, 非典型语气助词的使用频率不高, 统计学意义不大。

分句语气组配关系可以影响语气助词的选择, 而语气助词的使用也可以影响分句的语气组配模式, 从而影响所在分句的前后位置。本文只关注后一种情况, 尤其是语气助词的使用对复句中异类语气组配频率的影响。鉴于此, 基于以往的研究, 本文借助语料统计, 着重探讨“了、的、吗、呢、吧、啊”等 6 个典型句末语气助词的使用对二合复句中分句语气异类组配的影响情况。文中语料, 除少数来自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 (简称 CCL) 外, 主要使用自制的 50 多万字的语料, 其中戏剧 30 万字 (曹禺《雷雨》、吴祖光《风雪夜归人》和张爱玲《情场如战场》各约 10 万字) 小说 20 万字 (钱钟书《围城》的第一、二、三、四和第九章共约 10 万字, 余华《活着》10 万字)。统计出分句句末使用语气助词的异类语气组配共 301 例。

1 语气助词的表义特点对异类语气组配的影响

1.1 语气助词的传信传疑对异类语气组配频率的影响

齐沪扬 (2002) 研究了语气助词的表义功能, 指出语气助词可以“传信”和“传疑”, 6 个语气助词呈离散状态分布在从传信到传疑的连续统中: 的、了、呢₂、啊、吧、呢₁、吗;^{[4]191} 越是往左边的语气助词, 传信度越高、传疑度越低; 越是往右边的语气助词, 传信度越低、传疑度越高。他对语气助词的语义解释很有说服力, 可以借用。我们认为, 既然“吧”主要用于祈使语气, 其次用于疑问语气, 因此“吧”也需要分成表疑问的“吧₁”和表祈使的“吧₂”, 加入到传信传疑的连续

* 本文的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项目编号: 09YJA740044) 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项目编号: 11JZD036) 的资助。感谢《语文研究》匿名审稿专家及编辑部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统中即为：的、了、呢₂、吧₂、啊、吧₁、呢₁、吗。

1.1.1 传疑度高的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前置的频率低。

将带有传信和传疑语气助词的语气分别替换在前分句时，前者大多可以接受，而后的接受度很低。如：

(1) a. 后悔没有用，谁愿意尽做没有用的事情呢？

(《风雪夜归人》)

b. 后悔没有用的了，谁愿意尽做没有用的事情呢？

c. *后悔没有用吧₁/吗，谁愿意尽做没有用的事情呢？

例(1) a中，前分句的陈述语气中没有语气助词。如果替换成由传信语气助词“的”和“了”表达的语气，句子是合法的，如例(1) b。如果替换成由传疑语气助词“吧₁”和“吗”表达的语气，则句子不合法，如例(1) c。这是因为：传信是已知信息，传疑是未知信息，而信息总是按照从已知到未知的顺序加以组织的。

传疑语气助词表达的语气，即使可用在前分句，也只能是传信成分多的“吧₁”或者“啊”，如例(2) a和b，而不能是传信成分极少的“呢₁”和完全不传信的“吗”，如例(2) c和d。

(2) a. 你找长军吧₁，他上县城了。(CCL)

b. 你是不是找长军啊，他上县城了。

c. *你为什么找长军呢₁，他上县城了。

d. *你找长军吗，他上县城了。

传疑语气助词“呢₁”和“吗”表达的语气一般不用在前分句，用在后分句却很自然。如例(1)和例(3)。

(3) 你就知道说我，你自个儿不也是光棍儿一个人吗？

(《风雪夜归人》)

另外，语气助词的传疑度越高，所在分句在语气组配中越靠后。三个或更多异类语气组配时，传疑度最高的语气助词所在的分句通常出现在句末。如：

(4) 我一听就傻了，我可不是什么名模呀，这样的演出不是欺世盗名吗？(CCL)

例(4)中有三个语气助词，第一分句用“了”，第二分句用“呀”，第三分句用“吗”。从传疑特点上看，“了”不传疑，“呀”是“啊”的变体，基本不传疑，“吗”传疑度最高，它们的组合格局是：不传疑+基本不传疑+传疑。

1.1.2 传信度高的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组配频率高。

传疑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一般只能在后分句，如例(1)，而传信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既可以在组配的前分句，也可以在组配的后分句。如：

(5) 哥总是瞎说八道的——他跟您说了什么？(《雷雨》)

(6) 爸爸，您别又穷疯了，胡说乱道的。(同上)

传信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有时可以和另一语气调换顺序，如例(7) a和b，说明它所表达的语气在位置上受限的可能性较小。

(7) a. 爹，你快躲起来，爷爷要来揍你了。(《活着》)

b. 爹，爷爷要来揍你了，你快躲起来。

传信度越高的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前置的频率

就越高。我们检验了301例二合复句，发现前分句使用语气助词的异类语气组配频率从高到低的顺序为：

陈述+疑问/祈使/感叹(83例)>祈使+陈述/疑问/感叹

(48例)>感叹+陈述/疑问/祈使(14例)>疑问+陈述/

祈使/感叹(3例)。分析后可以得知，这个顺序其实是

语气助词传信度从高到低的顺序：表陈述的语气助词“了”“的”“呢₂”传信度最高，在前分句的使用频率最

高；表疑问的语气助词“吗”“吧₁”“呢₁”传信度最低，在前分句的使用频率最低。

传信语气助词表达的语气在后分句的使用频率也较高，和传疑语气助词在后分句的使用频率基本持平。

在301例语气助词的异类语气组配中，后分句使用传

信语气助词的有100例：疑问/祈使/感叹+陈述(49例)

>陈述/疑问/感叹+祈使(33例)>陈述/疑问/祈使+感

叹(18例)，使用传疑语气助词的有101例：陈述+疑

问(81例)>祈使+疑问(10例)>感叹+疑问(10例)。

1.2 语气助词的弱化强化对异类语气组配的影响

大多语气助词对所在小句的语气可以起到强化作

用，如陈述语气助词“了”“的”可以加强肯定程度，

疑问语气助词“吗”“呢₁”可以加强疑问程度，感叹

语气助词“啊”可以加强感叹程度，这些语气助词具有强化小句语气

的功能，属于强化语气助词，而祈使语气助词“吧₂”具有缓和祈使的功能，属于弱化语气助词。

(8) a. 养孩子的效率会与众不同？(《围城》)

b. 养孩子的效率会与众不同吗？

(9) a. 韩太太真丑！(《围城》)

b. 韩太太真丑啊！

(10) a. 姑妈方面，我自然会解释。(《围城》)

b. 姑妈方面，我自然会解释的。

(11) a. 快回来。(《围城》)

b. 快回来吧₂。

语气助词加强语气程度的大小，可以根据听话人的反馈来判断。如果听话人必须对说话人的话语做出

反应，表明语气程度较大；如果听话人不必做出反应，表明语气程度较小。如例(8) a可以是自问自答，但

例(8) b是向听话人询问，要求给出答案。这就是说，

“吗”的使用加强了疑问，而且使疑问程度达到了最大。例(11) a是一种命令，听话人必须执行，例(11) b

是一种建议或乞求，听话人不一定执行。这就是说，“吧₂”的使用弱化了祈使语气。语气助词按照加强语

气作用的大小可以依序排列为：吗>呢₁>吧₁>啊、呢₂、了、的>吧₂，即越往左，语气助词的强化功能越强；越往右，语气助词的弱化功能越强。

1.2.1 弱化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在组配中的前置频率高。

考察发现，越是能弱化语气的语气助词，其后才越可以用逗号，这为其所表达的语气在组配中前置创造了条件。祈使句中的“吧₂”表建议、劝阻语气，比

命令、禁止的语气弱化，前者句末通常用逗号，后面紧跟一个分句，构成因果后因的异类语气组配，如例

(12),而后者虽说句末没有语气助词,但因命令、禁止语气强烈,句末几乎不能用逗号,只能用感叹号,因而与后分句构成的是句群,如例(13)。就疑问语气而言,“吗”的疑问语气最强,后面多用问号,与后分句构成句群,如例(14);“呢₁”和“吧₁”的疑问语气较弱,后面可以用逗号,如例(15)。

(12) 好,你走吧₂,我也想睡了。(《雷雨》)

(13) 别胡说! 怎么是偷的?(《围城》)

(14) 看清楚了吗? 这可都是你签字画押的。(《活着》)

(15) 这样不好吧₁, 害了人家一辈子。(CCL)

同一语气助词,弱化语气的功能越强,见于前分句的频率就越高。“吧₁”表疑问,强化语气,“吧₂”表祈使,弱化语气,因而“吧₂”表达的语气前置的频率(共14例)高于“吧₁”前置的频率(0例)。同理,“呢₁”表疑问,强化疑问语气,“呢₂”用在陈述语气中表夸张,强化陈述语气,但两者相比,前者比后者更强化,也就是说后者弱化成分多些。我们自制的语料显示,它们在前分句的使用频率都较低:“呢₂”1例,“呢₁”0例。在CCL中我们也只找到“呢₂”在前分句的用例,没找到“呢₁”在前分句的用例。

(16) 全世界除了闹灾荒,剩下的人就都在闹离婚呢₂,多么幼稚的人们啊!(CCL)

(17) 我还摸不着头脑呢₂,能写出来吗?(同上)

弱化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在异类组配中也可以后置,但通常情况下,弱化语气助词后置时,前分句不再有语气助词。如:

(18) 那,那我也不知道,你来说吧₂!(《雷雨》)

弱化语气助词前置的频率高于强化语气前置的频率,这符合人类情绪的发展规律:先是缓和的语气,随着情绪的高涨,这种缓和的语气慢慢加强,达到顶峰;一旦语气特别强烈,到达顶峰之后,相应的话语就终结了,这种强烈的语气就成了最后位置。

1.2.2 强化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在组配中的后置频率高。

强化语气的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不能靠前,如例(2)c和d,而是通常居后,如例(1)a和(3)。我们的语料也显示:异类语气组配中,前分句无语气助词、后分句有语气助词的用例共153例,用得最多的语气助词是最具强化功能的“吗”(40例),其他强化疑问语气的语气助词为“呢₁”(8例)和“吧₁”(4例),但因为它们强化功能不如“吗”强大,因而频率低些,这说明语气助词的强化功能越大,所表达的语气越容易在语气组配中后置。

两个或多个语气助词出现在语气组配中时,强化功能大的语气助词往往出现在后分句。如:

(19) 人家有王寿南的儿子了,还要你吗?(《情场如战场》)

(20) 你说得对极了,干这行是真苦啊。(《风雪夜归人》)例(19)中“吗”的强化功能大于“了”,因而出现在“了”之后;例(20)中“啊”的强化功能大于“了”,

因而出现在“了”之后。齐沪扬的观点也印证了这一点:“如果句子中有两个句末语气助词,一般来说表示疑问和感叹语气的语气助词居末。”^{[4]158}但是,表疑问和感叹的语气助词同现时,疑问语气助词因为强化作用大而居后,如例(21)。最有说服力的是两个“啊”在“感叹+疑问”组配中同现时,表感叹的“啊”在前,表疑问的“啊”在后,顺序不能颠倒,如例(22)。

(21) 多聪明的一句话啊,此话难道不耐人寻味吗?(CCL)

(22) 多好的工人啊,这可咋办啊? (同上)

2 语气助词的句法特点对异类语气组配的影响

2.1 语气助词的完句功能对异类语气组配的影响

一个不能独立的句子,通过添加句末语气助词,成了独立的句子,说明语气助词具有完句功能。如:

(1) a. *他又上这儿来。

b. 他又上这儿来了。(《情场如战场》)

(2) a. ? 莲生你十点钟还有事情。/?

b. 莲生你十点钟还有事情吧? (《风雪夜归人》)

语气助词的完句功能有两种:时间完句功能和感情完句功能。如例(1)a不自足,添加语气助词“了”后,成了自足的例(1)b。“了”的这种完句功能与时间因素有关,表现动作在时间上的变化,称为语气助词的时间完句功能。例(2)a自足性较差,即使勉强接受,也存在两解:一为祈使,告诉听话人还有事情要做,句末用句号;一为疑问,询问听话人是否还有事情要做,句末为问号。而例(2)b添加了语气助词“吧”,不仅句子自足了,语气也变得单一,表疑问。“吧”的这种完句功能表明了说话人对说话内容的一种估计态度或感情,称为语气助词的感情完句功能。

齐沪扬认为时间完句功能的语气助词有“了、呢、的、吧”,感情完句功能的语气助词有“呢(夸张)、吧(揣测)、啊、(啦、哪、噢)”。^{[4]202-204}我们通过分析认为,语气助词都有感情完句功能,不过程度不同:“了”的时间完句功能最强,感情完句功能最弱;“呢₁”“的”“吧₂”的感情完句功能较“了”强;“呢₂”“吧₁”“啊”的感情完句功能最大,时间完句功能最弱。

(3) 走得慢吞吞的,怕我们听见,是不是?(《围城》)

(4) 你说吧₂,你预备怎么样呢?(《雷雨》)

例(3)中“的”针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主要起时间完句功能,同时还表达对动作行为的肯定,具有感情完句功能。例(4)中“吧₂”减缓了祈使语气,体现了对听话人的尊重,“呢”表达了对听话人的关切,它们的主要功能是感情完句。

2.1.1 时间完句功能强的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组配频率高。

在我们的语料中,时间完句功能最强的“了”,在前分句的有93例,后分句的有66例,其表现的语气在组配中频率最高;时间完句功能居中的“吧₂”,在前分句的有25例,后分句的有29例,其组配频率居中;时间完句功能最弱的“啊”,在前分句的有10例,后

分句的有 15 例，其组配频率最低。

当多个语气助词共现时，时间完句功能越强的语气助词，表现的语气越是靠前。如：

(5) 去年毕业了，你呢₁? (《情场如战场》)

(6) 同志们，山上不能停留，坐下去就起不来了，不活动就会冻僵的，加油啊! (CCL)

例(5)中语气助词“了”的时间完句功能强于“呢₁”，所以“了”所在的分句在前，“呢₁”所在的分句在后。例(6)中三个语气助词“了、的、啊”也是按照时间完句功能的强弱依次排列的。

具有时间完句功能的语气助词所表现的语气置后时，前分句一般没有语气助词，如例(7)。即使有，也是表示弱化语气的“吧₂”“啊”，如例(8)，此时两个分句可以调换顺序。

(7) 我好心交个朋友，难道又是我错了? (《风雪夜归人》)

(8) 听爸爸的话吧₂，爸爸的脾气你是知道的。(《雷雨》)

2.1.2 感情完句功能强的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在组配中一般置后。

使用具有感情完句功能的语气助词，既是句子自足的需要，更是表达感情的需要。感情越强烈，感情完句功能强的语气助词越倾向于出现在组配的后分句。如：

(9) 一件事做错了，你难道不后悔吗? (《风雪夜归人》)

(10) 你们给我找啊，我的大儿子呢₁? (《雷雨》)

两个语气助词连用时的感情完句功能比单用时表达的感情更强，连用的语气助词所在的分句同样居后。如：

(11) a. 听说你们中间党员不少啊，公开了吗? (CCL)

b. 听说你们中间党员不少啊，公开了?

(12) a. 咱们先走吧₂，没看见爸爸正忙着呢₁吗? (同上)

b. 咱们先走吧₂，没看见爸爸正忙着吗?

例(11)和(12)的 a 的后分句都是两个语气助词连用，其疑问语气都比 b 强烈。在特定语境中，b 中的两个分句可以换位，但 a 中的两个分句无论如何都不能换位，语气助词连用的分句必须居后。

语气助词和语气副词或/和特定表达语气的句式连用时，表达的语气或感情也相当强烈，承载语气的分句也往往是在后位。如：

(13) a. 我们的事你不懂，就别再操心了。(《雷雨》)

b. 我们的事你不懂，别操心了!

c. ? 就别再操心了，我们的事你不懂。

d. 别操心了，我们的事你不懂。

例(13) a 中使用了语气助词“了”，同一分句里还有副词“就”和“再”，祈使的语气或感情较 b 要强得多，传达了说话人非常厌烦的情绪，即强烈要求听话人不要“操心”。因此，带有祈使感情完句功能的语气助词在后位。如果祈使语气置前，句子的接受度就会大大降低，如(13) c。比较而言，没有语气副词的(13) b，只用了语气助词“了”，就能较自然地出现在组配的前分句。

2.2 语气助词的单用和配对使用对异类语气组配

的影响

语气助词在小句中可以单用，也可以连用。^{[13]208-209}在二合复句中，只出现一个语气助词，并且在分句末的，是语气助词的单用；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气助词，并且一起置于分句句末的，是语气助词的连用；几个语气助词分别位于不同分句句末，各自传达所在分句语气的，是语气助词的配对使用。如：

(14) 别走，话还没完呢₂。(《雷雨》)

(15) 您留几句回家说吧₂，这是人家周公馆。(同上)

(16) 凤霞死了也有些日子了，能忘就忘掉她吧₂。(《活着》)

(17) 急坏了，咱们心里不就消停了吗? (CCL)

例(14)和(15)都是语气助词的单用，例(14)中的语气助词在后分句，例(15)中的语气助词在前分句。例(16)和(17)都是语气助词的配对使用，例(16)中每个分句末都只有一个语气助词，例(17)中前分句是语气助词的单用，后分句是语气助词的连用。

2.2.1 单用的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组配频率高。

单用的语气助词在语气组配的前后位置都大量存在，但是居后位的多于居前位的，在我们的语料中的使用频率是：前分句无、后分句有语气助词的用例 153 个，前分句有、后分句无语气助词的用例 100 个。在 153 个置后的语气助词中，“吗”“呢₁”“吧₁”共 74 例，“吧₂”14 例，“啊”11 例，“了”和“的”共 54 例，疑问语气助词置后的用例最多。在 100 个置前的语气助词中，“了”和“的”共 79 例，“吧₂”14 例，“啊”6 例，“吗”“呢₁”“吧₁”共有 1 例，陈述语气助词置前的用例最多。

2.2.2 语气助词的配对使用顺序对异类语气组配频率的影响。

表 1 语气助词的配对使用对异类语气组配的选择

语气助词所在位置		异类语气组配及频率
前分句	后分句	
了 (24 例)	了	陈述+祈使 2、陈述+感叹 1、祈使+陈述 2
	的	祈使+陈述 2
	吗	陈述+疑问 6、感叹+疑问 1
	吧	陈述+疑问 1、陈述+祈使 5
	呢	陈述+疑问 1
	啊	陈述+疑问 1、陈述+祈使 2
的 (7 例)	吗	陈述+疑问 1
	了	陈述+疑问 2、祈使+疑问 1、疑问+陈述 1
	吧	陈述+祈使 1、感叹+疑问 1
吗 (1 例)	啊	疑问+陈述 1
呢 ₂ (8 例)	了	祈使+陈述 7
	的	陈述+疑问 1
吧 ₂ (4 例)	呢	祈使+陈述 1、祈使+疑问 1
	的	祈使+陈述 2
啊 (4 例)	吗	陈述+疑问 1
	了	祈使+陈述 1、感叹+陈述 1
	呢	祈使+疑问 1

从上表可以看出，语气助词配对使用时，表示陈

述的语气助词置前的用例最多。当“了”在前时，6个语气助词都可以与之组配，使用频率最高，其中，“了……吗”“了……吧”配对使用频率相对较高，表达的语气更容易形成相应的组配模式。具体而言，就是“了”表陈述，“吗”表疑问，“吧₂”表祈使，“陈述+疑问”“陈述+祈使”的组配模式使用频率相对较高。“吧₂”“啊”“呢₂”表达的祈使或感叹的语气在前后分句的频率大致相同，“吗”“吧₁”“呢₁”表达的疑问语气通常在后分句。表中的数据还显示，配对语气助词表达的语气遵循着“前弱后强”的规律，也就是说，后面分句的语气程度强于前面的分句。

异类语气组配没有遵循上述规律的，分句的顺序基本可以调换，使语气按“前弱后强”的规律在复句中组配。如：

(18) a. 您留着自己用吧₂，我走了。(《雷雨》)

b. 我走了，您留着自己用吧₂。

(19) a. 好热的天啊，别热着了。(CCL)

b. 别热着了，好热的天啊。

同一语气助词可以表达多种语气意义时，前分句一般表陈述，只有少数表祈使或感叹，后分句多表疑问。如：

(20) 我早饱了，今天菜太丰盛了！(《围城》)

(21) 你太贫了，你是不是喝多了？(CCL)

例(20)(21)中前后分句都使用了语气助词“了”，但例(20)中前一个“了”表陈述，后一个“了”表感叹；例(21)中前一个“了”表感叹，后一个“了”表疑问。同样，上节例(22)中的前后两个语气助词“啊”，前一个“啊”表感叹，后一个“啊”表疑问。

语气助词的这种配对顺序显示了它们所表现的语气在301例异类语气组配中的使用倾向性：“陈述”在前的组配(187例) > “祈使”在前的组配(78例) > “感叹”在前的组配(31例) > “疑问”在前的组配(5例)。

3 结论与余论

汉语复句中，当分句语气异类组配时，语气助词发挥着一定的影响作用。6个典型句末语气助词的句法语义特点呈连续性状态。从传信度来看，6个典型句末语气助词从高到低可以排列为：的、了>呢₂>吧₂>啊>吧₁>呢₁>吗；从强化分句语气的作用角度看，6个典型句末语气助词从大到小可以排列为：吗>呢₁>吧₁>啊、呢₂、了、的>吧₂；从时间完句功能（同时也是感情完句功能）角度看，6个典型句末语气助词从强到弱可以排列为：了>呢₁、的、吧₂>呢₂、吧₁>啊。总的来说，语气助词“了”“的”“呢₂”的传信度、强化分句语气的作用及时间完句功能都在最前面，“吧₂”“啊”为其次，“吗”“吧₁”“呢₁”在最后面。传信度高、能弱化分句语气、时间完句功能强的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在异类组配时频率高，传疑度高、能强化分句语气、感情完句功能强的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置前频率低。语气助词位置使用的倾向性导致了它们

所表达的语气在组配使用上的倾向性：“陈述”在前的组配>“祈使”在前的组配>“感叹”在前的组配>“疑问”在前的组配，使异类语气按“前弱后强”的规律组配。

以上我们讨论了影响异类语气组配的语气助词的两个语义因素和两个句法因素，这几个因素可以单独起作用，也可以共同起作用，共同起作用时更能显示语气助词在异类语气组配中的影响作用。

应该说明的是，复句中分句异类语气按“前弱后强”的规律组配，只是总体上的、倾向性明显的规律，也有例外：

(22) 你怎么不想好了呀，等会吧₂！(CCL)

(23) 你身体到底吃得消吗？不行就回来吧₂。(同上)

例(22)中连用的语气助词“了呀”表达的语气强于单用的语气助词“吧₂”；例(23)中“吗”与副词“到底”一起加强了疑问语气，“吧₂”弱化了祈使语气。它们都违反了“前弱后强”的语气组配规律。这些反例恰恰说明：影响分句语气异类组配的因素多种多样，不仅仅是语气助词在起作用，还包括语气自身的特点、复句的语义关系、关联标记的位置、分句主语的缺省、语体、主观性、象似性等因素的影响。语气助词在这些因素中究竟有多重要的作用，尚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戴昭铭. 汉语语气助词的类型学价值[J]. 汉藏语学报, 2010(4).
- [2]贺阳. 试论汉语书面语的语气系统[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2(5).
- [3]陆俭明. 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助词[J]. 中国语文, 1984(5).
- [4]齐沪扬. 语气词与语气系统[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 [5]邵敬敏. 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 [6]孙汝建. 语气和语气助词研究[D]. 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98.
- [7]万光荣, 储泽祥. 现代汉语二合复句中分句语气异类组配的倾向性研究[J]. 华文教学与研究, 2011(4).
- [8]邢福义. 汉语复句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9]袁明军. 小句的语气类型与小句之间语义联结类别的关系[J]. 汉语学习, 2006(3).
- [10]曾常年. 现代汉语因果句群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3.
- [11]张谊生. 现代汉语虚词[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12]朱斌, 伍依兰. 现代汉语小句类型联结研究[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13]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责任编辑 刘 敏)

4.2.27 万光荣. 英汉主从同时复句的比较研究,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1 (1)

英汉主从同时复句的比较研究

万光荣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同时复句细分为点与点的同时、点与段的的同时、段与段的的同时,同时关系在整个时间系统中的特殊性在于它比前时、后时的语言表达更加复杂多样。英汉同时复句都以带从属关联标记 *when* 或“(当)……(的)时”的从属形式为主要表达形式。英汉同时复句也采用复合形式:英语用连词 *and*;汉语用连词“而”或者并置两个无连接标记的分句。英语同时复句中时间从句可在前可在后,汉语时间分句往往前置。制约分句语序的因素主要有六个:整句平衡美感、信息组织结构、分句间逻辑语义关系、语篇连贯性、大脑加工信息难易度、语言与认知的象似性,它们的竞争与合作形成同时复句中分句间的顺序。

关键词: 同时复句;比较研究;*when*;“(当)……(的)时(候)”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76(2021)01-0015-05

Abstract: Simultaneity in a complex or composite clause is divided into that of point-to-point, point-to-period and period-to-period. To express simultaneity,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use subordination as a major way and coordination as a minor way. In subordination, the English conjunction “when” and Chinese “(当 *dang*)… (的 *de*) shi (候 *hou*)” are frequently used. In coordination, the English conjunction “and” and Chinese “*er*” are used. The subordinate clause can stand at the beginning or end of a simultaneous complex sentence in English while the temporal clause generally appears at the beginning of a simultaneous composite sentence in Chinese. This order is determined by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of six factors, namely, preference of a balanced sentence, principle of the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logical relation of clauses, coherence and cohesion of a discourse, difficulty of processing information by the human brain, and iconicity of language and cognition.

Key words: simultaneous temporal clauses; comparative study; *when*; “(*dang*)… (*de*) shi (*hou*)”

DOI:10.16362/j.cnki.cn61-1457/h.2021.01.004

1. 引言

时间是人类的基本概念,用来描述物质运动或事件发生的过程,每种语言都有相应的时间表达法。句中任意两个时间,或者一前一后,或者同时,两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情用分句表达出来,构成时间复句,分为同时、前时、后时和永时四类(黎锦熙 1998)。一般来说,用先发生事情说明后发生事情的时间的句子叫前时复句;用后发生事情说明先发生事情的时间的句子叫后时复句;以一事说明另一事时间的句子叫同时复句,即只要两个事件在时间域中有重合的部分,就是同时复句,带有时间标记的分句叫时间分句。与前时复句和后时复句相比,同时复句的表达更加复杂多样。不同语言本族语者潜意识中对时间信息表达方式不同(何清强 2020: 10)。英语中前时复句常用连词 *before*, 后时复句常用连词 *after*, *till/until*; 汉语中前时复句常用“在……之前”, 后时复句主要使用“在……之后”。英语同时复句使用连词 *when/whenever*, *while*, *as*, *as soon as* 等,还可使用 *the instant*, *the moment*, *directly*, *immediately* 等特殊连词; 汉语同时复句主要使用连词“当……的时候”“当”“时”以及

“刚”“一”“正”“恰好”和与之匹配的“便”“就”。

同时复句的已有研究集中在形式标记上,如: *when* 的多义性(Declerck 1997)、*when* 和 *while* 的区别与联系(Vega *et al.* 2007)、表达同时关系时“正”出现的位置(王志 1998)、“当”的语法化(王耿 2014)、“时”的语法化(江蓝生 2002)、“的时候”的意义和作用(黄敏 1999)、“正在 VP1, VP2”句式特点(龚琼芳 2018),等等。还有研究聚焦复句内两个分句的语序,如: *when* 从句可位于复句的前、后分句(Quirk *et al.* 1985)、“当……的时候”“……时候”“……之时”分句只能居前(陈春华 2004)。也有研究探讨古汉语中同时复句的特点和功能(匡鹏飞 2010)、古代汉语“当 X 时”结构(王耿 2014)等。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考察同时复句,构拟同时复句的基本概貌,但仍有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同时复句表达哪些具体的语义关系? 从属和复合形式是否为英汉语同时复句的主要表达形式? 复句内分句的优势语序是什么? 这些语序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 本文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2. 英汉同时复句表达的语义关系

同时性是指事件发生在时间上没有先后之分,即两

个事件在时间域中有重合部分。根据没有“先后之分”的时间长短以及动作的重复性和时序性,可分为点与点的同时、点与段的同时、段与段的同时。英汉两种语言表达同时语义关系存在较多共性。

2.1 点与点的同时

两个分句表达的事件同时发生,而且是一次性、短时的,称之为点与点的同时。句中两个动词都是非延续性动词,两个事件同时发生,瞬间存在,又同时消失。如:

(1)a. I saw him yesterday when he came out of the church.

b. 他昨天从教堂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他了。^①

例(1b)是例(1a)的中文翻译。came out of、saw、“出来”“看见”都是非持续性动词,表明这两个事件同时发生、不持续、不重复,在一个时间点上重合。

2.2 点与段的同时

甲事件发生在乙事件的过程之中,通常情况下,甲事件无延续性或只有较短的延续性,使用非持续性动词,停留在一个时间点,乙事件具有延续性,使用持续性动词,持续一个时间段。甲事件的时间点与乙事件的时间段中的某一点重合,称为点与段的同时。英语同时复句中,表达甲事件的动词用非进行体,表达乙事件的动词可用进行体或非进行体,连词可用 while、when、as。汉语同时复句中,连词多用“(正/当)……的时候”。如:

(2)a. They arrived while we were having dinner.

b. 他们来时,我们正在吃饭。(《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第四版)

例(2b)是例(2a)的中文翻译。arrived、“到达”是非持续性动词,表达的事件发生在某一个时间点上,we were having dinner、“在吃饭”是一个持续性动词的进行体,表达的事件持续在一个时间段上,arrived 发生在 were having dinner 之中,二者在时间域中有短暂重合,但 arrived 结束时,we were having dinner 还会持续。

2.3 段与段的同时

两个分句表达的事件同时发生,都有延续性,而且延续时间大致相等,称为段与段的同时。句中两个动词都是持续性动词,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发生。英语用时态标记和连词 when、while 等,汉语用“(正)(当)……(的)时(候)”,或者使用对照式并列复句。如:

(3)a. I was cooking the dinner while he was playing the piano.

b. 我在做饭时,他在弹钢琴。

c. 我做饭,他弹琴。

例(3b)、例(3c)都是例(3a)的中文翻译。was cooking(在做饭)、was playing(在弹钢琴)都是两个持续性动词的进行体,都在一段持续的时间域中重合。译文(3b)带有同时性的标记词“时”,译文(3c)则用对照式复句,都能传达原文中“做饭”“弹琴”两个事件的同时性。

值得注意的是,英汉同时关系在实际运用中都是相

对的。两个事件可能完全同时发生,也可能是其中一个稍早,然后两个事件同时持续,在时间域中重合,直至结束,所以本文仍然理解为同时关系。如:

(4)a. 黄灯亮时,门开启。(Door opens when yellow light glistens.)

b. 红灯亮时,门故障。(Door malfunctions when red light glistens.)

例(4)为地铁提示语。例(4a)中,黄灯先亮,门随后开启,这时,黄灯仍然在闪烁。黄灯亮起,是为了给乘客信号,但实际上,两个动作在时间域中有重合。例(4b)中,门有故障,智能系统识别之后就发出红灯信号,故障的状态在持续,而红灯也继续在亮,是同时关系。

3. 英汉同时复句语法表达形式的多样性和互补性

英汉同时复句有从属和复合两种语法表达形式,绝大多数“以一事为另一事的时间背景,就是说拿甲事来指乙事发生的时间”(吕叔湘 1982:370),这种从属关系理所当然由从属形式表达。因此,同时复句主要表现为从属形式,其次为复合形式,再次为其他特殊表现形式。

3.1 从属形式的典型标记

英语同时复句的典型表达形式是用连词 when 引导时间状语从句,修饰主句,二者构成主从复合句。有时为了突出强调从句中动作发生的时间,when 前面可以添加介词短语 at the time/break/moment 等,译为“正在……(的时候)”;甚至还可以在介词短语之前加上程度副词 exactly、just 等,形成 exactly/just at the time/moment when,强调两个事件高度同时,译为“正在/就在……时”。如:

(5) Please take your rings off when you work with food by hand. (当你用手操作食物时,请把戒指摘下来。)(美国国家语料库)

(6) The officers were seeking to prevent that at the time when the assault took place. (在袭击发生时,警官们正在设法阻止那种情况的发生。)(英国国家语料库)

(7) It happened just at the time when the Tuscan peasants were abandoning their land to go and work in the factories. (就在托斯卡纳农民弃地去工厂打工的时候,那件事情发生了。)(英国国家语料库)

例(5)中,when 引导后置的时间状语从句,是典型的英语同时复句表达。主句中的非延续性动词 take off 发生在从句中的延续性动词 work 过程中,二者几乎同时发生,是点与段的同时。例(6)和例(7)中,在后置的时间状语从句引导词 when 前增加了强调同时的表达 just at the time,根据动词的时态标记和意义,可以判断:例(6)表达点与段的同时,例(7)表达点与点的同时。

汉语界普遍认为“(当)……(的)时(候)”是同时复句的代表性标记^②。“当……的时候”所在分句说明另一分句发生的时间,“当……的时候”所在分句相当于英

语复合句中的时间状语从句,另一分句相当于主句。“当……(的)时(候)”前面可以添加副词“正”“每”。“正/每当……(的)时(候)”与英语 at the time when... 的用法和意义接近,表示强调。如:

(8)当孔雀忘乎所以开屏炫耀羽毛的时候,身体上最污秽的部位也就一览无遗了。

(9)正当大家撤离水库休息的时候,又突然发现坝基底部有松软的泥沙层。

(10)每当我一闻见花香,无论是清新的,还是浓烈的,都很舒服。(以上三例均来自华中师范大学汉语复句语料库)

例(8)表示“开屏”和“一览”同时发生,“开屏”是为了说明“一览”发生的时间,孔雀“开屏”时会有人“看见”,“开屏”多长时间,观众就可以“一览”多长时间,“开屏”结束,“一览”也就结束。例(9)中“正当……的时候”分句中的动作是一次性行为,而例(10)中“每当……(的时候)”表示多次重复的行为。与英语不同的是,“正当……(的)时(候)”“每当……(的)时(候)”前面不能再增加任何副词。

3.2 复合形式的典型标记

英语中 and 连接两个分句,形式上是并列关系,实际上是同时关系。与 and 表示纯粹并列关系不同,同时关系一般要满足两个条件:两个事件在语义上具有反义性,在时间上存在同时性。如:

(11)a. The phony war has finished and the real referendum campaign has begun. (D'Souza & Ng 2013: 922)

b. 冷战已经结束,真正公投运动已经开始。

例(11b)是例(11a)的汉译。has finished(已经结束)和 has begun(已经开始)是反义关系,一个动作的结束和另一个动作的开始在时间域中有短暂重合,因此“结束”和“开始”同时发生。

汉语中也有复合形式表达同时关系,典型标记是“而”,与 and 一样,连接两个相反事件且具有同时关系,如例(12a)。汉语比英语还多两种情况:一是还可以使用副词“却”,放在后分句的主语之后,除了表达同时,还兼有对照,如例(12b);二是配套使用“而”和“却”,分别放在后分句主语的前后,如例(12c)。

(12)a. 座位发出啪啦啪啦的声响,领座员朝客人们鞠躬,而他在一边温和殷勤地看着。

b. 我在向左走,你却在坐电梯。

c. 我在向左走,而你却在坐电梯。(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

汉语同时复句的复合形式也可以是无连接标记的两个并置小句。英语分句之间通常必须有连词,没有连词的两个小句是两个单句,二者构成一个句群而非复句。汉语两个分句意合,两个事件同时发生,但也必须满足两个事件是反义或对照关系且存在同时性,如例(13);或者两个事件是并列关系且存在同时性,如例

(14)。

(13)王老师教一班语文,何老师教二班语文。

(14)一大早,妈妈在厨房炖肉,爸爸在室外劈柴。

3.3 同时复句表达形式的互补性

从属形式和复合形式在有些情况下也可以互换,体现了语言表达概念的手段多样性,但一般可以形成互补关系,共同表达同时关系。在从属形式内部,多个从属连词之间也形成互补,一起表达同时关系。英语同时复句常见的连词有 when、while、as,表达的侧重点不同:when 多用来表达点与段的的同时,while 强调同时发生的两个事件持续时间较长,多用于表达段与段的的同时;as 强调两个动作行为碰巧同时发生,多用来表达点与点的的同时。如:

(15)His wife and two kids were forced to lodge with friends while they searched for new digs. (他们寻找新的地块时,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被迫住在朋友家里。)(英国国家语料库)

(16)I saw Peter as I was getting off the bus. (我下公共汽车的时候看见了彼得。)(《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第四版)

例(15)中,lodge、search 两个动作同时发生、同时延续;例(16)中,saw、getting off the bus 表示瞬间发生的两个同时事件。

汉语同时复句中“(当)……(的)时(候)”的各种变体形成互补分布:在时间分句之首,使用“当 A,(就)B”格式;在时间分句之后,使用“A 时,B”格式;分置在时间分句的首尾,使用“当 A 的时候,B”格式(王绶 1985)。除了常用标记“当……的时候”,还有“正(在)VP1,VP2”结构,通常包含“忽然、突然、蓦地”等表示意外的词语(王志 1998;龚琼芳 2018),这些关联标记互补使用的时候多,互换使用的时候少。如:

(17)大家正谈得兴高采烈,忽然棉布门帘被撩开了,伸进一个年轻姑娘的头来。(马烽《结婚现场会》)

英语同时复句的关联标记还可以由连词 as soon as、名词短语 the instant、the moment 或副词 directly、immediately 充当,都表示复句中的两个事件紧密相连,间隔极小,译为汉语的“一……就……”,属于其他词类扩展充当同时复句的连词。如:

(18)As soon as she entered the room, she knew there was something wrong. (她一踏进房间就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了。)

(19)Jen burst out laughing the instant she walked in. (她一走进来,珍就大笑起来。)

(20)I came directly I got your message. (我一得到你的消息就来了。)

(21)Immediately you begin to speak, he gives you his full attention. (你一开始说话,他就会全神贯注地听。)(以上四例均来自《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第四版)

汉语中名词短语和副词不能充当连词,不能出现在

同时复句中。“一……就……”构成紧缩句,表示两个事件在时间域中重合,几乎同时发生,除了逻辑上的条件关系之外,还有时间上的同时关系。部分复句可以看作同时关系,属于其他语义关系扩展充当同时关系。如:

(22) 父母如果心一软,一迁就,事情就进行不下去了。(华中师范大学汉语复句语料库)

4. 英汉同时复句中分句的语序及其制约条件

如果两个物质同时运动,或者两个事件同时发生,用于表达这种同时关系的分句该如何排序? 英汉同时复句是否存在相同理据? 下面将进行对比探讨。

4.1 英汉同时复句中分句的优势语序

4.1.1 英汉同时复句中分句的不同优势语序

英语时间从句在前在后都是常态,汉语时间从句严格控制在前分句。跨语言研究结果显示,时间从句主要有两个位置:前后均可和只能在前。汉语时间分句通常只能前置,英语时间分句前后均可(Diessel 2005)。但细究起来,英语 when 从句在前分句的使用频率略少于在后分句。Diessel(1996)统计了英语时间从属连词的出现频率,when 从句在前分句 52 例,占比 45%,后分句 65 例,占比 55%。陈春华(2004)统计了英汉语时间分句的语序:when 从句在前、后分句分别有 15 例、35 例,分别占 30%、70%;汉语中时间分句前置 49 例,占 98%,后置 1 例,占 2%。

4.1.2 英汉同时复句中分句位置存在差异的语言类型解释

Diessel(2005)调查分析了 40 种语言之后指出:OV 语言中,时间分句在前,标记词通常在时间分句句尾;VO 语言或者极少数 OV 语言中,时间分句在前、后都常见,标记词位于时间分句句首;这两种情况各占一半。英语是 VO 语言,同时复句中时间分句在前、后都很普遍,连词在分句句首,符合上述规律。但是,汉语同时复句内分句语序不完全符合这条规律。时间分句在前,标记词可在时间分句句首,也可在句尾。“当……(的)时(候)”是汉语同时复句的典型标记,“当”和“(的)时(候)”分别位于分句的首尾;若“当”省略,则“(的)时(候)”不能省略,且“(的)时(候)”位于分句句尾;若“(的)时(候)”省略,则“当”不能省略,且“当”位于时间分句句首。

汉语时间分句在前,但汉语主要是 VO 语言,与 Diessel(2005)总结的语言共性不一致。现有研究表明,汉语(及其大多数方言)是 VO 和 OV 并存的语言(方言),但以 VO 型为主。桥本万太郎(2008)认为中国南部的汉语以 VO 结构为主,北部的汉语以 OV 结构为主。刘丹青(2013)在语料中发现,吴闽方言是最弱的 VO,官话是温和的 VO,粤语是强烈的 VO。金立鑫、于秀金(2012)调查了 10 组相关语法组配发现,普通话有 4 组兼有 OV 和 VO 组配,3 组倾向于 OV 组配,3 组倾向于

VO 组配。如果 Diessel(2005)的总结规律考虑汉语的情况,就需要修改,将“只有 OV 语言”改为“绝大多数是 OV 语言”。这一论断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4.2 英汉同时复句中制约分句位置的因素

英汉同时复句中分句之间的相对位置一般受六个因素的制约。

1) 整句平衡美感:从句子平衡的角度来看,前分句稍微简短,后分句稍微繁长,否则就会出现头重脚轻的“失重感”。

2) 信息结构安排:一般而言,旧信息在前,新信息在后;英汉同时复句中,承载旧信息的分句在前,承载新信息的分句在后。

3) 分句间逻辑语义关系:这是决定分句顺序的最重要因素。同时复句中分句的语义关系是同时,但具体语义关系是点与点、点与时、时与时的同时,如何识别这种关系? 姚双云(2012:11)认为,“言者的主观视点对于句子的语义起主导作用”。英汉语关联标记 when、as、while、“(当)……(的)时(候)”所在的时间分句定位另一分句中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言者通常先定位再叙述事件。因此,充当话题/预设/背景/共识等功能的时间分句在前,充当焦点/重心功能的另一分句在后。

4) 语篇连贯性:从语篇连贯的角度来看,前分句承上,后分句启下。

5) 大脑加工信息的难易度:关联标记出现越早,大脑加工起来就越容易,时间分句带有关联标记,时间分句在前的句子就容易加工。具体而言,时间标记词提示大脑,该分句是背景信息,往后是焦点信息,在背景信息的基础上更容易理解和把握焦点信息(Hawkins 1994)。反之,不带标记词的分句在前,大脑扫描完成对它的加工之后,再遇到标记词,会认为带标记词的分句说明前句,那么它会返回到前句,再结合背景信息理解一遍,就有些费时费力。因此,大脑更倾向时间分句在前、另一分句在后。

6) 语言与认知的象似性:从语言、人脑、世界三者的关系来看,与人类认知世界规律相似的语言顺序更受欢迎。Greenberg(1966)认为语言的顺序遵从实际经验或知识的顺序,Comrie(1986)认为句间顺序遵循时间指示上的顺序。同时复句,即使是早一秒发生,也是先发生,两个事件的发生存在严格的一先一后。“象似性”解释主句、从句的顺序,主张先发生的先说,后发生的后说。

上述六个因素都对同时复句中分句的位置产生影响,最终呈现的语序就是这六个因素竞争的结果。如:

(23)a. When we arrived in Berlin it was dark.

b. It was dark when we arrived in Berlin. (Diessel 2005: 450)

c. 我们到达柏林的时候,天黑了。

例(23c)是例(23a)和例(23b)的汉译。从整句平衡美感来看,例(23b)是优势语序;从信息组织结构来

看,例(23a)是优势语序;从分句之间逻辑语义关系来看,例(23a)是优势语序;从语篇连贯来看,选例(23a)或例(23b);从大脑处理信息的难易度来看,选例(23a);从语言与认知的关系来看,选例(23b)。综合来看,例(23a)符合更多制约因素,比例(23b)更具优势。该结论得到语料库的检验:在英国国家 BNC 语料库中检索 when we arrived,共计出现 128 例,在复句前后分别有 74 例、54 例,比例分别为 58%、42%。这六个因素对同时复句中分句顺序的影响有大有小,最重要的是分句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最不重要是句子平衡美感。至于它们各自所占比重,我们将另外撰文。

5. 结语

同时复句中分句所述的事件同时发生,这种同时性体现为点与点的同时、点与段的的同时、段与段的的同时,主要以带从属关联标记的从属形式表达出来,英语最常用的关联标记是 when,其他关联标记与之互补共同表达同时语义;汉语最常用的关联标记是“(当)……(的)时(候)”,其变体“当……”“……(的)时(候)”也可互补使用。英汉也都用复合形式表达同时关系:英语用连词 and;汉语用连词“而”或者并置无连接标记的两个分句。英语同时复句最常用的关联标记是 when,但 when 还有其他意义;汉语同时复句最常用的关联标记是“(当)……(的)时(候)”,只有一种意义;when 和“当”都位于分句句首。英汉同时复句的优势语序是:英语时间分句在复句的前、后都是常态,汉语时间分句严格在前。这种顺序受六个因素的制约:整句平衡美感、信息组织结构、分句间逻辑语义关系、语篇连贯、大脑加工信息的难易度、语言认知象似性,这六个因素竞争的结果就是同时复句中分句顺序的安排。

需要指出的是,汉语同时复句中分句的顺序与语言类型 VO/OV 不完全一致,这有待进一步研究。六个制约因素对同时复句中分句间顺序影响的权重,尚需细致考察和深入探究。

注释:

- ① 本文例句未标注出处者,均为笔者自省例句且给出译文。
- ② 汉语学界对“当……(的)时(候)”有三种看法:“当”是连词,“时/的时候”是时间助词,参见秦旭卿“‘当’和时间复句”,《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 年第 3 期,第 82-87 页;“当”是介词,“时/的时候”是名词,参见陆俭明“现代汉语时间词说略”,《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 年第 1 期,第 24-37 页;“当”是连词,“时/的时候”也是连词,参见刘丹青《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148 页。本文倾向将“当……(的)时(候)”界定为框式连词。

参考文献

- [1] Comrie, B. Conditionals: A typology [A]. In E. Traugott, A. ter Meulen, J. S. Reilly & C. A. Ferguson (eds.). *On Conditionals*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77-100.
- [2] Declerck, R. *When-Clauses and Temporal Structure* [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7.

- [3] Diessel, H. Processing factors of pre- and postposed adverbial clauses [J].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996(1): 71-82.
- [4] Diessel, H. Competing motivations for the ordering of main and adverbial clauses [J]. *Linguistics*, 2005(3): 449-470.
- [5] D'Souza, J. & V. Ng. Classifying temporal relations with rich linguistic knowledge [A].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13 Conference of the North American Chapter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Human Language Technologies* [C]. Atlanta: Georgia, 2013: 918-927.
- [6] Greenberg, J. H.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A]. In J. H. Greenberg (ed.). *Universal of Language* (2nd edn.) [C].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6: 40-70.
- [7] Hawkins, J. A. *A Performance Theory of Order and Constituenc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8] Quirk, R. et al.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M]. London/New York: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85.
- [9] Vega, M. et al. Figure and ground in temporal sentences: The role of the adverbs *When* and *While* [J]. *Discourse Processes*, 2007(1): 1-23.
- [10] 陈春华. 英汉时间状语从句位置分布差异及其对英语学生写作的影响——基于 CLEC 的实证研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1): 75-78.
- [11] 龚琼芳. “正(在) VP1, VP2”式时间复句 [J]. *汉语学报*, 2018(4): 82-87.
- [12] 何清强. 英汉已然位移事件句的时间表达 [J]. *外语教学*, 2020(3): 10-16.
- [13] 黄敏. 试析“的时候”句的时间性 [J]. *语言研究*, 1999(2): 45-50.
- [14] 江蓝生. 时间词“时”和“後”的语法化 [J]. *中国语文*, 2002(4): 291-301.
- [15] 金立鑫, 于秀金. 从与 OV-VO 相关和不相关参项考察普通话的语序类型 [J]. *外国语*, 2012(2): 22-29.
- [16] 匡鹏飞. 上古汉语时间复句说略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5): 107-111.
- [17] 黎锦熙. *新著国语文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 [18] 刘丹青. *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19]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20] 桥本万太郎. *语言地理类型学* [M]. 余志鸿, 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8.
- [21] 王耿. 论汉语时间短语“介 X 时” [D].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 [22] 王 珉. 复句·句群·篇章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 [23] 王 志. 时间副词“正”的两个位置 [J]. *中国语文*, 1998(2): 103-104.
- [24] 姚双云. “主观视点”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 [J]. *汉语学报*, 2012(2): 11-24.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类型学视域下的汉语意外范畴研究”(项目编号: 17BYY150) 和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湖湘文化走出去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18YBA291)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万光荣,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汉外语言对比、句法学

责任编辑 郑 荣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This is a contribution from Target 29:1
© 2017,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This electronic file may not be altered in any way.
The author(s) of this article is/are permitted to use this PDF file to generate printed copies to be used by way of offprints, for their personal use only.
Permission is granted by the publishers to post this file on a closed server which is accessible only to members (students and faculty) of the author's/s' institute. It is not permitted to post this PDF on the internet, or to share it on sites such as Mendeley, ResearchGate, Academia.edu.
Please see our rights policy on <https://benjamins.com/content/customers/rights>
For any other use of this material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should be obtained from the publishers or through the 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for USA: www.copyright.com).
Please contact rights@benjamins.nl or consult our website: www.benjamins.com

Holly Mikkelsen & Renée Jourdenais (eds.). (2015)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Interpreting*. London: Routledge. 456 pp.

Reviewed by Lihua Jiang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The fact that globalization comes with an increasing need for qualified and well-trained interpreters has recently strengthened interest in interpreting as a field of academic study. Several encyclopedias and handbooks exist already in the are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ink of *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Baker and Saldanha 2009),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almkjær and Windle 2011), or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illán and Bartrina 2013). The publication of the encyclopedic handbook of interpreting under review here is therefore to be welcomed as a sign of the maturity of the discipline. The subjects covered by this volume range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preting profession and the different modes of interpreting to the frequently-discussed issues in this field, giving readers a historical and synchronic surve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interpreting, and of the complex array of themes,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nd methodologies in this research field.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left aside, the book is organized into four parts: I.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II. Modes of interpreting, III. Interpreting settings, and IV. Issues and debates.

Part I of the book describes interpreting from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d looks at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employers, and researchers. Jesús Baigorri-Jalón traces interpreting from Ancient Egypt and China to the first use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technology at the Nuremburg Trials, and then further to the latest remote interpreting scenario. Julie Boéri looks at key internal players of interpreting, including the roles of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training bodies and the academic community, while Sofía García-Beyaert uses case studies to show the external factors involved in interpreting. In the final chapter of Part I, Franz Pöchhacker addresses the evolution of interpreting research, lists research paradigms in history (e.g., the Paris School's Interpretative Theory Paradigm, the Post-Trieste's Neurolinguistic Paradigm and Cognitive-Pragmatic Paradigm) and presents major topics in this field (e.g., memory, performance, aptitude, teaching, role, technology), which will later form the structure of Part IV.

Part II focuses on the different modalities of interpreting. Not only does this part include the traditional modes such as simultaneous and consecutive, but also

the more recent signed language interpreting, sight translation, and transcription. Kilian G. Seeber discusses the complexity and difficulty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and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se features. She also addresses the underlying constructs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in the regard of memory, bilingualism, and directionality before describing the major problems in this mode (e.g., speed, numbers, syntax, accents). Kayoko Takeda and Debra Russell present various (e.g., cognitive and linguistic) issues that influence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and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good note-taking, as well as the role of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in interpreter training. The next two chapters are about signed language interpreting research. Karen Bontempo's chapter offers a general picture of this mode, while Jemina Napier focuses on the way in which signed language interpreting differs from spoken language interpreting. The presence of these two chapters shows the increasing visibility and importance of signed language interpreting in the interpreting research community. Wallace Chen's contribution on sight translation examines how this mode differs from written translation; it describes sight translation from pedagog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 and proposes a number of innovative pedagogical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In the final chapter, Carmen Valero-Garcés discusses 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 of spoken discourse in various settings, and examine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involved in transcribing and translating for different purposes.

Part III comprises articles about the specialized settings in which interpreters work. In addition to the more developed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scenario, this part covers a variety of interpre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scenarios, including court interpreting, interpreting in asylum proceedings, community interpreting, healthcare interpreting, interpreting in mental healthcare, etc. Ebru Diriker gives an overview of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and its professionalization proces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he also presents an array of key studies in this field. In the following chapter, Jieun Lee introduces court interpreting by defining key terms and describes the specific aptitude and competence of court interpreters. Other topics include the different legal systems in which interpreters are engaged, the demanding nature of court interpreting, court interpreter certification,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status. In the next chapter, Sonja Pöllabauer examines the particular type of interpreting which occurs in asylum proceedings and explores frequently-researched topics in this field, such as the interpreter's role and training, language choice in asylum interviews, and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asylum hearings. The next chapter starts with Marjory A. Bancroft's list of different terms confusingly given to the field of community-based interpreting, such as public service interpreting, liaison interpreting, dialogue interpreting, cultural interpreting, and discourse interpreting, to name a few. Due to its unclear position with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interpreting,

community-based interpreting has developed a great variety of denominations with different conceptual components and focuses. Some degree of initial agreement has been reached on its difference from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e.g., Pöchhacker 2004; Hale 2007); however, even this distinction has become blurred by its seemingly overlapping features with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Kalina 2006, 255). In this chapter, Bancroft shows the current trends in community-based interpre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role of the community interpreter and to the ethical issues involved. The rapidly growing field of healthcare interpreting is introduced in the following chapter by Cynthia E. Roat and Ineke H. M. Crezee with particular focuses on the interpreter's cultural bridging role, standards of practice, regulation, training, and certification. With a narrower focus on mental-health interpreting, Hanneke Bot shows the interpreter's interactive involvement in interpreting events as cultural mediator, co-therapist, and independent communication participant; thus, constructive cooperation depends on the alignment to the type of patient and type of session. Melissa B. Smith echoes this argument by discussing the use of interpreters in primary, secondary, tertiary, and adult vocational training classes, and by describing the function of interpreters in these various learning environments. The last two chapters address two less discussed interpreting fields: mass media and conflict zones. Pedro Castillo presents a general picture of mass-media interpreting and covers a range of aspects including interpreter recruitment, interpreting services, and the interpreted interactions through different media. In the final chapter of this part, Barbara Moser-Mercer defines interpreting in conflict zones, and describes the complex roles of interpreters and the special challenges they face in terms of their own physical security and the risk of trauma.

Part IV outlines the issues and debates ongoing in the field of interpreting and offers readers a picture of research focuses and trends. Uldis Ozolins traces the ethical standards in interpreting and describes the differences in perception of the interpreter's role across different sectors. In the next chapter, Justine Ndongokeller deals with the topic of trauma and examines different types of trauma (e.g., psychological trauma, emotional trauma, physical trauma, professional trauma, and spiritual trauma) with a view to developing methods of preventing trauma and optimizing the care of interpreters.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moder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on interpreting is addressed in Sabine Braun's chapter on remote interpreting. The author distinguishes telephone-based interpreting and videoconference-based interpreting and delves into current practice and research findings regarding remote interpreting in a range of settings (e.g.,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s, legal settings, healthcare, business). She concludes with recommendations for research designs so as to ensure quality interpreting in virtual environments. In the next chapter, Ángela Collados Aís and Olalla García Becerra

introduce the multifaceted, complex, and dynamic issue of quality, describe the basic parameters that define this concept, and trace the history of quality studies with reference to the most significant research achievements. Continuing with the theme of quality, Jean Turner discusses how interpreter's quality is measured or evaluated in terms of admission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testing. In the next chapter, focusing on the graduate level, Chuanyun Bao outlines different interpreting degree programs in Europe and in China, and also provides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short courses and non-degree programs in interpreting, including certificate programs and online learning. Reflecting the growing emphasis on the training of trainers, Bao lists various training programs and specifies various parameters in interpreter training such as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interpreting expertise development. Non-professional or ad hoc interpreters are associated with community settings in the next chapter by Aída Martínez-Gómez, which reports relevant research findings and argues that the general interpreting research community should give due attention to this type. The last contribution comes from Mette Rudvin with a focus on the sociological issue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She discusses how various parameters may affect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self-perception of interpreting as a profession, adding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identity of interpreter and of the creation of a well-defined professional community (433).

Following the first major reference work on interpreting, *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 by Franz Pöchhacker (2004), this encyclopedic handbook provides readers with a disciplinary framework and a comprehensive, state-of-the-art account of interpreting. Trying to meet the needs of very diverse readerships, each contribution in the book helpfully features a lead-in paragraph, a list of key concepts, an overview of main theoretical frameworks, methodologies or specialized practices, challenges lying ahead, related topics, further reading, and an up-to-date bibliography.

However, some imperfections need to be noted. Firstly, some important research issues and approaches are missing in Part IV. One of them is Corpus-based Interpreting Studies, which was proposed many years ago by Miriam Shlesinger (1998) and now fulfills a significant role in interpreting studies (Sandrelli, Bendazolli and Russo 2010; Straniero Sergio and Falbio 2012; Angelelli and Baer 2016). Another example is bibliometric work on research outputs, which has gained ground in interpreting studies lately (Grbić and Pöllabauer 2008; Angelelli and Baer 2016) but is not mentioned in this part, either. Secondly, the articles on research issues in Part IV fail to cover some of the important subjects mapped by Franz Pöchhacker (69–74), such as “Memory” and “Strategy” in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and “Power” in dialogue interpreting. Thirdly, literature reviews in the various chapters are not always complete. For example, Claudia Angelelli's work (2004, 2006, and 2007) on the interpreter's role, professional codes and ethical

principles in healthcare interpreting is regrettably not covered (246–249), which may create an incomplete picture of healthcare interpreting research. Last but not least, questions may be asked about how some of the contributions have been categorized into the book's four main parts. For example, the article on "Remote Interpreting" in Part IV would appear to be more relevant to Part III inasmuch as the discussion relates to settings.

Despite such minor flaws, this handbook's comprehensive overviews, multiple foci, insightful guidance, and wealth of authentic references make it into a true encyclopedia of interpreting that will be of great use to a wide and varied readership of interpreting students, users of interpreting services, practitioners, and interpreting researchers – to anyone who is interested in the field and wants to gain deeper insights into it.

Acknowledgement

This research is funded by the CSC Visiting Scholar Program (2015–2016) at Middlebury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Monterey, as well as by th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Elite Young Scholar Funding program (14XGG10).

References

- Angelelli, Claudia V. 2004. *Medical Interpreting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17/CBO9780511486616
- Angelelli, Claudia V. 2006. "Validating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nd Cod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terpreting* 8 (2): 175–193. doi: 10.1075/intp.8.2.04ang
- Angelelli, Claudia V. et al. 2007. "The California Standards for Healthcare Interpreters: Ethical Principles, Protocols and Guidance on Roles and Intervention." In *The Critical Link & Professionalization of Interpreting in the Community*, ed. by Cecilia Wadensjö, Birgitta Englund Dimitrova, and Anna-Lena Nilsson, 167–18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doi: 10.1075/btl.70
- Angelelli, Claudia V., and Brian James Baer, eds. 2016. *Resear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London: Routledge.
- Baker, Mona, and Gabriela Saldanha, eds. 2009.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eco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 Grbić, Nadja, and Sonja Pöllabauer. 2008. "To Count or Not to Count: Scientometrics as a Methodological Tool for Investigating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3 (1/2): 87–146. doi: 10.1075/tis.3.1-2.04grb
- Hale, Sandra B. 2007. *Community Interpreting*. Sydney: Palgrave Macmillan. doi: 10.1057/9780230593442
- Kalina, Sylvia. 2006. "Zur Dokumentation von Maßnahmen zur Qualitätssicherung beim Simultandolmetschen." In *Text and Translation: Theory and Methodology. Jahrbuch*

- Übersetzen und Dolmetschen*, ed. by Carmen Heine, Klaus Schubert, and Heidrun Gerzymisch-Arbogast, 253–268. Tübingen: Narr.
- Malmkjær, Kirsten, and Kevin Windle, eds. 2011.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oxfordhb/9780199239306.001.0001
- Millán, Carmen, and Francesca Bartrina, eds. 2013.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Pöchhacker, Franz. 2004. *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Sandrelli, Annalisa, Claudio Bendazzoli, and Mariachiara Russo. 2010. "European Parliament Interpreting Corpus (EPIC): Methodological Issues and Preliminary Results on Lexical Patterns in S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22 (1–2): 165–203.
- Shlesinger, Miriam. 1998. "Corpus-Based Interpreting Studies as an Offshoot of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Meta* 43 (4): 486–493. doi: 10.7202/004136ar
- Straniero Sergio, Francesco, and Caterina Falbo, eds. 2012. *Breaking Ground in Corpus-Based Interpreting Studies*. Bern: Peter Lang. doi: 10.3726/978-3-0351-0377-9

Reviewer's address

Lihua Jiang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HUNAN 410001
 China
 clarissajlh@hotmail.com

The sociological turn in the interpreter's role

Dis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s

Lihua Jiang, Chong Han, Jinlin Jiang, and Yue Feng

Interpre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s a complex activity that involves social interaction among all participants,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oday's globalized world. A focus on sociolinguistic questions and on consider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interpreter's presence and actions has led to opposing views ranging from that of "verbatim" interlinguistic reproducer or "conduit" to that of "advocate," "cultural broker," or "coordinator." Still,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rarely mode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ameters that influence the interpreter's on-site decisions during a specific communication ev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nterpreter's scope of action in a given communicative situation within a Triadic Discourse Interpreting Model (TRIM) by means of dis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s, which show the interplay of static and dynamic TRIM parameters. Thus, the interpreter's role is no longer defined by the verbatim-mediation dichotomy but rather reflects a decision-making continuum that evolves as the communication develops and offer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preter's complex and important social role.

Keywords: community interpreting, interpreter's role, dis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s, filtered messages

Introduction

With the rise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associated increase in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research has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the complexity of the court and police interpreter's role, as well as the aspects of communica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interpreter's presence and actions. This discussion has led to opposing views on the interpreter. On the one hand, the interpreter may be viewed as an interlingual messenger who is expected to render utterances verbatim while remaining "neutral" or "invisible" (e.g., Berk-Seligson 1990/2002; Goffman 1981; Morris 1995).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terpreter acts as a cultural mediator and may be expected to actively manage communication and render services that can be described as advocacy, cultural brokering, or coordination (see Angelelli 2004a and 2004b; Baraldi and Gavioli 2012; Davidson 1998, 2000; Metzger 1995, 1999; Roy 2000; Rudvin 2007; Wadensjö 1998).

Within the realm of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the most widely acknowledged demand on interpreting with regard to quality is that it be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in "message and style" (Gile 1992: 189; 1995: 26). Several studies on quality in interpreting (Bühler 1986; Kurz 2001; Moser 1996) consider accuracy as an important criterion for high-quality interpretation.¹ Language interpreters are, therefore, often portrayed as "conduit" language facilitators (Reddy 1979).

However, the recent literature on the interpreter's role has described medi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interpreter as "involvement" (e.g., Gentile et al. 1996; Opraus 2003; Pöllabauer 2004; Foley 2006), which differentiates it from the "content-orientation" of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Gile 1995; Kalina 2002; Moser-Mercer 1996). Interpretation's involvement has been researched (e.g., Wadensjö 1998) and positioned within discourse analysis (e.g., Roy 2000). Roy claims that a number of factors influence the interpreter's potential interaction and mediation: language and cultural competence, competence in a specific domain area, and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referred to as "people skills" (Bowen 2000) or "discourse management skills" (Roy 2000: 6; Pöchhacker 2004: 187).

It is within this context that interpreting scholars have started to research interpreting as active discourse management in social interaction and to explore the interpreter's mediation, in particular, the identity, role, and power of the mediator in the conceptual dimensions of "interaction" and "culture." (Angelelli 2004a and 2004b; Baraldi and Gavioli 2012; Davidson 1998; Mason 2001, 2004, 2012; Roy 2000; Wadensjö 1998). These researchers have devoted attention both to socio-professional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and to the elemental level of interaction in social processes, that is, the way interpretation is organized in any given sociocultural context. To date, academic studies have discussed a wide range of issues associated with the interpreter's conflicting role from ethical (Metzger 1995; Roy 2000; Wadensjö 1998), linguistic (Meyer 2004; Apfelbaum 2007) and didactic points of view (Brunette 2003; Carr et al. 1997; Hale 2007; Pöchhacker 2004; Roberts et al. 2000). Previous research has indicated social factors' influence on

1. Bühler's (1986) research of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shows that criteria for interpreting quality includes not only accurate and complete information but also a "pleasant voice, native accent, and fluency of delivery." Moser-Mercer (1996: 50) also suggests that in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criteria such as team discipline, adaptability, flexible scheduling and availability may be part of the quality of interpreting.

the interpreter's role (see Angelelli 2004a and 2004b), but little interest has been shown in modeling the parameters that influence or determine the interpreter's role in actual interpreter-mediated communicative events. In the past decade, sociolinguistic questions and discourse considerations have been of increasing importance. Still, many authors associate the interpreter's various roles with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in which the interpretation takes place, claiming that the interpreter's role is largely determined by the institutional setting; discourse considerations have increasingly gained prominence within this view over the past decade (e.g., Berk-Seligson 1990/2002; Wadensjö 1992, 1998; Tebble 1996, 1998; Meyer 2000, 2004; Pöllabauer 2003, 2004; Sauerwein 2006).

The interpreter's conflict, however, remains unresolved today, as the research of Angelelli (2004a and 2004b) and Shlesinger (2008) vividly illustrate the interpreter's challenge of responding to two interlocutors simultaneously. The debate regarding the community interpreter's role questions whether and, more specifically, under which circumstances the interpreter may "mediate" communication by rendering a novel, non-verbatim utterance. Even though a general Code of Ethics establishes collective conduct guidelines, in an actual situation individual interpreters are often at a loss as to how involved they should be.² Nevertheless, a general code of conduct cannot anticipate every possible situation that arises for individual interpreters, and a general code of ethics cannot account for every possibility.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model a set of parameters that influence the interpreter's decisions and to describe how these parameters' interaction determines the individual interpreter's scope of action in any given interpreter-mediated communicative situation.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riadic Discourse Interpreting Model (TRIM)

It is suggested in the Triadic Discourse Interpreting Model system (Jiang 2011), that static and dynamic parameters interact in a triadic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when an interpreter produces a target message. This interplay is here assumed to

2. *Code of Ethics* (also called *Code of Conduct*) is a set of rules requiring interpreters to translate closely and accurately to the standard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It first appeared in court interpreting scenarios and differs from one district or country to another (U.S. Code, Australian Code, UK Code, etc.).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please see Angelelli (2007), Berk-Seligson (1990), Hale (2004) and Mikkelsen (2000).

take place in the form of a number of interpreting filters through which a source message (M) is rendered as a target message M'.³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discourse analysis, "texts" are not considered "as static objects, but as dynamic means of expressing intended meaning" (Brown and Yule 1983:24). Since communicative partners are traditionally responsible for uncovering implicit meanings in the coherence-establishing process, the interpreter is a cooperative partner responsible for establishing continuity of meaning. To achieve this aim, the interpreter includes his/her own assumptions and inferences in the communicative event during which the interlocutors cannot directly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Therefore, the interpreter's responsibility is to use the means he/she deems appropriate to ensure sense continuity (cohere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coherence, then, in an interpreted message sequence will be paramount in discussing the interpreter's role.

TRIM identifies and describes static parameters for the analysis of interpre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Static parameters describe knowledge parameters, first, as the holistic structures that relate content and functional elements in reflection of communicative partners,' as well as the interpreter's, assumed world knowledge. This assumed world knowledge encompasses the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domain elements necessary for communication. Moreover, situation-specific knowledge particular to the discourse situation is included, such as type, time, and place characterizations, the communicative partners' mutual attention (from which the communication topic emanates), the communicative purpose, and the interlocutors' interest in the discourse.

Dynamic parameters in TRIM show the interplay of these parameters in a tetradic speech act sequence of turns in interpre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Min Sunwoo 2008). The original tetradic speech acts model shows the interaction of communicative partners in a monolingual situation in its four dimensions: communicative partner A's utterance; communicative partner B's reaction; the acknowledgement of B's reaction by A; the acknowledgement of A's acknowledgement by B. In the sequence, each turn influences the following turns. The reactions and acknowledgements can be positive or negative. Negative reactions and acknowledgements may stem from one partner's un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In community interpreting, communicative partners do not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directly and therefore may not be aware of this *prima facie*, but the interpreter must recognize these underlying dimensions of meaning. As an example,

3. *Dis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 is proposed by Jiang (2008, 2011) to encompass the interpreter's translation and coordination decisions during the formulation of a target messag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message's adequacy and coherence, these decisions may lead to variation in the source language utterance.

this awareness is important on the part of the interpreter in order to detect a communicative partner's "double bind" strategies.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tetradic sequence interaction of an interpreter as a "third party." All possible other turns or turn exchanges — that is, misunderstandings and the interpreter's clarification or corrections — can be explained within this recursive tetradic cycle, but these elements will not be shown in exhaustive detail in the present article. In interpre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the primary speakers can only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an interpreter; the interpreter, therefore, assumes responsibility for understanding an utterance and making an acknowledgement with primary speakers.

Within the tetradic exchange, dynamic discourse interpreting parameters involve understanding and reproducing a message. This article assumes that interpreting is influenced by the interpret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message and his or her decisions regarding what source information to transfer and how to transfer the source message.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to be interpreted is assumed here to be determined by discourse objectives and coherence criteria depending on what the interpreter is able to qualify as coherent, a-coherent, and non-coherent (Mudersbach 2004:250), both "locally" (ibid:260)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ously interpreted actual discourse.⁴ Further criteria assumed in the interpreting filters are: (1) the general communicative goal and the discourse purpose; (2) the coherence of the source message as understood by the interpreter and measured by topic or isotopic continuity; (3) potential knowledge differentials, which the interpreter needs to balance; and (4) the partners' interest, as perceived by the interpreter in reaching the specified discourse purpose.

Dis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s

Within TRIM, dis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s are defined as the process by which a source message *M* is rendered from its original state into its interpreted message as target message *M'*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several interpreter-applied interpreting filters. The interpreted message *M'* reflects the interpreter's own perception of information and therefore may differ from the primary partner's understanding

4.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herent," "incoherent," and "a-coherent" messages depends on whether the elements of a turn exchange are explicitly related (coherent), are incompatible (incoherent), or are completely unrelated (a-coherent). This differentiation results in the interpreter's manipulation of a message through deletion, addition, or condensation. Coherence is here understood as depicting the continu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es and rhemes in an interpre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turn exchange (Mudersbach 2004).

of the original message *M* due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interpreter. Wadensjö (1998) first developed a scale, which Rosenberg (2001) later adopted, to categorize these types of messages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interpreter's role. This scale is: *zero* (totally deleting the original message); *partially invariant*, comprised of the restructured *partially invariant 1* (substituted — expanded or reduced — rendering) and the clarifying *partially invariant 2*; *variant* (coordinated or mediated) and *invariant* (verbatim rendering). This scale reflects the continuum of the interpreter's scope of action which can now be described as being motivated by a series of interrelated interpreter decisions.

Classification of filtered messages (*M'*)

TYPE I: Zero target message M' (zero rendition)

Zero target message refers to a message that is not reproduced in the target discourse, that is, the deletion of a source message in both content and function. The term derives from Wadensjö's understanding of "zero renditions" as "cases when 'originals' are left untranslated" (1998:108). According to Rosenberg's research (2001), certain utterances, such as banter, phatic expressions, repetitions, and anything unrelated to the interview goals, can sometimes be omitted without negatively impacting the interpreted speech event.

TYPE II: Partially invariant target message M', Category 1 (restructured)

Most interpreted messages are *partially invariant category 1* messages, which may include any lexical, syntactic, or stylistic modifications made as necessary when interpreting betwee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his category encompasses reduced, expanded, paraphrased, and summarized renditions that may be necessary for coherence and that derive from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domain knowledge differences. These modifications serve to achieve the discourse purpose and include "expanded renditions," "reduced renditions," "summarized renditions," and "substituted renditions" (Wadensjö 1998:107–108); "qualifier[s]" and "elaboration additions" (Barik 1994:125–126); and "explanat[ions]" (Jakobson 1990:75).

TYPE III: Partially invariant target message M', Category 2 (request for clarification)

Partially invariant 2 target messages appear when a message presents the interpreter with coherence problems, that is, an implicit, isotopic meaning that is unclear

to either the interpreter himself or the other communicative partner.⁵ With a view to achieving the discourse purpose, the interpreter may request that the original message producer clarify the unclear meaning so as to secure proper coherence in communication.

TYPE IV: Variant target message M' (mediated)

The term *variant target message* includes all interpreter interventions under Wadensjö's (1998: 107–108) “zero rendition,” “non-renditions,” “expanded renditions,” “reduced renditions,” and “summarized renditions” categories, which strive to achieve the discourse purpose despite the discourse partners’ potentially conflicting interest.

TYPE V: Invariant target message M' (close and verbatim renderings)

Lay persons in 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ion or interpreting areas tend to value *invariant* interpretation. The general code of ethics and many community interpreting guidelines demand invariance — “accurate” or “verbatim” interpretation — and invariant interpreting is particularly common among and relevant to police hearings and court interpreting discourse although court representatives openly concede that an interpreter, of course, needs to make sense of a message before interpreting.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specialists agree that requests for invariance are naïve. Indeed, renditions that do not deviate from the source utterance cannot be provided; a number of factors, including the interpreter's coherence-building strategies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individual hypotheses, world knowledge interactions, and the verbalized contents of a message, have not been clearly documented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refore, here a verbatim rendition will not be assumed to be realistic and will refer to invariant target messages instead of the idea that invariance exists only as far as meaning is concerned. *Invariance* refers to all meaning dimensions included in Schulz von Thun's communication model (1981), as well as in Wadensjö's “close rendition” category, according to which “the propositional content found explicitly expressed in the

5. *Isotopy* is a firmly-established text linguistics concept indicative of text coherence. It is from this discipline, specifically from text analysis, that the concept of isotopy entered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mostly as a means of ensuring full source text comprehension (Thiel and Thome 1988, 1996). Nevertheless, isotopy transfer conditions, including potential invariance in translation, have hardly been discussed in translation literature (see Mudersbach and Gerzymisch-Arbogast 1989).

'rendition' must be equally found in the preceding 'original,' and the style of the two utterances should be approximately the same" (Wadensjö 1998: 107).

Dis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s

During the interpreter's filtering process, a number of filters operate on the original message and influence the target message's content and function. These filters are described herein as purpose, coherence (in the sense of topic and isotopic continuity), knowledge, and interest filters, and are activated in that order.

The discourse purpose filter

The *discourse purpose filter* verifies whether a message is compatible with the agreed-upon discourse purpose. This first filter presupposes the cooperation of all discourse partners by means of Herbert Grice's maxims (1975) in the form of a "contract" (Tebble 1996) that the interpreter has clearly defined and targeted *skopos* in mind as a base from which to adopt and adapt appropriate strategies.⁶

The following question guides the interpreter's decisions as he filters the original message M in view of the discourse purpose: Is the source message compatible with achieving the overall communicative goal and the specific discourse purpose?

The following example is taken from the author's experience interpreting at an international auto mechanics fair in Frankfurt am Main (Jiang 2011: 120). In the course of a Brazilian purchasing manager introducing his factory to a Chinese supervisor, the purchasing manager stares at the interpreter and says, "You're a beautiful woman." The male Brazilian client's remark about the female interpreter's looks fall under the discourse purpose filter category. Therefore, utterances similar to those expressed in this example can be left out by the interpreter due to its incompatibility with the general communication goal and discourse purpose.

The coherence filter

The *coherence filter* contextualizes an individual message exchange, that is, it links an individual message to its topical continuity and its factual, appellative, relational, and self-indicative isotopy dimensions in previous and successive tetradic exchanges. Thus, the coherence filter allows overall continuity of the discourse.

6. *Skopos* is Greek for "purpose." Vermeer's *skopos* theory (1978: 100) postulates that, in general, it is the intended purpose of the target text that must determine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strategies. From this proposal, Vermeer derives the *skopos* rule: Human action (and its subcategory of translation) is determined by its purpose (*skopos*) and is, therefore, a function of its purpose.

Moreover, coherence influences the target message by requiring judgments as to whether the many dimensions of a message are mutually comprehensible and, thus, relevant in the light of the entire interpreted event.

The coherence filter pose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to the interpreter:

1. Are the topic and the source message's factual, appellative, relational, and self-indicative dimensions compatible with the overall discourse purpose?
2. Are there signs that indicate that one of these dimensions is characteristic of a particular message (and thus may be negligible and result in zero rendition) or that it is a continuously- and coherently-developed dimension that is coherent with previous or anticipated discourse exchanges such that it must be interpreted?

The coherence filter is a powerful filter for the interpreter and involves decisions regarding the restructure (summarization, expansion, or reduction) or deletion (zero rendition) of messages. In the reproduction dimension, a coherence filter also verifies the local meaning dimensions to be transferred (separate isotopies) against global coherence. Coherence in the reproduction filter focuses on message transfer that closes gaps between different isotopies while including the top-level isotopy. Thus, interpreters may downplay a message by omitting the relational and self-indicative dimensions (see Schultz von Thun 1981), by structuring a message in order to be fully comprehended by the other communicative partner, and by using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o clarify the original message.

The topic continuity filter

The *topic continuity filter* uses topic development in discourse as an indicator of coherence. Explicit or implicit theme progression may establish topic continuity. Explicit theme continuity develops via recurrent or derived topics and implicit theme continuity by establishing thematic progression via textual or world hypothesis with the recipient or analyst. Topic identification derives from the Fan Fixation Communication Model (FFCM) and integrates the interpreter who, with his/her on-site decisions about the communicative partners' shared focus and perspective, establishes coherence within the actual discourse purpose.⁷

Shared focus, therefore, is a vital coherence-establishing element in all phases of the interpreting process. This shared focus serves as a reference for the

7. Fan Fixation Communication Model shows the components of a message and the message's themes and rhemes from both the speaker's and hearer's points of view. Gerzymisch-Arbogast (1987, 2003) and Gerzymisch-Arbogast and Will (2005) have applied this model to monologic texts and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respectively.

interpreter when preparing for or reworking a particular assignment as Martin Will (2009) suggests for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Similarly, this focus is an orienting element during the interpretation process: it helps prevent unethical extensions of the interpreter's job, as in lawyer-plaintiff interactions outside the courtroom (Hale 2007:79), and rejects working conditions that are not conducive to coherent discourse, as when courts allow only parti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roceedings that undermine coherence (Kadric 2000: 162). During the interpretation process itself, a shared focus limits distractions, sudden topic changes, or unconscious linguistic mistake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guide the topic continuity filter:

1. Is there a change in the original message that must be reproduced in the target message?
2. Is there a shift in theme, shared focus, or perspective in the original message that must be made explicit or that requires clarification?

The isotopic continuity filter

The *isotopic continuity filter* applies Schultz von Thun's (1981) assumption that any message contains at least four dimensions: a factual, an appellative, a relational, and a self-indicative dimension, which are equally applicable to a hearer ("four ears") and a speaker ("four tongues"). The isotopic continuity filter complements the topic continuity filter as it establishes continuity of meaning dimensions, rather than informational units, that may be implicit from the other communicative partners.

Although isotopic continuity does raise contrastive language and cultural problems, its factual dimension may seem to be the least problematic dimension; in contrast, the appellative dimension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interpre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because question-answer turns (such as in court situations or asylum hearings) usually contain a strong appellative component. The relationship dimension is equally important because interpreting environments frequently involve asymmetric discourse partners — such as in doctor-patient or barrister-defendant relationships — that require the interpreter to carefully balance the uneq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locutors. And while the self-indicative dimension may seem less crucial, it does aid the interpreter in judging a discourse partner's credibility and the potential for conflict between discourse partner interests or styles. The interpreter, therefore, has to ensure that s/he comprehends the source message in its factual, appellative, relational, and self-indicative potentials and that s/he filters the target message by deciding (a) which of the abovementioned isotopic dimensions are to be represented in the target message, (b) to what extent,

and (c) in which form they are to be represented. The present article will neglect the comprehension dimension of interpre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will assume that the interpreter fully understands all four dimensions involved and that dimension decisions relate to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only. I will therefore concentrate on the decisions that fall within the interpreter's action latitude in reproducing a target message *M'*.

The following question guides the isotopic continuity filter:

1. Can the factual, appellative, relational, and self-indicative dimensions of a message be reproduced in a target message?

The knowledge filter

The *knowledge filter* proceeds from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systems and their holistic description (Mudersbach 1991). Elements of relevant knowledge systems are "concretized" in message exchanges as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manifestations (for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manifestation, see Floros 2003) or as domain knowledge systems (for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domain knowledge systems, see Will 2009).

The interpreter must bear in mind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en applying the knowledge filter:

2. Is the message compatible with communicative partner B's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system, norms, and conventions?
3. Does B have sufficient cultural, domain-specific, norm-related, and communicative knowledge to understand the message without clarification or explanation?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may lead the interpreter to make message restructuring decisions, such as restructured renditions and clarification interventions. Assumed cultural knowledg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mediating doctor-patient interactions; patients from European and African cultures find reception of information empowering and believe that obtaining illness-related information is positive.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is the way in which the western physician's concern for the Chinese patients' autonomy and self-determination conflicts with Chinese patients' family-centered culture (Hsieh 2004: 19).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se cultural differences, western physicians may be troubled by a Chinese family's controlling behaviors and by the patient's indifferent attitude, whereas the Chinese patient and family members may be angered by a healthcare provider's insensitivity in delivering bad news to the patient. The interpreter thus assumes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nsferring the information in a culturally-appropriate way so as to ensure effective medical communication.

The interest filter

The *interest filter* is paramount to the interpreter's filtration of the original message and answers the following question:

1. Is the source message compatible with the interests of the individual discourse partners A or B?

If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is "No," the interpreter will have to balance the divergent interest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discourse purpose.

After passing through the discourse purpose, coherence (topic continuity and isotopic continuity), knowledge, and interest filters, a source message *M* will be interpreted into *M'* as a zero, partially invariant (Category 1 or 2), variant, or invariant message.

Interplay of parameters: Filtered message flow and types

The discourse interpreter's filtered *M'* can now be positioned on a scale from *zero* to *invariant M'*, with scalar values of partially invariant *M'* and mediated *M'* as determined by the discourse purpose, coherence (topic continuity and isotopic continuity), knowledge, and interest filters. The assumption of filters makes it possible to specify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M'* comes about.

A *zero M'* presupposes an original message *M* that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actual discourse purpose or is incoherent. A *category 1 partially invariant M'* (reduction, expansion, or summarization) presupposes that *M* and *M'* are within the actual discourse purpose; that they are incompatible regarding knowledge differentials; that they involve a knowledge differential between the communicative partners A and B that can be balanced by reduction, expansion, or summarization of *M* in the filtering process; and that they are devoid of conflicting communicative partner interests. A *category 2 partially invariant M'* presupposes that *M* and *M'* are within the actual discourse purpose; that they are incoherent due to a lack of explicit or implicit topic continuity, isotopic continuity, or implicit meaning; and that they are devoid of conflicting communicative partner interests. Downplaying or emphasizing a message *M* in *M'*, therefore, does not belong to the partially invariant category but is,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filters, a variant message. A *variant M'* (mediation) requires that the original message *M* and *M'* be within the discourse purpose; be coherent in topic continuity and isotopic continuity; be characterized by a manageable knowledge differential between the

communicative partners; and involve conflicting communicative partner interests. An *invariant* M' presupposes that M and M' are within the global communicative and specific discourse purpose; are coherent in all implied meaning dimensions; involve a knowledge differential that can be balanced by reducing, expanding, or summarizing M in the filtration process; and are devoid of conflicting communicative partner interests. Figure 1, below, illustrates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interpreter renders the messa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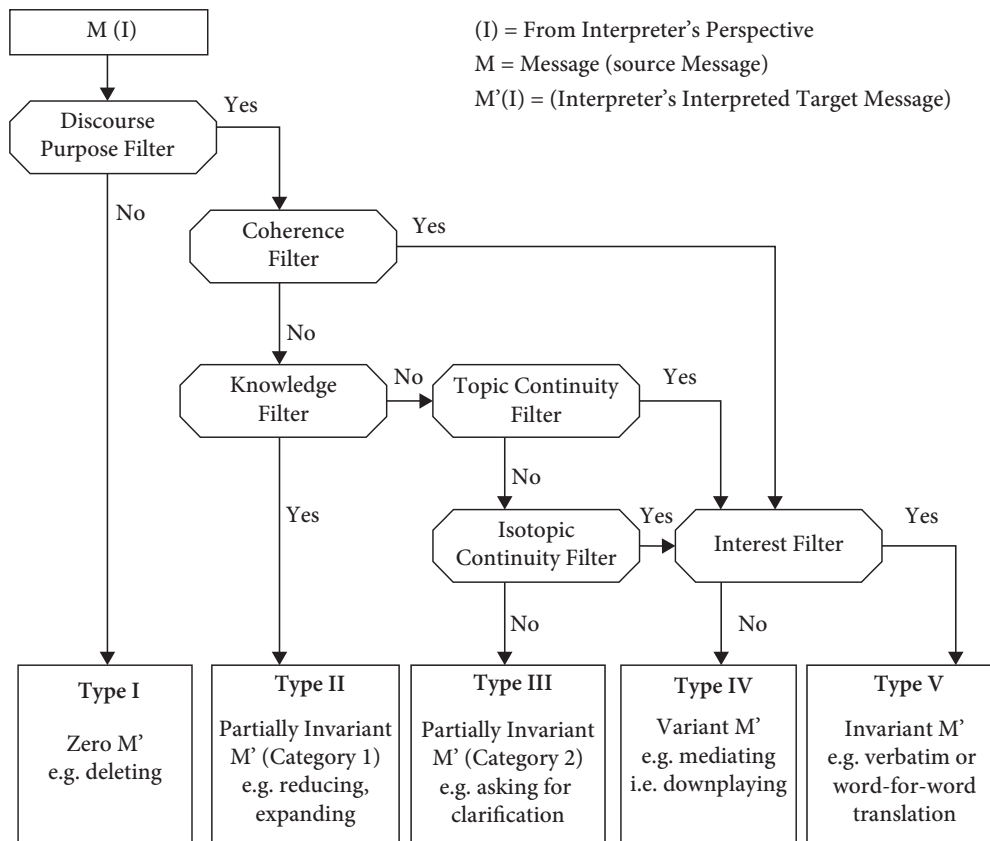


Figure 1. Interpreter's filtering process (Jiang 2011: 131)

According to Figure 1, a source message goes through different paths and yields different types of target interpreted messages, as follows:

- Path 1: discourse purpose (–): Type I (*zero* M')
- Path 2: discourse purpose (+) → coherence (–) → knowledge differential (+): Type II (*category 1 partially invariant* M')
- Path 3: discourse purpose (+) → coherence (–) → topic continuity (–) → isotopic continuity (–): Type III (*category 2 partially invariant* M')
- Path 4: discourse purpose (+) → coherence (–) → topic continuity (–) → isotopic continuity (+) → compatibility of interest (–): Type IV (*variant* M')
- Path 5: discourse purpose (+) → coherence (–) → topic continuity (+) → compatibility of interest (–): Type IV (*variant* M')

- Path 6: discourse purpose (+) → coherence (+) → compatibility of interest (–):
Type IV (*variant M'*)
- Path 7: discourse purpose (+) → coherence (+) → compatibility of interest (+):
Type V (*invariant M'*)

Application of the model

Background of the data analysis

The following analysis is based on an excerpt of Transcript/Tape Number 12 of Case I in the CERG project by Dr. Ester S M Leu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Dr. Xunfeng Xu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⁸ The following analysis considers the primary communicative partners to be the English-speaking prosecuting barrister (BPE) and the Cantonese-speaking defendant (DC), considerations that may pose cultural knowledge differentials that the interpreter must

Table 1. The transcription symbols in the analysis data

Symbol or Abbreviation	Meaning
=	latch (no pause between turns,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an overlap)
CAPITAL LETTERS	emphasis
colons	drawn out syllable,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a hesitation
{ }	faster
{ { }	slower
[]	describes nonverbal speech features; also, inaudible
(2.5)	pause, timed in seconds
(.)	brief pause
BPE	Barrister prosecutor's message in English
ICT	Interpreter's Chinese interpretation
IET	Interpreter's English interpretation
DC	Defendant's Chinese message

8. In the transcript, the defendant is cross-examined by the prosecutor barrist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 court interpreter. The complete proceedings of Case I consist of 18 transcribed audiotapes, in which six tapes are devoted to the witness and 12 to the defendant. In Case I the defendant "TCS," a 30-year-old electronics salesman currently employed as a badminton coach, was accused of raping three teenage girls ("SSK," "LHY," and "LWY") from 1998 to 1999. Witness LHY was one of the defendant's badminton students, a 13-year-old school girl who offered evidence regarding three incidents of rape that the defendant had committed against her. LMF is one of SKK's former boyfriends.

close.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interpretations are referred to in the transcript as ICT and ICE, respectively.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one tetradic exchange is chosen to show how the dis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s work in an authentic situation. Recursive tetradic cycles explain all other possible turns or turn exchanges, including misunderstandings and corresponding interpreter clarification or corrections, but will not be explained in detail at present.

Analysis of one tetradic turn exchange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excerpt, the barrister defendant (BDE) briefly introduces the three witnesses being questioned about their relationships and summarizes the rape cases in English. The defendant then tells the victim SKK that he was marrying someone else to get better housing.

- 1: BDE =and then the next question my lord then asked this defendant was did you tell SKK and again his answer was yes then he explained that he told SKK because em he was going to get married with l to get the unit (.) So I suppose I believe as I said and that's why I have to put forward this stop hand indeed he said he did tell S in because they wanted to get a house no matter it was a sham or whatever they leave it aside
- 2: [voices overlapped]

In the data for analysis, the barrister prosecutor, the defendant, and the court interpreter participate in the exchange. The author's literal translation, verified by Dr. Ester Leung, corpus possessor, accompanies the transcribed Chinese data. The following is the overview of the analyzing data.

- 34: BPE That sort of (.) silly little trick that is of an immature girl isn't it
- 35: ICT 咁呢一類呢係一啲好唔成熟嘅女仔玩嘅啲好傻嘅玩意嚟 略係咪?
- Literal Translation:
(So this is the sort of very immature, very silly trick of girl, isn't it)
- 36: DC 我唔知係咪
- Literal Translation:
(I don't know if it is)
- 37: IET I don't know if that's true or not.
- 38: BPE That's pathetic isn't it?
- 39: ICT 咁係啲好:: em:: (1.0)好傻嘅嘢嚟略(1.0)係好(.)咁樣做呢係好係好可憐嘅嘢嚟略
- Literal Translation:
(This is very ..em.. very silly kind of things (1.0) very (.) This kind of action, is very very pathetic kind of things It's very silly. That's very pathetic.)

40: DC 大人有時都會=

Literal Translation:

(Sometimes adults would do that.)

41: IET =Some (.) Sometimes adult would do that

Sequence 1

Turn 34 and Turn 35

Classifications

Original Message M	34
Language Direction	English > Chinese
Speech Act	Question
Interpreted Message M'	35
Interpreted Message M' Type	Type IV (<i>variant</i> target message) The interpreter draws a conclusion with the link "so;" erroneously relates the attribute "immature" to "trick;" and adds the intensifier "very" to "silly" and "immature."

Rationale

Discourse filtration illustrates the following interpretation filters:

1. Discourse purpose filter: The discourse purpose is the court's definition of truth concerning a rape ca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cative partners BPE and the defendant implies a certain amount of interest incompatibility, the extent of which the interpreter, and her ensuing interpretation, must feel. The discourse purpose is, therefore, considered to be fulfilled.
2. Coherence filter: From the interpreter's perspective, coherence is insufficient and partial invariance bridges the identifiable linguistic knowledge differential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3. Topic continuity filter: The BPE's recurrent reference to 'trick,' which the interpreter reproduces by altering the reference of immature from 'girl' (original) to 'trick' (interpretation), demonstrates topic continuity in the original message.
4. Isotopic continuity filter: Assuming continuity with the preceding exchange's credibility isotopy, this exchange demonstrates isotopic continuity in the BPE's suggestive trap of eliciting a negative response from the defendant. This negative response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defendant's desire to portray himself as an upstanding individual. Whether the interpreter is aware of this constellation is unclear. Nevertheless, she intensifies the BPE's derogatory allusion to the girl to the extent that the BPE's implicit motive (credibility question) may

have become obvious to the defendant. She thus endangers the BPE's hidden strategy in her effort to clarify the credibility issue with the defendant.

5. Interest filter: The BPE and defendant's interests are incompatible.

Summary of Filtering Results:

Discourse Purpose (+) → Coherence (+) → Topic Continuity (–) → Isotopic Continuity (+)
→ Compatibility of Interest (–)

Sequence 2

Turn 36 and Turn 37

Classification

Original Message M	36
Language Direction	Chinese > English
Speech Act	Answer
Interpreted Message M'	37
Interpreted Message M' Type	Type II (<i>category 1 partially invariant</i> target message) The interpreter produces a more explicit statement.

Rationale

Discourse filtration illustrates the following interpretation filters:

1. Discourse purpose filter: The discourse purpose is identical to that of Sequence 1 and has been fulfilled.
2. Coherence filter: The interpreter assumes coherence to be insufficient, as evidenced by the interpreter's addition of the phrase "That's true or not".
3. Knowledge filter: Due to the linguistic knowledge differential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he interpreter bridges the gap by explication.

Summary of Filtering Results:

Discourse Purpose (+) → Coherence (–) → Knowledge Differential (+)

Sequence 3

Turn 38 and Turn 39

Classification

Original Message M	38
Language Direction	English > Chinese
Speech Act	Question

Interpreted Message M'	39
Interpreted Message M' Type	Type IV (<i>variant</i> target message) The interpreter repeats her earlier use of "silly," adding the intensifier "very;" paraphrases the "trick" several times by saying "kind of things" and "kind of action;" and, three times, emphasizes "pathetic" by adding the intensifier "very."

Rationale

Discourse filtration illustrates the following interpretation filters:

1. Discourse purpose filter: The discourse purpose is identical to that of Sequence 1 and has been fulfilled.
2. Coherence filter: The interpreter deems coherence to be insufficient.
3. Topic continuity filter: The topic continuity is implicit, or hypothetical, rather than explicit; the entire questioning hinges on "truth." Answering a question characterized by implicit topic continuity may conflict with the defendant's desire to portray himself as an upstanding individual.
4. Isotopic continuity filter: The interpreter has repeated BPE's descriptive word "pathetic" and added intensifiers three times, which made BPE's interrogation of the witness' credibility obvious. Therefore, we may assume that the interpreter has understood the implicit relationship isotopic dimension and made it explicit in her renditions.
5. Interest filter: There is the clash of interests between BPE and the defendant because BPE is questioning the defendant's credibility while the defendant is asserting his credibility.

Summary of Filtering Results:

Discourse Purpose (+) → Coherence (-) → Topic Continuity (-) → Isotopic Continuity (+)
→ Compatibility of Interest (-)

Sequence 4

Turn 40 and Turn 41

Classification

Message M	40
Language Direction	Chinese > English
Speech Act	Answer
Interpreted Message M'	41
Interpreted Message M' Type	Type V (<i>invariant</i> target message) with repetition phenomenon

Rationale

Discourse filtration illustrates the following interpretation filters:

1. Discourse purpose filter: The discourse purpose is identical to that of Sequence 1 and has been fulfilled.
2. Coherence filter: The continuity of situation parameters as described in Sequence 1, the lack of an identifiable knowledge differential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the continuity of purpose as described in Sequence 1 demonstrate coherence.
3. Interest filter: Compatibility of interest is assumed because the defendant has the responsibility, according to legal norms, of answering questions in the court proceedings.

Summary of Filtering Results:

Discourse Purpose (+) → Coherence (+) → Compatibility of Interest (+)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is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s in the authentic legal interpreting scenario has shown the model's adequacy in describing unanticipated variants in the interpreter's renderings in an interpre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event. Furthermore, TRIM makes the interpreter's scope of action transparent and, by extension, demands that the interpreter be explicitly aware of the filter processing capacity and associated TRIM parameters.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a previously established agreement among the involved communicative partners, including the third-party interpreter, may facilitate this explicit detailing of interpreter processes.

Conclusion and implications

In exploring the justification of non-verbatim interpretation and the existence of criteria that determine whether a message will be rendered verbatim in an actual interpreter-mediated scenario, this paper has attempted to model the set of interdependent parameters that influence the interpreter's decisions in an interpreting situation. This paper defined these parameters as dis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s, which show how the interpreter filters original message (M) to produce interpreted message (M'). The resulting typology of interpreted messages (Type I through Type V) illustrates the circumstantial restrictions surrounding the interpreted variations of M', as well as the interpreter's production of these variations in actual interpreting scenarios.

Theoretically speaking, this study has proposed indicators for empirical studies on how the M' types apply to different discourse settings;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ypes related to a number of settings can be investigated. It will also be interesting to analyze how TRIM applies to the comprehension process and to multilingual settings. Moreover,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filters to various discourse settings may provide insight into problems like language specificity, misunderstandings, or cultural disparities. Finally, this study provides the basis for investigation of the varieties of M' that appear in interpreted communication and of the reasons why certain variant messages predominate in specific settings, such as legal or healthcare.

In practice, awareness of certain factors and their interaction during an interpre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event will help the interpreter make onsite decisions. Specifically, a checklist could be developed for use in legal, medical, and law-enforcement settings; if previously negotiated and agreed upon, this checklist could be integrated into each interpreter-mediated event. With the checklist, the interpreter could work through the concretization of the parameters and filters in particular communicative situations and query the event's initiator for clarification.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equip the interpreter to anticipate challenges and to establish strategies that reflect the interpreter-mediated discourse type and purpose within the agreed-upon discourse purpose.

Didactically, the parameter constellation and discourse interpreting typology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an be used in interpreter-training courses. Both the parameters and typology will raise student awareness of the knowledge factors, skills, and situational challenges that surround the profession of discourse interpreter. Also, assignments may refer to specific situations, making the student aware of both how situation-dependent discourse interpreting is and how helpful it is to have criteria available that will reveal and justify professional interpreting decisions.

Acknowledgements

This paper is jointly sponsored by Hu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Project (13YBA412), SRF for ROCS, State Education Ministry (2013–693), and Hunan Education Department (13C551). I would like to give special thanks to my Ph.D. supervisor Professor Heindrun Gerzymisch-Arbogast of Saarland University for her everlasting support and help with this research. I would also like to acknowledge Dr. Ester Leung of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who has not only provided the corpus, but also taken her precious time to review the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e analyzing data.

References

- Angelelli, Claudia V. 2004a. *Medical Interpreting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17/CBO9780511486616
- Angelelli, Claudia V. 2004b. *Revisiting the Interpreter's Role: A Study of Conference, Court and Medical Interpreters in Canada,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DOI: 10.1075/btl.55
- Angelelli, Claudia V, Niels Agger-Gupta, Carola E. Green, and Linda Okahara. 2007. "The California Standards for Healthcare Interpreters: Ethnical Principles, Protocols and Guidance on Roles and Intervention." In *The Critical Link 4: Professionalization of Interpreting in the Community*, ed. by Cecilia Wadensjö, Birgitta Englund Dimitrova, and Anna-Lena Nilsson. 167–18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Apfelbaum, Birgit. 2007. "Conversation Dynamics as an Instructional Resource in Interpreter-mediated Technical Settings." In *The Critical Link 4: professionalization of interpreting in the community* ed. by Cecilia Wadensjö, Birgitta Englund Dimitrova, and Anna-Lena Nilsson, 53–6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Baraldi, Claudio, and Laura Gavioli. 2012. "Introduction: Understanding Coordination in Interpreter-mediated Interaction." In *Coordinating Participation in Dialogue Interpreting*, ed. by Claudio Baraldi, and Laura Gavioli, 1–2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DOI: 10.1075/btl.102.01intro
- Barik, Henri Charles. 1994. "A Descrip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Omissions, Additions and Errors of Translation Encountered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In *Bridging the Gap. Empirical Research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ed. by Sylvie Lambert, and Barbara Moser-Mercer, 121–137.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DOI: 10.1075/btl.3.12bar
- Berk-Seligson, Susan (ed). 1990, 2002. *The Bilingual Courtroom. Court Interpreters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Bowen, Margareta. 2000. "Community Interpreting." www.aiic.net/community/print/default.cfm/page234 (accessed 3 September 2014)
- Brown, Gillian, and George Yule. 1983, 2000. *Discourse Analysi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Press.
- Brunette, Louise, Georges L. Bastin, Isabelle Hemlin, and Heather Clarke (eds). 2003. *The Critical Link 3: Interpreters in the Communit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DOI: 10.1075/btl.46
- Bühler, Karl. 1986. "Linguistic (Semantic) and Extra-linguistic (Pragmatic) Criteria for the Evaluation of Conference Interpretation and Interpreters." *Multilingual* 5 (4): 231–235.
- Carr, Silvana E., Roda P. Roberts, Aideen Dufour, and Dini Steyn (eds). 1997. *The Critical Link: Interpreters in the Communit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DOI: 10.1075/btl.19
- Davidson, Brad. 1998. *Interpreting Medical Discourse: A Study of Cross-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in the Hospital Clinic*.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 Davidson, Brad. 2000. "The Interpreter as Institutional Gatekeeper: the Social-linguistic Role Interpreters in Spanish-English Medial Discourse."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4 (3): 379–405. DOI: 10.1111/1467-9481.00121
- Floros, Georgios. 2003. *Kulturelle Konstellationen in Texten: Zur Beschreibung und Übersetzung von Kultur in Texten* [Cultural Constellation in Texts: On De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 of Culture in Texts]. Tübingen: Narr.

- Foley, Tony. 2006. "Lawyers and Legal Interpreters. Different Clients, Different Culture." *Interpreting* 8 (1): 97–104. DOI: 10.1075/intp.8.1.07fol
- Gentile, Adolfo, et al. 1996. *Liaison Interpreting: A Handbook*.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 Gerzymisch-Arbogast, Heidrun. 1987. *Zur Theme-Rhema-Gliederung in amerikanischen Wirtschaftsfachtexten. Eine exemplarische Analyse* [On Theme-Rheme-Structuring in American Economic Specialized Texts. A Case Analysis]. Tübingen: Narr.
- Gerzymisch-Arbogast, Heidrun. 2003. "Die Thema-Rhema-Gliederung in fachlichen Texten [The theme-rheme-structuring in specialized texts]." In *Fachsprachen und Hochschule* [Specialized Language and College], ed. by Udo O. H. Jung, and Anastasia Kolesnikova, 43–65. Frankfurt am Main: Peterlang.
- Gerzymisch-Arbogast, Heidrun, and Martin Will. 2005. "Kulturtransfer oder 'Voice-Over': Informationsstruktur im gedolmetschten Diskurs [Culture Transfer or Voice-over : Information Structure in Interpreted Discourse]." In *Forum angewandte Linguistik Band 46, Sprache (n) in der Wissensgesellschaft* [Applied Linguistic Forum Volume 46, Language(s) in Knowledge Community], ed. by Sabine Braun, and Kurt Kohn, 171–193.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 Gile, Daniel. 1992. "Basic Theoretical Components in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In *Tea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Insights, Aims, Visions*, ed. by Cay Dollerup, and Anne Loddegaard, 185–19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DOI: 10.1075/z.56.29gil
- Gile, Daniel. 1995.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DOI: 10.1075/btl.8
- Goffman, Erving. 1981. *Forms of Talk*.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Grice, Herbert Paul.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Syntax and Semantics: Speech acts*, Vol. 3, ed. by Peter Cole, 41–5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ale, Sandra B. 2004. *The Discourse of Court Interpreting: Discourse Practices of the Law, the Witness and the Interpreter*.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Hale, Sandra B. 2007. *Community Interpreting*. Sydney: Palgrave Macmillan. DOI: 10.1057/9780230593442
- Hsieh, Elaine. 2004. *Bilingual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Medical Interpreters: Managing Role Performances and Communicative Goal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 Jakobson, Roman. 1990. *On Langu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 Jiang, Lihua. 2008. "From 'Community Interpreting' to 'Discourse Interpreting': Establishing Some Useful Parameters." *Proceedings of the Marie Curie Euroconferences MuTra: LSP Translation Scenarios – Vienna, 30 April – 4 May 2007*. http://www.euroconferences.info/proceedings/2007_Proceedings/2007_proceedings.html (accessed 3 September 2014)
- Jiang, Lihua. 2011. *How Far Can a Community Interpreter Go? Dis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s*. Hamburg: Verlag Dr. Kovač.
- Kadric, Mira. 2000. "Interpreting in the Austrian Courtroom." In *The Critical Link 2: Interpreters in the Community*, ed. by Roda P. Roberts et al., 153–16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DOI: 10.1075/btl.31.18kad
- Kalina, Sylvia. 2002. "Interpreters as Professionals." *Across Language and Cultures* 3 (2): 169–187. DOI: 10.1556/Acr.3.2002.2.3
- Kurz, Ingrid. 2001.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Quality in the Ears of the User." *Meta* 45 (2): 394–409. DOI: 10.7202/003364ar

- Mason, Ian (ed). 2001. *Triadic Exchanges: Studies in Dialogue Interpreting*.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 Mason, Ian. 2004. "Conduits, Mediators, Spokespersons: Investigating Translator/Interpreter Behavior. In *Translation Research and Interpreting Research: Traditions, Gaps and Synergies*, ed. by C. Schäffner, 88–97. Clevedon, Buffalo and Toronto: Multilingual Matters.
- Mason, Ian. 2012. "Gaze, Positioning and Identity in Interpreter-mediated Dialogues." In *Coordinating Participation in Dialogue Interpreting*, 177–20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DOI: 10.1075/btl.102.08mas
- Meyer, Bernd. 2000. *Medizinische Aufklärungsgespräche: Struktur und Zwecksetzung aus diskursanalytischer Sicht*. [Medical Informed Consent Discussion: Structure and Goal Setting from Discourse-analytical Perspective]. Arbeiten zur Mehrsprachigkeit, Folge B (Nr. 8) [Multilingualism Works, Series B]. Universität Hamburg: Sonderforschungsbereich Mehrsprachigkeit [Collaborative Research Areas Multilingualism].
- Meyer, Bernd. 2004. *Dolmetschen im medizinischen Aufklärungsgespräch. Eine diskursanalytische Untersuchung zur Arzt-Patienten-Kommunikation im mehrsprachigen Krankenhaus* [Interpreting in Medical Informed Consent Discussion. A Discourse-analytical Examination of Doctor-patient-communication in a Multilingual Hospital]. Münster: Waxmann.
- Metzger, Melanie. 1995. *The Paradox of Neutrality: A Comparison of Interpreter's Goals with the Realities of Interactive Discourse*. Ph.D Dissertation,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 Metzger, Melanie. 1999. *Sign Language Interpreting: Deconstructing the Myth of Neutrality*. Washington, D.C.: Gallaudet University Press.
- Mikkelsen, Holly. 2000. *Introduction to Court Interpreting*. Manchester: St. Jerome.
- Morris, Ruth. 1995. "The Moral Dilemmas of Court Interpreting." *The Translator* 1 (1): 25–46. DOI: 10.1080/13556509.1995.10798948
- Moser, Peter. 1996. "Expectations of Users of Conference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ing* 1(2): 145–178.
- Moser-Mercer, Barbara. 1996. "Quality in Interpreting: Some Methodological Issues." *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 7: 43–55.
- Mudersbach, Klaus. 1991. "Erschließung historischer Texte mit Hilfe linguistischer Methoden [The Development of a Historical Text with the Help of Linguistic Methodology]." In *Reihe historisch-sozial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en des Zentrums für historische Sozialforschung [A Series of Historical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318–362. St. Katharinen: Script Mercaturae.
- Mudersbach, Klaus. 2004. "Kohärenz und Textverstehen in der Lesersicht. Oder: Wie prüft man die Stimmigkeit von Texten beim Lesen [Coherence and Text Comprehension in Readers' Eyes. Or: How Can We Prove Coherence of the Texts in Reading]." In *Neue Perspektiven in der Übersetzungs- und Dolmetschwissenschaft*, ed. by Juliane House, Werner Koller, and Klaus Schubert, 249–272. Bochum: AKS.
- Mudersbach, Klaus, and Heidrun Gerzymisch-Arbogast. 1989. "Isotopy and Translation." In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Training and Foreign Language Pedagogy*, ed. by Peter Krawutschke, 147–170. DOI: 10.1075/ata.iii.13mud
- Opraus, Adela. 2003. "Rollen der Dolmetscherin in der psychotherapeutischen Triade [The Interpreter's Roles in the Psychotherapy Triad]." In *Übersetzen und Dolmetschen, 4.1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ed. by Klaus Schubert, et al., 117–138. Tübingen: Narr.
- Pöchhacker, Franz. 2004. *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Pöllabauer, Sonja. 2003. *Translatorisches Handeln bei Asylanhörungen. Eine diskursanalytische Untersuchung* [Translational Actions in Asylum Hearings. A discourse-analytical Examination]. Ph.D. Dissert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Graz.
- Pöllabauer, Sonja. 2004. "Interpreting in Asylum Hearings. Issues of role, responsibility and power." *Interpreting* 6 (2): 143–180. DOI: 10.1075/intp.6.2.03pol
- Reddy, Michael J. 1979. "The Conduit Metaphor: A Case of Frame Conflict in our Language about Language." In *Metaphor and Thought*, ed. by Andrew Orton, 164–20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berts, Roda P. et al. (eds). 2000. *The Critical Link 2: Interpreters in the Communit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DOI: 10.1075/btl.31
- Rosenberg, Brett Allen. 2001. *Describing the Nature of Interpreter-mediated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 Quantitative Discourse Analysis of Community Interpreting*. Ph.D. dissert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 Roy, Cynthia B. 2000. *Interpreting as a Discourse Proc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udvin, Mette. 2007. "Professionalism and Ethics in Community Interpreting: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ist Versus Collective Group Identity." *Interpreting* 9 (1): 47–69. DOI: 10.1075/intp.9.1.04rud
- Sauerwein Sami, Fadia. 2006. *Dolmetschen bei polizeilichen Vernehmungen und grenzpolizeilichen Einreisebefragungen: Eine explorative translationswissenschaftliche Untersuchung zum Community Interpreting* [Interpreting in Police Interrogation and Border Police Entry Questioning]. Frankfurt, Berlin, and Bern: Peter Lang.
- Schulz von Thun, Friedemann. 1981. *Miteinander reden 1 – Störungen und Klärungen. Allgemeine Psychologie der Kommunikation* [Talk with Each Other 1 – Interference and Clarification. General Communication Psychology].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Taschenbuch-Verlag.
- Shlesinger, Miriam. 2008. "Gray Goes with the Territory: Certainties and Uncertainties in Public Service Interpreting." http://www.translationconcepts.org/pdf/Miriam_Shlesinger_presentation.pdf (accessed 3 September 2014)
- Sunwoo, Min. 2008. "Operationalizing the Translation Skopos." In *Proceedings of the Marie Curie Euroconferences MuTra: LSP Translation Scenarios – Vienna, 30 April – 4 May 2007*, http://www.euroconferences.info/proceedings/2007_Proceedings/2007_proceedings.html (accessed 3 September 2014).
- Tebble, Helen. 1996. "Research into Tenor in Medical Interpreting." *Interpreting Research: Journal of the Interpreting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Japan* 6: 33–45.
- Tebble, Helen. 1998. *Medical Interpreting: Improving Communication with Your Patients* (companion to video): 1–55. Geelong: Language Australia.
- Thiel, Gisela, and Gisela Thome. 1988. "Isotopiekonzept, Informationsstruktur und Fachsprache. Untersuchung an wissenschaftsjournalistischen Texten [Isotopy Concept,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Specilized Languages. Examination of Scientific Journal Texts]." In *Textlinguistik und Fachsprache* [Text linguistics and Specialized Languages] ed. by, Rainer Arntz, 299–331. Hildersheim: Olms.
- Thiel, Gisela, and Gisela Thome. 1996. *Vermuten. Nominale Ausdrucksmittel im Wissenschaftsjournalismus (Deutsch - Französisch - Englisch)* [Assumption, Nominal Expressions in Scientific Journals (German-French-English)]. Tübingen: Narr.
- Vermeer, Hans J. 1978. "Ein Rahmen für eine allgemeine Translationstheorie [A Framework for a General Translation Theory]." *Lebende Sprachen* [Living Languages], 23 (3) 99–102. DOI: 10.1515/les.1978.23.3.99

- Wadensjö, Cecilia. 1992. *Interpreting as Interaction: On Dialogue-interpreting in Immigration Hearings and Medical Encounters*. Ph.D. dissertation, Linköping University.
- Wadensjö, Cecilia. 1998. *Interpreting as Interaction*. New York: Longman.
- Will, Martin. 2009. *Dolmetschorientierte Terminologearbeit. Modell und Methode* [Interpreting-oriented Terminology Work. Model and Methodology]. Tübingen: Gunter Narr.

Authors' addresses

Lihua Jiang
Faculty of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2
China

Chong H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Arts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Locked Bag 1797
Penrith NSW 2751
Australia

Jinlin Ji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Yue Fe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Copyright of Translation & Interpreting Studies: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Translation & Interpreting Studies Association is the property of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and its content may not be copied or emailed to multiple sites or posted to a listserv without the copyright holder's express written permission. However, users may print, download, or email articles for individual use.

中国翻译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2020/5

第41卷
总第263期
双月刊

中国翻译协会会刊

05 文本移植的生命存续 ——“生生之谓译”的生态翻译学新解

13 译者研究的问题转换与生态定位： 生态翻译学视角

20 再论翻译生态环境

弗兰金仙的译介与民族象征符号

“拼却声名顾大局”：曾纪泽的跨语际实践

卡尔维诺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1955-2019）

口译学能测试预测效度研究：以目的语复述为例

国内外翻译硕士人才培养模式对比研究



扫描全能王 创建

编委会主任 周明伟

编委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刚毅 王敏强 刘德君 宋书声

周明伟 林武原 周明伟 赵军强

施燕琴 高海明 郭晓勇 唐国生

编委组 黄友义 周明伟

编委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庆凤 中山大学

王宁 上海交通大学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瑞辉 中国网

王敏强 英国利兹大学

朱兆深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仲伟合 澳门城市大学

任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

刘军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刘和平 北京语言大学

刘树森 北京大学

许哲 浙江大学

孙艺风 澳门大学

孙敬礼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李瑞林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杨平 中国翻译协会

张美芳 澳门大学

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

罗选民 清华大学

胡开宝 上海交通大学

黄永刚 中国外文局

祝朝晖 四川外国语大学

蔡明强 上海外国语大学

曹明伦 四川大学

蔡正坤 北京大学

张天振 上海外国语大学

陈川运 美国明德大学

谭敬真 深圳大学

廖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声明

本刊来稿要求原创, 切勿一稿多投。向本刊投稿者, 应当保证作品著作权的完整性、合法性, 作品及内容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来稿如被采用, 除另有约定, 将被发表在本刊、本刊合刊、本刊合作网站数据库及由本刊授权的其他出版物。

来稿在本刊发表后, 除另有约定, 作者即已授权给本刊处理转载事宜。凡以转载、转编、复制、翻译等方式使用该作品者, 必须征得本刊同意。

生态翻译研究专栏 /

05 文本移植的生命存续

——“生生之谓译”的生态翻译学新解

胡庚申

13 译者研究的问题转换与生态定位: 生态翻译学视角

罗迪江

20 再论翻译生态环境

方梦之

译史纵横 /

28 弗兰金仙的译介与民族象征符号

廖七一

36 “拼却声名顾大局”: 曾纪泽的跨语际实践

杨焯

译介研究 /

44 卡尔维诺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1955-2019)

周婷

翻译教学 /

52 口译学能测试预测效度研究: 以目的语复述为例

尚小奇 柴明频

63 国内外翻译硕士人才培养模式对比研究

史兴松 牛一琳

译家研究 /

71 论冯友兰哲学术语翻译思想

周勇

79 东亚视野与译学互动

——论韩国汉学家朴宰雨的中国文学译介

张乃禹

学术视点 /

88 认知术语学视角下中华思想文化核心术语翻译的概念建构模型

——以“天”相关术语为例

黄鑫宇 魏向清

书刊评介 /

98 口笔译神经认知的研究理念与理论构建

——The Neurocognition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评析

侯林平 郎玥



学术访谈 /

- 107 跨学科翻译研究: 学科意识与系统路径
——加尔博夫斯基访谈录 纪春萍

行业研究 /

- 113 区块链技术的众包翻译应用 陆艳

翻译技术 /

- 121 人工智能技术在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中的应用与评价 周兴华 王传英

学术争鸣 /

- 130 浅谈《伤寒论》罗希文译本中的几个翻译问题 王娜 闻永毅

实践探索 /

- 136 政治话语重复修辞的翻译
——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例 邓中敏 曾剑平
145 植物名称的因类制宜翻译法探索 任开兴
154 西方修辞学视角下的法庭口译研究 赵军峰 杨之森
163 多模态视角下的远程视频会议口译
——基于医疗平台视频线上会议的案例分析 蒋莉华 李颖

自学之友 /

- 171 The Bohemian Girl (Excerpt) (Willa Cather) 曹明伦 译
174 翻译什么就研究什么 曹明伦
179 “民主”概念变迁的启示 (林巍) 林巍 译
182 在历史沿革中辨析与疏通
——关于“民主”概念的翻译 林巍

- 187 词语选译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相关词汇英文表述 (三)

- 190 英文摘要

- 192 更正

主管单位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

主办单位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

中国翻译协会

编辑单位

《中国翻译》编辑部

主编

杨平

副主编

苑爱玲

本期责编

张浩

英文顾问

刘亚猛

编辑部电话

(010) 68326681 68327209

编辑部信箱

zhongguofanyi@tac-online.org.cn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51 68994027

发行部信箱

taccn2008zhgfybjb@gmail.com

发行部 QQ

1399136384

举报电话

(010) 68995925

网址

www.tac-online.org.cn

新浪微博

@中国翻译杂志社

通信地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编

100037

法律顾问

岳成律师事务所

制作

北京兰卡宏图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河北华商印刷有限公司

总发行处

北京市邮政局

订阅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第 0325 号

本刊刊名由钱钟书题写

本刊微信二维码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0-873X
CN 11-1354/H

国内代号: 2-471

国外代号: BM272

定价: 30 元



扫描全能王 创建

多模态视角下的远程视频会议口译

——基于医疗平台视频线上会议的案例分析

蒋莉华 李颖 湖南师范大学

摘要: 2019年爆发的新冠疫情改变了人们沟通交流的方式,远程视频会议成为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受到远距离位置、技术手段、交流模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远程视频会议口译中的译员面临心理压力、信息的获取和理解等多方面挑战。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远程视频会议口译的性质特点,从多模态视角对杜松医疗在线平台的远程视频会议案例进行分析,有助于理解此种口译形式对译员能力和素质新的要求。

关键词: 多模态视角;远程视频会议口译;译员;公共卫生危机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73X(2020)05-0163-08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语言服务商们采取各种方式减少双语沟通中的时间差和成本,打破了地域和时间限制的视频会议口译形式由此应运而生。视频会议的形式最早出现在九十年代初,此后的几十年间得到了迅猛发展。此次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催发了远程视频口译的发展。受疫情的影响,许多传统的国际会议都转战线上,为了共同抗疫,各国专家也纷纷通过远程视频会议进行沟通交流,因此国际上对于远程视频会议口译的需求大幅增加,这极大地促进了远程视频会议口译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使得学界越来越关注此种口译形式的翻译质量、译者素质和教育等各类问题。

一、远程视频会议口译

随着5G时代的到来,通信技术的发展为实时远程通信创造了大量机会,也给口译服务提供了多种可行的方式。根据Braun^①的定义,远距离口译(Distance Interpreting)指利用远程通信技术来进行的口译活动。

根据交流媒介的不同,可分为视频口译(Video-Mediated Interpreting)和电话口译(Telephone-Mediated Interpreting)。视频口译包括远程视频口译(Video Remote Interpreting,简称VRI)和视频会议口译(Videoconference Interpreting,简称VCI)。VRI中的所有参与方位于同一地点,而口译员位于另一地点。VCI中的所有参与方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地点,口译员与其中一方或多方位于同一地点。根据各参与方与口译员所处位置的不同,还可以分为远程会议口译(Teleconference Interpreting)和远程口译(Remote Interpreting)。远程会议口译指会议参与方处在两个或多个地点,包括电话会议口译(Telephone/Audioconference Interpreting)和视频会议口译。

与传统口译相比,远程口译具有“非现场性”、“及时性”、“成本低”和“专业程度高”等特征(刘春伟、魏立,2017)。在此情境下,第一,非语言信息缺失。交际各方缺乏肢体语言等副语言工具来辅助理解,译



员无法通过非语言元素获得完整的交流信息,也无法与交际各方进行直接交流来干涉语流、纠正及反馈,错误信息无法得到及时纠正。第二,高度依赖技术设备。由于此种口译过程中高度依赖通讯设备,通讯信号的稳定(如电话信号、网络视频信号、摄像设备质量)直接影响到口译质量和进程。

最早的远程会议口译试验是在1976年。为了满足语言需求并减轻与解决大批口译人员的流动困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和内罗毕之间通过 Symphonic Satellite 进行了人类历史上首次远程口译试验。1978年联合国又在纽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开展过一次类似试验。欧盟扩张之后,欧盟机构对于远程会议口译试验最为热衷,主要是出于环保和节约成本的考虑(姚斌,2011:35)。对远程会议口译的早期探索主要集中于讨论技术的可行性,而对口译员在远程状态下的工作条件和自身感受涉足较少。1990年代,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展开了不少大规模的试验,充分讨论了远程会议口译的优势与弊端。到了21世纪初,研究者发现,由于远程会议中情感交流等行为很难通过技术实现,造成了口译者心理上的疏远感(Moser-Mercer, 2005; Mouzourakis, 2006; Braun, 2007/2011; Roziner & Shlesinger, 2010),因而远程会议口译的可行性一直成为学者们争议的热点。在讨论远程音频和视频信号传输技术的同时,学界也开始关注和探讨译员在此新的工作环境和技术条件下所面临的挑战,以及需要应对的策略(Braun, 2007/2011/2013; Napier & Skinner & Braun, 2018; Salaets & Brône, 2020)。在此研究领域,国内学者主要围绕远程口译的历史特点和对教学的启发而展开(肖晓燕, 2009;

姚斌, 2011; 詹成, 2012; 刘春伟、魏立, 2017),更多关注现场口译和远程口译之间的不同,以及开设远程口译课程的必要性,对于口译的整体质量和译员表现较少涉及。有鉴于此,本文将从多模态视角探讨该口译形式对译员能力和素质的新要求。

二、多模态视角下的远程视频会议口译

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发展,人类生活和交际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交流并非如过去一样仅仅局限于面对面的语言交流,而是呈现出更加多样的语言交际方式和更为丰富的交际层次,各类即时通信工具(例如微信、QQ、Zoom、腾讯会议等)赋予了交际行为更多的变化、内涵和意义。文字、图形、符号、动作、影音资料等都可以部分甚至是完全实现双方话语意义的传达,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语言的沟通功能,形成了内容丰富的语篇系统。单一的语言媒介逐渐被由语言、图像、声音等构成的复杂媒介所取代(冯德正等, 2014)。在新的交流形式层出不穷的时代,口译领域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出现了多种新的翻译方法,源文本也越来越复杂多样(Dicerto, 2018)。因此,口译员除了关注源语中的“言语”所传达的信息之外,也应关注其他模态所传达的信息,考虑其他模态信息如何与口头交流信息相互作用,并影响口译员的理解和译出。

(一)多模态话语分析

模态“指人类通过感官(如视觉、听觉等)跟外部环境(如人、机器、物件、动物等)之间的互动方式。”(顾曰国, 2007: 3)互动活动中若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模态,则称为多模态。多模态文本是指对文本信息传



55)。目前国内的多模态话语研究主要是应用型研究,最为常见的是将“视觉语法”应用于特定语类、语篇的分析,以揭示多模态语篇中意义的构建方式。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关注的重点在外语教学 and 多媒体翻译领域,从多模态理论的角度对口译的探究仍显不足。

(二) 公共卫生危机下的远程视频会议案例分析

1) 语料背景

以下章节将选取杜松医疗平台的远程视频线上会议案例^②进行分析。新冠疫情在各国的努力和一线医护人员的付出下,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控制,社会的运转也在逐渐恢复。在抗击疫情和救治病人的过程中,医护人员经历了身心上的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杜松医疗平台举行了主题为“新冠疫情下,身心俱疲的医护人员”的远程视频会议分享,探讨如何给医护人员提供良好的心理健康支持。

与会的专家包括 Susan L. Rosenthal 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瓦格洛斯内外科医师学院儿科教职工发展部副主席)、官锐园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医学心理学系主任)和主持人 David P. Roye Jr.(中文名骆德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教授、杜松医疗首席医疗官、国际医疗领导力创始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整个视频会议全长1小时17分钟,活动流程包括:首先,官锐园教授介绍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状况与应对措施,该部分是官锐园教授的中文发言,由口译员进行远程的交替传译。接下来是 Rosenthal 教授介绍当前医护人员的现状以及医护人员如何关爱自己。该部分是 Rosenthal 教授的英语发言,由口译员进行交替传译。最后一部分是讨论与回答观众的问题。整个交流过程中涉及到口头语言、文本和图片的多种模态。会议前面两部分的讲者发言均配有双语 PPT。

官锐园教授的 PPT 共 9 页,内容包括图表和文字(色彩标识)。Rosenthal 教授的 PPT 共 4 页,内容主要为文字。讨论与观众问答部分主要是口语形式。

笔者将口语部分按照语言学规则转写为文本并制作出案例语料。音频的转写中使用了一些语言学标识:“=”标识表明话轮的重叠,大写的字母表明语气的强调,“:”分号标识迟疑和短暂的停顿,“{ }”大括号朝内标识语速加快,“} {”大括号朝外标识语速减慢,“[]”中括号标识非言语信息,“(2.5)”小括号里面的数字标识停顿的秒数。“(.)”标识极短暂停顿。

2) 分析和讨论

(1) 适度删减,简洁明了

远程视频会议口译过程时,译员不能只关注发言人的语言这一单一模态,还需要重视 PPT 上的文本信息和图片信息。通过三种模态信息的结合,并根据与会人的专业背景,对译文做出适度删减,就能使译文更简洁明了,有助于双方的高效交际。

例 1.(官锐园教授)我们主要使用的问卷呢是叫心理健康自评问卷是(.)WHO 推荐的一个主要是测量(.)焦虑(.)抑郁(.)还有躯体化的这样的三个因子。

(口译员) So, the survey we used are SRQ (.) recommended by WHO.

例 2.(官锐园教授)我们把这个分数做了一个排序呢(.)那可以看到前三位的呢是相当于第 20 个条目(.)是容易疲劳和第三个睡眠差和感觉不安紧张(.)所以可以看到前面的这几个量(.)几个因子呢都是跟焦虑有关系。

(口译员) So (.) {that means that one third of the medical staff is facing psychological issu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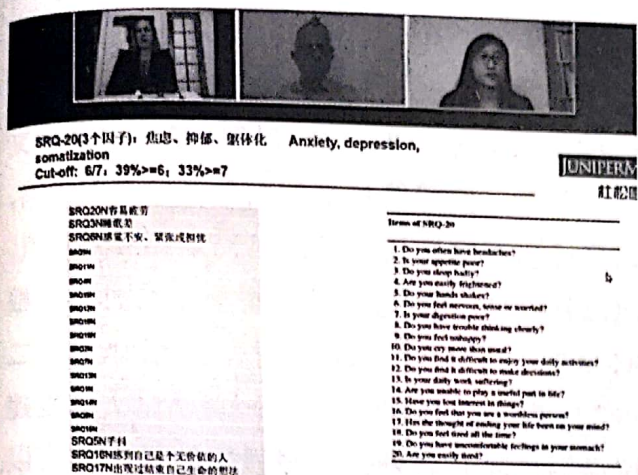


图1 心理健康自评问卷

这一部分是官教授对心理健康自评问卷和调查结果的介绍。

例1是对心理健康自评问卷的介绍,语言模态主要涵盖两层意思:一是调查因子包括焦虑、抑郁和躯体化;二是问卷是由WHO推荐的。译员并没有译出其中具体的三个因子,看似漏译了第一层含义。考虑到PPT上文本模态上的内容(见图1),已经清楚地写出了SRQ调查问卷主要调查的三个因子,且与会的两位听众都是医学领域专家,对此十分熟悉,因此译员可能有意删减了这一部分,使得译文变得更加简明。

例2是对调查结果的解释,语言模态指明了排在前三的因子:容易疲劳、睡眠差和感觉不安、紧张,且这三个因子都与焦虑相关。译员直接改译为三分之一的医护患者面临心理健康问题,而且译语的语速变快。这可能是因为译员前面的部分没有处理好,希望快速地将前面的内容重新译出,也可能因为注意力分配原因没有听全发言,或者没有关注到PPT上的文本和图片,因此直接放弃翻译此部分。这部分除了语言模态,可以看到图片模态上的信息(见图1),清楚地展现了排在最前面的三个因子,且以红色标出

(前三行),所以即使没有听清发言人的话语,也可以根据PPT中的图片进行处理。结合图片删减具体症状信息,该处建议译为: The top three are Q20, Q3 and Q6, as being shown in the picture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slide. They are all related to anxiety. 这样既可以省略发言人所说的症状,同时结合PPT内容进行解释说明,使译文更清晰明了和易懂。

(2) 适当增补,解释说明

远程视频会议口译中,发言人一般会在PPT上列出发言的大纲和关键信息,因此译员不能仅关注语言模态,还要关注PPT上的文本模态,整合发言人的言语信息和PPT上的文本信息,添加指示词和逻辑词使译文更清楚易懂。

例3.(官锐园教授) 那额::有很多研究发现呢(.)包括SARS的这个过程中会发现(.)人们在出现症状的时候呢(.)他的一些想法跟他的症状也是有一些关联(.)那我们这个呢也调查了他的一些担忧啊困扰(.)然后发现呢(.)主要是第二条(.)我担心家人被传染和第九条和第十条(.)就是同事出现疑似症状让我担忧(.){和自己出现疑似症状让我担忧}(.)就是出现疑似症状和担心家人(.)那这两个(.)这三个条目是我们排序来讲(.)所有的医护人员(.)排在前三位最大的担心和困扰。

(口译员) So,..em..(.) 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 from umm form the SARS epidemic, many of these ideas..em.. torturing the medical staff are related to their symptoms actually. So, number(.) from this list number 2, number 9 and number 10 are mostly shared by um(.) the medical staff.

例4.(Susan L. Rosenthal 教授) Apart from that, what I:: can't emphasis enough is



that (.) caring for ourselves is a team sport.

(口译员) 第三个就是我就是想一直强调的就是减轻自己的压力 (.) 能够关爱自己 (.) 其实是一个团队协作。



担心或困扰 Concerns	
1. 我担心自己被传染	I'm worried about being infected
2. 我担心家人被传染	I'm afraid my family will be infected
3. 我担心因为自己疏忽使同事出现感染风险	I'm worried about my colleagues' risk of infection due to my negligence
4. 我因为没办法照顾家人感到自责	I feel guilty for not being able to take care of my family
5. 我为家人担心自己感到愧疚	I feel guilty for worrying about myself for my family
6. 防护装备使医疗操作变得困难	Protective equipment makes medical operation difficult
7. 病人和家属情绪反应让我烦恼	The emotional reactions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bothered me
8. 病人病情恶化让我担忧	I'm worried about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patient's condition
9. 同事出现疑似症状让我担忧	I'm worried about my colleagues' suspected symptoms
10. 自己出现疑似症状让我担忧	I'm worried about my suspected symptoms

图2 担心和困扰的症状



关爱医护人员的关键点 Key Aspects of Taking Care of Ourselves	
• What does care for ourselves look like 怎样算是医护人员关爱自己	
• Caring for ourselves is a team sport 关爱自己需要团队合作	
• Planning ahead/preparing for our needs 提前计划, 为自己的需求做准备	
• Preparing as a health care provider 作为医疗服务提供者, 做好准备	
• What to do if you become overwhelmed 当你过度劳累的时候, 应该怎么做?	
• Establishing routines for ourselves and our families 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日常习惯	

图3 关爱医护人员的关键点

上述两个例子中, 例3的语言模态主要讲的是人们的症状与他们的担忧相关, 以及人们最大的担忧。在这里译员增译了 from this list, 可能是因为考虑到了 PPT 上的表格 (见图2) 和表格中的文本信息模态。口译员将表格增译出来, 根据 PPT 上的图片进行解读和删减, 将列表中已出现的信息不再重复说明, 可以给听众提供更简洁易懂的译文。

例4中, 发言人在讲解她整个部分的

第二点, 但是并没有加以逻辑词来体现是第二点。译员增译了“第三个”这一逻辑词, 这种做法非常可取, 通过增译逻辑词使译文更有条理。但可能是受到前面各分点的影响, 译员没有注意到这里不是第三点而是第二点, 可以从 PPT 上的文本模态看出 (见图3)。根据 PPT 上的大纲, 翻译时可以增译“第二点”, 使译文更有条理, 逻辑更清晰。该处建议译为: 除此之外, 我想强调的是大家可以看到的 PPT 上的第二点, 即关爱自己需要团队合作。

(3) 整合调整, 逻辑连贯

远程视频口译过程中, 如果译员没有注意到源语的多模态特征, 表达容易出现偏差, 出现逻辑连贯问题, 因此需要结合发言, 整合多方信息给出译文。

例5。(官锐园教授) 那我们也调查了 (.) 就是它在当前有什么应对 :: 策略 (.) 然后排在前三位的呢 (.)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红色的 (.) 就是他采取了自我保护措施 (.) 消毒啊 (.) 自己预防 (.) 那么还第二位呢 (.) 就是主动去学习病毒相关的知识 (.) 以及呢自己注意自己的日常休息 (.) 那么这三点呢我们按照应对类型来讲 (.) 主要都是这个额 :: 问题相关的一个应对。

(口译员) We have also investigated the strategies (.) which adopted by the medical staff, including {protection for themselves for example}, they will do more sterilization. They will learn more about the virus and take more rest. So, this is mostly..em.. the issue-related strategies.

这一部分主要是介绍当前医护人员对抗心理压力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例5中, 发言人介绍了前三种应对措施, 提到了 PPT 上的





当前的应对措施 Current coping methods

JUNIPERM
红松露

在现阶段工作中，您是否采取一些措施保护自己？Currently, how do you protect yourself?	应对类型 Coping style
1 自我保护措施 Self protection	事件应对 Event coping
2 主动学习病毒知识 Studying knowledge about COVID-19	
3 注意休息 A good rest	
4 乐观的心态 Keeping to be optimistic	情绪应对 Emotion coping
5 家人或朋友聊天 WeChat with family or friends	
7 了解心理知识 Getting to know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6 限制关注疫情时间 Decreasing the attention on the disease conditions	
8 冥想等放松训练 Meditation or relax practice	
9 哭喊释放情绪 Crying or yelling to release emotions	

图4 当前的应对措施

红色字体加以说明。译员的译文中并没有体现红色字体，可能是因为没有注意到 PPT 上的文字和图片模态，所以就直译出了语言模态中的信息。事实上，结合 PPT 来看（见图 4），前三种应对措施，已经特别标红。当发言人说大家可以看到红色时，译员可以结合红色的部分来整合译文，因为红色的部分就是发言人所说的内容，只是在第一条自我保护中增加了一条（经常消毒），翻译时补充出来即可。译员把消毒和后面的两大点直接并列在一起，译成 “For example, they will do more sterilization. They will learn more about the virus and take more rest”，逻辑上出现了偏差。此外，对于发言人所说的“主要问题相关的应对”就是 PPT 中展示的“事件应对”，可以直接按照 PPT 上内容来译为 coping event，译文更加准确，译员也更轻松。此处建议译为：The top three strategies as you can see in this slide, the red part, are firstly, self-protection, including sterilization; secondly, studying knowledge about COVID-19, and thirdly, having a good rest. In terms of the coping styles, they are event coping strategies.

通过以上案例分析可以发现，远程视

频口译中的源语语篇是一个多模态的立体语篇，其意义由发言人的语言信息、副语言信息和非语言信息复合而成。远程视频会议中的口译员在理解和发布信息时整合了多种信息来源：一个是听觉感知，其信息来自发言人的语言表达和副语言表达（如语音、语调、重音等）；另一个是通过视频手段接收到的视觉感知（包括表情、手势、身势及其使用的辅助视觉符号，例如图片等）。如果口译过程中发言人同时展示 PPT，还涉及其中的文字部分。由此可见，口译语篇的特征，尤其是在远程传播模式上，具有特殊性，应从多层面进行多模态分析。通过多模态交际分析框架可以对交际文本、视频、图像进行分析，识别多模态信息中的交际内涵，增进交际过程中的感知和理解。

三、结语

后疫情时代下的视频会议已成为人们之间沟通和交流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提供语言服务的口译员在这种新型的口译形式中面临着距离疏远、技术困难、多模态信息等多方面的挑战。由于视频会议涉及图片、文本和语言的多种模态，本文利用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框架，探析了新冠疫情期间国内外医务工作者的沟通案例，指出如何从多模态的角度对源语信息进行多个层面的分析，识别信息中的交际内涵，通过各种策略和技巧来接收和传递信息，有助于理解此种口译形式对译员能力和素质的要求，同时也为译员的教育培训提供思路。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一般项目“基于虚拟现实平台的口译练习语料库”（项目编号：16BYY02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

- ① 远程口译定义和分类来自 Braun 主持的欧盟 AVIDICUS 项目 (<http://wp.videoconference-interpreting.net/>) (accessed on 21.05.20)
- ② 所选案例获得了杜松医疗平台 (<https://www.junipermd.com/>)、国际医

疗领导力、哥伦比亚全球中心·北京以及参与此次远程视频会议的 Susan L. Rosenthal 教授、David P. Roye Jr. 教授和官锐园教授的使用授权,在此特别致谢。

参考文献 |

- [1] 冯德正、张德禄、Kay O'Halloran. 多模态语篇分析的进展与前沿 [J]. 当代语言, 2014 (1): 88-99+126.
- [2] 顾曰国. 多媒体、多模态学习剖析 [J]. 外语电化教学, 2007 (2): 3-12.
- [3] 胡壮麟. 社会符号学研究中的多模态化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7 (1): 1-10.
- [4] 胡壮麟. 谈多模态小品中的主体模态 [J]. 外语教学, 2011 (4): 1-5.
- [5] 刘春伟、魏立. 欧美远程口译发展对我国口译人才培养模式的启示 [J]. 语言教育, 2017 (4): 15-19.
- [6] 李战子. 多模式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 [J]. 外语研究, 2003 (5): 1-8+80.
- [7] 辛红娟、陈可欣. 多模态话语分析视角下外宣纪录片翻译研究——以《四季中国》为例 [J]. 对外传播, 2020 (2): 54-56.
- [8] 肖晓燕、张梅. 美国电话口译的职业现状及理论分析 [J]. 上海翻译, 2009 (2): 22-27.
- [9] 姚斌. 远程会议口译——回顾与前瞻 [J]. 上海翻译, 2011 (1): 32-37.
- [10] 詹成、索若楠. 电话口译在我国的一次重要实践——广州亚运会、亚残运会多语言服务中心的电话口译 [J]. 中国翻译, 2012 (1): 107-110.
- [11] 张德禄. 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探索 [J]. 中国外语, 2009 (1): 24-30.
- [12] 张德禄. 系统功能理论视阈下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 [J]. 现代外语, 2018 (6): 731-743.
- [13] 朱永生. 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J]. 外语学刊, 2007 (5): 82-86.
- [14] Braun, S. Keep your distance? Remote interpreting in legal proceedings [J]. *Interpreting*, 2013: (2): 200-228.
- [15] Braun, S. & Taylor, J. Video-mediated interpreting: an overview of current practice and research [A]. In Braun, S. & J. Taylor (eds.), *Videoconference and remote interpreting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C]. Guildford: University of Surrey, 2011: 27-57.
- [16] Braun, S. Interpreting in small-group bilingual videoconferences: challenges and adaptation processes [J]. *Interpreting*, 2007 (1): 21-46.
- [17] Dicerto, S. *Multimodal Pragmatics and Translation: A New Model for Source Text Analysis* [M].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 [18] Kress, G. & T. van Leeuwen.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M]. London: Routledge, 1996.
- [19] Kress, G. & T. van Leeuwen.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M]. London: Arnold, 2001.
- [20] Jewitt C. Introduction: Handbook. Rationale, Scope and Structure [A]. In Jewitt C.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ultimodal Analysis* [C]. London: Routledge, 2009.
- [21] Moser-Mercer, B. Remote interpreting: issues of multi-sensory integration in a multilingual task [J]. *Meta*, 2005(2): 727-738.
- [22] Mouzourakis, P. Remote interpreting: a technical perspective on recent experiments [J]. *Interpreting*, 2006(1): 45-66.
- [23] Napier J. & Skinner, R. & Braun, S. (eds.). *Here or There: Research on Interpreting via Video link* [C]. Washington D.C.: Gallaudet University Press, 2018.
- [24] Pöchhacker, F. "Going video": mediality and multimodality in interpreting [A]. In Salaets, H. & Brône, G. (eds.). *Linking up with Video: Perspectives on interpret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20: 13-46.
- [25] Roziner, I. & Shlesinger, M. Much ado about something remote: Stress and performance in remote interpreting [J]. *Interpreting*, 2010(2): 214-247.
- [26] Salaets, H. & Brône, G. (eds.). *Linking up with Video: Perspectives on interpret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 [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20.
- [27] Walsh, M. Reading Visual and Multimodal Texts: How is "Reading" Different? [J]. *Australian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teracy*, 2006(1): 24-37.

作者简介 蒋莉华, 博士, 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口译研究和翻译学。

李颖,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口译研究。

作者电子信箱 lhjiang@hunnu.edu.cn; 1622925980@qq.com



翻译继续教育领域口译教学新模式探索

——来自 IVY 项目的启示

蒋莉华 彭雪姣 湖南师范大学

摘要：翻译的继续教育是院校教育的延续。随着国内口译服务市场需求的增加，亟需建立一种高端翻译培养体制，以便翻译从业人员在工作中不断累积经验和继续学习。有鉴于此，本文将基于口译继续教育模式和终身学习的理念，从虚拟现实（VR）环境的设置、用户体验和语料库建设方面介绍欧盟的 IVY 项目，为探索国内继续教育领域口译教育新模式提供借鉴。

关键词：翻译继续教育模式；虚拟现实（VR）；IVY 项目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3X（2018）06-0041-06

2015 年底，首届翻译人才发展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美国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院高翻学院前院长鲍川运教授提到：翻译的继续教育应该成为院校教育的延续。在国内，亟需建立一种高端翻译培养体制，以便翻译从业人员在工作中不断累积经验和继续学习。有鉴于此，本文将结合翻译继续教育的发展趋势，探讨创新的口译教育模式。

一、翻译继续教育与虚拟现实技术

在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和经济中，人类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需要面对不断出现的新知识和新技术，继续教育因而成为当今全球教育发展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的翻译教学和翻译人才培养中，继续教育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终身学习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院校翻译专业毕业，并不是翻译训练的终结，而只是学习的一个阶段，翻译的继续教育是翻译完整教育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翻译继续教育

广义上的继续教育是指已脱离正规教育、已参加工作和负有成人责任的人所接受的各种各样的教育。在知识经济兴起和终身教育发展的新形势下，继续教育已成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培养各类专门和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从长远角度来看，继续教育是满足全民终身学习需求、实现全民学有所教、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继续教育将教育的方式从单一的学校教

育或课堂教学转向多种教学途径的、全方位的、面向全社会的终身教育体系。

中国的翻译教学经历了几个时期，上世纪 90 年代主要是有关本科的翻译教学，鲜有涉及研究生层次的翻译教学。2007 年 5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全国 15 家高校开始设立翻译硕士（MTI）专业学位，对口译的教学和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翻译的硕士研究生培养逐渐起步。与研究型翻译学硕士学位不同，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目标是要“培养适应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建设需要的高水平、应用型、专业性口笔译人才”，并提出“口译方向的学生应有不少于 400 个小时、2 个学分的口译实习要求”的指导性原则。尽管在校期间，学校为翻译硕士研究生提供了各种实习和锻炼的机会，但是正式进入翻译职场后，翻译从业者需要学习各类专业知识，不断接触各类新事物，尤其是推陈出新的信息技术。

然而，由于学校教育不足以满足职业翻译人才培养的要求，翻译人员从业后面临工作环境的复杂多变，同时人类存在追求自我完善的精神，翻译人才从高等院校毕业从事翻译工作之后，必须不断地进行在岗继续教育，以提高实际的翻译技能，例如翻译记忆软件、资源提取软件、文档格式编辑软件等翻译辅助工具的使用，同时，协同翻译技术、文字处理、表格处理、数据库处理、图形图像处理、桌面排版技术等方面的知识也是个人通过长期学习和经验积累起来的操作性知识。因此，如何将翻译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逐步推出，作为翻译教育的组成部分，已经

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二) 虚拟现实技术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计算机应用技术中的虚拟现实手段(Virtual Reality, 简称VR技术)是近年来非常火热的高新技术。VR技术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 它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环境, 是一种多源信息融合、交互式的三维动态视景和实体行为的系统仿真, 使用户沉浸到该环境中。VR技术具有沉浸性(Immersion)、交互性(Interactivity)和想象性(Imagination)三个具体特性。学生作为主角进入虚拟环境中, 拥有比现实更逼真的照明和音响效果, 使学生能够在虚拟的学习环境中扮演某种角色并反复地练习, 在多维信息空间中依靠自己的感知和认知能力全方位地获取知识, 发挥主观能动性, 获得最大的真实感和趣味性。网络VR技术可以弥补地域和时间差异, 便于建立适合不同口译学习者的口译练习平台, 开拓翻译继续教育的新模式, 为不同地域和不同层次的口译学习者提供实训和评估平台, 为口译实训者提供仿真的语言环境和广泛的语言素材, 不但可以进行口译实战演练, 还可以进行学习者之间的互动, 也可以人机互动。网络的口译练习材料还可以根据每个学习者的不同特点和学习进度, 进行选择和调整, 使口译学习和培训更具有针对性和个性化。因此, VR技术也必将成为翻译继续教育的趋势。

在国外的口译教学和研究领域, 使用数字化视听教学手段、机辅口译培训和VR技术, 在过去的十年得到了长足发展(Bendazzoli & Sandrelli, 2005; Hansen & Shlesinger, 2007; Berber 2008; Braun, 2011/2013/2014/2015), 为口译学习者的机助培训和测评提供了新的视野。穆雷、仲伟合(2011)和刘和平(2012)根据新时代对口译人才的要求, 提出了适合中国口译学生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模式,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数字化时代, 如何让不同地域的口译学生自主完成口译实习和适应职业环境, 成为了口译教学的讨论热点。但目前国内将VR技术用于口译教学和实践的研究仍相对较少, 研究深度和广度仍可继续挖掘(邓军涛,

2015/2016/2017; 刘梦莲, 2016/2017)。由此可见, VR技术在口译研究中的手段和方法已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对于VR技术如何应用于翻译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探讨, 还有待更多、更深入的研究。从教育技术界的讨论来看, 将VR技术应用于口译教学, 还存在导航困难、语料库细分等问题。欧盟的IVY(Interpreting in Virtual Reality)项目在应用VR技术进行口译培训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 本文将从虚拟现实的环境设置、操作模式、用户体验和语料库的建设和选择几个方面介绍IVY项目, 希望为国内的翻译继续教育提供合理的借鉴和新的思路。

二、IVY 项目介绍

21世纪以来, 商业和社区环境对口译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 而此类口译培训相对匮乏。为了满足欧洲经济与社会发展对口译人才和口译业务的需求,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欧盟IVY项目应运而生。IVY项目旨在利用3D虚拟的创新特征, 将VR环境与数字视听内容相结合, 对口译人员和潜在口译客户进行培训。IVY项目通过体验式自主学习、学习者协作、社会互动等方式, 为口译学习和教学提供了更全面的解决方案。

(一) 项目的VR环境

IVY项目中的VR环境包括一系列模拟真实口译的场景(如会议室、演讲厅、社区中心等), 主要利用Web技术和美国林登实验室研制的“第二人生”网络虚拟现实平台(Second Life, 以下简称SL)研发而成。SL是一个面向大众、以教育为目的的免费网络虚拟环境, 为IVY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SL的内容丰富, 包括各种社会活动和教育活动。同时, SL对IVY项目核心部分提供了技术运作, 例如提供了可修改的建筑物和景观、机器人化身、用户之间的语音聊天、音频和视频文件的传输、网站链接以及创建学习活动的选项。

IVY中的虚拟环境能模拟和观察不同的口译场合, IVY用户可以在情景中用虚拟化身随意走动。这种体验比单一的视频短片更具灵活性、更符合口译教学目的。用户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观看口译情景, 利用语料进行练习并与其它用户互动。IVY场景设立具有一定的标准。

首先, 场景呈现的是真实的口译工作场景。考虑到口译培训具有职业化的特点, 同时口译培训也是为未来口译客户服务, 因此模拟现实场景非常重要。其次, 场景的内容反映的是所选语料库的内容。为了保持两者的连贯一致, 虚拟场景的开发需要结合教学语料的选取。第三, 场景既有通用性, 可与多种不同的语料一同使用, 又有独特性, 可为特定语料提供真实的情景。场景既具语言文化的独特性, 又可为不同的语言组合多次使用。

根据这些标准, IVY 项目确定了与所选语料库相匹配的 11 个口译场景: 会议室、旅游咨询处、教室、室外、运动场地、商店、工厂车间、社区中心、医疗机构、展示区、法庭。IVY 项目会根据语料内容适当调整场景。例如, “教室” 场景可以根据语料的不同调整为小学环境或大学教室。场景的选择与具体语料形成一一对应, 以保证用户选定某一独白或对话语料时, IVY 加载特定的虚拟环境。

(二) 项目的操作模式

IVY 项目中的虚拟口译情景在 4 种不同的模式中运行: 口译实践 (interpreting practice)、探索 (exploration)、学习活动 (learning activity) 和实时互动 (live interaction)。多模式的运行可以满足不同口译活动和不同目标群体的需求。

在“口译实践”模式下, 口译员选取某一种语言或语言对 (language pair) 进行角色扮演, 系统会自动激活与语料库的音频内容相匹配的虚拟情景, 虚拟情景包含空间物体 (房间、家具、背景等) 和虚拟化身。口译员可利用虚拟化身参与其中来练习交替传译或联络口译, 其他 IVY 用户也可以加入该模拟场景观摩口译实践。“探索模式”主要为新手译员和口译客户提供特定口译情景下的语言、文化、伦理和实践方面的专业知识, 让用户了解译员角色、任务和技能。该模式包含行动指南、交互面板和演示短片。尽管该模式主要针对口译客户, 也可以用于本科教学中的口译基础知识课程, 重在观察、探索和研究相关口译知识。“学习活动”模式通过提供试听材料来训练口译员的各类口译技能 (如听力理解、大意概括、记忆训练、笔记练习等), 同时也让

口译客户有机会了解口译职业的相关知识。该模式还涉及译员角色和口译相关的实践和伦理问题 (包括译员的中立性、与客户的关系、口译任务中的座位的安排、着装要求等)。“实时互动”模式让译员和“口译客户”在虚拟空间中相互合作和学习。例如, 商务管理专业的学生可用某种语言发表演讲, 口译员进行翻译。IVY 用户可在以上不同的 4 种工作模式中转换。例如, 口译员最开始选择某一口译场景并阅读相关语料简介后进入的是“口译实践”模式, 接下来发现需要为特定的场景做更多的准备工作, 于是转换为“学习活动”模式。

(三) 项目的用户体验

IVY 项目中的用户体验主要包括指南和导航两个方面:

首先, 用户初次进入 IVY 虚拟环境需要一定的引导, 引导的程度取决于用户的经验和手头的实际任务。只有对 SL 的特性和 IVY 项目的目标进行适当阐述, 用户才懂得在虚拟环境中如何操作, 而不会被各个选项弄得不知所措, 从而使练习任务分心。用户通过访问 SL 网站进入 SL 虚拟岛首先到达接待区和定位区, 该区会出现 3 个选项: 1) 展示 IVY 项目的目标; 2) 辅导 SL 相关知识; 3) 辅导 IVY 环境相关知识 (工作模式和内容)。每个选项都会提供展示面板 (例如展示屏幕、视频剪辑等)。由于在虚拟环境中行走对新手用户来说很困难, 因此不同类型的接待区的指南可以帮助用户熟悉整个虚拟环境。

其次, 除了帮助用户熟悉 IVY 环境外, 另一个能让用户轻松操作的办法是提供清晰简单的任务导航路径。上述用来进行指导的到达区同样也是进入不同工作模式和虚拟情景的主要入口。工作模式决定了呈现给用户的情景 (例如, 如果是“口译实践模式”, 则附带对话或独白, 如果是“实时互动模式”, 则不添加任何语料)。工作模式的选择依赖于用户类型。例如, 口译学生倾向于使用“口译实践模式”, 而潜在客户则更愿意使用“探索模式”。由此可见, 用户进入 IVY 环境首先进行的是工作模式的选择。

(四) 项目的数据库

IVY 项目的语料取自于 ELISA 和 BACKBONE

语料库。ELISA 语料库包括 25 位来自不同英语变体国家母语人士的采访录音,采访的人士分别来自政府、教育、银行、环保、旅游等部门,采访的内容主要是他们的职业生涯,这是初期口译员非常好的练习材料。语料库网站上提供的演示片段使用户直接访问所选访谈的完整视频,同时包括文本和主题索引以供查询。BACKBONE 语料库是为外语学习者和口译学生设计的,包括对各种欧洲语言(英语、法语、德语、波兰、土耳其语)母语人士的单语访谈的十分钟录音,访谈内容已在主题和语言特征方面进行了转录和注释。该语料库还包括对英语为通用语人士进行的访谈,使口译练习者能够练习翻译非母语人士的英语。每个视频都配有文本,方便查询各类文化问题或专业词汇。选用 ELISA 和 BACKBONE 语料库的重要原因是这两个语料库很容易改编为真实的口译场景。与自发对话构建的口语语料库不同,这些语料库中的访谈都是具有引导性的主题发言,包含广泛的文化和专业语境相关的背景知识,这些对口译学习者息息相关。

语料库中的访谈被编辑为独白(monologue)和对话(dialogue)。适用于独白的语料可用作现场演示,还可编辑为简短的欢迎词或解说词等。对话则包括信息类访谈、求职面试、辩论等语料。独白语料主要通过选取和编辑现有的访谈而创建,比如删减原语料库中叙事访谈的即时提问。编辑过程需要不断回查以保持意义的连贯,确保这些即时提问的答案的合理性。双语对话语料通过选择具有“互动性的”的语段创建。创建对话语料首先要将访谈划分为适当的话轮,然后编辑并插入提问。

IVY 项目中的语料库将较长的独白或对话切分为话轮或段落,作为口译练习的基础单位。IVY 项目教学评估的结果也表明,学生更愿意用切分的方式暂停音频/视频文件来进行口译练习。在切分独白和对话时还需考虑实际材料中主题的复杂性、词汇和语法的密集程度、包含的日期或数字等。此外,语料库中的对话需要考虑话轮的顺序。自然对话中谈话者的话轮交替是随意的,所以可能出现一位说话者同时拥有两个连续话轮的情况。例如,一名发言人

讲完一个想法后继续演讲。为了模拟这种真实情景,IVY 语料库中对话的话轮顺序较为灵活,唯一的限定是对话者不超过两人。

三、启示

作为“欧盟终身学习项目”(EU Lifelong Learning Programme)的子项目,IVY 项目率先在口译研究领域提出利用 VR 的方式进行口译训练,并在 VR 环境的设定、语料库的建立和训练评估上进行了一些尝试和探讨。本文介绍了 IVY 虚拟世界设计和功能的关键要求(包括虚拟口译情景、IVY 工作模式和用户体验)、教学内容(基于语料库的独白或双语对话)及丰富的材料。IVY 项目创建了一个创新型的数字资源,通过这种方式将定制的 3D 虚拟环境和教学资源丰富的口语语料库相结合,是将 VR 技术结合到口译教育的先行者,具有一整套比较成熟和完备的学习和测评体系,其值得借鉴的地方如下:

(一) VR 的技术平台

考虑到技术和成本的要求,目前基于 VR 技术的口译练习软件最切实可行的选择是桌面式口译虚拟训练系统,这种系统能够运用软件编程的方法在显示器上显示三维场景,用户通过键盘、鼠标等简单的设备与虚拟场景进行人机交互。桌面式口译虚拟训练系统包括硬件与软件两部分。硬件部分包括计算机(普通的 PC 机即可)、标准的视频采集设备(数字录影设备)、多媒体大屏幕、耳机、麦克风等,无需投入高昂的成本。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都有自己的语音教室,有些学校甚至设有同声传译教室,上文所提到的设备都已具备,因此不需要再添加较多额外的硬件设备。

创建虚拟的口译场景可以依托三维工具来实现,目前有很多优秀的三维制作工具,为 VR 提供出色的纹理贴图、强大的贴图控制、各种空间扭曲和变形、全景图生成等技术支持。可供选择的桌面 VR 软件包括 VRML(Virtual Reality Modeling Language,虚拟现实建模/造型语言)、Viewpoint 和 Cult3D,也可以使用如 DirectX、Panda3D 等游戏引擎或语音识别软件 Julius 等。同时借鉴 IVY 项目中使用的免费网络 VR 平台“第二人生”,将已经建立的口译练

习语料库嵌入 VR 平台进行训练。口译学习者可以通过 VR 平台进入各种模拟仿真的交际场景,根据所提供的语言材料进行口译练习。

(二) VR 的语料库建设

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因其可以更系统、科学地描写和归纳可见的翻译现象,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得到长足的进展(Baker, 1995; Laviosa, 2002; 黄立波、王克非, 2011; 胡开宝, 2011)。但是,国内外将语料库运用于口译的研究仍不多见,多集中在现场会议口译研究领域(Shlesinger, 2008; Setton, 2011; 李婧、李德超, 2010; 王斌华, 2011; 陈菁、符荣波, 2014)和大学生英汉汉英口笔译语料库(文秋芳、王金铨, 2008; 张威, 2013),鲜用于商务口译和社区口译领域。国内的口译教育需要结合翻译继续教育的趋势,在现有的口译语料库基础上,建立适合各个层次和口译学习者的口译语料库,以支持网络虚拟现实的口译训练平台。

国内使用 VR 平台建立相关练习语料库,可以在已有的传统汉英口译语料库基础之上,借鉴欧盟建立用于口译教学和第二语言学习语料库的方法,建立英语原语和汉语原语两个语料库的子库。根据口译学习者不同层次的需求和双语水平,建立适合不同练习者的综合口译练习语料库,用来训练各类型口译中涉及的口译技巧和双语转换能力。可以借鉴的中文口译语料库包括:香港浸会大学 2005 年建立的粤语和英语双语法庭口译语料库、文秋芳和王金铨于 2008 年创建的大学生口译学习者语料库、胡开宝和陶庆于 2009 年建立的汉英会议口译平行语料库。可以借鉴的英语原语语料库包括免费的欧盟 BACKBONE 语料库和 ELISA 语料库。

英文和中文的口译练习原语语料库涉及的内容可以包括 12 大板块:外交、法律、商务、文化、教育、医疗、经济、农业、环境、科技、体育、旅游。语料库的形式可包括单向式(monologue)的演讲材料和双向式(dialogue)的会谈材料。建立的口译练习语料库所涉及的 12 个板块内容,可以通过政府机构的官方网站(例如,联合国、欧盟、东盟、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外交部、中国科技部、中国教育部、中国环境保护部、中国司法部、中国商务部等)、国

际口译培训机构和口译者联盟的官方网站(例如,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 AIIC,美国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高翻学院 MIIS 等)获取。将获取的音频和视频材料按照语言学原则进行手工转写,同时标注语言特征(词性标注和段落标注)和副语言特征(包括演讲中出现的口误、修正、重复、犹豫、停顿、笑声),便于之后研究译者在口译过程中的具体参与行为。

口译学习者利用 VR 平台进行自主学习,可以进行实时或者远程评估,深入分析口译练习中出现的错误并究其原因,然后在此基础上改进口译评估标准,提高口译学习质量。根据评估结果,实时地调整各个翻译院校内的口译教学大纲和培养方案,同时为口译服务的使用者提供挑选合格口译人员的参考数据。评估阶段采取网络虚拟社区的形式,让口译学习者的评估摆脱地域和时间限制,得到来自口译行业的各类评估和反馈:包括口译教师、同行的从业人员和资深口译人员。

练习当中,系统同时播放练习材料和录制练习者视频,并将录制的口译视频植入练习材料并显示音频图像。口译评估者可以采取实时评估和远程评估两种方式,通过在练习视频中进行句子修改、添加批注、评语和小标题的方式对口译练习者进行评估。评估后的视频可以作为资料存入双语语料库,以供其他学习者分析和借鉴。

四、结语

IVY 项目强调学习的社会互动性和情景性、学习任务的真实性、学习的自主性和协作性,将数字化的教学内容通过 Web 和 VR 技术进行视觉化和功能化,根据具体语料对虚拟场景进行加工和定制,营造了口译训练中任务的参与感和沉浸感,为翻译的继续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野,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网络化 VR 技术为口译实训者提供仿真的语言环境和广泛的语言素材,不但可以进行口译实战演练,还可以进行学习者之间的互动,也可以人机互动。但是由于口译学习者的归类标准涉及到口译者的双语能力、应变能力和心理要素等各个方面,如何进行客观合理分类练习,仍是今后研究的重点。在 VR 练习软件的界面,实训软件中的移动操作和空间结构要易于被学习者掌握,而

不至于增加学习者的外部认知负荷,进而影响学习进程。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一般项目“基于虚拟现实平台的口译练习语料库”(项目编号:16BYY022)的阶段性成果。

参 考 文 献

- [1] 陈菁、符荣波. 国内外语料库口译研究进展(1998-2012)——一项基于相关文献的计量分析[J]. 中国翻译, 2014(01): 36-42.
 - [2] 邓军涛. 国外口译教学资源库的建设与启示[J]. 现代教育技术, 2015(12): 78-83.
 - [3] 邓军涛. 数字化口译教学资源的语境重构——IVY资源库为例[J]. 现代教育技术, 2016(11): 94-99.
 - [4] 邓军涛、古煜奎. 口译自主学习语料库研究[J]. 外文研究, 2017(4): 88-93.
 - [5] 胡开宝. 语料库翻译学概论[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 [6] 黄立波、王克非. 语料库翻译学: 课题与进展[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1(06): 911-923.
 - [7] 李婧、李德超. 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 回顾与展望[J]. 中国外语, 2010(05): 100-105.
 - [8] 刘和平、徐明. 探究全球化时代的口译人才培养模式——第九届全国口译大会暨国际研讨会述评[J]. 中国翻译, 2012(5): 53-59.
 - [9] 刘梦莲. 欧盟IVY应用特点及其对机助口译教学的启示[J]. 现代教育技术, 2016(6): 94-99.
 - [10] 刘梦莲. 生态化口译教学与自主训练系统设计研究[J]. 外文研究, 2017(4): 78-87.
 - [11] 穆雷、仲伟合. 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A].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八次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汇编[C]. 2011: 125.
 - [12] 王斌华. 语料库口译研究——口译产品研究方法的突破[J]. 中国外语, 2011(03): 94-100.
 - [13] 文秋芳、王金铨. 中国大学生英汉汉英口笔译语料库[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 [14] 张威. 口译语料库的建设与应用——理论、方法与实践[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3.
 - [15] Baker, M. 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 overview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 *Target*, 1995(7): 223-243.
 - [16] Bendazzoli, C. & Sandrelli, A. An approach to corpus-based interpreting studies: Developing EPIC (European Parliament Interpreting Corpus) [A]. In H. Gerzymisch-Arbogast & S. Nauert (eds.). *Proceedings of the Marie Curie Euroconferences MuTra: Challenges of Multidimensional Translation — Saarbrücken 2-6, May 2005* [EB/OL] [2018-02-20] http://www.euroconferences.info/proceedings/2005_Proceedings/2005_Bendazzoli_Sandrelli.pdf.
 - [17] Berber, D. 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A Survey of Their Usage in Professional and Educational Settings[A]. CETRA [EB/OL] [2018-02-20] http://isg.urv.es/cetra/article_CETRA2007_berber.pdf.
 - [18] Braun, S. & Slater, C. Populating a 3D 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interpreting students with bilingual dialogues to support situated learning in an institutional context [J].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Special Issue: Dialogue Interpreting in practice: Filling the gap between empirical research and interpreters training*, 2014, 8(2): 469-485.
 - [19] Braun, S. IVY-Interpreting in Virtual Reality, Progress Report, Public Part [EB/OL]. [2018-02-20] http://www.virtual-interpreting.net/files/2010_5082_PR_IVY_pub.pdf.
 - [20] Braun, S., Slater, C. & Botfield, N. Evaluating the pedagogical affordances of a bespoke 3D 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training interpreters and their clients [A]. S. Ehrlich & J. Napier (eds.). *Interpreter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Innovation, Access, and Change. Special volume of the Interpreter Education Series* [C]. Washington, D.C.: Gallaudet University Press, 2014: 39-67.
 - [21] Braun, S., Slater, C., Gittins, R., Ritsos, P. D. & Roberts, J.C. Interpreting in Virtual Reality: Designing and developing a 3D virtual world to prepare interpreters and their clients for professional practice [A]. D. Kiraly, S. Hansen-Schirra & K. Maksymski (eds.). *New Prospects and Perspectives for Educating Language Mediators* [C]. Gunter Narr Verlag, 2013: 93-120.
 - [22] Hansen, I. & Shlesinger, M. The Silver Lining-Technology and Self-Study in the Interpreting Classroom [J]. *Interpreting*, 2007, 9(1): 95-118.
 - [23] Laviosa, S.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y, Findings, Applications* [M]. Amsterdam: Rodopi, 2002.
 - [24] Setton, R. Corpus-based interpreting studies (CIS): Overview and prospects [A]. A. Kruger, K. Wallmarch & J. Munday (eds.).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C]. London: Continuum, 2011: 33-75.
 - [25] Shlesinger, M.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Interpretese. An intermodal, corpus-based study [A]. G. Hansen, Chesterman, A. & H. Gerzymisch-Arbogast (eds.). *Efforts and Models in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Research. A tribute to Daniel Gile*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8: 237-253.
- [作者简介] 蒋莉华, 博士, 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口译研究、翻译学。
彭雪姣,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口译。
[作者电子信箱] clarissajlh@hotmail.com
pxj1207@foxmail.com

Sinicizing Western Terminology in China's Late Qing Translation of European Works

By ZHANG Jinghua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China) p.27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ng European works into Chines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a process whereby Western terminology was Sinicized. For in how the terms were rendered, we find a visible tendency to play up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culture, to integrate Chinese and Western learnings, and to critically absorb the latter into the former, in a bid to modernize China's academic discourse. Leading translators of this period, such as John Fryer and Yan Fu, tended to display a keen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or a deep-seated self-confidence in the Chinese culture. While this turned out to be a key contributing factor to the way European terminology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China's knowledge system modernized,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Shixue (实学/practical learning) prevalent during this period also exerted great influences on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further bearing witness to the innovating spirit of China's modern academic circles.

Key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transl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terminology; Westernization; Sinicizatio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Pishu Series in the 1970s and China's Translation-based Historiographical Studies of Areas and Nations

By XU Mingwu & ZHAO Chunl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China) p.35

Abstract: Since the study of the histories of areas and nations depends critically on translation, a translation-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iographic endeavor would necessarily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both practices. This article offers a diachronic overview of China's translation-based historiographic studies of foreign nations and geopolitical areas since the mid-19th century,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Pishu series in the 1970s as a focal point in the narrative of the development. The insights derived from the account cast light on both the feature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pecialized genre of translation. A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genre is especially relevant today, when China is putti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into practice and detailed information of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s is in great demand.

Keywords: national and regional history; translation history; "Pishu"; translation features

Virtual-Reality-Based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An EU Model

By JIANG Lihua & PENG Xuejiao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p.41

Abstract : As an exte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ontinuing education has been expected in China to offer an advanced platform on which practitioners in relevant fields could continue their learning process and further gain in experiences. In the twin field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this traditional expectation has been challenged lately when an EU-funded IVY program employs techniques of virtual reality in constructing a new platform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lifetime learning for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An introduction to this EU model promises to help bring about changes to the pattern of interpreting training in China.

Keywords: continuing education; lifetime learn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virtual reality; IVY Program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常用外国语类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社会科学卷)

全国百强社科学报
陕西省权威社科学报
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科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

外语教学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WAIYU JIAOXUE



ISSN 1000-5544



0 9>

9 771000 554206

2020 5

西安外国语大学主办



扫描全能王 创建

目 录

· 体认语言学研究专栏 · (栏目主持人:王寅)

用对称性体认方式统一解释汉语平行结构和怪句

——基于体认语言学的思考

非现实空间位移关系构式的体认性与互动性

王 寅(1)

张 晓(6)

· 认知语言学研究专栏 · (栏目主持人:文旭)

变换/转换语法与构式语法的非转换观

英汉隐喻型断定构式的句法语义特征及其理据性探索

基于语料库的日汉指示词认知互动性对比研究

陈满华(11)

司卫国(16)

牛迎春(22)

· 语言学研究 ·

汉语流水句与英语复杂句结构特性对比:英汉时空特质差异视角

成员归类分析及其运作

句子语境信息与词汇同义关系交互作用的机理探究

——来自眼动追踪实验的证据

中外语言学期刊英语标题介词比较研究

赵朝永 王文斌(27)

袁周敏(33)

庞 杨 戴好运 倪传斌(38)

方 强 王义娜 李银美(43)

· 新时代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论坛 · (栏目主持人:常俊跃)

内容语言融合教育理念(CLI)的提出、内涵及意义

——从内容依托教学到内容语言融合教育

我国中西部高等外语教育规划与发展:供给侧改革视角

常俊跃 赵永青(49)

景飞龙 李红丽(55)

· 新技术应用与外语教学方法创新 ·

5G时代二语习得游戏化学习路径探究

数字素养与英语自主学习研究

英语教学形成性评价云端测评模式构建

任务型网络书面实时交流中的意义协商机制:扩展模式构建

甘容辉 何高大(60)

华维芬(66)

刘 敏 吴始年(71)

胡永近(76)

· 翻译研究 ·

汉学家中国当代文学英译研究存在问题及应对策略

当代汉学家小说翻译中的语音图式和叙事框定

20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传播

翻译研究新动向:口述影像的多模态分析

朱振武(81)

谭业升(88)

方 红(94)

蒋莉华 李 颖(99)

· 外国文学评论 ·

基于语料库的《劳拉的原型》多元主题解析

集团文化下的“罪”与“耻”

——远藤周作《海与毒药》论

魏利霞 周 震(104)

霍 斐(109)



翻译研究新动向:口述影像的多模态分析

蒋莉华, 李 颖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1)

摘要:随着传播媒介的不断变化,当今“文本”概念呈现多模态趋势。本文通过对无障碍电台“启明电台”中TED视频口述影像的多模态话语分析发现,口述员在理解和发布信息时通过整合多种模态的信息来源,增进语篇理解和接受。本研究期望对口述影像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一定启发。

关键词:文本;口述影像;多模态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44(2020)05-0099-05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ext” develops multimodal phenomena with the changes of communication media. This paper analyzes a TED-based audio description from the multimodal perspective, and discovers that audio describer integrates multimodal information in his comprehension and transmission. This study hopes to provide some input for the research and teaching of audio description.

Key words: text; audio description; multimodal

1. 引言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和传播媒介开始网络化、数字化、影像化,改变了我们对“文本”的认识和定义。在翻译研究领域中,翻译所涉及的“文本”不再局限于单一和线性的符号系统,还包括图像、声音、空间、色彩等多维度和多模式因素,翻译研究的领域、内容及其范式由此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视听翻译(audiovisual translation,简称AVT)逐渐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热点。视听翻译范畴下的字幕翻译(subtitling)和配音译制(dubbing)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而为盲人和视障者提供的现场表演和影视作品的视障口述影像服务直至近10年来才开始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视障者在“观看”电影、电视和“欣赏”戏剧时,只需戴上专用耳机,就能听到有关时间、空间、人物表情和动作等的解说,从而了解作品中的无声世界,达到观赏电视和电影的目的。

2. 口述影像概述和研究现状

口述影像(Audio Description,简称AD)是一种通过口语或文字叙述,将视障者无法接收的影像讯息转换成言语符号,协助视障者克服生活、学习和就业中各种视觉障碍的服务。口述影像不仅要译出影视中的语言对话,还要在人物对话间歇和不影响主要音效的情况下,对画面中所出现的动作、环境、表情、服装等细节进行描述,让欣赏者获得影片的整体信息,而“文本”的意义在此具有完全的开放性。简而言之,口述影像就是把“看见的”东西“说”出来,从对电视、电影、戏剧、博物馆展览、自然景观的口语描述到教科书插图的文字解说等都属于口述影像的范畴。

尽管许多人认为口述影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美国,因为Frazier早在1970年就提出了口述影像的概念(吴宗艺、谢桢桢 2015: 20),但Díaz-Cintas等学者(2007)认为口述影像最早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的西班牙。美国的视障人士口述影像服务目前已发展得比较成熟,在当地首映的电影中,60%都附有口述频道,被制作成有口述频道的DVD也有40%。美国盲人协会自2009年起推行了口述影像计划,通过培训专业口述员,制定口述频道的准则,加强教育和鼓励相关的学术研究,来提升美国口述影像服务的水平。英国的口述影像最早于1987年11月出现在温莎皇家剧院的音乐剧公演当中,最初的参与者是志愿者,之后英国国家剧院开始培养专业人员。

相比之下,中国的口述影像服务起步较晚。在中国香港,类似以口述影像为概念的活动最早可追溯至2009年,中国香港盲人辅导会组织了首支“视障人士电影导赏”义工队,开始向公众积极推广电影口述影像服务。中国台湾于2002年6月成立了专门的口述影像发展学会,是第一家开始研究并制作口述影像服务的机构。中国大陆口述影像服务的开展起源于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该中心于2003年7月在北京成立,致力于用声音解说技术为视障人士提供无障碍文化产品服务,倡导社会为视障人群提供融合性的支持环境(符艺 2014: 77-78)。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残疾人无障碍电影”作为重要成果在世博会首次设立的残疾人展馆“生命阳光馆”展出。口述影像服务在中国大陆主要是以无障碍电影为主,在电视、戏剧等方面的应用甚少(吴宗艺、谢桢桢 2015: 99)。



有关口述影像的专门研究较少,前期研究多见于视听翻译研究(Díaz-Cintas *et al.* 2007),学者关注的是口述影像脚本的翻译过程,主要讨论了其中涉及的文化因素。Jankowska(2015)认为以翻译外文口述影像脚本的方式制作口述影像,而不是从头开始制作,更能节省时间和提高脚本质量。由于口述影像既要为节目提供必要的信息描述,又要让观众感觉恰到好处,因此信息的选择不仅要考虑描述部分有时长制约,而且要考虑丰富的视觉信息。Braun(2007)基于关联理论提出了要区分显性和隐性的信息传递,必须分析需要“阐明”的部分和可以让观众自己推测的部分。经过近10年的发展,国外的口述影像研究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Benecke 2004, 2014; Braun 2007, 2008, 2011; Fryer 2016; Matamala & Orero 2016; Maszerowska *et al.* 2016),研究者们对口述影像中的多模态现象、认知负载、文本连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相比而言,中国的口述影像研究起步较晚。赵雅丽(2002)调查了台湾地区视障人士的观影习惯,从符号、叙述、传播等角度解读了口述影像。她认为,对视障者而言,口述影像的意义比较接近“再现”,甚至更接近“表现”,但对正常人而言,口述影像的意义比较接近“翻译”,因为正常人与视障者使用的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然而口述影像研究并未进入大多数中国翻译学者关注的视野,只零星见于障碍沟通教育和图书馆论坛等非翻译研究类期刊(丁方舟 2014; 符艺 2014; 刘芷晴 2014; 吴宗艺、谢桢桢 2015),鄢秀和罗康特(2019)对口述影像理论与实践的综述是翻译界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

3. 多模态视角下的口述影像案例分析

口述影像的多模态源文本主要包含视觉和听觉信息,听觉信息大多数情况下呈显性,视觉信息多数情况下则是隐性的。对多模态源语的理解要整体考虑所有模式传递的信息,确定隐性视觉信息在视听文本整体意义中的作用,并挑选出需要描述的视觉部分进行传达。鉴于其多模态和互动特点,口述影像不仅涉及信息的加工技巧,还包括对各种模式下信息的理解和挑选。

3.1 多模态话语分析

多模态话语分析指在进行话语分析时,不仅关注语言模态,还关注声音、图像、动作、表情等多种非语言模态。多模态话语分析接受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关于语言是社会符号的意义潜势的观点,认为非语言符号也是意义的源泉(朱永生 2007)。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时,虽然语言仍是分析的重要内容,但应放在一个更大的多模态语境中进行,并考虑语言与多模态语境的关系(Jewitt 2009: 2)。Kress 和 van Leeuwen(1996)根据符号在交际中的操作,将多模态语篇分析分为话语、设计、生产、分布四个层次,其中“设计是在内容和表达之间的层面,在此阶段需要考虑符号的特征,并且要对所用的模态或模态系统做出安

排”。胡壮麟(2007, 2011)、朱永生(2007)、张德禄(2009)等对多模态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路径和现实意义进行了评介,对推进国内的多模态话语研究起到了宏观指导的作用。胡壮麟不仅将“多模态符号学”的概念引进国内,阐释了多模态、多媒介的区别和关系(胡壮麟 2007),还研究了 PPT、多模态小品等多模态语篇的语类特点。

3.2 口述影像案例分析

本文的口述影像案例分析基于张德禄(2018: 740)提出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即“语境化(交际事件置于语境)→话语化(意义选择和模态分工,包括体裁类型和模态:多模态、模态转换)→设计(模态的词汇、语法模式、模态组织和建构)→生产(多模态语篇生产过程)→分布(话语传播与分布)”,分析 TED 的无障碍版本中口述者在交际过程中,如何根据不同符号系统的特点和在社会文化中的功能,在不同符号系统中选择合适的符号及其组合,形成适合语境和交际目的的多模态语篇。

3.2.1 语料背景

以下章节选取的是 TED Talks 中 Daniel Kish 在 2015 年所发表的英语演讲“声呐如何帮助我在世界前行”的中文无障碍版本进行分析。Daniel Kish 是一名“人类回声定位领域”的专家,被称为“现实版蝙蝠侠”。在 13 个月大时,Kish 就失明了,但他学会利用回声定位来“观看”世界。他用舌头发出嘀嗒声将声音送出,声音撞击到周围环境和物体的表面后反弹回来,帮助他构建对周围空间的理解。在演讲中,Kish 用实验展示了他的声呐导航方法,并呼吁人们消除对“未知黑暗”的恐惧。口述员浚溢(Joey)将这段演讲口述了出来,并做成了无障碍版本提供给视觉障碍者。无障碍版本发布在中国首款盲人无障碍电台“启明电台”上。笔者将源语和无障碍版本的口语部分转写为文本,并制出案例语料。音频的转写中使用了一些语言学标识:“(.)”标识表示停顿,“=”标识表明话轮的重叠,大写的字母表明语气的强调,“:”冒号标识迟疑和短暂的停顿,“{}”大括号朝内标识语速加快,大括号朝外“{}”标识语速减慢,“[]”中括号标识非言语信息,“(2.5)”小括号里面的数字标识停顿的秒数。

整个 TED 视频的英语演讲全长 13 分钟,包括 Kish 的演讲和主持人的提问。口述员浚溢(Joey)的中文无障碍版本全长 15 分钟,包括对演讲和演讲者的背景介绍、对源语演讲的口述和场景信息的补充总结。TED 视频的演讲过程中除了 Kish 的语言信息,还包括他进行的几个回声定位实验以及现场的实物展示,同时现场还播放了视频,因此口述影像的源语语篇包含口头语言、图片、视频和动作多种模态。

3.2.2 分析和讨论

3.2.2.1 结合多模态,整体传达

口述影像的源文本涉及多个模态,需要同时关注发言人的神态、动作以及展示出的实验和放映的 PPT。

(1) All right. (.) So (.) Just a few centimeters, (1)



you would notice the difference (.) you've experienced (.) sonar. (Daniel Kish)

所以,你们看(.)只要一些时间(.)几秒钟(.)你们就可以觉察到这些|差异|并且学一点闪光声呐。(浚溢)

(2) So (.) I came up here, (2) and (3) [clicking] they wouldn't (.) tell me where the lectern was. (.) So you can't trust (.) those TED folks. (3) Emm {"find yourself" they said}. So (4) and the feedback for the PA system is no help at all. (Daniel Kish)

嘉宾正在台上探索(3)TED的工作人员真的不能相信(.)他们(.)他们竟要我要自己上来?自己找(3)并且广播系统的反馈也无济于事(2)他们不会|告诉我|讲台在哪里(.)他们用广播(.)远程告诉我也没办法。(浚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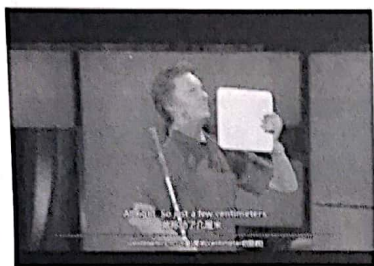


图1. 移动纸板(1)



图2. 移动纸板(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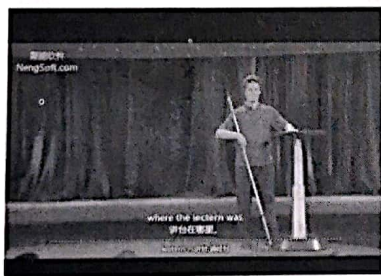


图3. 找讲台

例(1)的语言模态主要是演讲者对自己实验的总结。他想通过演示告诉观众,纸板只要移动几厘米的距离,人们就可以感觉到声音的变化,体验声呐。口述员在这里错误地理解为只要几秒钟,且增译了“只要一些时间”,可能因为他只关注了演讲者所说的话,即语言模态,而将“centimeter”误听为“several minutes”,然后根据自己的认知经验,将其译为“几秒钟”。事实上,结合演讲者的动作来理解(见图1和图2),可以看到演讲者在讲述的同时移动纸板进行示范。结合演讲者的动作和言语,不难理解他说的是只要几厘米的距离。

例(2)是演讲者在舞台上寻找讲台拿纸板时所说的话,主要是调侃TED的工作人员让他一个盲人自己找讲台,对他很放心。口述员在这里描述比较多,增译了“嘉宾在台上探索”和“自己上来”。且一开始也未说明是找讲台,直到后面部分才重新补充说明。这可能是因为口述员开始并不知道演讲者找什么,由于只关注语言模态,没有听懂“lectern”,所以不理解是找什么,就没有译出,而后而口述员可能注意到了演讲者的动作,才理解了原来是在找讲台。如果口述员从一开始就边听边看(见图3),就很容易理解演讲者所找的是讲台。

根据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例(1)和例(2)的具体分析如下:1)演讲的文化语境是介绍视障者如何通过回声定位感知世界;2)口述者需要解读演讲中呈现的所有符号的意义。语言符号系统是Kish用英语话语对“声呐导航”的描述。TED视频传递的视觉符号系统是Kish移动纸板对语言描述中有关“声呐导航”的补充;3)每一个符号系统都由一系列符号组成,符号间是选择关系,口述者需要通过设计过程把这些符号联系在一起,形成多模态语篇的符号结构。这两个例子中口述者是否关注到视觉中模态中的动作,直接导致口述语篇出现偏差与否;4)符号由媒介体现。口述者通过媒介化把符号生产为媒介,可以产生口述影像脚本和口头话语的呈现形式;5)媒介通过实体化成为无障碍版本。

3.2.2.2 适当解释,精准描述

口述影像过程中,综合考虑到源语除语言模态以外的其他模态,根据不同的受众,斟酌选词,对源语进行解释说明十分必要,会使表达描述更精准。

(3) The world is a much LARGER nursery? (Daniel Kish) 世界其实是一个更大的(.)|超大的|育儿室。(浚溢)

(4) Fortunately, (.) I have my {trusty long cane {, [longer than the canes used by most blind people. I call it my freedom staff]}. (Daniel Kish)

幸运的是(.)我有一个(.)这个长长的手杖(.)比盲人的一般手杖更长一些(.)我称它为我的自由。(后面补充:还有kish用的手杖(.)他说的是长手杖(.)到底有多长呢?大概从视频上看(.)额大概是超过他的下巴的高度(.)也是在下巴和下嘴唇中间的这个高度(.)他认为这个高度是比较适合他去使用的。)(浚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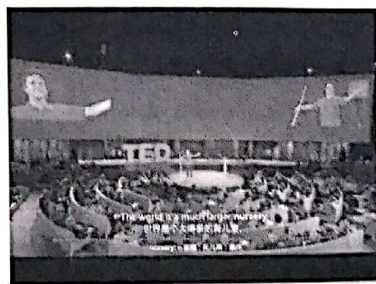


图4. 张开双臂





图 5. 展示超长的手杖

这一部分主要是演讲者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将世界比喻为更大的育儿室,以及向人们介绍作为他自由帮手超长手杖。

例(3)中口述员在口述世界是更大的育儿室时,增译了“超大的育儿室”,使译文更精确。这是因为他注意到了源语中通过视频传达的动作模态,演讲者在这里做出了张开双臂的动作(如图4),强调世界这个育儿室非常大。所以,口述员的增译就使得意义表达更准确。

例(4)中,当演讲者说到手杖时,口述员开始只将语言模态的信息对应译出,后面才补充说明了手杖的具体高度“大概超过他的下巴的高度,也就是在下巴和嘴唇中间的这个高度”,这是因为口述员的对象是盲人,他们若只是听大概的描述“长长的手杖”很难知道手杖具体长度。考虑到这一点,根据视频所展示出来的手杖,口译员后面特地做了补充说明,使描述更精准。根据源语中所展示出来的视频(如图5),可以看到手杖大概是和演讲者身高等长。

根据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例(3)和例(4)具体分析如下:1)演讲的文化语境是介绍手杖对于视障者的重要作用;2)口述者需要解读演讲中呈现的所有符号的意义。语言系统是 Kish 用英语话语对“育儿室”和“超长手杖”的描述。TED 视频传递的视觉符号系统是 Kish 用张开双臂和展示手杖的动作对语言描述的补充;3)这两个例子中口述者关注到多模态信息,对源语进行相关内容的补充和解释,从而更加精准地传达源语信息;4)符号由媒介体现。口述者通过媒介化把符号生产为媒介,可以产生口述影像脚本和口头话语的呈现形式;5)媒介通过实体化成为无障碍版本。

3.2.2.3 删减提炼,概括总结

口述影像的时间有限,且口述员精力有限,很多细节信息对于整体理解的作用并不大,全部口述出来既不现实,效果也不好,因此口述时要结合所有模态删减无用信息,提炼关键信息并进行总结概括。

(5) Now I present to you a challenge. (.) so if you'd all close your eyes {for just a moment}, okay? (.) :: And you are going to learn a bit of flash sonar. I am going to make a sound. (.) I am going to hold this panel {in front of me, but I'm not going to move it}. Just listen to the sound for a moment. (3) “Shhhhhh”. okay nothing very interesting.

(.) Now listen to what happens to {that same exact sound} when I move (.) the panel. (2) “Shhhhhh”. (Daniel Kish)

在这里(.)我要向大家展现一个挑战(3)你们都闭上眼睛好吗? 仔细听一会(.)这声音“Shhhhhh”, 好吧{这没什么特别的}你们听::到差别了吗? 好吧(.)继续闭上眼睛(.)现在嘉宾拿了一块纸板在自己面前(.)并且移动纸板(.)所以声音他就有些变化。(浚溢)



图 6. 纸板未动,声音无变化



图 7. 移动纸板,声音变化(1)



图 8. 移动纸板,声音变化(2)

这一部分是演讲者向观众展示声呐是如何作用的一个对比实验,主要是通过移动纸板和改变纸板与嘴唇之间的距离来感受声音的变化。

例(5)中,口述员删减了不移动纸板时的条件说明,直接让大家闭上眼睛听声音,询问“你们听到差别了吗?”,并在纸板移动时说明了演讲者所做的动作,解释声音变化的原因。这是因为口述员结合了演讲者的言语和动作,进行删减概括,简洁清晰地描述出整个对比实验。纸板未移动时(见图6),声音没有任何变化,正如口述员所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不用过多解释,只要听众可以感受到移动纸板前后之间的对比变化即可。演讲者移动了纸板(见图7和图8),声音产生变化。口述员直接解释清楚,可以帮助盲人听众更好地理解实验,达到演讲者展示这个实验的目的。

例(5)根据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具体分析如下:
1) 演讲的文化语境是介绍如何通过距离感受声音变化;



2) 口述者需要解读演讲中呈现的所有符号的意义。语言系统是 Kish 用英语话语描述如何通过改变纸板与嘴唇之间的距离来感受声音的变化。通过 TED 视频传递的视觉符号系统是 Kish 通过移动纸板的动作对语言描述进行补充; 3) 本例中口述者关注到动作模态已经对语言模态进行了相关补充和解释, 因此整合两种模态的信息进行概括式翻译; 4) 符号由媒介体现, 口述影像者通过媒介化把符号生产为媒介, 可以产生口述影像脚本和口头话语的呈现形式; 5) 媒介通过实体化成为无障碍版本。

通过以上案例分析可以发现, 口述影像的源语语篇是一个多模态的立体语篇, 其意义由发言人的语言信息和非语言信息复合而成。口述员在理解和发布信息时整合了多种信息来源: 一个是听觉感知, 其信息来自发言人的语言表达; 另一个是通过视频手段接收到的视觉感知(包括表情、手势、身势等)。具体案例分析基于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综合框架, 对源语信息进行多方位的分析, 发现口述者通过整合多模态信息来以整体传达、适当解释、删减提炼的方式增进口述影像语篇的感知和理解。

4. 结语

本文通过梳理口述影像的历史和研究现状发现, 口述影像将视觉、音效和对话等多模态的信息转化为音频信息提供给视障者, 是一种复杂的翻译过程。因此, 多模态理论框架对口述影像的分析具有指导作用。基于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 案例分析选取了 TED 视频的无障碍版本进行了具体的讨论, 发现多模态信息的感知和理解对于口述影像描述的成败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所总结的口述影像常用方法将有助于口述影像的教学和培训, 从而有利于培养专业化的口述人员, 为视障者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 [1] Benecke, B. Character fixation and character description: The naming and describing of characters in *Inglourious Basterds*[A]. In A. Maszerowska, A. Matamala & P. Orero (eds.). *Audio Description: New Perspectives Illustrated*[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4: 141-158.
- [2] Benecke, B. Audio-description[J]. *Meta*, 2004(1): 78-80.
- [3] Braun, S. Creating coherence in audio description[J]. *Meta*, 2011(3): 645-662.
- [4] Braun, S. Audio description research: State of the art and beyond[J].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New Millennium*, 2008(6): 14-30.
- [5] Braun, S. Audio description from a discourse perspective: A socially relevant framework for research and training[J]. *Linguistica Antverpiensia, New Series—Them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2007: 357-369.
- [6] Díaz-Cintas, J. et al. (eds.). *Media for All: Subtitling for the Deaf*,

- Audio Description, and Sign Language*[C]. Amsterdam: Rodopi, 2007.
- [7] Fryer, L. *An Introduction to Audio Description: A Practical Guide*[M].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 [8] Jankowska, A. *Translating Audio Description Scripts: Translation as a Strategy of Creating Audio Description*[M].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15.
- [9] Jewitt, C. Introduction: Handbook, rationale, scope and structure[A]. In C. Jewitt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ultimodal Analysis*[C]. London: Routledge, 2009.
- [10] Kress, G. & T. van Leeuwen.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M]. London: Routledge, 1996.
- [11] Matamala, A. & P. Orero(eds.). *Researching Audio Description: New Approaches*[C].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 [12] Maszerowska, A., Matamala, A. & P. Orero. (eds.). *Audio Description: New Perspectives Illustrated*[C]. New York: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6.
- [13] 丁方舟, 译. Aline Remael, 著. 从视听翻译到无障碍传播: 实时字幕、口述影像与声音字幕[J].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2014(4): 24-29.
- [14] 符艺. 口述影像在公共图书馆视障服务中的应用与思考[J]. 图书馆论坛, 2014(8): 77-81.
- [15] 胡壮麟. 社会符号学研究中的多模态化[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7(1): 1-10.
- [16] 胡壮麟. 谈多模态小品中的主体模态[J]. 外语教学, 2011(4): 1-5.
- [17] 刘芷晴. 口述影像之理论与研究回顾[J]. 沟通障碍教育, 2014(2): 19-29.
- [18] 吴宗艺, 谢桢桢. 中国视障口述影像服务的发展现状与大陆推广[J]. 新闻研究导刊, 2015(10): 20-22, 34.
- [19] 鄢秀, 罗康特. 新时代的翻译研究: 口述影像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性[J]. 东方翻译, 2019(4): 8-12, 24.
- [20] 张德禄. 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探索[J]. 中国外语, 2009(1): 24-30.
- [21] 张德禄. 系统功能理论视阈下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J]. 现代外语, 2018(6): 731-743.
- [22] 赵雅丽. 言语世界中的流动光影——口述影像的理念架构[M]. 台北: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2.
- [23] 朱永生. 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研究[J]. 外语学刊, 2007(5): 82-86.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虚拟现实平台的口译练习语料库”(项目编号: 16BY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蒋莉华,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口译研究、翻译学。

李颖,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口译。

责任编辑 薛旭辉



德国如何培养对外语言服务人才

蒋莉华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在全球化和本国教育政策的大背景下,德国的立法从政策上保障了对外语言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地位。德国高校系统下的综合性大学、应用技术大学和翻译专业学院共同构建了德国对外语言服务人才培养的多元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特色。德国高校中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考试评价为中国语言服务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语言服务; 人才培养; 德国; 应用技术大学; 翻译专业学院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24(2020) 05-0100-07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事业取得新进展,对外语言服务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本保障,在经济文化发展中的地位日趋重要。

根据中国翻译协会发布的《2019 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中国语言服务行业保持快速发展态势。2002 年语言服务企业达到了 8 179 家,到 2011 年底达到 37 197 家,截止到 2019 年 6 月底,中国营业范围含有语言服务的在营企业 369 935 家,比 2018 年 6 月底增加了近 5 万家^[1]。包括翻译在内的语言服务产业已经是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中国现存的对外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备,使得人才与服务使用者之间未能形成透明而直接的联系,从而带来了整个人才系统中的供需断层。而德国完善的对外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体系及运作经验,可为我国同类人才培养提供一定的镜鉴。

一、德国经济发展需要大量对外语言服务人才

根据德国联邦数据统计局(Statistisches Bundesamt)官方网页的数据^[2]显示,2019 年德国的 GDP 约为 3.4 万亿欧元,在全球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排第四位。德国经济的“外贸依赖度”高达 70.8%,

其汽车制造、电气工程、精密机器装备、信息化系统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都和国际贸易有关。这种外向型发展模式的优点是能大大促进本国企业的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德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对外语言服务需求的激增,近年来德国对外语言服务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对外语言服务是加强企业对外文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保证,决定着企业、产品和服务走向全球的专业服务,关系到企业国际化的效率和效果。

德国美因茨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在 2019 年对该学院翻译专业的毕业生进行了一项综合调查^[3],发现翻译专业本科毕业生和国际硕士学位毕业生仅占 23.5%和 22.9%,而传统意义上的笔译硕士学位毕业生高达 41.2%,口译硕士学位毕业生为 6.9%。由此可见,德国高校中传统的口笔译硕士学位更加得到学生的青睐。在对外语言服务的专项领域调查中,高达 36.5%的毕业生从事与经济相关的语言服务,其次是法律和技术领域,分别占 23.9%和 20.7%,体现了德国对经济和技术的重视。在询问从事语言服务行业的问题上,回答者的选项高达 20 项,包括行业翻译、项目经理、会议口译员、市场经理、信息技术员、教师、技术编辑、科研等,其中行业翻译占比最高,达 27.4%,说明德国对外语言行业的服务人才分

收稿日期: 2020-07-20

基金项目: 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课题 [G2017B037]; 湖南师范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课题 [J7JG11]

作者简介: 蒋莉华,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布广泛。在“主要工作语言”的回答中,有 85.3% 的从业者的主要工作语言仍为英语。问卷还对近几年的收入变化趋势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从业者收入呈增长趋势。

从以上调查报告可以看出,德国高校培养对外语言服务人才更加注重与市场接轨,同时与行业蓬勃发展态势相适应。笔译员除了承担笔译任务外,往往还需兼做译前/译后编辑、术语管理、技术写作、校订编审、排版设计、项目管理等语言服务工作;而口译员在口译之余,也要同时担当笔译员、文化协调者、语言政策咨询者、技术写作者、会议组织者、项目经理等角色^[4]。为了满足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和全球化的需求,德国联邦政府非常重视对外语言服务人才(Sprachmittlern)^[5]的培养,不仅从法律上加以保障,同时在高校体制中加大培养力度^[6]。

二、对外语言服务人才的法律保障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立法权力根据《基本法》(即宪法)规定,仅限于国防、外交、海关等涉及整个联邦共同利益的领域,而各联邦州政府根据《基本法》规定享有相应范围的立法权。文化教育事业的立法和行政权限根据《基本法》第七条“国家将整个教育事业置于其监督之下”的原则,由联邦政府将教育事业的管辖权在联邦政府和各联邦州之间进行分配,各联邦州政府部门负责语言服务教育培训机构的设立和相应规划的制定^[7]。

1. 以法律形式规定对外语言服务人才的地位与标准

各联邦州政府部门在语言服务人员的培养和使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管理职能,对语言服务人员的资格和相关权限、义务,以及担任的语言服务的评定标准等都有详细的规定。根据汉堡州 2005 年 9 月 1 日颁布的对外语言服务行业中口笔译从业人员法律条文的规定^[8],翻译人员每次工作或者居住地方迁移都有义务直接告知州法院院长;印章只能用在本人的翻译中,只用于公众指定和宣誓的场合,未经授权禁止使用;谨慎地管理所交付的文件和文字材料,不向外透露任何有关信息,翻译文件只交给客户或者授权的相关人员;对翻译内容保持沉默,遵守翻译人员行业道德,不向第三方传递相关信息;作为面谈委员会成员参加整个公众指定程序;服务费用根据法律规定和具体案例进行计算。这些规定,一方面肯定了语言服务人员的社会地位,通过法律的形式加强了公众对于语言服务人员的可信度;另一方面规范了语言服务人员个人素质、专业资格和权利义

务,并明确了语言服务人员的工作内容。由于各联邦州对语言服务人员的需求不同,具体的管理政策及要求也不同。如,萨克森-安哈特州要求提供语言服务的人员需要通过州政府设置的相关考试的认证(笔试和口试)^[9];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要求翻译人员具备必要的语言和法律用语知识^[10]。

2. 用法律条文规范高校对外语言服务人才培养

德国联邦政府非常重视建立科学严谨的人才资源培训计划和管理体系,以克服联邦制所造成的各个联邦州之间的不平衡,保证各州高教发展能基本协调一致。《基本法》在 1969 年赋予联邦政府以高等教育原则立法权,并于 1975 年诞生了第一部《高等学校总法》,确定了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框架。此后,16 个联邦州根据在高等教育领域拥有的立法和行政管理权,相继按照《高等学校总法》要求修改了原有的《联邦州高教法》。一方面,通过财政手段将学校置于政府控制之下,以控制学校经费运转来间接监督学校的行政指导;另一方面,赋予大学一定的行政自治权和学术自主权,如根据其章程具有选举产生的管理机构和管理本校或本系的事务^[11]。

各联邦州对辖区内教育规划拥有实际管理权,而教学规定基本处于政府和学校双重管理之下。各联邦州政府重视制定和实施对外语言服务人才的政策,不断努力改善人才培养的外部环境,加强组织领导和政府投资,并且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建立了多样化的培训体制。如,汉堡州的联邦法就规定,从事对外语言服务的口笔译者必须具备包括德语和外语的语言知识及其法庭和公众机构的规范,为口笔译人员的培训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些法律规定都为高校中具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规范提供了保障和方向。

三、德国高校培养对外语言服务人才的特色

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数字信息化等各项因素催生了德国对外语言服务市场的发展,同时也对对外语言服务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为顺应要求,德国的大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对外语言人才培养体系。德国的综合性大学(Universität)设有翻译学院和翻译专业,同时辅以应用技术大学(Fachhochschule)和翻译专业学院(Fachacademie),构建了多元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的培养体系。

1. 多元化

多元化是指通过多种学习选择、多种实习方式和多样化的学制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培养模式。

(1) 多元化的学习选择

德国的各类高校为培养对外语言服务人才提供了多元化的学习选择。

第一,综合性大学。根据“全德翻译者协会”(BDÜ)官方网站^[12]的资料显示,德国具有全日制翻译专业的综合性大学共有 9 所,即:海德堡大学、美因茨大学、慕尼黑大学、波恩大学、杜塞多夫大学、黑德海姆大学、莱比锡大学、波茨坦大学和萨尔大学。这 9 所综合性大学的语言文化教学各有偏重:海德堡大学、美因茨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拥有德国最著名的翻译学院,波恩大学以亚洲语言和东方文化研究著称,杜塞多夫大学的语言特色为英美文化研究,黑德海姆大学以专业翻译见长,莱比锡大学的语言学和翻译研究传统悠久,波茨坦大学的斯拉夫语言独树一帜,萨尔大学的语言学与语言技术颇具特色。综合性大学的语言文化教学对学生的语言综合能力进行了全方位的培养。

第二,应用技术大学。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德国设立了培养应用翻译人才的应用技术大学。不同于一般高校,应用技术大学更加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目前,德国开设翻译专业的应用技术大学有福勒斯堡应用技术大学、科隆应用技术大学、维尔茨堡-施万福特应用技术大学、安哈特应用技术大学和茨陶-哥理茨大学等 5 所高校。应用技术大学非常注重学生的专业实践,力图从实践中发现不足,通过学习再提高实践能力,针对性很强,这对强化学生技能的培训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对于今后希望提高理论水平的学生,应用技术大学也允许进入综合性大学继续学习博士课程。应用科技大学的设立让学生能够根据各自的学习目标和兴趣选择相关院校,为学生提供了选择的自由度。

第三,翻译专业学院。德国培养翻译人才的机构还包括 8 所翻译专业学院,分别为欧洲班贝格学院、欧洲英戈尔施塔特专业学院、慕尼黑外语学院、欧洲威登职业学院、爱尔兰根大学外语和外国人学院(IFA)、肯普顿外语专业学院(IFB)、慕尼黑语言口译学院(SDI)、维尔茨堡外语专业口译学院等。翻译专业学院的建立是对高校培养对外语言服务人才体制的有效补充。

(2) 多元化的实习

翻译实习是实践教学中的重要环节,是学生掌握翻译技能提升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专业实习是指学生在基本完成相关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课程学习之后,在实际工作环境或高度仿真的模拟工作环境中,展示、应用、检验所学相关知识与技能,锻炼和

提高工作能力,增强职业意识,培养职业习惯,提升可雇性的培训阶段。

除了综合性大学的常规实习模式,德国的应用技术大学的实习更具特色。应用技术大学的入学资格需要满足完成 9 年基础教育,以及由教育局和劳动部推荐的两个条件。学生进入大学之后,首先签订两份合同:第一份是与学校签的培训合同。合同规定,经过 3 年的培训,学生应该具体达到什么水平。第二份是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学生与企业签订的合同。合同规定,学生边学习边在企业中实习,从 10 年级开始拿工资,每月由企业发给学生 400—600 欧元的实习工资。因为学生在学习期间能拿到工资,这也是应用技术大学吸引生源的巨大优势^[13]。

(3) 多元化的学制

不同形式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不同,学制也相应变化。综合性大学的口笔译专业一般为 4 年学制。学业一般分为基础阶段、专业学习阶段和提高阶段,以培养研究型对外语言服务人员为目的,注重基础课程的教育。因专业方向的不同,规定的学习年限也不同。一般来讲,每个学年分为冬季学期和夏季学期。结业学生可以获得学校颁发的本科笔译学位或者本科口译学位,代替了过去双重的本科“口笔译学位”。相比之下,应用技术大学学制短,通常是 3 年。课程是按 6 学期设置,学生在应用技术大学上课的时间也随年级的升高而逐渐减少。第一学年,每周有 2 天时间到校上课,每天上 9 节课,其中有 3 节文化课,6 节专业课;第二、三学年每周在校学习时间只有 1 天,其余时间均在企业实习。翻译专业学院的学制一般是 3 年,其中 2 年为专业学习。翻译专业学院不发放学位,结业方式是报名参加联邦州的笔译人员考试或者口笔译人员考试。

2. 专业化

专业化指德国高校对外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以市场为导向,重视行业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应用,强调语言服务的职业化特点。

(1) 专业知识课程

德国高校大学的翻译专业除传授语言学基础课程之外,也非常重视其他专业科目的教育。目前,德国开设的副课主要包括经济学、法学、医学等,学生可在其中选择一门。德国的综合性大学借助大学中的辅修课程、选修课程向学生传授相关专业的基本知识,以及有关的专业术语。这为学生独立学习其他专业知识打下基础。副课的学习通常从第 3 学期开始,第 6 学期以后通过考试结束。大学还定期开

设百科知识研讨课(Seminar),邀请各行各业的专家为学生讲座,同时邀请学生参加研讨。如果以培养法庭口译(Gerichtsdolmeschen)为主,则会组织相关的法律讲座;如果社会需求更多的技术口译,则跟工厂企业合作,通过实地语言服务实践,加强学生对语言以外的专业知识的掌握^[14]。

(2) 专业教学方向

德国高校体系中的应用技术大学基于本校不同的专业教学资源,都设置有特定的语言服务培训专业方向。如:福勒斯堡应用技术大学主要培训机械类和电子类,科隆应用技术大学主要培训信息交流和传播交流,维尔资堡-施万福特应用技术大学主要培训各种科学领域。这种应用型对外语言服务人员培训更趋近职业化,与市场结合更加紧密,具有极高的实践性^[15]。

3. 国际化

国际化是指德国高校从多语种课程设置、跨文化意识培养和提供国际交流机会等各个方面,让学生处于多语种和多文化的国际环境中。

(1) 开设多语言课程

德国综合性大学一般都设有多国语言专业。美因兹大学应用语言与文化学院^[17]是国际大学翻译学院(CIUTI)院长常设会议的成员,开设的专业有:英国和美国语言文化专业(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传授大不列颠英语语言文化,而后者则传授美国英语语言文化)、法国语言文化专业、意大利语言文化专业、西班牙语语言文化专业、葡萄牙语言文化专业、俄语国家语言文化专业、波兰语言文化专业、阿拉伯语言文化专业、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现代希腊语言文化专业、荷兰语言文化专业,以及为外国留学生设立的“德语语言文化专业”等。多语种课程的开设,有利于以人文通识教育培养学生的价值观自觉,以社会科学方法论教学促进国别、区域研究意识,培养学生的全球理解能力。

(2) 培养跨文化意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翻译行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因此培养跨文化意识已经成为培养对外语言人才的最基本的要求之一。为了促进学生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德国的综合性大学为语言学专业学生开设了跨文化的国际知识课,涉及社会学、现代文学、现代历史、政治和国际组织机构等,极大地丰富了学生专业领域的词汇量,同时促进了学生对国外经济、文化环境的了解。

(3) 加强国际交流

德国高校重视利用现有资源积极促进学生与国外的交流。例如,美因茨大学应用语言学与文化学院积极吸收国外留学生,为专业发展营造国际化交流环境。德国的综合性大学也利用欧盟提供的欧盟各国之间高校互换生的便利条件(例如欧盟内部的Erasmus学生和学者交换项目),一方面借鉴其他欧盟国家高校的口笔译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另一方面使口笔译专业的学生通过交换项目提高对于译语的认识,增加与国外同行接触的机会。

四、德国高校培养对外语言服务人才的课程与教学

德国综合性大学的翻译专业一般分为“笔译专业”和“口译专业”,并按照相关要求设置了专业课程,分授不同的学位。笔者将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考试评价三方面介绍德国口笔译人才的培养。

1. 课程设置

(1) 设置不同方向课程

以海德堡大学翻译学院为例^[17],翻译专业的学位分为笔译学士学位(包括为国际学生提供的西班牙语笔译方向)、信息技术下的翻译学士学位、笔译硕士学位(包括海德堡大学和西班牙萨拉门卡大学的“专业翻译和文化交流”双硕士学位)、会议口译硕士学位。口译和笔译方向的课程设置不同,因为笔译的起点和终点是文本,而口译处理的是语言信息。口译的整个过程是紧张的,它的速度通常是笔译的30倍,但是口译中比较容易掌握交际各方的反应,因此可以随时根据需要进行补充、删减和重复。笔译是以原文为本位,对资料来源和出处都要交待清楚,以便忠实于原文。因此,笔译专业强调对于原文文本的理解及其笔头语言的雕琢,而口译专业则强调对口头话语的逻辑分析、短时记忆和对于原语的迅速理解,以及在译语中的迅速反应^[18]。

(2) 采取多语种融合

以美因茨大学应用语言与文化学院为例,翻译学士学位的课程设置一般涵盖6个学期,包括14个必修课模块、2个必选课模块、2个选修课模块、1个考试模块,以及至少在国外进行为期6周的外语实习。学生可以选择任一种语言组合进行学习:学习母语和两门外语;学习母语和三门外语;学习母语和一门外语(德语或英语)。专业知识模块主要是传授语言和翻译领域的基本科学知识。基础性、专业性的语言和翻译练习课程,以母语、第一和第二外语来学习相关学科领域的基础知识。笔译硕士学位的

课程设置包含用多语种来教授学生相关专业领域的知识,培养他们在语言文化和翻译领域的独立学术研究能力、专业笔译能力,以及良好的跨文化协调能力。由此可见,德国高校翻译专业的多语种融合强调语言本身的多样化和专业领域课程的多语种化。

(3) 培养跨学科知识

基于翻译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德国高校的翻译专业课程设置非常重视多门学科知识的传授。如,慕尼黑大学语言文学学院^[9]有 3 个系:德语和北欧语系、拉丁和斯拉夫语系和英美语系。学院的课程中仅硕士课程包含笔译方向。笔译硕士学位课程涵盖 2 个学期,包括叙事文本和散文翻译、主题笔译、翻译理论、翻译评论、语言学和文学研究、语言风格分析、创意写作、文本练习等。同时还为学生提供优质的跨专业课程,包括比较文学、英语浪漫史研究、意大利语、斯拉夫语和文本研究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参加不同语言课程和翻译研讨会。课程不是简单相加,而是强调融合。学院通过开设大类课程、辅修专业、创新实践等方式,贯通翻译专业。

(4) 融入现代技术课程

随着现代技术日新月异,德国高校翻译专业已将最新的信息素养融入了课程设置。一般而言,课程包括翻译研究模块和“主题”模块(主题涉及互联网技术、医学、法律、技术或经济学领域)。笔译硕士课程中还设置了核心课程(社区口译、技术笔译、跨文化研究、交替传译、同声传译、文学翻译、媒体翻译、翻译研究与教学),每门重点课程由 2 个选修模块组成。在会议口译硕士学位 4 个学期的课程中,语言组合和课程配置包括:同声传译、口译研究、口译符号系统、文化研究、同声传译、术语、职业道德和笔译练习等。随着现代互联网和 AI 技术不断渗入语言服务行业,机器翻译、本地化、译后编辑等课程也相继进入课程体系^[2]。

2. 教学方法

(1) 形式多样化

德国综合性大学中翻译专业的教学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讲座、大型系列讲座、高级研讨会、练习课、集中课程和研究座谈会。“讲座”主要由讲师以讲课的形式传达,鼓励学生独立和进一步学习相关内容。“大型系列讲座”是一种特殊的讲座形式,授课者是来自不同学院的老师或专家,主要讲授某一特定主题,重点是让学生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现状。“高级研讨会”的形式包括:互动式教学、项目工作、研究学习和演示等,具体形式的选择基于课程模块

中需要传授的技能。“练习”是将所学的理论知识用于实践。老师会先给出相应的准备任务,然后在课堂上一同讨论和提供解决方案,通过各种互动的学习和教学形式进行练习,包括个人和小组工作、项目工作和合作学习。“集中课程”是指课程教学采取连续几天进行,而不是每周进行一次,一般在无常规课期间举行。集中课程通常集中于某一特定的主题。“研究座谈会”主要介绍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并进行科学研究方面的交流,特别是学习相关论文答辩技能并为硕士或者博士论文做准备。

(2) 项目式教学

除了常规化的课程教学,海德堡大学的翻译学院定期开展项目教学,将其作为所选课程的一部分,包括典籍翻译、文本翻译、电影字幕/视听翻译、软件和网站本地化、术语翻译,口译方向则由学生对接座和会议进行实时口译^[2]。

项目式教学能极大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进一步强化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也能通过小组内及小组间的充分交流、讨论、决策等,提高学生的合作能力,强化学生的团队意识。真实的项目能为学生提供实用的口笔译经验,同时也能让学生实际了解对外语言服务行业的日常工作。根据专业知识方向不同,学院还定期组织学生去公司、欧盟机构和其他学院进行短途考察,作为教学课程的一部分。考察的地点包括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斯图加特的贸易展览会和海德堡地方法院等。

3. 考试评价

除了大学常规的课程考试,德国高校翻译专业的毕业生仍需要参加翻译资格考试,因为刚获得翻译学位证书步入社会的新手翻译缺乏相关的实践能力。除了在没有特别要求的联邦州之外,翻译资格考试都是由各联邦州文化教育部主管的对翻译人员的外语掌握能力的认证考试。各联邦州的翻译资格认证考试具体由各州文化部下属的考试处分管,而考试翻译类型和语言种类由于各联邦州资源和对相关语言的市场需求不同而有所区别。各联邦州文化部具体指定并公示考试时间表,考试内容随着市场上翻译服务使用者的需求变化,同时也根据报考的翻译资格需求进行调节。

一般来讲,懂得一门以上的外语并且具有一定的翻译实践经验就可以预约翻译资格认证考试。翻译专业学院的毕业生可以直接申请参加考试,而综合性大学和应用技术大学的毕业生需要证明至少接受了 3 年制课程的口笔译培训,或至少具有 3 年专职的口笔译经验。如果申请者的母语不是德语,在

进行翻译资格考试之前,还需要通过大语言文凭 (Grosses Deutsches Sprachdiplom) 来证明德语的知识和技能。

各个联邦州对于考试资格的要求,基于本联邦州内部的教育体制和对于翻译人员的管理法令,有所区别。考试试题由各联邦州文化部选出和编排,内容涉及一般的语言知识和专业知识两部分,考试包括 1 个半小时的德语语言考试,3 个小时的外语作文考试和 1 个半小时相关专业考试三个部分。以拜仁州文化部公示的翻译资格考试为例,该州对考试的时间、地点及其考试形式和语种都有具体规定。如:考试包括笔译考试、口笔译考试或者口译考试三种形式,应考者只有通过笔译考试或者联邦州政府认可的同等资格的笔译考试,方可报考口译考试。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意大利语和汉语考试可以全年在慕尼黑外语学院进行。而阿拉伯语、丹麦语、爱沙尼亚语、芬兰语、克罗地亚语、荷兰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则要根据具体需求安排,一般三年进行一次考试。考试以德语作为一种测试语言,并结合相关专业(经济、法律、技术、自然科学或者人文科学)进行考核。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考察德国的对外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体系后发现:

第一,德国多样化的培养形式为学生提供了多项选择空间。应用科技大学的设立是德国人才培养的一大特色,学生能够根据各自的学习目标和兴趣选择相关院校,避免了学不能用的空泛理论指导,具有选择的自由度。德国的翻译专业学院、私人学校和远程教学等培训机构是对高校体制的有效补充,从时间上和空间上扩展了人员培训的范围。

第二,德国高校的专业设置更为市场化。根据市场上对于不同人才的需求,德国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更加具体化和细致化。例如,针对市场对高水平专业人员需求的增加,高校将翻译专业从过去的应用语言学文化学中分出来,同时又根据市场对口译人员需求的增加,将口译和笔译专业课程设置和学位区别开来。学生结业之后将分别获得笔译学位或者口译学位,充分体现了德国高校人才培养根据市场变化向实用化发展的趋势。

第三,德国的翻译资格认证体系纳入了考试评价体系。德国拥有一整套完备的专业资格认证体系。由于政府对语言服务企业的注册、企业从业人员资质要求做出符合行业发展的限制,同时建立了

市场准入制度,实行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因此人才培养效果的检验从高校延伸到社会。

根据中国对外语言服务人才培养的现状,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的方面包括:

其一,尽管中国不具备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培养体系,但可以通过政产学研合作的方式培养实践型语言服务人才。政府和教育指导部门可定期对翻译专业院校的培养情况和市场的发展状况进行调研,及时了解企业需求,为产学研互动提供可靠依据。相关院校也应积极探索符合区域发展与市场实际需求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有条件的院校可以组织师生实地参观企业,与企业面对面交流。同时,高校与企业共建实习基地,发挥企业实践资源丰富的优势,将实习基地建成学生实习、实训、就业、创业的平台,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其二,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人才的培养。结合中国国情,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完善有关对外语言服务行业的法律法规建设,走专业化之路。由于一些高校本身就是具有专业特色的大学(例如政法、医科大学等),或在某个专业领域具备很强师资,或与某个行业机构合作密切,因此可以选择专业翻译为主、通用翻译为辅的专业化培养道路。专业化培养不只是简单地讲授一两门专门用途外语或翻译课程,而是需要深入而系统地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同时创造机会让学习者到行业机构去观摩见习。

其三,强化行业资格认证体制。德国对外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体系之所以能够发育成熟,更多地得益于政府对于从业资格的要求。我国可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鼓励翻译专业的学生和从业人员参加翻译资格考试,检查和督促翻译高校翻译资格考试衔接实施情况,鼓励用人单位将翻译资格考试证书作为职业基本能力的依据。我国应改革资格考试的形式和内容,在继续保持考查译者口笔译能力的同时,加强对技术和管理能力的考查,以适应当前对外语言服务行业的发展需求,从而帮助整个行业建立完整而体系化的人才评价标准。

参考文献:

- [1] 中国翻译协会.2019 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 [R].北京:外文出版社,2019.
- [2] 德国联邦统计局报告 [EB/OL]. [2020-06-20]. <https://www.destatis.de>.
- [3] Rösener C., T. Dörflinger, C. Canfora. Berufsfelder und Perspektiven für Übersetzer und Dolmetscher: Eine Studie zum Verbleib der Absolventinnen und Absolventen des FTSK

- Germersheim [EB/OL]. [2020-06-20]. https://www.zq.uni-mainz.de/files/2019/12/Band25_VerbleibsstudieDes-FTSKGermersheim.pdf.
- [4] 任文. 新时代语境下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再探究: 问题与出路 [J]. 当代外语研究, 2018(6): 92-98.
- [5] Ottmann, A. Best Practices: Übersetzen und Dolmetschen. Ein Nachschlagewerk aus der Praxis für Sprachmittler und Auftraggeber [C]. Berlin: BDÜ-Fachverlag, 2017.
- [6] Kadri é M. & Kaindl K. Berufsziel Übersetzen und Dolmetschen: Grundlagen, Ausbildung, Arbeitsfelder [C]. Tübingen: A. Franke Verlag, 2016.
- [7] 蒋莉华, 等. 中国翻译行业立法之路: 来自德国的借鉴 [J]. 中国翻译, 2012(4): 49-52.
- [8] 汉堡州口笔译法律 [EB/OL]. [2020-06-20]. <http://www.landesrecht-hamburg.de/jportal/portal/page/bshaprod.psml?showdoccase=1&doc.id=jlr-DolmGHA2005rahmen&st=lr>.
- [9] 萨克森-安哈特州口笔译法律 [EB/OL]. [2020-06-20]. <https://www.landesrecht.sachsen-anhalt.de/bsst/document/jlr-DolmGST2009pP1>.
- [10]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口笔译法律 [EB/OL]. [2020-06-20]. https://recht.nrw.de/lmi/owa/br_vbl_detail_text?anw_nr=6&vd_id=10649&vd_back=N128&sg=0&menu=1.
- [11] 蒋莉华, 曹斌. 德国翻译人员的管理、培养体系 [C] // 中国人才前沿 No.4.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470-494.
- [12]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EB/OL]. [2020-06-20]. https://bdue.de/fileadmin/files/PDF/Presseinformationen/Pressemappen/BDUE_Hintergrundinformationen.pdf.
- [13] Schmitt P. A., L. Gerstmeier, S. Müller. Übersetzer und Dolmetscher: Eine internationale Umfrage zur Berufspraxis [C]. Berlin: DBÜ Fachverlag, 2016.
- [14] Orlando, M. Training 21st Century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At the Crossroads of Practice, Research and Pedagogy [M]. Berlin: Frank & Timme, 2016.
- [15] Rodríguez de Céspedes, Begoña. Addressing Employability and Enterprise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Translation Curriculum [J].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2017(11): 107-122.
- [16] 美因茨大学应用语言学与文化学院 [EB/OL]. [2020-06-20]. www.fask.uni-mainz.de/fbpubl/brosch/info-de.html.
- [17] 海德堡大学翻译学院 [EB/OL]. [2020-06-20]. <https://www.uni-heidelberg.de/fakultaeten/neuphil/iask/sued/index.html>.
- [18] EMT. European Masters in Translation. Competence Framework 2017 [EB/OL]. [2020-06-20].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info/files/emt_competence_fw_2017_en_web.pdf.
- [19] 慕尼黑大学语言文学学院 [EB/OL]. [2020-06-20]. <https://www.anglistik.uni-muenchen.de/studiengaenge/lituebers/index.html>.
- [20] De Palma, D. A. et al. The Language Services Market [C]. Cambridge, MA: Common Sense Advisory, Inc. 2016.
- [21] Kvam S. et al. Spielräume der Translation: Dolmetschen und Übersetzen in Theorie und Praxis [C]. Münster: Waxmann Verlag, 2018.

How to Train Foreign Language Service Talents in Germany

JIANG Lihua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domestic education policy, German legislation ensures the status of employees in foreign language service industry. The German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consisting of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applied technology universities and translation colleges are presenting the features of being diversified, profess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h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teaching methods and examination evaluation in German universities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training of Chinese language service talents.

Key words: language service; talent training; Germany; applied technology university; college of translation

湖南师范大学“双一流”学科教学改革笔谈

编者按: 近年来, 湖南师范大学全力推进“双一流”大学建设,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以教学科研为中心, 以战略需求为导向,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以国家启动“新文科”建设为契机, 推进以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为核心的专业内涵建设, 努力建设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体系, 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本栏目的 3 篇文章, 主要从学校国际化建设、课程教学法改革等方面反映了我校锐意进取、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教学改革思路。

“双一流”学科的国际化建设

蒋莉华

2017 年 9 月,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成为湖南省属高校唯一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的学科。学校上报的“语言与文化”学科群建设方案中明确指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为主建学科。因此, 深入推进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 对全面提升学科群实力和推进学校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为例, 从国际化教学、国际化科研和国际化合作三个方面探讨其国际化建设路径。

一、“双一流”学科的定位与特色

湖南师范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 学术积累厚。它肇始于湖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国立师范学院初创时的英文系, 由学贯中西、有“文化昆仑”之称的钱钟书先生亲自创办, 数十年来, 罗膺岚、刘重德、沈同治、徐燕谋等一千名家先后任教于此。近年来, 借着“双一流”建设的“东风”, 学科聚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和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取得了一系列积极进展, 向着打造世界一流学科的目标稳步迈进, 整体实力更上一层楼。与全球 30 余所大学建立了密切的交流合作关系, 在俄罗斯、韩国和美国承办三所孔子学院, 其中俄罗斯喀山联邦大学孔子学院被国家汉办评为“全球先进孔子学院”。

学科拥有一支由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教学名师、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和

委员组成的、国际化特征明显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学术发展在全国已有相当影响, 实力居全国前列, 具有深厚的学术底蕴。其中, “英语专业”为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和湖南省重点示范专业。2016 年, 英语专业在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16 年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中获评 5 星等级, 位居全国同类专业第 4 位。2017 年, 外国语言文学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长期以来,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致力于服务国家外语高等教育的发展, 承担了外语教育一系列国家标准的研制任务。作为外语类国标、英语专业国标等国家文件的主要领衔起草单位之一, 获得了我国第一个外语专业类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近年来, 学科积极创新教学模式, 构建了由国家标准、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级规划教材等组成的本硕博一体化“教学环链”, 形成了以“全人教育”与“个性学习”为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稳步推进, 国家急需大量高质量的跨文化复合型外语人才^[1], 学科瞄准国家行业急需人才, 主动调整本科专业和二级学位点。

湖南师范大学作为国家“双一流”建设大学, 充分依托外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的优势资源, 提升学生的跨文化和跨语言交流能力、拓宽国际视野和全球眼光,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积极为国家 and 地方重要对外活动提供智库服务。如 2018 年 9 月, 第四届对非投资论坛在长沙举行, 来自英语和法语专业的 35 名学生志愿者, 承担了“一对一”接待国家元首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的重要任务。2019 年第一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在长沙举办, 学院积极配合湖南省

政府,全程参与博览会的组织和开展工作,组织翻译了《中非经贸合作案例方案集》(英文版、法文版),为博览会的顺利举办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国际化教育

1. 高水平国际化师资

周连勇认为,高等教育师资队伍的国际化的两个方面:一是应积极促进国内优秀教师主动参与国际交流,促进国际化理念的提升和实践;二是应注重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师资对国内教育和发展的影响,促进他们发挥示范带动和引领作用,培养一批有国际视野、创新意识的国际化师资队伍^[4]。戴炜栋、王雪梅指出,一流外语学科应突出多语种、国际化特色,打造结构合理、水平一流、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师资队伍,学科带头人与各层次教学科研团队互为支撑,潜心教学科研^[5]。

国际化师资队伍是一流学科建设的坚实基础,一所高校的国际化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所学校师资队伍的国际水平。师资国际化方面,近3年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国际师资引入工作较为出色。2015年以来,外国语学院从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美国纽约大学、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等名校引进教学经验丰富、科研能力突出的优秀人才9人,推行“走出去、引进来”的方针,推进师资队伍的国际建设。近3年来,英语专业有9名教师分别赴美国、加拿大等国际知名学府以及国内知名高校做一年及以上的访学研修或工作,同时通过科技部、省级和国家级人才项目引进高端外专外教。另外,邀请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外高水平的学者前来讲学或讲座,平均每年讲学超过40场。学院与世界一流语言数据实验室瑞宏(Red Hen Lab)实验室合作,成为瑞宏实验室在亚洲唯一的数据中心。成立了全国首个认知科学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促进了英语语言教学研究交流,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合作开设“创意写作班”,邀请英美著名诗人、剧作家等授课。近年来,学院有20名教师参加了国际、国内的高水平学术会议,有效提升了英语专业教师队伍的国际化建设。

2. 多层次国际化学生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是我国高校建设“双一流”、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更是推动“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推手^[6]。近年来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国际化程度较高,不仅坚持“引进来”,还坚持“走出去”。

为吸引更多优秀的外国留学生报考外国语言文

学一流学科,外国语学院不仅与国际交流合作处积极合作,推出国家汉办、省级和校级奖学金,还专门设立了“一流学科奖学金”,仅2019年秋季学期就吸引了来自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近20人来本专业进行研修和攻读本科、硕士研究生学位。同时,依托“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生海外研修和国际交流计划”,与蒙特雷高级翻译学院以及特拉华大学等世界名校开展师生互访交流合作。此外,还有一大批学生利用留基委项目或自费留学。学生每年留学三个月以上的有200余人次,参加各类型国际学术会议有400余人次。

2018年,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与美国特拉华大学合作开展硕士研究生教育项目,成为湖南省首个研究生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为进一步加大国际化交流力度,鼓励和支持研究生参与国际交流、拓宽国际视野,自2018年起启动了“研究生海外研修和国际交流计划”项目,支持研究生赴海外高水平大学或机构开展3个月以上的研修与联合培养。对于具有海外研修和国际交流经历的研究生,学院优先推荐其申报研究生创新计划、创新基金项目、省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选等。

三、国际化科研

科研能力是显示一个大学综合实力的重要因素,国际化科研则能够体现一个学科是否能够紧跟前沿理论,能够顺应时代发展。胡开宝、王琴则指出,学术研究的国际化主要表现在研究成果的国际化 and 学术平台的国际化。研究成果的国际化指在国际学术期刊或国外出版社发表、出版学术论著,而学术平台的国际化包括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的建立、国际学术期刊的主办和国际学术会议的承办^[7]。

1. 发表高质量有国际影响的论文

一流学科的学术研究一方面要把握国际前沿领域研究,引领发展趋势;另一方面要立足学科现状,结合国情校情提出新观点并构建新理论。戴炜栋、王雪梅提出,国际一流的学术研究一方面要依托各类国际性或全国性学术团体、协会等构建学术共同体;另一方面各院校要以学术方向或学术项目为平台,打造学术团队,促进成果的国际化^[8]。

在研究评估方面,国际学术论文发表的层次和数量成为“国际化”的重要考核指标。就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特点而言,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SCI)和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简称A&HCI)收录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代表着本学科基础研究的世界级水准,这在学术界已形成了基本

的共识。目前各高校外语学科顺应国际学术主流,以 SSCI、A&HCI、CSSCI 等收录的国内外核心期刊论文作为考核标准,同时综合考虑专著、译著、教材、专利等不同的成果形式,实行代表性成果制度,强调成果的社会应用及影响力。

2. 举办高级别国际会议

国际学术会议是一流学科发挥学术引领、开展学术对话和分享学科资源的重要平台。近 3 年来,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成功举办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研讨会,打造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品牌,推动了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

举办了“新世纪外国语言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国际多模态交际研讨会”“国际中文与比较文学双年会”等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共有来自美国、新西兰、英国、俄罗斯、荷兰等 30 余个国家的近 1 000 余名代表参加,光明日报、人民网、湖南日报等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学术影响。学院充分利用“瑞宏实验室亚洲研究中心”“学学半”“麓山语言文化论坛”等平台,邀请了瑞宏实验室全球各分支机构的近 30 位研究员来校举行学术讲座,开展工作坊,为国内学者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2018 年 6 月,在中美双边关系发展的关键节点,学院举办了“第十五届中美青年学者对话会”,两国青年学者齐聚一堂,就双方共同利益的相关话题进行对话。2019 年 4 月,在国家“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召开前夕,学院举办“2019 潇湘论坛:东北亚文明与和谐构建”学术研讨会,来自东北亚中、俄、韩、日、蒙的顶级专家总计 80 余人参加论坛,为研究国际问题、特别是东北亚问题打造了一个国际交流平台。

3. 国际化期刊影响力

为了提高国际化科研水平,实施科研国际化战略,发挥学科特色,做好全球布局,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实施国际知名高校合作拓展计划,加强科研深度国际合作,不断加强优秀学术期刊国际化建设,资助教师开展实质性高水平国际科研合作交流。

创办了《外国语言与文化》和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两种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其中,《外国语言与文化》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组织的学术期刊数据库用户数据关注报告(2018)的调查中,在 46 种语言学类学术期刊中排名第一。而国际期刊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助推中华文化和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平台作用。学校设立了专门的学术期刊建设基金,为外语类国际学术期刊的运行提供了基本的财务支持,成立了专门中

英文编辑部从事期刊编辑管理工作,规范学术期刊质量管理与绩效评估,建立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及引导激励机制,从而提升了学术期刊的整体质量。与此同时,英文期刊也与国际知名期刊进行期刊交流和强强联合,向国际社会传播一流学科的科研成果,同时扩大学科的国际影响力。

四、国际化合作

国际化合作体现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层次和水平,有利于促进海外人才与国内科研骨干队伍的融合,全面提升学校的科研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徐涔琳认为,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加强国际协同创新,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是中国高校进一步参与全球教育资源竞争与合作的必然诉求,也是国家实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行为^[3]。

学院与瑞宏实验室及其全球数据分支机构、合作单位创立了涵盖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三位一体”的合作办学项目。2019 年,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合作申报的“大数据背景下复合型外语创新人才培养项目”成为首批国家留学基金委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该项目由国家留学基金委全额支持,每年选派博士生、联合培养博士生、博士后与访问学者去瑞宏实验室与阿尔伯塔大学学习。中外双方合作开设了长期与短期结合、线上与线下混合的课程。瑞宏实验室的教授从 2017 年起每年来湖南师范大学开设两期语言与文化方面的讲习班,讲习班主题分别为“人类的创造性”“语言与认知”“多模态研究”等;阿尔伯塔大学的教授从 2018 年起每年为研究生讲授“西方文论简介”课程;中外教授共同成立本科生英语创意写作班,定期邀请国际知名小说家、桂冠诗人来授课,并成功出版了两期 *Voice* (湖南省内唯一一份由本科生主编的英语文学文化作品集)。中外双方合作开办了 2019 年“比较文学与跨文化”国际暑期班,该暑期班涵盖了来自 6 个国家、近 40 所高校的 150 名学员,主讲专家主要由瑞宏实验室的研究员担任,同时合作开设了“比较文学与跨文化”“创意写作”等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慕课)。合作院校已经深度参与到了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双方实施中外导师合作制,直接参与指导外国语学院的硕士生与博士生。

学院利用自身的学科优势与语言优势,与湖南省外事侨务办、湖南省商务厅、湖南省贸促会积极开展合作,主动参与国家和地方国际合作。合作不仅促进了学科科研成果的转化,同时也强化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国际视野的拓展。其中,东北亚研

究中心在朝鲜半岛文学文化、朝鲜半岛的国际政治与中国的周边安全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参考文献:

- [1] 曾艳钰.论新时代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跨学科发展路径[J].外语界,2019(1):31-37.
 - [2] 周连勇.“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路径探究[J].世界教育信息,2018(20):39-42.
 - [3] 戴炜栋,王雪梅.“双一流”背景下的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战略[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5):1-13.
 - [4] 王喜娟,朱艳艳.高校“双一流”建设的研究热点初探——基于CNKI文献的知识图谱分析[J].当代教育科学,2018(10):88-97.
 - [5] 胡开宝,王琴.国际化视域下的外语学科发展:问题与路径——以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科建设为例[J].外语教学,2017(2):1-6.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一般项目[6BYY022]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教育性语言教学的新方法: 概念型教学法

卢 婷

随着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技术化教学的弊端日益凸显。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涌现反映出教学中“教育性”的缺失。“教育性教学”给我国正在进行的教育教学改革带来了新的视角。作为一个进行“概念重构”的教育学理论体系^[1],它强调教学是“知识性”和“教育性”统一的过程,对语言教学也提出了新要求。概念型教学法是语言教学中的最新流派,该方法聚焦概念知识,训练思维能力,其教学特点正好切合教育性语言教学的理念。

一、回归赫尔巴特的“教育性教学”

随着人文学科中实证研究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的教学技术化程度一直在朝纵深发展。日益升级的信息科技为技术化教学提供了硬件支持,而实证主义导向使我们越来越重视教学效率,进一步强化了教学的技术化。客观上,技术化的教学有助于知识技能的习得及提高学习效率。然而,它引发的问题也不容小觑,其中,最典型的为心理健康问题。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报告显示,除了自杀这种极端行为,厌世、抑郁等一系列心理问题也在青少年中高发^[2]。这说明“空心病”^[3]在我国青少年中

普遍存在。所谓“空心病”,是指人心中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内心缺乏支撑自我的价值观^[3]。“空心病”折射出技术化教学中的弊端——重视知识传授却忽视培育人的“道德力量”^[4]。这是我国长期将“教学”与“教育”彼此对举甚至相互分离的结果。如何正确认识教学与教育的关系?这对我们缓解当前教育教学改革的困境意义深远。

在《普通教育学》中,赫尔巴特^[5]明确指出,我们需立刻承认,不存在“无教育的教学”,也不存在“无教学的教育”。由此可见,他否定了教学与教育的隔离。赫尔巴特^[5]认为,“无教育的教学”是没有目的的教学,而“无教学的教育”是无法实现的教育,因为教学是达成教育目的的必需手段。同时,他进一步提出了“教育性教学”,构建了将教育与教学融会贯通的理论体系。教育性教学^[6],顾名思义,强调教学的“教育性”。它认为教学是教育的必要前提,其使命在于通过知识的传授,形成必要的观念基础,而后获取“道德性格的力量”^[6]。赫尔巴特^[5]指出,人的认知、情绪和意志是统一的。人的情感起源于思想,而原则和行为方式则产生于这些情感;只有通过头脑训练,道德教育才可能实现,而头脑训练就其本质而言是能够通过适当的教学而实现的。因此,教学就是一项利用知识影响学习者的观念和道德的工作^[6]。可见,教育性教学是“知识科学”和“教育学”相结合的教学,具有“知识性”和“教育性”。

教师的知识讲授可以达成教育性教学的“知识性”。然而,如何实现其“教育性”?赫尔巴特^[5]指出,关键在于通过知识训练形成思想内容从而激发道德性格的力量。简言之,知识传授是起点,思想世界的形成是核心,激发道德力量是终点。除了知识训练,思想世界形成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人对自我生命的自我觉知,它来源于自我反思以及基于反思产生的领会、承担和筹划^[7]。可见,培养反思能力对形成思想世界具有重要作用。如何训练反思能力?我们需要依靠两重中介的作用:个体的社会生活和思想世界^[8]。社会生活的中介作用是自动完成的,因为人可以通过感官直接获得经验感受;思想世界的形成及发挥作用则需要借助教学进行头脑训练而实现^[7]。由此可见,面对思想世界的教学是实现“教育性”的核心。

教育性教学具有知识性和教育性,相应地,其实践也需要针对学习者的知识世界和思想世界而设计。传统教学方法可以有效进行知识教学。然而,面对思想世界的教学是我们的新课题。从本质上说,思想世界是概念性而非知识性的^[9]。思想世界

《翻譯季刊》

Translation Quarterly

二零二一年三月 第九十九期

No. 99, March 2021

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2021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ISSN 1027-8559-99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has entered into an electronic licensing relationship with EBSCO Publishing, the world’s most prolific aggregator of full text journals, magazines and other sources. The full text of Translation Quarterly can be found on EBSCO Publishing’s databases.

翻譯季刊

Translation Quarterly

香港翻譯學會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創刊主編 Founding Chief Editor

劉靖之 Liu Ching-chih

榮譽主編 Honorary Chief Editor

陳德鴻 Leo Tak-hung Chan

主編 Chief Editor

李德超 Li Dechao

副主編 Associate Editors

陳嘉恩 Shelby Chan

李 波 Li Bo

劉康龍 Liu Kanglong

編輯委員會 Editorial Board

陳潔瑩 (主席) Elsie Chan (Chairperson)

張其帆 Cheung Kay Fan Andrew

李德鳳 Li Defeng

李忠慶 Lee Tong King

龍惠珠 Lung Wai-chu Rachel

潘漢光 Joseph Poon

鄧 彧 Duncan Poupard

邵 璐 Shao Lu

洪蘭星 Stella Sorby

鄺 秀 Yan Xiu Jackie

王斌華 Wang Binhua

鄭冰寒 Zheng Binghan

Sara Laviosa

顧問委員會 Advisory Board

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Mona Baker

林文月 Lin Wen-yueh

Cay Dollerup

羅新璋 Luo Xinzhang

劉靖之 Liu Ching-chih

Wolfgang Lörcher

沈安德 James St. André

楊承淑 Yang Chengshu

編務經理 Editorial Manager

劉中柱 Liu Zhongzhu

編者的話：

本期為《翻譯季刊》第九十九期，共收錄六篇研究文章和一篇書評。張美芳、張簫雨和曾維欣採用量性質性結合的研究方法對《毛澤東語錄》和《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中“同志”的翻譯進行了對比研究，揭示了不同時期國內政治文獻翻譯的特徵和成因。作者指出，譯法的轉變展現了翻譯界對翻譯和翻譯研究關注重點的變化，並揭示了翻譯與社會政治之間的相互影響。郭聰和楊承淑採用紮根理論的資料分析方法和檢驗程式，對訪談稿進行分析，得到 33 個國際醫療語言服務能力一級編碼，最終形成八個能力範疇。該模型的建構可望為國際醫療語言服務人才培養設定目標，為教學方法和課程設置提供理論依據。梁志芳和邵璐採用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分析了中國特色話語“一帶一路”在美國主流媒體新聞報道中的接受與傳播情況，揭示了三大媒體對此倡議的認知狀態及其情感態度。研究表明，中國特色話語外語譯名的規範工作及對“倡議”性質的宣傳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部分美國媒體將“一帶一路”塑造為中國謀取地緣政治訴求的工具。蔣莉華以話語口譯理論模型為基礎，以話語口譯篩檢程式為工具，具體分析香港的雙語庭審過程中口譯員的具體決策行為。研究發現，法庭口譯員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完全中立，而是在不同的情境中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或多或少地介入整個法庭口譯過程中。楊曉華和祖贊從譯介主體、譯介過程和譯品接受三個方面分析舞鶴《餘生》的異質性文學書寫和白睿文的英譯過程。研究發現，漢學家白睿文秉承“存異倫理”和“創新倫理”，通過翻譯將目的語讀者群轉變為異地的離散群體，讓其追尋霧社事件的歷史事實，與原住民族群進行跨文化交流與對話。王昱和範武邱對新中國成立初期旅美華人譯者通過翻譯重塑中國國家形象的譯介實踐進行考察。研究證明，通過對翻譯題材的理性選擇、對譯介內容的詳細考證和勘誤、善用副文本闡釋中國文化元素以及歸化和異化兼顧的翻譯策略，譯者實現了中國傳統經典在疆界和文化上的跨越，較為成功地塑造了中國的外部形象。本期亦收錄一篇書評，柏雲飛對中譯本《從北京到曼德勒：末代帝師的中國西南紀行》進行了評述，通過具體的案例分析試圖引起讀者對於早期來華外國人遊記中譯本品質問題的重視。

李 波

二〇二一年三月

目錄 CONTENTS

iii 編者的話

論文 Articles

- | | | |
|----|--|-------------|
| 1 | 從不同時代對“同志”的英譯看政治
文獻翻譯的變化 | 張美芳 張簫雨 曾維欣 |
| 13 | 國際醫療語言服務能力模型的紮根
理論研究 | 郭聰 楊承淑 |
| 45 | “一帶一路”術語的英譯及其在美國的
傳播——基於美國三大主流媒體
相關用詞的分析 | 梁志芳 邵璐 |
| 61 | 法庭口譯員的過濾行為：香港雙語
庭審案例分析 | 蔣莉華 |
| 73 | 《餘生》的異質性文學書寫在北美的
譯介研究 | 楊曉華 祖贊 |
| 89 | 建國初期旅美華人譯者國家形象重塑
探析 | 王昱 范武邱 |

書評 Book Review

- | | | |
|-----|--|-----|
| 101 | 莊士敦的文化苦旅：中譯本《從北京
到曼德勒：末代帝師中國西南紀
行》評述 | 柏云飛 |
| 109 | 稿約凡例 Guidelines for Contributors | |
| 113 | Subscription and Order Form | |

法庭口譯員的過濾行為：香港雙語庭審案例分析

蔣莉華

Address: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E-mail: lhjiang@hunnu.edu.cn

Correspondence: Lihua Jiang

Citation: Jiang, Lihua. 2021. "The Court Interpreter's Filtering Actions: the bilingual legal proceedings in Hongkong." *Translation Quarterly* 99: 61-71.

Abstract

The Court Interpreter's Filtering Actions: the bilingual legal proceedings in Hongkong (by Lihua Jiang)

The court interpret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bilingual courtroom. Thus, the research begins to focus on court interpreter's role. Departing from the Triadic Discourse Interpreting Model (TRIM), this paper applies Interpreting Filters to understand the interpreter's decision-making continuum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corpus for case analysis comes from Hong Kong bilingual courtroom. After analyzing the court interpreter's discourse,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rpreter is involved in the whole court interpreting process rather than being completely impartial or neutral.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preting filters" will make the interpreter's decision-making transparent and provide a new insight for court interpreter training.

一、法庭口譯員的角色困境

隨著經濟全球步伐的加快，國際間的人口流動越大，人們跨國從事經商、開工廠、運輸、旅遊、購物、結婚等活動，其中部分人由於主觀或客觀的原因，觸犯了當地的刑事或民事法律，不得不在他們不熟悉的法律面前接受審判，這一切都使得法庭口譯服務需求急劇增加。法庭口譯人員在雙語庭審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但長期以來，由於翻譯學界以及司法界普遍認為法庭口譯人員應該保持完全中立，進行字對字的翻譯，不應該以任何方式介入整個庭審過程，這種誤解給法庭口譯人員帶來了極大的困擾。

在學者們對法庭口譯所進行的各類研究中，口譯員的角色定位已經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法庭口譯員在翻譯過程中總是面臨著許多的窘境，Fenton (1997, 31-33) 曾指

出，在具體的庭審口譯中，“律師一方面擔心他們採用的法律語言策略沒有被口譯人員傳達，一方面又擔心因為譯者的介入，律師的權威性受到挑戰”。法庭口譯的職業規範條例（Code of Ethics）對口譯員的行為準則做出了具體的規定，認為法庭口譯人員應該做到完全中立，採取不偏不倚的立場（Berk-Seligson 1990；Fenton 1997；Mikkelsen 1998；Hale 2008）。而另一方面，口譯員在適當的時候主動地掌控交際過程，充當了“調解人”（conciliator）的角色（Merlini & Favaron 2013, 212）。作為法庭上唯一具有雙語能力的譯員，被不通曉本國語的訴訟參與人當作救星，期望在法庭上得到更多的協助和諮詢，其角色更為“顯形”。在此情景下，法庭口譯人員“在一定場合會對自己的法律客戶提供諮詢”，“保證客戶獲得相關資訊，並能自主地把控整個交際活動”，“對帶有種族或者文化歧視類的陳述內容或是結論提出質疑”（Roberts 1997, 13）。

近年來，隨著雙語庭審口譯在中國出現頻率的增多，華人學者也對法庭口譯進行了相關研究，包括對各國法庭口譯歷史的梳理，其中吳雅珊（Ng 2018）詳細介紹了香港法庭口譯體系，吳遠寧（2016）介紹了美國法庭口譯的歷史，趙軍峰、陳珊（2008）則將中西法庭口譯進行了比較；也包括對口譯人員角色的探討：梁倩雯（Leung 2015）探討了強姦案中譯者如何處理法律相關的筆譯和口譯，餘蕾（2015）描述了外刑事庭審語境與口譯員角色困境，趙軍峰、張錦（2011）通過將法庭口譯員比作“機構守門員”剖析其角色特徵，朱波、高虹（2015）指出了法庭口譯中的衝突和口譯員的兩難處境。由於法庭口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歸入社區口譯的範疇，因此社區口譯的譯員角色研究也有提及（任文 2010/2011；Jiang 2011；Jiang et al. 2014）。

法庭口譯是一個紛繁複雜的活動，交際各方在交談中受年齡、性別、社會地位等各種因素的影響所享有的說話權利和應盡的說話義務不同。譯員除了具備良好雙語能力、文化知識和相關專業知識之外，還應該具有出色的話語交際能力，瞭解口譯過程中的各種話語連貫策略，在必要的情況下參與交際活動當中，靈活機動地處理口譯中出現的各種交際困難和障礙，有效地促進談話雙方的成功交流。以往學者對譯員行為的討論，以及職業規範中對譯員行為的規定過於籠統和寬泛，在具體庭審中譯員無法判斷是否可以介入庭審內容、以怎樣的方式介入、介入的程度可以多大。有鑑於此，本文將以話語口譯理論模型為基礎，以話語口譯篩檢程式為工具，具體分析香港的雙語庭審過程中口譯員的具體決策行為，以期在方法論上對現有的法庭口譯分析框架進行補充。

二、話語口譯篩檢程式

基於話語分析理論的話語口譯模型（簡稱 TRIM，Triadic Discourse Interpreting Model）（Jiang 2011）包含靜態要素和動態要素。靜態要素包括交際情景（例如庭審的具體時間、地點、法庭特點等）、交際各方的認知知識構成（例如法官的知識構成、律師的知識構成、檢控官的知識構成、證人的知識構成、被告的知識構成等）、交際各方的話題中心、言語資訊的層次、句際中的語義連貫。動態要素指的是普通話語交際的言語行為序列（Tetradic Speech Act），即說話人 A 的言語，說話人 B 的回饋，說話

人 A 對說話人 B 回饋的回應，說話人 B 對說話人 A 回應的接受 (Mudersbach 2008)。

在 TRIM 模型框架下，“話語口譯篩檢程式” (Dis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s) (Jiang 2011) 指的是口譯員利用篩檢程式將源語資訊轉換成目標語資訊的過程。過濾這些資訊的依次是話語目的篩檢程式 (Discourse Purpose Filter)、意義連貫篩檢程式 (Coherence Filter)、話題連貫篩檢程式 (Topic Continuity Filter)、語義素連貫篩檢程式 (Isotopic Continuity Filter)、知識構成篩檢程式 (Knowledge Filter)、利益篩檢程式 (Interest Filter)。

“話語目的篩檢程式”是用來檢驗源語資訊是否與交際話語的目的的一致。該篩檢程式假定所有話語雙方都基於 Grice 的“合作原則” (1975) 進行合作式的交際，而譯員也基於此種合作原則採取適當的調節措施。例如庭審過程中，某一訴訟參與人的話語與整個庭審的目的不一致，口譯人員可能進行資訊的過濾和刪除。“意義連貫篩檢程式”將單個資訊置於上下文情境中，涉及口譯員對資訊的重組 (總結、詳述或簡化) 或完全刪減。為了讓另一交際方完全理解資訊，譯員需要對資訊進行重新構建以及添加附加資訊以澄清源語資訊。“話題連貫篩檢程式”將話語交際中的話題發展作為測定話語是否連貫的指標。話題的連續性通過反復的或衍生的話題發展起來，而隱含的話題連續性通過語境或假設，與接受者建立主位-述位元 (theme-rheme) 推進模式。“語義素連貫篩檢程式”從 Schultz-von-Thun (1981, 27) 的交際理論發展而來。該理論認為，所有的話語資訊都包括四個層面的意義：事實 (factual)、訴求 (appellative)、關係 (relationship) 和自我暗示 (self-indicative)。該篩檢程式是對話題連貫篩檢程式的補充，建立了語義連貫之外的語用連貫。“知識構成篩檢程式”來自認知知識體系的概念 (Mudersbach 1991)，知識體系包括語言知識、文化知識、機構專門知識體系 (例如庭審知識)。“利益篩檢程式”主要是基於 Fairclough (1989, 248) 提出的“語言即權力”的社會語言學概念。在通過該篩檢程式時，口譯員若發現話語雙方利益有權力衝突，需要通過調解的話語來平衡相悖雙方的利益，達到順利交際的目的。

口譯員將源語資訊依次通過以上的篩檢程式後產生不同類型的目標語資訊，目標語資訊根據處理策略的不同可歸納為 (Wadensjö 1998; Rosenberg 2001)：(1) 零目標語資訊 (Zero Target Message)，即完全刪除源語資訊；(2) 部分保留的目標語資訊的第一類 (Partially Invariant Target Message, Type I)，即通過增減話語的方式進行語言重組；(3) 部分保留的目標語資訊第二類 (Partially Invariant Target Message, Type II)，向源語說話人尋求進一步的解釋；(4) 完全改變原意的目標語資訊 (Variant Target Message)，例如通過緩和話語來協調雙方的矛盾和衝突；(5) 逐字直譯的目標語資訊 (Invariant Target Message)。在過濾資訊的過程中，口譯員接收到源語資訊後經過 7 條不同的路徑，產生 5 類目標語資訊，如圖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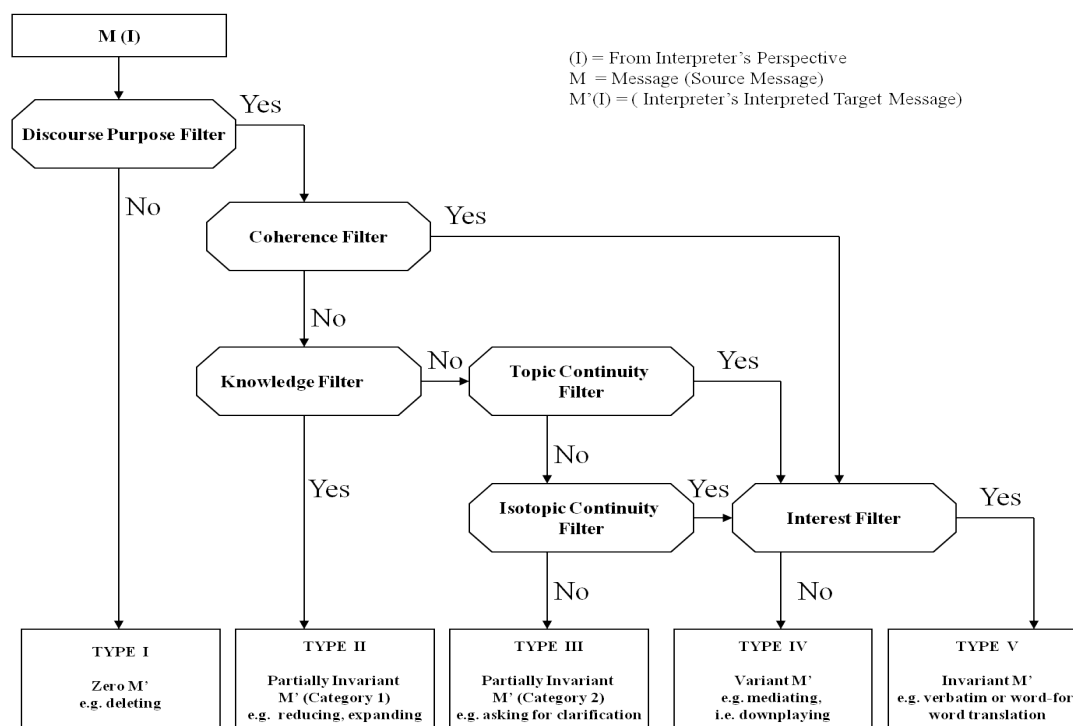


圖 1: 譯員的過濾資訊過程 (Jiang 2011, 131)

三、案例分析

3.1 語料背景

以下分析材料來自香港浸會大學的梁倩雯博士 (Dr. Ester S M Leung) 團隊共同合作的項目 (<http://cpdb-arts.hkbu.edu.hk/>) 中案件 1 的 12 號轉錄文本/錄音。語料為 2005 年秋香港高級法院受理的性侵審訊。在審訊中，被告在法庭譯員的幫助下接受控方律師的盤問，案件 1 的整個訴訟過程包括 18 盤轉錄的錄音帶，其中 6 盤錄音帶是目擊者的錄音，12 盤錄音帶是被告的錄音。在案件 1 中，被告姓名縮寫 **tcs** (曾做過電子銷售的羽毛球教練) 被指控從 1998 年到 1999 年強姦了 3 名少女 (姓名縮寫為 **skk**, **lhy** 和 **lwy**)。目擊者是 13 歲女孩 **lhy**，她曾是被告的羽毛球班的學生。**lmf** 是 **skk** 的前男友。

語料中的源語說話人是講英語的控方律師 (縮寫為 **BPE**) 和講粵語的被告 (縮寫為 **DC**)。譯員的中英文翻譯分別縮寫為 **ICT** 和 **IET**。音訊的轉寫中使用了一些語言學標識：“=” 標識表明話輪的重疊，大寫的字母表明語氣的強調，“:” 分號標識遲疑和短暫的停頓，“{” 大括弧朝內標識語速加快，大括弧朝外 “}” 標識語速減慢，“[]” 中括弧標識非言語資訊，“(2.5)” 小括弧裡面的數位識別碼停頓的秒數。

3.2 語料討論和分析

在所摘錄語料的開頭，辯方律師 (Barrister Defendant English, **BDE**) 首先用英文介紹了 3 名目擊者之間的關係，並簡要概括了強姦案。被告人曾告訴受害人 **skk** 說他

與別人結婚的目的只是為了得到更好的住房。

1: BDE =and then the next question my lord then asked this defendant was did you tell s k k and again his answer was yes then he explained that he told s k k because em he was going to get married with l to get the unit (.) so i suppose i believe as i said and that' s why i have to put forward this stop hand indeed he said he did tell s in because they wanted to get a house no matter it was a sham or whatever they leave it aside

2: [voices overlapped]

3: BPE when did you tell s k k

4: ICT 你系幾時話俾 s k k 聽

5: DC 九七年

6: IET ninety seven

7: BPE a: ninety seven

8: ICT 系九七年啊

9: BPE when she thought she was pregnant

10: ICT 啫系佢: 以為自己有 b b 嘅時候

11: DC 我真系不記得 (.) 系邊一日喇

12: IET i really can' t =remember which day

13: DC = 三年前喇律師先生你系咁質問我 [crying] 我都答你唔到㗎

14: IET mister counsel it' s three years ago i can' t give you an answer even if you continue with this question

15: BPE mister t (.) s k k was questioned for two and a half days to recount her experience three years ago

16: ICT 噏 = 關於

17: BPE = i am asking you about an IMPORTANT TRAUMATIC incident in your supposed relationship with s k k which you said was CARING and responsible now are you seriously saying that you can't remember when was you TOLD her (.) this girl who loved you and who you loved and you can't REMEMBER when it was that you told her you were going to marry someone else (.) is THAT what you' re saying

18: ICT 噏就三年前嘅事呢 s k k 呢都被盤問咗呢兩日半嘅咁而家問你嘅呢系一件呢系重大嘅事情嚟嘅因為呢系發生響: 你啦同埋呢一個根據你所講啦系咁關心你啦同埋呢系 a: 你想向佢負責任同埋呢你系咁愛佢同埋 } 佢咁愛你嘅 (.) 女童嘅身上 { □ 你真系不記得你系幾時話俾佢知你打算同另外一個女人結婚呀 }

19: DC 我同佢講我同你講我而家 (.) 嘅腦海裡便我記得喺九七年嘅事 (.) 我同佢講 (.) 我話 (.) 我會同 l 去有一間臨屋因為要需要而家要結婚因為如果純啫系啲啲證明唔夠所以我而家會同佢結婚希望將來會換啲大啲嘅屋

- 20: IET as far as i can remember now in nineteen ninety seven i told s k k that i would be marrying l to acquire a housing unit because there was not sufficient proof to get that at that time and i told her that in the future a bigger unit could be obtained after the marriage
- 21: BPE and what did she say
- 22: ICT 咁 s k k 聽到之後跟住點啊
- 23: DC 都有反應
- 24: IET There was no response
- 25: (38.0)
- 26: BPE during the day you gave evidence about this em what you said about er s k k playing trick on l m f do you remember that
- 27: ICT 嗱你俾證供嘅時候呢提曾經呢系提過呢關於 s k k 呢系整蠱 l m f 嘅事系咪?
- 28: DC 系
- 29: IET yes
- 30: BPE telling she liked him and then telling she didn' t like him
- 31: ICT 啫系話呢最初呢就話俾: l m f 聽呢佢鐘意佢後來又話俾佢知佢唔鐘意佢系咪? =
- 32: DC = 系
- 33: IET yes
- 34: BPE that sort of (.) silly little trick that is of an immature girl isn' t it
- 35: ICT 咁呢一類呢系一啲好唔成熟嘅女仔玩嘅啲好傻嘅玩意嚟 □ 系咪?
- 36: DC 我唔知系咪
- 37: IET i don' t know if that' s true or not
- 38: BPE that' s pathetic isn' t it?
- 39: ICT 咁系啲好:: em:: (1.0) 好傻嘅嘢嚟 □(1.0) 系好 (.) 咁樣做呢系好系好可憐嘅嘢嚟 □
- 40: DC 大人有時都會 =
- 41: IET =some (.) sometimes adult would do that

在挑選的 41 個話輪的香港雙語庭審語料中，法庭口譯員有 19 個話輪。通過分析發現，除了完全對等的語言資訊通過逐字翻譯成目標語資訊的 8 個話輪，還包括完全刪除源語資訊的過濾行為（僅為話輪 18 的一部分），部分保留源語資訊的第一種類型，即刪減和增加資訊的過濾行為（6 個話輪），以及完全改變源語資訊的協調型過濾行為（4 個話輪），如表 1 所示：

表 1: 語料中法庭口譯員資訊的類型

	類別 I 零目標語資訊	類別 II 部分保留的目標語資訊第一種類別	類別 III 部分保留的目標語資訊第二種類別	類別 IV 完全改變源語資訊目標語資訊	類別 V 逐字直譯的目標語資訊
話輪數目	0	6	0	4	8
占比	0	33.33%	0	22.22%	44.44%
具體話輪	話輪 18 第 4 部分	話輪 10, 話輪 14, 話輪 20, 話輪 22, 話輪 31, 話輪 37		話輪 18, 話輪 27, 話輪 35, 話輪 39	話輪 4, 話輪 6, 話輪 8, 話輪 24, 話輪 27, 話輪 29, 話輪 33, 話輪 41

從表 1 可以看出，逐字翻譯源語資訊的行為占翻譯資訊大部分（占比 44.44%），主要是因為現場很多資訊只需要證人或者被告回答“是”或“不是”，同時也因為法庭口譯在規範上對譯員有嚴格的職業要求。表 1 顯示，除了逐字翻譯，由於檢控官和被告在語言和文化的差別，法庭口譯員需要通過增補、刪減詞語或者調整語序來幫助雙方進行有效溝通交流，因此部分保留源語資訊的第一種類型佔有較高的比例（占比 33.33%）。分析中也發現，儘管專業的法庭口譯員一般情況下會保持中立，不以任何形式介入庭審，但在實際口譯活動中，為了協助雙語庭審的順利進行，會或多或少地介入庭審（占比 22.22%），同時緩和了律師和檢控官提問的語氣。以下部分將就類別 I、類別 II 和類別 IV 的目標語資訊過濾過程進行具體分析。

3.2.1 完全刪除

根據話語過濾的路徑來看，只有完全不符合話語目的的話語才會被譯員完全刪除，這種情況一般比較少見。完全刪除的現象在以上選段中僅存在於話輪 18 的最後部分，譯員刪除了檢控官“is THAT what you’re saying”，可能是譯員認為，這部分內容跟前面所陳述的部分重合，重複翻譯同樣的內容會令庭審延緩，而刪除該部分並不對整個交流產生影響。過濾過程如下：源語資訊經過“話語目的篩檢程式”，譯員發現源語資訊“is THAT what you’re saying”不符合話語目的，此處回答為否，因此產出了類型 1 的零目標語資訊，即完全刪除源語資訊。

3.2.2 語言重組

中西語言和文化上存在區別，同時法律專業語言也對譯員的語言處理技巧提出了相應的要求，因此譯員通過增減等方式進行了語言重組。

在話輪 10 中，譯員將源語資訊中的“pregnant”調整為了“有 b b”，語體上更加口語化，可能是譯員希望在翻譯時將“懷孕”一詞明晰化，方便被告如實回答。過濾

過程如下：源語資訊經過“話語目的篩檢程式”，譯員發現源語資訊符合話語目的，此處回答為是；於是繼續經過“意義連貫篩檢程式”，譯員發現如果逐字翻譯可能出現意義理解上的偏差，此處回答為否；於是繼續經過“知識構成篩檢程式”，發現英語源語中“pregnant”如果直譯，可能會讓被告有機會以在懷孕初期自己不知情來辯解，從而影響證詞的信度。

在話輪 14 中，譯員將“mister counsel”放到了“it’s three years ago”之前，進行了句式的調整，同時加上了 if 引導的條件狀語從句，將被告的立場表達得更加清楚，即如果檢控官繼續追問這個三年前的事情，被告將無可奉告。過濾過程中經過“知識構成篩檢程式”時譯員發現中文源語中的“你系咁質問我”加上被告當庭痛哭的體態語，需要增添資訊才能表達被告對這個問題的強烈抗拒情緒。

在話輪 20 中，譯員刪除了中文源語資訊中的“我同佢講”和“我同你講”等插入語，刪除無關資訊以精簡資訊，有利於庭審更加高效地進行。譯員將源語中另一個“我同佢講”中的第三人稱明晰化，用被害人 skk 的名字來替代，使得人稱指代更加清楚。譯員在英語目標語資訊中加入了“to get that”，將被告以獲得大房子為目的的結婚進行了中立化的處理，避免因為被告的回答不當而成為控方的把柄。過濾過程中經過“知識構成篩檢程式”時譯員發現中文源語中的插入語對於整個資訊沒有太大影響，從而刪除，同時為了讓人稱代詞的指代更加明晰，譯員將其所指具體翻譯出來。為了避免因為因果關係處理不當而造成的理解偏差，譯員也通過加入表目的的不定式來處理資訊。

在話輪 22 中，譯員將英語源語中的人稱代詞“she”明晰化，翻譯時用具體的人名 skk 代替，同時加上了時間狀語“聽到之後”讓提問更有針對性，更能獲得需要的資訊。過濾過程中經過“知識構成篩檢程式”時譯員發現必須將代詞指代明晰化，添補適當的時間狀語，才能讓被告更具體地回答問題。

在話輪 31 中，譯員使用了介紹性的開頭“啫系話呢”，增加了時間狀語“最初呢”，並將原文中的“him”替換為了男孩的具體名字 lmf，加入了反問的語氣“系咪”，將檢控官的責問語氣通過翻譯表達出來。過濾過程中經過“知識構成篩檢程式”時譯員發現必須將代詞指代明晰化，添補適當的時間狀語，同時加上反問語氣，才能更好地表達檢控官的資訊中隱含的意義。

3.2.3 斡旋協調

在話輪 18 中，英文源語中檢控官窮追不捨地追問，質問被告和當時要結婚的之間發生的事情竟然會忘記，用“i am asking you about an IMPORTANT TRAUMATIC incident in your supposed relationship with s k k which you said was CARING and responsible now are you seriously saying that you can’ t remember when was you TOLD her (.) this girl who loved you and who you loved and you can’ t REMEMBER when it was that you told her you were going to marry someone else (.)”檢控官兩次用到“can’t remember”來質疑被告證詞的可信度。譯員在處理這種質問語氣的時候，並沒有將檢控官的質疑翻譯出來，而是將語氣進行了緩和，可能是譯員認為，檢控官咄咄逼人的質問方式會讓被告產生反感甚至不合作，這樣無法進行有效地庭審和獲得需要的資訊。話輪 27 中，英

文源語檢控官再次提到“do you remember that”，通過問話技巧再次質疑被告證詞的可信度，譯員此時仍然沒有將檢控官的強烈語氣譯出，而是進行了緩和協調。過濾過程經過“利益篩檢程式”時譯員發現必須調整源語中強烈的質問語氣，才能更好地獲取證詞，於是譯員通過緩和協調的方式處理了源語資訊。

話輪 35 中，譯員在“immature”和“silly”前面加入了兩個“好”作為強調，通過這種方式將檢控官強烈的質問語氣表達了出來。話輪 39 中，譯員在“pathetic”前面加入了多個“好”來加以強調，以同樣地方式將檢控官的質問語氣表達出來。過濾過程經過“利益篩檢程式”時譯員發現必須將源語中強烈的質問語氣更加強烈地表達出來，才能讓證人的可信度得到質疑，於是譯員協調的時候加強了語氣。

以上通過對譯員過濾行為的具體描述和分析得出，法庭口譯員在真實的雙語庭審中，除了進行逐字的翻譯，還會根據兩種語言進行資訊的重組，甚至可能站在一方的立場調和法庭中出現的衝突和矛盾。由此可見，法庭口譯員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完全中立，而是在不同的情境中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或多或少地介入整個法庭口譯過程中。

四、結語

为了更好地處理法庭口譯員“中立”和“調解人”的角色困境，本文在話語口譯模型的框架下利用“話語口譯篩檢程式”分析了譯員各類決策背後的原因，讓譯員的行為在法庭口譯實踐中有理可循。從方法論上講，將“口譯篩檢程式”概念引入法庭口譯研究，可以對譯員話語的數量和特徵進行深度研究，也可以通過實證研究探究不同譯員話語類型出現的頻次，從而有助於瞭解語言的特殊性、交際中的誤解和文化差異等問題。在具體的法庭口譯實踐中，庭審之前可以基於話語口譯模型中的要素制定一份詳單，提前跟交際各方進行協商，以便他們更好地理解法庭口譯員在庭審中會通過增添、解釋和弱化話語等一系列行為來協調整個法庭口譯過程，從而有助於庭審更加順利地進行。在法庭口譯的教學時，課堂模擬實踐中可以採用話語口譯模型中涉及的要素及過濾過程來訓練學生的雙語知識、法律專業知識和文化知識，同時讓學生瞭解在法庭口譯的不同階段如何利用“口譯篩檢程式”來進行更好的決策和採取更有效的策略。

基金資助

本文得到湖南省學位與研究生教育教學改革課題（項目編號：JG2017B037）和湖南師範大學學位與研究生教育教學改革課題（項目編號：17JG11）的支持。

致謝

本文的語料得到了梁倩雯博士（Dr. Ester S M Leung）的授權使用和相關支持，再次特別致謝。

参考文献

- Berk-Seligson, Susan. 1990. *The Bilingual Courtroom. Court Interpreters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Fairclough, Norman. 1989.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 Fenton, Sabine. 1997. "The Role of the Interpreter in the Adversarial Courtroom" . In *The Critical Link: Interpreters in the Community*, ed. by S.E. Carr et al., 29-34.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Grice, Herbert P.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 In *Syntax and Semantics: Speech Acts*, Vol. 3, ed. by Peter Cole, 41-5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ale, Sandra. 2008. "Controversies Over the Role of Court Interpreter" . In *Crossing Borders in Court Interpreting: Definitions and Dilemmas*, ed. by C. Valero-Garcés & A. Martin, 99-121.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Jiang, Lihua. 2011. *How Far Can a Community Interpreter Go? Dis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s*. Hamburg: Verlag Dr. Kovač.
- Jiang, Lihua et al. 2014. "The Sociological Turn in the Interpreter's role: Dis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s" .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9(2):274-298.
- Leung, Ester S. M. 2015. "What Can a Bilingual Corpus Tell Us about th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Rape Tri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emiotics of Law* (3): 469-483.
- Merlini, Raffaella & Roberta Favaron. 2013. "Community Interpreting: Re-Conciliation through Power Management" . *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 (12): 205-229.
- Mikkelsen, Holly. 1998 "“Towards a Redefinition of the Role of the Court Interpreter.” *Interpreting* (1): 21-45.
- Mikkelsen, Holly. 2000. *Introduction to Court Interpreting*. Manchester & North Hampton: St. Jerome.
- Mudersbach, Klaus.1991. "Erschließung historischer Texte mit Hilfe linguistischer Methoden" In Reihe historisch-sozial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en des Zentrums für historische Sozialforschung,318-362. St. Katharinen: Script Mercaturae.
- Ng, Eva N. S. 2018. *Common Law in An Uncommon Courtroom: Judicial Interpreting in Hong Kong*.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Roberts, Roda. P. 1997. "Community Interpreting Today and Tomorrow". In *The Critical Link: Interpreters in the Community*, ed. by Silvana E. Carr et al.,7-25.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Rosenberg, Brett Allen. 2001. *Describing the Nature of Interpreter-Mediated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 Quantitative Discourse Analysis of Community Interpreting*.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 Schulz von Thun, F. 1981. *Miteinander reden 1 – Störungen und Klärungen*.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Taschenbuch-Verlag.

Wadensjö, Cecilia. 1998. *Interpreting as Interaction*. New York: Longman.

蔣婷、李美奇、楊郁梅（2016），“仲裁庭審中仲裁員的打斷策略與權力研究”，*外語教學* 2：24-28。

任文（2010），《聯絡口譯過程中譯員的主體性意識研究》。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任文（2011），“試論口譯過程中譯員的“中立性”問題”，*中國翻譯* 6：36-41。

吳遠寧（2016），“美國法庭口譯員角色之困境”，*中國翻譯* 2：60-65。

餘蕾（2015），“外刑事庭審語境與口譯員角色困境”，*浙江外國語學院學報* 2：1-9。

趙軍峰、陳珊（2008），“中西法庭口譯研究回顧與展望”，*中國科技翻譯* 3: 19-22。

趙軍峰、張錦（2011），“作為機構守門人的法庭口譯員角色研究”，*中國翻譯* 1: 24-28。

朱波、高虹（2015），“法庭口譯中的角色衝突—以 Camayd-Freixas “聲明”為例”，*外語與外語教學* 5: 75-79。

近年国际“贝学”研究与译介发展态势

——与洛伊丝·欧维贝克的对话

曹波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本文是曹波教授访学美国埃默里大学期间与该校研究生院教授、著名贝克特研究专家洛伊丝·欧维贝克的学术对话。两人首先论及当下贝学(萨缪尔·贝克特研究)的趋势,尤其是欧美的三种态势:从不同视角对贝克特出版作品的研究推陈出新;对贝克特戏剧艺术(导演、革新及域外变异)的整理研究持续不断;手稿、笔记、档案等原典的整理成果趋向电子化。对于新世纪工具书,两人从领域互补的角度评介了四种《盛名之累》《格罗夫指南》《诗集》和《书信集》。谈及贝克特全球译介的新动向时,曹波评述了汉译的历程,重点论及“副文本”的学术史价值和“间接介入”对“学术型”文本翻译的意义。这场对话对中国贝学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也向西方学界展现了汉译的成就。

关键词: 萨缪尔·贝克特; 研究态势; 工具书; 汉译; 副文本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21)04-0114-08

曹波(以下简称“曹”): 作为埃默里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的前辈,您一定知道在 20 世纪爱尔兰文学史上,“有三位作家彻底改变了文学的面貌”。

欧维贝克(以下简称“欧”): 那当然,是威廉·叶芝(William B. Yeats)、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和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他们都是西方现代文学的偶像,相关研究和节庆已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产业,是爱尔兰向外推广其“文学大国”形象的重要抓手。

曹: 其中,贝克特走的是“去爱尔兰”的极简主义道路。他的驳杂、深邃在欧美现代派文学史上少有匹敌,相关研究和演出活动可能赶超“让学者忙上 300 年的乔学产业”,这大概就是您所说的“贝克特是一所(念不完的)大学”的意思吧。

欧: 是的。在西方,贝克特研究早已成为显学:国际萨缪尔·贝克特学会已有欧美会员 3600 多人,雷丁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爱丁堡大学和安特卫普大学的顶级专家依次主编了《贝克特研究杂志》,雷丁大学设立了贝克特国际基金会,埃默里大学和巴黎美利坚大学合作成立了贝克特书信研究中心,等等。相信在日益自信的中国,贝学也取得了长足发展。

曹: 没错。自 20 世纪末孟京辉排演《等待戈多》、陆建德发表雄文《自由虚空的心灵》、李维屏就《克拉普的最后一盘录音带》等戏剧开展教学以来,相关研究者、翻译者、教学者、戏剧实验者及一般爱好者的队伍也迅速壮大,掀起了学术的热潮。

欧: 你们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了吗?

曹: 还没有,但这并不表明中国的贝学就乏善可陈。传入文化与域外文化发生碰撞时,会产生扭曲和新的特征,因此中国的贝学不是欧美贝学的复制或缩小,而是延展和变异。二者具有纵向比较的价值,却不是

收稿日期: 2021-04-10

作者简介: 曹波,男,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和爱尔兰文学研究。

恰当的横向对比项。

欧: 这很自然。我是出于好奇。

曹: 而我好奇的是,21 世纪以来欧美贝学呈现了怎样的态势呢?

欧: 这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个人认为有三个方面: 一是从哲学、文艺学、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等视角对纸质作品展开的专题研究依然兴盛,而且随着新史料的发掘,这类研究还可带来许多新意,因此这一方面事实上非常复杂;二是 1976 年创办的《贝克特研究杂志》所刊文章兴许就是重要的风向标;最后,欧美国家的学术出版社每年都有许多这类专论出版。

曹: 那您能就最新专论说得具体些吗?

欧: 按论题分类吧。有一组“后人类”专论令人瞩目,比如在《贝克特的晚期戏剧: 创伤、语言与主体性》(2018) 中,特兰特尔(Rhys Tranter)阐释了贝克特在晚期戏剧中描绘的后人类图景;在《贝克特短篇散文中的后人类空间》(2019) 中,博尔特(Jonathan Boulter)则挖掘了贝克特碎片式文本中的精神困境;而在《贝克特与主体性的语言》(2018) 中,图布里迪(Derval Tubridy)更“为从后人类视角对贝克特的跨文类创作做出新的阐释奠定了基础”。这些专论大致是从解构主义视角出发的,内容上互补,在“贝学”历史上首次清晰地展现了贝克特作为预言家的形象。

曹: 按您的思路,也有一组“互文性”专论不可小觑,比如在《贝克特中的音乐与音乐中的贝克特》(2013) 中,罗斯(Catherine Laws)就探讨了贝克特对欧洲古典音乐的吸收及其创作对欧洲当代音乐的影响;在《贝克特与影院》(2017) 中,帕拉斯基瓦(Anthony Paraskeva)梳理了贝克特与影院交往的过程及影院对其舞台剧、荧屏剧创作的影响;而在《贝克特与视觉艺术》(2018) 中,卡维尔(Conor Carville)则厘清了贝克特与(晚期)现代主义和“先锋派”视觉艺术的历史关系。如同《贝克特笔下的但丁: 小说与批评中的互文性》(2005) 那样,先前的此类专论多属同一文类,而这组专论是跨文类的,展示了新的动向。

欧: 没错。那么第三组就是“政治性”专论,例如在《萨缪尔·贝克特与后殖民小说》(2009) 中,比克斯比(Patrick Bixby)运用新历史主义方法分析了贝克特小说与爱尔兰历史、政治、后殖民思潮的隐秘联系,令人耳目一新;在《贝克特的政治想象》(2017) 中,莫林(Emilie Morin)从社会历史学角度“阐释了贝克特的双语文本如何重新想象政治史”,其学识令人惊讶;而在《贝克特与余波政治学》(2018) 中,马克诺顿(James McNaughton)则阐释了贝克特的创作如何对爱尔兰内战、欧洲的分化、法西斯的崛起和二战恶行等做出回应,再次展现了贝克特的政治意识。

曹: 这组专论体现了全新的趋向: 前者颠覆了贝克特“倾心无知、无能”因而“不涉历史”“无关政治”的传统观点,中者将对贝克特与政治史关系的研究从爱尔兰拓展到了欧陆,而后者则发掘了贝克特对战后欧洲政治意识的独特呈现。三部专论打开了从后殖民或政治学角度解读贝克特的大门,为新领域的开拓做出了“无价的贡献”。

欧: 此言不假。另有两组专论略显传统,但不乏新意和深度。在“爱尔兰性”专论中,莫林(Emilie Morin)所著《贝克特与爱尔兰性问题》(2009) 和肯尼迪(Seán Kennedy)主编《贝克特与爱尔兰》(2010) 最具代表性。而在“艺术性”专论中,杜尔法德(Lance Duerfahrd)的《贫乏的创作: 贝克特的流浪汉与危机剧场》(2013) 和安德顿(Joseph Anderton)的《贝克特的造物: 种族大屠杀之后的失败艺术》(2016),则与你的大作《贝克特“失败”小说研究》(2015) 在思路有些相似。

曹: 这五组专论推陈出新,可以说代表了近 10 年欧美贝学在纸质作品研究领域的成果和动向。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欧: 鉴于贝克特与先锋派戏剧及艺术的密切联系, 欧美尚有许多导演、表演艺术家、电台和电视艺术家从事贝克特戏剧艺术、导演艺术、新媒体艺术的整理和研究, 出版了很多具有独特史料价值的纸质版著作, 也发行了不少相关影视作品和纪录片。要知道, 贝克特曾在不同时期在法国、德国、英国等地的许多剧场指导排练自己的舞台剧、电台剧甚至电视剧; 由于新技术的采用和新灵感的产生, 即使剧本无一字改动, 他的导演台本总会新增许多微妙的订正。不同时期、不同剧场的同类台本的解读与对比研读是一个弥久而新的研究领域; 若是将世界各国自行排演贝克特戏剧的台本——比如爱尔兰阿比剧院和大门剧院完整保存的本院历年导演台本——以及主演的相关回忆录联系起来, 那么这一方面会足以同对贝克特纸质作品的阐释比肩。

曹: 以非纸质作品即戏剧艺术的研究为焦点, 在中国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您能举例说明吗?

欧: 以英美为例吧。拜恩奇尼(Natka Bianchini) 所著《贝克特戏剧在美国》(2015) 就对阿兰·施耐德(Allan Schneider) 任美国版贝克特戏剧导演的遗产进行了条分缕析, 而塔克(David Tucker) 和马克提格(Trish McTighe) 所著《在大不列颠排演贝克特戏剧》及姊妹篇《在爱尔兰和北爱尔兰排演贝克特戏剧》(2016) 细致梳理各个时期贝克特戏剧在英、爱两国编排的过程、原则和特点。这类成果是贝克特戏剧接受史的活教材, 值得细致分类和系统整理。不过, 欧美艺术界十分尊重版权, 因此这类台本及其研读尚未全部出版, 更未联通上网。但随着时间流逝, 这一态势的持续发展是可以预见的。

曹: 这一方面中国文艺界可以做出少许贡献, 例如世纪之交北京、香港排演的三个半《等待戈多》, 新世纪初台湾传奇剧场排演的京剧版《等待果陀》, 近年北京多个剧场在爱尔兰导演简·斯盖夫(Sarah Jane-Scaife) 的指导下排练的《所有跌倒的》和《来来往往》等短剧。据我观察, 第三个方面估计是手稿、笔记、日记和档案的整理研究吧?

欧: 是的。在20世纪末, 英国、爱尔兰的专家就开始对贝克特创作笔记进行比照研究, 解开了贝克特创作尤其是早期小说创作中的许多谜团。近年, 经贝克特遗产理事会惠允, 安特卫普大学手稿遗传学中心与雷丁大学贝克特国际基金会、得克萨斯大学兰瑟姆人文学科研究中心紧密合作, 联系法国国家档案馆等10余家相关机构, 完成了贝克特数字化手稿项目(BDMP), 推出了有关小说三部曲、戏剧三部曲等作品的创作过程的系列著作(2015), 建成了涵盖读书笔记、草稿、初稿、打印稿、校订稿等在内的贝克特手稿数据库, 从而大大推进了原典和版本流变等专题研究。2018年12月, 该项目成果的上线还获得了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 颁发的文献、档案与数字化项目出版奖。

曹: 这一方面应包括您刚完成的贝克特书信收藏信息线上项目(LROP)。该项目将美国境内26家文学档案馆所藏贝克特书信的信息联通上网, 方便世界各地“贝学”中人直接查询。

欧: 只是与欧洲众多收藏馆或所有者的版权谈判过于繁杂, 我们对欧洲境内那14000多封书信相关信息的整理才刚刚开始, 因此得过两年才能建成完整的贝克特书信线上图书馆。在回归原典这一方面, 《贝克特的藏书》(2013) 也具有典型性: 该书分析了巴黎所存贝克特700卷藏书中的笔记、誊抄和旁注, 探究了他将所读材料融入、译入、移入自己作品的方式, 从而填补了对其创作过程研究的很大一部分空白。此外, 《贝克特的德国日记: 1936—1937》(2011) 经整理, 也列入“现代主义的历史语境”丛书出版了, 这样“贝迷”们就可以直接进入贝克特漫游德国期间那纷繁的艺术世界和躁动的精神世界了。

曹: 这类创作前的研究可与稍前对作品原稿、创作笔记等创作中的研究相互佐证, 更可与第一、第二方面涉及的创作后和创作中研究构成完整的体系。看来, 每一方面都很兴盛, 也都还有很大空间。这正印证了您的没有贝克特之后一说的含义。那么, 作为贝学资深学者, 您认为在世纪之交以来产生的卷帙浩繁的

成果中,有哪些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呢?

欧:我倒愿意说具有工具性价值的。无论如何深奥或新颖,专论都以工具书为依托。况且贝克特的作品如此艰深、复杂,就许多话题、从许多角度都可做出精辟、创新的论述,而这样的成果往往难分伯仲。因此,轻易不要用具有“终结”或“俯视”意味的词来形容相关著述。

曹:我以为,您对话题的修订反映了中美学术界价值追求的些许差异。我们过于看重专论及其级别,而你们推崇的既有深度研究,也有工具性成果的开发。那么,就贝学研究而言,近年有哪些工具书是不可或缺的呢?

欧:如果不算厚此薄彼的话,主要有诺尔森(James Knowlson)撰写的《盛名之累:萨缪尔·贝克特传》(1996)、阿克利(C. J. Ackerley)和贡塔尔斯基(Stanley Gontarski)编著的《费伯版萨缪尔·贝克特指南》(2006)、洛拉(Seán Lawlor)和皮林(John Pilling)编著的《萨缪尔·贝克特诗集》(2012)以及菲森菲尔德(Martha Fehsenfeld)和我主编的《萨缪尔·贝克特书信集》(2009—2016)。

曹:据我个人的研读经历,《盛名之累》也是理当首选的。这部经贝克特授权撰写的传记将海量的信息融入线索连贯、引人入胜的叙事中,是一部学术严谨、记录翔实得令人敬畏的著作,纠正了有关贝克特生平 and 创作的许多误会、误解和误读,因而是贝学必读书目。那么,《费伯版指南》何以入选呢?

欧:该《指南》按词条首字母的顺序排列,是对贝克特作品、生平及思想最全面的导读,为所有研读贝克特作品的人提供了细致的参考。其中许多复杂的词条几乎就是专论写作提纲,例如“艺术”一项就把贝克特所有作品、日记和书信中的相关内容做了清晰的梳理和精炼的评述,“身体”一项把贝克特所读文献中的相关论述、作品中的有关变形做了系统整理和简要解说,而“算术”一项则把贝克特所有作品中的算术谜团及与非理性主义和符号学的关联作了厘清和必要的阐释。可以说,该书是一部基于精细考证、利于文本细读和论文撰写的导读全书。

曹:对贝克特小说中的谜团(比如“伶伦制律”的典故)不得其解时,我确实从《指南》中寻到了有益的观点和思路。假如《盛名之累》偏重对贝克特生平及其与创作的关系的历时梳理,那么《指南》则侧重对贝克特作品中的疑难之处进行分类耙梳,二者互补。至于《诗集》,其“工具性价值”何在呢?

欧:《诗集》不仅按时序收集了贝克特创作和翻译的所有诗歌(其中许多是未曾发表或从未重印过的),而且补充了各类注释(约占全书的五分之二),以展现这些诗歌的各个侧面,如创作语境、修改过程、隐晦典故或引文的来龙去脉、在其他作品中的改写或回响等,使读者得以追溯嵌入贝克特想象力 DNA 中的那些模式。这也是一个学术型版本,凭此读者可以鸟瞰贝克特如何在自己的“词语工棚”里造出有意义的模式,并发掘其诗歌与小说及戏剧未曾有人探讨过的互文关系。

曹:由此可以推断您挑选《诗集》作为第三种工具书的依据了,那就是填补诗歌(非主要作品)整理和导读的空白。而《书信集》入选的依据,则必定是填补私人书信(非出版作品)整理和导读的空白。这算是知其所以然了吗?

欧:是的。贝克特生前见诸报刊的书信寥寥可数,而贝克特通信项目团队从散落于欧美各国的档案馆、图书馆、手稿室、研究中心和上百名收信人及后裔手中收集了已知信件 16000 多封,并选取与创作有关的全文约 2500 封,另摘录约 5000 封,才编成这四卷大部头。从那长达 15 页的致谢和授权名单,你就可以想见在长达 30 年的编撰过程中,填补空白的付出有多大。

曹: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其学术价值您能列举一下吗?

欧:首先,贝克特在创作中奉行极简主义,而且从不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因此只有在他的私人通信中,即

《书信集》的正文文本中,我们才能发现作品背后的动因,揭开人物面具看到作者本真。

曹:没错,作品是反复打磨而成的——贝克特的《创作笔记》和同一作品的多部手稿之间的差异就是力证,而相关书信则是即席写就的,最真实地反映了贝克特当时的心态、动机和言语习性。

欧:就是说,读他的作品是进入虚构世界,读他的书信则是进入真实世界,二者需要联通。而且,贝克特与欧美众多先锋派作家、导演、艺术家和出版商都通信频繁,因此对于任何对20世纪西欧文学和戏剧饶有兴趣的人来说,这套集子都是基本读物。

曹:事实上,这些书信本身的价值已为中美学者共知了。2019年5月,贵国《现代文学杂志》主编瑞贝蒂(Jean-Michel Rabaté)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刊发的《贝克特与精神分析》一文,就是通过回顾贝克特的书信来探讨精神分析与其创作的复杂关系。

欧:该文实现了两个世界的“联通”。第二,世界大多数文豪的书信集仅是书信本身按时序编排的集子,基本没有对书写特征、背景信息和具体内容的详细注释,甚至缺乏导读和序言,因而算不上学术型。相比之下,这套《书信集》的另一种学术价值就凸显了出来。作为卷一的汉译者,你应该了如指掌吧?

曹:是的。《书信集》的副文本是细致记录、严谨考证、精心整理、系统评述的结果:保留了书写特征,编入了信件状态,尤其对信件本身的内容进行了注解,而且收入了编辑体例、全集总论、各卷绪论、译者序等。可以说,这些齐备的副文本才是《书信集》作为学术型总集的价值所在,与正文文本相得益彰。说到这里,我又很好奇,是怎样的编辑原则使得这些副文本的主体(即对信件的注释)与中国古文献学中的考据和注疏如此相似呢?

欧:是吗?这是作者意图与编辑原则协调的结果。在授权编写《书信集》时,贝克特就交代,仅涉创作,切勿评论。一方面,贝克特及相关通信人的隐私必须得到尊重——在他看来,盛名即是受累;另一方面,贝克特愈少即是愈多的意志不可改变——添加评论即是误导读者。但玛莎和我认为,须有语境才能解读,对此贝克特欣然接受。于是,我们确定的编辑原则就是极简主义原则:凡涉及创作的信件才得入选;凡对理解信件必不可少的才予以注释。因此,《书信集》就有正文文本和副文本之分,而副文本则有注疏性(信件注释)和评论性(各类绪论)之别。

曹:所以其学术价值也得分两方面来说。在我看来,切勿评论的要求是《书信集》无限接近原典的保障,而须有语境的坚守则是读者不断走向原典的保障。这大概就是推动《书信集》成为工具性成果的动因吧。

欧:没错。换言之,这一动因就是回到原典的信念。我们编撰的不只是一套自身即为终结的书,而是可以据此写成许多专论的众论之书。

曹:在上述工具性成果中,《盛名之累》已由商务印书馆委托王雅华领衔汉译,而四卷《书信集》正分别由我、张和龙、张亚东、龚蓉主持汉译,不久就可以完成半个世纪以来贝克特汉译的大业了。

欧:十分期待!记得2019年5月9至11日,国际萨缪尔·贝克特学会以萨缪尔·贝克特与翻译为主题,在西班牙的阿尔梅里亚(Almeria)大学举办了第五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议题既包括贝克特个人及与他人合作进行的翻译活动,也覆盖贝克特作品的外译。这次会议有一个亮点,就是有中国译者参加了会议,使汉译首次成为贝克特外译中不可忽视的新议题。

曹:就个人而言,这似乎标志着中国学者在“贝学”领域不再是西方亦步亦趋的跟随者,而是创造了贝克特域外生命的平等对话者。

欧:言之有理。其汉译是欧洲以外的首次大规模译介。鉴于贝克特作品的繁杂与艰涩,汉译必定经历了漫长的努力。请问,这一成就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呢?

曹:这一成就要归功于湖南文艺出版社团结一批研究型译者,于2016年推出22卷本《贝克特全集》。该社从欧美各国出版方购买了贝克特所有原作的版权,因此该集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第一套《贝克特全集》。在贝克特进入中国图书市场的过程中,这其实是四大步中的第三步。

欧:哦,愿闻其详。

曹:第一步是1965年施咸荣汉译的《等待戈多》以黄皮本即内参的形式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刊行,使中国大陆的分子和追求新知的文艺青年得以接触那部划时代的作品。但此后30年,即使诺贝尔奖效应逐步显现,也只有两部戏剧《快乐的日子》《终局》和三个短篇小说得到汉译,列入《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或《当代外国文学》等丛书。

欧:起步缓慢。

曹:这一生发期的译介有个更显著的特点,就是受冷战的影响,翻译的目的是让读者看看西方社会有多么荒诞,看看荒诞派戏剧是如何反映这一现实的。这一点在相关评论中得到了充分反映:莫不冠以荒诞、堕落之名,将存在主义哲学和先锋派戏剧意义上的荒诞挪移到政治学、社会学领域,从而为己方效力。

欧:这是东西方对峙时代的烙印吧,也可以叫作历史性误读,其背后是简单的模仿论和工具论。即便如此,相关译介30年止步不前,还是令人感到意外。如此算来,第二步应该是在世纪之交吧?

曹:更准确地说是在21世纪之初。余中先领衔的团队翻译了巴黎子夜出版社的集子,于2006年推出五卷本《贝克特选集》,为贝克特的中国化做出了突出贡献。有趣的是,原作用法语写成,而这个项目也得到法国文化部支持,这两点让大多数中国读者以为久居巴黎的贝克特是法国作家。为此,在贝克特百年诞辰全球庆典期间,爱尔兰外交部门不得不出面,以贝克特一直持爱尔兰护照为由进行澄清。

欧:若贝克特久居伦敦,那他的民族归属就具有更大的去殖民价值。如你撰文所言,有关爱尔兰裔作家国别归属的争议,其背后是文化上的去殖民努力与殖民主义残余之间的较量。话归正题,这一兴起期的译介有何区别性特征呢?

曹:有两点。其一,余中先团队译出了贝克特近一半的作品,功莫大焉,但事先和事后均很少就相关译介发表评述,因而在学术界没有出现该有的回响,这一点事实上约束了译介活动产生的后续影响。其二,该《选集》沿用了原版切勿评论的风格,即译本中没有插入任何绪论、注释、前言或后记,因此本就不多的读者没有副文本可资借鉴,更难以就原作主题、写作特色、翻译过程等话题进行探讨。

欧:于是,在《贝克特在全球的接受》(2006)一书的第八章《在中国的接受》中,该《选集》就成了仅为百年诞辰生产且只供顾客消费的商品,而非可由读者欣赏和亲近的名著选集。

曹:忽视新的读者对象,沿用在原语语境中适用的编辑原则,其结果就是《选集》被冷冷地物化。由于解读和评述的匮乏,该《选集》在贝克特的中国接受史上本应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大打折扣了。

欧:但译者的遁形是作者至上的要求,况且贝克特走的就是与通俗读物背道而驰的路线。而你从这个《选集》的接受中似乎发现了反其道而行之的必要性,是这样吗?

曹:不尽然,要区分间接介入和直接介入。前者指副文本并不归属、扰乱原作本身,但对于原作的接受大有裨益;后者指编辑或译者对原作的有形删改,是权宜之计。在前一情形中,原文本是忠实、完整的;在后一情形中,原文本是变形、缩减的。对于艰涩名著的译介,间接介入是绝对必要的,而直接介入则要慎之又慎。

语境转换了,传播策略亦应调整。名著的域外生命不是域内生命的复制,其创造需要译者的现身,需要副文本的共存。译者是最细致的读者,没有译者主体性的助力,艰深的翻译文学就只有束之高阁。作者已

死,原出版商亦死,就是说不能刻板地要求域外的出版商亦步亦趋。况且阅读史就是误读史,原作者和出版商没必要为更多的误读担心。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丰富的误读正是名著经由多棱镜折射出的绚烂光芒。

而对于直接介入《选集》的出版商和译者是在目的论意义上忠诚地避免了的。原作的中心地位没有动摇;原作和读者相向而行是在《全集》中才实现的。

欧:事实上,为了保持作品原有的丰富含义,即新批评意义上的含混性,贝克特才要求编辑和出版商切勿评论。我依然好奇,假如《全集》代表了相关译介的鼎盛期,那么作者至上的兴起期是如何向兼顾读者的鼎盛期过渡的呢?

曹:这一过渡确实少为人知。发现贝克特大多数英文原作尚未汉译时,我便向湖南文艺出版社毛遂自荐,并申请了“爱尔兰文学交流”(Ireland Literature Exchange)项目,译出了《莫菲》和《瓦特》,使其于2012年推出11卷本的新《贝克特选集》。这是贝克特中国译介史从法汉翻译向英汉翻译转折的标志,扭转了半个世纪以来贝克特英文原作仅有极少数文字浅显的篇目得到汉译的局面。

欧:你是生逢其时呢!看来这一转折的背后有三个动因:译者的学术意识、出版商的市场意识和赞助人对作家民族归属的政治意识(即对本国文学作为对外名片的传播意识)。三者合力,易成盛事。估计就是这次转折为《全集》铺平了道路吧?

曹:是的。随后我向出版商提议在贝克特110周年诞辰之际推出《全集》。出于独此一家的愿景,已在路上的出版商即刻申请“‘十二五’国家重点规划图书”项目。但尚待翻译的作品多是贝克特青年时代模仿乔伊斯和其他先锋派作家的习作,文字艰涩,典故繁复,因此翻译过程异常艰难。其中最“烧脑”的是朱雪峰首译的《梦中佳人至庸女》——贝克特模仿《尤利西斯》的长篇处女作,其次是陈俊松重译的《论普鲁斯特》和我首译的《但丁……布鲁诺·维柯……乔伊斯》^①等两篇专论。

欧:可以想见。西方权威的贝克特学者都曾怀疑这样的作品和专论能否翻译。鉴于其重大意义,汉译《全集》已为埃默里大学罗斯图书馆、(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当代文学图书馆等机构收藏。相对于先前的兴起期,这一迅疾到来的鼎盛期的译介有何特点呢?

曹:除了有英汉、法汉两支译者队伍的参与外,主要是《全集》收纳了富含价值的副文本。这些副文本主要有两类:一是原书编辑和权威学者就手稿校订或创作过程所写的《前言》和《出版说明》;二是英汉译者针对原作层出不穷的疑难之处(如典故、文字游戏、英语或法语之外的语言)所做的脚注以及法汉译者为再版增补的脚注。作为原书编辑和译本编辑均在场的痕迹,这些副文本是《全集》与《选集》在形式上的最大差异所在,同时也是译者间接介入的标志。

欧:进步显著。但也看得出《全集》形式上的欠缺是没有总序和各卷译序或后记。这一点似乎表明,除了出版商的组织和编校工作外,在这一宏大的翻译工程背后并无统一的学术协调。因此,若非你在报刊和网络发表的《寻找容纳混乱的形式》等评述《全集》的缘起、翻译过程和翻译策略等就仍不为读者所知了。现在,第四步已经呼之欲出了,就是出版过程中的汉译《书信集》吧?

曹:没错。《全集》推出后,出版商便向我咨询,并申报了“‘十三五’国家重点规划图书”项目,从而为《书信集》的翻译、出版铺平了道路。事实上,早在2011年我在贝克特的母校访学期间,“爱尔兰文学交流”的负责人就向我推荐了《书信集》已出版的两卷。

① 原文为“Dante……Bruno. Vico. .”,点的数量表示间隔时间的长短,点表示世纪的数量。

欧: 在这一宏大的翻译、出版工程的背后,我再次发现了那三个动因。作为先期译者,相信你在翻译和修订过程中都发挥了标杆作用。以卷一为例,你是否延续了学术型且兼顾读者的标准呢?

曹: 当然。最显著的标记是就典故、错别字、行文特征、文字游戏、非英语片段、文化或历史背景等增补了 259 处脚注。对于已有出版译文的片段,例如收入《碎片集》的书信段落和收入《诗集》的早期诗歌初稿,也置于《书信集》界定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翻译,并就显著的差异加注说明,最大限度回归原典。

欧: 但与出版作品截然不同,这些书信均是即席写就,行文跌宕,有时措辞生僻,且错字连篇。请问这类句法、词法上的特征,能用汉语传达得神似吗?

曹: 能。汉语作为意合语言的优势能得到充分发挥,使用流水句、无主句、把字句、破句、同音词或同形词等,能贴切地传递贝克特写信时的心态和思绪,并生动地再现其书信本来的面貌,及其与经专家修订的先前出版版本的细微差异。甚至对于人称代词,换用汉语中发达的称呼语更能传神地表现贝克特与收信人的亲疏关系。

欧: 你的行文应当非常灵活。另外,贝克特的英语书信中插入了许多非英语片段。他这么做是有特定意图的,对此你是如何处理的呢?

曹: 与《全集》不同的是,《书信集》汉译时非英语片段均得到保留,一则行文不与信后的注释重叠,二则借此创造一种中、西文夹杂的“夹生饭”文体,既最真实地反映贝克特的行文特征,也与同时代中国留洋作家(如郭沫若、鲁迅等)的文体切近,折射其文化背景的多元性。

欧: 看来,对于小说作为出版作品和书信作为非出版作品,你有着清醒的认识。最后一问,可否说你特别适合从事学术型文学翻译?

曹: 大抵如此。正如贝克特决计与乔伊斯背道而驰,我走的是与贵国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进行直接介入相反的道路。对于学术型著作,译者必须持间接介入的立场,而对于非学术型文学,则可采取直接介入的手段。有经验的译者会感知到文本类型学和历时译介学的指导意义。感谢您拨冗对话!

欧: 也谢谢你对贝克特在中国的接受及汉译历程发表评述,为欧美同行打开一扇窗户!

Recent Trends of S. Beckett Studies: A Talk with Lois Overbeck

CAO Bo

Abstract: This talk took place between Prof. Cao Bo and the famous S. Beckett scholar Lois Overbeck while the former furthered his studies at Emory University. After touching upon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recent Beckett studies, they elaborated the three trends in the West: more innovative researches made on Beckett's published works from various points of view; more sorting studies of Beckett's theater art demonstrated in his directions and innovations and others' directions and performances; more going online of studies of Beckett's manuscripts, diaries and archives that lead readers "back to the cannon." As to research tools, Overbeck recommends four that complement each other: *Damned to Fame*, *The Grove Companion*, and *The Collected Poems* and *The Letters*.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section, Cao expanded on the features of the four stages, with his focus on the value of those "paratexts" in the history of relevant scholarship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indirect intrusion" to the translation of scholarly texts. This talk is inspiring to the Chinese Beckett circle and makes known to the West the feature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Key words: Samuel Beckett; trend of scholarship; primary reference book; Chinese translation; paratext

责任编辑: 陈宁

• 121 •

刘半农诗歌著译学术年谱(1915—1927)

曹波, 万兵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刘半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新诗的拓荒者、白话文的倡导者、诗歌翻译家、文学翻译家和语言学家。回顾刘半农诗歌著译生涯(1915—1927), 梳理其诗歌翻译和创作主要学术观点, 勾勒其新诗著译线路图, 可以发现, 作为诗人, 刘半农诗歌著译颇丰, 有《扬鞭集》《瓦釜集》《初期白话诗稿》《国外民歌译》等, 为中国新诗的翻译和创作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关键词: 刘半农; 诗歌著译; 学术年谱

中图分类号: I206.5;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917(2020)02-0153-07

刘半农(1891.5—1934.7), 原名寿彭, 后名复, 初字半侬, 后改半农, 号曲庵, 笔名寒星、范奴冬, 堂号灵霞馆、桐花芝豆堂等, 江苏省江阴县(今张家港市)西横街人。“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新诗的拓荒者、白话文的倡导者、诗歌翻译家、文学翻译家和语言学家。在其短暂的一生中, 作为诗人, 著译有《扬鞭集》《瓦釜集》《初期白话诗稿》《国外民歌译》等。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乙卯) 二十五岁

七月一日, 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七期上, 署名半侬, 以《杜瑾讷夫之名著》为总题, 发表俄国文学家杜瑾讷夫(现译“屠格涅夫”)四篇散文诗(《乞食之兄》《地胡吞我之妻》《可畏哉愚夫》《嫠妇与菜汁》)。这是外国散文诗在中国最早的译介。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丙辰) 二十六岁

在翻译小说《翡翠光阴》中, 采用骚体翻译《翡翠鸟歌》(六首)。

十月一日, 首次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上, 辟专栏《灵霞馆笔记》, 发表译诗《爱尔兰爱国诗人》, 包括《火焰诗七首》《悲天行三首》《咏爱国诗人三首》《割爱六首》《绝命词两章》, 署名刘复。

十二月一日, 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上, 发

表《拜伦遗事》(即《拜伦家书》)一文, 以骚体翻译拜伦长诗《异教徒》(*Giaour*)中的一节诗《吊希腊》(*Greece*)。与拜伦的《哀希腊》(*The Isles of Greece*)比较, 认为, “其《吊希腊》一诗, 尤悲壮恳切。盖《哀希腊》系自哀, 《吊希腊》则直呼希人而正告之。为振聩发聋, 唤醒灵魂计。遂不觉其言之激也”^[1]。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丁巳) 二十七岁

一月一日, 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 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论文, 提出“文学改良”的八点主张。

一月, 在《小说画报》第一至五期上, 发表章回小说《歇浦陆沉记》。署名半侬。其中, 在开头处, 留有一首创作的词《浪淘沙》。这首词是《歇浦陆沉记》全书的总纲。录如下:

世事总茫茫, 转眼沧桑。古今兴废本无常。往日繁华多换了, 说也荒唐。 月色渐昏黄, 照遍申江。重来妖气更猖狂。百五年前余此孽, 因果难忘。

二月一日, 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 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论文, 提出“三大主义”, 呼应胡适的文学改革的主张。胡适发表诗作《白话诗八首》, 其中最著名的是《朋友》(后改名《蚬

收稿日期: 2019-11-20

作者简介: 曹波(1968—), 男, 湖南益阳人,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 教授; 万兵(1970—), 男, 湖北黄冈人,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

蝶》),创作于一九一六年八月间。八首白话诗未摆脱旧诗的束缚,残留着旧诗的痕迹。这是最早的一批现代白话诗,其地位不容忽视。刘半农发表译作《阿尔萨斯之重光 马赛曲》(《李塞儿》),第一次向国人译介资产阶级革命歌曲,署名刘半依。其中,第一阙云:“我祖国之骄子,趣赴戎行。今日何日?日月重光。暴政与我敌,旌旗已高扬。君不闻四野贼兵呼噪急,欲戮我众,欲歼我妻我子以勤王。

(合唱)我国民,秣而马,厉而兵,整而行伍,冒死进行;沥彼秽血以为粪,用助吾耕!”^[2]

四月一日,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译诗《咏花诗》,即《寄赠玫瑰四章》《最后之玫瑰三章》《哀尔伯紫罗兰三章》《同情一首》《不忘我三首》《颂花诗十五首》,署名刘半依。

五月一日,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论文,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刘半农主张,文言和白话可暂处于对待的地位。在论及韵文的改良方面,第一曰,破坏旧韵,重造新韵。韵文对于散文而言,一切诗赋歌词戏曲之属,均在其范围之内。刘半农提出“重造新韵”的三种办法:(1)“作者各就土音押韵”; (2)“以京音为标准”; (3)新“撰一定谱,行之于世”。第二曰,增多诗体。吾国现有之诗体,除了律诗排诗当然废除外,其余绝诗古风乐府三种(曲、吟、歌、行、篇、叹、骚等,均为乐府之分支),已尽是供新文学上之诗之发挥之地。倘将来更能自造,或输入他种诗体,并于有韵之诗外,别增无韵之诗^①。自此,新诗在形式上向外国诗体借鉴,向民歌学习,山歌、船歌、俗曲、童谣、寓言诗、散文诗、无韵诗、自由体、阶梯式、十四行诗等样式,相继登上古老诗国的歌坛^[3]。在文学作品(诗歌)形式上的改革方面,提出分段、句逗符号和废除圈点等三点意见。

五月,发表译作《诗人的修养》,收录《半农杂文》第一册,它是《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中的一部分,署名刘半依。

六月一日,在《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上,发表五言译诗《灵霞馆笔记·缝衣曲》,署名刘半依。

七月一日,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上,发表《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论文,署名刘半依。文章介绍英国约翰生和美国樊戴克的文学思想,表

达关于诗歌和小说改革的见解,继续鼓吹文学革命。对于诗歌,刘半农主张,作诗本意,只需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用自然音响节奏谱写出来,所表现的是真实的感情。

是年夏天,刘半农翻译英国来华使臣马夏尔尼的《乾隆英使觐见记》。其中,以骚体析出莎士比亚(The Tempest)《飓引曲》(今译《暴风雨》),诗句曰:“观此芸芸之众生兮,叹造物之神奇。真人类之美且大兮,吾乐乎新世界之自居。”^[4]虽只有两句,但这是莎士比亚的诗在中国首次出现。

十二月,创作诗歌《其实……》《案头》,收录《扬鞭集》上卷。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 戊午) 二十八岁

一月十五日,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发表《新文学与今韵问题——复玄同》(通信)。发表诗作《相隔一层纸》和《题小蕙周岁日造像》(署名刘半农)。《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刘半农与胡适、沈尹默三人9首诗的发表,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新诗出现的先声,被称作“现代新诗的第一次出现”^②。李大钊、鲁迅、陈独秀、周作人、康白情、俞平伯、刘大白、朱自清等人尝试写新诗,被称为初期白话诗派。1920年3月,胡适新诗集《尝试集》出版,被公认为中国现代第一部白话诗集。

为了表示和旧文学决裂,彻底改变自己翻译和创作的方向,刘半农还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发表了《应用文之教授》一文,进一步壮大文学革命的声威,正式署名“半农”,自此,跳出“新鸳鸯蝴蝶派”的漩涡。

一月,和沈尹默讨论征集歌谣的事宜:“那天,正是大雪之后,我和尹默在北河沿闲走着,我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我将章程拟好,蔡先生看了一看,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就从此开场了。”^[5]

二月一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后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刊载该简章。

二月十五日,创作诗歌《拟古二首》,收录《扬鞭集》上卷。并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二号上,署名

①见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载《新青年》,1917年5月1日第3卷第3号。

②见刘半农《相隔一层纸》《题小蕙周岁日造象》,载《新青年》,1918年1月15日第4卷第1号。

刘半农,发表诗作《车毯》(拟车夫语)、《游香山纪事诗》。这组诗有30首,唯有第二首用江阴乡音叶韵。诗云:“古刹门半开,微露金身佛。颓唐一老僧,当窗逢破衲。小僧手纸鸢,有线不盈尺。远见行客来,笑向天空掷。”^[6]

三月十五号,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钱玄同托名王敬轩发表反对文学革命、为封建文学辩护的《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刘半农则以记者名义写了《文学革命之反响——奉答王敬轩书》(书信),集中批判当时社会上的封建复古思想以及一些保守派对文学革命的非议。钱玄同与刘半农合演一场“双簧戏”,表达了新文学家们对文学革命的坚定态度。

三月十五号,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发表诗作《除夕》,署名刘半农。

四月十五日,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发表诗作《灵魂》《学徒苦》,署名刘半农。

五月十五日,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我行雪中》,署名刘半农。在“译者导言”中引述原刊的“记者之导言”,指出它是一篇“结撰精密之散文诗”^[7]。这是“散文诗”这一文类名称,第一次在中国报刊中出现^[8]。由文言古体译诗转为白话自由无韵体诗,尤其是对于屠格涅夫和泰戈尔的散文诗的连续译介,刘半农给当时的中国诗坛带来全新的空气,强化和推进由胡适等人倡导的新诗运动,促进了新诗创作。译诗的方法由晚清以来流行的译述、意译走向直译。诗歌的外在形式,由原来右起竖排改为左起横排,全面采用西式标点。同时,发表无韵诗《卖萝卜人》《三月廿四夜听雨》,署名刘半农。这是他最早创作的无韵诗。

七月十五日,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上,发表白话诗作《纸窗》《无聊》,署名半农。

八月十五日,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上,周作人在发表《改革》译文按语中透露:刘半农欲造一个“她”字,与“他”字并用。

八月十五日,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上,署名刘半农,发表散文诗作《晓》,发表译诗《泰戈尔无韵诗二首》,即《恶邮差》《著作资格》。

九月十五日,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上,发表《译诗十九首》,即《海滨五首》(无韵诗)、《同情二首》(无韵诗)、《村歌二首》(俚曲体)、《海德辣跋市五首》(俚曲体)、《倚楼三首》(俚曲

体)、《狗》(散文诗)、《访员》(散文诗)。创作诗歌《大风》《沸热》,收录《扬鞭集》上卷。

十二月十五日,在《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上,发表诗作《悼曼殊》八首。

一九一九(民国八年 己未) 二十九岁

七月,在《每周评论》第三十号上,发表诗作《云》(仿儿歌),署名寒星。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诗作《羊肉店》(拟儿歌),署名寒星。

九月,在《新生活》周刊第五期上,发表诗作《落叶》,署名寒星。

十月,在《新潮》月刊第二卷第一号上,发表诗作《铁匠》,署名寒星。在《新潮》月刊第二卷第一号上,发表散文诗作《E弦》《老牛》,署名寒星。

十月,发表诗作《中秋》、发表散文诗作《卖菜》,均收录《扬鞭集》上卷。在《新生活》周刊上,发表诗作《民国八年的国庆》,原诗七十七行,经删剩四行,具体发表日期,待查证。

十一月一日,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发表诗作《他们的天平》《D——!》《烟》,署名刘半农。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 庚申) 三十岁

一月一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上,发表诗作《小湖》《桂》,署名刘半农。

三月二十七日,创作诗歌《拟装木脚者语》,收录《扬鞭集》上卷。

四月一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上,发表诗作《敲冰》,署名刘半农。四月,创作诗歌《血》《猫与狗》,均收录《扬鞭集》上卷。

五月十八日,创作诗歌《一个失路归来的小孩》,收录《扬鞭集》上卷。

六月六日,创作诗歌《三十初度》,收录《扬鞭集》上卷。

六月二十三日,创作诗歌《稿子》,收录《扬鞭集》上卷。

七月,创作诗歌《夜》,收录《扬鞭集》上卷。

八月六日,创作诗歌《雨》,收录《扬鞭集》上卷。

八月九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发表《“她”字问题》论文,首创“她”“牠”(它)二字,作为第三人称女性代词和无生命代词,引起争论。

八月十一日,创作诗歌《爱它? 害它? 成功》,收录《扬鞭集》上卷。

八月十六日,创作诗歌《静》,收录《扬鞭集》上卷。

十月一日,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上,发表诗作《牧羊儿的悲哀》《地中海》《登香港太平山》,署名刘复。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 辛酉) 三十一岁

一月一日,创作诗作《在大穷大病中》,收录《扬鞭集》中卷。

三月十日,创作诗歌《在一家印度饭店里》,收录《扬鞭集》中卷。

三月二十日,长诗《十二个》译讫,寄岂明,托其在国内发表。在给岂明的一封长信中,谈及对译诗的见解。

三月二十三日,创作诗歌《歌》(《没有不爱美丽的花》),收录《扬鞭集》中卷。

五月一日,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上,发表诗作《伦敦》(一首昏乱的诗)。

七月十六日,创作诗歌《耻辱的门》,收录《扬鞭集》中卷。

八月一日,在《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夏天的黎明》,以及诗作《奶娘》《一个小农家的暮》《稻棚》《回声》。

九月五日,创作诗歌《卖乐谱》,收录《扬鞭集》中卷。

九月十五日,创作诗歌《战败了归来》,收录《扬鞭集》中卷。

九月二十日,创作诗歌《秋风》,收录《扬鞭集》中卷。

九月二十三日,创作诗歌《两个失败的化学家》,收录《扬鞭集》中卷。

十月一日,创作诗歌《老木匠》,收录《扬鞭集》中卷。

十月五日,创作诗歌《织布》,收录《扬鞭集》中卷。

十月十五日,创作诗歌《荒郊》,收录《扬鞭集》中卷。

十一月十日,在《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一号上,发表译诗《王尔德的散文诗五首》,署名刘复。创作诗歌——《山歌六首》:《郎想姐来姐想郎》《姐园里一朵蔷薇开出墙》《劈风劈雨打熄我灯笼火》《你叫王三妹来我叫张二郎》《你联竿拗拗乙是拗格我?》《五六月里天气热旺旺》。收录《扬鞭集》中卷。收录《瓦釜集》。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 三十二岁

一月,在《诗》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诗作《母的心》《我们俩》《巴黎的秋夜》《无题》《小诗——许多的琴弦》《小诗——酷虐的冻与饿》《小诗——眼泪啊!》。收录《扬鞭集》中卷。

八月,创作诗歌《诗神》,收录《扬鞭集》中卷。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 癸亥) 三十三岁

四月,创作诗歌《三十三岁了》,收录《扬鞭集》中卷。

六月十一日,创作诗歌《江南春暮怨词》,收录《扬鞭集》中卷。

六月二十三日,创作诗歌《巴黎的菜市上》,收录《扬鞭集》中卷。

六月二十四日,《江阴船歌》,《歌谣》周刊第二十四号,署名刘半农。

七月八日,创作诗歌《忆江南》,收录《扬鞭集》中卷。

七月九日,创作诗歌《尽管是……》,署名刘复,收录《扬鞭集》中卷。

七月二十日,创作诗歌《柏林》《写所见》,署名刘复,收录《晨报·副刊》。

七月二十三日,创作诗歌《秧歌》,署名刘复,收录《扬鞭集》中卷。

七月二十九日,创作诗歌《记画》,署名刘复,收录《扬鞭集》中卷。

八月五日,创作诗歌《母亲》,收录《扬鞭集》中卷。

九月十六日,在《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上,发表诗作《回声》,署名刘复。同日,创作歌词《教我如何不想她》,署名刘复,将“她”字首次入诗。后由赵元任谱曲。被收录北京《晨报·副刊》。

九月二十三日,论文《海外的中国民歌》,署名刘复,收录《歌谣》周刊第二十五号。

十月,创作诗歌《熊》,收录《扬鞭集》中卷。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四年 甲子) 三十四岁

四月二十一日,在《文学周报》第一百一十八号上,发表诗作《病中与病后》,署名刘复。创作诗歌《劫》《我竟想不起来了》《赤裸裸的话》《等着》,载《文学周报》第一百一十七期。创作诗歌《病中与病后》《梦》《在墨蓝色的海洋深处》《七月六日》(《别再说》),载《文学周报》第一百一十八期。创作诗歌《三唉歌》(《思祖国也》),收录《扬鞭集》中卷。创作诗歌《面包与

盐》，收录《扬鞭集》中卷。创作《山歌三首》，即《小小里横河一条带》《河边浪阿姊你洗格舍衣裳》《你已看见水里格游鱼对挨着对》，收录《瓦釜集》。创作《拟儿歌四首》，即《小猪落地》《铁匠铿锵》《我哥哥》《玩事做》，收录《扬鞭集》中卷。创作诗歌《依家》《阵雷》，收录《扬鞭集》中卷。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 三十五岁

二月二十一日，在《京报·副刊》上，署名刘半农，发表诗作《拟拟曲》(一)(《北京的两个车夫》)。

三月一日，在《歌谣》周刊第八十号上，发表《太平天国时代的民歌》。

三月九日，在《语丝》第十七号上，署名刘复，发表诗作《看井》。

五月二十五日，在《语丝》周刊第二十八期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法国民歌二首》，即《巴黎有一位太太》《约翰赫诺》。

七月三日至八月七日，创作《归程中得小诗五首》，即《地中海》《苏彝士运河》《Minikoi岛》《哥伦波海港》《西贡》，均收录《扬鞭集》中卷。

九月二十八日，在《语丝》周刊第四十六期上，署名刘复，发表诗作《拟拟曲》(二)。

十月一日，在《京报·副刊》第一百八十六号上，署名刘复，发表诗作《小诗二首记老友申无量先生语》。

十月十九日，在《语丝》周刊第四十九期上，署名半农，发表诗作《小诗三首》。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 丙寅) 三十六岁

二月十五号，在《语丝》周刊第六十六期上，署名刘复，发表诗作《饿》。

三月一日，在《语丝》周刊第六十八期上，署名刘复，发表诗作《旧体诗二首》，即《秧针细细似眉梢》《杨花如雪飞满天》。

三月十五日，在《语丝》周刊第七十期上，署名刘复，发表《〈扬鞭集〉自序》。他写道：“我在诗的体裁上是最会翻新鲜花样的。当初的无韵诗，散文诗，后来的用方言拟民歌，拟‘拟曲’，都是我首先尝试。至于白话诗的音节问题，乃是我自从我一九二〇年以来无日不在心头的事。”^①

三月二十二日，在《语丝》周刊第七十一期上，

署名范奴冬女士，发表诗作《呜呼三月一十八》。

四月十二日，在《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一人能有几天活?》。

四月十九日，在《语丝》周刊第七十五期上，署名刘复，发表《〈瓦釜集〉代自序》。他写道：“采用江阴方言，依江阴最普通的一种民歌——‘四句头山歌’——的声调，所作成的诗歌十多首，集名叫做‘瓦釜’”。“关于语言，我们做文做诗，我们所摆脱不了，而且是能于运用到最高等最真挚的一步的，便是我们抱在我们母亲膝上时所学的语言”。关于声调，“俗歌——民歌与儿歌——是现在还有生命的东西，他的调子更可以拿来利用。”“中国文学上，改文言为白话，已是盘古以来一个大奇谈，何况方言。”^②

四月，民歌体诗歌专集《瓦釜集》，由北新书局出版。周作人用绍兴方言作《题半农〈瓦釜集〉序歌》。全集收录《开场的歌——一只雄鹅飞上天》，另收歌21首。附《手攀杨柳望情哥词》小序，另收歌19首。其中，第九首、第十首、第十三首、第十四首歌未收录。同时，附周作人作《中国民歌的价值》。“民歌格调而为诗人采取者，清季黄遵宪以后第一人也。既崇活语，首集歌谣，中国近代采录民众文艺之风，自先生开之。”^③

四月二十六日，在《语丝》周刊第七十六期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戕默诗八首》。

五月三日，在《语丝》周刊第七十七期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国外民歌二首》，即《好像是河中流着的水》《少年人》。

五月十七日，在《语丝》周刊第七十九期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为的是我要上巴黎去》。

六月一日，在《语丝》周刊第八十一期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今希腊的民歌二首》，即《在一个区域里》《我要变做了——》。

六月七日，在《语丝》周刊第八十二期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大真实》。

六月十四日，在《语丝》周刊第八十三期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茶花女〉第一幕第八场的饮酒歌》。

六月，《扬鞭集》(上卷)，由北新书局出版。集中收诗119首，与《瓦釜集》重收9首。

①见刘半农《〈扬鞭集〉自序》，载《语丝》，1926年3月15日第70期。

②见刘半农《〈瓦釜集〉代自序》，载《语丝》，1926年4月19日第75期。

③见魏建功《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刘先生行状》，载《国学季刊》，1934年第4卷第4期。

七月二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一卷第二号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哦!你喝了些酒》。

七月三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一卷第三号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Verduroquette》。

七月四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一卷第四号上,署名刘复,发表《与顾颉刚先生论〈静女〉篇》,谈及诗歌的问题。

七月六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一卷第六号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已经过了四十五个礼拜日》。

七月十三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一卷第十三号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我的女儿你要买只帽子么?》。

七月二十四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一卷第二十四号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爱情的欢乐只是一时的》。

七月二十六日,在《语丝》周刊第八十九期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阿尔萨斯的〈呜儿歌〉》。

八月七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二卷第七号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在山中往来的走》。

八月十八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二卷第十七号上,署名刘复,发表诗作《女郎的歌》。

八月十九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二卷第十八号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为的是你爱着我我也爱着你》。

八月二十三日,在《语丝》周刊第九十三期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小亚细亚的情歌》。

八月二十八日,在《语丝》周刊第九十四期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柬埔寨的民歌》。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二卷第二十七号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英国古歌二首》,即《海盗》《格林维志的养老人》。

九月十一日,在《语丝》周刊第九十六期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俾路芝斯坦的民歌》。

九月十四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三卷第十四号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尼泊尔的民歌》。

九月二十六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三卷第二十五号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满洲里的民歌三首》,即《一个人断然说不出来》《从这棵树上》《要是你不愿意》。

十月二十五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四卷第二十四号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罗马尼亚民歌

三首》,即《一只秃鹫》《小姑娘,你不要弄错了》《女郎,美好的女郎》。

十一月十三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零五期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西班牙的短民歌二十二首》。

十一月二十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零六期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西班牙的民歌六首》。

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零七期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西班牙的民歌八首》。

十二月十一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零九期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西班牙的民歌九首》。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 丁卯) 三十七岁

一月二十二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一十五期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西印度Pueblo族民歌》,即《妇女们唱的收成歌》《筐子歌》《妇女们唱的谷歌》。

一月二十九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一十六期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西印度Pueblo族民歌》,即《替向日葵求雨的时候唱的歌》《求闪电的歌》《吹笛子的法师求雨的时候唱的歌》。

一月三十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七卷第二十七号上,发表诗作《今朝》《采莲曲》《秋风》《玉笙》《我爱君莫去》《雪夜》《雪后》《寒枝》《骆驼颂》。

二月十二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一十八期上,发表诗作《采莲曲》,署名刘复。

三月五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二十一期上,发表译诗《木马歌》(小惠译、刘半农校改)。

三月三十日,周作人在《国外民歌译》序言中写道:半农这部国外民歌的确选也选得唔啥,译也译得不错。有几首民歌曾经登在《语丝》上面,见过的人自会知道;如有人不会看到呢,那么看了这部民歌选也就知道了。总之,半农的笔去写民谣是很适宜的:瓦釜一集,有书为证^[9]。

四月十六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二十七期上,发表译诗《〈海外民歌〉自序》(序跋),署名刘复。

四月三十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二十九期上,署名刘复,发表译诗《猓猓民歌四首》,即《新嫁娘的怨歌》《伤旧域歌三首》。

四月,译诗专集《国外民歌译》,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刘半农主张:“它的好处,在于能用最自然的言词,最自然的声调,把最自然的情感发抒出

来。”“我既然是个爱赏歌谣的人，自然不能专爱本国的，有时还要兼爱国外的。”^①

五月十四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三十一期上，发表译诗《钉匠歌》（小蕙译、刘半农校改）。

五月二十一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三十二期上，发表译诗《猥猥人的创世纪》，署名刘复。

六月十一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三十五期上，发表译诗《祖父的歌》（小蕙译、刘半农校改）。

六月十八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三十六期上，发表诗作《悼王静安先生》，署名刘复。

七月二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三十八期上，发表译诗《我的饮酒歌》，署名刘复。

七月九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三十九期上，发表论文《关于译诗的一点意见》，署名刘复。他写道：“基本方法是直译。因是直译，不但要译出它的意思，还要尽力地把原文中语言的方式保留着；又因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并不就是字译（transliteration），所以一方面还要顾着译文中能否文从字顺，能否合于语言的天然。”“在甲种语言中，用什么方式或用什么些字所表示的某种情感，换到乙种语言中，如能照它直译固然很好，如其不能，便把它的方式改换，或增损，或变改些字，也未尝不可；因为在这等‘二者不可得兼’之处，我们应当斟酌轻重；苟其能达得出它的真实的情感，便在别方面牺牲些，许还补偿得过。”^②

七月二十三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四十一

期上，发表译诗《土耳其民歌五首》，署名刘复。

七月三十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四十二期上，发表译诗《土耳其民歌五首》（六至十），署名刘复。

八月二十七日，在《语丝》周刊第一百四十六期上，发表译诗《秋歌》（小蕙译、刘半农校改）。

参考文献：

- [1]刘半农.拜伦遗事[J].新青年, 1916(2): 8.
- [2]刘半农.阿尔萨斯之重光 马赛曲[J].新青年, 1917(3): 9.
- [3]徐瑞岳.刘半农评传[M].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 71-72.
- [4]刘半农.乾隆英使觐见记[M].上海: 中华书局, 1917: 17.
- [5]刘半农.国外民歌译[M].北京: 北新书局, 1927: 1.
- [6]刘半农.刘半农诗选[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4.
- [7]刘半农.我行雪中·译者导言[J].新青年, 1918(4): 433.
- [8]王光明.散文诗的世界[M].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7: 91.
- [9]周作人.国外民歌译·周序[M].北京: 北新书局, 1927: 4.

责任编辑: 邓双霜

①见刘半农《〈国外民歌译〉自序》，载北京北新书局1927年出版的《国外民歌译》。

②见刘半农《关于译诗的一点意见》，载《语丝》1927年7月9日第139期。

刘半农小说著译学术年谱(1913—1920)

曹波, 万兵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刘半农是民国初年“新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小说翻译家和语言学家。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著译颇丰,名噪一时。作为小说家,从1913年到1917年,刘半农创作的小说主要集中在1915年。刘半农发表创作小说20余种,总计34篇。刘半农的小说翻译略晚于其小说创作。刘半农发表翻译小说17种,共计45篇。就题材而言,社会小说包括警世小说、哲理小说、刺世小说、家庭小说、少年小说、历史小说等。总体来看,社会小说最有价值,侦探小说次之。从1916年开始,刘半农翻译小说的语言由文言转向白话,即通俗的语言。

关键词:刘半农;小说著译;学术年谱

中图分类号:I206.5; 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20)01-0154-06

刘半农(1891.5—1934.7),原名寿彭,后名复,初字半依,后改半农,号曲庵,笔名寒星、范奴冬,堂号灵霞馆、桐花芝豆堂等,江苏省江阴县(今张家港市)西横街人。民国初年“新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小说翻译家和语言学家。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著译颇丰,名噪一时。从1913年到1917年,刘半农创作的小说最多发表在中华书局创办的《中华小说界》上。其中,发表小说最多的年份是1915年。刘半农发表创作小说20余种,共计27篇^[1]。据刘永文编撰《民国小说数目》显示,刘半农在《新闻报》上发表创作的小说有7篇^[2]。这样,刘半农发表创作的小说,总计34篇。刘半农的小说翻译略晚于其小说创作。刘半农发表翻译小说17种,共计45篇^[3]。就题材而言,社会小说包括警世小说、哲理小说、刺世小说、家庭小说、少年小说、历史小说等^①。总体看来,社会小说最有价值,侦探小说次之。从1916年开始,刘半农翻译小说的语言由文言转向白话,即通俗的语言。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癸丑)二十三岁

八月,在《小说月报》第四卷第四号上,发表

小说《假发》。这是目前已知的刘半农发表的第二篇小说,以一段自己亲身的经历写成的小说。署名半依。

十月十三日,在《时事新报·杂俎》上,发表百字小说《秋声》。内容为揭露张勋镇压二次革命、荼毒地方的罪行。文末附“案语”三则。署名半依。事实上,全文只有98个字。特录如下:

净月当空,一缕秋光透林梢而出。

金陵城内满张禁止淫劫之谕:

“天乎!……”三数同样之尖锐声,出自某破屋,悲惨类鬼号。

门外有一垂辫者蹑足听:

“这儿是窑子,弟兄们,来!”……三数八太爷呼啸至,破扉入。

“姑娘们,别害怕,咱们同你养孩子顽儿……”

呜呼,后事余不忍言^[4]。

有三个按语,对小说内容作了具体的补充:其一说,“此老友达君天悲为余言者。……虽仅寥寥数语,而人民悲惨之状况,张兵野蛮之口吻,已历历如画。观此不啻目睹。”此句点明了小说的主题。

①见郭长海《刘半农前期研究》(团结出版社2014年版)中的《外国小说的翻译》一文。

收稿日期:2019-11-20

作者简介:曹波(1968—),男,湖南益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万兵(1970—),男,湖北黄冈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硕士生导师,副教授。

其二说,“京语称妓院为窑子。今张军竟以此名赐之普通之人家,普通妇女则直呼之为窑姐儿。”可见张军之野蛮,无耻。其三说,“强奸则强奸矣,而必美其名曰‘养孩子’。每日清晨及傍晚时,八太爷必奔走相告曰:‘咱老子今天养了几个孩子’,亦即强奸数次也。呜呼!张军竟以南京为殖民地矣。夫复何言!”^[5]

十月,在《小说月报》第四卷第六号上,发表英国警世小说《局骗》。署名半依。

经徐半梅介绍,入中华书局编辑部工作,编译小说。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 甲寅)二十四岁

三月一日,首次在《中华小说界》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侦探小说《匕首》。署名半依。

五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翻译滑稽小说《黑行囊》。署名半依。

五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法国滑稽小说《我将死矣》。

六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一卷第六期上,发表翻译第一篇小说《顽童日记》(滑稽小说)。无作者名,也无国籍。署名半依。此后,所译作品呈上升趋势,数量上超过了创作,共50余篇。所译作品的国家,除英国外,涵盖法国、德国、丹麦、美国、丹麦、葡萄牙、希腊,甚至还有从英文转译的日本小说。若以内容分类,则可涵盖当时流行的各种小说样式,诸如社会小说、侦探小说、爱情小说、历史小说、滑稽小说、政治小说、外交小说、实业小说、哲理小说等。

六月,《礼拜六》周刊创刊。王钝根担任编辑。

七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一卷第七期上,发表翻译滑稽小说《洋迷小影》,这是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的名作,今译为《皇帝之新衣》。署名半依。在小说前,有一段译者的前言。录如下:“是篇为丹麦物语大家安德生氏原著,名曰《皇帝之新衣》。陈义甚高,措辞诙诡。今兼安氏原文,及日人剧本之意,参以我国习俗,为洋迷痛下针砭。但求不失其真,非敢以推陈出新自诩也。”这是安徒生的名字第一次在中国出现。

八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一卷第八期上,署名半依,发表滑稽小说《财奴小影》。发表翻译社会小说《伦敦之质肆》,并在文末留下《译后记》。摘录如下:“译者曰:余观今日社会,心最毒,

手最辣。而貌最倨者,官吏而外,厥维质伙。曩曾于《演说报》著论痛斥之,观者颇为动容。今读迭氏之文,虽仅寥寥五百余言,已将质伙之丑态描摹尽致,写来不著形迹,其妙处全在字句之外。若非名笔,曷以臻此。然质者,以物质钱,且给以厚利,非向人乞助者可比。设肆者将本博利,藉质者之利以为生,乃完全营业性质,非慈善事业可比。……呜呼!自有金钱,而世界之人品,遂日以堕落。故欲求真平等,真道德发现,非先废金钱不可。”

九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一卷第九期上,发表笔记小说《美洲风俗趣谈》。署名半依。

十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一卷第十期上,发表哀情小说《默然》。无作者名,也无国籍。署名半依。

十一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一卷第十一期上,发表翻译醒世小说《咏而归》。无作者名,也无国籍。署名半依。

九至十二月,在《中华教育界》第三卷第九百一十二期上,发表翻译教育小说《翡翠光明》(与畹滋合译),无作者名,也无国籍。

十一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一卷第十一期上;第一卷第十二期上,发表翻译哀情小说《此何故耶》(续)。署名半依。刘半农译毕此篇小说,留下了《译余赘言》。录如下:“呜呼!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吾谓世之英雄豪杰,举全世而崇拜之者,皆庸人之尤者也。不然,何若辈一出,天下遂多事耶!托氏此篇其殆有刍狗万物之思想,蕴蓄于脑而不能自己,乃借儿女之口吻,发为搔首问天之辞。托氏作此,托氏之目光四射矣。”

十二月五日,首次在《礼拜六》第二十七期上,发表翻译实业小说《橡皮傀儡》。署名半依。

十二月十三日,在《新闻报·快活林》上,发表滑稽短篇小说《还债》。无作者名,也无国籍。

十二月十九日,在《礼拜六》第二十九期上,发表翻译实业小说《奉赠一圆》。署名半依。

一九一五年(民国三年 乙卯)二十五岁

一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言情小说《未完工》。署名半依。无作者名,也无国籍。

一月二日,在《礼拜六》第三十一期上,发表翻译实业小说《疗妒》,译《大陆报》。无作者名,也无国籍。署名半依。

一月,《中华学生界》月刊创刊。在第一卷第

一期(创刊号)上,发表翻译英国短篇小说《终身恨事》。署名半依。在结尾处,刘半农补述,权作译者附志。录如下:“是篇得诸英伦道学推广会所刊之《星期学生小说丛编》中,族著者为一女士,不属姓氏。序文言、女士为写实派小说家。展诵一过,见其描摹学生心理处,无不丝丝入扣。洵不可多得之作也。”^①

一月,《中华妇女界》月刊创刊。在第一卷第一期(创刊号)上,发表家庭小说《忏悔》。无作者名,也无国籍。署名半依。

二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滑稽小说《福尔摩斯大失败1-3案》。

二月六日,在《礼拜六》第三十六期上,发表翻译滑稽小说《哲学家》。署名半依。

二月二十七日,在《礼拜六》第三十九期上,发表翻译实业小说《幸运之怪物》。署名半依。

三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三期上,发表滑稽小说《影》。署名半依。

三月二十五日,在《中华妇女界》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爱国小说《南山情碣》。无作者名,也无国籍。

三至五月,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三、四、五期上,发表翻译家庭小说《帐中说法》。署名瓣依。

四月一日,在《小说海》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翻译小说《八月十二》。署名半依。

五月一日,署名半依,在《小说海》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翻译法国小说《卑田院客》;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翻译侦探小说《烛影当窗》。

五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翻译哀情小说《悯彼孤子》(从日本著名作家德富芦花转译)。署名半依。在小说后面,留下一段文字——《译后记》。录如下:“余不解日文,然尝闻人言,日本小说家思想最高而又善为状物之文者,首推德富芦花氏。氏之杰构,有《不如归》《寄生木》两种,短篇甚少。是篇由西文转译而来,标题为Opoorchildl,译作《悯彼孤子》,似去原义不远。

篇中人名、地名译时得卓呆君之助不少,书以志谢。”其实,无论从结构上来看,还是从情节上来看,乃至语言表达上来看,都不能构成小说。只是因为“善为状物之文”,写出了“我”在特殊的环境中的思想变化和心理特征,细腻而又真实。

五月,翻译中篇外交小说《欧陆纵横秘史》,在中华书局出版。

五月,在《中华妇女界》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历史小说《大将军华盛顿轶闻》。

六月一日,在《中华学生界》第一卷第六期上,发表翻译法国伦理小说《一小时之自由》。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六期上,发表言情小说《情悟》。无作者名,也无国籍。署名半依。

七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七期上,发表翻译国事小说《黑肩巾》(卷上)(天游原译,半依润辞)。发表《杜瑾訥夫之名著》(名家小说)(“Tyргeneв”,即“Ivan Turgenev”,现译“屠格涅夫”),包括《乞食之兄》《地胡吞我之妻》《可畏哉愚夫》《嫠妇与菜汁》。这是其第一次发表翻译的四篇散文诗。署名半依。在“译者前言”中,刘半农写道,“诗文小说并见。然小说短篇者绝少,兹于全集中得其四。”此四篇“余所读小说,殆以此为观止,是恶可不译以饷我国之小说家”。翻查当时刘半农使用的英译本,发现其标在“Poems in Prose”分卷中。事实上,在编译时,译者弄错了文类的归属^②。

七月二十五日,在《中华妇女界》第一卷第七期上,发表俄国伦理小说《孝女救亲记》。无作者名,也无国籍。在小说的后面,写了一段话。录如下:

“伦理之学如布帛、菽粟,不可一日缺。顾晚近以来,浮滑之子每有粪土之者。……然西人于父子昆弟之道,初不稍让于吾国。往昔而抹杀事理,谓西人不事伦理,得非冤哉。陈生曙峰尽然于此,译是篇,自言旨在即以其道还治其人。余嘉其可以贬薄俗耶,乐为之参订润饰如是。”

七月三十一日,在《礼拜六》第六十一期上,发表滑稽小说《吃河豚》。署名半依。

八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八期上,

^①见刘半农《终身恨事》,载《中华学生界》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

^②根据贺麦晓(Michel Hockx)考证,刘半农采用的英译本作者是将俄国作品译入英语世界的译者伽奈特夫人(Constance Garnett, 1861-1946)。刘半农受英译本题名“Dream Tales”的影响,将屠格涅夫散文诗理解为“小说”。参见: Ivan Turgenev. *Dream Tales and Prose Poems*, trans. Constance Garnett.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897; Michel Hockx. *Questions of Style: Literary Societies and Literary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 1911-1937*.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163.

发表翻译历史小说《英王查理一世喋血记》。署名半依。

八月,《小说大观》季刊创刊。包天笑担任编辑。

九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九期上,发表哲理小说《诛心》。无作者名,也无国籍。署名半依。

九月,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自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

九至十月,在《中华学生界》第一卷第九至十期上,发表翻译少年小说《奴儿脱籍记》。

十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十期上,发表翻译哲理小说《希腊拟曲·盗江》。署名半依。在其前语中写道:“去冬十月,本界刊载启明君所译《希腊拟曲》二首,情文双绝,古色灿然,谈者每称为译林珍品,近友人蒋子,远道自美洲录寄希腊珞珞披端遗稿一章……妄译如左,启明见之,得勿嗤为狗尾续貂耶!”对周作人的译文多有称许。同日,在《小说大观》第二集上,发表翻译法国政治小说《玉簪花》。署名半依。

十一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十一期上,发表翻译社会小说《如是我闻》。署名半依。

十一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十一期上;二卷十二期续载,发表侦探小说《淡娥》。署名半依。

十二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十二期上,发表翻译哀情小说《暮寺钟声》。署名半依。

十二月三十日,在《小说大观》第四集上,发表翻译侦探小说《一身六表之疑案》。署名半依。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丙辰)二十六岁

是年春,中华书局同人合译《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毕,负责全书的校阅工作。五月,校毕,并作者小传及跋。五月,在中华书局出版印行。

一月,在《中华小说界》第三卷第一期上,发表社会小说《我矛我盾》。署名半依。

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华学生界》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法国小说《拿破仑之恩人》。无作者名,也无国籍。备注:“这篇小说后面没有评语,所有的道理在小说中表现无遗。关键是,刘半农在选择所译小说时,有所注重,这就是从关爱青年的角度

出发,给他们指出前进的道路和奋斗的目标,进行的方法和付出的代价。因此,其翻译小说或创作小说,都是有所为而发,达到教育的目的,而不是写一些消闲的小说,消磨青年的大好时光。”^①

一至六月,在《中华小说界》第三卷第一至六期上,发表国事小说《黑肩巾》(卷下),(天游原译,半依润辞)。

二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三卷第二期上,发表历史小说《拿破仑瘦死之翻案》。署名半依。

二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三卷第三期上,发表哀情小说《呱呱默默》。署名半依。

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华教育界》第五卷第二期上,发表伦理小说《逐客令》。

三月,在《小说大观》第五集上,发表翻译侦探小说《X与O》(与小青合译)。署名半依。

四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三卷第四期上,发表翻译滑稽小说《福尔摩斯大失败》(第四案)。署名半依。

五月一日,署名半依,在《中华小说界》第三卷第五期上,发表翻译滑稽小说《福尔摩斯大失败》(第五案);在《小说海》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翻译短篇小说《二十六人》。

五月,在《中华学生界》月刊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少年小说《立志难》。署名半依。

六月一日,在《中华小说界》第三卷第六期上,发表社会小说《愚民术》,其中有《国师》《叶仙》。署名半依。

六月,在《小说大观》第六集上,发表翻译社会小说《塾师》。署名半依。与以往的做法不同的是,在小说前面,刘半农对其主题作了说明。录如下:“我国旧时书塾之腐败,固已人人引为笑柄。即曾做过猢猻王、坐过冷板凳者,亦于无聊之极,咏为打油诗,自嘲勿讳也。然一读此篇,则欧美古代之学塾,其腐败一何让与我!夫以腐败不让我者,而一转瞬间,其学校制度之完备,以为我国所称誉、所模仿者。何哉?曰:此之谓社会之进步。”

六月,署名半依,在《小说大观》第六集上,发表翻译宫廷小说《韩卢忆语》,译自英国《吾主安在》;发表翻译侦探小说《铜塔》(与小青合译)。

六月,在《中华妇女界》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翻译哲理小说《安知非福》。无作者名,也无国籍。署名半依。在文末,刘半农发表关于本文的

^①见刘半农《拿破仑之恩人》,载《中华学生界》第2卷第2期,1916年1月25日。

看法。录如下：“外史氏曰：道尺而魔丈，位高而身危。福即是祸；贫可以励志，贱可以养节。祸即自福。即福，即祸。世间一切事当作如是观。”^①

七月，在《小说海》第二卷第七号上，发表翻译美国短篇小说《庸人自扰》。署名半依。无题名，也无作者名。

八月，在《新闻报·快活林》上，发表翻译短篇警世小说《赌孽》（与恺然合译）。

十月，在《小说大观》第七集上，发表翻译社会小说《柳原学校》。署名半依。发表翻译哀情小说《看护妇》。署名半依。

十一月一日，在《小说海》第二卷第十一期上，发表翻译短篇小说《丹墀血》（与恺然合译）。无作者名，也无国籍。署名半依。

十二月一日，在《小说海》第二卷第十二期上，发表翻译侦探小说《日光杀人案》（与舍我合译）。无作者名，也无国籍。署名半依。

十二月一日，在《小说海》第二卷第十二期上，发表翻译短篇小说《兄弟侦探》（与无为合译）。无作者名，也无国籍。署名半依。

十二月，在《小说大观》第八集上，发表翻译美国侦探小说《髯侠复仇记》。署名半依。

十二月六日，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翻译德国警世小说《回音》。在小说的前面，刘半农点评道：“是篇妙处，在问语之末后数字译之难。亦即每句末后数字，以中西文法不同，西文一句中之末后数字，决难尽用于中文一句中之末后数字也。吾尝细核原文，知半依译此煞费苦心矣。至原著者发明此种高妙之章法，尤非绝顶聪明人不办。瘦鹃附识。”“短篇小说文情务取朴茂，字句贵在简练。此篇纯系天籁，而妙造自然。是诚小说界中破天荒之杰作也。天虚我生志。”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丁巳）二十七岁

一月一日，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论文，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点主张。

一月一日，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翻译心理小说《磁狗》，译自英国麦道克。署名刘半依。

一月五日，在《小说海》第三卷第一期上，发表短篇小说《女侦探》。署名半依。

一月起，在《小说画报》第一至五期上，发表

章回小说《歇浦陆沉记》。署名半依。

二月一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论文，提出“三大主义”，呼应胡适文学改革的主张。

二月五日，在《小说海》第三卷第二期上，发表翻译短篇小说《失魂药》（与舍我合译）。无作者名，也无国籍。署名半依。

二月二十五日，在《小说月报》第八卷第二号上，发表翻译英国小说《交谪》（寓言）。署名半依。小说以对话的形式表达内容。丈夫的口吻，妻子的语言，都能恰如其分地表现个人的特点，符合个人的身份和思想。读者可以从双方的对话中，观察到每个人的心理状态，而不用旁白来作说明。从这一点来说，这篇小说的特点非常突出。刘半农在选择外国小说翻译的时候，考虑到他们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6]。

二月，在《小说画报》第二期上，发表短篇小说《催租叟》。署名半依。在《小说月报》第三十号上，发表翻译刺世小说《文明》。

三月，在《小说画报》第三期上，发表短篇小说《可怜之少年》（半依起稿，天笑修辞）。

三月十五日，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钱玄同托名王敬轩，发表反对文学革命、为封建文学辩护的《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刘半农以记者名义写了《文学革命之反响——奉答王敬轩书》（书信），对当时社会上的封建复古思想以及一些保守派对文学革命的非议集中批判。钱玄同与刘半农合演了一场“双簧戏”，表达了新文学家们对文学革命的坚定态度。

三月二十五日，在《小说月报》第八卷第三期上，发表侦探小说《钱虏之言》，日本式亭三马著，刘半农从英译本转译。署名半依。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剖析“我”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活动，给读者以十分真切的感觉，体现主题。

三月二十五日，在《小说月报》第八卷第三期上，发表翻译侦探小说《万国扶筐会》。署名半依。

四月五日，在《小说海》第三卷第四期上，发表短篇小说《最后之跳舞》，无作者名，也无国籍，文内所述为英国的事情。

四月二十五日，在《小说月报》第八卷第四期上，发表英国小说《新闻电稿》（寓言）。发表法国小说《村长女》（寓言）（无作者名，也无国籍）。

^①见刘半农《安知非福》，载《中华妇女界》第1卷第6期，1916年6月。

四月,翻译侦探小说《猫探》,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在《小说画报》第四期上,发表短篇小说《奴才》。

五月一日,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论文,推动文学革命。在一些具体提法上,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形成区隔。刘半农主张,文言和白话可暂处于对待的地位。其认定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与文章之进化,则将来之期望,非做到“言文合一”,或“废文言而用白话”。在文学作品(诗歌)形式上的改革方面,提出分段、句逗符号和废除圈点等三点意见。

五月十五日,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上,发表译作《诗人的修养》,署名刘半依。这是《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的一部分。

六月三十日,在《小说大观》第十至十二集上,发表翻译社会小说《卖花女侠》。署名半依。

七月一日,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上,发表《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论文,署名刘半依。文章介绍英国约翰生和美国樊戴克的文学思想,表达关于诗歌和小说改革的见解,继续鼓吹文学革命。对于小说,刘半农主张,小说是社会教育的利器,潜移默化影响人的思想观念。因此,必须主张利用小说转移世道人心。

八月,刘半农翻译日记体小说《乾隆英使觐见记》,在中华书局出版。在《序》中写道,原书共三卷,今译本不分卷。他认为,这类书有“剔抉隐秘,道人未道,以补正史之缺”的作用^[7]。

八月二十五日,在《小说月报》第八卷第八期上,发表翻译社会小说《稗史罪言》(连载)。署名半依。

九月五日,在《小说海》第三卷第九期上,发表翻译短篇侦探小说《地图与珠》(与舍我合译)。无作者名,也无国籍。署名半依。

十一月,在《小说时报》第三十三号上,发表翻译英国短篇小说《恶作剧》(与无为合译)。署名半依。

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小说月报》第八卷第十一期上,发表翻译社会小说《稗史罪言》(连载)。署名半依。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小说月报》第八卷第十二期上,发表翻译社会小说《稗史罪言》(连载)。署名半依。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小说月报》第八卷第十二期上,发表翻译短篇小说《猫之圣诞》。署名

半依。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 戊午)二十八岁

一月十五日,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一期上,发表了《应用文之教授》,毅然将文章的署名由“半依”改为“半农”,下定决心不再写那些“吴侬软语”般的缠绵悱恻之作,而要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呐喊^[8]。字号的改变,意在除旧布新,以名言志。因此,在这一期上刊载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应用文之教授》署名是刘半依,而另一篇是《新文学与今韵问题》署名是刘半农。

一月十八日,出席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小说科第三次研究会,在会上作了题为“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的演讲。

三月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作关于小说研究的演讲。

三月二十九日,出席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小说科第五次研究会,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之下等小说”的演讲。

四月十九日,出席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小说科第六次研究会。从该日起,至五月三日,和周作人、胡适一起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教授小说。

五月十七日,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和周作人、胡适一起作关于小说研究的演讲。

七月十五日,在《太平洋》杂志第一卷第十期上,发表翻译小说《最后之一叶》。

八月十五日,周作人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上,发表译文《改革》。在《按语》中透露,刘半农欲造一个“她”字,与“他”字并用。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 庚申)三十岁

一月下旬,在会上,议论“鸳鸯蝴蝶派”问题。“鸳鸯蝴蝶派”的名称,由此得名。

八月九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她”字问题》,首创“她”“它”二字。

参考文献:

[1][3]姚涵.刘半农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173-177;173-177.

[2][4][5][6][7]郭长海.刘半农前期研究[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4:39;12;12;76;68.

[8]徐瑞岳.刘半农评传[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66-67.

责任编辑:邓双霜

阿卡迪亚与牧歌起源

曹 波, 姜承希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0)

摘 要: 阿卡迪亚的经济模式与早期共同体为牧歌的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 而潘神崇拜则为牧歌提供了必备的形式元素。当忒奥克里托斯这位来自他乡都市的有深厚艺术素养的诗人站在自己的角度打量阿卡迪亚的时候, 牧歌就诞生了。也就是说, 牧歌不是阿卡迪亚牧人的创造, 而是城里人通过文学想象为城里人创造的关于乡下牧人生活的田园乌托邦。阿卡迪亚成就了牧歌, 也在悠久的牧歌传统中逐步演变成一个具有永恒意义的文化符号。

关键词: 阿卡迪亚; 牧歌; 潘神崇拜; 田园乌托邦

作者简介: 曹波(1968—), 男, 湖南益阳人,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爱尔兰及英国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WW051)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59(2019)04-0145-07 **收稿日期:** 2018-10-19

当布鲁诺·斯奈尔说“阿卡迪亚是公元前 41 或 42 年被(维吉尔)发现”^①的时候, 他所谓的“阿卡迪亚”已非百科全书里描述的那个被多道山梁与外界阻隔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的崎岖山地, 而是被维吉尔虚幻化了的一个田园乌托邦。也就是说, 文学或文化意义上的阿卡迪亚的确是由维吉尔“发现”或“创造”的。但是, 第一位以文学形式正面书写地理学意义上的阿卡迪亚的决非维吉尔, 而是他的希腊前辈, 如品达、忒奥克利托斯等。品达只是在其诗歌中以阿卡迪亚作为背景来讲述潘神的故事, 忒奥克利托斯则不但多次在自己的诗歌中提到潘神的领地阿卡迪亚, 还摹状那里的自然景观与牧人的生产生活。忒奥克利托斯因此被公认为欧洲牧歌传统的首倡者。

一、作为地理空间的阿卡迪亚

忒奥克利托斯时代及其之前的古阿卡迪亚与现在的阿卡迪亚地区略有不同。古阿卡迪亚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中心地带, 是一片被多座山脉与外界阻隔开来的内陆山区。它的北面以厄瑞曼托斯山、阿洛尼亚山和基利尼山为界与亚加亚地区相邻(阿洛尼亚山大部分都在阿卡迪亚界内); 东面自北向南以基利尼山、奥里格特斯山和帕塞尼乌斯山为界与阿尔戈利斯和科林西亚接壤。在南部, 帕农山脉和泰格托斯山脉把阿卡迪亚与南部拉科尼亚和麦西尼亚二地区两两相隔, 使得半岛上最长河流阿尔菲厄斯河的中上游几乎全处于阿卡迪亚境内。在西南方, 诺米亚山和埃拉乌姆山分别成为阿卡迪亚与麦西尼亚和埃利斯两个地区的边界。西部自北向南流向的厄瑞曼索斯河的一部分成为与埃利斯的边界。除了帖戈雅和麦格罗普利斯周边小片平原以及阿尔菲厄斯河和拉顿河谷地之外, 阿卡迪亚的其他地区全是山地。

^① Snell, Bruno: Arcadia: The Discovery of a Spiritual Landscape, The Discovery of the Mind. Tr. T. G. Rosenmeyer, Blackwell, 1953, P281.

阿卡迪亚地区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属于典型的地中海式气候。总体上说,这里降水丰富、环境宜人;虽不适合农耕,却是天然的牧场,是绝佳的牧羊之地;山林里栖息着无数动物,也使它成为猎人的天堂。

阿卡迪亚人是古老的原生民,公元前12世纪多利安人开始入侵之前他们就生活在那里,世代在这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田园生活。阿卡迪亚原文arkadia中的ark-原意为“躲避”,后来才有了“方舟”之意;-adia则指“阎王”;二者结合就是指躲避灾难的意思。由词源可见,阿卡迪亚在其原初时期就有避难之所的意思,这与我们文化中的“桃花源”如出一辙。

独特的自然环境和近乎封闭的生存空间造就了阿卡迪亚以畜牧、狩猎为主的独特而恒久的经济模式,也使其成为希腊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个地区。在阿卡迪亚,除了西南部平原及河谷地带人口相对稠密外,山里的居民多分散而居,与世无争,生活悠闲而散漫,以至于当希腊其他地区相继进入并长期维持城邦制社会结构的时候,阿卡迪亚却始终未能形成堪与雅典、斯巴达等媲美的城邦。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为抗衡南部强大的斯巴达,阿卡迪亚人汇聚几乎所有力量建立了麦格罗普利斯城,但该城从建立到被斯巴达侵占并毁灭,统共不过半个世纪。可以想见,一个内陆的多山地区想要实现富强的梦想该有多么困难。不招惹,不抗衡周边强大的城邦,满足于与世无争、悠闲散漫的生活自然成为阿卡迪亚人维持生存的最佳选择。事实上,满足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是包括阿卡迪亚人在内的所有幽闭民族的普遍心理。当然,正如这里世代的人们期望不被外部世界干扰一样,阿卡迪亚也注定成不了外部界关注的核心。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世纪忒奥克里托斯开始诗歌创作之前。

二、神话、历史与阿卡迪亚早期共同体

如果人类确曾有过天人合一的时代,那么阿卡迪亚人对此应该最有发言权。据古老传说,阿卡迪亚国王吕凯厄斯犯下了严重罪过。关于其所犯之罪,说法不一。有的说吕凯厄斯把自己的孩子作为祭品供奉给宙斯;有的说是他请宙斯到家里做客,试图诱使宙斯品尝他儿子的肉;甚至有的还说,他企图诱使宙斯到他家里,趁黑夜将其杀死。无论如何,反正是惹恼了宙斯。作为惩罚,宙斯将吕凯厄斯变成了一匹狼。从此,狼就成了阿卡迪亚人的图腾。这个具有原始宗教色彩的神话充分体现了阿卡迪亚人与自然合而为一的存在关系。

作为初民自然观、世界观重要载体的神话与现实世界永远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正如拉斐尔·贝塔佐尼所说,“神话是真实的历史,”因为它“不是纯粹杜撰的产物,不是虚构的无稽之谈,而是历史;它是‘真实’的故事而不是‘虚构’的故事。”^①阿卡迪亚幽闭、宁静的空间环境在催生出独特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衍生出独特的神话体系;这些神话又反过来影响了世世代代的阿卡迪亚人,使他们坚信自己生产、生活方式的神圣与不可替代性。原本属于神话的某些内容也渐渐演变成社会规约,融入到阿卡迪亚的日常生活之中。

融入生活的神话成为阿卡迪亚传统文化得以恒久维持的精神力量。阿卡迪亚人长期保持着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主要以牧羊、狩猎为生。他们的膳食结构极为简单;如神话里所说的那样,橡子成为他们的主食之一。简约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使阿卡迪亚人养成了淳朴、善良的性情。据古希腊史学家忒奥彭普思记载,古阿卡迪亚人性情质朴,待人宽厚;虽有阶层划分,却更具平等观念。他们准许奴隶和主人在宴会时同席,一起吃自助餐,还可以共享一个调料碗。^②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像是出自18世纪关于美洲土著快乐生活的纪实文学。但是,这些描写的确符合忒奥彭普思的一贯风格,他的作品中其他地方也不时出现类似的具有乌托邦色彩的记载。罗森梅耶尔认为,忒奥彭普思刻意选择了阿卡迪亚人这个群体作为彰显纯朴而无欺诈、知足长乐且无阶级障碍的早期共同体的范例。^③尽管忒奥彭普思因为过于喜欢记录浪漫而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故事而常受后人诟病,但既然是史学家,他的记载总是要有可靠性的。由此看来,后来阿卡迪亚文化内涵的逐步丰富也并非纯粹是神话与文学的功劳,还理应有历史的积淀。

当然,在阿卡迪亚丰富的神话故事中,最能体现和解释阿卡迪亚人与自然合而为一存在关系的当属潘神

① 拉斐尔·贝塔佐尼:《神话的真实性》,阿兰·邓迪斯:《西方神话学读本》,金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5页。

② Rosenmeyer, T. G.: The Green Cabinet: Theocritus and the European Pastoral Lyri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P234.

③ Rosenmeyer, T. G.: The Green Cabinet: Theocritus and the European Pastoral Lyri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P234—235.

崇拜。

三、潘神崇拜与牧歌诸元素的形成

在希腊神话中,潘神是牧群、牧人、森林和荒野的守护者,是一位纯粹的乡村神祇。一些神话认为,潘神与宙斯同代,甚至比其更早;但多数神话则认为他是信使之神赫尔墨斯的儿子。潘神出生时非常丑陋,虽是人面人身,却长着山羊的角、尾巴和双腿;他自幼遭到了母亲的遗弃,遂终身流浪于荒野,与林间仙女为伴,还创造了乡村音乐。和希腊神话中许多神祇一样,潘神也是一个情种;他的情感故事一大箩。潘神还有一种令人讨厌的习惯,就是常藏在树林里,用突然的喊叫或恐怖的笑声惊吓过往的行人,让他们心生恐惧——他的名字也因此具有了“恐慌”(panic)的内涵。他这个令人生厌的习性日后反而助其成就了不朽业绩。一次是在提坦神对奥林匹斯神的叛乱和攻击中,潘神声称自己也应享有胜利者的荣耀,因为他在叛乱者中引起了恐慌。另一次是在雅典人反击波斯人的马拉松战役中。据说,当时潘神站在雅典人的一边,在敌人心中激起了恐慌。

在古罗马诗歌中,潘经常与弗恩努斯一起出现,有时甚至被等同起来。但就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的描写来看,弗恩努斯性格相对复杂,是一个集理性与感性为一体的形象。因此,在维吉尔之后的文学传统中,弗恩努斯较少被用作牧歌中闲适和简单的象征。每当表现天真和嬉闹时,罗马诗人通常让弗恩努斯与潘结伴登场,以保持理性与感性的平衡。可见,罗马神话与文学中的潘神是感性的象征,这也与希腊神话与文学中的潘神形象相吻合。

潘神崇拜始于阿卡迪亚,因为这里是他的家乡和最主要的“道场”。作为地位并不崇高的乡村神祇,潘神的祭坛通常散布在远离城市的荒野;即便极个别出现在城市的边界之内,也通常不是人工所建的寺庙,而是象征荒野的洞穴。潘神的影响很长时期内仅仅局限于阿卡迪亚地区,是上文提到的马拉松战役让其声名远播;此役之后,在雅典、阿提卡等许多地区,人们纷纷以山洞为圣坛对潘神虔诚膜拜。

潘神崇拜对西方文化最重要的影响莫过于成就了悠久的牧歌传统。很显然,西方古典牧歌所包含的核心元素均能从潘神及潘神崇拜中找到原型或踪迹。

首先,潘神所代表的经济模式是古典牧歌赖以形成的社会基础。潘神一直被认为是荒野、山林与牧场的完美产物,是土生土长的阿卡迪亚牧人的神圣化身,是典型的乡村畜牧经济和远离都市的田园生活的象征。作为潘神专属领地的阿卡迪亚是一个畜牧经济发达的地区,而且狩猎也比在希腊其他地方更重要。^①在潘神的领地,由于这种特定经济模式的主导作用,狩猎自然不会“沦落”到娱乐运动的层次。因此,作为猎人、猎物、牧人、牧群守护者的潘神犹如万物之主一般受到猎人和牧人的共同敬拜。“正如阿卡迪亚的整个历史和文化所展示的那样,阿卡迪亚的潘神似乎为我们带来了一个与被称为古典的希腊截然不同的世界。”^②阿卡迪亚由此成为与希腊其他地区相隔离的独特经济体。

随着牧歌的兴起,阿卡迪亚逐渐由原来的“避难之所”演变成为一个逃离烦恼的隐逸之地,由一个原始质朴的地理空间演变成为一个乌托邦式的空间符号;其经济模式自然也化作一种文化符号延传至今。

其次,潘神“创造”的牧笛和乡村音乐是古典牧歌的精神内核。我们说潘神成就了牧歌传统,不仅仅因为他是牧人的守护者,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音乐才能。牧歌传统很大程度上是从潘神创造的乡村音乐衍生而来的。

关于潘神创造排箫的传说是这样的:河神兰顿的女儿绪林克斯是阿卡迪亚一位美丽的小林仙。有一天,她打猎归来,迎面碰上了潘。美丽的仙女不理睬潘神的恭维,匆匆逃离,以免被其纠缠。潘从莱希乌姆山一直追到众仙女的驻地,姐妹们迅速把无处藏身的绪林克斯变成了一株芦苇。于是,风(也有说是潘神的叹息)吹进芦苇,便奏出哀伤的乐曲。痴心的潘神不能确认哪一株芦苇是心上人所变,索性砍下7株(一说9株),将其按递减长度编排在一起,制成一种乐器,并以心上人的名字命名。从此,这种乐器便与潘神形影相随,永不分离。这与太阳神追求达芙妮的故事如出一辙。阿波罗与潘两位音乐之神的爱情故事分别为西方文化传统提供了两个典型的符号:前者是代表荣耀的桂冠,后者则是牧歌中的牧笛。桂冠的文化意蕴之深远自不必

① Borgeaud, Philippe: The Cult of Pan in Ancient Greec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5.

② Borgeaud, Philippe: The Cult of Pan in Ancient Greec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4.

说,仅就牧笛(或其变体)而言,它作为欧洲牧歌中牧人的典型装备,也早已超越了其具体的娱乐功能而升华为代表牧人精神特质的符号了。

在西方文学艺术的悠久传统中,吹笛子的潘是非常突出的母题:潘神象征着牧歌式的闲适、放松以及性兴奋;牧笛奏出的曲子则是姑娘们乡村舞蹈的最佳伴奏。牧神的生活方式其实就是自古以来牧人生活方式的写照。牧人在孤寂的地方照料畜群,他自然需要一种排遣孤独的方法;因为笛子易于制作和携带,他们很自然就以吹奏自制的笛子为乐。

我们当然清楚,无论排箫还是笛子,都是人之创造,而非神祇之功;因为,就连潘神也是由人创造出来的。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曾详细分析过潘神和以芦笛为代表的乡村音乐的缘起。据他推测,是乡下人根据山谷里的回声创造了潘神和他的笛子:

在荒僻的地方,山岩会以适当的次序反射我们的声音。当我们在沉郁的群山中寻找迷路的同伴时,我们用响亮的声音呼唤他们。我知道一些地方,你在那里发出一个声音,就会连续听到有6到7次回声;这些声音在山间来回飘荡,仿佛是受过训练一般。

当地人认为,这些地方是仙女和森林之神的栖息之地,是林牧之神的家园;他们喧闹、嬉戏的狂欢常常打破夜晚的宁静。人们会听到丝竹之音在夜空荡漾。他们还说,当地的村民都听到过潘[……]吹奏的不绝如缕的美妙笛音。[……]他们鼓吹这些神迹的动机也许是害怕被认为他们居于荒僻之地,孤独无助,以至于连神都将他们抛弃。^①

卢克莱修的确看穿了这些乡下人的心理,也解释了神话产生的部分原因。事实上,人类为自己寻求精神安慰正是神话诞生的原因之一。这种神话创造过程在神话学中被称作“情感投射”,它“不是审美的,而是实用的,即表现为神话创造者的希望。”^②就阿卡迪亚人来说,他们创造与潘神相关的种种神话的重要目的是为自己所坚持的生产生活方式寻求一个牢靠而合理的依据;他们要藉此告诉世人,他们不但没被神灵抛弃,而且还沿袭着由神明开创的神圣的生产生活方式。

基于自己对神话本质的揭示,卢克莱修进一步对音乐的诞生、笛子的发明与牧人生活的关系展开了精彩而更为可信的探讨:

人们经常用嘴模仿清澈婉转的鸟鸣,终于学会了演唱悦耳动听的歌。风通过芦苇管腔发出的哨音启发乡下人:空心茎秆可以吹出声音。经过不断摸索,人们掌握了用手指击打腔管上面的音孔发出美妙音符的方法。于是,就在那人迹罕至的树林和林间空地,在旷野中休息的孤独的牧羊人发明了笛子。吃饱喝得之后,牧人们就用这种音乐抚慰自己的心灵;因为那是一个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带来快乐的时代。因此,牧人们常常会躺在溪边大树下天鹅绒般柔软的草地上,让他们的身体享受简单而惬意的放松,尤其在天气晴好,绿草间缀满鲜花的时候。然后就会有笑话、闲聊和愉快的笑声;那时候,乡村缪斯的状态最佳。接下来,在嬉闹欢乐的驱使下,他们会用花环和树叶来装饰他们的头和肩膀,然后在一场没有节奏的舞蹈中笨拙地扭动他们的四肢,用笨拙的双脚击踏着大地。这些表演令人愉悦,不时引发阵阵笑声,因为这些娱乐活动新颖而美妙,在那个时候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这个古老的传统至今仍被守望者所保留。尽管守望者们早已学会了打节拍,但他们从自己的音乐中获得的乐趣并不比那些林地之人与大地之子们从他们那原始的音乐中获得的更多。^③

至此为止,卢克莱修将潘神、回声、乡村音乐联结成一幅声音同质而意蕴多彩的画面,形成一种充满理性的神话学理念。但是,文学作品的大量描绘暗示我们,笛子并非潘神的唯一乐器。除了笛子,潘还常常携带简单的打击乐器;有时候,打击乐器碰撞的声音会产生一种骇人的音效,使人联想到潘所引起的恐慌。换句话说,潘的音乐不仅仅是美妙的旋律;他的音乐与其性格一样,本质上聚集着更大的能量;而这种能量是通过用简单乐器模仿野外自然的声音实现的。我们只要联想一下神话中潘神和艾科(Echo意为“回声”)的关系——潘神曾一度追求艾科而不得——就更能理解上述说法的逻辑及其可能性了。

① Lucretius Carus, Titus; On the Nature of Things, Trans. Martin Ferguson Smith,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1, P116.

② 鲁刚:《文化神话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9页。

③ Lucretius Carus, Titus; On the Nature of Things, Trans. Martin Ferguson Smith,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1, P174—175.

再次,作为守护者与攻击者复合体的潘神是牧歌人物多元性的象征。潘神既是牧人又是猎人,是守护者与攻击者的复合形象。潘神首先是牧人保护者,这种形象稳定而持久,自其被定义始,就没再发生改变。但是,在西方艺术中,潘神又常被塑造成猎人的形象:除了永不离身的排箫(或牧笛)之外,更为突出的是他携带的那根曲柄手杖(lagobolon 意即 hunter's stick)以及肩上扛着的猎物。这根曲柄手杖是一种攻击性武器,原意就是击杀兔子的工具,当然也用作防守武器。这种曲柄手杖后来成为猎人和牧人的标准装备之一。可以肯定地说,潘神原本主要是位猎人。但在牧歌中的职业类型里,狩猎的确又是一个不太好评价的职业。因为,作为人类的谋生手段,狩猎却侵害着那些生机勃勃的野生动物的生存权,同时,其潜在的侵略性也打破了林间的宁静;打渔的生产方式也是如此。无论狩猎还是打渔,都说明潘是一个攻击者;就连他的好色的本性也成为其攻击性力量的侧面反映。可见潘神性格的突出特征就是其难以控制、随时可能爆发的强大能量。古希腊诗人、批评家卡里马库斯用灰烬里沉睡的火种来喻指潘和狄奥尼索斯,暗示他们是一种经过一定的潜伏期终将爆发、重获新生的力量。可见,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潘神已渗透入古希腊人的灵魂之中。公元2世纪希腊职业占卜家阿特密多罗士在其《梦的解析》中解释道:梦见潘神对于牧人和猎手来说是吉兆;对于演员也是吉兆,因为演员们和潘一样没有固定的步态;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就可能是凶兆了。这种解析主要是基于潘神形象的特征,可见潘神崇拜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普及程度。潘神形象为牧歌提供了诸多人物原型,对这些人物的解读势必要回归其原型。那些仅仅将牧歌中的猎人解读为一种职业形象,而不去发掘其深层内涵的做法势必触及不到猎人形象的本质。

事实上,由于潘神的性格暴躁,受其守护的牧人对他也多有忌惮。他会驱逐未经允许闯入他领地的牧人;即便是被允许进入其领地,牧人们也都非常谨慎。忒奥克利托斯在其第一首牧歌《达夫尼斯之死》中就描绘过牧人的慎重,因为他们知道潘就在附近且不喜欢别人打扰:

不,牧羊人,不,在这炎热的午间
我可不敢吹笛;因为狩猎劳累的潘
此时正在休息;我害怕惹他老人家
发脾气。(17—20)

无论如何暴躁,如何具有攻击性,这一切主要不是针对牧人和牧群。就牧人对他的敬仰程度来看,潘神是一位合格的守护神。大多情况下,他并不是一个暴力形象,而是一位喜欢热闹的角色,会与众仙甚或牧人一同狂欢。潘神无疑是牧歌中性格多元的牧人与猎人形象的基本原型。

最后,与潘神一样,牧歌人物也多是孤独的漫游者和情感饥渴者。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喜欢热闹的潘神其实是一位孤独的漫游者和情感饥渴者。他虽被认为是丰饶、生殖力和春天的象征,却深受情感孤独的困扰。发生在他身上的众多情感故事证明,他虽有众仙女为伴,却始终得不到真正的爱情。宁愿化作草木也不愿屈服的仙女绪林克斯和庇蒂斯似乎激发了潘神的一腔痴情,成为他永恒的眷恋与伤痛。庇蒂斯的故事与绪林克斯的故事很相似:说是潘神爱上了仙女庇蒂斯,后者为逃避他而化作了一株松树。于是,潘神便终日流连于林间了,松树也成为潘神的圣树。大量故事证明,潘神的情感大多为滥情,仅有的几次倾注真情的爱情却皆以悲剧告终。无论是滥情还是真正的爱情悲剧,均在后来的牧歌中反复上演,前者如色情牧歌中的男欢女爱,后者如忒奥克里托斯的独眼巨人、维吉尔、马维尔的达蒙等的爱情悲剧。这不禁又让我们联想起希腊神话的悲剧特质对包括史诗、戏剧和牧歌等在内的欧洲文学传统的深远影响。

我们当然还可以对上面提到的潘神与月亮女神及回声女神艾科的故事更进一步展开牧歌式解读。我们很容易解释牧羊人对月亮的爱,因为在月朗之夜,羊群更容易看管。当牧人在山谷或树林中呼唤同伴或者走失的羊只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可怕的回声,这不禁让他们想象是潘神在悬崖和沟壑中制造了可怕的噪音,而艾科则将其放大并反复播放。可见,神话创造如文学创作,是生活经验与想象力相结合的产物。卢克莱修关于神话诞生的论述就是先贤们善于总结生活经验的优秀实例。

四、牧歌的形成

阿卡迪亚的经济模式与早期共同体为牧歌的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而潘神崇拜则为牧歌的诞生准备好了必备的元素。一切预示,阿卡迪亚将注定成为牧歌的故乡,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无论是依据神话传说还是历史事实,牧歌都不是由阿卡迪亚人首创;其开创者另有其人——这人来自大希腊西西里岛的忒奥克里

托斯。悠久的牧歌传统就是这位站在自己的角度打量阿卡迪亚的来自文明世界的有深厚艺术素养的诗人创造的。

我们考察古代阿卡迪亚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时注意到,他们尚处于较为原始的社会形态,很难出现能够将自己的社会生活付诸艺术实践的文学艺术人才,漫长的阿卡迪亚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直到进入近现代社会,阿卡迪亚才诞生了本土诗人。但是,对于已经文明开化的古希腊诸城邦国家的人们来说,阿卡迪亚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简朴、散漫而富有诗意,是令人羡慕的。也就是说,阿卡迪亚就是一首牧歌,那里的人们就生活在牧歌里;而发现这首牧歌的却是在站在远处凝视着这一切的那个(些)人。正如威廉·燕卜苏所说,牧歌“专写(牧人),却又不是由他们书写和为他们而写。”^①这是传统牧歌的典型特征之一。牧歌诗人是要借助对牧人生活的展示,以间接、含蓄的方式对自身所处的生活形态进行审视,展开批判。所以,牧歌从一开始就是对田园生活充满向往的城里人的专利。城里人之所以对田园生活充满情感,是因为对其原始生境的怀恋;而正是作为人类共同原始生境的荒野、溪谷、丛林在守护着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这种原始生境意识以一种文化基因的形式世代相传、恒久罔替。每当走向城镇或其他生活环境的人们突然发现他们失去了宁静与快乐,进入了一个充满焦虑和苦恼的樊笼之时,他们便怀恋起他们原本属于的那个生境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就是这种心理的写照。田园诗歌这种文学形式正是在人们追求质朴、率真的思想情感以及渴望与都市生活相对应的田园风光和乡村生活的语境下诞生的。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田园诗从本质上很好地体现了艺术对人类愿望的满足功能,它反映了人类“对纯真与快乐的双重渴望。”^②田园诗是一种怀旧的、童稚般的看待世界的方法;而牧羊人受到诗人们的尊敬则因为他们是“有闲阶级的理想化身。”^③所谓的“有闲阶级”就是指城里的王公贵族、文人墨客之流,田园诗人多出自这个群体。他们借助对下层劳动者牧人、牧女的劳动、生活与爱情的理想化描绘,为有闲阶层提供一种可供逃避的精神空间,是有闲者在为有闲者美化劳动者。用燕卜苏的话说就是,田园诗人是在为其所处群体书写另一群体的生活与故事。^④所以,田园诗通常被界定为都市文化的产物,它源自乡村与城市两种生活模式的对立。^⑤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歌理论家乔治·帕特纳姆曾在《英国诗歌艺术》中形象地描绘了牧歌的形成过程:将牛群或羊群赶往野外的公用田地和树林里,让它们自由觅食,而牧人们则和那些护林人或护篱人聚在一起以聊天消磨时光,这成就了田园诗里最早的对话形式;树丛里或树荫下,他们或闲聊家长里短,或阔论身外之事,此则成就了最早的论辩;出于肉体与安逸的需求,便有了求爱与寻欢;他们唱给配偶或情人的歌便成为最早的爱情乐章;有时也未免边唱边配以管弦,大家来比试一番,看谁最优秀,最迷人。帕特纳姆坚信,田园诗就是在这浪漫、惬意的生产劳动中诞生的。^⑥

在帕特纳姆的描绘中,我们看到了阿卡迪亚人的真实生活图景,因为它符合阿卡迪亚牧人的生活实际。这段描绘也许是迄今关于田园诗歌形成过程的最接地气、最接近现实的解释。更为重要的是,该描述揭示了牧歌主题的升华过程:由物理空间(山林、草地等)到社会空间(与他人交际)再到精神空间(娱乐、爱情等精神需求);也就是说帕特纳姆发现了牧歌逐步将牧人理想化(或虚化)的基本特征,从而抓住了古典牧歌的本质。毋庸置疑,牧歌从一开始就深受关于潘神的古老传说的影响,承袭了阿卡迪亚这个地方的乌托邦特征。因为帕特纳姆的描述,才有了雷内·拉宾关于田园诗是“对牧人或具有牧人特质的人的行为的模仿”^⑦的定义,也才有了20世纪美国学者列奥·马克斯“没有牧人,就没有田园诗”^⑧的观念坚守。理论家们之所以坚持上述观点,主要原因是他们在阿卡迪亚牧人身上发现了易于被乌托邦化的品格特质,而这些特质自然又是超越阿卡迪亚而具有普遍性的:

首先,牧人的劳动生活惬意而散漫,是一种精神化的过程。牧人无需像农人那样为生计而辛苦耕耘,“自

① Empson, William: Some Versions of English Pastoral.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74, P6.

② Poggioli, Renato: The Oaten Flute: Essays on Pastoral Poetr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

③ Poggioli, Renato: The Oaten Flute: Essays on Pastoral Poetr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6.

④ Empson, William: Some Versions of English Pastoral.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74, P6.

⑤ Kermode, Frank: English Pastoral Poetry: From the Beginnings to Marvell. George G. Harrap & Co. Ltd., 1952, P14.

⑥ Puttenham, George: Arte of English Poesie. Printed by Richard Field, dwelling in the black-Friers, neere Ludgate, 1589, Chap. 18.

⑦ Congleton, J. E: Theories of Pastoral Poetry in England 1684—1798.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1952, P157.

⑧ Gifford, Terry: Pastoral: The New Critical Idiom. Routledge, 1999, P1.

然为牧人提供了大部分的需要。更令人满意的是,自然干了几几乎所有的活儿。”^①因此,牧人对自己的前景最自信、最无忧,这为他们创造出比其他任何职业都更为广阔、自由的精神空间。

其次,牧人每天面对的是纯粹自然状态的事物(包括他们的牧群),而不是被社会异化了的人,因而他们保持着纯朴、自然的天性。在自然的熏陶之下,牧人们即便没有文化启蒙,也仍然拥有浪漫的基因。也因此,与农夫相比,牧人精神更接近天然:农夫通过改造自然而获取生产、生活资料,其实已有被社会异化的迹象;牧人无需改造自然,他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弗里德里克·席勒把田园诗与童年时代及儿童般的质朴联系起来,认为自然当中有我们不可磨灭的童年印记;诗人或因其自然而成就素朴,或因其追求自然而变得感伤。^②田园诗人所追求的就是牧人身上那种如儿童般质朴的品质。

再者,牧人的笛声或歌声虽然听众不多——不外乎他们的牧群或三两同伴(或情人)——却宣泄着孤独的情感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与牧歌诗人的心理十分相近。牧歌中有大量对牧人情感的描写,其实质是反映诗人本人的情感孤独。

最后,牧人是个原始意象,其原型可追溯到农耕开始之前的远古祖先。因此他具有了更深远的象征意义——牧人与文明社会的人们有着两极倾向,通过两相比较而展开对异化人类的批判是牧歌的核心价值。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牧人形象可说是人类原始生境的象征,是诗人们表达返璞归真愿望的最佳选择。换句话说,诗人们书写牧人并非是要关注他们的劳动生活,而是要创造一种邈远的效果,让诗人借以暂时退出并远距离审视和评判他们现实所处的社会;因而,牧歌中那种阿卡迪亚共同体式的乡村生活既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艺术手段。这一点在悠久的牧歌传统中不断得到证实。

由是观之,牧歌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文学道路。它不但远离了古希腊盛行的史诗传统,从宏大、粗狂的外部世界回归到细腻、敏感的精神空间;也没有追随赫西俄德开辟的以现实的奋斗重归黄金时代的道路。赫西俄德本人就是生活在乡村的自耕农,他有乡村生活的现实根基,这使他很快就能从黄金时代的梦幻回到现实之中,而且相信要重归黄金时代,必须付出现实的奋斗。但在牧歌传统中,诗人们个个都是带着乡下人面具的城里人,他们无有乡村生活基础,所以倾向于符合自身心理需求的表达方式。

了解牧歌的形成过程之后,我们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阿卡迪亚最终没有成为牧歌的故乡,这完全符合牧歌创作的艺术规律:城里的有闲人为有闲人书写乡下的劳动者。因为,田园诗人笔下那些身居社会下层的现实中的牧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们的劳动场面怎么会那样的惬意多彩,他们的生活空间怎么会那样的令人向往。现实使他们不可能有创作与欣赏的能力与冲动,也就不可能成为田园诗的作者和读者。既然田园诗的作者和读者不属于劳动阶层,其中所寄托的理想定然会不同程度地反映出诗人们的矛盾心理。田园诗人的任务之一就是把这些矛盾对立的元素有意识地统一起来,达到一元和谐。也就是燕卜苏所谓的“把复杂变简单。”^③所以,田园诗人的表达方式就是纯粹的文学想象。正是这个想象的翅膀将田园诗歌带往渺远的方向——一个处处存在却又处处不在的田园乌托邦。总体来说,田园诗歌中所充斥的空想和虚幻的生活不是诗人们自己所熟悉的,他们不过是要拿那种生存方式作为对现实生活的逃避或反叛,是寄托一种社会理想,也是对现实社会的侧面批判。

[责任编辑 海 林]

① 利奥·马克斯:《花园里的机器:美国的技术与田园理想》,马海良、雷月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② 席勒:《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伍蠡甫、胡经之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73—496页。

③ Empson, William: Some Versions of English Pastoral,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74, P22.

贝克特对中国文化的挪用与对乔伊斯的扬弃

曹 波

内容提要: 在早期创作中,贝克特深受乔伊斯“文字革命”的影响,倾心素材的铺陈和机巧的展示。其小说处女作《春梦》对中国文化的大肆挪用就体现了他对业师的膜拜和炫耀自身学识的冲动。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在第二部小说《莫菲》的创作中,他竭力摆脱乔伊斯的影响,从“扩展”性艺术走向“收缩”性艺术,用典日趋简洁,中国文化的印记随之锐减。在其后续作品中,中国文化几乎销声匿迹,这一骤变取决于贝克特对乔伊斯创作手法的扬弃。中国文化从滥用到弃用,是贝克特自我意识迅速崛起的结果,与扬西贬东的“东方学”无关,体现了他创作方向的重大转变。

关键词: 贝克特 中国文化 乔伊斯 扬弃

中图分类号: I7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29(2011)01-0141-08

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DOI:10.16430/j.cnki.fl.2017.01.018

Title: Samuel Beckett's Allusions to Chinese Culture and Sublimation of James Joyce

Abstract: Early in his career, S. Beckett was so greatly influenced by J. Joyce's "Revolution of the Word" that he succeeded to the latter's habit of grafting. The excessive allusions to Chinese culture in his virgin novel *Dream* is an illustration of his worship of Joyce and impulse to show off his knowledge. While writing his second novel *Murphy*, Beckett tried to escape Joyce's shadow and preferred art of "contraction" to art of "expansion." Here his allusions are so economical that Chinese culture is much less hinted at. In his later works, he hardly mentioned Chinese culture. This instant change results from Beckett's sublimation of J. Joyce rather than his Europe-Centered "orientalism," and illustrates the quick awakening of his self-consciousness as a creative writer.

Keywords: Samuel Beckett, Chinese culture, James Joyce, sublimation

Author: Cao Bo, Professor,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Province, China. Email: caobo200205@sina.com

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是爱尔兰出生的第三位诺贝尔奖作家,早年对乔伊斯(James Joyce)亦步亦趋,以推进其“文字革命”(the Revolution of the Word)为己任,后以“极简主义”(minimalism)创作手法和“无能、无知”(McDonald 15)主题与其分道扬镳。他不懂汉语,但在早期小说中经常挪用中国文化。据保存在英国雷丁大学“贝克特国际基金会”的小说手稿,他是通过法语和英语了解中国文化的。1928 年底,他来到巴黎高师担任英语讲师,其间结识了正在欧洲文坛叱咤风云的同乡乔伊斯,并接触了因庞德(Ezra Pound)等人的推介而风行于西欧的中国文化。1932 年 1 月,他从闭塞的都柏林移居先锋派聚居的巴黎,2 至 6 月创作了长篇处女作《春梦:从靓女到庸女》(*Dream of Fair to Middling Women*)。这期间,受乔伊斯纵横捭阖的创作手法的巨大影响,贝克特参阅了法国东方学者拉卢瓦(Louis Laloy)的《中国音乐》(*La Musique Chinoise*)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 A. Giles)的《中国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等书,不免在《春梦》中摆弄中国文化,展现自己喷涌而来的学识和对现实主义叙事传统的调侃,为爱尔兰独立以来挪用中国文化最积极但剔除也最迅捷的先锋派作家。

《春梦》对中国文化的大肆挪用

在巴黎高师任教期间,同样主修法语和意大利语的贝克特很快成了乔伊斯的圈内人士。当时,已然成名的乔伊斯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文字革命”,但苦于眼疾,阅读、书写多有不便,二十二岁的贝克特便恰逢其时地担当起私人秘书的职责,协助“革命”领袖收集资料,整理书稿,翻译片段,直接参与了《创作中的作品》(*Work in Progress*, 即后来的《芬尼根守灵》)的成书过程。对于业师无与伦比的创作才能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实验,这位后生无限敬仰,即使事后二十多年也禁不住赞叹:“他是最杰出的素材的驾驭者,能让文字绝对且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qtd. in Shenker 148)。基于对前辈的膜拜,贝克特的首个短篇集《徒劳无益》(*More Pricks Than Kicks*, 1934)在语言技巧和环境描写(对都柏林街头景象的细致描绘)等方面就和《都柏林人》(*Dubliners*)类似,而长篇处女作《春梦》在多种语言的运用和各类典故的铺陈上也效仿了业师的巅峰之作。在前辈“文字革命”的感召下,《春梦》对中国文化的挪用必有滥用之嫌。

贝克特自小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闲暇时常弹奏钢琴自娱。移居巴黎前后,他接受了“中国风”的熏陶,对中国古代音乐史恋恋不忘。在《春梦》中,他禁不住鹦鹉学舌,在一页半的篇幅里连续挪用了“伶伦制律”、“孔子击磬”和“凤凰涅槃”三个典故(*Dream* 10-11),似乎叙事者在表达对内心的宁静和众多人物间的和谐关系的渴望,却难免炫耀自身学识之嫌。他对“伶伦制律”传说的挪用(对《中国音乐》相关片段的翻译和改写)几乎就是对《吕氏春秋》中“律吕”一节的严格的二度翻译:

假设现在我们讲一个中国的故事,把我们的意思谱成曲子。好吗?那么就讲伶伦的故事,他来到西部边境,来到嶰谷,断一竹于两节间,吹之,不禁欣喜,定其音为黄钟之宫。接着,凤凰来助,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伶伦又制十一管,和所听之音适合。然后,他将十二律吕上报黄帝,分为六律、六吕,曰: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

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10)

在该传说的结尾,学识喷涌的后生竟将“六律”和“六吕”一个不落地罗列出来,显得十分突兀。“十二律吕”是他绞尽脑汁从法文直译而成的,绝非哈佛学者所言欧洲新兴的表现主义作曲法“十二调”(Albright 25)。在此,贝克特模仿业师的文风,将有关中国音律起源和吹管乐器发明的故事完整地表述出来,并把故事醒目地插入因而更加散乱的叙事中。这样的“跑题”(Dream 111)流露出他一直在嘲弄的18世纪英国小说中常见的“作者介入”的痕迹,不过丝毫无益于统一、连贯的情节的建构,而是使其碎片化、杂乱化,是篇首所说“狂乱的思想”(1)的范例。

正如通过巧妙的“排列”(permutation)、“组合”(combination),“十二律吕”可以谱成悠扬的乐曲,“叙事者希望,他描述的人物各为一律,在更为出色、悠扬的曲调中扮演自己的角色”(Ackerley and Gontarsky 322)。果然如此,叙事者的职责就简单了:玩弄“排列”、“组合”游戏而已,“像孔夫子那样在玉磬上变戏法”(Dream 10)。^①由此,炫耀性的类比从传说中的“伶伦制律”转向了有据可查的“孔子击磬”。年轻的贝克特并非职业译者,只希望进而借用孔子的音乐观和音乐成就来表现叙事者的狂躁和对现实主义叙事传统的调侃。在他看来,“音乐必须反映儒家的理想,即社会的和谐”(Ackerley and Gontarsky 322)。苦于将喷涌而来但难于驾驭的素材纳入一部连贯、统一的“作品”而非“文本”的后生,在推崇实用主义音乐观的东方圣人身上找到了知音,幻想着能像孔子那样在一组“玉磬”(cubes of jade)上奏出“和谐”的“雅乐”,使人同样“三月不知肉味”(Giles 12)。令人惊讶的是,他的读书笔记(对《中国音乐》和《中国文明》相关章节的转述)是准确无误的——忠实地挪用了《史记·孔子世家》中的故事,而不谙中国拼音和古代文化的西方论者倒是普遍犯错,以为贝克特提及的是“孔子学鼓琴于师襄”的故事,将此处的“磬”(the pien k'ing,编磬)当作“琴”(the Chinese qin or k'in,古琴; Ackerley and Gontarsky 322),甚至当作晚于孔子时代一千余年而且诞生于印度的“琵琶”(pipa or the lute),说《春梦》的构思深受中国“琴曲”(k'in music)或“琵琶曲”(lute music)的影响(Lin 280),不免贻笑“东方”。

急于老成的贝克特对中国文化的挪用还意犹未尽。假如众位人物狂躁不安,又桀骜不驯,叙事者该如何处置呢?是任其胡作非为,使作品堕落成杂乱无章的拼缀物,还是将其纳入有序的线性系统,构成一段性质单一的“旋律”(Dream 10)呢?为描述这一叙事的困境,这位“文艺青年”转向了另一个古老的东方传奇——“凤凰涅槃”:叙事者期望那些人物能像“不死的祥鸟”那样“从灰烬中升起”,摒弃前嫌,相互协作,一道奏响主调清晰的“旋律”,而非众声喧哗的“混响曲”。但他不免绝望,因为这一期待无异于“给双性的球体(bisexual bulge)配以林簇(Great Iron of the Woods)”(11)。在西方,“双性的球体”原指男女合体,源自柏拉图对男女间爱情起源的猜想;在东方,这一概念指“太极图”,源自道家的“阴阳”学说。无论出处,此处的“球体”无疑指违背二分法的“阴阳同体”(androgyny);“林簇”则是贝克特酣饮灵泉后生造的术语,为阳性“六律”之一的“太簇”(the Great

① “变戏法”(conjuring)为编辑所改,贝克特的手稿中作“摆弄律吕”(playing with Liù Liǔs)。

Steeple-Iron)和阴性“六吕”之一的“林钟”(the Bell of the Woods)的拼合,即“雄鸣”和“雌鸣”的混搭。“球体”与“林簇”相配,是多重“性(质)”混乱的具象。而面对“欧洲秧鸡唱出的中国音律”、“克里斯托弗·伶伦”和“竹管吹奏的《扬基佬》”(Dream 70, 178)这类东西文化的杂合,叙事者更是无法驾驭,只有任其逍遥,并借“狂乱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文思泉涌的爱尔兰后生凭借对中国文化的大肆挪用表达了对“全知全能”叙事传统的讥笑,也炫耀了自己作为“文字革命”传承人的本领。

对中国文化最放肆的挪用就此休止,然而在“又及”(“Und”)一章的开篇,贝克特再次冲动起来,把“武则天怒贬牡丹”的故事娓娓道来,插入本已散乱不堪的叙事中:

中国的武后戴着假须,来到内阁坐下。百合犹如则天大圣皇后那般美丽,玫瑰犹如那般可爱。

“开花呀!”她对着牡丹喊道,“开花呀,混蛋!”

不。它们毫无反应。于是牡丹遭贬:寰宇之内,牡丹皆被连根拔起,烧为焦土,花艺禁绝。

好了,跑题这么远了,我们的意见是,我们可能不只是跑题。(111)

这段文字是对《中国文明》第四章有关段落(Giles 28)的戏剧化改写,被顽皮的文艺青年置于此处作为自己学识渊博和善于“跑题”的力证,与生拉硬拽的“语域”(张士民 91)分析基本无关。与中国史实的出入无关紧要,^①在绘声绘色的描述和异域色彩的张扬中偏离叙事的主线,恣意调侃具有统一性和连贯性的现实主义叙事传统,这才是这位文艺青年的意图。和对中国音律的挪用类似,这一“跑题”仅具有叙事学和互文性研究的意义,没有“文体学研究”(张士民 91)的价值。

贝克特继承了乔伊斯收罗素材的方法:大肆借用正在研读的书籍,“把醒目、深刻或机智的句子和短语抄录在笔记本里。然后,这样的引文或几乎就是引文的片段就被编进自己早期散文的稠密编织物当中”(Knowlson 106)。当然,这位后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滥用前辈的方法,不是为了构造一个宏大的统一体,而是为了调侃现实主义小说营造的叙事“统一性”(Dream 133)的幻象。由于中国文化及其他典故的大肆挪用,故事情节屡屡中断,小说也在驳杂中平添了突出的互文性和元小说性。此刻的文艺青年不在乎问题的解决,只关心问题的描述,乐于拿异域文化来铺张一番。对“革命”领袖创作方法和语言能力的膜拜,其结果可以想见:“小说的结构复杂难辨,呈碎片式;其情节刻意去除了线性的形式和统一性……而且其表面的现实也被有意地扭曲了”(Knowlson 146)。在“风云激荡的‘革命’氛围里”,贝克特也有一种“让平庸的读者见鬼去”的“孤傲”(陆建德 262),不免滥用“移花接木”(grafting)的技巧,把小说变成文化典故和专业术语的“稠密编织物”。于是,在他所有作品中,处女作《春梦》内容最驳杂,语言最生涩,是他最明显的读书笔记的大杂烩。事实上,就取材方法而言,《春梦》就是《芬尼根守灵》的投影,但作为文本,前者是一串碎片,显得杂乱、生硬,后者是一个“统一体”,显得宏大、艰深。

^① 这些出入源自翟里斯的概述,主要有:武则天上朝不戴“假须”;赏花是在“上苑”,而非“内阁”;“大圣皇后”(God Almighty the Empress Wu)是她退位后的称号,贬花时尚未册封。

《莫菲》对中国文化的慎用

1934年9月至1936年6月,陷入心理危机的贝克特主要在伦敦接受新兴的精神分析治疗,并在伦敦和都柏林两地断断续续地完成了第二部长篇小说《莫菲》(*Murphy*, 1938)。该小说明确体现了他自我意识的觉醒,在很大程度上去除了乔伊斯的影响,因而是他“满意的第一部长篇作品”(梅斯 I)。此时,“他[摆脱乔伊斯]的目的意识比以前更为坚定,因而用典日趋保守”(梅斯 IV)。他不再长篇累牍地挪用,在经不住推敲的情节中罗列自己的才华,其作品中的中国文化印记随之锐减,而且用典不再限于《中国音乐》和《中国文明》。虽然西方所有传记、评述和贝克特自己的信札中均无相关记载,但可以断定,贝克特此时的中国文化典故部分源自他在都柏林、伦敦或巴黎唐人街的直接经历。

《莫菲》是贝克特首次认真地“去乔伊斯”努力的结果,虽然罗列心理学、哲学、艺术的术语依然偏多,但对读书笔记的成规模挪用已少有踪影。出于表达自我声音的需要,其中对中国文化的借用骤然简洁,能比较自然地融入故事情节,少有炫耀或“跑题”之嫌,这是《莫菲》与《春梦》在处理中国文化素材上的主要区别。在该小说的第七部分,这位文艺青年把从都柏林赶到伦敦寻找莫菲未果的尼瑞直接安排在中餐馆,让他喝着中国最普及的“绿茶”,握着作为中国餐饮文化象征的筷子:“他拿着筷子苦涩地咕嘟着,而一种比任何妻子甚至情妇——即使是杨贵妃本人——还要凄苦的空寂,就是跟他同床共枕的心思。毫无疑问,东方的背景跟这种错乱没有关系。荔枝汁……依然散发着说不出名字的芬芳,那种芬芳在他的烦恼背后形成一层琵琶曲的薄暮”(68-69)。和追求自由、虚空的莫菲相反,尼瑞离不开受决定论摆布的世俗世界,缺了“男人的另一半”就感到“空寂”。在“走自己的路”的时刻,贝克特最后一次显摆了自己的中国文化修养,把“杨贵妃”(Yang Kuer-fei)作为令男人拜倒的美丽情妇的代表,让相隔13个世纪的大唐“琵琶曲”隐隐地回响在西欧普通岛民的脑海,使他在“东方的背景”下喝上高贵艳妇嗜好的“荔枝汁”,仿佛小人物尼瑞就是唐玄宗一类重色轻国之徒,甚至如同作者一样研读过《中国文明》。耽于肉欲又略懂汉学的形象在三言两语中跃然纸上,这是乔伊斯身边的后生慎用中国文化典故的妙处。

此处的描述绝无《春梦》罗列“十二律吕”的堆砌之嫌,但典故的最终出处依然是对《新唐书·卷八十九》“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记载的转述,也融合了杜牧名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意境。不过,此时的文艺青年惜墨如金,只从《中国文明》相关段落中撷取了三个短语(Giles 40),而且敏锐过人,用典恰到好处:唯有脱离物欲横流的“大世界”,遁入唯我的“小世界”(Murphy 8),莫菲才有获得绝对自由的可能,而深陷污浊、耽于享乐的尼瑞难免自缢的悲剧。简洁的用典——已非对中国历史故事的完整复述,仅取寥寥数语——给小说增添了异域色彩,且没有形成明显的“跑题”,是小说情节的有机成分。在贝克特的所有中国文化典故中,这是最后一个可以辨明具体出处的例子。

正如莫言的小说具有“幻觉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 realism)色彩,在唐人街伴着大唐“琵琶曲”喝“荔枝汁”的场景也是一段幻觉,但闻着浓香喝中国茶的情景却绝对是现实的。对于茶,沐浴过“中国风”的贝克特赞赏有加。在小说的第五部分,他点明了中国红茶

鼻祖的名称及其在西方的普遍接受:

卡里奇小姐的日子有一个核心,就是下午喝一杯细腻的浓茶。有时候,她坐下来准备品味这种万灵茶,深信那些合算的事儿没有哪一件没做过,那些不合算的事儿却没有哪一件做过。……甚至一杯热腾腾的好茶端在她手里,也没法叫她向时空的通常状况屈服。……

“但愿你喜欢这股香味,”卡里奇小姐说道,“最上等的正山小种。”(43)

女主人公西莉亚情绪低落地在房间等待莫菲寻找工作归来,房东卡里奇小姐给她端来一杯“好茶”——“正山小种”。这种红茶即“拉普山小种”(Lapsang Souchong,广东话音译),西方历史上亦称“武夷茶”(Bohea Tea,闽南话音译),17世纪初被英国王室选为皇家红茶,随之喝“下午茶”的习俗在西欧兴起。在此,爱尔兰的这位后生写明中国红茶的品名,既呼应了拜伦的长诗《唐璜》,也表现了小人物对奢华生活的向往和略显“悲怜”的房东让茫然的房客“严肃起来”^①的愿望。

卡里奇是个惯于算计的小生意人,她把“正山小种”当作与生计紧密相关、“芬芳”得叫人忘却“时空”的“万灵茶”,把喝“下午茶”当作过日子的“核心”,仿佛骨子里还流淌着三个世纪前贵族祖先的“蓝血”。而男主人公莫菲是个不屑于工作的唯我论者,虽囊中羞涩,却有喝“下午茶”的遗风。寻找工作未果又饥肠辘辘时,他只好来到餐馆就着中国茶吃几块饼干。喝完半杯后,他对服务生嚷道,“我要中国,你却给我印度。”经两次诬陷,他就达到了“付一杯茶的钱却喝掉将近 1.83 杯茶”的目的(50)。在此,尚未“而立”的贝克特将中国茶文化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故事简洁地融为了一体:1492 年,哥伦布是携带西班牙国王致“中国大汗”的国书出航的,他带着抵达中国的梦想西渡大西洋,却意外抵达了“(西)印度”群岛。从卡里奇对中国茶的陶醉到莫菲蹭中国茶喝的泼皮习气,这些情节无疑承袭了英国贵族喝“下午茶”的风气,也表明贝克特本人对中国茶情有独钟——他笔下的主角喝的软饮料多是中国茶;即便不喝茶,也要伴着盛唐的宫廷音乐喝丽人嗜好的“荔枝汁”。可见,在用典日趋简洁的爱尔兰新锐作家心里,中国文化依然是挥之不去的;他在唐人街的经历是其小说中中国文化的又一源头。

创作《莫菲》时,贝克特不再跟着业师鹦鹉学舌,而是“走自己的路”,竭力虚构情节连贯、主题统一的故事,因此对异域文化的借用几乎不再显露显摆或“跑题”的痕迹。此后,中国文化就连同其他文化一道遁形了:在后来的实验小说《瓦特》(Watt, 1953)和代表性的小说三部曲中,中国文化忽然间销声匿迹,而且久无音讯,仅在末篇《无法称呼的人》(The Unnamable, 1958)当中,“我”自诩已退化成一个说话的肉球,依稀觉得有一盏中国灯笼挂在餐馆的门口,将微弱的光照在盛放“我”的陶瓮上。从滥用、慎用 to 弃用,中国文化历经两部小说就“失声”了,这一巨变是由文艺青年对“乔老前辈”创作方法的绝然扬弃决定的,即中国文化典故的锐减源自贝克特走出乔伊斯身影的意识的增强,和许多论者常用来解读东方文化在西方想象中的命运的“东方学”(Lin 287)没有关系。对于独立

^① 出自《唐璜》第 4 章第 52 节。

意识日渐增强的贝克特,文化之争绝非创作的主题,如何对待“文字革命”才是当务之急。

中国文化的遁形与对乔伊斯的扬弃

初到巴黎时,贝克特还是初生牛犊,又和“乔老前辈”趣味相投,学会了“也从多种语言和多国文学中攫取引文”,甚至“比乔伊斯走得更远”,仿佛要向老前辈证明“文字革命”后继有人。在早期创作中,“除使用各种词典和参考书籍外,贝克特还把从其他文学、哲学和神学作品中摘录的数百段引文编入自己的小说。……其劲头和插入引文的技巧颇有乔伊斯的派头”,因此《春梦》当中“有大量的炫耀成份”(Knowlson 146),其对中国文化的滥用也就不足为怪。与此同时,这位晚辈也开始意识到跟着文学“教父”学舌的危险:“尽管我最最诚恳、竭力地赋予它我自己的气味,但这部小说依然散发出乔伊斯的气味”(qtd. in McDonald 27)。由于历来的“孤傲”和对“与众不同”(陆建德 186)的追求,这位年轻的“都柏林人”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第二次来到“乔老前辈”的身边时,他越发觉得,“不能沿着同一条路走下去”(J. Knowlson and E. Knowlson 47),在创作中“有必要和他保持距离,[因为]那是发现自己的声音的重要步骤”(Knowlson 146)。事实上,早在《春梦》的个别章节里,贝克特就开始摒弃“乔老前辈”的风格了。在1932年6月致编辑普特南(Samuel Putnam)的信中,他甚至豪言:“我深信,死去之前我会超越詹·乔的”(qtd. in Knowlson 146)。不久,那些彰显了个性的章节果然得到了编辑的赞赏。得此佳音,心中暗喜的都柏林晚辈坚定了“存在”的秘诀在于“被感知”、在于“与众不同”的信念:“在无所不知这个方向、在对素材的控制上,乔伊斯能走多远就已经走了多远。他总在添加;要明白那一点,你只须看看他的手稿。我意识到,我自己的道路在于贫乏,在于知识的匮乏,在于剔除、减去,而非添加”(qtd. in J. Knowlson and E. Knowlson 47)。

晚辈急于独立“存在”的冲动指向“弑父”——背弃“无所不知”和不断“添加”的文学“教父”,和他背道而驰,走向“知识的匮乏”和对“感知”持之以恒的“剔除”。当然,“弑父”不是轻而易举的,对许多作家(尤其是爱尔兰作家)而言,“乔老前辈”就是无可回避的“父亲法则”。值得庆幸的是,决绝的文艺青年就在“反其道而行之”当中寻到了解决之道:“走向无能、无知的艺术,放弃典故和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的声音,拥抱更加内倾和沉浸的第一人称散文”(J. Knowlson and E. Knowlson 47)。中国文化之类的“知识”成了他“剔除”的对象,因为其挪用与向“无能、无知”的转向是相悖的。

其实,基于对“乔老前辈”巨大身影的畏惧和自身的“孤傲”,这位都柏林新锐作家的“极简主义”早在1930年9月他独自撰写的《普鲁斯特论》中就已萌芽了。在对个体、时间、记忆、习惯、艺术等展开的极端怀疑主义论辩中,年轻的贝克特就扬言,“艺术的趋势不是扩展性的,而是一种收缩。艺术是对孤独的颂扬。没有交流可言,因为没有交流的手段”(Proust 63-64)。在散漫而咄咄逼人的论述中,未出茅庐的贝克特指出,文学应该独立于“表面价值”,走向“深度意义上的”潜意识世界,表现“交流”的缺失,即个体的“孤独”(63),因而艺术是“收缩”性的;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摒弃习惯、记忆和交流,从“无能、无知”的角度寻求“存在”的本真,为此应该首先解构人类的“感知”能力,拥抱虚空和无尽的悖论。即将回国的小青年有了走向“收缩”和“孤独”的念头,但未及在小说创作中付诸实

践,而且“乔老前辈”的“扩展性”艺术依然耸立在他的面前,非决绝之人无以“超越”。因此,当他回到乔伊斯身边时,他的长篇处女作在取材上还是以继承为主,照样堆砌了中国文化。而在第二部小说中,他去除了大部分“乔伊斯的气味”,于是中国文化陡然“瘦身”。此后,随着他对业师创作方法的彻底摒弃,中国文化在其作品中几乎渺无踪迹,而贝克特也从“愣头青”成长为在“贫乏”、“无知”的道路上卓有建树的“老前辈”了。

在贝克特的小说中,中国文化的“瘦身”与遁形是他扬弃乔伊斯创作路线,践行“无能、无知”文艺思想的结果,和殖民主义、文化霸权、种族歧视等政治概念无关。自我意识愈强,则离乔伊斯愈远;用典愈少,则“收缩”得愈彻底。中国文化及西方“知识”在贝克特小说中的锐减,是他走向与乔伊斯背道而驰的“失败”(Proust 125)和“无知”文学的必然结果。他的“极简主义”是反向的“文字革命”,是在“‘失败’小说”(曹波 22)创作中觅取成功的艺术。□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 Ackerley, J., and S. E. Gontarsky. *The Grove Companion to Samuel Beckett: A Reader's Guide to his Life, Works and Thought*. New York: Grove, 2004.
- Albright, D. "Beckett as Marsyas." *Samuel Beckett and the Arts: Music, Visual Arts and Non-print Media*. Ed. Lois Oppenheim.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25-29.
- Beckett, Samuel. *Dream of Fair to Middling Women*. London: Calder, 1993.
- . *Murphy*. London: Pan, 1973.
- . *Proust and Three Dialogues with Georges Duthuit*. London: Calder, 1999.
- Giles, Herbert A. *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CUP, 1911.
- Knowlson, James, and Elizabeth Knowlson, eds. *Beckett Remembering and Remembering Beckett*. London: Bloomsbury, 2007.
- Knowlson, James. *Damned to Fame: the Life of Samuel Beckett*. London: Bloomsbury, 1997.
- Lin, Lidan. "Globalization and Post-Orientalism: the Chinese Origin of Samuel Beckett's Fictio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11 (2010): 270-88.
- McDonald, Ronan.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Samuel Beckett*. Shanghai: SFLEP, 2008.
- Shenker, Israel. "An Interview with Beckett." *Samuel Beckett: the Critical Heritage*. Ed. L. Graver and R. Federman. London: Routledge, 1979. 146-49.
- 曹波:《贝克特“失败”小说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Cao, Bo. *A Study of S. Beckett's Novels of "Failure"*. Beijing: Commercial, 2015.]
- 陆建德:《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Lu, Jiande. *A Selective Study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Mind*. Beijing: Peking UP, 2001.]
- 陆建德:《自我的风景》,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第186-95页。 [Lu, Jiande. "Images of the Self."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4 (2011): 186-95.]
- 梅斯:《序》,载贝克特著《莫菲》,曹波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第1-19页。 [Mays, J. C. Preface. *Murphy*. By S. Beckett. Trans. Cao Bo. Changsha: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2012. 1-19.]
- 张士民:《对贝克特文学风格的文体学研究——语域与贝克特的“无风格”写作》,载《国外文学》2010年第1期,第91-100页。 [Zhang, Shimin. "A Stylistic Study of S. Beckett's Literary Style: Register and Beckett's Styleless Writing." *Foreign Literature* 1 (2010): 91-100.]

莫洛伊恋母的困境与游戏

曹 波 姚 忠

内容摘要: 在贝克特的小说《莫洛伊》中, 由于父亲的缺场或无能, 莫洛伊在寻母旅程中一路玩弄恋母游戏, 表现出许多跟母亲有关的恋物癖症状; 但鉴于母亲的堕落和乱伦的危害, 他又借污秽学对母亲大肆谩骂, 表现出典型的厌女症状和对父亲法则的最终服从。在笔者看来, 莫洛伊是一个从“象征界”向“想象界”退化的“问题主体”, 其叙事中的种种谜团和杂耍似的游戏都是其恋母困境外化而成的“梦意象”, 和作者“身处子宫的记忆”密切相关。

关键词: 《莫洛伊》 精神分析学 恋母情结 困境 游戏

作者简介: 曹波,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爱尔兰文学研究及文学翻译; 姚忠,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英国文学和英语教学研究。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贝克特‘失败’小说研究”【项目批号: 12FWW01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Molloy's Oedipal Dilemma and Games

Abstract: In S. Beckett's novel *Molloy*, due to the father's absence or impotence, Molloy plays Oedipal games all the way back to the mother, thus revealing his mother-oriented fetishism. Meanwhile, due to the mother's decadence and the danger of incest, he draws upon mother-oriented scatology in his narrative, thus disclosing his misogyny and final surrender to the father's law. Molloy is a "problem subject" regressing from the Symbolic Order to the Imaginary Order, and the various enigmas and games described in his narrative are in essence dream-images of his Oedipal dilemma or, rather, of Beckett's "memories of being in the womb."

Key words: *Molloy* psychoanalysis Oedipus Complex dilemma game

Authors: **Cao Bo** is professor at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British and Irish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Email: caobo200205@sina.com **Yao Zhong** is lecturer at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 China). She specializes in British literature and English teaching. Email: yeziyao2004@tom.com

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先以戏剧《等待戈多》扬名欧美, 但他首先是一位“荒诞主义小说家”(侯维瑞 李维屏 810)。其小说三部曲的首篇《莫洛伊》(*Molloy*, 1955)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莫洛伊的叙事, 以母亲为中心, 洋溢着儿子回归母体的欲望, 第二部分是莫兰的叙事, 充盈着儿子得到父亲认可的欲望。作者将小说一分

为二，是为了突出“家庭三角”（the family triangle）中母子与父子两对关系。两位主角对母亲或父亲的矛盾心理决定了他们的现代版俄狄浦斯之旅：莫洛伊莫名其妙地回归已经堕落了的心路历程，莫兰认可父亲的专制却遭受殉难的心灵旅程。就小说的第一部分而言，莫洛伊对母亲抱有极其矛盾的态度，一路上玩弄恋母游戏。与弗洛伊德孙子的“缠线板游戏”（fort-da games）相反，这种游戏象征性地满足了莫洛伊乱伦的欲望，又暗示了他对父亲法则的最终服从。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看来，莫洛伊叙事中的种种谜团和杂耍似的游戏都是他恋母困境外化而成的“梦意象”（dream-image），和作者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困境息息相关。

一、恋母的困境

莫洛伊的恋母情结陷入困境，这是父亲的缺场、无能和母亲的堕落、纵容共同作用的结果。他几乎没有提过父亲，仿佛其中“只有一位缺场者。那就是父亲”（Hill 96）。实际上，正如母亲常以替身的形象出现那样，父亲也试图在犯罪的儿子面前戴上各种面具，以便在关键时刻审问他、阻止他，其最常见的形象就是维持秩序的警察。在故乡小镇的入口处，当莫洛伊不顾“公共行为准则”，不雅地“跨在自行车上休息”时，一个警察挡住他，要他出示“证件”（20）^①。这位执法者对莫洛伊身份的盘问就是“对表明主体已在象征界获得身份确认的证件本身的询问”（Watson 57），或者说就是对莫洛伊从“象征界”退化到“想象界”（曹波 54）的倾向的质问。像斯芬克斯一样，这位警察试图阻止儿子回归母亲的进程；而要拿出相应的证件，退化中的“婴儿主体”（the infantile subject）必须重新置于“父亲的语言”的控制之下。只是从莫洛伊的寻母之旅开始以来，“父亲的语言”就岌岌可危了。当莫洛伊讽刺性地把“几片碎报纸”（20）塞到警察的鼻子底下，免得在父亲替身的威胁下暴露自己的身份时，他回归母亲的欲望似乎已无可遏制了。

父亲的替身依法行事，把暴露了乱伦企图的儿子带到了警察局——维持秩序和语言的机构，而儿子则“在警惕、专注的眼神下”懒洋洋地走着，一边听着“远处的音乐”（21）。终于，警察感到绝望，因为这个“没有证件的”家伙竟声称，“她[母亲]的名字一定也叫莫洛伊”（23），仿佛他已经和母亲实现了二位一体。儿子如此固执，父亲的替身看来没有能力拯救他了，只能“未经惩罚”（24）就将他释放，任他继续回归母亲。这里，由于儿子冥顽不化，警察作为父亲的替身是失职了，而莫洛伊不巧压死了老狗泰迪时，“那不可回避的治安官”（33）却被老妇索菲（纵容乱伦因而堕落的母亲替身）轻易打发走了。同样，森林里的烧炭工也是一个父亲替身，他“想把我留在他的身边”，不让“我”回归母亲，于是“扯住我的袖子”（84），却被有虐待狂倾向的莫洛伊杀害了，仿佛父亲式的人物已经弱不禁风，而儿子既然已经靠近了母体，就变成了玩命之徒，把阻止他乱伦的人当作敌人干掉。看来，莫洛伊叙事中的父亲式人物确实无能，无法阻挡孤注一掷的儿子从“象征界”的退化。

实际上，父亲的缺场或无能是作者预先设定的。在贝克特看来，耶稣是圣灵的兒子这一说法在十字架上就破灭了，因为圣灵从不显露身手，将受难中的儿子拯救下来。于是在莫洛伊的叙事中，缺场不能转化成象征性的在场——他唯一一次提到父亲也是在母亲把儿子当作丈夫这种反讽情景中。这一错觉正如耶稣生父的身份那样充满了悖论，因为那是一种缺乏父子关系的认同。对贝克特而言，“身体悬挂在十字架上，就像一团不成形体的肉等待着出生”（Hill 97），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殉难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而且总是停滞在

无法存在因而缺场的父亲的哀悼中——父亲本人还钉在十字架上等待着出生，正如莫洛伊被索菲当作自己的孩子时声称的那样：“经由圣灵的运作，万物都一起悬而未决”（41）。看来，驱使儿子奔向母亲的一个动因，似乎是儿子无法认同本身尚未正常诞生的父亲。

莫洛伊的困境同样源自母亲（替身）本人的堕落。在他的叙事中，母亲已经丧失了作为母亲的资质，而且母亲的替身也变得性别不明了。起先，他的肛欲冲动发生了效用，将生理排泄和语言排泄的能量注入到了写作中，这一点可从他连绵不绝地针对母亲（替身）的淫秽语言和象征游戏可以看出。接着，“从肛门出生”的妄想也推动他将女性定义为无能的男性，因而母亲本人及替身在性别上就变得模棱两可，无法担当合格的母亲这一角色。于是，莫洛伊同母亲的关系与其说被断然否定了，不如说是误置、变形了。他同母亲式人物的暧昧关系就是明证：旅途中不断遇见的女性人物和母亲形象相仿，但对她们的性别，他从解剖学的角度提出了怀疑。最典型的例子是母亲似的人物“索菲·罗伊”，“或者露丝”（33），也许是“鲁丝”或者“艾迪丝”（56），甚至可能是“罗丝”（83）。^②她同莫洛伊的关系是对整个妄想脚本的注解。莫洛伊同她的交媾及分手是一场征服母亲的游戏；正是在符号学的意义上，这个可能是女人的人又像是他的一个“缠线板”——像弗洛伊德孙子的玩具那样，可以自如地拿过来又丢出去。

母亲的堕落并未在精神分裂（如把丈夫与儿子混为一谈）中终止。正如假使“从腹股沟就截肢了”，无能的儿子“会更加高兴”（35）那样，当莫洛伊怀疑索菲“难道不是个男人，或者至少是个阴阳人”时，她的母性就被剥夺得几乎荡然无存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通过这位母亲似的人物，恋母的莫洛伊才懂得了“真正的爱情”（56）。在污言秽语的爆发中，莫洛伊象征性地进行了乱伦，从而像俄狄浦斯无意中谋害了父亲一样，他也间接地实现了弑父意图。在他的内心，厌女症和恋母情结奇异地纠结在一起，而“在垃圾堆里”找到的“真正的爱情”也成了他“从肛门出生”妄想的逼真意象。莫洛伊占有索菲，既满足了他对母亲的欲望，又发泄了他对母亲肛门怀孕的愤懑，而索菲也同时得到了丈夫和儿子，这种一举两得自然而然造成了“她的死亡”（58），让二位一体的替身无法确保这种混沌的身份。然而，发现“母亲的形象有时候和他们的形象混淆在一起”（59）时，莫洛伊就无法忍受了，因为抹除了“缠线板”和母亲本身之间的差异，游戏就无法进行了，而且他潜意识中依然害怕阉割。毕竟，父亲之死意味着“家庭三角”的终结。

假如母亲为防止乱伦接受了父亲法则，那么不借助升华或者替代性满足的手段，儿子就无法实现乱伦的企图。事实上，在贝克特的小说中父亲从不绝对缺场，因此莫洛伊的叙事尽管是建立在对母亲的非法欲望之上的，但同时也是最终指向秩序的，指向父亲法则和语言的重新确立。他的叙事大抵展示了他的寻母旅途，只是最后他还是觉察到，父亲尽管迟到了但依然存在。他的欲望必须受到挫败，否则父亲就必须死亡，他的故事也就必须在他占有母亲时终结。在小说的第一部分，父亲似乎完全缺场，但他的权威却在莫洛伊的种种游戏中有所体现，因为儿子不敢真正在生理行为中满足乱伦的冲动，只能以游戏（象征）的方式来替代。然而，父亲依然有些无能，他的命令有时受到了莫洛伊的挑战——他不仅占有过一个母亲替身，而且现在竟然就“睡在她[母亲]的床上”（1）。在儿子的乱伦行为中，父亲似乎殉难了，因而不在于场，或者假使没有亲自到场，也仅以替身的形象偶尔露面。他的缺场、迟到或者无能是对乱伦的纵容，但他隐约的存在或者最终的到场又构成了对乱伦的威胁，因此儿子的精神分裂是难以避免的。

莫洛伊孤注一掷地回归母亲，又迫不及待地离开母亲；千方百计地忽略父亲，又在最

后归顺父亲。他的困境是两组矛盾纠结在一起的结果，在乱伦即殉难的妄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和索菲的相遇是意想中与母亲相遇的预演，即回归母亲的妄想。甚至索菲的鹦鹉也学舌道，“操他妈婊子的儿子”（37），这叫骂声不仅暗示了莫洛伊的家庭地位，而且预示了他跟母亲乱伦的后果，因为他和索菲的老狗之间或者索菲与莫洛伊的母亲之间已形成了比较确定的“镜像关系”。对索菲而言，老狗似乎是她已故丈夫及缺场的孩子的替身，于是她给老狗取名“泰迪”（和“爹地”发音相仿），其功能和莫洛伊的母亲称儿子为丈夫“丹”没有什么两样。于是，在母亲面前既是丈夫又是儿子的莫洛伊，就成了在索菲面前具有两重身份的老狗的理想替身。在这一戏剧性情景中，地位与身份可以互换，老迈的索菲就是莫洛伊心目中的母亲替身。然而，在城里笨拙地骑着车时，莫洛伊意外地撞倒了索菲“唯一的孩子”（37）——老狗泰迪。那条“年迈、眼瞎、耳聋、因风湿而腿脚残疾、时刻大小便失禁的”（33）狗，似乎是莫洛伊和母亲替身乱伦后的镜像，因此埋葬老狗时，他直觉地感到“这仿佛是我自己的葬礼”（36）。而且土堆旁的落叶松形状也跟墓碑相仿，这一景象更强化了他乱伦即殉难的幻觉。

寻母之旅注定是无果而终的，莫洛伊只能在无望中拿替代物满足自己的欲望，在恋物癖症状中象征性地实现对母亲的占有，从而避免遭受父亲的惩罚。过程大于结果，这是贝克特预设的情节。他潜意识中的悖论都没有解答，只有迷幻的演示，只有相关的妄想或者幻觉，于是他的小说充满了谜团。在精神分析学看来，那些谜团多是和母亲有关的病症及游戏。

二、恋物癖与恋母游戏

莫洛伊的奇怪举动其实都是指向母亲的恋物癖症状，即对某些物品作为母亲的替代物固恋的表征。在他把并不实用的自行车作为“亲爱的自行车”（16）来歌颂时，他的恋物癖第一次暴露了出来。这辆交通工具的重要性与其说在于“标明了叙事者对中心叙事的直接偏离”，或者“兴趣点从叙事目标向叙事手段的直接转移”（Watson 63）^③这一表象，不如说在于他象征性地实现了向母亲（的替代物）回归这一欲望。从圣洁到猥琐的叙事转换看似唐突，却隐含了莫洛伊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乱伦记忆：“拿一只橡胶喇叭吹——嘟嘟！——总是位列最优先的活动之列。不得不丢下自行车的时候，我就取下喇叭带在身边。……说起自行车和喇叭，那多叫人心神宁静啊”（16）。在莫洛伊的赞赏中，这辆自行车俨然用于儿童娱乐的女性物品，能使他充分体会“很可能同男性的性行为有关”（Hill 87）的重复性身体动作。在很大程度上，他跨在没有链条因而并无实际用途的自行车上的乐趣，来自座凳与肛门括约肌接触引发的性幻想；甚至追赶他的人也承认，骑自行车就是“那该死的快乐原则”（99）。荒唐的举动背后是对母亲（替代物）的过分依恋，是乱伦的冲动在作怪，因此只有在同母亲的替身索菲交媾之后，莫洛伊才终于丢掉了自行车。

在莫洛伊寻母的征途中，女式自行车成了缺场母亲的替代物，而非缠线板，因为它指向的不是儿子对母亲缺场的接受，而是儿子乱伦的企图。在丢失自行车后，他必须寻找新的发泄对象，此时车上的喇叭因其特殊的形状（圆型）和质地（橡胶）成了他最心爱的物品——母亲乳房的替代物。他承认，自己最喜欢的自行车部件不是可以搁腿因而实用的“突出的前车轴”，而是可以反复放进嘴里吹或者拿在手里捏的“红色小喇叭”（16），其潜意识的动机依然是反复地、象征性地占有母亲。同样，莫洛伊吸吮石头的怪癖也是一种指向母亲的恋物癖症状。在海边，他玩起“无聊的排列游戏”（陆建德，《破碎思想体系的

残编》276),拿鹅卵石在“四个口袋之间循环挪动”,还拿它们“依次吸吮”。正如“吮石”(69)这一命名所暗示,这些鹅卵石因形状的类似成了母亲乳房的替代物。在母亲缺场的情况下,石头也可权且一用,就像找不到母亲的乳房时,婴儿会把乳头状的手指放进嘴里吸吮一样。不过,莫洛伊最终还是发现,那些石头是必须抛弃的,不可能提供真正的“指向母亲……的乐趣”(Hill 91)^④。实质上,“吮石”游戏的宗旨是:那些“吮石”不仅要满足他“吸吮的欲望”(69),而且要成为缠线板似的玩具,让他以符号的手段获得对乳房的绝对控制。

针对母亲的恋物癖的出现有两个前提:一是母亲的缺场,二是恋母情结的畸形发展,前者是需要母亲替代物的条件,而后者则是对母亲的替代物过分依赖的条件,即不会出现正常的缠线板游戏、只会出现恋物癖症状的条件。在莫洛伊的叙事中,这两个前提都很充分,只是他一直遮遮掩掩或有意回避。事实上,他的寻母之旅一开始就陷入了母亲可能缺场的困境。在小说第一段的中间,他宣称在自己到达母亲房间的前后,母亲就死了,但过了十多段,他开始寻找母亲这一情节又预设了她还活着。寻找的目标是否在场,他不置可否,或者无从知道。被迫描述这趟已经漫无目的的旅程时,对于一开始他就占有了母亲的房间是否意味着自己一度认同了母亲,或者现在占有了已故母亲的床榻时自己是否对母亲因难产而死去负有一定责任,他也仅仅是含糊其辞。而且母亲很可能就“住在屠宰场附近”(22),仿佛街坊一带就是死亡的世界,就是追寻的目标可能已经缺场的世界,这一点更强化了他叙事的含糊性,即对恋母困境的有意遮掩。即使是在东拉西扯地讲述寻找可能已故的母亲的过程时,莫洛伊也频繁地跑题,仿佛这趟旅途的前提已然不存在了。

莫洛伊的恋母情结是畸形发展的,没有在父亲的及时干预下升华为对母亲的孝顺和感恩,而是直接指向乱伦。他是一个失败但孤注一掷的俄狄浦斯,除了那些恋母游戏,他的叙事还至少两度展现了乱伦的幻象:旅途临近结束时,他生理上已然退化,掉进了水沟(产道的梦意象),手脚动弹不得,无望中只听到一个声音安抚他,仿佛他已经从外界回到产道里了;旅途结束时,他生理上已全然崩溃,终于被抬进了母亲的卧室(子宫的梦意象),无助但象征性地实现了回归母体的欲望。与此同时,他的恋母情结再次陷入了困境,因为母亲的卧室并非真正的母体,而是更像一所救护机构:他“也许是用救护车”(7)送来的,而且定期有人来看他,买走他写有旅途经历的纸片。这里,莫洛伊的叙事无异于一项要依照父亲的命令来完成任务,他很乐意拒绝这项任务,但那位来访者(心理医生)不允许,似乎想通过精神病人的“自动写作”对他的心理症状进行诊断和治疗。可见,阳具还发挥着作用,但总是不够及时或者强悍。漫长的寻母旅程表明,儿子有充足的时间展现针对母亲的恋物癖症状,直到病入膏肓时才勉强依从了阳具。

对于恋母的困境,莫洛伊其实早有察觉。终于回到母亲的住房时,他却要么渴望“回到森林里去”,要么“碰巧在什么地方”(91)就待在什么地方,这种反向的冲动暗示了恋母情结陷入困境的可能原因:母亲的颓废或事实上的缺场,以及父亲迟到的干预。这种既渴望回归母亲又急不可待地离开母亲的矛盾,体现的正是“暗恐”(the uncanny)心理,即本应藏而不露的令人害怕的事物不知何故却暴露出来。莫洛伊本应远离这个家园,还应对自己的乱伦冲动密不外宣,这样才能不被阉割,可他最终还是象征性地回归了这个家园。他的叙事呈现的是固执又痛苦不堪地回归家园的旅途,而这趟旅途又因对阳具的惧怕,像鬼魂似的纠缠着作为退化中主体的他。莫洛伊生命的源头是模糊难辨的,因为母亲早已死去,或者早已颓废,无法给予他慰藉和平静;但渴望和失望的矛盾也会导致强制性的迷恋,比任何特定的、恼人的客体更叫人烦恼,因为这一矛盾造成了他主体性的分裂——自我与

企图占据自我位置的他者之间的分裂。

主体地位尚未巩固，困境随之而来，对立面之间的矛盾也就无法解决。看来，莫洛伊陷入了无法理喻的困境，除了指向母亲的恋物癖，他的行为还会显露与之相对的“厌女症”（misogyny）和“污秽学”（scatology）的症状。

三、厌女症与污秽学

莫洛伊的困境并不仅仅源自母亲事实上的缺场和父亲最终的到场。在他心中，恋母情结和厌女症奇异地纠结在一起，使他产生了从肛门出生的妄想——污秽流经的部位和新生命的通道合而为一、排泄和出生融为一体的妄想，因此他既想念母亲又厌恶母亲，既回归母亲又背离母亲。在一系列心理逆转或者倒错行为中，对母亲的依恋似乎全被厌恶和狂躁取代了。对他而言，出生从一辈子只能经受一次的神圣的经历变成了可以时不时地重复的、肮脏的排泄过程。他频繁地揉捏自行车喇叭，这一动作与其说是从母亲乳房吸取养分这一动作的戏剧化，不如说是对肛门排泄过程的戏仿。在很大程度上，莫洛伊已经退化到力比多发展的“肛门发泄期”了，其古怪的性格可以用“肛门排泄”或者“肛门留滞”这类术语来解释（王小章 郭本禹 28），因此他常见的病态行为以及叙事本身，往往显露出排泄和播撒那样的节奏。在回归母亲的路途上，婴儿的生产成了污物的排泄，为生命而吸吮的洁净行为也被他频繁的放屁取代了。

其实，莫洛伊把自行车喇叭当母亲乳房来揉捏的游戏，跟他针对母亲的“污秽学”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他的怪癖多是恋母情结和厌女症纠结在一起的结果。假如揉捏自行车喇叭的动作酷似“肛门括约肌的动作”（Hill 87-88），那么莫洛伊确实是有些肛门“固恋”（fixation）的症状。因而他没有像赞赏自行车那样歌颂母亲的生育之恩，而是精确地计算自己放屁的数量——“19个小时放了315个屁，就是说平均每小时16个多屁”（30）。在关于寻母历程的散漫记录中（原文第8-91页，不分段——笔者注），莫洛伊还留下了许多污言秽语，那些语言其实都与肛门括约肌的动作有关。在他的妄想中，出生是肛门排泄的结果，是“第一次尝到屎的滋味”（16），毫无美好、纯净可言，于是他的寻母故事中不免夹杂着明显的厌女症的成份。从病源学的角度来说，莫洛伊骑车回家、把捏喇叭以及座凳之乐，都可归咎于回归子宫、寻求健康的再生的欲望。只是事与愿违，在叙事的末尾，他还是待在一间“氨气熏天”（17）的房间里。

莫洛伊的厌女症和从肛门出生的妄想结合起来，促生了他对母亲生产的直接谩骂，即促生了针对母亲的、以肛门排泄为中心意象的污言秽语。他对自身历史的开端坐立不安，把自己从肛门出生的妄想归咎于母亲的堕落，不禁泄愤似地说道，“到现在我们都像一对老迈而亲密的朋友了，没有性别，也没有血缘关系”（17）。他先是否认母子关系，接着就直接谩骂，称其为把他“从屁股中间的洞”（16）带到人世间的男人，或者是“大小便失禁的”（17）的女人，仿佛他的出生正是母亲肛门排泄的结果。莫洛伊不顾文明的禁忌，在心理医生必定拿走的纸片上玩起了狂欢的游戏，用肮脏的词汇取代对母亲养育之恩的颂扬，这背后是厌女症和肛门固恋在作祟。因此，他不仅对那个女人是否有能力成为母亲表示怀疑，而且还无所顾忌地咒骂起来。厌母的症状越突出，贬义的形容词也就叠加得越多。于是，有关回归母亲的叙事竟缺乏颂扬之词，倒是谩骂不绝于耳。就此而言，贝克特恐怕超越了他的都柏林同乡斯威夫特。

此外，莫洛伊的厌女症还体现为母亲生理上和语言能力上高度退化的妄想，这种妄想

是一种针对母亲的间接的污言秽语。在他的狂欢游戏中，母亲不仅语言能力灾难性地退化，而且在儿子的肛门排泄发作中丧失了作为母亲的资质。即使是使用儿子特意发明又借暴力付诸实践的最简单的语言，她也几乎无法和儿子沟通：“我通过敲击她的头颅的方式和她沟通。敲一下表示‘是的’，两下表示‘不是’，三下表示‘不知道’，四下表示‘钱’，五下表示‘拜拜’。我绞尽脑汁把这套编码往她报废、狂乱的脑子里灌输，却不得其法。……即使没有全然失去测量的概念，她看来至少已经丧失了计算二以上数字的能力。……这[更为有效的手段]就是用拳头在她脑袋上擂一下或者多下（次数照我的需要而定），而不再用我的指数指关节来敲”（18）。对母亲这个几乎没有记忆力的白痴而言，有效的编码系统应该是一系列有序的对头颅的重击，是一种比蜜蜂的舞蹈还要简单得多的初级语言。而且，既然她无法计算大于最小复数的数字，这个脆弱的语言系统事实上已经简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仅仅由表示“是的”或者“不是”的两个符号组成。假使是运用符号的能力将人与其它动物区分开来，那么这个母亲就可以诊断为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资格的动物，更不用说是一个能抚养子女成长的人。

由于莫洛伊的恋母情结出现了错乱，这个只能表示肯定或者否定，而且借助暴力来推行的语言系统，很可能也是莫洛伊对母亲流产未遂或者难产进行报复的手段，和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给政治科学家开出的药方异曲同工。表面上，这个语言系统和莫洛伊从肛门出生的妄想没有直接关系，但他推行这一系统所借助的暴力以及叙述的节奏分明显露出排泄的快感，因此这种语言系统的推行和叙述，必定适用于别的括约肌（如嘴唇）的反复张合，可以看作是针对母亲的污秽学的升华。无论如何，在有厌女症倾向或“厌母情结”的作者笔下，肛欲的冲动自然变成了针对母亲的“一种敌对，有时甚至带有虐待性的暴力”（Hill 89）。于是在莫洛伊的叙事中，肛欲期的敌对性就成了他针对母亲的污言秽语的心理基础，其效用就是使他能够重写关于自己出生的脚本。

四、（反）缠线板游戏

“缠线板游戏”是对离开母亲、进入以父亲为中心的文明社会的过程的模拟，玩家在心理上必定是“镜像阶段”的“婴儿主体”（the infantile subject，如弗洛伊德不满一岁的孙子）。莫洛伊回归母亲的历程就是他向“婴儿主体”的地位不断退化的过程，即从“象征界”向“想象界”退化的过程，这种退化为他玩弄反讽性“缠线板游戏”铺平了道路。经过漫长的跋涉，他发现自己的身体机能已经高度退化，而且辅助设备（自行车）也弄丢了，结果乏力地掉进了水沟，像婴儿夹在产道中那样无能和无助。在回归的幻觉中，他甚至不像通过镜像认知了身体完整性的婴儿，相反，他感觉到了身体的瓦解：四肢“离我很远”，或者“不像是我的”，于是手、脚就独立地“成双成对”（66），全然不受他的控制。此外，语言能力的瓦解也暗示了莫洛伊向“前镜像阶段”的退化。随着寻母的旅途接近终点，他总感到事物“无以命名”，或者语言已经变成“冰冷的词语”（31）。对他而言，从语言到事物、从能指到所指的指涉过程已经中断了，因此“除了无名的事物就绝无事物，除了无物的名字就绝无名字”（31），仿佛他确实已退化到了尚未接受语言、尚未确立主体性的阶段。无论莫洛伊是否停滞在“前镜像阶段”，其生理的退化和语言的瓦解为他的“反缠线板游戏”奠定了心理学的基础。

事实上，莫洛伊的“反缠线板游戏”多已在他的恋物癖症状中表现出来，而且起先多指向对母亲的占有，而非对母亲缺场的接受。除自行车和车上的喇叭外，他的“吮石”就

是理想的缠线板之类的玩具，其挪动的各种方式实际上只是他象征性地掌控乳房从而掌握母亲的方法。起先，令这个游戏玩家“愤怒且疑惑不解”（71）的，不是那些石头无法消化，而是这个游戏的符号学意义。当他准备扔掉那些石头时，这场游戏就进入了高潮。在莫洛伊的游戏中，没有养分的东西取代了乳房，这一特点使他得以象征性地掌控乳房及母亲，但是，他还是把乳房连同那些卵石一同抛弃了，这个结局表明在父亲法则的干预下，他终究放弃了和母亲乱伦的想法。因此在回归母亲的旅途中，有人给他递来饮料和面包（乳汁似的或乳房形的可消化食物）时，他的反应是焦虑、敌意和惊厥，仿佛他最终接受了父亲法则，不愿再接近跟母亲相关的事物。

正如“吮石”游戏的结局那样，莫洛伊的“缠线板游戏”都有一盘指向相反的“残局”，即当他终于抛弃那些玩具时，他的游戏就不再是反讽性的了，而是从指向对母亲的占有向对父亲的服从转变了，这是恋母情结和厌女症在他潜意识中纠结在一起的缘故。这一点在莫洛伊称呼母亲的游戏中体现得非常明确。起先，他同母亲的关系中还有恋母情结的残余，因为他的心中依然有“一份对母亲毫无疑问又尚未承认的需要”（17）。但当他再次提及俄狄浦斯神话时，他的语言游戏就从占有母亲走向了抛弃母亲：“幸而她从不叫我儿子，我受不了这个词儿，而是叫丹，我不知道为啥，我的名字不是丹。丹也许是我老爸的名字，是的，也许她把我当我老爸了。我把她当老妈，她把我当我老爸。……不得不叫她的时候，我就叫她妈格（Mag）。我叫她妈格，因为对我来说，虽说我不知道为啥，末尾的字‘格’（g）让‘妈妈’这个词儿报废了”（17）。在母子相见的时刻，母亲竟把儿子错当作自己的配偶，从而造成了莫洛伊已然占有母亲的妄想。但通过增加仿佛具有阉割能力的字母“g”，他否认了基于母亲认知错误的家庭关系，不仅宣布了母子关系的断绝，而且拒绝了占有母亲的妄想，促使他的恋母游戏向真正的“缠线板游戏”转变。

为了报复母亲，莫洛伊创造了“妈格”这个词，这种造词可以看作是“缠线板游戏”的一个翻版。从莫洛伊的矛盾态度可以看出，他的行为确实跟“母亲在场与不在场”（福原泰平 81）这一悖论相对应。他采用了约定俗成的音节“妈”来指涉母亲，然而母亲已经高度退化，这一事实暗示了合格的母亲实际上的缺场。因此，莫洛伊使用了另一个符号——“字母g”，将“妈妈”这个称呼及其在场废除掉，从而将“来”（fort）废除成“去”（da）。接着，念出自己生造的词语时，他既满足了内心“对母亲的心理需求”（17），但迅即又用末尾的“字母g”抹除了这一符号及其所指。借助象征手段，莫洛伊可以反复控制不可或缺的母亲的存在和缺场，因而他的文字游戏和“弗洛伊德的缠线板辩证法”（Watson 65）相仿。一方面，他借用为父亲法则所接受的象征手段满足了和母亲乱伦的欲望，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父亲对乱伦的禁令，通过抹除母性实现了对丧失或缺场状态的象征性掌控。因而，他的寻母历程也是远离母亲的征程，或者说也是被迫寻找父亲的征程——父亲法则的存在早已由具有阉割能力的“字母g”（Cousineau 49-50）^⑤暗示出来了。在贝克特的小说中，父亲这一角色从不绝对缺场，这一事实使得乱伦行为有可能升华为象征性的“缠线板游戏”。

莫洛伊游戏的突出特征是欲望和压抑的冲突，因为对于已经堕落的母亲，他的态度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存在即是受难，他只有将母亲当作生命的源头和最终的家园；另一方面，他承受着俄狄浦斯禁令的巨大压力，不敢暴露心中反复涌起的对母亲的欲望。这种二元矛盾的胶合正是莫洛伊叙事中欲望运动的基础。在回家的旅途中，他试图解决自己与母亲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预设了分裂、匮乏或者丧失的重大决定，但他的叙事又暗示了

一个司法权威（采取行动以恢复“象征界”的秩序的权威）的存在。在拉康所说的“象征界”，婴儿也许想表达对母亲的欲望，但在能指所在的缺场的世界里，那种欲望总是空乏的；即使不断地向母亲靠近，婴儿也永远都得不到她，除非经由能指在名义上占有她。因此，对莫洛伊寻母之旅的辩证解读就是，他暂时获得了替代性满足，随即又永久地离开母亲，二者交错发生。

在贝克特的小说三部曲中，主人公似乎总是被异化，被抛弃在他者的范围内，永远离开了自我的家园。莫洛伊在寻母途中表现出的心理困境、恋物癖症状和玩弄的“缠线板游戏”，起初都是反弗洛伊德的——它们以隐喻的方式满足了退化主体的乱伦欲望，而非象征性地表明婴儿被迫接受了“差异”（Saussure 88）原则，^①进入了“象征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父亲的无能或者懦弱，而非父亲的死亡。当莫洛伊抛弃那些玩具时，他的症状和游戏才恢复“缠线板游戏”的本色，以象征的手法表示他终于接受了母亲的缺场。因此，父亲法则无论如何衰微却依然有效，莫洛伊必须离开母亲，索菲也必须滚蛋。父亲从不完全缺场，而总是以替身的形象在场。虽说隐形，他却总是无望地守卫着通往底比斯的道路，或者说绝望地阻挡着儿子退化到“前镜像阶段”。这一点在小说的第二部分体现得更加明显。

贝克特出生时有些难产，生来即有厌母情结。这种心理倒错左右了他童年和少年时代跟母亲的关系，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当抑郁症终于发作时，他只得前往伦敦接受将近两年的精神分析治疗，其间在医生的引导下发现了自己潜意识中的病因，并阅读了不少精神分析学著作。“贝克特敢于自我剖析，积极配合（精神分析）治疗”（陆建德，“自我的风景”186），有意把“自我剖析”当作发觉潜意识中的病因的途径兼“不自觉创作过程”（陆建德，《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277）。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经历赋予了他创作的灵感，使他的作品充满了精神分析的色彩，仿佛就是他自我诊疗时“自由写作”的产物。在《莫洛伊》的开篇，贝克特就暗示了“他”和“我”的医患关系及诊断过程：“来拿我新写的纸片时，他（心理医生）就把上周的纸片带来。上面标满了我看不懂的符号”（7）。可以说，莫洛伊的心理困境就是作者本人“身处子宫的记忆”（Knowlson 2）变异和升华的结果。此外，为了不“发出乔伊斯的气味”（McDonald 27），贝克特刻意摒弃了“全知全能”的叙事风格，走向“无知、无能”（McDonald 15）。他创作的成功除归因于对欧洲非理性哲学的文学化演示，也归因于对潜意识的革命性探索和对乔伊斯的扬弃。

注解【Notes】

- ① Samuel Beckett, *Molloy*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 20. 原文引文均出自该版本，以下只注明页码。
- ② 该女人只有教名是确定的（因此本文用其教名），姓氏无从考证。多数论者用姓氏称呼她，是对贝克特文字游戏的意义不甚明了的结果。
- ③ 华生从叙事学的角度讨论了莫洛伊自行车的问题，有些天真。事实上，“自行车喇叭的乐趣”跟“小说的显在主题或叙事的进展”并非没有关系，而是和莫洛伊回归母亲的欲望有着直接的联系。
- ④ 希尔的阐释有些肤浅，因为对莫洛伊而言，重要的不是“吮石”没有养分，而是“吮石”可以作为母亲乳房的替代物。
- ⑤ 库西诺偏离了论题。他探讨的是莫洛伊选择词尾“g”的原因，而不是生造的这个词究竟跟莫洛伊的恋母困境有何关系。

⑥索绪尔认为，“语言中只有差异。”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王小峰 李濯凡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Ai Fukuhara. *Lacan: The Mirror Stage*. Trans. Wang Xiaofeng and Li Zhuofan.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2.]

Beckett, Samuel. *Molloy*.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

Bloom, Harold. Introduction. *Modern Critical Views: Samuel Beckett*. Ed. H. Bloom.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5. 1-12.

曹波：“《瓦特》：文本的混沌与叙事传统的瓦解”，《国外文学》2(2011):54-60。

[Cao Bo. “Watt: Chaos of the Text and Dissolution of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Foreign Literatures* 2(2011): 54-60.]

Cousineau, Thomas J. *After the Final No: Samuel Beckett's Trilogy*. Newark: U of Delaware P, 1999.

Hill, Leslie. *Beckett's Fiction in Different Word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0.

侯维瑞 李维屏：《英国小说史》。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年。

[Hou Weirui and Li Weiping. *A History of British Fiction*. Nanjing: Yilin Press, 2005.]

Knowlson, James. *Damned to Fame: the Life of Samuel Beckett*. London: Bloomsbury, 1997.

陆建德：《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

[Lu Jiande. *Comments o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ir Histories*. Beijing: Peking UP, 2001.]

——：“自我的风景”，《外国文学评论》4(2011):186-195。

[---. “The Self of Literary Masters.”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4(2011): 186-95.]

McDonald, Rona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muel Beckett*.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8.

Saussure, F.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Ed. Julie Rivkin and Michael Ryan.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8. 76-90.

王小章 郭本禹：《潜意识的诠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

[Wang Xiaozhang and Guo Benyu.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Unconsciou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8.]

Watson, David. *Paradox and Desire in Samuel Beckett's Fiction*.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91.

责任编辑：杜娟

贝克特《莫洛伊》中的“镜像写作”

曹波, 姚忠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 在《莫洛伊》中, 贝克特将主题之一设定为模糊不清的镜像, 将叙事的结构原则设定为镜像反射, 使小说分裂为互为镜像的两部分叙事, 并使两位叙事者之间的镜像关系和路人 A 与 C 之间的镜像关系叠加起来, 构成复杂的反射模式。小说中结构对称的餐刀架就是其镜像反射模式的物象, 具有“缠线板”的功能。本质上, “镜像写作”就是关于问题主题在镜像阶段的认同困境的写作。

关键词: 《莫洛伊》; 拉康精神分析学; 镜像关系

中图分类号: I56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44(2013)03-0077-04

Abstract: In *Molloy*, S. Beckett takes the vague mirror as a motif and mirroring as the structural principle of narration. Thus the novel is divided into two mutually reflecting sections, and the mirror relation between Molloy and Moran and that between A and C are closely associated, illustrating a complex mode of reflection. The symmetrical knife-rest is the image of the mode of reflection, and works like a fort-da game. In essence, “mirror writing” is the writing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subject’s dilemma of identification during the mirror stage.

Key words: *Molloy*; Lacanianism; mirror relation

1. 引言

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 是 1969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小说三部曲的首篇《莫洛伊》(*Molloy*, 1955) 中, 虽然“镜像”一词出现的频率不如在前一部小说《瓦特》中那么高, 但一些人物、事件和场景却暗示了“镜像关系”的确存在。从认识论和叙事学的角度来说, 这部小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镜像关系”。两位主角(莫洛伊和莫兰)的双重叙事既相互隔离又紧密相连, 和父母之间严格维持的对立相对应; 当莫兰最终无论外表还是内心都酷似之前的对立面(莫洛伊)时, 他们就成了对方的模糊镜像。因此, 这部小说展现的是由家庭三角关系定义的主体身份在模糊镜面中的复杂反射: 镜面的一侧是受到母亲吸引的“婴儿主体”, 另一侧是受到父亲压制的“问题主体”, 而且这面镜子总是把它反射的影像倒转过来, 在多重“镜像关系”中构造作者的“镜像写作”(mirror writing) (R. Begam 1996: 114)。

2. A 和 C 的镜像关系

在主体成长的过程中, 进入“镜像阶段”和进入“俄狄浦斯阶段”同样困难重重, 因此贝克特索性把这两个紧密相连的阶段融入同一个文本中, 于是《莫洛伊》就分为两部分(原文各 84 页), 分别讲述一位儿子式人物或父亲式人物的故事。第一部分是莫洛伊的叙事, 以母亲为中心, 洋溢着回归母体的欲望, 第二部分是莫兰的叙事, 充盈着得到父亲认可的欲望; 一方面莫洛伊还陷在俄狄浦斯阶段难以自拔, 另

一方面莫兰又在回归镜像阶段, 仿佛要重新辨认自己的身份。在两部分叙事中, 家庭三角关系的破碎为镜像关系在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 这部小说突出的模糊性源自镜面的昏暗和波动(因而模糊不清), 而不是像《瓦特》中那样源自直接的“差异缺失”(indifference) (D. Watson 1990: 96)。

第一组“镜像关系”是陌生路人 A 和 C 的关系。在暮霭中, 莫洛伊躲在灰色岩石的阴影中看到了他们“这场景的背景本身就是一个镜像”^①因为山谷两边的山丘、断崖和路冠如此对称, 甚至“一模一样”(9-10), 如同在山谷这面镜子里映照出来的影像。这些地理标志相互间如此相似, 甚至都成了“无法用词语来形容, 也无法用思想来表达的符号”(10)。其相似性否决了“语言”——因为“语言中只有差异”(F. de Saussure 1998: 88), 而中间的镜面更是强化了“差异”的消解和个体身份的消失。除了地形这一静止的镜面, 在“向对方慢慢走近”(8)的 A 和 C 之间, 其实还有一个假想却更为重要的镜面, 只是“由于地形的起伏, 道路也显得起伏不定, 如同波浪”(9), 那一镜面显得摇摆不定。在波动的镜面里, 昏暗的镜像只能在路冠的背后时隐时现, 因此观察者很难看到稳定的镜像, 也无法看清由他者反射的自我的身份。这一点也暗示了莫兰把莫洛伊作为另一个自我来寻找的旅途将前途渺茫。

无法看清“看起来如此相像”(9)的两位路人之间有何区别时, 莫洛伊无法借助一长串描述性词语来标明差异, 只得拿两个再简单不过的字母给他们贴上标签。假如“A 和

C 就是亚伯(Abel) 和该隐(Cain) 两人名字的首字母”(T. J. Cousineau 1999: 113-114) ,而且这两个身份明确的《圣经》人物成了几乎无名又几乎无法区别的路人,那么这一戏剧性的变形就暗示了贝克特通过镜像关系抹除个人身份的意图,以及这部小说有意营造模糊性的倾向。对于这种蒙昧的角色,镜子终于出现了:在“同一个水槽”边“他们相互打量着,相距足足有十五步,然后停下脚步,胸部贴着胸部”(9) 。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自己清晰的镜像,或者不愿意面对在对方身上反射出来的模糊不清的另一个自我,于是很快就转过身去,各走各的路。在贝克特的笔下,所有问题主体见到的都是混沌的镜像。

莫洛伊对迷失身份痛苦不堪,急于和路人认同,却大失所望,因为他们都笼罩在暮色中,模样模糊不清“很难和自己区分开来”(8) 。在他朦胧的思绪中,“内外之间的区别,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区别,都已变得微不足道了”(R. Begam 1996: 114) ,因此他的感知总是以含混不清结束。接下来,他的行为就是仔细观察自己的昏暗镜像,与此同时又不让路人看到自己,而路人 C 则应该转而依赖他,向他寻求“记忆的导向标”(10) 。于是无论外表还是内心,他们都融为一体了:

我看着他往后退,对他的焦急感到焦急万分……天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焦急让他焦急万分了。他还没看见我。我居高临下……平整地贴在一块岩石上,那块岩石和我是一个颜色,也就是灰色。……他向四周打量,仿佛要把这些景物刻在脑海里,他肯定看到了这块岩石,我就蹲在岩石的阴影里……我看着他后退,内心被起身跟上他的诱惑揪住……那样才能更多地了解他。可是,虽说我的魂儿都急着跳出来跟上他,……我依然只是模模糊糊地看见了他。(10-11)

作为莫洛伊的镜子,路人 C “因为暮色”,早已是“昏暗不清”了,而且“由于地形的起伏”(11) ,还只能时隐时现,一会儿就消失在地势低洼的地方。而作为路人 C 的镜像,莫洛伊则整个模糊不清,因为他完全淹没在灰色岩石的阴影中。因此,他们尽管急于相互认同,却无法看清对方的个人特征和身份。

由于莫洛伊认同 C 的欲望,路人 A 和 C 之间的“镜像关系”开始和莫洛伊与莫兰之间的“镜像关系”叠加起来了,从而使作者重复“镜像关系”的模式初现端倪。但贝克特“镜像写作”的实验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在构建莫兰和莫洛伊的“镜像关系”的过程中更趋复杂。

3. 莫兰—莫洛伊镜像关系的叠加

有关“镜像关系”及其模糊性的证据散布在小说中,足以表明“A 和 C 其实就是莫兰和莫洛伊的翻版”(R. Begam 1996: 113) 。正如莫洛伊对路人 C 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莫兰也在路人 A 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即莫洛伊与莫兰的关系就是 C 与 A 的关系。此外,和 A、C 之间起伏不定的镜

面相似,莫兰面前的镜面是一条水面本来平静却被涟漪搅乱的小溪。他打发满腹牢骚的儿子去洞口取自行车,自己则来到小溪边独自待着,一会儿就像泉边的“纳西索斯”或湖边的“格列佛”(曹波 2010: 55) 那样反思起自己的身份来:

我躺下来,望了一眼自己的倒影,接着洗了洗脸和双手。我等着自己的倒影回来,我望着它颤悠悠地复原,越来越像。时不时地,我的脸上滴落一滴水珠,把倒影又击得粉碎。(145)

莫兰望着自己的镜像,这一情节进一步提示了镜面不合格这一主题。清晰的投影很快而且轻易就被击碎了,因为他的镜子是轮廓不定且柔软的水面。投影先是被照镜人的双手搅乱,接着快要复原时,又被他脸上滴落的水珠击破。镜面两度被外力打破,接着又被照镜人自己“弄得更加模糊不定了”(R. Begam 1996: 115) 。而且,这一镜像关系就发生在莫兰想着找到莫洛伊时该拿他怎么办之后,仿佛莫兰永远都没法看到一个清晰、稳定的自我,只能看到一个在寻找莫洛伊的过程中越来越退化和模糊的自我。

很大程度上,这时已大为削弱的自我反省只不过是莫兰可能的和 C(莫洛伊的残余影像) 见面的预兆。在内心想考过莫洛伊、视觉上反观过自己之后,莫兰再次通过暮色中昏暗的镜面,看到了“几步开外”(145) 可能就是 C 的人。他们“一言不发,相互打量了一会儿”(146) ,但是莫兰明显不愿意认同这一颓废的镜像,只是在发觉他的自我和 C(或者莫洛伊) 没什么两样时,才不得不接受这一镜像。此处,镜面的昏暗倒是反映了莫兰寻找莫洛伊的任务的晦暗前景,或者说是莫兰的自我发觉之旅的晦暗前景。这一点得到了莫兰幻觉中模糊的河中倒影的证实:思考莫洛伊的身份问题时,莫兰感觉仿佛面对着一面柔软而晃动的镜子;当渐渐浮现的脸庞太过昏暗,而且摇晃不定,让观察者无以确认自己的身份时,镜子不合格这一主题就更显突出了。此处,莫兰在涟漪中看到的不是他自己的倒影,而是他的自我的视觉影像,这一影像已经剥除了从“父亲法则”那儿习得的面具,是自我本真的镜像。然而,尽管莫兰的另一个自我似乎即刻就可以触知,但他在心理的退化中期待的是已故主体的模糊不清的头颅,因而有“被剥夺了自我”(149) 的感觉。

正是在昏暗的镜像反射和“自我消解”(陆建德 2001: 263) 这样的情况下,莫兰终于遇见了自己的另一个自我——可能是 A 的人。一如既往,贝克特笔下的主角又是在暮色中朦朦胧胧地看到了自己的镜像:

……我就在那儿,和一个昏暗不清的人面对面,因为暮色,脸庞昏暗不清,体形也昏暗不清。……那张脸……似乎有些像我的脸,……长着相同的小胡须,相同的雪貂似的小眼睛,相同的鼻梁包茎……(149-151)

贝克特一直在含糊其辞的不合格镜像的主题,在这里终于公开叙述了。莫兰在幻觉中反观自我之后,接着就“面对面”地见到了一个“昏暗不清”的人,那人和过去的莫兰的另一个自我相像。身体上的极其相像掩盖不住心理上的迥

然不同,这一点在他们对相遇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中体现得明白无误。在寻找莫洛伊的路途上,莫兰无论外表还是内心都已退化得和莫洛伊相似,看到另一个自我的形象不禁恐惧起来,因为当他要莫兰看看他的“身份证”(151)时,那个自我展现的是莫兰清晰的身份。莫兰认为身份证“毫无意义”,还下意识地杀了A,这样“他就再也不像我了”(151)。对于探索自我的人,面对在父亲的语言中习得的自我的丧失,这是无法忍受的,于是莫兰最终捣毁了那面变形的镜子——谋杀了路人A,正如莫洛伊谋杀了森林里的烧炭工。

莫洛伊和莫兰是两个独立的叙事者,他们的相遇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他们各自和C,A的相遇间接实现的。正如莫洛伊在C身上看到了自己发育不全的自我的模糊镜像,就在退化之前,莫兰也在A身上发现了自己的胚胎般的模样;正如A和C在暮色中的“同一个水槽”中有一瞬间看到了对方一样,退化了的莫兰也在自己忽闪忽闪的幻觉中见到了莫洛伊。这一镜面反射的模式由一整套昏暗的“镜面反射”组成,或者说贝克特创造了一个昏暗的万花筒,里面有两对自我探索者在昏暗中互相打量。事实上,贝克特早已对自己的“镜像写作”进行了暗示:莫洛伊从索菲那儿偷来的结构对称的餐刀架就是其“镜像写作”的最佳物像。

4. 镜像关系的反射模式

小说中有关“镜像关系”的第二个插曲,是莫洛伊曾久久地、无限好奇地瞪着结构完全对称的餐刀架这一情节。这个银质的架子自身就是一面镜子: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右半部分和左半部分如此对称,仿佛各个部分就是各自对应部分的镜像,因而各部分间的“镜像关系”构成一个复杂而混乱的系统,似乎消解了指涉性差异及各自的身份。餐刀架由“两个十字架组成,相交部位由横杆连接”(63),可以通过各个部分的排列和组合展现出无限的镜像,有如在万花筒中一样。假如横杆就是镜面,那么整个架子就像是一对锯片粘在一起,因为餐刀架早已是“一个小小的锯片”,只是“真正的锯片上的十字架……被截去了上端”(63)。换一个角度,在这个神秘的镜子里,有“两个相同的V形”反射了出来,“更确切地说”,总共有“四个完全相同的V形”(63),它们的开口分别在上端或者下端,以横杆为镜面相互反射。再换一个角度,假如横杆的中点是镜面和横杆垂直相交的地方,那么反射出来的就是相连部位有一根短柄的十字架,或者说就是两个相同的V形,尖端由截断的柄连接,开口面向左侧或者右侧。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观察,这个刀架总有一半是另一半的投影。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该餐刀架的神秘性来自“差异缺失”。就形状而言,“这个奇怪的工具”没有左右之分,也没有上下之分,以“四个落地点中的任意一个落地,都能同样平稳地”摆放在桌子上,“而且外观也没有任何变化”(63)。就用处而言,这件物品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功能”,一个凝神

观察的莫洛伊“捉摸不透的功能”(64),即假如不作餐刀架来使用,那么其功能就是一个难解之谜,一个观望者可以带着“崇敬”的心情“没完没了地……感到迷惑不解”(64)的纯粹的形状。这一物体和任何对应物都没有区别,缺乏个体的身份,或者说缺乏源自特定指涉语境的任何意义。在两种情况下,这面镜子都是无用的,因为对于轮廓清晰、身份明确的物体,它无法反射出一个反转因而略有不同的镜像。既然“差异缺失”正是抛弃“父亲法则”的人一心追求的,那么在莫洛伊从索菲那儿拿走的“小小物品”中,惟独餐刀架才是莫洛伊即使在“最最缺钱”的时候也无法“割舍”(63)的,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这纯粹的形状所唤醒的认知的无知,竟然成了莫洛伊的慰藉“超越对任何事物的认知……对毫无好奇心的寻求者的灵魂来说,那才是平静来临的时刻”(64)。对于寻求和母亲合二为一的人,重要的是脱离了“差异”和“父亲语言”的“平静,”而非源自对相关物体间的“差异”的认知。

餐刀架就是贝克特“镜像写作”模式的物化,因为莫洛伊、莫兰、A和C实际上组成了一个由两个水平相连的十字架组成的框架,每人占据其中一个十字架的一端。这样的结构模式展现的是一组相互关系,其中,不仅“头部”(或者源头“在追逐自身的尾部”(或者倒影),而且由于镜面的昏暗和摇摆不定,“头部和尾部已变得越来越难以区分了”(R. Begam 1996:118)。旅途刚开始时,莫洛伊模模糊糊地看见了A和C的相遇,这一相遇构成了原型镜像关系。认识论的沟通被改写成了自我把自身作为他者来打量的意象,而那些在其中发生的类似事件及两位叙事者,不是带领读者追索到了线头,而是越来越远离线头,来到了主体绕着缺场的中心旋转的纠缠不清的结本身。假如贝克特刻意编织了一个线乱如麻的结,那么他的意图就被莫洛伊偷来的餐刀架展现出来了——餐刀架正是主体作为衰老的追寻者早已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或者站在昏暗的镜子内外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旅途上迷失了方向的物象。

贝克特“镜像关系”的重复模式也是一种“缠线板游戏”(fort-da game),“再现的是原本缺场的事物”,或者“对从未发生过的事件”的“种种忧虑”(T. J. Cousineau 1999:69)。确切地说,莫洛伊和莫兰照镜似的相遇实际上是第一个类似事件的重复,即对C和A相遇的重复。这种重复对于贝克特笔下的两位主角极其重要,因为对于难以确认自我身份的他们而言,反反复复把“镜像”抛出去(fort)又拉回来(da),似乎就是征服了定义自我的他者,虽说只是象征性地或者朦朦胧胧地做到了。这种重复对于“父亲法则”的功能也是至关重要的,以多数读者迄今还不知晓的方式表明了阉割者的权威,但此处,正如镜面多半昏暗不清或者摇晃不定那样,它几乎无益于确定照镜者的身份,或者说由于某些外在因素,几乎无法把缠线板拉回来。

假如莫洛伊的“妈格”(17)游戏带来的,是跟强调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差异”这一方面相关的愉悦,那么该小说中

“镜像关系”的大范围重复,则使自我与他者间的创伤性分离的再次展现得以成为一种令人厌恶的经历。换言之,结构性的重复与其说是对经历快乐的时刻的持续重复,不如说是对极端忧虑的时刻的反复重复。但这种重复实行的也是“快乐原则”,因为它将过剩的力比多约束住了,而且允许这一原则释放多余的紧张感。贝克特的小说常常借助“镜像写作,”滑入以五花八门的方式重复的复杂结构中,导致互文性和原小说性的大爆发。

5. 结语

贝克特在两部分叙事中分别探索了恋母的莫洛伊和基督似的莫兰的种种困境,又借助“镜像关系”将两者连接起来。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看来,莫洛伊在父亲缺场时,在寻母旅途中借助种种“缠线板游戏”象征性地实现了乱伦的欲望。他借助了游戏,而不是真正地占有了母亲,因为乱伦指向的是整个家庭的灭亡以及作者写作实验的终结。而莫兰则是“象征界”的牺牲品。在回归女性自我的旅途中,他逐渐失去了在“象征界”习得的文明,像耶稣一样殉难了,恐慌不已地发现了内心的本真。他们虽然身处几乎截然分开的两段叙事中,却通过“镜像关系”神奇地连接了起来,但他们的镜像是模糊不清的,无法赐予他们清晰的自我身份,反倒增添了他们的心理困境。此外,贝克特此处的“镜像写作”既是上一部小说中镜像叙事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下一部小说中最具元小说特征的写作游戏的预演。毕竟,他的脑海里一直保留着“身处子宫的记忆”(J. Knowlson 1997: 2),而且他也是一个自觉的先锋派作家。他的小说越来越关注写作与主体性的不确定之间的关系,可定义为有关问题主体在镜像阶段的认同困境的小说。

(上接第76页)

著增大的趋势,教师的职业倦怠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界,如果不对其进行密切的关注和防治,将严重危害教师的身心健康,影响到学生的成才,以及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前文对这一问题进行的调查研究中,已经发现了其中存在的某些关键现象和成因,需要寻找和构建与之相应的措施,以此来促进教师队伍的正常、健康发展,为高等教育事业的推进保驾护航。为此,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1) 正确看待高校英语教师的职业倦怠问题,合理地引导教师教学和科研心理走向;2) 促使社会、学校和教师个人共同面对这一严肃的问题,调动一切力量关注和解决这一问题;3) 通过必要的激励手段,提升高校英语教师参与教育工作的积极性和主体性,使其将职业作为事业来对待,等等。

参考文献

- [1] Maslach, C. M. & Jackson, S. E. Leiter, M. P.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Manual* (3rd ed.) [M]. Palo Alto: 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 1996.
- 80 •

注释:

- ① 引自 Beckett, Samuel. *Molloy*.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 年第20页。以下原作引文只标明页码。

参考文献

- [1] Begam, Richard. *Samuel Beckett and the End of Modernity*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1996.
- [2] Cousineau, Thomas J. *After the Final No: Samuel Beckett's Trilogy* [M]. Newark: Univ. of Delaware Press, 1999.
- [3] Knowlson, James. *Damned to Fame: The Life of Samuel Beckett* [M]. London: Bloomsbury, 1997.
- [4] Saussure, F.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A].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J]. In Julie Rivkin & Michael Ryan (eds.).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8: 88.
- [5] Watson, David. *Paradox and Desire in Beckett's Fiction* [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0.
- [6] 曹波. 经济人的政治话语——再论格列佛的异化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0(4): 54-57.
- [7] 陆建德. 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贝克特‘失败’小说研究”(项目编号: 12FWW012)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 曹波,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英国文学、爱尔兰文学及文学翻译。

姚忠,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爱尔兰文学、英语教学。

收稿日期 2012-09-07

责任编辑 采玉

1996.

- [1] 李永鑫, 李艺敏. 职业倦怠诊断标准的初步探讨 [J]. 心理科学, 2006(1): 148-153.
- [2] 鲁莉. 非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英语学习现状调查研究 [J]. 外语教学, 2009(6): 80-84.
- [3] 魏绪涛. 高校教师职业倦怠的成因及其对策——以大学英语教师职业倦怠问题为例 [J].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8): 37-39.
- [4] 薛荣. 论交际口语测试及其评分方法 [J]. 外语教学, 2009(6): 62-66.
- [5] 许海燕. 大学英语教师职业倦怠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J]. 教育与现代化, 2010(9): 88-91.
- [6] 赵建平. 地方性高校教师职业倦怠归因及干预策略 [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1): 10-13.

基金项目: 本文系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基于认知心理学的外语教学研究”(项目编号: 12240045016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英爽, 南阳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硕士, 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与研究。

收稿日期 2012-09-20

责任编辑 采玉

基于情感膨胀门控 CNN 的情感-原因对提取*

代建华^{1,2,3} 邓育彬^{1,3}

¹(湖南师范大学智能计算与语言信息处理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长沙 410081)

²(湖南师范大学语言与文化研究院 长沙 410081)

³(湖南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长沙 410081)

摘要:【目的】针对情感-原因对抽取这一情感分析任务,提出情感膨胀门控 CNN(EDGCNN)模型。【方法】首先使用情感判别模型 CNN 找出情感句,然后将情感句编码输入到融入情感特征的 EDGCNN 模型,找出相应的情感原因,得到情感-原因对,并在实验数据集进行情感原因关键字标注。【结果】召回率和 F1 值分别达到了 63.52% 和 60.45%,召回率优于已有方法最好结果,F1 值与已有方法最优性能相当,而且能从更细粒度实现情感-原因对抽取。【局限】情感-原因对语料规模较小,有待进一步扩充完善。【结论】EDGCNN 模型能够从文本中更好地抽取情感-原因对。

关键词: 情感-原因对抽取 EDGCNN 情感判别

分类号: TP391 G202

DOI: 10.11925/infotech.2096-3467.2019.1243

引用本文: 代建华, 邓育彬. 基于情感膨胀门控 CNN 的情感-原因对提取[J].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 2020, 4(8): 98-106.(Dai Jianhua, Deng Yubin. Extracting Emotion-Cause Pairs Based on Emotional Dilation Gated CNN [J]. Data Analysis and Knowledge Discovery, 2020, 4(8): 98-106.)

1 引言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社交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共享各种新闻和信息源的平台,所以从互联网的海量文本(如商品的在线评论、舆论新闻等)中挖掘出情感倾向和情感原因是非常有意义的。文本中情感研究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热门方向,情感研究又分为情感分类和情感原因抽取(Emotion Cause Extraction, ECE),目前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情感分类的研究上。如 Rout 等^[1]提出一种基于词权重的无监督的 Twitter 文本情感分类方法。Peng 等^[2]通过训练原域大量带有标签的数据及目标域少量带有标签的数据,对目标域大量无标签数据进行跨领域情感分类。为了解决特定方面的情感极性分类问题,刘全等^[3]提出结合区域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NN)和分层长短期记忆网络(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的深度分层模型。张庆庆等^[4]研究了深度信念网络在文本情感分类任务中的参数选择与性能。

一般来说,个人情感的产生、表达和感知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情感原因被认为是能够引发相应情感的事件或条件,因此情感原因的分析对于民意挖掘和知识发现等至关重要。但由于 ECE 任务困难加上相关标注的数据集较少,所以相应的研究^[5-6]也较少。在深度学习之前,情感原因抽取的研究是基于规则的。例如, Lee 等^[7]提出一种基于文本驱动和规则的汉语情感原因关系检测方法; Yada 等^[8]使用自举技术,自动获取连接词作为文本提示模式以提取情感原因; Gao 等^[9]提出一种基于规则的中文微博

通讯作者:代建华, ORCID: 0000-0003-1459-0833, E-mail: jhdai@hunnu.edu.cn。

*本文系湖南省科技创新计划项目“湖湘高层次人才聚集工程-创新人才”(项目编号: 2018RS3065)和“智能计算与语言信息处理湖南省重点实验室”(项目编号: 2018TP1018)的研究成果之一。

情感原因成分检测方法,利用设计好的情感原因抽取规则,发掘微博评论里面的情感原因。随着深度学习的发展,很多神经网络模型^[10]被应用到情感原因的抽取。Gui等^[11]将情感表达词作为查询词,将上下文作为文本,借用基于记忆网络(Memory Network)^[12]的问答(QA)方法,进行“是”或者“不是”的问答,判断当前文本是否是情感原因的文本,然后借助注意力机制进行情感原因关键词的抽取。Yu等^[13]提出一个联合的情感原因提取框架 RTHN,同时对多个子句进行同步编码和分类,从语句中分类出情感原因句。

然而,以上这些情感原因提取都是提前人工标记出文本情感倾向,只需要从文本中提取出相应的情感原因。Xia等^[14]在 ECE 任务上做了升级,提出情感-原因对抽取(Emotion-Cause Pair Extraction, ECPE)的新任务,即给定一段不做任何标注的文本,从中抽取相应情感-原因对;利用多任务模型逐句判别出情感句和原因句,然后通过笛卡尔积得到所有的情感-原因对,最后训练出一个过滤器以过滤掉那些非情感-原因对。然而,这种策略属于粗粒度情感原因分析。例如:“1-这间房子交通便利的同时价格却非常高昂,2-让小明纠结是否买下它,3-他心里很是喜欢,4-但是看了看自己的钱包,5-他面色却忧愁了起来。”粗粒度的情感-原因对抽取方法,只能够对句子进行分类,得到情感句为第3句和第5句,相应的情感原因都在第1句,但这只是较粗略的分类结果,更细粒度的情感和情感原因结果应为“他心里很喜欢:房子交通便利”和“他面色却忧愁了起来:价格却非常昂贵”。为了得到细粒度的情感原因,本文在数据集上进行情感原因关键字标注,并参考苏剑林^[15]提出的基于 CNN 的阅读理解式问答模型,设计了融入情感特征的情感膨胀门控 CNN(Emotion Dilation Gated CNN, EDGCNN)情感-原因对定位模型,更细粒度地进行情感原因抽取,更好地完成 ECPE 任务。

2 情感-原因对抽取任务及实验思路

2.1 ECPE 任务

ECPE 任务具体为:给定一段文本 $d = [c_1, c_2, \dots, c_m]$,从中分析出情感-原因对,如公式(1)

所示。

$$P = \{\dots, (c^e, c^c), \dots\} \quad (1)$$

其中, c^e 是表达情感的语句; c^c 是相应的引起情感的原因语句。

如图1所示,给定文本“她身体就不好,……,张志刚得知妻子要捐肾给自己时,他十分感动,同时也非常担心……”。ECPE 任务是提取出所有的情感-原因对,可以提取出两对表达情感的句子:(他十分感动,张志刚得知妻子要捐肾给自己时)和(同时也非常担心,张志刚得知妻子要捐肾给自己时),张志刚感动和担心的原因都是因为妻子要捐肾给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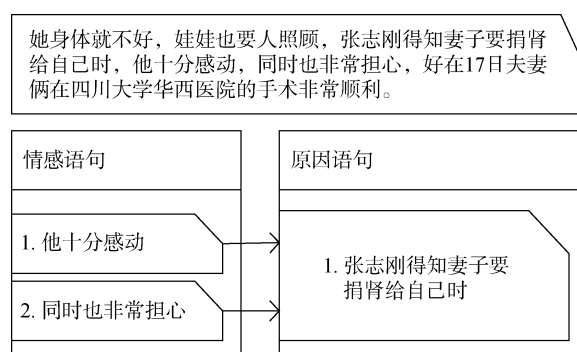


图1 ECPE 任务例子

Fig.1 Example of ECPE Task

2.2 实验思路

本文具体实验思路如图2所示,对文本进行分词,加载预训练的词向量得到句子级别表示。随后使用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字词向量融合情感判别模型对句子进行情感分类,识别出段落中的情感句。最后把情感句作为问题输入到融入情感特征的 EDGCNN 模型,使用 EDGCNN 对情感原因关键字进行定位,解码得到情感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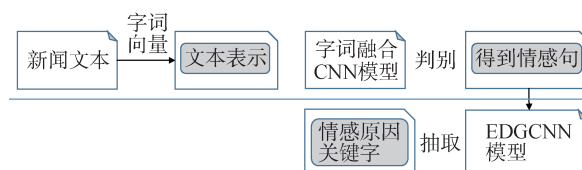


图2 实验思路

Fig.2 Experimental Considerations

3 实验模型

3.1 情感判别模型

CNN在图像领域有很多成功应用,后来也成功运用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中。Kim^[16]使用CNN进行文本分类并取得了较好的结果,表明CNN具有很强的语义特征捕捉能力。情感表达往往会带有诸如“担心”“感动”这种能够表示情感倾向的词,因此融合字词向量的CNN模型能够学习到这些关键词的特征,有利于情感语句的判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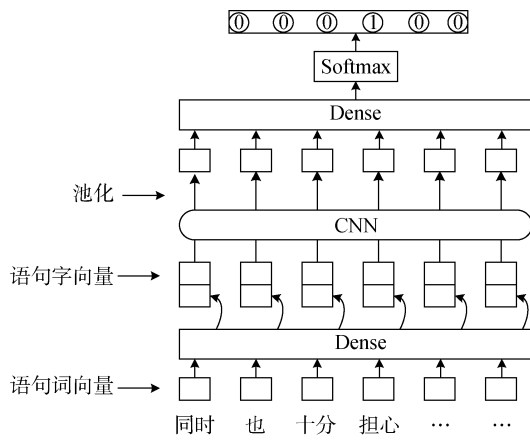


图3 情感语句判别模型

Fig.3 Emotional Discriminant Model

情感判别模型如图3所示,文本 d 中的每一条语句 c_i ,经过分词后,输入到预训练好的词向量Word2Vec模型得到语句的词向量序列 I_{ci} ,如公式(2)所示。

$$I_{ci} = \{x_{c1}, \dots, x_{cn}\} \quad (2)$$

其中, n 为语句 c_i 分词后词的个数, x_{cn} 表示语句 c_i 的词向量。

语句 c_i 中的字经过Word2Vec模型得到字向量 z_i ,进而得到语句 c_i 的全部字向量 Z_i ,如公式(3)所示。其中, m 为语句中字的个数。

$$Z_i = \{z_1, \dots, z_m\} \quad (3)$$

得到句子的词向量 I_{ci} 后,再经过变换矩阵得到 H_i ,如公式(4)所示。其中, h_m 为矩阵变换后的向量。

$$H_i = \{h_1, \dots, h_m\} \quad (4)$$

最后字词向量融合得到 ZC_i ,如公式(5)所示。

$$ZC_i = \{zc_1, \dots, zc_m\} \quad (5)$$

其中, m 为语句中字的个数, zc_m 为融合的字词向量。

字词融合向量进入CNN层,再进入池化层(Pooling)、全连接层(Dense),最后进入Softmax层,得到情感判别结果。最终得到文本带有情感的语句 $C = \{c_1, \dots, c_t\}$, t 为带有情感的语句个数。

3.2 情感-原因对提取

情感和原因往往是相互关联的,所以本文使用融合情感倾向特征的深度学习框架去找出情感-原因对。

(1) 基于EDGCNN的情感-原因对抽取模型

本文EDGCNN模型框架如图4所示。主要包含两个模块:情感语句编码模块和情感-原因对定位模块。

由图3情感判别模型得到带有情感倾向的语句 $C = \{c_1, \dots, c_t\}$,再经过Word2Vec模型分别得到语句的词向量序列 C_i ,依次作为情感语句编码模块的输入。本文使用情感判别模型Dense层的输出 O_{di} 作为EDGCNN的情感特征编码。情感编码模块的最终输入为 I_i ,如公式(6)所示。

$$I_i = \{C_i, O_{di}\} \quad (6)$$

随后进入CNN进行语义特征抽取得到语句上层语义特征 HC_i ,如公式(7)所示。

$$HC_i = \{hc_1, \dots, hc_v\} \quad (7)$$

其中, v 代表卷积核的个数, hc_v 表示在 I_q 上进行一维卷积^[16]所得到的上层特征。采用Laskar等^[17]提出的空间注意力(Spatial Attention)机制代替简单的池化,每一个卷积核的Attention矩阵参数共享,最后得到融合情感倾向的情感语句上层编码 HE ,如公式(8)所示。

$$HE = \{l_1, \dots, l_v\} \quad (8)$$

情感-原因对定位模块主要包括特征输入层、膨胀卷积层和模型输出层。卷积层负责捕获语句的特征,输出层负责最后的情感原因定位。模型的输入融合了语句的字词向量和情感语句编码。

(2) EDGCNN卷积结构

① 门控卷积

模型采用Dauphin等^[18]提出的门控卷积结构,使用门控卷积可以有效降低梯度弥散的可能,并且还具有保留非线性变换的作用。所以,门控卷积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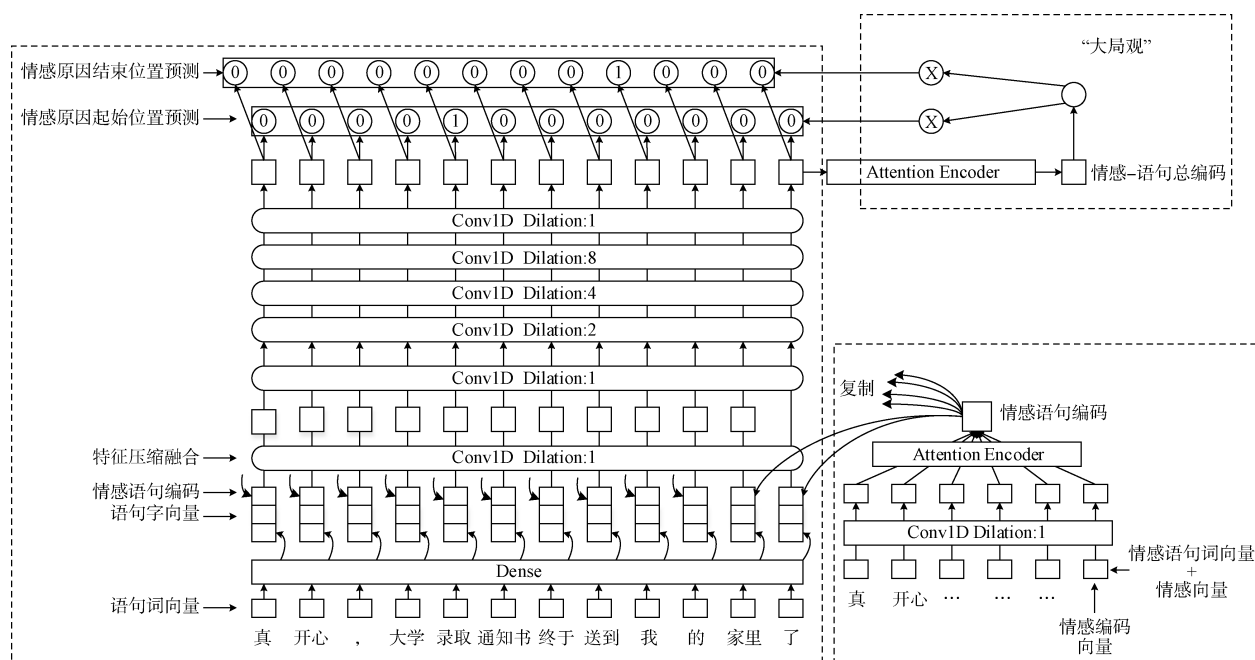


图 4 情感-原因对提取模型

Fig.4 Emotion-Cause Pair Extraction Model

一些自然处理任务(如机器翻译)中取得不错的效果。

给定输入序列 $X = [x_1, x_2, \dots, x_n]$, 门控卷积神经网络与标准卷积不同的是, 前者在每层进行卷积操作后都加上一个输出门限, 用来控制信息的流动, 如公式(9)所示。

$$Y = \text{Conv1D}_1(X) \otimes \sigma(\text{Conv1D}_2(X)) \quad (9)$$

其中, $\sigma(\cdot)$ 为 sigmoid 激活函数; Conv1D_1 和 Conv1D_2 表示卷积操作, 两个卷积的卷积核数一样多, 并且权值不共享。

② 膨胀卷积

传统卷积神经网络对序列建模受到卷积核大小的限制, 但是在自然语言处理中, 文字往往是具有依赖性的, 对于距离较远的依赖, 如果想要抓取这种依赖关系, 必须线性地堆叠模型的层数, 所以为了抓取文字更长的依赖关系。本文使用膨胀卷积神经网络代替传统的卷积神经网络, 膨胀卷积神经网络如图 5 所示。

相比于传统卷积神经网络, 膨胀卷积在每一层做卷积的时候允许间隔采样, 采样间隔受膨胀系数 d 的控制, 如图 5 所示, 当取 $d = 1$ 时, 表示对这一层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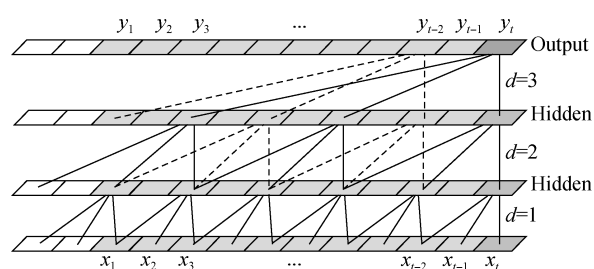


图 5 膨胀卷积神经网络

Fig.5 Dilated Convolutions

个点都进行采样; 当 $d = 2$ 时, 表示每两个点采样一个作为卷积输入。因此, 层数越高, d 越大, 膨胀卷积的窗口随着层数的增加呈现指数增长, 从而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卷积的层数。在图像领域, 可以极大地扩大视野; 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能够抓取传统卷积神经网络需要堆叠层数才能获取的长距离依赖关系, 所以使用膨胀卷积神经网络代替传统卷积神经网络进行特征抽取。图 4 模型中的 Dilation:4 表示膨胀卷积神经网络的膨胀系数为 4。

(3) 注意力机制

EDGCNN 模型采用注意力机制^[19], 用来代替简

单的池化对序列信息进行整合。图4模型中的情感语句编码为一个总的情感语句向量,也将语句的序列编码为一个总的编码向量。注意力机制具体描述如公式(10)和公式(11)所示。

$$z = \text{Encoder}(z_1, z_2, \dots, z_n) = \sum_{i=1}^n \lambda_i z_i \quad (10)$$

$$\lambda_i = \text{Softmax}(\alpha^T \text{Act}(Wx_i + b) + \beta) \quad (11)$$

其中, α 和 W 为可训练参数; $\text{Act}()$ 为激活函数, 本模型取 $\tanh$ 函数; β 为偏置项。

(4) EDGCNN 模型输出设计

模型的输出参考文献[15]中的双标注输出,使用两次标注的方式分别标注出情感原因的起始位置和结束位置,如公式(12)和公式(13)所示。

$$P_i^{\text{start}} = \sigma(\alpha_1^T \text{Act}(W_1 x_i + b_1) + \beta_1) \quad (12)$$

$$P_i^{\text{end}} = \sigma(\alpha_2^T \text{Act}(W_2 x_i + b_2) + \beta_2) \quad (13)$$

其中, P_i^{start} 和 P_i^{end} 分别表示模型的起始位置和结束位置; x_i 为卷积提取的特征; $\text{Act}()$ 为 $\tanh$ 激活函数; $\sigma()$ 为 sigmoid 激活函数; 其他为可训练参数。

为了增加图4模型的“大局观”, 本文先将语句的序列编码成一个整体向量, 同样使用注意力机制代替简单的池化, 然后接全连接层得到一个总的打分 p^{global} , 如公式(14)–公式(17)所示。

$$o = \text{Encoder}(x_1, x_2, \dots, x_n) \quad (14)$$

$$p^{\text{global}} = \sigma(Wo + b) \quad (15)$$

$$P_i^{\text{start}} = p^{\text{global}} \sigma(\alpha_1^T \text{Act}(W_1 x_i + b_1) + \beta_1) \quad (16)$$

$$P_i^{\text{end}} = p^{\text{global}} \sigma(\alpha_2^T \text{Act}(W_2 x_i + b_2) + \beta_2) \quad (17)$$

全局打分对模型的收敛和情感原因定位效果有重要的作用, 如果不存在情感原因, “大局观” p^{global} 直接为0。

损失函数根据 Lin 等^[20]提出的改进的交叉熵损失函数(Cross-Entropy, CE), 即焦点损失函数(Focal Loss, FL)设计, 它能够解决序列标注不平衡的问题, 在情感原因定位模型中, 情感原因关键字显然要比非情感原因少, 损失函数计算如公式(18)–公式(20)所示。

$$\begin{aligned} \text{loss}_{\text{start}} = & \sum_{j=1}^m \sum_{i=1}^n -\alpha y_{ji} \log^{\hat{y}_{ji}}(1 - \hat{y}_{ji})^y - \\ & (1 - \alpha)(1 - y_{ji}) \log^{1 - \hat{y}_{ji}} \hat{y}_{ji}^y \end{aligned} \quad (18)$$

$$\begin{aligned} \text{loss}_{\text{end}} = & \sum_{j=1}^m \sum_{i=1}^n -\alpha z_{ji} \log^{\hat{z}_{ji}}(1 - \hat{z}_{ji})^y - \\ & (1 - \alpha)(1 - z_{ji}) \log^{1 - \hat{z}_{ji}} \hat{z}_{ji}^y \end{aligned} \quad (19)$$

$$\text{loss} = \text{loss}_{\text{start}} + \text{loss}_{\text{end}} \quad (20)$$

其中, α 和 λ 为可调参数; 因为是双标注序列输出, 所以有 $\text{loss}_{\text{start}}$ 和 loss_{end} ; y_{ji} 和 z_{ji} 为真实序列; $\hat{y}_{ji}$ 和 $\hat{z}_{ji}$ 为模型预测输出; n 为模型序列长度; m 为批处理(batch)大小。

(5) 模型解码部分

最后输出两列浮点数字列, 一列预测情感原因起始位置, 另外一列预测结束位置, 如公式(21)和公式(22)所示。

$$P_1 = \{f_1, \dots, f_n\} \quad (21)$$

$$P_2 = \{l_1, \dots, l_n\} \quad (22)$$

P_1 、 P_2 分别表示起始位置和终止位置的打分。为了得到最终的情感原因定位, 设置最大情感原因区间 maxlen , 遍历输出序列长度不超过 maxlen 的区间, 分别计算 P_1 、 P_2 的起始位置和终点位置的打分, 实验使用和、乘积或积的平方根进行计算, 发现使用乘积效果最好, 最后选择得到的最大值区间作为模型预测的情感原因结果。

4 实验部分

4.1 实验数据集

本文使用文献[14]所提供的新闻数据集, 每个文档标记了一条或多条情感句以及相应的情感原因句, 数据集中不同数量的情感原因对的文档所占的比例如表1所示。

表1 具有不同情感-原因对数量的文档的比例

Table 1 The Proportion of Documents with Different Number of Emotion-Cause Pairs

数据集	数量	比例
只有一对情感-原因对的文本	1 746	89.77%
有两对情感-原因对的文本	177	9.10%
超过两对情感-原因对的文本	22	1.13%
总计	1 945	100%

表1在此基础上, 为了抽取情感原因的关键因素, 在实验数据集做了如图6所示的情感原因关键字标注。图6左边 happiness 表示第2句为带有喜悦

的情感语句,并且喜悦的原因也在第 2 句,引起喜悦的关键原因是由于女儿的出生;图 6 右边 sadness 表示第 5 句为带有难过倾向的情感语句,关键原因是由于他们(指父母)还在为我操心。*中间所标注的词表示情感原因的关键字,EDGCNN 模型会抽取这些情感原因关键字。

随机选择数据集的 10% 作为实验测试集,其余作为训练集。为了获得更加可信的结果,进行 5 次实验,取平均值。实验采用正确率(P)、召回率(R)、 F_1 值(F_1)作为评判,如公式(23)–公式(25)所示。

$$P = \frac{\sum correct_pairs}{\sum proposed_pairs} \quad (23)$$

$$R = \frac{\sum correct_pairs}{\sum annotated_pairs} \quad (24)$$

$$F_1 = \frac{2PR}{P + R} \quad (25)$$

其中, $correct_pairs$ 表示模型预测和标记的情感-原因对一致的个数; $proposed_pairs$ 表示模型预测的情感-原因对个数; $annotated_pairs$ 表示测试集标记好的情感-原因对个数。

1,null,null,49年前 2,happiness,喜悦,*女儿的出生*为黄魁吾夫妇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喜悦 3,null,null,可没多久 4,null,null,两人渐渐发现女儿似乎与其他孩子不同 5,null,null,一天天长大的她 6,null,null,不会坐 7,null,null,不会爬 8,null,null,甚至不会自己翻身 9,null,null,奔波了多家医院后 10,null,null,夫妇俩不得不接受女儿患有先天性脑瘫的事实	1,null,null,真的不想治了 2,null,null,我的家庭承受不起 3,null,null,一直都没有能力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4,null,null,现在还要让*他们为我操心* 5,sadness,惭愧,很惭愧 6,null,null,我知道即使手术后风险还是很大 7,null,null,所以就不想治了
---	---

图 6 情感原因关键字标注示例

Fig.6 Example of Emotion Cause Keyword Tagging

4.2 实验参数设置

词向量为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21]提供的搜狗新闻训练的 300 维词向量。情感判别模型 CNN 卷积窗口设置为 2,3,4,卷积核个数为 100 个。情感-原因对定位模型膨胀卷积网络卷积窗口设置为 3,膨胀率一般为指数上升,选择 1,2,4,8。Adam 具有性能优秀、效率高的优点,适用于梯度稀疏或梯度存在很大噪声的情况,所以模型选择它作为优化器。为了防止过拟合,加入了 dropout 优化策略,通常设为 0.3,批处理大小都为 30,EDGCNN 情感原因关键字最大长度 $maxlen=8,10,12$ 。

4.3 实验结果及分析

(1) 情感句判别

首先进行情感句抽取,由于 LSTM^[22]和 CNN 都能较好地对文本进行情感分类,所以选择 LSTM 和 CNN 进行对比,对句子进行二分类,找出文本中的情感句。为了平衡训练数据集,随机选择训练集文

本中非情感句作为负样本,使得训练集中情感句和非情感句数量相当,进行 5 次实验求取平均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情感句判别结果

Table 2 Result of Emotional Sentences Discrimination

实验模型	情感句判别结果		
	P	R	F_1
CNN	0.734 0	0.876 9	0.799 1
LSTM	0.674 4	0.824 6	0.741 9

实验对测试集中句子长度小于 3 的句子不进行情感判别。从表 2 可以发现,由于是对文本中的每一个句子都进行情感判别,且 CNN 更容易抓取到短文本上的情感关键词,池化层也会过滤掉模型认为不重要的特征,所以效果优于 LSTM,之后将得到的情感句作为下一步情感原因抽取模型的输入。

(2) 情感原因抽取

ECPE 任务最近才被提出,相关研究还不多,目前有三种代表性方法^[14],包括独立多任务学习

Indep、交互式原因情感多任务学习 Inter-CE 和交互式情感原因多任务学习 Inter-EC, 而 Inter-EC 在 ECPE 任务上性能最好。Indep、Inter-CE 和 Inter-EC 实际上都是句子级别的学习模型。

Indep 模型具有两层 Bi-LSTM 网络, 第一层的 Bi-LSTM 提取语句级别特征; 第二层中一个任务是情感提取, 另一个任务是原因提取, 每个 Bi-LSTM 为句子级别, 接收 d 个句子表示, 然后把 d 个句子特征作为输入接一个 Softmax 对该子句进行分类。

Inter-CE 是在 Indep 基础上, 把预测得到的情感原因标签嵌入到第一层的语句级别特征, 然后共同作为第二层的输入来预测情感句分类。

Inter-EC 与 Inter-CE 相反, 用预测得到的情感标签融入到第一层抽取的语句特征来预测情感原因句分类。

为验证本文模型的有效性, 将最后抽取结果与上述三种代表性方法进行对比, 实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实验结果对比
Table 3 Experimental Results

实验模型	情感原因对提取结果		
	P	R	F_1
Indep	0.683 2	0.508 2	0.581 8
Inter-CE	0.690 2	0.513 5	0.590 1
Inter-EC	0.672 1	0.570 5	0.612 8
EDGCNN	0.575 8	0.635 2	0.604 5

从表 3 可以看出, EDGCNN 模型拥有最高的召回率, 而 F_1 值和现有最好模型在性能上相当。Indep 将情感句识别和原因句识别当作两个独立的子任务, 上层的两个 Bi-LSTM 分量没有特征交互, 而 Inter-CE 和 Inter-EC 在上层 Bi-LSTM 进行特征融合, 性能更好, 结果也表明情感特征更容易影响原因句的抽取。但是这三种模型最后的过滤器没有考虑到上下文的信息, 会过滤掉很多正确的情感-原因对, 所以在召回率上不如 EDGCNN。F1 值上, EDGCNN 与现有最好模型 Inter-EC 性能上相当, 也说明了本文提出的方法的有效性。此外,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EDGCNN 可以进行更加细粒度的情感原因抽取, 部分情感原因关键字抽取结果如表 4 所示。

ECPE 任务是从文本中找出情感-原因对, 从表

表 4 EDGCNN 模型部分实验结果

Table 4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EDGCNN Model

文本中部分语句	情感句	EDGCNN 输出	情感-原因对
8, null, 白金跃陷入回忆 9, happiness, 并略显激动	9	跃陷入回忆	9-8
3, happiness, 她为自己再过几天就可基本康复出院而感到高兴	3	康复出院	3-3
4, happiness, 让郭惠英感动的是 5, null, 她醒来时 6, null, 还有一位民警守在身边	4	民警守在身边	4-6
1, null, 每当在新闻上看到血库告急的消息 2, fear, 刘淑梅就很焦虑	2	血库告急的消息	1-2
6, null, 当唐某向张某提出离婚后 7, disgust, 怨恨转化成杀意	7	提出离婚	7-6
19, null, 汤某也完全站在女儿一边数落女婿 20, anger, 这让陈晓毅很是气愤	20	数落女婿	20-19

4 可以看出, EDGCNN 模型会根据上下语义关系, 利用情感判别模型识别出的情感句, 融入情感特征, 最后解码输出的情感原因关键字定位在文本中哪条语句, 就表明这条语句为相应的情感原因句。例如表 4 中第三行, 模型解码输出“康复出院”, 所以第 3 句就视为情感原因句, 得到情感-原因对 3-3。

实验中发现最大区间范围的选择会影响模型解码输出, 因此尝试使用区间最大长度分别为 8、10 和 12 进行实验, 实验中发现最大长度为 10 时效果最好, 部分情感原因关键字抽取结果如表 4 所示。另外, 第一步情感判别 CNN 模型会得到非情感句, 这些句子也会经过 EDGCNN 模型, 最后输出两列浮点数字列。为了过滤掉这些非情感句经过 EDGCNN 产生的结果, 模型的解码设定了阈值, 本文实验选择浮点数字列中的值大于 0.15 时, 才进行相应位置打分的计算。

总的来说, 本文 EDGCNN 模型具有较高的召回率, 可以更全面地挖掘文本中的情感-原因对。此外, EDGCNN 模型能抽取更细粒度的情感-原因对, 从而精细完成情感-原因对抽取任务。

5 结 语

情感-原因对提取是情感原因挖掘的新任务, 为

了有效解决这一任务,并且从更细粒度的角度分析情感原因,本文首先通过情感句判别模型CNN找出带有情感的语句,然后将情感句编码,输入到本文融入情感特征的情感原因定位模型EDGCNN,找出相应的情感原因关键字,得到情感-原因对。与已有三种模型相比,本文模型召回率最高,并且在F1值性能上与现有最好模型结果相当,说明本文模型的有效性。在未来的工作,笔者将尝试构造一个端对端的模型,直接一步获取情感-原因对。

参考文献:

- [1] Rout J K, Choo K K R, Dash A K, et al. A Model for Sentiment and Emotion Analysis of Unstructured Social Media Text[J].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2018, 18: 181-199.
- [2] Peng M L, Zhang Q, Jiang Y G, et al. Cross-Domain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with Target Domain Specific Information[C]// Proceedings of the 5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Melbourne, Australia, 2018: 2505-2513.
- [3] 刘全, 梁斌, 徐进, 等. 一种基于方面情感分析的深度分层网络模型[J]. 计算机学报, 2018, 41(12): 2637-2652. (Liu Quan, Liang Bin, Xu Jin, et al. A Deep Layered Network Model for Aspect-Based Sentiment Analysis[J]. Chinese Journal of Computers, 2018, 41(12): 2637-2652.)
- [4] 张庆庆, 贺兴时, 王慧敏, 等. 基于深度信念网络的文本情感分类研究[J].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 2019, 3(4): 71-79. (Zhang Qingqing, He Xingshi, Wang Huimin, et al. Text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Deep Belief Network[J]. Data Analysis and Knowledge Discovery, 2019, 3(4): 71-79.)
- [5] Chen Y, Hou W J, Cheng X Y, et al. Joint Learning for Emotion Classification and Emotion Cause Detection[C]// Proceedings of the 2018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2018: 646-651.
- [6] Li X J, Feng S, Wang D L, et al. Context-Aware Emotion Cause Analysis with Multi-Attention-Based Neural Network[J]. Knowledge-Based Systems, 2019, 174: 205-218.
- [7] Lee S Y M, Chen Y, Huang C R, et al. Detecting Emotion Causes with a Linguistic Rule-Based Approach[J].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2013, 29(3): 390-416.
- [8] Yada S, Ikeda K, Hoashi K, et al. A Bootstrap Method for Automatic Rule Acquisition on Emotion Cause Extraction[C]// Proceedings of 2017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a Mining Workshops. IEEE, 2017: 414-421.
- [9] Gao K, Xu H, Wang J S. A Rule-Based Approach to Emotion Cause Detection for Chinese Micro-Blogs[J].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15, 42(9): 4517-4528.
- [10] Chen Y, Hou W J, Cheng X Y. Hierarchical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for Emotion Cause Detection on Microblogs[C]// Proceedings of the 2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2018: 115-122.
- [11] Gui L, Hu J N, He Y L, et al. A Question Answering Approach for Emotion Cause Extraction[C]// Proceedings of the 2017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2017: 1593-1602.
- [12] Weston J, Chopra S, Bordes A. Memory Networks[OL]. arXiv Preprint, arXiv: 1410.3916.
- [13] Yu X Y, Rong W G, Zhang Z, et al. Multiple Level Hierarchical Network-Based Clause Selection for Emotion Cause Extraction[J]. IEEE Access, 2019, 7: 9071-9079.
- [14] Xia R, Ding Z X. Emotion-Cause Pair Extraction: A New Task to Emotion Analysis in Texts[C]// Proceedings of the 57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19: 1003-1012.
- [15] 苏剑林. 基于CNN的阅读理解问答模型[EB/OL]. [2018-04-15]. <https://spaces.ac.cn/archives/5409>. (Su Jianlin. CNN Based Reading Comprehension Question and Answer Model [EB/OL]. [2018-04-15]. <https://spaces.ac.cn/archives/5409>.)
- [16] Kim Y.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for Sentence Classification[C]// Proceedings of the 2014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2014: 1746-1751.
- [17] Laskar Z, Kannala J. Context Aware Query Image Representation for Particular Object Retrieval[C]// Proceedings of Scandinavian Conference on Image Analysis. 2017: 88-99.
- [18] Dauphin Y N, Fan A, Auli M, et al. Language Modeling with Gated Convolutional Networks[C]// Proceedings of the 3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2017: 933-941.
- [19] Wang W H, Yang N, Wei F R, et al. Gated Self-Matching Networks for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Question Answering[C]// Proceedings of the 55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17: 189-198.
- [20] Lin T Y, Goyal P, Girshick R, et al. Focal Loss for Dense Object Detection[C]//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2017: 2980-2988.
- [21] Li S, Zhao Z, Hu R F, et al. Analogical Reasoning on Chinese Morphological and Semantic Relations[C]// Proceedings of the 5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18: 138-143.
- [22] Hochreiter S, Schmidhuber J. Long Short-Term Memory[J]. Neural Computation, 1997, 9(8): 1735-1780.

作者贡献声明:

代建华:提出研究思路,设计研究方案,起草论文,最终版本修订;
邓育彬:采集、清洗和分析数据,进行实验,起草论文,最终版本修订。

支撑数据:

支撑数据由作者自存储, E-mail: jhdai@hunnu.edu.cn。
[1] 邓育彬. EDGCNN.txt. 情感-原因对话料数据集。

利益冲突声明:

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关系。

收稿日期:2019-11-14
收修改稿日期:2020-05-29

Extracting Emotion-Cause Pairs Based on Emotional Dilation Gated CNN

Dai Jianhua^{1,2,3} Deng Yubin^{1,3}

¹(Hun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Intelligent Computing and Langua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²(Research Institute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³(Colleg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proposes an Emotional Dilation Gated CNN (EDGCNN) model, aiming to extract emotion-cause pairs for sentiment analysis. [Methods] First, we used the emotional discriminant model to identify sentiment sentences. Then, we input coding for these sentences to the EDGCNN model and located corresponding reasons. Finally, we tagged keywords of reasons generated from the experimental dataset. [Results] The new model's recall and F1 values reached 63.52% and 60.45% respectively on the training dataset, which were better or very similar to the existing ones. The proposed model also extracted emotion-cause pairs at finergranularity level. [Limitations] The experimental corpus size was small. [Conclusions] The proposed model can extract emotion-cause pairs effectively.

Keywords: Emotion-Cause Pair Extraction EDGCNN Emotion Discrimination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source text complexity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quality on the task difficulty of NMT post-editing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A multi-method study

Yanfang Jia¹  and Binghan Zheng^{2*} 

¹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² Durham University, UK

ORIGINAL RESEARCH PAPER

Received: April 14, 2021 • Accepted: October 11, 2021

© 2022 Akadémiai Kiadó, Budapest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source text (ST) complexity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MT) quality on the task difficulty of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NMT) post-editing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When investigating human effort exerted in post-editing, existing studies have seldom taken both ST complexity and MT quality levels into account, and have mainly focused on MT systems used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NMT. Drawing on process and product data of post-editing from 60 trainee translators, this study adopted a multi-method approach to measure post-editing task difficulty, including eye-tracking, keystroke logging, quality evaluation, subjective rating, and retrospective written protoco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ST complexity and MT quality present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effect on task difficulty of NMT post-editing; 2) ST complexity level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post-editing low-quality NMT (i.e., post-editing task becomes less difficult when ST complexity decreases); while for post-editing high-quality NMT, it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ly on the subjective ratings received from participants; and 3) NMT quality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its post-editing task difficulty (i.e., the post-editing task becomes less difficult when MT quality goes higher), and this impact becomes stronger when ST complexity increase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both ST complexity and MT quality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testing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binghan.zheng@durham.ac.uk

post-editing difficulty, designing tasks for post-editor training, and setting fair post-editing pricing schemes.

KEYWORDS

source text complexity, machine translation quality, post-editing, task difficulty, multi-method approach

1. INTRODUCTION

Due to the advanc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machine translation (MT) technology, MT post-editing (PE) has now been provided as an independent service in today's translation market with its own international service standard (ISO, 2017: 18587). It is also the most widely adopted set-up nowadays in the professional context in the translation industry (TAUS, 2019). As a relatively new task mode, the potential value and cognitive process of PE are still largely under-investigated but have gained increasing attention both from academia and industry. The recently emerged paradigm of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NMT) has greatly advanced MT quality,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s of fluency or readability of translation output, when compared to the once-dominant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 (SMT) (Junczys-Dowmunt & Dwojak, 2016; Sennrich, Haddow, & Birch, 2016). However, recent studies show that NMT also brings new challenges to post-editors by producing unpredictable errors hidden in its fluent texts, which make it more difficult to identify and correct translation errors during PE (Vieira, 2019; Yamada, 2019).

Investigating the factors impacting the task difficulty of PE and its measurements is important for testing post-editing difficulty, designing tasks for post-editor training, and setting reasonable post-editing pricing schemes. Among such factors, source text (ST) complexity and MT quality are usually regarded as major intrinsic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task difficulty of PE.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e.g., Castilho et al., 2018; Daems, Vandepitte, Hartsuiker, & Macken, 2017; Krings, 2001; O'Brien, 2006) have rarely taken both factors into account when investigating the human effort exerted during PE, making it difficult to disentangle the role each factor plays in PE. Besides this, these studies have focused predominantly on PE of MT approaches before NMT between Indo-European languages, leaving PE of NMT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under-researched.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ST complexity and NMT quality on the task difficulty of NMT post-editing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by adopting a multi-method approach (Halverson, 2017), including data collected from eye-tracking, keystroke logging, subjective rating, retrospective protocols, and translation quality evaluation. We aim to address the following two questions: (1) Do N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have an interaction effect on the task difficulty of NMT PE? and (2) If yes, how do they affect the impact of each other on the task difficulty of PE?

2. TASK DIFFICULTY OF PE

From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task difficulty is a concept specific to a task and a person (Dahl, 2004: 39), referring to “the degree of cognitive load, or mental effort, required to identify a



problem solution” (Gallupe, DeSanctis, & Dickson, 1988: 280). Measuring task difficulty, therefore, concerns whether a task is easy or difficult for a person performing the task, which is inherently subjective and personal. Cognitive load in the present study refers to the demand on cognitive resources that a PE task imposes upon a post-editor, whereas cognitive effort is the actual amount of cognitive resources that a post-editor uses to complete the PE task. Following Sun (2015), “task difficulty” is used as a common and cover term, and will be investigated with resp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identifying the potential causal factors of PE task difficulty, and measuring its task difficulty.

2.1. Causal factors of PE task difficulty

Cognitive load theory (CLT; Sweller, 1988) is adopted in the present study a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o explain the causal factors of PE difficulty. According to Paas and Van Merriënboer (1994: 353), cognitive load is “a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 representing the load that performing a particular task imposes on the cognitive system of an individual”,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intrinsic cognitive load, extraneous cognitive load, and germane cognitive load. The intrinsic cognitive load is immutable and originates from the difficulty level imposed by the inherent nature of the material or task and the expertise of the individual performing the task. The extraneous cognitive load is not constant and should ideally be reduced by improving the usability of the tools or optimizing the way the information is presented. Intrinsic and extraneous cognitive loads add up to determine the total amount of cognitive load imposed by the task to be completed, while germane cognitive load refers to the cognitive resources devoted to learning for schema construction (Sweller, Ayres, & Kalyuga, 2011).

As a problem solving rather than a learning process, a PE task mainly includes intrinsic and extraneous cognitive loads. The intrinsic cognitive load for PE is determined by the efforts needed to process the ST and the MT output, and the post-editor’s expertise. For manual translation, the intrinsic cognitive load of translation difficulty is primarily decided by ST complexity (Liu, Zheng, & Zhou, 2019); but for PE, post-editors are offered two sources of information (i.e., ST and MT) with different functions. As long as the MT output is not so poor that the post-editor decides to translate everything from scratch, or not so good that the post-editor could accept unedited raw MT, it is safe to say that a PE process entails evaluation of MT output, correction of MT errors, and translation from scratch at different levels. The extraneous cognitive load in PE is caused by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the user interface and working environment where a PE task is performed, which is gaining increasing interest in usability and ergonomics research (Kappus & Ehrensberger-Dow, 2020).

2.2. ST complexity and PE effort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T and PE effort for Rule-based MT (RBMT) and Example-based MT (EBMT) systems shows that a ST with more Negative Translation Indicators (NTIs) (e.g., ambiguity, coordination, ellipsis and gerunds) will result in more cognitive effort, a higher number of edits (Aikawa, Schwartz, King, Corston-Oliver, & Carmen, 2007), and longer time on the task (O’Brien, 2004, 2006). However, these studies have not controlled for the corresponding MT quality for the ST used. As a ST with more NTIs can easily lead to lower MT quality, what those studies examined was actually the difference in cognitive effort when post-editing a ST with more NTIs paired with a lower-quality MT, versus a ST with fewer NTIs



coupled with a higher-quality MT. Some other studies investigat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T features and PE effort indicators have not controlled for the quality of MT outputs either. As [Aziz, Koponen, and Specia \(2014\)](#) reflected, the PE effort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specific linguistic patterns of ST may be caused by the low-quality MT output of these ST features.

Eye-tracking studies demonstrate differences in how cognitive resources are allocated to ST and target text (TT) during PE tasks. Most of thes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less visual attention (e.g.,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is allocated to the ST area ([Carl, Dragsted, Elming, Hardt, & Jakobsen, 2011](#); [Daems et al., 2017](#)). For example, [Carl et al. \(2011\)](#) found that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was much longer than on ST during PE. In [Mesa-Lao \(2014\)](#), however, mixed results are reported with more fixations on TT for 4 out of 6 PE tasks. As Mesa-Lao only mentions that some STs were not of similar complexity levels, without providing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ST complexity and corresponding MT quality levels, it is impossible to further interpret his findings.

2.3. MT quality and PE effort

MT quality has commonly been perceived as the key factor deciding PE effort; however, the argument has not been unanimously borne out by empirical studies.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studies devoted to the impact of MT have been reported with some inconsistencies. [Krings \(2001\)](#) employed human raters to evaluate RBMT output sentences using a five-point Likert scale. He found that RBMT post-editing speed was faster for higher-rated segments. Krings also observed tha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T quality and PE effort in terms of attention distribution was not always linear. PE effort was the highest, in many cases, for the medium-quality sentences rather than for the lowest quality ones, with more and greater dispersion of attention distributed across the ST, MT and TT for the medium-quality ones. In addition, he also found that the level of MT quality seemed to have an impact on how attention and effort were allocated to ST processing. However, the ST complexity levels were not controlled for by Krings, making it unclear whether ST complexity itself has affected how the ST is processed.

Other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MT quality, measured by different automatic evaluation metrics, tends to b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 effort. For example, lower MT quality as measured by GTM (General Text Matcher) and TER (Translation Edit Rate) in [O'Brien \(2011\)](#), and by BLEU (Bilingual Evaluation Understudy), METEOR (Metric for Evaluation of Translation with Explicit Ordering) and TER in [Gaspari, Toral, Naskar, Groves, and Way \(2014\)](#), were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longer PE time and longer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all of which suggest greater cognitive effort invested by post-editors. [Sanchez-Torron & Koehn \(2016\)](#) assessed how MT quality indicated by BLEU can impact PE effort by using ST of similar complexity. They found that PE for MT output with higher BLEU scores led to better final product quality and reduced the overall PE effort in terms of PE time and operations. In [Vieira \(2016\)](#), higher MT quality as indicated by higher METEOR scores correlates with post-editors' lower cognitive effort as indicated by lower average fixation duration. In addition, MT quality in terms of the number and types of errors was also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PE effort exerted. [Daems et al. \(2017\)](#) show that the overall number of MT errors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fixation count, number of production units and the HTER (Human-targeted Translation Edit Rate) score,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verage pause ratio. They also report that different error types affect different PE effort indicators.



All the above studies and those studies reviewed in Temizöz (2012) take MT quality as the primary factor impacting on PE effort, without controlling the corresponding ST complexity levels. However, post-editing MT with the same errors or automatic evaluation scores may involve different levels of effort, when paired with STs with different complexity levels. In addition, most of these studies investigated MT systems before NMT became the dominant paradigm; therefore, the results may not be replicable to research on PE of NMT.

3. RESEARCH DESIGN

3.1. Participants

Sixty MA students in Translation (two males and fifty-eight females) with an average age of 24 years (range = 22–26, $SD = 1.9$ years) were recruited as participants from two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y were all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with English as their L2. All participants had similar levels of L2 proficiency, passed the Test for English Majors Band 8 (TEM8),¹ but had no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experience. They all had roughly the same level of experience in using MT systems as additional resources during translation, but had never received formal training in PE. To compensate for their work, participants received two academic credits from their university for taking part in a PE training session prior to the experiment, and were given a memory disk as the reward for their participation. All participants were touch-typists and had normal or corrected to normal vision. They were told that anonymity and confidentiality would be ensured, and they all signed a consent form before each experiment. The research was approved by the Ethics Committee of Hunan University.

3.2. Materials

3.2.1. ST selection. Four English news texts² (128–145 words, coded as ST₁, ST₂, ST₃ and ST₄), two with high complexity and two with low complexity, were carefully selected as STs for this research. ST₁, ST₂ and ST₄ were selected from *newsela.com*, a website providing newspaper article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complexity, and ST₃ from *the Times*, a British daily national newspaper. Featuring news topics for general readers, the four texts are self-contained, requiring no additional context for comprehension and translation.

Four sets of measurements, comprising readability level, word frequency, syntactic complexity, and subjective evaluation, were adopted to measure the ST complexity. As can be seen from Fig. 1, in terms of readability indexes, ST₁ and ST₂ are appropriate for 7 and 8 years of schooling respectively, while ST₃ and ST₄ are appropriate for 18 and 16 years of schooling for successful comprehension respectively. Flesch Reading Ease scores show that ST₁ and ST₂ are much easier to read than ST₃ and ST₄. Word frequency tests indicate that ST₁ and ST₂ contain a smaller proportion of low frequency words than ST₃ and ST₄. Sentence syntax similarity values

¹The Test for English Majors Band 8 is a national English test for English majors in China, which includes tests for listening, reading, writing, translating, proofreading and general knowledge, and requires a candidate to master 13,000 words.

²Due to the word limit, the four STs and their machine translations are not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Interested readers can request the STs from the first auth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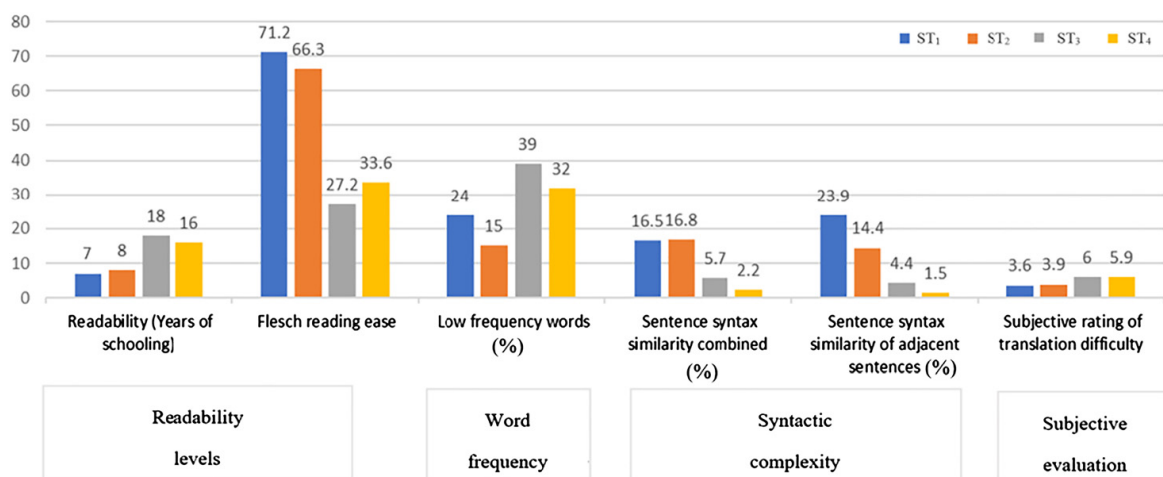


Fig. 1. Summary of ST complexity from four sets of measurements

as measured by the Coh-Metrix automatic text analysis tool (version 3.0) indicate that ST₁ (0.165/0.239) and ST₂ (0.168/0.144) present lower complexity than ST₃ (0.057/0.044) and ST₄ (0.022/0.015). Nine freelance translators were recruited to rate the levels of translation difficulty on a nine-point Likert-type scale, with 1 being “extremely easy” and 9 “extremely difficult”.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₁ and ST₂ were rated to be easier for translation than ST₃ and ST₄. In summary, ST₁ and ST₂ are tested as less complex and less difficult texts for translation than ST₃ and ST₄.

3.2.2. MT output selection. The four STs were first pre-translated by five online NMT engines: Google Translate, Baidu Translate, Bing Translate, Systran, and Youdao Translate. The MT outputs were then assessed by TAUS’s (2013) fluency and adequacy criteria on a 4-point Likert scale, with “1” being incomprehensible and “4” being flawless for fluency, and “1” being extremely inadequate and “4” being fully adequate for adequacy. The nine freelance translators recruited to assess the MT outputs using this scale were not participants for the main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results, the outputs of Google Translate and Systran were kept for the PE experiments (available upon request). Kendall’s W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agreement among the nine raters. For both fluency and adequacy of the above two NMT outputs (see Table 1), the responses for Kendall’s W fall between 0.71–0.90, $p < 0.001$, indicating a significant, strong agreement among raters. All evaluators rated the quality of MT output from Google to be higher than that from Systran in both fluency and adequacy for all four texts, with all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verage scores being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3.3. Experiment settings

The eye movements of the PE processing for all participants were recorded by an Eyelink 1000 plus (1000 Hz) eye-tracker, connected to a 23-inch LCD monitor as the presentation screen. The screen resolution was set at 1280*1024 pixels. A nine-point calibration was applied to guarantee the precision of the gaze data. The English STs were displayed in the upper window of Translog-II, with Times New Roman Typeface set at 16 points, and double line spacing. The

Table 1. The inter-rater agreement and mean scores for Google and Systran MT outputs

MT Adequacy	Text	Mean	Sd.	Min	Max	Kendall's W	Chi-Square	Sig.
Google	ST ₁	3.33***	0.37	2.57	3.82	0.765	422	<i>P</i> < 0.001
Systran		1.94	0.44	1.19	2.58			
Googles	ST ₂	3.36***	0.4	2.57	3.89			
Systran		2.46	0.53	1.62	3.29			
Google	ST ₃	3.32***	0.43	2.62	3.68			
Systran		1.65	0.15	1.46	1.82			
Google	ST ₄	3.36*	0.33	3.08	3.92			
Systran		2.47	0.79	1.77	3.77			
MT Fluency	Text	Mean	Sd.	Min	Max	Kendall's W	Chi-Square	Sig.
Google	ST ₁	3.11***	0.44	2.52	3.69	0.799	453	<i>P</i> < 0.001
Systran		1.79	0.49	1.19	2.51			
Google	ST ₂	3.37***	0.48	2.23	3.39			
Systran		2.28	0.54	1.55	3.21			
Google	ST ₃	3.3***	0.38	2.98	3.79			
Systran		1.51	0.23	1.21	1.78			
Google	ST ₄	3.33*	0.38	3.02	3.88			
Systran		2.39	0.86	1.78	3.88			

Chinese MT output and final target texts were displayed in the lower window, with SimSun Typeface set at 16 points, also with double line spacing.

3.4. Experimental procedure

Each participant carried out two PE tasks: post-editing one MT output with high quality (coded as MT_H), and the other MT output with low quality (coded as MT_L). The two PE tasks are from different STs to reduce potential learning effect. The order of the four STs and the sequence of the two PE tasks were balanced across the sixty participants in a Latin square design. There was no time constraint on all tasks.

Each participant filled in a pre-task questionnaire concerning their educational and language backgrounds,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MT and PE. They first carried out a warm-up task and were instructed to post-edit the assigned MT outputs and deliver final products of publishable quality. To eliminate the impact of background knowledge on the task difficulty of PE, a piece of short English news briefing the background of each ST was provided for participants before each task. Right after finishing each task,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rate the task difficulty subjectively; and after finishing their tasks,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comment in writing regarding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they had come across during the PE tasks. Participants cou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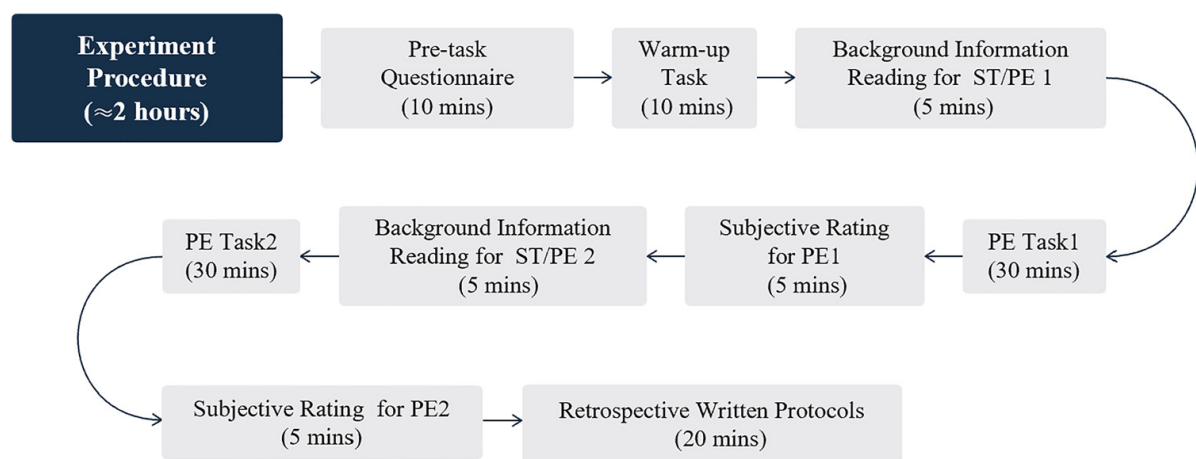


Fig. 2. The flow chart of experiment procedure

choose to take a ten-minute break between the two tasks. The experimental procedure is shown in Fig. 2, with the complete session for each participant lasting roughly two hours.

3.5. Quality of the eye-tracking and key-logging data

The quality of eye-tracking and key-logging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sixty participants was assessed prior to the data analysis. For the eye-tracking data, gaze data with average fixation duration (AFD) below 200 ms and the ratio of the total gaze time on the screen (GTS) divided by the total task time considerably below sample mean (1.5 SD below sample mean), were eliminated. The samples left were all with GTS above 30% (cf. Hvelpund, 2011; Vieira, 2016). In addition, two abnormal eye-tracking sessions and two corrupted key-logging sessions were excluded, and one session from ST₂ was randomly removed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final data points for each task. As a result, 96 valid PE sessions across four STs pre-translated by two NMT engines were selected for further analysis (see Table 2). The percentage of valid data is 80%.

3.6. Data preparation and statistical data analysis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Linear Mixed Effects Regression (LMER) models provided in the lme4 package (Bates, Maechler, Bolker, & Walker, 2014) of the statistical software R (version 3.6.3). Standard errors, effect sizes and significance values were calculated by the software package lmerTest (Kuznetsova, Brockhoff, & Christensen, 2017). The effects of the models were plotted by applying effects package (Fox, Weisberg, Friendly, & Hong, 2017). As fixed effects, the main effects of NMT quality levels (MT_H for high-quality, and MT_L for low-quality MT), ST complexity levels (ST_H for high-complexity and ST_L for low-complexity ST) and their interaction were entered into the model. The random effect was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LMER models,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investigated were: (1) Subjective rating scores; (2) Processing time; (3)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4)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5) Pause to word ratio; (6)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and (7) Total number of errors. To eliminate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ST length, the following 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normalized by number of tokens in ST: processing time,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and total number of errors. Subjective rating and



Table 2. Valid data sets left for final analysis (“x” represents the data points excluded)

NMT engine	Google translate (high quality)				Systran translate (low quality)			
	Low		High		Low		High	
	ST ₁	ST ₂	ST ₃	ST ₄	ST ₁	ST ₂	ST ₃	ST ₄
AFD	xx	x	x		xx		x	x
GTS		x	xx	xx		xx	x	x
AFD+GTS	x			x				
Corrupted logging data					x			x
Abnormal data						x	x	
Randomly excluded		x						
Final data points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24		24		24		24	

pause to word ratio were not normalized by ST tokens, because subjective rating was based on the task difficulty of the whole task and pause to word ratio had already taken the ST length into account.

We applied Skewness and Kurtosis tests to verify that all 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normally distributed, and checked the residual plots to ensure that the homogeneity of variance for each model was not violated. Square-root or log-transformation was used to transform variables with Skewness or Kurtosis greater than 1 or smaller than -1 , depending on which method produced better normal distribution. To analyze the errors in PE output, the customized error categories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Quality Metrics framework (MQM, Lommel, 2018) were adopted. The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by two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who had over 1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rating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examinations.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mainly on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final post-edited product, thus total number of errors was calculated as an indicator of overall PE quality.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MT hereafter refers to NMT.

4. RESULTS

4.1. Subjective rating

Subjective rating represents the participants’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task difficulty after finishing each PE task, with “1” being the least and “9” the most difficult.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on subjective rating is plotted in Fig. 3 and shows no significance ($p > 0.05$). ST complexity showed a consistent, positive impact³ on PE for both MT_H and MT_L. PE-MT_L for ST_H (6.29) was reported to be significantly more difficult than for ST_L (5.21)

³A positive impact in this article means that the increase of the value of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leads to the increase of the value of the dependent variable; while a negative impact means that the increase of the value of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results in the decrease of the value of the dependent varia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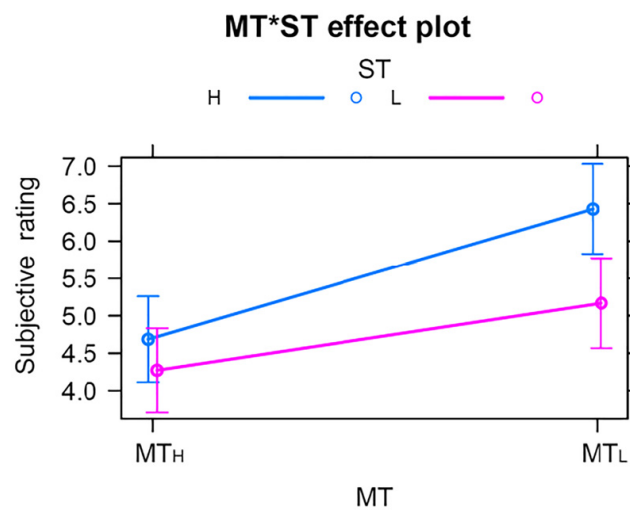


Fig. 3.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on subjective rating

($t = 2.82, p < 0.01$). Similarly, PE-MT_H for ST_H (4.75) was considered to be slightly more difficult than for ST_L (4.33),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t = 1.09, p > 0.05$). MT quality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ubjective rating for PE difficulty for both ST_H and ST_L. For ST_H, PE-MT_L (6.29) was perceived to be significantly more difficult than PE-MT_H (4.75) ($t = 4.01, p < 0.001$); for ST_L, PE-MT_L (5.21) was rated more difficult than PE-MT_H (4.33) ($t = 2.33, p = 0.058$).

4.2. Processing time

Processing time is the time taken to finish each PE task in millisecond (ms). The longer time it takes, the more cognitive effort is expected to be exerted. As shown in Fig. 4, regarding processing time,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was significant ($p < 0.001$). ST complexit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PE-MT_L. PE-MT_L for ST_L (6984 ms) was significantly faster than for ST_H (8846 ms) ($t = -2.7, p < 0.01$). For PE-MT_H, the impact of ST complexity was negative. PE-MT_H for ST_H (4950 ms) was faster than ST_L (6287 ms), but t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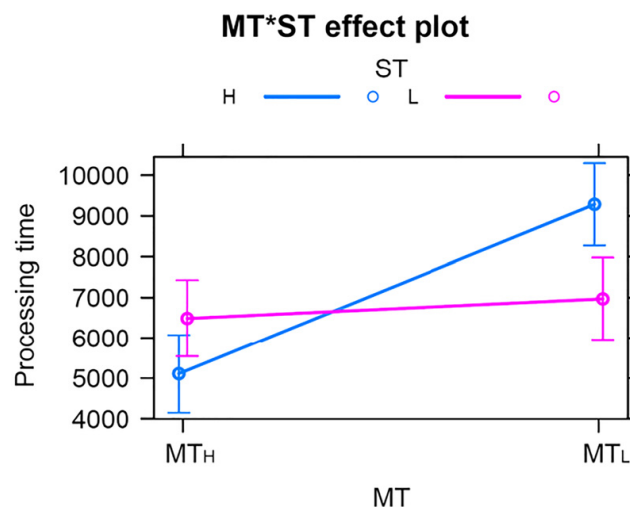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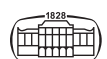


Fig. 4.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on processing tim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 = -1.9$, $p = 0.052$). MT quality demonstrated a negative impact on processing time and this impact was significant only for ST_H , with $PE-MT_H$ (4950 ms) being significantly faster than $PE-MT_L$ (8846 ms) ($t = -5.7$, $p < 0.001$). For ST_L , $PE-MT_H$ (6287 ms) took slightly less time than $PE-MT_L$ (6984 ms) ($t = -1$, $p > 0.05$).

4.3. Pause to word ratio

Pause to word ratio is calculated by dividing the total number of pauses in a task by the number of tokens in the ST. Higher pause to word ratio indicates more cognitive effort exerted (Lacruz & Shreve, 2014). As plotted in Fig. 5,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on pause to word ratio was significant ($p < 0.05$). Pause to word ratio during $PE-MT_L$ for ST_H and for ST_L was almost the same ($t = 0.09$, $p = 0.93$). $PE-MT_H$ for ST_H led to significantly lower pause to word ratio than for ST_L ($t = 3.37$, $p < 0.05$). MT quality had a consistent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pause to word ratio during PE and this effect was stronger for ST_H . For STs of higher complexity, $PE-MT_H$ resulted in significantly lower pause to word ratio than $PE-MT_L$ ($t = -7.75$, $p < 0.001$). For ST_L , $PE-MT_H$ again had a significantly lower pause to word ratio than $PE-MT_L$ ($t = -4.48$, $p < 0.001$).

4.4. Visual attention allocation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on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was significant ($p < 0.05$), as shown by Fig. 6 (left). ST complexity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for $PE-MT_L$, but not for $PE-MT_H$. The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during $PE-MT_H$ for ST_H (1186 ms) was almost the same as for ST_L (1268 ms) ($t = -0.199$, $p = 0.84$). $PE-MT_L$ for ST_H (2284 ms) had significantly longer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than for ST_L (1300 ms) ($t = 2.892$, $p < 0.01$). MT quality showed a consistent, negative impact on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during PE, i.e., processing higher-quality MT costs shorter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However, this impact was significant only for ST_H , wh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was recorded in $PE-MT_H$ (1186 ms) than in $PE-MT_L$ (2284 ms) ($t = -3.686$, $p < 0.01$). For ST_L ,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during $PE-MT_H$ (1268 ms) w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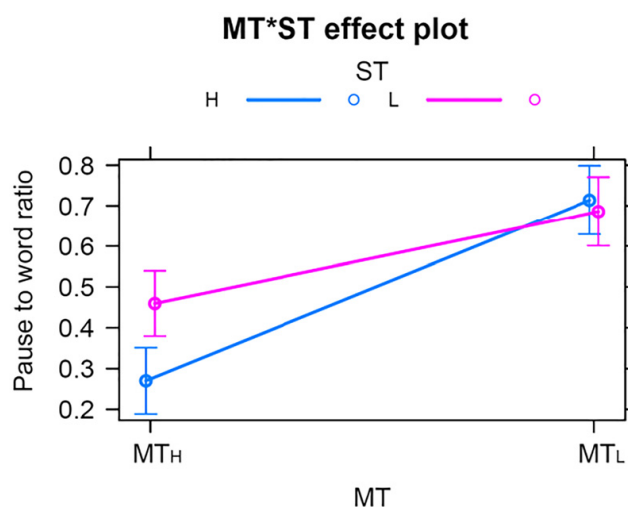


Fig. 5.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on pause to word rati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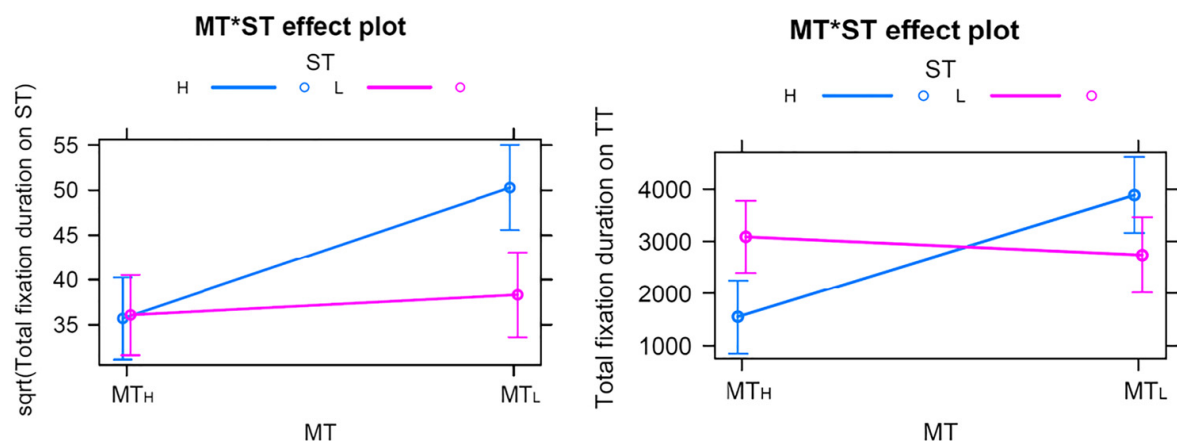


Fig. 6.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on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left) and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right)

slightly shorter than during PE-MT_L (1300 ms) and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t = -0.16$, $p = 0.89$).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on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was significant ($p < 0.01$), with the effect plot shown in Fig. 6 (right). ST complexity had a negative effect on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during PE-MT_H, but a positive effect during PE-MT_L. For PE-MT_L, the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for ST_H (3313 ms)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for ST_L (2274 ms) ($t = 2.1$, $p < 0.05$). For PE-MT_H,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for ST_L (2842 ms) than for ST_H (1325 ms) ($t = 3.2$, $p < 0.01$). MT quality demonstrate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during PE for ST_H, in which PE-MT_L (3313 ms) had significantly longer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than PE-MT_H (1325 ms) ($t = 4.7$, $p < 0.001$). For ST_L,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for PE-MT_H (2842 ms)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for PE-MT_L and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t = 0.54$, $p = 0.85$).

4.5.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on the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in terms of insertions and deletions is presented in Fig. 7, with more edits indicating more effort exerted; and this interaction effect was significant ($p < 0.05$). For PE-MT_L, the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for ST_H (5.25) and for ST_L (5.28) were almost the same ($t = -0.068$, $p = 0.95$). For PE-MT_H, the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for ST_L (3.1)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for ST_H (1.7) ($t = 3.52$, $p < 0.001$). MT quality showe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during PE, and this impact was stronger for ST_H. For both ST_H and ST_L, PE-MT_H resulted in significantly fewer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than PE-MT_L ($t = -8.8$, $p < 0.001$ for ST_H; $t = -5.4$, $p < 0.001$ for ST_L).

4.6. Total number of errors

Finally,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on the total number of errors is presented in Fig. 8 and this effect was not significant ($p > 0.05$). For both PE tasks, the translators produced marginally more errors when working on ST_L than on ST_H, with n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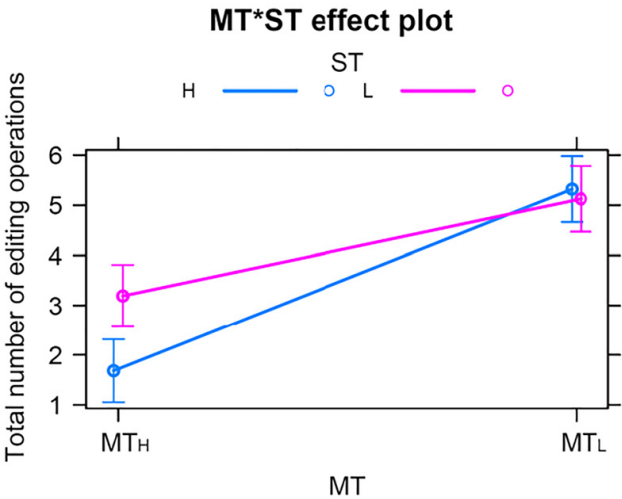


Fig. 7.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on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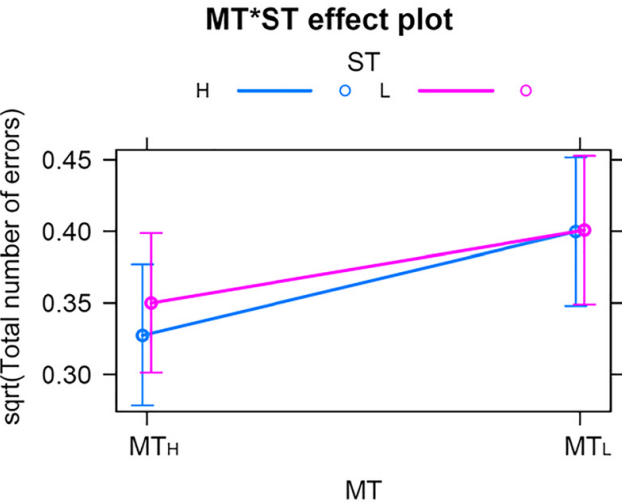


Fig. 8.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on the total number of error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MT quality showed a consiste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total number of errors during PE for both ST_H and ST_L with stronger impact for ST_H . PE- MT_L generated more errors than PE- MT_H (for ST_H , $t = 2.09$, $p = 0.097$; for ST_L , $t = -1.56$, $p = 0.27$), but neither impact was significant.

5. DISCUSSION

ST complexity and MT quality showed an interaction effect on all 7 indicators of PE task difficulty, with 5 indicators being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see Table 3).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task difficulty of PE is decided by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ST complexity and MT quality. In other words, when participants conduct a PE task, the task difficulty perceived, the processing time spent, the number of pauses produced, the editing operations needed, the fixation duration



Table 3.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on PE task difficulty

Indicators	Subjective rating	Processing time	Pause to word ratio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Total number of errors
Interaction effect (<i>p</i> value)	>0.05	<0.01	<0.05	<0.05	<0.01	<0.05	>0.05

allocated to ST and TT, and the number of errors produced, are all influenced by factors of ST complexity and MT quality.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we will discuss how the two factor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o impact the overall PE task difficulty. The participants' retrospective reports on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they came across during PE tasks will be cited to support the findings.

5.1. Effect of ST complexity on PE task difficulty

The impacts of ST complexity on PE for MT_L and MT_H were summarized in Table 4, showing that ST complexity has a substantial, positive impact on task difficulty in PE-MT_L, but not in PE-MT_H.

When post-editing low-quality machine translation (PE-MT_L), ST complexity displayed a positive impact on 5 out of 7 task difficulty indicators. The increase in ST complexity led to significantly higher subjective rating, processing time,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and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Interestingly, the impact of ST complexity on PE-MT_L was similar to its impact on manual translation as reported in previous studies. Translating high-complexity STs was subjectively rated as more difficult than low-complexity ones (Liu et al., 2019; Sun & Shreve, 2014), took longer processing time (Sun & Shreve, 2014), and required more visual attention on ST and TT (Liu et al., 2019). Although ST complexity seems to have similar impact on PE-MT_L and manual translation, the role ST plays in the two tasks are inherently different.

In a PE task a ST acts both as a reference for correcting MT errors and a text for translating from scratch. According to the retrospective data, 75% of participants reported that, when post-editing a low-quality MT, they had frequently checked the ST for revising the MT output,

Table 4. Effect of ST complexity on the PE task difficulty for MT_H and MT_L

ST Complexity	ST _L → ST _H						
	Subjective rating	Processing time	Pause to word ratio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Total number of errors
MT _L	↑**	↑**	↑	↑**	↑*	↓	↓
MT _H	↑	↓	*↓	↓	↓**	↓***	↓

Note: “↑” represents an increase of the value; “↓” represents a decrease of the value (* for $p < 0.05$, ** for $p < 0.01$, *** for $p < 0.001$).



or for re-translating segments with critical mistakes from scratch. In other words, when post-editing a low-quality MT, participants will have to allocate high cognitive effort to the ST in order to fully understand its meaning either for extensive revision or for manual re-translation without endorsing the MT output.

Understanding a high-complexity ST either for PE or for manual translation is cognitively more demanding than understanding a low-complexity ST, as indicated by the significantly longer fixation duration on ST_H . When MT_L was paired with ST_H , 71% of participants expressed their frustration on the PE task, and opined that they might have spent even more effort on the task than on translating from scratch. They reported that low-quality MT was sometimes very misleading and constantly hampered their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the ST. Such experience, however, was not reported by participants when MT_L was paired with ST_L , as 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 low-complexity STs does not require as much effort. PE- MT_L for ST_H is therefore significantly more difficult than for ST_L .

When post-editing high-quality machine translation (PE- MT_H), ST complexity shows a positive, insignificant impact on subjective rating, with the remaining measurements showing that PE- MT_H for ST_H costs less cognitive effort than for ST_L . The increased cognitive effort exerted for ST_L could have been caused either by ST or MT.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xation duration on low and high complexity STs was approximately the same, implying that ST complexity did not have an impact on cognitive effort exerted in PE- MT_H . According to the retrospective data, 91% of participants reported that they just needed a quick scan of STs for checking the correctness of MT output. Therefore, when MT quality is high, ST reading generally does not require deep cognitive processing regardless of ST complexity level.

In the TT area, however, significantly longer fixation duration was recorded for post-editing ST_L , suggesting that processing these MT outputs requires more cognitive effort. The MT scores for ST_L and ST_H are similarly high. We speculate that the MT output for ST_L may have contained errors which did not affect the holistic rating of MT quality by human raters but was effortful for correction by participants. Hence, a detailed error analysis using MQM on all four MT outputs was carried out by two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with the results presented in Table 5.

Table 5 shows that both MT_H outputs (for ST_H and ST_L) are much higher in translation quality and contain substantially fewer errors than the MT_L outputs, which can validate the results of our holistic human rating. However, MT_H for ST_L contains four more errors than MT_H for ST_H . Some errors such as omission may lead to a higher cognitive effort exerted in PE-MT for ST_L . Some recent research also reports that NMT can produce TTs of high overall quality with unpredictable omissions and mistranslations “hidden” in the fluent expressions, which are problematic during full PE (e.g., Moorkens, 2018; Yamada, 2019). NMT is also difficult to conceptualize due to complex neural networks behind the system. Although most students did not elaborate on how they corrected the errors they came across, two of them reported that they wondered why certain ST words were just omitted unexpectedly in some MT outputs, and that they would not have noticed them had they not checked the STs carefully.

5.2. Effect of MT quality on PE task difficulty

Table 6 shows that MT quality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PE difficulty in general; that is, the higher the MT quality, the lower the difficulty of the PE task. This effect becomes stronger as ST complexity increases.



Table 5. Error analysis on the MT outputs for ST_L and ST_H

Error type	ST _L		ST _H		Severity
	MT _L	MT _H	MT _L	MT _H	
Mistranslation	17	5	16	4	Critical
	5	0	6	2	Minor
Grammar	4	0	3	0	/
Word order	4	3	6	1	/
Omission	0	3	0	0	/
Total	30	11	31	7	/

Table 6. Effect of MT quality on the PE task difficulty indicators for ST_L and ST_H

MT quality	MT _L → MT _H						
	Subjective rating	Processing time	Pause to word ratio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Total number of errors
ST _L	↓	↓	↓***	↓	↑	↓***	↓
ST _H	↓***	↓***	↓***	↓**	↓**	↓***	↓

Note: “↑” represents an increase of the value; “↓” represents a decrease of the value; (* for $p < 0.05$, ** for $p < 0.01$, *** for $p < 0.001$).

For low-complexity STs, MT quality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6 out of 7 indicators of PE task difficulty (subjective rating, processing time, pause to word ratio,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and total number of errors), with pause to word ratio and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being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mpared to post-editing low-quality MT, post-editing high-quality MT was rated to be easier (by participants), with reduced processing time, fixation duration on ST, total editing amount and total number of errors.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was about the same between PE-MT_H and PE-MT_L tasks. Daems et al. (2017) found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MT errors could affect different PE effort indicators. The different types of errors which appeared in the MT_L output for ST_L appear to have affected fixation duration on TT the most but did not evidently affect the other indicators.

For high-complexity STs, MT quality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all 7 indicators, with 6 being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dicating that task difficulty of PE decreases significantly when MT quality increases. This is reasonable, as evaluating and revising low quality MT output took more cognitive effor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MT quality on PE difficulty became stronger when the ST was more complex, as indicated by the bigger differences in subjective rating, processing time, pause to word ratio, total number of editing operations, total number of errors between MT_H and MT_L when paired with ST_H. This is mainly because neither ST_H nor ST_L requires deep

processing and high amounts of cognitive effort when MT produces high-quality output. In contrast, when MT produces low-quality output, processing a ST_H either for revising MT output or for manual re-translation takes substantially more cognitive effort than processing a ST_L .

5.3. Implications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 translation market

As the first study investigating how ST complexity and MT quality levels interact to impact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post-editing, our findings will have implications both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 translation market.

Methodologically, our study shows that the extent of interaction effects between ST complexity and MT quality on various task difficulty indicators is different. This validates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studies (e.g., Herbig, Pal, Vela, Krüger, & Genabith, 2019; Vieira, 2016) in that “different measures may be more sensitive to different nuances of cognitive effort” (Vieira, 2016: 57). Therefore, a multi-method approach could offer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gnitive processes of PE and manual translation.

On the side of ST,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when checking the impact of ST features on PE effort (e.g., O’Brien, 2004, 2006; Aziz et al., 2014), quality of MT outputs should be controlled at a similar level to disentangle the impact of ST from that of MT on the final PE effort. On the side of MT quality, our results support those reported in Krings (2001), Gaspari et al. (2014), Vieira (2016) and Daems et al. (2017) in that MT quality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PE effort. None of these studies, however, considered the impact of ST complexity level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it is essential to assess ST complexity if we want to further evaluate the extent of the impact that MT quality imposes on PE effort.

Our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amount of visual attention allocated to ST and TT areas is significantly impacted by both the given ST complexity and MT quality levels. No previous PE studies have controlled for both ST complexity and MT quality levels when they looked into visual attention allocation to ST and TT, which can explain why their results are likely to be inconsistent and difficult to compare (e.g., Carl et al., 2011; Daems et al., 2017; Mesa-Lao, 2014).

For the translation industry, pricing a post-editing task is more challenging than pricing conventional manual translation. A cost-effective operating model for PE pricing is still far from being well-established (TAUS, 2013, 2019). Recent studies have touched on how to improve MT quality evaluation metrics to better predict PE effort (e.g., Specia & Shah, 2018), but research has not yet considered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ST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MT quality on PE effort.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 predictive and fair PE pricing model should factor in both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6. CONCLUS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ST complexity and MT quality on the task difficulty of post-editing. The finding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ly,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effect was found between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on most difficulty indicators of PE tasks. Secondly, ST complexity has a substantial, positive impact on the task difficulty of post-editing low-quality MT, similar to its impact on manual translation. However, it has no positive impact on post-editing high-quality MT. This is because ST does not require deep cognitive processing when the MT quality is high enough. Thirdly, MT quality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task difficulty of post-editing and this effect becomes stronger when the complexity level of ST increases. Therefore, the overall task difficulty of post-editing is decided by both MT quality and ST complexity. They cannot be decoupled from each other and should both be assessed or controlled when developing post-editing pricing schemes or designing post-editing tasks for training purposes.

The results obtained in this study ma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ining courses and pricing schemes for MT post-editing. However, we are aware that some limitations exist in this study, such as recruitment of a single student participant group and applying only one text type and language pair. Our future research will include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and other text domains for more generalizable results. In addition, our next step of analysis will include detailed eye-tracking data to investigate how different types of ST features and MT errors affect post-editing effort.

ACKNOWLEDGEMENTS

Great thanks go to Prof. Yves Gambier, Dr. Joss Moorkens and the two anonymous reviewers for their comments on the earlier drafts of this article. This research was supported by th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Hunan Province (No. 20YBQ068).

REFERENCES

- Aikawa, T., Schwartz, L., King, R., Corston-Oliver, M., & Carmen, L. (2007). Impact of controlled language on translation quality and post-editing in a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 environment. In B. Maegaard (Ed.), *Proceedings of the MT Summit XI, Copenhagen, Denmark* (pp. 1–7). Copenhagen, Denmark.
- Aziz, W., Koponen, M., & Specia, L. (2014). Sub-sentence level analysis of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ing effort. In S. O'Brien, L. W. Balling, M. Carl, M. Simard, & L. Specia (Eds.), *Post-editing of machine translation: Processes and applications* (pp. 170–199).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 Bates, D., Maechler, M., Bolker, B., & Walker, S. (2014). *lme4: linear mixed-effects models using Eigen and S4. R package version 3.1.2*. <http://CRAN.R-project.org/package=lme4>.
- Carl, M., Dragsted, B., Elming, J., Hardt, D., & Jakobsen, A. L. (2011). The process of post-editing: a pilot study. *Copenhagen Studies in Language*, 41, 131–142.
- Castilho, S., Moorkens, J., Gaspari, F., Sennrich, R., Way, A., & Georgakopoulou, P. (2018). Evaluating MT for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achine Translation*, 32, 255–278. <https://doi.org/10.1007/s10590-019-09232-x>.
- Daems, J., Vandepitte, S., Hartsuiker, R. J., & Macken, L. (2017). Identifying the machine translation error types with the greatest impact on post-editing effort.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Article 1282.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7.01282>.
- Dahl, Ö. (2004). *The growth and maintenance of linguistic complexity*. John Benjamins.
- Fox, J., Weisberg, S., Friendly, M., & Hong, J. (2017). *Effects: Effect displays for linear, generalized linear, and other models. R package version 4.0-0*.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effect>.
- Gallupe, R. B., DeSanctis, G., & Dickson, W. G. (1988). Computer-based support for group problem-finding: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MIS Quarterly*, 12(2), 277–296.



- Gaspari, F., Toral, A., Naskar, S. K., Groves, D., & Way, A. (2014, October). *Perception vs reality: measuring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ing productivity* [Paper presentation]. The third workshop on post-editing technology and practice (WPTP-3), within the eleven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Machine Translation in the Americas (AMTA-2014). Vancouver, Canada.
- Halverson, S. L. (2017). Multimethod approaches. In J. W. Schwieter, A. Ferreira, & J. Wiley (Eds.), *Th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pp. 195–212). Wiley-Blackwell.
- Herbig, N., Pal, S., Vela, M., Krüger, A., & Genabith, J. (2019). Multi-modal indicators for estimating perceived cognitive load in post-editing of machine translation. *Machine Translation*, 33, 91–115. <https://doi.org/10.1007/s10590-019-09227-8>.
- Hvelplund, K. T. (2011). *Allocation of cognitive resources in translation: An eye-tracking and key-logging study*.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2017). *Translation services – Post-editing of machine translation output – Requirements* (ISO Standard No. 18587:2017). <https://www.iso.org/standard/62970.html>.
- Junczys-Dowmunt, M. T., & Dwojak, H. (2016). Is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ready for deployment? A case study on 30 translation directions. In *Proceedings of the 9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poken language translation*, Seattle, WA. <https://arxiv.org/abs/1610.01108>.
- Kappus, M., & Ehrensberger-Dow, M. (2020). The ergonomics of translation tools: understanding when less is actually more.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14(4), 386–404. <https://doi.org/10.1080/1750399X.2020.1839998>.
- Krings, H. P. (2001). *Repairing texts: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of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ing processes*.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Kuznetsova, A., Brockhoff, P. B., & Christensen, R. H. B. (2017). *lmerTest: Tests in linear mixed effects models. R package version 2.0-20*. <http://CRAN.R-project.org/package=lmerTest>.
- Lacruz, I., & Shreve, G. M. (2014). Pauses and cognitive effort in post-editing. In S. O'Brien, L. W. Balling, M. Carl, M. Simard, & L. Specia (Eds.), *Post-editing of machine translation: Processes and applications* (pp. 246–272).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 Liu, Y., Zheng, B., & Zhou, H. (2019). Measuring the difficulty of text transl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text-focused and translator-oriented approaches. *Target*, 31(1), 125–149. <https://doi.org/10.1075/target.18036.zhe>.
- Lommel, A. (2018). The multidimensional quality metrics and dynamic quality framework. In J. Moorkens, S. Castilho, F. Gaspari, & S. Doherty (Eds.),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From principles to practice* (pp. 109–127). Springer.
- Mesa-Lao, B. (2014). Gaze behaviour on source texts: An exploratory study comparing translation and post-editing. In S. O'Brien, L. W. Balling, M. Carl, M. Simard, & L. Specia (Eds.), *Post-editing of machine translation: Processes and applications* (pp. 219–245).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 Moorkens, J. (2018). What to expect from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a practical in-class translation evaluation exercise.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12(4), 375–387. <https://doi.org/10.1080/1750399X.2018.1501639>.
- O'Brien, S. (2004). Machine translatability and post-editing effort: How do they relate. *Translating and the Computer*, 26, 1–31.
- O'Brien, S. (2006). Controlled language and post-editing. *Multilingual*, 17(7), 17–19. <https://multilingual.com/issues/2006-10-11.pdf>.
- O'Brien, S. (2011). Towards predicting post-editing productivity. *Machine Translation*, 25(3), 197–215. <https://doi.org/10.1007/s10590-011-9096-7>.



- Paas, F., & Van Merriënboer, J. J. G. (1994). Instructional control of cognitive load in the training of complex cognitive tasks.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6(4), 351–371. <https://doi.org/10.1007/BF02213420>.
- Sanchez-Torron, M., & Koehn, P. (2016). Machine translation quality and post-editor productivity. In S. Green, & L. Schwartz (Eds.), *MT researcher's track, within proceedings of Association for Machine Translation in the Americas (AMTA-2016)* (pp. 16–26). Austin, USA.
- Sennrich, R., Haddow, B., & Birch, A. (2016).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of rare words with subword units. In *Proceedings of the 54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Berlin, Germany* (pp. 1715–1725).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https://arxiv.org/abs/1508.07909>.
- Specia, L., & Shah, K. (2018). Machine translation quality estimation: Application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1, 201–235.
- Sun, S. (2015). Measuring translation difficulty: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16(1), 29–54. <https://doi.org/10.1556/084.2015.16.1.2>.
- Sun, S., & Shreve, G. M. (2014). Measuring translation difficulty: An empirical study. *Target*, 26(1), 98–127. <https://doi.org/10.1075/target.26.1.04sun>.
- Sweller, J. (1988). Cognitive load during problem solving: Effects on learning. *Cognitive Science*, 12(2), 257–285. https://doi.org/10.1207/s15516709cog1202_4.
- Sweller, J., Ayres, P., & Kalyuga, S. (2011). Cognitive load theory in perspective. In J. Sweller (Ed.), *Cognitive load theory* (pp. 237–242). Springer.
- TAUS. (2013). *Adequacy/Fluency guidelines*. <https://taus.net/academy/best-practices/evaluate-best-practices/adequacy-fluency-guidelines>.
- TAUS. (2019). *A review of the TAUS global content conference in Salt Lake City*. <https://www.taus.net/academy/reports>.
- Temizöz, Ö. (2012).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postediting*. European Society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Research Committee State of the Art Research Reports.
- Vieira, L. N. (2016). *Cognitive effort in post-editing of machine translation: Evidence from eye movements, subjective ratings, and think-aloud protocol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ewcastle University.
- Vieira, L. N. (2019). Post-editing of machine translation. In M. O'Hagan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technology* (pp. 206–318). Routledge.
- Yamada, M. (2019). The impact of Google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on post-editing by student translators. *The Journal of Specialised Translation*, 31, 87–106. https://jostrans.org/issue31/art_yamada.php.



机器翻译译后编辑难度测量体系构建研究^①

贾艳芳 湖南师范大学 孙三军 北京外国语大学

摘 要: 了解机器翻译译后编辑难度的影响因素及测量方法, 对于提升机器翻译质量、优化其人机交互工具界面和功能、提供课堂教学和测试难度分级依据均有重要作用。本文提出了译后编辑认知加工过程及难度测量的理论和方法模型, 分析了影响译后编辑难度的三大因素: 材料因素(即机器翻译及原文)、译者个体因素、环境因素(即译后编辑工具), 并从机器翻译质量评估、原文特征分析、译者个体因素、译后编辑工具可用性评测及认知努力测量等方面, 论述了译后编辑难度测量及存在的挑战。

主题词: 机器翻译; 译后编辑; 任务难度; 认知努力; 人机交互

中图分类号: H3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82(2022)03-0016-09

DOI: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22.03.001

1 引言

机器翻译在经历了基于规则、实例和统计的实现手段后, 又迎来了基于神经网络的机器翻译(简称神经机器翻译), 其质量在许多语言对上优于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 尤其表现在译文流利度上(Jia et al., 2019a)。虽然机器翻译中的错误依旧不可避免, 但辅以不同程度的人工译后编辑来修改机译错误, 可大大提升翻译效率, 因此译后编辑模式被语言服务行业广泛采用, 成为当下翻译市场应用最多的主流翻译模式(TAUS, 2019)。

从认知角度讲, 译后编辑是一项人机交互特征明显的新型翻译模式(O'Brien, 2021), 其认知加工过程较传统人工翻译更为复杂, 又有别于基于翻译记忆模糊匹配的计算机辅助翻译。译者需要同时与原文、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工具交互协作, 以实现最佳的认知成本效益。原文和机器翻译译文两个输入源的特征都将影响译后编辑的任务难度; 此外, 译后编辑必须在特定的工具中进行, 工具的可用性也会直接影响任务难度。

了解机器翻译译后编辑难度的影响因素及

测量方法, 对于提升机器翻译质量、优化人机交互、方便课堂教学和测试难度分级均有重要作用。然而, 译后编辑作为一种较新的翻译模式, 其难度测量又涉及机器翻译、翻译学、认知科学、工效学等跨学科专业领域, 目前相关研究仍较为匮乏。本文尝试构建译后编辑认知加工过程和难度测量框架, 从理论与方法两个角度对译后编辑难度的测量进行探讨。

2 译后编辑认知加工过程及难度测量研究模型

任务难度指“识别问题解决方案所需的认知负荷或心理努力程度”(Gallupe et al., 1988: 280), 它主要针对特定的任务和任务执行者。衡量任务难度关系到执行者完成任务的难易程度(Dahl, 2004: 39), 其本质上是主观的, 与个体感知直接相关。

认知负荷(cognitive load)和心理负荷(mental workload)是认知科学的核心概念, 两者内涵相近, 但源于不同的研究领域。这两个概念在翻译及译后编辑过程研究中常互换使

作者简介: 贾艳芳, 湖南师范大学翻译系讲师, 研究方向: 人机交互翻译、翻译认知过程、计算机辅助翻译, E-mail: yanfang.jia@hunnu.edu.cn。
孙三军,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翻译认知过程、实证翻译研究、翻译技术, E-mail: sunsanjun@bfsu.edu.cn。

用。认知负荷最早出现于心理学领域,影响较大的是Sweller et al. (1998)提出的认知负荷理论,该理论认为,任务所需的总体认知负荷由材料因素和个体因素引发的内在认知负荷,以及任务呈现方式和环境等引发的外在认知负荷需求共同决定。心理负荷是人机交互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人机交互是一门研究机器或计算机化的系统及软件与用户之间交互关系的学科(Johnson, 1992), Meshkati (1988)提出了影响人机交互任务执行者心理负荷的多维模型,概括了影响心理负荷的众多因素、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测量心理负荷的手段。本研究中,认知负荷指译后编辑任务对译者提出的认知资源需求,而认知努力(cognitive effort)指译者在执行任务时实际投入的认知资源。

本研究基于认知负荷理论和心理负荷多维模型,构建了译后编辑认知加工过程及难度测量模型(见图1)。译后编辑认知过程包含五类活动:(1)原文阅读理解;(2)机器翻译阅读理解;(3)机器翻译质量评估;(4)机器翻译错误修订;(5)原文人工翻译。译者依据原文评估识别机器翻译错误,决定修改机器翻译错误或重新人工翻译原文句段,这一决策过程受到原文特征和机器翻译质量共同影响。译者阅读原文或机器翻译的优先顺序,可能受到机器翻译质量或译者个体习惯差异影响(Guerberof Arenas, 2013; Carl et al., 2015)。在此过程中,译者仍是译后编辑任务

的主导者,但必须和机器翻译译文及译后编辑工具交互合作,才能最好地平衡质量水平要求和认知努力付出。下文将对译后编辑认知加工过程及任务难度的各项影响因素和测量方法展开分析讨论。

3 译后编辑难度影响因素及其测量方法

影响译后编辑认知加工过程及任务整体难度的因素包括三类:(1)材料因素,即机器翻译和原文;(2)译者个体因素;(3)译后编辑工具。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在从事复杂活动时的工作记忆有限,译者在进行译后编辑任务时,对各因素进行认知加工均会占用其有限的工作记忆和认知资源。因此,这四项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决定译后编辑任务的难度及译者的认知努力付出。认知努力测量指标主要包括译者执行译后编辑任务时的各项生理指标、行为指标及最终译文质量。四项影响因素均为可控制和可测量项,检验其中一项或多项因素对译后编辑难度的影响,须在有效测控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进行。

3.1 机器翻译质量

3.1.1 机器翻译质量评估方法

机器翻译质量通常被视为译后编辑任务难度的决定性因素。机器翻译质量评估方法可分为人工评估和自动评估两种。人工评估方法包括忠实度/流利度评分、等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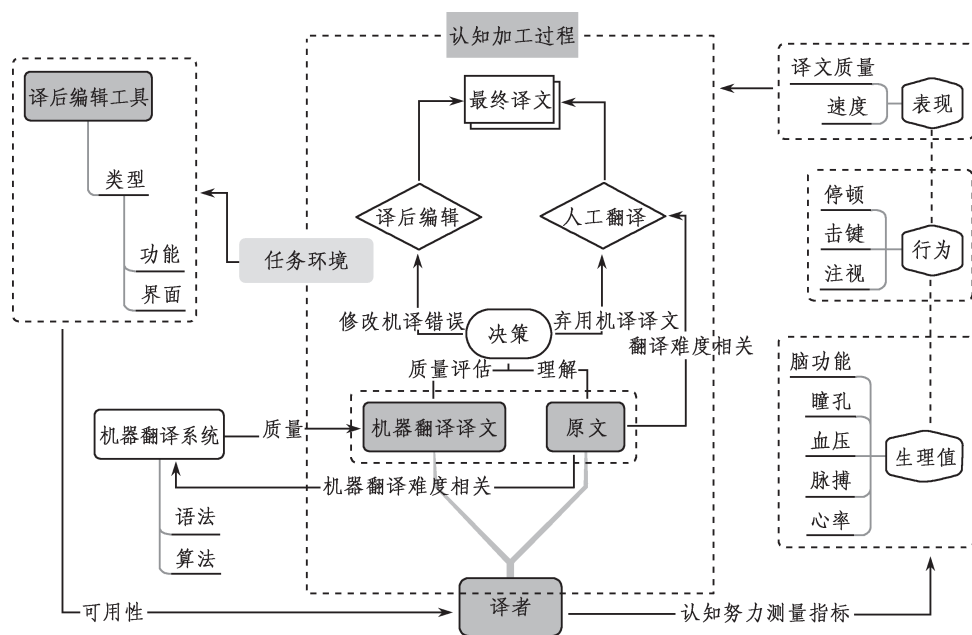


图1 译后编辑认知加工过程及难度测量模型

排序 (ranking)、错误分类,如翻译自动化用户协会 (the Translation Automation User Society, TAUS) 的动态质量评估框架 (DQF) 及目前采用最广的翻译质量多维评估模型 (Multidimensional Quality Metrics) (Lommel, 2018); 自动评估通过对比机译结果与标准人工参考译文或译后编辑结果之间的相似度为机译结果量化打分,常用方法包括BLEU、NIST、GTM、METEOR、TER、HTER等。两者相比,人工评估耗时耗力但更为可靠,自动评估方法省时省力且相对稳定,被机器翻译领域广为采用,但严重依赖参考译文,所以可靠性较差,且与人工评估之间的相关性低,仍有待继续完善。

在现有的全自动机器翻译模式下,译者无法实时干预机译结果,需要对所有机器给定译文进行译后编辑,仍处于“人适应机器”阶段;探索研发中的交互式机器翻译模式(如TranSmart),其发展朝向“机器适应人”的人机融合方向,目标是在译者与机译系统交互时,系统会根据译者的实时反馈,产生新的翻译假设供译者选择,避免译者反复修改相同的机器翻译错误,并实时更新优化译文选项。新变化将对机译质量评估带来全新挑战。

3.1.2 机器翻译质量与译后编辑难度

Krings (2001) 对基于规则的机译句子质量进行了人工评估,发现句子机译质量越高,则译后编辑耗时越短;但机译质量与译后编辑认知努力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的,译后编辑中等质量机译句子所花费的认知努力很多时候反而最高,因为译者的注意力在原文、机译译文和译文上的分散程度更高。Krings还发现,机译质量高低对原文加工及认知努力分配有一定影响,但该研究并没有测量原文句子复杂度,所以无法衡量原文特征本身在此过程中的作用。

机器翻译的错误数量和类型均与译后编辑努力的付出相关。Daems et al. (2017) 发现机译错误总量与总注视次数、产出单位 (production unit) 数量呈负相关,与平均停顿率 (average pause ratio) 呈正相关,但与平均注视时长无相关性;不同的错误类型对不同的译后编辑努力指标的影响不相同,如连贯性错误对任务完成时间的影响较大,而意义迁移与注视时长的相关性较强。此外,机器翻译质量自动评估结果与译后编辑努力呈负相关。低分的GTM、TER、BLEU及METEOR机译译文,在译后编辑时需要消耗的任务时间及总注视时间更长,总注视次数也更多,表明更高的

认知努力付出(如O'Brien, 2011; Gaspari et al., 2014); 基于高分的METEOR机译结果译后编辑,消耗的平均注视时间和注视次数较低 (Vieira, 2016)。上述研究均将机器翻译质量作为影响译后编辑过程的主要因素,对应的原文特征很少被纳入考虑范围。然而,在与不同复杂度的原文配对时,具有相同错误或自动评分水平相当的机器翻译结果可能耗损不同程度的认知努力。

此外,机器翻译技术几经迭代更新,现有研究主要以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为研究对象,神经机器翻译系统基于神经网络模型的翻译方法,虽然极大提高了译文流畅度,但其错误类型却更加难以预测,这类错误隐藏在流畅的行文中,反而加大了译后编辑时识别和更正机译错误的难度 (Moorkens, 2018; Yamada, 2019)。而交互式机器翻译具有人机融合的特点,其译文及质量随着与译者的交互呈现动态变化,这对译后编辑过程也会产生影响,因此亟须加大对最新机器翻译方法的研究。

3.2 原文特征及其测量

3.2.1 原文与机器翻译难度相关特征

在译后编辑模式下,原文发挥的作用有异于人工翻译。原文特征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机器翻译质量,早期基于规则及实例的机器翻译质量受原文特征的影响尤为明显。原文中容易引发机器翻译错误的特征被称作消极翻译指征(如多义词、省略、动名词、被动语态等) (Underwood & Jongejan, 2001)。O'Brien (2004, 2006) 发现,消极翻译指征较多的原文在译后编辑时需要更多的认知努力,如任务时长更长及编辑量更多;不同消极翻译指征对译后编辑认知努力的影响程度不同,如较长的名词短语及动名词对译后编辑努力的影响较大,而缩写、专有名词以及标点符号等的影响则较小。然而,此类针对原文特征对译后编辑认知努力影响的研究,普遍没有控制或测量相应的机器翻译质量水平。所以,原文的某些特征对译后编辑认知努力的影响,可能是由这些原文特征造成的较低质量的机器翻译或两者交互作用共同造成的,无法明确归因于原文特征。

了解原文消极翻译指征的影响有助于制定受控语言 (controlled language) 写作规范,实施译前编辑,从而消除这些因素,提高机器翻译质量,最终降低译后编辑难度。随着机器翻译技术的革新,原文对机器翻译质量的影响

减弱,而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及神经机器翻译,其质量更多受到训练机译系统的平行语料库的质量及算法的影响,受原文特征的影响程度较小(Jia et al., 2019b)。

3.2.2 原文与翻译难度相关特征

译者需要依据原文来识别机器翻译错误并加以修改,对于错误较多的句段,译者可能弃用机译译文,对原文进行不同程度的人工翻译。此时,原文与翻译难度相关特征将影响其最终的认知努力付出。

原文翻译难度测量可采用可读性公式、高低频词占比、句法复杂度、非直译度(non-literality)、文本语义特征及专家评分等方法。可读性公式是文本阅读难度测量最常用的方法,一般包含1—3个可以量化统计的文本特征(如词汇难度与句长),可以据此对文本的阅读难度给出客观评分,常用的可读性公式包括Flesch Reading Ease、Dale-Chall、SMOG、Flesch-Kincaid Readability等。高低频词占比可以测量原文中高低频词所占的比例,通常一篇文章所含的低频词越多,阅读难度越高。句法复杂度测量文本句子内部的连贯性及相邻句子之间的结构相似性,句子之间的连贯性及相似度越高,阅读难度就越低,可以利用Coh-Metrix对句子结构相似度进行打分(McNamara et al., 2014)。

除阅读难度外,某些文本特征容易引发翻译相关难度,如可直译度。可直译度指文中包含习语、隐喻、转喻等非直译元素的数量,非直译元素越多,文本翻译难度越大。可直译度最早由Jensen(2009)应用到翻译过程研究中,作为原文复杂度的筛选标准之一。此外,文本的语义特征,如“词的多义性”和“词语在译入语中对等词的数量”,也是影响可直译度的潜在因素(孙三军、文军,2015),但目前暂无有效工具对汉语词义进行量化统计。WordNet词义统计工具以英语为主,暂未开发其他语言的词义统计功能。除以上几种评价标准外,专家对原文阅读及翻译难度的主观评估也是原文难度评估的常用手段。

原文翻译难度测量在实践中多综合采纳以上多种测量方法。Jensen(2009)最早使用可读性公式、高低频词占比、可直译度及专家评分作为原文难度分层筛选的标准,是目前翻译过程研究中原文复杂度筛选最常引用的指标模板之一(如Liu et al., 2019)。Sun(2015)构架了翻译难度研究框架。

译后编辑研究对原文的关注则较少,译后编辑过程研究也极少测控原文特征。然而,

贾艳芳(2020)对于神经机器翻译任务难度的研究显示,原文复杂度和机器翻译质量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会影响译后编辑难度。原文复杂度对其译后编辑难度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机器翻译质量,对低质量神经机器翻译来说,原文复杂度的影响与传统人工翻译相似,复杂度越高,译后编辑难度越大;而对高质量神经机器翻译来说,原文复杂度对译后编辑的影响则不显著。译者访谈表明,该现象可能由于原文需要被理解加工的程度取决于机器翻译的质量,对于低质量的机器翻译,译者需要充分理解原文才能修改机译中的大量错误或重新翻译原文,而对高质量机器翻译进行译后编辑,译者无须深入加工原文,原文主要起到参考作用。然而,该研究只聚焦于原文的整体复杂度,原文具体特征对译后编辑难度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探究。

3.3 译后编辑工具可用性及测量

现有的译后编辑任务普遍在融合机器翻译功能的机辅翻译软件(如Trados和memoQ)、线上机辅翻译平台(如YiCAT和Memsources)或独立的机器翻译软件(如云译通)中进行。译后编辑作为典型的人机交互模式,其工具功能及界面设计的可用性直接影响译后编辑的外在认知负荷需求,不符合译者的认知需求及习惯的功能或界面,会增加认知摩擦,加大任务难度。可用性评估是工效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基本方法包括用户测试、启发式评价(heuristic evaluation)、认知走查法(cognitive walkthrough)、行为分析(action analysis)、访谈、问卷、GOMS模型,以及基于眼动和脑电技术的认知生理评估方法等。

现有的机辅翻译软件普遍融合机器翻译功能,可以同时进行机辅翻译和机器翻译译后编辑。O'Brien & Moorkens(2014)和Moorkens & O'Brien(2017)等研究均表明,职业译者对机辅翻译软件功能及界面以及其译后编辑功能普遍抱有强烈的不满,主要针对界面布局、交互功能、文本切分方式、视觉效果、软件故障等,即便在机辅翻译系统功能不错的前提下,译者普遍对其译后编辑功能也会有所不满。由于“翻译记忆和机器翻译技术到目前为止被认为是两种明显不同的技术”(ibid.: 109),机辅翻译软件并没有全方位考虑译后编辑任务的特殊性。独立的译后编辑工具研发也得到了一定的关注,如TransType(Langlais et al., 2002)、iOmegaT(Moran & Lewis, 2011)、PET(Aziz et al., 2012)、

Matecat (Bertoldi et al., 2013)、Casmacat (Koehn et al., 2015) 等, 但此类软件开发同样主要考虑软件功能本身, 缺乏对译者人为因素的考虑。驱动翻译技术发展的首要因素是功能需要, 能否很好地满足译者的生理、心理及认知需求往往是开发者的次级考量因素, 软件很少在设计之初就以译者为中心, 全面考量人类工效学因素, 译者反馈往往在软件设计完成以后才会得以收集, 而这时软件可以调整的余地已经很小了。

提升工具可用性是提高译后编辑效率和用户满意度的重要途径。通过融合可用性评估和翻译过程研究方法, 观察和测量分析译者在真实工作环境下应用翻译技术进行翻译时的认知加工过程, 对现有软件或正在开发软件的可用性进行分析, 可以为翻译技术开发提供宝贵的参考。Kappus & Ehrensberger-Dow (2020) 通过分析任务时间、眼动热点图、击键次数、鼠标活动、译文质量评估及访谈等, 发现功能相似的机辅翻译软件Trados和Lilt的界面布局呈现方式差异较大, 而译者更喜欢符合直觉判断的功能布局, 功能纷繁的界面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译者的认知负荷。随着交互式机器翻译的研发 (Peris & Casacuberta, 2019), 机器翻译朝着“机器适应人”的方向发展, 要更好地实现人机融合, 开发符合译后编辑自身任务特点的工具的需求更为迫切。

Ragni & Vieira (2022) 通过梳理目前针对神经机器翻译的研究发现, 绝大多数涉及译者的机器翻译研究, 其研究目的均为改进机器翻译技术本身, 而不是如何让机器翻译作为工具更好地服务译者。因此, 除了针对提升机器翻译技术本身之外, 亟需学界和业界加大以下方面研究, 包括: 如何让机器翻译技术及译后编辑工具设计更有效地协助译者完成译后编辑任务, 揭示译者执行译后编辑任务时的认知需求和局限, 评估现有工具人机界面及功能设计的实用性及易用性, 最终改进不符合译者认知需求或认知工效原理的痛点设计。

3.4 译者因素及测量

除了客观输入材料和工具因素外, 译者对译后编辑任务难度的感知与其自身的认知能力、情感态度因素及译后编辑相关能力等也密切相关。认知能力通常可以通过受试的工作记忆力容量测得, 具体包括操作广度、阅读广度及记忆广度等测验 (Conway et al., 2005)。然而, Vieira (2016) 发现工作记忆力对译后编辑认知努力并没有显著影响, 认为工作记忆

是译后编辑任务的次级影响因素, 与其他因素 (如机器翻译质量、原文熟悉程度及态度等) 交互影响译后编辑的认知努力付出。

作为一种人机交互翻译模式, 译后编辑能力与传统翻译能力存在交叉, 但并不完全相同。O'Brien (2002) 认为成功的译后编辑者需要熟练掌握原语和目的语、专业领域知识、文本类型与对比知识, 能运用工具, 还需要掌握机器翻译知识, 具备术语管理能力, 可以执行译前编辑, 进行受控语言写作, 开展基本编程, 使用宏命令, 为机器词典编码, 并对机器翻译抱有积极态度, 可以容忍低质量机译结果等。Rico & Torrejón (2012) 将译后编辑能力划分为三大范畴, 即语言能力、工具能力与核心能力。冯全功、刘明 (2018) 构建了译后编辑能力的认知、知识及技术三大维度。Nitzke et al. (2019) 认为译后编辑能力应包含双语能力、修订能力、翻译能力、译后编辑能力、机器翻译能力、研究能力、工具能力、语言外能力以及风险评估能力、决策能力、咨询能力及服务能力。

虽然对译后编辑能力到底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并无定论, 但其内涵明显更为多元, 除传统的语言能力及翻译能力外, 还包含了工具能力、机器翻译相关知识掌握、技术使用及态度等范畴, 充分体现了其人机交互的特性。虽然行业认为译后编辑比人工翻译更为简单, 其定价比人工翻译更低, 但调查显示职业译者强烈排斥译后编辑任务 (Bundgaard, 2017; Läubli & Orrego-Carmona, 2017; Cadwell et al., 2016), 认为译后编辑增加了任务中的不确定因素。一方面, 机器翻译的质量并不稳定, 另一方面, 译者需要不断学习迭代更新的技术工具, 因此许多译者认为译后编辑是一项更为复杂的认知活动。相比之下, 学生译者对机器翻译及译后编辑的态度更为积极 (Yamada, 2015; Jia et al., 2019b)。

究其原因, 对于职业译者和新手译者来说, 译后编辑都是一项新型翻译模式, 职业译者并不等同于职业译后编辑者, 译者译后编辑相关能力的整体提高, 将降低其任务难度感知, 减少其译后编辑需要付出的认知努力, 但专精知识的获得需要多年的刻意训练 (Ericsson & Smith, 1991)。Moorkens et al. (2015) 发现职业译后编辑者的译后编辑速度明显快于新手译后编辑者, 而de Almeida (2013) 和Guerberof Arenas (2014) 认为译者的译后编辑经验与译后编辑速度没有显著关系。由于译后编辑能力没有统一的测量标准,

前人的研究对译后编辑能力的筛选标准并不一致,多根据译后编辑经验年限、是否会使用工具等简单标准进行筛选,因此仍需要进一步研究细化统一译后编辑能力的测量标准,分析其对译者任务难度感知的影响。

4 译后编辑难度测量方法及挑战

测量译后编辑难度的方法,可分为内省法(主观评测、回溯性报告等)、行为观测法(编辑行为、停顿行为、注视、任务时长等)、生理测量法(脑功能反应、瞳孔反应、皮肤反应、血压、心率等)(Sun, 2019; 谭业升, 2020)。由于认知负荷的多维度性,不同指标从不同侧面反映认知负荷的影响,测量结果可能存在差异。

Vieira (2014) 和 Cumbreño & Aranberri (2021) 等研究对比了眼动、停顿、编辑时间和主观评分四类认知努力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发现虽然所有指标之间都存一定程度的相关性,但编辑时间、停顿单词比(停顿次数与原文词数比)、注视次数单词比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且信度较高,而平均注视时长、停顿率及主观评分之间的相关性弱且信度低;具有译后编辑经验的译者对认知负荷的主观评分与其他指标的相关性较高,新手译者则较弱。当用不同测量方法测出的结果相互矛盾时, Jex (1988) 认为应以个体的主观感知评价为准。Herbig et al. (2019) 则尝试建立译后编辑难度的多模态指标评估模型,发现在所有标准中与主观评分相关度最强的是任务时长和眨眼频率,中等相关的是TER得分、平均注视量(average fixation amount)、平均停顿率、皮肤电反应,而其余指标呈弱相关。该研究发现,多模态指标认知负荷测量模型的有效性显著高于单独基于时间或文本特征的测量模型。

在行业方面,译后编辑定价主要依靠译后编辑效率作为其任务难度及定价的主要依据,效率主要通过任务时间或编辑量来衡量。然而任务时间并不能全面反映译者认知努力的付出,一方面,单独使用译后编辑时间测量认知努力的有效性不高,另一方面,译后编辑的耗时不止包括修改机译错误本身的任务时间,还可能涉及原文预处理、解决软件技术问题以及项目管理等时间成本。而编辑距离(如HTER)一方面只能体现最终译后编辑结果和最初机器翻译之间的编辑量,而非具体过程的实际操作修改量,如反复修改过程等,另一方面,编辑量是认知加工过程后的最终技术操

作结果,与认知加工过程本身存在一定差别(Vieira, 2016; 贾艳芳, 2020)。

测评手段优化可以综合采用主观评测、行为及生理测量等多模态数据指标,多方法多元互证,测量译后编辑过程中的认知努力付出,避免单一方法的片面和不足。然而,科学测量译后编辑认知努力还需要建立在对上述影响因素的合理测控上。译后编辑认知加工过程受多元因素影响,但大多数现有研究未能考虑此特性,把原文和机器翻译两大材料因素对译后编辑认知加工效果的影响割裂开,往往在未测控原文或译文一方的情况下,研究另一方的作用(如Aziz et al., 2014; Daems et al., 2017)。进一步研究需要评测不同层级原文的复杂度、质量优劣分层的机器翻译及两者的交互效应,及其对译后编辑难度的影响,由此全面了解材料内因的作用。

此外,译后编辑研究往往滞后于翻译技术革新,需要进一步对接机器翻译技术发展,在现有的大量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神经机器翻译的研究,并展开对交互式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的研究,分析不断革新的机器翻译方法对译后编辑模式认知加工机制的影响,促进符合工效学原理的交互式机器翻译系统和工具的开发,保证译后编辑难度研究的应用价值最大化。

5 结语

本文运用人机交互领域的理论及相关研究成果,构建了译后编辑认知加工和难度测量模型,分析了译后编辑难度的影响因素、影响因素的测量及认知努力的测量方法。尽管译后编辑已成为语言服务行业的主流翻译模式之一,但迄今为止有关译后编辑难度测量的实证研究却并不多见。译后编辑难度测量涉及机器翻译、翻译学、认知科学、工效学等跨学科领域,且涉及多元复杂的影响因素,亟需大量的实证研究分析解决以下问题,主要包括:(1)综合评测多元因素的影响,分析原文和机器翻译两大材料内因对译后编辑难度的影响;(2)评测现有各类译后编辑工具的界面及功能可用性对译后编辑难度的影响;(3)分析译者在译后编辑时的认知需求、认知能力和局限,以及不同材料内因及工具外因的变化对其认知加工机制的影响,包括认知努力、压力、决策、情感及人机交互等过程;(4)优化测评手段,建立评测译后编辑认知努力的最佳测量模型。基于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最终建立译后编辑各影响因素交

互效应的量化模型,科学预测译后编辑难度。

译后编辑难度研究与译后编辑过程中的问题解决、策略与技巧、译后编辑能力等翻译学中的诸多问题密切相关,可以拓展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认知翻译学的研究疆域。深化对译后编辑难度影响因素及测量方式的认知,可以对译后编辑任务失败科学归因,对其任务难度计算进行建模科学预测,优化译后编辑工具的人机交互界面和功能,最终全面提升翻译效率及用户满意度,并为译后编辑市场定价及培训测试等提供科学依据。□

注释

- ①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信息技术背景下人机交互翻译模式任务难度研究”(编号:20YBQ068)的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Aziz, W., S. Castilho & L. Specia. Pet: A tool for post-editing and assessing machine translation[A]. In *Proceedings of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 Resources and Evaluation, LREC 2012*[C]. Istanbul: European Language Resources Association (ELRA), 2012: 3982-3987.
- [2] Aziz, W., M. Koponen & L. Specia. Sub-sentence level analysis of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ing effort[A]. In S. O'Brien, L. W. Balling, M. Carl, M. Simard & L. Specia (eds). *Post-Editing of Machine Translation: Processes and Applications*[C].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4: 170-199.
- [3] Bertoldi, N., M. Cettolo & M. Federico. Cache-based online adaptation for machine translation enhanced computer assisted translation[A]. In *Proceedings of Machine Translation Summit XIV: Papers*[C]. Nice, 2013: 35-42.
- [4] Bundgaard, K. Translator attitudes towards translator-computer interaction—Findings from a workplace study[J]. *Hermes*, 2017(56): 125-144.
- [5] Cadwell, P., S. Castilho, S. O'Brien & L. Mitchell. Human factors in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post-editing among institutional translators[J]. *Translation Spaces*, 2016(2): 222-243.
- [6] Carl, M., S. Gutermuth & S. Hansen-Schirra. Post-editing machine translation: Efficiency, strategies and revision processes in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settings[A]. In A. Ferreira & J. W. Schwieter (eds). *Psycho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Inquiries into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5: 145-174.
- [7] Conway, A. R. A., M. J. Kane, M. F. Bunting, D. Z. Hambrick, O. Wilhelm & R. W. Engle. Working memory span tasks: A methodological review and user's guide[J].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2005(5): 769-786.
- [8] Cumbreño, C. & N. Aranberri. What do you say? Comparison of metrics for post-editing effort[A]. In M. Carl (ed). *Explorations in Empirical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C]. Switzerland: Springer, 2021: 57-79.
- [9] Daems, J., S. Vandepitte, R. J. Hartsuiker & L. Macken. Identifying the machine translation error types with the greatest impact on post-editing effort[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7, 8: 1282.
- [10] Dahl, Ö. *The Growth and Maintenance of Linguistic Complexity*[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4.
- [11] de Almeida, G. Translating the post-editor: An investigation of post-editing changes and correlations with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across two Romance languages[D]. Dublin City University, 2013.
- [12] Ericsson, K. A. & J. Smith (ed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Expertise: Prospects and Limits*[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3] Gallupe, R. B., G. DeSanctis & G. W. Dickson. Computer-based support for group problem-finding: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J]. *MIS Quarterly*, 1988(2): 277-296.
- [14] Gaspari, F., A. Toral, S. K. Naskar, D. Groves & A. Way. Perception vs reality: Measuring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ing productivity[A]. In *Proceedings of the 11th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Machine Translation in the Americas*[C]. Vancouver, 2014: 60-72.
- [15] Guerberoof Arenas, A. What do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think about post-editing?[J]. *The Journal of Specialised Translation*, 2013(19): 75-95.
- [16] Guerberoof Arenas, A. The role of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in post-editing from a quality and productivity perspective[A]. In S. O'Brien, L. W. Balling, M. Carl, M. Simard & L. Specia (eds). *Post-Editing of Machine Translation: Processes and Applications*[C].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4: 51-76.

- [17] Herbig, N., S. Pal, M. Vela, A. Krüger & J. van Genabith. Multi-modal indicators for estimating perceived cognitive load in post-editing of machine translation[J]. *Machine Translation*, 2019(1-2): 91-115.
- [18] Jensen, K. T. H. Indicators of text complexity[J]. *Copenhagen Studies in Language*, 2009(37): 61-80.
- [19] Jex, H. R. Measuring mental workload: Problems, progress, and promises[A]. In P. A. Hancock & N. Meshkati (eds). *Human Mental Workload*[C].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88: 5-39.
- [20] Jia, Y., M. Carl & X. Wang. Post-editing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versus phrase-based machine translation for English-Chinese[J]. *Machine Translation*, 2019a(1-2): 9-29.
- [21] Jia, Y., M. Carl & X. Wang. How does the post-editing of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compare with from-scratch translation? A product and process study[J]. *The Journal of Specialised Translation*, 2019b(31): 60-86.
- [22] Johnson, P.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Psychology, Task Analysis, and Software Engineering*[M]. New York: McGraw-Hill, 1992.
- [23] Kappus, M. & M. Ehrensberger-Dow. The ergonomics of translation tools: Understanding when less is actually more[J].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2020(4): 386-404.
- [24] Koehn, P., V. Alabau, M. Carl, et al. *CASMACAT: Final Public Report*[R]. 2015.
- [25] Krings, H. P. *Repairing Texts: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of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ing Processes*[M]. Kent: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26] Langlais, P., G. Lapalme & M. Loranger. TransType: Development-evaluation cycles to boost translator's productivity[J]. *Machine Translation*, 2002(2): 77-98.
- [27] Läubli, S. & D. Orrego-Carmona. When Google translate is better than some human colleagues, those people are no longer colleagues[A]. In *Proceedings of the 39th Conference Translating and the Computer*[C]. London, 2017: 59-69.
- [28] Liu, Y., B. Zheng & H. Zhou. Measuring the difficulty of text transl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text-focused and translator-oriented approaches [J].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019(1): 125-149.
- [29] Lommel, A. Metrics for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A case for standardising error typologies[A]. In J. Moorkens, S. Castilho, F. Gaspari & S. Doherty (eds).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From Principles to Practice*[C]. Berlin: Springer, 2018: 109-127.
- [30] McNamara, D. S., A. C. Graesser, P. M. McCarthy & Z. Cai. *Automated Evaluation of Text and Discourse with Coh-Metrix*[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31] Meshkati, N. Toward development of a cohesive model of workload[A]. In P. A. Hancock & N. Meshkati (eds). *Human Mental Workload*[C].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88: 305-314.
- [32] Moorkens, J. Eye tracking as a measure of cognitive effort for post-editing of machine translation[A]. In C. Walker & F. M. Federici (eds). *Eye Tracking and Multidisciplinary Studies on Translation*[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8: 55-69.
- [33] Moorkens, J. & S. O'Brien. Assessing user interface needs of post-editors of machine translation[A]. In D. Kenny (ed). *Human Issues in Translation Technology*[C].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109-130.
- [34] Moorkens, J., S. O'Brien, I. A. L. da Silva, N. B. de Lima Fonseca & F. Alves. Correlations of perceived post-editing effort with measurements of actual effort[J]. *Machine Translation*, 2015(3/4): 267-284.
- [35] Moran, J. & D. Lewis. Unobtrusive methods for low-cost manual evaluation of machine translation[J/OL]. *Tralogy I, Session 5 - Quality in Translation*, 2011. <http://lodel.irevues.inist.fr/tralogy/index.php?id=141%26format=print>. Accessed 13/04/2022.
- [36] Nitzke, J., S. Hansen-Schirra & C. Canfora. Risk management and post-editing competence[J]. *The Journal of Specialised Translation*, 2019(31): 239-259.
- [37] O'Brien, S. Teaching post-editing: A proposal for course content[A]. In *Proceedings of the 6th EAMT Workshop, Teaching Machine Translation*[C]. Manchester: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Machine Translation, 2002: 99-106.
- [38] O'Brien, S. Machine translatability and post-editing effort: How do they relate[A]. In *Proceedings of Translating and the Computer*

- 26[C]. London, 2004.
- [39] O'Brien, S. Controlled language and post-editing[J]. *Multilingual*, 2006(7): 17-19.
- [40] O'Brien, S. Towards predicting post-editing productivity[J]. *Machine Translation*, 2011(3): 197-215.
- [41] O'Brien, S. Translati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and cognition[A]. In F. Alves & A. L. Jakobsen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C]. London: Routledge, 2021: 376-388.
- [42] O'Brien, S. & J. Moorkens. Towards intelligent post-editing interfaces[A]. In W. Baur, B. Eichner, S. Kalina, N. Kessler, F. Mayer & J. Orsted (eds). *Proceedings of the XXth FIT World Congress*[C]. Berlin: BDÜ Fachverlag, 2014: 131-137.
- [43] Peris, Á. & F. Casacuberta. Online learning for effort reduction in interactive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J]. *Computer Speech & Language*, 2019, 58: 98-126.
- [44] Ragni, V. & L. N. Vieira. What has changed with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human factors[J]. *Perspectives*, 2022: 137-158.
- [45] Rico, C. & E. Torrejón. Skills and profile of the new role of the translator as MT post-editor[J]. *Revista Tradumática: Tecnologías de la Traducción*, 2012(10): 166-178.
- [46] Sun, S. Measuring translation difficulty: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J].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015(1): 29-54.
- [47] Sun, S. Measuring difficulty in translation and post-editing: A review[A]. In D. Li, V. L. C. Lei & Y. He (eds). *Researching Cognitive Processes of Translation*[C]. Singapore: Springer, 2019: 139-168.
- [48] Sweller, J., J. J. G. van Merriënboer & F. G. W. C. Paas. Cognitive architecture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1998(3): 251-296.
- [49] TAUS. Keynotes summer 2019: A review of the TAUS global content conference in Salt Lake City, UT (USA)[R]. Amsterdam: TAUS Signature Editions, 2019.
- [50] Underwood, N. L. & B. Jongejan. Translatability checker: A tool to help decide whether to use MT[A]. In B. Maegaard (ed). *Proceedings of MT Summit VIII: Machine Transl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C]. Santiago de Compostela, 2001: 363-368.
- [51] Vieira, L. N. Indices of cognitive effort in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ing[J]. *Machine Translation*, 2014(3/4): 187-216.
- [52] Vieira, L. N. Cognitive effort in post-editing of machine translation: Evidence from eye movements, subjective ratings, and think-aloud protocols[D]. Newcastle University, 2016.
- [53] Yamada, M. Can college students be post-editors? An investigation into employing language learners in machine translation plus post-editing settings[J]. *Machine Translation*, 2015(1): 49-67.
- [54] Yamada, M. The impact of Google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on post-editing by student translators[J]. *The Journal of Specialised Translation*, 2019(31): 87-106.
- [55] 冯全功, 刘明. 译后编辑能力三维模型构建[J]. 外语界, 2018(3): 55-61.
- [56] 贾艳芳. 神经机器翻译译后编辑与人工翻译: 难度测量实证研究[D]. 湖南大学, 2020.
- [57] 孙三军, 文军. 论翻译难度的测量: 理论与方法[J]. 外语界, 2015(5): 70-78.
- [58] 谭业升. 翻译认知过程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0.

Measuring the Difficulty of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ing: A Research Framework

Abstract: Identifying the factors impacting the difficulty of machine translation (MT) post-editing and selecting scientific indicators to measure it will contribute to improving MT quality, optimizing the usability of 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tools, and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post-editing pedagogy and assessment. This study models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post-editing with its impacting factors and measures of its difficulty. It identifies three groups of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difficulty of post-editing, namely, texts (including source text and its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ors, and environments. It then discusses MT quality assessment, source text complexity, post-editor's characteristics, usability of post-editing tools, cognitive effort, and their measurements.

Keywords: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ing; task difficulty; cognitive effort;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